



维普数据库全文收录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ISVORA

ISSN 3079-4552



9 773079 455255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编辑出版: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2卷4期

2026年4月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主办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编辑出版 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编辑部
编辑部邮箱 xk@wisvora.com
投稿地址 www.wisvora.com



维普数据库全文收录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总编辑 陈科存
副总编辑 梅见华 孙文杰

编辑委员会

李兆祺	林鑫	苏天	穆艾伟	熊森浩
刘伟伟	吕憬岩	黄少安	刘宇	叶明裕
陈曦	景瑞宾	崔健	王正威	李泽宇
姚金芳	李明蔚	吴钰双	穆尚海	曹一君
陈立立	舒波	袁臣辉	郝澳茹	

版权声明

文章版权由文章作者与维思沃尔出版社(WISVORA Publishing)所有。单篇文章由 WISVORA Publishing 正式出版, 所刊载文章均依照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进行许可。根据该许可协议, 任何第三方在明确署名原作者与出处的前提下, 均可对本刊内容进行复制、传播、演绎使用, 无需作者及出版社另行个别授权。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已获得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许可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注于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与交流, 旨在为学者提供研究支持, 并促进知识的共享与应用。研究院通过出版学术期刊、举办学术会议及提供政策建议, 推动学术界与社会各界的对话与合作。

网址: www.hks.ac.cn 邮箱: info@hks.ac.c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印刷出版 ISSN 3079-4579

电子出版 ISSN 3078-4387

出版社 WISVORA Publishing
维思沃尔出版社

地址 香港新蒲岗景福街99号启德工
业大厦8楼D07

wisvora-publishing@wisvora.com
www.wisvora.com

中国大陆引进
北京中科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大陆运营
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WISVORA
Publishing



微信扫一扫

维思沃尔出版

目 录 TABLE OF CONTENTS

文化与文学研究

甲骨文人形构件在简化字中的演变-安潼潼、李宁宁 1-6

对马克思货币理论及其价值的现代性认识-张慧媛 7-11

冰灯冰雕制作技艺雕刻冰雪经济的金山银山——寒地非遗传承发展路径研究-于 欣、袁玉山 12-18

嫁妆与寡妇再嫁：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丧偶女性处境探析-胡瀛予 19-22

20 世纪上半叶新加坡胶商的”传承”交替-林晓晓 23-28

《自警编》版本考略-汪玉雅竹 29-34

明清聊城运河沿线墩台研究-黄睿贤 35-40

教育理论与实践

从“会用”到“会判”：AI 辅助下高职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三层递进培养——基于营销课程的教学实践探索-乐冰洁 41-46

基于“科普+”模式下场馆与文旅教育产业深度融合的实践与思考-白宁 47-50

AIGC 赋能“数字资产共建”产教融合实践路径研究-张蕴 51-57

主要照顾者类型对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家庭功能的调节作用-张哲 58-64

健康学习视域下幼儿体适能课程体系构建研究-李显熙 65-68

音乐教师课堂中的多重角色建构-陈雨凡 69-73

高校篮球专项身体素质训练现状与提升对策研究——以兰州大学为例-李政霖 74-79

酒店业数字化转型下职教教师复合数字能力提升路径研究——基于 DigCompEdu 框架-张惠媛、翁星佳 80-86

AIGC 赋能高校软件测试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探索-付丽方、王天顺、王骏 87-89

数智赋能高等教育科学评价与人才质量提升：困境、挑战与突围路径-吴建红 90-94

汉字构形学视角下中小学生书法教育培训摭谈-张鑫	95-99
小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现状分析与提升路径-丁建华、董辉、王环宇	100-102
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思政教育实践路径研究——以侗族琵琶歌为例-杨婧	103-106
心理情景剧在提升唇腭裂儿童自我效能中的实践应用-项毅馨、宋方港、倪宸好、陈涵涵、袁伊尔	107-110

社会与治理

智慧治理场景下社会工作者的角色转型与能力重构-殷瑞芳	111-116
何以陷入“塔西佗陷阱”：网络舆情中的信息生态位演化-李紫寒	117-123
城镇流动儿童多维贫困测度及影响机理探析——基于广东省佛山市的调查-胡诺琪、王成超、徐丹	124-130
非遗技艺文化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路径——以罗城仫佬族剪纸为例-黄雅晴、莫艳婷、杨艳	131-135
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引下的机制创新与路径前瞻-周伟	136-141
抑郁症状对低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主观收入水平的调节作用-张嘉伊、周树彤、李树芳、陈一鸣、贾紫阳、王洋洋、张明晓、葛蒲、白倩	142-148
医务社会工作的伦理困境-方玲玲、高静	149-155
偷换二维码取财行为的罪名适用问题研究-朱昊楠	156-162
儿童性引诱行为的刑法规制研究-吴亚红	163-169
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探索-毛林	170-174

经济与管理研究

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绿色化转型的影响-张育卿	175-181
快速交通影响下的旅游景区可达性研究——以安徽省为例-郭苑	182-187
网络情境中积极情绪对旅游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李季蓉	188-193

基于空间可达模型的名人文旅景点 k-近邻聚类算法-周啸、潘娟、赵太萍、田江鹏	194-199
中式养生护肤产业的商业模式创新与价值创造研究-张明珠、初琦、尹欣然、李佳纯、张烨涛	200-204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绿色技术创新与经营绩效-洪蓓高	205-210

传媒与艺术研究

从符号狂欢到价值共赢：用户共创式舆情生成逻辑与转化机制研究-李文琦	211-214
“破圈”与“重构”：共情传播视角下非遗的年轻化路径研究-徐沁怡、王奕然	215-219
感官愉悦与审美体验——ASMR 疗愈研究-冯光祥、杨欣悦	220-224
中华文化数字化传播策略研究——以抖音平台文化类短视频为例-彭心怡	225-229
艺术疗愈的数字化转型：沉浸式技术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及其设计框架-徐晨、王建民、张健	230-236
基于地方依恋理论的黑龙江生态 IP 色彩意象研究-田媛迪、宋昭卿	237-240
文旅消费新动能视角下冰雪艺术玻璃化创意设计研究-宋昭卿、田媛迪	241-243
莫里斯植物纹样与女式提包融合的设计研究-赵伟强、王玉成、王健同	244-249
传统银饰工艺在可持续时尚产品设计中的创新研究-石思雨	250-253
客家乐舞艺术的文化功能与当代价值研究-徐高瀚、吴璇	254-257
传统服饰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创新应用-李凤泽、郭俊傲	258-262
四川廉洁文化基因的时空传承与非遗化建构——以“琴鹤”意象与赵抃、丁宝桢清官谱系为例-石婷婷、管太兴	263-267
浅析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女性的服装变革-张宇璇	268-272
大白兔品牌文化的塑造与传播研究-张佳丽	273-275
夹江年画在多元民间艺术谱系中的跨界再生机制研究-余娇、佟吉丽、蒋钰	276-280

甲骨文人形构件在简化字中的演变

安潼潼¹, 李宁宁²

(1.南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 河南 南阳 473061, 2.商丘学院 人文学院, 河南 商丘 476000)

摘要: 甲骨文是中国商朝刻于龟甲、兽骨的古老文字, 作为已知中国最早的成型文字之一, 为考释古代历史文化提供了核心实物佐证。简化字是20世纪为便利书写、普及文化而形成的规范汉字, 现已成为中国内地通用书写形式, 其构字根源可追溯至甲骨文奠定的早期汉字形态, 二者分属汉字发展的奠基与当代成熟阶段, 共同承载着从表意符号到实用文字的传承演变。目前学界对甲骨文人系汉字的研究多局限于先秦静态考释, 缺乏古今完整历时梳理与现代应用关联, 基于此, 以甲骨文人形构件为核心, 聚焦简化字中含“人”构形的代表性汉字, 梳理其“显形延续”与“隐形转化”的演变路径, 探究其传承变异规律, 可以为汉字构形学理论完善、汉字教学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提供历史依据。

关键词: 甲骨文; 人系汉字; 简化字; 演变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397

在甲骨文人系汉字研究领域, 学界已积累一定成果。李建伟(2023)聚焦“人”符字展开专题探究, 宣璇(2006)系统梳理人系汉字的核心特征, 冯雪丽(2019)则侧重多“人”组合类汉字的构形规律分析。不过, 现有研究多局限于先秦文字体系的静态考释, 既缺乏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的完整历时脉络梳理, 与现代汉字应用实践的关联也相对薄弱, 难以充分彰显该领域研究的现实价值。

许慎《说文解字》载:“(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 象臂胫之形”。人类对自我主体的认知关注往往超越其他事物, 这种主体性认知投射到汉字构形系统中, 便形成了以“人形”为核心构字要素的鲜明特征, 具有深刻的内在合理性。从甲骨文到现代简化字, 含“人形”构形要素的汉字始终构成规模可观的字群体系, 其历时演变轨迹承载着汉字构形规律的核心信息, 也折射出社会文化的发展变迁。

在甲骨文中, 与“人形”直接相关的汉字被界定为人系汉字。“所谓的人系汉字是指, 在甲骨文中, 所有用‘人形’作构字部件的汉字群体。这里的‘人形’不包括人体各器官。”^[2]据统计, 甲骨文中含“人形”构件的汉字达149个。需明确的是, 本研究中“人形”取其概括性构形特征: 其一, 仅包含完整人形轮廓, 不涉及人体局部器官的单独构形; 其二, 构形属性具有性别与年龄的中立性, 故“母”“子”等凸显特定身份特征的字符不纳入此范畴。典型如“人”“从”等字, 其构形中的“人形”均呈现概括性直立体态, 体现出早期汉字构形对人类主体形象的抽象化表达智慧。

现代汉语将人定义为“由类人猿进化而成的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劳动、并能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动物”, 这种认知深化并未割裂现代汉字与“人形”构形的历史关联。在现代汉语通用的简化汉字中, 仍保留诸多与“人形”相关的构形字符, 诸如“人”“从”“众”“夫”等。其中“人”“夫”“从”等字符的甲骨文字形已呈现明确的“人形”构件, 构意直观可辨; 另有“尸”“儿”“女”等字符, 现代简化字形虽难觅“人形”的直观踪迹, 但其原始构形(以甲骨文为核心载体)均与“人形”构件存在深层谱系关联。

基于上述研究现状与文字事实, 本文以甲骨文人形构件的历时演变为核心研究对象, 通过系统梳理“甲骨文—简化字”的形态传承与变异轨迹, 揭示其构形功能的动态调整规律, 剖析书写工具革新、社会需求变迁等因素的驱动作用。本研究构建历时研究框架, 深化演变机制的学理阐释; 建立构形演变与现代应用的关联, 凸显研究的实践价值。此项研究不仅能完善汉字构形学理论体系, 为同类构件研究提供方法论借鉴, 更能为汉字教学、规范化

作者简介: 安潼潼(2003—), 男, 河南漯河人, 南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方言与文化;
李宁宁(1995—), 女, 河南周口人, 硕士, 商丘学院助教, 研究方向为文字学。

工作提供历史依据, 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一、简化汉字中仍可见的“人”

王宁先生在《汉字构形学讲座》说:“汉字构形最大的特点是它要根据所表达的意义去构形, 因此, 汉字的形体总是携带着可供分析的意义信息, 而可供分析的意义信息, 来自原初造字时造字者的一种主观造字意图, 我们称作构意, 也叫造意”^[1]。在简化汉字中, 部分汉字中保留完整可见或仅变动部分笔画的“人形”, 未缀加其他符号元素或其他元素不影响“人形”的完整性; 另有部分字符则以“人形”为基础, 经过变形或融入其他笔画等, 使原本的“人形”需要经变形、拆分等才能识别。此下文将按照演变为“人”“亻”“大”三类进行分析。

(一) 演变为“人”形

甲骨文的人写作, 象形字, 像侧面站立的人之形, 后来经过简化写作了“人”形。简化字中部分汉字的形体中有清晰可见的“人”形, 这类汉字有“人”“页”“欠”“企”“咎”等。

1.  (人), 《说文》:“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此籀文象臂胫之形。”显而易见, 这是一个象形字, 其字形像一个侧面站立的人形, 有头、身躯和肢体。后来“人”的下肢部分后缩, 上半身直立, 最终演化为简体“人”。

2.  (从), 或写作, 《说文》:“相听也。从二人。”无论是哪种形体, 字形表义均很明确: 像一个人跟从另一个人之形, 其本意就是跟从, 随从。在演变过程中, 人的上肢部分拉长, 下肢部分向后撇, 最终演化成简体“从”字。

3.  (众), 《说文》:“多也。”甲骨文“众”的字形像众人在日下耕作, 表示很多人。将三个人形放在“日”下表示人多, 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依据商代卜辞的相关记载, “众人”群体不仅能够参与祭祀、耕田等社会事务, 其日常活动的核心更集中于农业劳作与军事征战两大领域。经过字形演变, 楷书的“众”已经只剩下三个“人”形了。

4.  (页), 《说文》:“头也。从 从儿。”侧面跪跽人, 突出其首, 首上有毛。由此可见, 页就是头的意思。其简体字“页”中依旧可以看出“人形”。

5.  (欠), 《说文》:“张口气悟也。象气从人上出之形。”像一个跪跽的人朝前张大嘴, 其本义应为张嘴, 也有人认为是“张嘴打呵欠”。后篆文字形改为, 改“口”为“彡”, 但其“人”字形依旧还在。到了楷书写为了“欠”, 依旧保留了人形。

6.  (饮), 《说文》:“饮, 啜也, 从欠, 食声。”其甲骨文字形像一个人弯腰低头, 张开嘴伸出舌头从容器中喝酒。后来人与口分离, 变成酉上有倒口, 人在左边。简体“饮”字依旧保留“人”形。

7.  (企), 《说文》:“举踵也。从人止声。”人下面有止(趾), 突出脚趾之形, 应表示踮起脚后跟站立之意。也是说“企”的本义应该是踮起脚跟。简化字“企”中依旧保留“人”形, 只不过将“人”变得更加扁平。

(二) 演变为“亻”形

除了以上提到了“人”形外, 还有一些字是经过变形的“亻”形, 这一类字有“化”“保”“佢”“休”“宿”等。

1.  (化), 《说文》:“教行也。”该义应该是引申义。“化”的甲骨文字形 像一个正立的 (人) 和其倒立形象。“倒立的人代表行事不正的人或者逆天而行之人, 正立的人翻转成为倒立的人, 固‘变化’之意由此而生”^[4], 本义也应该如此。朱芳圃在《殷周文字释业》中解释:“化象人一正一倒之形, 即今俗所谓翻跟头。”后来字形演变过程中, 左边的“人”形逐渐变成“亻”, 而右边的“人”形则渐渐演化成了“匕”, 形成简体字字形“化”。

2.  (保), 《说文》:“养也。从人, 从 省。”古文孚。 , 古文。 , 古文不省。”许慎认为简化字中“保”字由“亻”“呆”组成, 但甲骨文中字形作、等。从甲骨文字形可以看出, 其由“人”“子”组合, “表示一个人把孩子背在背上”^{[5][43]}。

3.  (佢), 《说文》作:“疾也。从人句声。”形符“人”表示侧立的人形。

4.  (休), 《说文》:“息止也。从人依木。”“休”字从人从木, 像是一个人靠着树休息, “本意是人在树荫下休息”^[6]。无论是简化字还是甲骨文中, 都可以看出“人”靠着树木休息, 一是可以有所依靠用来放松,

再者也因为树下有阴凉。

5. 𡩂 (宿), 《说文》: “止也。从宀 声。 , 古文夙。 ”宿的甲骨文还作𡩂, 这个字表示一个人人睡在屋里的草席上。

(三) 演变为“大”形

“大”形汉字中的“人”被隐藏在字形之中, 需要把表示胳膊的“一(横)”去掉, 才能显示出来, 我们在这里也把这一类单独拿出来谈。

1. 𡗗 (大), 《说文》: “天大, 地大, 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像一个张开双臂正面跨立的人形, 头与四肢清晰可见, 甚至比“亼(人)”更加形象。“‘大’象人正立形几乎没有争议。”^[7]从《说文》的解释亦可看出, 当时以人为大, 认为人是万物之灵, 所以在造字时, 为了表达“大”这一概念, 就用一个张开四肢的人形表示。简体字将“𡗗”的双臂伸直, 变成一横。

2. 𡗗 (天), 《说文》: “颠也, 至高无上, 从一大。”观察其字形发现, 这是一个正立的人形构造。也有作𡗗字形的, 无论是“口”还是“一”都表示人头。这意味着在古人的认知中, “人头”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他们而言, 天空始终高远难及, 而人头的正上方恰好对应着这片苍穹——于是, 古人便以经过夸张处理的人头形象, 来象征至高无上的天空, “天”字的本义也由此定格为人头。

3. 𡗗 (美), 《说文》: “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郑玄解释“羊大则美, 故从大。”根据其解释可看出, 其字形应与“人”无关, 只是因为用“大”表意, 产生歧义。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 “美”是“人”头上增加装饰性符号, 表示饰品而生“漂亮”之义。

4. 𡗗 (夫), 《说文》: “丈夫也。从大, 一以象簪也。周制以八寸为尺, 十尺为丈。人长八尺, 故曰丈夫。”甲骨文中的“夫”和“大”十分相像, 𡗗 (大) 是正面的人形, 𡗗 (夫) 看似也是正面的人形, 只是在“大”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画, 对此, 学术界有以下解释: 其一是表示高度。“夫”字的语义内核可理解为具备特定身高维度的“成年人”意象。文献显示, 先秦时期男子服徭役的征发标准多以身高为依据, 而非单纯以年龄划分: 《周礼 飧大夫》载“国中七尺以上, 野六尺以上, 凡可任役, 皆在征召之列”, “夫”字最初的语义指向或为达到特定身高阈值的成年男性。其二, 认为“夫”的“一”画表示头簪。“古童子披发, 成人束发戴簪, 男子戴簪, 示为大丈夫也。”^{[8][686]}高鸿缙在其训诂研究中指出: “按夫成人也。童子披发成人束发, 故成人戴簪, 字倚大(个)画其首发戴簪形。由𡗗(大)生意, 故为成人意之夫。童子长五尺, 故曰五尺之童, 成人长一丈(周尺)故曰丈夫, 伟人曰大夫。许言汉八寸为周一尺, 人长八寸也, 至妻之对曰夫, 或丈夫。”其三, 尚有观点认为“一”“夫”与“大”本属同形字, 后在语言演变中分化为两音两义。虽说其各有道理, 但我们更赞成发簪说。从古人对“夫”字的训释来看, 其与“人”字的语义分野更侧重于年龄维度的成年属性, 而非身高层面的量化标准——毕竟“夫”的身份确立并不必然与服徭役绑定, “夫”字本身亦非服役资格的专属标识。基于此, 本文认为“高度说”的论证存在逻辑疏漏, 难以成立。“以簪束发, 人已长成”的表述恰能印证“夫”的本义为成年男子。

(四) 小结

“人”形构件在简化汉字中或直承原型形态, 或经形变、笔画省简衍生“亼”“大”两类核心偏旁变体。其中直承原型者, 除前文所论外, 亦包含“囚”“须”“吹”等常用字; 衍生为“亼”旁者, 另有“何”“俘”“伊”等高频用字; 演化为“大”形构件者, 则还有“因”“夹”“夭”等典型例证。此类字形虽历经数千年演变, 仍未脱离原初构意逻辑, 其形义关联可通过《说文》等传统训诂文献与现代字形谱系分析得以佐证。这一现象既凸显了汉字“据义构形”的本质属性, 更为简化汉字的理据性研究提供了具象化支撑。

二、简化汉字中消失了的“人”

在汉字演变过程中, “人”形构件在简化中消失, 简化汉字中已经看不出“人”形, 但在其甲骨文中却有明显的“人”形。甲骨文发展到简化字历经数千年, 不少汉字如今已不再使用或无从考证, 我们难以追溯其演变轨迹, 也无法探究其中“人”形构件如何演变为其他部件或逐渐消失。根据需要, 我们在此将简化字中消失了的“人”简单划分成演变为“儿”“尸”“匕”“卩”“女”等。

(一) 演变为“儿”形

1. 𡗗 (儿), 《说文》: “孺子也, 象小儿头囟未合。”从字形上看, 该字十分象形, 上部分像是囟门未合

的头部,左下部分表示婴儿的手臂,右下部分表示婴儿的身体和腿脚。

2.𠤎(元),《说文》:“始也。从一从兀。”像是一个侧立的人形,用“●”“一”突出头部。本义为人头。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狄人归其元。”这句话中元当“头”讲。《说文》解释的“始也。”是其引申义。古人认为,头在人的上部,后来引申为“第一,开始”等含义,后来又组词“元首”,指称领袖。

3.𠤎(光),《说文》:“明也。从火在人上,光明意也。”像一个跪跽的人头顶着火。古代或下位者头顶发光器物(如烛台)以供照明之俗,故字形象人头顶火形。本义是光明、光亮之意。甲骨文上为火形,下是跪跽的人形,后来字形演变为上是火形,下为站立的人形,再后来火的上部成为,下部成为一横,人演变成“儿”。

4.𠤎(见),《说文》:“见,视也。”像跪跽的人形,突出其横着的眼睛,表示“看”的本义。人跪坐着以目看之,应有平视之意。“𠤎(见)”和“𠤎(视)”本为同源字,“见”侧重动作,“视”强调方向与专注。甲骨文“见”字清晰呈现跪坐人形,目向前方,金文延续此形,至《说文》写作𠤎,线条化后人形逐渐演变,楷书写作“见”,人形已经被隐藏。

(二) 演变为“尸”形

1.𠤎(尸),《说文》:“陈也。象卧之形。”该字的甲骨文也作𠤎、𠤎等形。关于“尸”形体的解释有很多种。一说像躺卧之形,如《说文》的解释,段玉裁解释为“此字象首俯而曲背之形”。一说为蹲踞之形,如《甲骨文字诂林》姚孝遂按“尸盖象蹲踞之形”^{[9]12}。也有人认为像高坐之形,如李孝定等人。众说纷纭,暂无定论。“尸”作“尸体”意义讲已经是其引申义,而并非本义。

2.𠤎(尼),《说文》:“从后近之。”其字形像一个人坐在或靠在另一个人背上。只有足够亲密的关系,一个人才会允许另一个人坐在或者靠在自己背上。尼的本义或是表示亲昵、亲密。不过后来这个义项人们大多用“昵”字来表示。在字形演变过程中,上方的“人”形逐渐变形变成“尸”形,下方的“人”形则慢慢演化为“匕”形。

3.𠤎(尻),《说文》:“𠤎也。从尸九声。”“为指事字,表示人之臀部所在”^{[10]746}。由人形和指示符号𠤎组成,表示臀部,如《庄子·大宗师》:“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此处就用作“屁股、臀部”之义。字形发展到小篆时,“人”变成了“尸”,《说文》中写作𠤎,指示符号成了声符“九”,“尻”从指事字变成了形声字。

4.𠤎(尾),《说文》:“微也。从到毛在尸后。古人或饰系尾,西南夷亦然。”字形像人身后有尾巴一样的装饰品,所以其本义就是尾巴。古人十分重视尾部饰品,《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槃瓠之后,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这和古人的审美意识是分不开的。佩戴“尾巴”一类的饰品,是古人对动物的模仿,是古人对美的追求。

(三) 演变为“匕”形

1.𠤎(匕),《说文》:“相与比叙也。从反人。匕,亦所以用比取饭,一名柶。”关于“匕”的字形,郭沫若等人释为饭器。我们认为“匕”是“妣”的初文。

2.𠤎(比),《说文》:“密也。二人为从,反从为比。”字形像一个人跟着另外一个人,十分亲密的样子。段注“其本义谓相亲密也”。甲骨文𠤎(比)和𠤎(从)字形很像,很多学者就据此判断为“比”和“从”实为一字。但有出土文献中有“比”和“从”并列出现的情况,如“𠤎𠤎”(王比从),因此这一观点也就不攻自破。后来经过演化形成简体字“比”字形,和“从”的字形就很容易区分了。

3.𠤎(死),《说文》:“澌也,人所离也。”甲骨文的“死”字形像一个跪在一个朽骨前低头哀悼的人。表示朽骨。罗振玉:“像生人拜于朽骨之旁,死之义也。”古人用“在朽骨前低头哀悼”表示“死”,也是古人对死亡这一概念的写照。随着字形演变,跪拜的人形逐渐简化为“匕”,与“歹”组合成“死”字。虽“人形”不再明显,但其作为构字部件的意义仍隐含在字中。这种演变既体现了书写便捷的需求,也保留了原始造字的意象逻辑,使“死”的文化内涵得以延续。

4.𠤎(北),《说文》:“乖也。从二人相背。”像两个人背对着站立,本义是“违背,相背”。在卜辞中常用作被祭祀的对象——北方之土神。除此之外,它还经常被借用为“北方”之意,后来引申为“败北”,如《左传·桓公九年》:斗廉衡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此乃因古时战阵背敌而逃,取“相背”之象,故以“北”喻败。在其字形演变过程中,“人”形的腿部,逐渐向左、向右弯曲,胳膊渐渐拉直,最后演变成今天所书写的

“北”字。

(四) 演变为“卩”形

1. 𠂔 (卩), 《说文》:“瑞信也。”像人跪跽之形。《说文》中写作𠂔, 在卩中加点, 解释也和甲骨初文完全不符合。赵平安指出“卩”的渐变过程为“𠂔(乙9077, 甲骨文) — 𠂔(后2.24.3) — 𠂔(说文小篆) — 卩(楷书)”^[11]。

2. 𠂔 (即), 《说文》:“即, 即食也。”字形像人面对着一个盛满食物的容器就食之形。

3. 𠂔 (印), 《说文》:“执政所持信也。”字形左边表示手, 右边是一个侧身跪着的人形, 其合体的意思就是用手去压人, 让人屈服”。本义就是“按”, 后来由按压的意思引申为印章的“印”。

(五) 演变为“女”形

1. 𡚦 (女), 《说文》:“妇人也, 象形。”像一个女性两手交错, 曲膝而坐的侧面形体。从字形来看, 商代“女”字象双手交错、曲膝跪坐之形, 反映了当时女子的典型姿态。女在商代是通称, 无论是女儿、母亲还是先王之配偶都可称作“女”。

2. 𡚦 (安), 《说文》:“静也。从女在宀下。”所从的女字像一个敛手跪坐的人, 其股胫之间多加了一笔。“这一笔的意图是要表示跪坐时股、胫相接处, 亦即将臀部放在脚后跟上。”^{[12]117}

3. 𡚦 (好), 《说文》:“美也。从女子。”会意字, 本义为女子。在甲骨卜辞中“女”多用为女子的姓, 如“妇好”。

(六) 演变为其他形体

1. 𠂔 (立), 《说文》:“住也。从大立一之上。”像一个正面人四肢张开站立在地面上。本义是站立。为与“大”字相区别, 则在“人”形下面加以横线, 以此来表示地面。立字本是一个站立在地面的人形, 后来在演化过程中人形的上肢拉直成为横线, 下肢分开变成“ㄣ”形, 地面还是一横线不变。立字中的“人”形就不见了。此字不仅表示物理意义上的站立, 更引申为建立、确立之意, 如《礼记·中庸》“中立而不倚”, 体现人格的坚定与独立。

2. 𠂔 (走), 《说文》:“趋也。从夭止。夭止者, 屈也。”字形像弯曲双手, 摆动两臂奔跑的样子, 本义即为“奔跑”。如杜甫《石壕吏》:“老翁逾墙走, 老妇出门看。”使用的就是走的本义。

3. 𠂔 (𠂔), 《说文》:“不顺也。从干下中。𠂔之也。”字形是倒立的人形, 是(大)的倒写, 本义是倒立的人。人本应该正立, 倒立着的人看着不顺, 因此古人就用倒立的人形表示不顺从的人。

4. 𠂔 (身), 《说文》:“躬也。象人之身。从人厂声。”字形像手臂向下伸展, 肚子大的人形。本义应该是身躯而不是怀孕, 如: 𠂔 (贞, 王疾身), 进而引申为身体, 后来才引申为怀孕。

5. 𠂔 (临), 《说文》:“临, 监也。”像是一个人弯着腰俯视, 其中把眼部夸大, 来突显出“看”的含义。其今文字形 𠂔 更容易看出来, 𠂔 表示众多东西。由此可知, 临的本义是俯身查看。

6. 𠂔 (既), 《说文》:“小食也。从皀无𠂔。”皀表示盛东西的容器, 人的口形与其方向相反, 表示吃完东西准备离开的样子。

此部分演变规律性不强, 但也有一些汉字如“𠂔 (文)”“𠂔 (交)”等, 虽没有演变为固定的符号, 但又相似的特征——笔画相交。不过这些汉字也不成系统, 我们也就不再单独说明。

(七) 小结

简化汉字中部分“人”形构件虽已隐没, 但其甲骨原型可追溯至“儿”“尸”“匕”“卩”“女”等衍生形体及其他变体, 不过其演变规律较简化汉字中仍可见的“人”形更模糊, 分类仅为基于现有材料的初步归纳。甲骨文时期, “儿”类衍生字多为侧立人形, 常附加符号或突出特定部位, 如“允”“兄”; “尸”类多取侧卧之形, 以“尸”为基附加部件表意, 如“屎”“尿”; “匕”类还可举“旨”为例; “卩”类常用字稀少; “女”类衍生字则有“妥”等例证。这类构件虽经线条化、形变脱离“人”的直观形态, 却延续原初构意, 其轨迹可通过甲骨比对与《说文》训诂印证, 为汉字演化的连续性研究提供支撑。

三、总结

“人”形构件的演变呈现“显”“隐”两大路径：其一是形体外显延续，或直承原型（如“人”“从”），或经省简形变衍生“亻”“大”等核心变体（如“休”“天”），形义关联直观，构意延续性显著；其二是形体隐没转化，演变为“儿”“尸”“匕”“卩”“女”等衍生部件（如“见”“死”“安”），虽人形难辨，但构意逻辑未断。两类演变虽规律差异明显，却均未脱离汉字“据义构形”的本质。其形义关联可通过《说文》训诂、甲骨文字形比对及裘锡圭、王宁等学者的研究得以印证。

此外，我们在归纳梳理中发现，“𠂇（伯）”“𠂇（仲）”“𠂇（贝）”等部分汉字存在特殊构形演变情况：其甲骨文字形中并未显现“人”形构件，而现代简化字中则出现了直观的“人”形或“亻”旁。这类字形的“人”形元素，多源于表意功能明晰化的表达需求，或因笔画系统自然演变而偶然形成，并不属于本研究聚焦的“人”形构件从甲骨文到简化字的历时传承演变范畴，特此予以说明。

参考文献：

- [1]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市：中华书局，2015.
- [2] 宣璇. 甲骨文人系汉字研究[D].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6.
- [3] 王宁. 汉字构形学讲座[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 [4] 冯雪丽. 甲骨文人系汉字之多“人”结构汉字研究[J]. 青年文学家，2018（35）：185.
- [5]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修订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6] 陈年福. 从甲骨论早期形声字的声符形化现象[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1（2）：61-66.
- [7] 李建伟. 甲骨文“人”符字研究[D]. 保定：河北大学，2023.
- [8] 刘兴隆. 新编甲骨文字典[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
- [9] 于省吾主编. 甲骨文字诂林[M]. 北京：中华书局，1999.
- [10] 李学勤. 字源[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
- [11] 赵平安. 从“𠂇”字的释读到甲骨文的“巴方”[J]. 文献，2019（5）：62-75.
- [12] 陈剑. 说“安”字[J]. 原刊于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语言学论丛》第三十一辑，商务印书馆，2005年8月。后收入陈剑《甲骨金文考释论集》，北京：线装书局，2007.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Human-Form Components in Oracle Bone Script into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An Tongtong¹, Li Ningning²

1.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Nanyang, Henan Province,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qiu University, Shangqiu, Henan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Oracle Bone Script, an archaic writing system inscribed on tortoise shells and animal bones during the Shang Dynasty of China, serves as one of the earliest known mature writing systems in China. It provides core material evidence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history and culture.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a standardized form of Chinese characters developed in the 20th century to facilitate writing and popularize education, have now become the universal writing form in mainland China. Their structural origin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early Chinese character forms established by Oracle Bone Script. These two systems, belonging to the foundational and contemporary mature stages of Chinese character development respectively, collectively embody the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ideographic symbols to practical writing. Currently, academic research on human-related characters in Oracle Bone Script is mostly confined to static phil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e-Qin period, lacking a comprehensive diachronic combing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and an exploration of their modern applications. Based on this research gap, this study takes human-form components in Oracle Bone Script as the core, focuses on representative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containing "human" configurations, sorts out their evolutionary paths of "explicit continuity" and "implicit transformation", and explores the laws of their inheritance and variation. This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historical basi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 configuration theory,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and the inheritance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Oracle Bone Script; human-related Chinese characters;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volution

对马克思货币理论及其价值的现代性认识

张慧媛

(湘潭大学, 湖南湘潭 411105)

摘要: 马克思货币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根基, 揭示了货币的本质、起源、职能以及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联系。本文将当代经济实际情况和目前的学术争论相结合, 从货币本质的历史演进、职能的现代拓展、内生性信用机制及当代实践价值的维度, 重新审视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科学性与现实解释力, 阐明在分析现代货币现象与金融风险中的核心地位, 并为理解当代经济问题提供理论启示。

关键词: 马克思; 货币理论; 劳动价值论; 当代价值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383

货币是现代经济体系运转的血液, 它的形态与功能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进行演变, 从实物货币、金属货币到信用货币、再到电子货币, 引发了理论探讨与挑战。在时代不断发展的背景下, 诞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货币理论是否已经过时? 它的理论内核是否仍能为我们理解当代货币金融现象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 本文将证明马克思货币理论不是僵化的教条, 而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方法论的开放科学体系。在当代不仅没有失效, 而且在不断深化的经济实践中展现出历久弥新的理论价值。

一、货币的本质与起源

货币的产生来自于商品内在矛盾的必然要求, 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性, 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 满足人们的某种特定需要比如说食物可以让人不饿; “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 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2]。这两个属性既统一于商品体中, 又相互对立: 生产者关心的是价值, 希望通过出售使用价值来实现价值; 消费者关心的是使用价值, 希望通过货币来获得使用价值。这一矛盾必须在交换中才能解决。

更深层次看, 商品的二重性根源于劳动的二重性: 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 抽象劳动形成价值。在私有制条件下, 生产商品的劳动直接表现为私人劳动, 作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却具有隐蔽性。这就构成了商品经济的核心矛盾: “‘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 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1]。而商品的价值, 也只有在成功的交换中才能得以实现。这一矛盾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商品生产者为了获得商品的价值最初是进行物物交换, 但是这种方式存在很大的偶然性与局限性, 需要交换双方的需求互相匹配。例如: 拥有一头羊的生产者需要粮食, 那么个体必须找到一个同时拥有富余粮食又恰好需要羊的交换者, 交易才能达成。一旦中间有一个环节无法契合, 这次交易就无法完成。这种交换方式效率非常低下, 严重束缚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广度与深度。

为了解决商品内在的矛盾问题, 克服物物交换的困境, 价值形式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 从简单的、个别的价值形式, 到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 再到一般价值形式, 最终, 当一般等价物的角色固定地由某种特殊商品(如金银)来充当时, 就发展到了货币形式。货币应运而生, “它作为一般等价物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 能够衡量一切商品的价值并充当交换媒介, 使得商品交换的公式从商品-商品转变为商品-货币-商品”^[3]。有了货币的存在, 商品的内在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在形式上得到了

解决，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张。正如马克思精辟指出的：“货币的出现是商品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是商品交换发展的必然产物”^[4]。它并非人类的发明或契约的产物，而是商品经济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历史结晶。

二、货币职能的多维展开

货币的职能体系建立在两大基石之上：“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这是货币最根本、最直接的职能，是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最本质体现，其他职能是从基本职能派生出来的”^[5]。

“价值尺度职能是指货币以自身为尺度，来衡量和表现一切商品价值大小的功能”^[6]。这解决了商品世界千差万别的使用价值无法直接比较和通约的难题。通过货币，商品的价值获得了统一的外在表现形式——价格。“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它使得商品的价值变得可见、可衡量、可比较。执行价值尺度职能时，货币不需要现实出场，只需是观念上的货币就可以，我们在给商品贴标价时并不需要将现金摆在旁边”^[7]。

流通手段职能是指货币在商品交换中充当媒介的角色，即公式“W-G-W”（商品-货币-商品）中的“G”。它解决了物物交换中需求双重巧合的时空局限，将买卖行为分解为“卖出”和“买入”两个相对独立的环节，极大地提高了交换的效率，拓宽了市场的范围。马克思精辟地指出：“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和流通手段职能是货币的基本职能，它们是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必然体现”^[6]。正是这两大职能，使得货币成为商品经济不可或缺的血液循环系统。

然而，货币的职能并未止步于此。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信用关系的成熟，货币的基础职能必然派生出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这三种延伸职能。贮藏手段是货币退出流通，被当作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储存起来的职能，它源于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绝对可接受性。支付手段职能则出现于赊购赊销、清偿债务、缴纳赋税等场合，“货币在此不再是交换的媒介，而是作为价值的独立存在进行单方面转移，这一职能是信用关系发展的基础”^[9]。世界货币职能则是指货币越出国界，在国际市场上执行一般等价物的职能，最初由贵金属直接担任，如今则由少数主权信用货币主导。这三种职能是货币基础职能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上的扩展与应用，它们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全球化进程。

三、货币内生性与信用机制

货币从何而来？货币的供给是由中央银行外生控制，还是由经济体系内部生成？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于新古典传统的深刻洞见，即货币供给在根本上具有内生性，它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和信用创造过程紧密交织，互为因果。

（一）货币内生性

“货币内生性是指货币供应量是由经济体系内部因素决定的，而不是由外在因素强制决定的”^[8]。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内生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货币供应量与经济活动水平密切相关。当经济繁荣时，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增加，对货币的需求也相应增加，银行信贷扩张，货币供应量随之上升；当经济衰退时，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减少，对货币的需求下降，银行信贷收缩，货币供应量也相应减少。这种货币供应量与经济活动水平的同向变动关系，反映了货币内生性的基本特征。其次，货币供应量受到利率的影响。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它对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都具有重要影响。当利率上升时，企业借贷成本增加，投资减少，居民储蓄意愿增强，货币需求下降，同时银行信贷收缩，货币供应量减少；当利率下降时，企业借贷成本降低，投资增加，居民消费意愿增强，货币需求上升，银行信贷扩张，货币供应量增加。利率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这种反向变动关系，进一步说明了货币内生性的存在。最后，货币供应量还受到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政策、金融创新以及金融市场的活跃程度等都会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例如，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会增加货币供应量，而金融创新则可能改变货币的供求关系和流通速度。“金融市场的发展则为货币的流通和配置提供了更有效的渠道，从而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形成和变化”^[11]。

货币内生性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之一，它反映了货币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货币内生性理论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动态变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信用机制

信用机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机制之一，它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是经济危机的重要根源。信用机制主要包括银行信用、商业信用和国家信用等多种形式。银行信用是指银行通过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等方式提供信用。银行信用是现代经济中最重要的信用形式之一，它为企业的投资和居民的消费提供了资金支持，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然而，银行信用的过度扩张也可能导致金融风险的积累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当银行过度放贷时，可能会导致信贷泡沫的形成，一旦泡沫破裂，银行将面临大量不良贷款，金融体系将陷入危机，进而引发经济衰退。商业信用是指企业之间通过赊销等方式提供的信用。商业信用是企业之间商品交易的重要形式，它能够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促进商品的流通和销售。然而，商业信用的过度扩张也可能导致企业债务链的断裂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当企业过度依赖商业信用时，可能会导致资金链的紧张和偿债能力的下降，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10]。

国家信用是指国家通过发行国债等方式筹集资金。国家信用是国家财政政策的重要工具，它能够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等提供资金支持。然而，国家信用的过度扩张也可能导致财政危机和债务危机，进而影响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信用机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是复杂的。一方面，信用机制能够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信用机制的过度扩张和滥用也可能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因此，如何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防范信用风险，是现代经济管理的重要课题。

四、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现代现实价值

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不是尘封的历史文献，而是为我们审视当代一系列重大经济金融问题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理论。无论是应对加密货币带来的挑战，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还是重构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马克思货币理论都展现出深刻的预见性和现实相关性。

（一）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当代应用

虚拟货币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区块链技术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型货币形式。然而，从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角度来看，虚拟货币不是真正的货币，它具有很多虚假性和危害性。

首先，虚拟货币不具备货币的本质属性。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它必须具有普遍的接受性和价值稳定性。虚拟货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于交换，但接受范围的非常有限，价格波动剧烈，不具备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例如，比特币的价格在短时间内可能会出现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波动，这种价格的不稳定性就无法成为稳定的交换媒介和价值尺度。其次，“虚拟货币缺乏货币的社会权力属性。货币的社会权力属性体现在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和经济秩序的维护上。虚拟货币由于去中心化和匿名性的特点，无法承担起对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和经济秩序的维护责任”^[12]。相反，虚拟货币的炒作和投机行为可能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最后，虚拟货币的发行和流通缺乏有效监管。货币的发行和流通需要国家的信用和法律保障，以维护货币的稳定性和经济的安全性。虚拟货币的发行和流通不受国家法律和监管机构的约束，容易被用于非法交易、洗钱、诈骗违法犯罪活动。

马克思货币理论对虚拟货币的批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货币的本质和社会属性是不可替代的，任何试图绕开货币本质和国家信用的虚拟货币形式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货币”^[13]。政府和监管机构应加强对虚拟货币的监管，防范其带来的金融风险和社会危害，维护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二）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启示

马克思货币理论为金融风险防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石。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内生性与信用机制的相互作用导致了金融风险的产生和积累。货币供应量的过度扩张和信用机制的过度滥用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资产泡沫、银行危机和债务危机等一系列金融风险。因此,“防范金融风险必须从货币供应和信用机制入手”^[14]。

首先,要加强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合理调控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政府和中央银行应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合理确定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和规模,避免货币供应量的过度扩张。同时,要加强对货币市场的监测和分析,及时发现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趋势和潜在风险,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加以调控。其次,要加强对信用机制的监管。信用机制是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之一,加强对信用机制的监管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关键。政府和监管机构应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规范金融机构的信贷行为,防止金融机构过度放贷和信用扩张。同时,要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打击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和违法违规活动,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最后,要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机制。金融风险预警机制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保障。“政府和监管机构应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测和分析,及时发现金融风险的早期信号,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加以防范和化解”^[12]。通过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可以提高金融风险防范的前瞻性和有效性,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

马克思货币理论为金融风险防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它揭示了货币内生性与信用机制的相互作用机制,为我们理解金融风险的产生和积累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基础。在现代金融体系中,防范金融风险必须从货币供应和信用机制入手,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防范机制,维护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三) 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贡献

马克思货币理论为宏观经济理论提供了重要的逻辑基础。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内生性与信用机制的相互作用对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和信用机制的扩张与收缩直接影响着经济的繁荣与衰退、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就业与失业等宏观经济变量。因此,理解货币内生性与信用机制的相互作用机制,对于构建科学合理的宏观经济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马克思货币理论揭示了货币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货币内生性理论表明,货币供应量是由经济体系内部因素决定的,而不是由外在因素强制决定的。这种内在联系表明,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与经济活动水平密切相关,经济繁荣时货币供应量增加,经济衰退时货币供应量减少。这一理论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合理调控货币供应量,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其次,“马克思货币理论揭示了信用机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重要作用”^[14]。信用机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机制之一,它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是经济危机的重要根源。信用机制的扩张与收缩直接影响着经济的繁荣与衰退、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就业与失业等宏观经济变量。这一理论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政府和中央银行应加强对信用机制的监管,防范信用风险,维护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最后,马克思货币理论揭示了经济周期的内在规律。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货币内生性与信用机制的相互作用是经济周期的重要决定因素。经济繁荣时期,货币供应量增加,信用机制扩张,经济快速发展;经济衰退时期,货币供应量减少,信用机制收缩,经济陷入低谷。这一理论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根据经济周期的变化,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平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14]。

马克思货币理论为宏观经济理论提供了重要的逻辑基础。它揭示了货币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信用机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经济周期的内在规律,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指导。在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中,马克思货币理论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指导意义。

五、结论

货币的本质是社会生产关系载体,这一内核在数字货币时代依然成立。马克思关于货币支付手段与危机的论

述, 为理解现代金融风险提供了帮助, 揭示了信用扩张与债务链条的系统性脆弱。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当代价值, 在于将货币视为社会历史范畴, 这一视角对数字经济时代的货币治理与金融监管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 [1] 政治经济学批判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4.
- [2] 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3.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 第 109 页.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第 147 页.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80 页.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107 页.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83 页.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86 页.
- [9] 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10] 李乾坤. 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演进及其当代价值[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10(05):84-94.
- [11] 李乾坤. 金融衍生品的社会哲学——对马克思价值形式分析和货币理论当代意义的探讨[J].理论与改革,2022,(04):72-83+166-167.
- [12] 王国刚. 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及其实践价值[J].金融评论,2019,11(01):1-14+123.
- [13] 蒋海曦. 当代货币形式的演变及成本——基于马克思货币理论视角[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9(05):3-19.
- [14] 鲍金. 论货币的社会权力——基于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当代考察[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03):29-35.

Re-examining Marx's Monetary Theory and Its Value

Zhanghuiyuan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Abstract: Marx's monetary theory, rooted i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reveals the essence, origin, and functions of money as well as its intrinsic connection to the capitalist economy. This paper integrates contemporary economic realities and current academic debates to re-examine the scientific validity and practical explanatory power of Marx's monetary theory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includ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oney's essence, the modern expansion of its functions, the endogenous credit mechanism, and its contemporary practical value. It elucidates the theory's central role in analyzing modern monetary phenomena and financial risks while providing theoretical insights for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economic issues.

Keywords: Marx; Monetary Theory; Labor Theory of Value; Contemporary Value

冰灯冰雕制作技艺雕刻冰雪经济的金山银山 ——寒地非遗传承发展路径研究

于欣¹ 袁玉山¹

(1.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摘要:冰灯冰雕制作技艺是我国东北地区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自身凭借其与自然资源的紧密结合和市场化运作,成为非遗保护的成功范例。本文以哈尔滨冰灯冰雕制作技艺发展史实为基础,结合其与自然资源、旅游经济、现代科技和地方文化的深度融合,分析其传承保护路径,并通过实证研究与跨文化比较,总结其对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启示与指导意义。

关键词:冰灯冰雕; 非物质文化遗产; 冰雪经济; 市场化运作; 非遗保护启示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351

引言

在祖国的东北边陲,有一座城市与冰雪共舞,它就是哈尔滨。冰灯冰雕制作技艺,作为哈尔滨独特的非遗文化瑰宝,从松嫩平原的民间照明习俗,历经岁月的雕琢,演变成今日惊艳世界的冰雪艺术。60余载的传承发展,不仅承载着东北的民俗记忆,更雕刻出了冰雪经济的繁荣盛景。从兆麟公园第一届冰灯游园会的偶然发端,到如今作为第九届哈尔滨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式元素,向世界展示冰雪运动的希望,这一技艺见证了城市的变迁与文化的交融。它在开放包容的城市基因中汲取养分,在政策的呵护与多方协作下茁壮成长,实现了产业化与文旅融合的华丽转身。

一、从冰灯照明的民间习俗到冰雪艺术的璀璨绽放

2025年2月7日晚,在第九届哈尔滨亚洲冬季运动会的开幕式上,有一位手持冰灯的小朋友以花样滑冰的步伐在开幕式现场翩翩起舞,小女孩手中散发着点点暖光的小冰灯,点亮的是冰雪运动未来的希望,如图1所示。冰灯冰雕的概念一般是指在冬季的室外景区,以冰为材料,运用砌筑、堆垒、雕镂、浇冻和镶嵌等多种技法,制作出冰建筑、冰雕塑等各类观赏性作品,同时配置内设灯和外设灯,达到形与光的和谐统一,形成色彩斑斓、晶莹剔透、融合自然的景区^[1]。时至今日哈尔滨冰灯冰雕制作技艺已跨越60余年,在北国冰城哈尔滨雕刻出冰雪经济的金山银山。

最早的冰灯是流行于中国北方的一种民间艺术,早期的冰灯是松嫩平原的农民和松花江流域的渔民冬季的照明工具,当时的人们在冬季把水倒入桶中进行冷冻形成桶状冰柱,再倒出中间未冻的清水,将油灯或蜡烛放入中空的“灯罩”,便不会被风吹灭。后来人们在春节和元宵节期间也制做冰灯摆在门前,或烫孔穿绳让孩子提着玩,用以增加节日气氛。黑龙江最早记载冰灯的文献见于清朝嘉庆年间的《黑龙江外记》:“上元,城中张灯五夜,村落妇女来观剧者,车声彻夜不绝。有镂五六尺冰为寿星灯者,中燃双炬,望之如水晶人。^[2]”之所以不以灯笼或油灯照明,是因为这些灯都禁不住东北冬季的寒风,唯有冰灯既能照亮夜晚,而又风吹不灭。在清代1尺约等于现代的31.5厘米,据记载“五六尺冰为寿星灯者”,其换算现代高度在1.57~1.89米之间,和后文所提到4米的大型冰雕作品在制作难度上还存在很大差别。

作者简介:于欣(2002—),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非遗数字化与视觉传达设计;

袁玉山(2001—),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数字演绎与视觉传达设计。



图1 第九届哈尔滨亚冬会开幕式出现的小冰灯（央视直播截图）

哈尔滨现代冰灯艺术的兴起以及赏冰灯的独特城市文化，缘起于62年前的一次偶然。1963年的农历正月初八，时任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在即农贸市场时，偶然发现路边摆放着一个用水桶制成的空心冰坨，中间插了根点燃的蜡烛，成了一盏冰灯。正是这种土制的“穷棒子灯”给了任仲夷灵感。冰灯，不正是冰天雪地的哈尔滨的特色吗！1963年正月十四，哈尔滨第一届冰灯游园会在兆麟公园拉开帷幕，如图2所示，6天共接待游人25万，占当时全市总人口的1/10。哈尔滨冰灯游园会，是中国第一个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冰灯展示，使濒临绝迹的中国古老的民间艺术走上复兴之路，为“冰城”哈尔滨的寒冬带来了无限春光^[3]。



图2 哈尔滨首届冰灯游园会（网络图片）

到了1964年第二届哈尔滨市冰灯游园会，在城市建筑研究所所长王丽生和他的助手朱秀芳、关绍羽对冰的物理性能有了科学验证的基础上，人们开始利用松花江天然采冰制作冰灯、冰雕以及大型冰景观与冰建筑，并全部采用电光源进行照明^[4]。哈尔滨冰雕艺术的创始人之一，现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杨世昌先生和哈尔滨园林雕塑工作室的同事花费一周的时间夜以继日地创作出一件高达4米的《工农兵群像》大型冰雕作品，如图3所示。该作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件大型户外冰雕，开启了我国现代冰雕艺术的新篇章^[5]。



图3 《工农兵群像》大型冰雕作品（网络图片）

二、开放包容与政策赋能

哈尔滨冰灯冰雕制作技艺自《工农兵群像》大型冰雕作品问世,跨域一甲子的发展传承接力,这里面离不开非遗保护政策的支持,更离不开哈尔滨这座城市所赋予的开放包容的传承基因。哈尔滨冰灯冰雕技艺作为一项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于2009年3月,经黑龙江省政府批准成为黑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艺术特色不仅体现在对东北民俗文化的传承上,还融合了多元文化的精华,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

（一）哈尔滨的城市基因：非遗传承的特殊土壤

哈尔滨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城市,人们无法沿着古老的墙垣去探寻她的过去,只能从那些百年建筑身上追索历史的脉络^[6]。在历史上曾有俄国、苏联、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丹麦、波兰、葡萄牙、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西班牙、瑞典、捷克斯洛伐克、瑞典在哈尔滨设立驻华总领事馆或领事馆。城市建筑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新艺术运动、文艺复兴、巴洛克、古典主义、拜占庭式、折衷主义、哥特式、装饰艺术运动等建筑风格纷纷拔地而起。

这种多元文化的交融塑造了哈尔滨开放包容的城市基因,为冰灯冰雕技艺注入了新的活力。

哈尔滨冰灯冰雕技艺在传统与创新的结合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哈尔滨冰雕冰雪造园艺术的造型极为丰富多样,涵盖了各种人物、动物、建筑、景观等元素。艺术家们凭借着丰富的想象力和精湛的技艺,将这些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美轮美奂的冰雪世界。从气势恢宏的宫殿城堡到充满现代感的城市建筑,如图4所示,从可爱的卡通形象到逼真的人物雕塑,无不展现出冰雕艺术的无限魅力。冰雕作品的材质——冰,具有天然的晶莹剔透的特性,这使得冰雕作品在光线的照射下能够呈现出独特的光学效果。当光线穿过冰体时,会产生折射、反射等现象,使冰雕作品散发出五彩斑斓的光芒,仿佛置身于梦幻般的童话世界。这种晶莹剔透的质感是其他艺术材料所无法比拟的,也是哈尔滨冰雕冰雪造园艺术的一大特色。



图4 第三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游园卡（网络图片）

来到哈尔滨，我们真切感受到“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冰雪文化和冰雪经济正在成为哈尔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对外开放的新纽带^[7]。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冰雪主题公园，其冰雕建筑群高达数十米，冰灯长廊绵延数公里，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电动工具的使用提高了冰雕制作的效率和精度，3D 打印技术则为复杂冰雕模型的设计和制作提供了技术支持。LED 灯光和音效技术的应用，使冰灯冰雕作品在视觉和听觉上更具吸引力。例如，灯光的变化与音乐的配合，为游客营造出沉浸式的艺术体验。这种科技与艺术的结合，不仅提升了冰灯冰雕作品的艺术表现力，还为其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二）顶层设计助力多方协作：政府、企业、高校与国际交流的合力

冰灯冰雕制作技艺的成功传承与发展，离不开政府、企业、协会、高校和国际交流的多方协作。这种协作模式为非遗传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而政府的顶层设计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引领作用。哈尔滨市政府在冰灯冰雕技艺的传承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政策赋能作用。通过顶层设计和政策支持，政府为非遗传承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发展空间。例如，《哈尔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明确将冰灯冰雕技艺列为重点保护对象，并制定了详细的保护措施和发展规划。政府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冰雕制作、场地建设和活动举办，为冰灯冰雕技艺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哈尔滨国际冰雕比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冰雕艺术家，促进了技艺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哈尔滨冰灯冰雕制作技艺的传承发展，一方面得益于顶层设计的政策支持，但另一方面其传承与发展又不完全依赖于政策支持，而是积极的和市场相结合，利用自身独特的艺术特色吸引企业的关注。本地企业通过市场化运作和资源投入，积极参与冰灯冰雕技艺的传承与推广。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由哈尔滨马迭尔集团运营，成为冰灯冰雕技艺市场化运作的成功典范。企业不仅为冰灯冰雕技艺提供了资金支持，还通过品牌推广、活动策划和市场运营，提升了冰灯冰雕技艺的社会影响力和经济价值。

高校聚集大量的管理型、理论型、实践型人才，可充分利用此研究优势、推广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培养优秀技术人才，弘扬传统工艺，提升冰灯冰雕技术水平，打造本土文化品牌，同时对黑龙江的地区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8]。黑龙江大学于 2015 年获批国家艺术基金：“冰灯冰雕艺术设计与实践人才培养”培训项目。该项目的培养方式采取课堂教学、专题讲座、座谈讨论、创作方案指导以及室外现场实践教学指导等方式^[9]。通过系统化的教育和培训，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不仅为冰灯冰雕技艺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科研创新，还通过开设相关课程、举办学术研讨会和出版研究成果，推动了技艺的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播。

哈尔滨冰灯冰雕技艺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还是一种文化传播的载体。国际冰雪文化交流也广泛开展，1989 年，美国政府给中国文化部发来邀请函，邀请中国艺术家到怀俄明州指导当地冰灯游园会事宜。彼时美国还没有冰雪雕塑，我国派出杨世昌等一行三人来到怀俄明州。在怀俄明州开了一个规模较小但精彩瑰丽的冰灯游园会，如图 5 所示，在美国产生了轰动，各大新闻纷纷报道，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还给杨世昌写了一封信，感谢杨世昌先生他们把冰雪艺术传到了美国，这也是城市间互相交流的一种友好表现。



图 5 1989 年怀俄明州冰灯游园会中的孔雀灯冰雕作品（杨世昌先生处）

主题文化节模式是商业和非遗融合的产物，是在特定公共文化空间营造出优良环境体验的过程，发挥了休闲娱乐、文化体验、展示观赏等多种功能^[10]。20 世纪 80 年代，哈尔滨冰灯冰雕已经名满天下，慕名欣赏者络绎不

绝，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建议在冰灯游园会基础上举办一年一度的冰雪节，并确定每年的1月5日为“哈尔滨冰雪节”，且只有开幕式没有闭幕式^[11]。时至今日，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冰雕艺术家，促进了技艺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与日本札幌冰雪节、加拿大魁北克冰雪节和挪威奥斯陆滑雪节并称为国际四大冰雪节。哈尔滨国际冰雪节的成功，推动了冰灯冰雕制作技艺的国际化发展，为冰灯冰雕技艺提供了新的创作灵感，还为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推广提供了平台。日本札幌冰雪节以其精致的冰雕艺术闻名世界，哈尔滨冰灯冰雕技艺在发展中借鉴了日本冰雕的精细工艺和现代设计理念，提升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这种多元文化的融合，使哈尔滨冰灯冰雕技艺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既有东北民俗的质朴，又有国际艺术的精致。

三、冰灯冰雕制作技艺的产业化与文旅融合品牌实践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12]。冰灯冰雕制作技艺作为哈尔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通过与冰雪旅游、文化创意产业的深度融合，实现了产业化与文旅融合的成功实践。兆麟公园冰灯游园会、冰雪大世界和采冰节作为冰灯冰雕制作技艺文旅融合的三大品牌活动，分别从文化传承、国际化发展和民俗文化三个角度展现了非遗技艺的产业化实践。这种文旅融合的成功经验不仅提升了冰灯冰雕技艺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还为其他非遗项目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与借鉴。通过文旅融合的实践，冰灯冰雕技艺将继续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世界的目光。

（一）兆麟公园冰灯游园会：文旅融合的文化传承载体

兆麟公园冰灯游园会自1963年首次举办以来，已成为哈尔滨冬季文化的重要象征。作为冰灯冰雕技艺的发源地，兆麟公园通过冰灯游园会展现了冰灯冰雕技艺的历史底蕴与文化价值。中国第一个冰滑梯——两米多高的大象滑梯也于1979年元旦在第五届冰灯游园会诞生。在这里游客可以通过冰雕作品、灯光秀和文化活动，多角度领略冰灯冰雕技艺的独特魅力。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到精美的冰雕作品，还可以参与冰雕制作体验、民俗表演等活动，感受冰雪文化的深厚内涵。

兆麟公园冰灯游园会不仅是一个展示平台，更是承载哈尔滨冰雪文化记忆的载体。不同于冰雪大世界、哈尔滨国际冰雪节的是：兆麟公园冰灯游园会没见过都会把富有历史记忆的经典作品和最传统的制作技艺展现出来，俨然已经成为了冰灯冰雕制作技艺展示的博物馆，这勾起了冰城儿女几代人的童年回忆，如图6所示。通过市民与游客的共同参与，冰灯冰雕技艺得以普及与传承。这种文旅融合的实践，不仅增强了公众对非遗技艺的认知与认同，还为哈尔滨冬季旅游增添了独特的文化魅力。



图6 1963年第一届哈尔滨冰灯游园会《冰花》景观（作者自摄）

（二）冰雪大世界：文旅融合的国际化典范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自1999年创办以来，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冰雪主题公园，也是冰灯冰雕技艺文旅融合的国际化典范。非遗与旅游的结合要充分遵循基本规律，即保护非遗资源是前提，挖掘文化内涵是关键，创新创造转化是动力，深度融合发展是根本^[13]。冰雪大世界通过冰雕作品、灯光秀和娱乐项目，打造了世界级冰雪艺术

景观。每年冬季，数百万游客慕名而来，感受冰雪艺术的震撼与魅力。2025年2月7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作为第九届哈尔滨亚冬会开幕式的分会场，再一次向世界展现了其无与伦比的冰雪魅力与独特的城市风情。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冰雪大世界瞬间化身为一片梦幻的冰雪王国，晶莹剔透的冰雕在五彩灯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与主会场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遥相呼应，共同奏响了这场亚洲冰雪盛会的华丽乐章。此次作为亚冬会开幕式分会场，冰雪大世界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媒体的目光，也让全球更多人了解到了哈尔滨这座城市对冰雪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及对冰雪运动的热爱与推广，如图7所示。



图7 亚冬圣火在冰雪大世界分会场点燃（央视直播截图）

冰雪大世界的成功不仅在于其规模宏大、艺术精湛，更在于其国际化视野与市场化运作，这一点在它每一届的冰雪大世界主题中就能看出。1999年12月31日的第一届冰雪大世界主题为“玉砌个世界贺千年”，2004年12月25日第六届主题为“中俄友好年”，2007年12月23日第九届主题为“冰雪世界，奥运梦想”，第二十六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则以“冰雪同梦亚洲同心”为主题。每一次主题公园的都有着极其强烈的“大设计、大主题、大气象”运作，通过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如LED灯光、3D打印），冰雪大世界提升了游客的体验感。这种文旅融合的实践，不仅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还提升了哈尔滨作为“冰城”的国际影响力。

（三）采冰节：文旅融合的民俗文化盛宴

民俗文化游模式，即通过打造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旅游路线和旅游项目，让游客实地体验当地的风土民情、历史文化，使非遗文化成为拉动旅游经济的制胜法宝^[14]。采冰节是哈尔滨冬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冰灯冰雕技艺文旅融合的民俗文化盛宴。采冰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东北地区冬季的采冰传统，过去，东北地区的渔民和农民会在冬季采冰，用于储存食物、制作冰灯或建造冰屋。这种采冰活动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民俗传统，并成为冰灯冰雕制作技艺的重要环节。

采冰节不仅是一个文化活动，更是一个冰雪经济的起点，哈尔滨将冰雪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文化遗产相结合，推动了冰雪旅游与地方经济的发展。采冰节以采冰仪式为核心，融合了传统民俗与现代旅游，打造了独特的文化体验。游客不仅可以观看采冰仪式，还可以参与冰雕制作、冰雪游戏等活动，感受冰雪文化的独特魅力。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凸显了旅游的文化性和地方性属性^[15]。这种文旅融合的实践，不仅传承了非遗技艺，还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哈尔滨冬季旅游增添了浓厚的民俗文化氛围。

结语

政策性非遗保护只能护住一时，若不能和时代发展同频、和经济发展共舞，非遗项目只能走向博物馆。哈尔滨冰灯冰雕制作技艺从民间照明习俗发展为璀璨的冰雪艺术，历经六十余年，在开放包容的城市基因、政策赋能、多方协作、科技助力以及产业化与文旅融合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成功实现了传承与发展，不仅成为哈尔滨独特的文化符号，对东北传统民俗传承意义重大，还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活力，提升了城市国际影响力，是寒地非遗传承发展的成功范例，为其他非遗项目提供了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 [1] 余雁.哈尔滨冰灯冰雕制作技艺的数字化保护探析[J].工业设计,2019,(02):95-96.
- [2] 西清.黑龙江外记[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 [3] 余雁.哈尔滨冰灯艺术发展回顾与特征解析[J].工业设计,2020,(03):138-139.
- [4] 王景富.哈尔滨冰雪文化发展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 [5] 杨世昌.忆哈尔滨第一件冰雕的诞生[G]//哈尔滨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哈尔滨文史资料.第34辑,那个冬天——哈尔滨冰雪文化50年.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3:23-25.
- [6] 刘金祥.刍议哈尔滨城市精神及现实功效[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1,32(10):26-32.
- [7] 习近平.在哈尔滨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式欢迎宴会上的致辞[N].人民日报,2025-02-08(003).
- [8] 王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角下黑龙江冰灯冰雕技艺在高校教育中的传承与发展[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18,(12):91-92.
- [9] 培养冰雪艺术人才,打造冰城文化名牌——国家艺术基金“冰灯冰雕艺术设计与实践人才培养”项目在黑龙江大学启动[J].工业设计,2017,(01):61-64+191.
- [10] 郭延龙,耿新蕾.文旅融合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研究——以安徽省非遗文旅案例为例[J].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21(01):16-20.
- [11] 刘亚薇,崔姗.非遗文化“哈尔滨冰灯冰雕”的传播与保护[J].边疆经济与文化,2021,(03):17-19.
- [1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13] 黄永林,邹蓓.推动非遗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基本规律与主要路径[J].文化遗产,2024,(01):1-8.
- [14] 马道玥,刘宇.文旅融合背景下“非遗+旅游”实践模式及发展路径探析——以天津市非遗文旅为例[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4(03):89-96.
- [15] 温欣.城市文旅热的地方性重构与文化阐释[J].旅游学刊,2025,40(01):75-86.DOI:10.19765/j.cnki.1002-5006.2025.01.011.

Ice Lantern and Ice Carving Production Technology, Carving the Gold and Silver Mountains of Ice and Snow Economy: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Path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old Regions

Xin Yu¹, Yu Shan Yuan¹

¹*School of Art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ice lantern and ice carving technology is a uniqu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Northeast China, and it has become a successful exampl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by virtue of its close integration with natural resources and market-oriented operation.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ice sculpture making technology in Harbin, combined with its deep integration with natural resources, tourism economy,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local cul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its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path, and summarizes its enlightenment and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and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Keywords: Ice Lantern and Ice Sculptur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e and Snow Economy; Market-oriented Operation; Enlightenment on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嫁妆与寡妇再嫁：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丧偶女性处境探析

胡瀛予

(暨南大学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嫁妆与寡妇再嫁之间的关系，是理解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丧偶女性处境的重要切入口。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一般来说嫁妆终身依附于已婚女性，丈夫死后归寡妇所有；然而正因如此，附带嫁妆的寡妇往往成为多方势力角力的对象。夫家世系为防止嫁妆随再嫁而流失，借遗嘱安排等手段极力挽留寡妇；社会舆论以“残忍母亲”的道德话语对再嫁女性加以规训，其实质亦指向嫁妆转移对父系家族财产的冲击；出生家庭则出于重续姻亲联盟的利益考量，往往积极促成守寡女儿的再嫁。嫁妆由此同时构成阻力与推力，使寡妇的再嫁选择始终处于多方博弈的夹缝之中。寡妇再嫁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嫁妆的归属与流向，而非个人意志的自由表达。

关键词：意大利；文艺复兴；寡妇；嫁妆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398

1427年，寡妇在托斯卡纳地区总人口中的比例远高于鳏夫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分别约为13.6%和2.4%。而且，在佛罗伦萨的人口普查中，40岁的寡妇占女性总人数的18%。²理论上来说，这些寡妇们有权做出自由的选择——她可以继续与孩子住在丈夫的房子里；或者，她也可以搬出丈夫的房子，与她的孩子独立生活；又或者，她也可以选择再嫁，迈入新一段婚姻，与前夫的家族划清界限。然而，在现实实践中，寡妇的选择往往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其中，结婚时女性的出生家庭所提供的嫁妆始终依附在女性身上，因此使得女性守寡后成为多方势力的争夺的目标，嫁妆化为阻力或者成为推力，对寡妇再嫁的意愿与可能造成了多样的影响。

关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寡妇问题的研究，学界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克里斯蒂娜·克拉皮施-祖伯(Christiane Klapisch-Zuber)，依托对托斯卡纳地区1427年地籍册的系统分析，对寡妇的数量规模及其再嫁现象进行了考察；³在国内学界，俞金尧从宏观的欧洲视野探讨了寡妇再嫁的普遍规律与地区差异。⁴然而，现有研究对嫁妆制度在寡妇再嫁问题上所发挥的具体机制关注尚显不足，尤其是嫁妆如何同时构成阻力与推力、分别影响不同利益主体对寡妇再嫁态度的内在逻辑，仍有深入探讨的空间。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嫁妆制度为核心线索，考察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社会中各方势力围绕嫁妆对寡妇再嫁施加的影响。

一、嫁妆的归属纠纷与夫家世系对寡妇再嫁的阻力

原则上来说，嫁妆是一笔依附于已婚女性的终身财富。通常，当嫁娶双方决定婚姻时，女方的父亲会为女儿准备一笔财产作为嫁妆。尽管这笔嫁妆通常由丈夫代为管理，但在法律上其终身依附于女方。未经女方同意，丈夫不得私自转让嫁妆。丈夫死后，这笔嫁妆就会成为寡妇应得遗产的一部分。如若寡妇再婚，嫁妆也会随着新的婚姻关系而完全转移到与新任丈夫的家庭中。也就是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家庭中存在两类财产，一类是男方创造或世系继承而来的财产，另一类则是女方结婚时为这个家庭所带来的财产。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两者的界限相当模糊，女方带来的嫁妆往往与男方的财产混为一体，被用于整个家庭的共同开支或其他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如若寡妇迅速再嫁，行使其索回嫁妆的正当权利，便极有可能破坏夫家的财产状况的平衡。

尽管女性的嫁妆的开支，处于法律规定与现实实践的暧昧边界，但在丈夫去世后，意大利城邦法明确地保护了寡妇索取嫁妆的权利。1242年，威尼斯颁布了与女性索回嫁妆相关的法律原则，用法律程序对女性索回嫁妆。丈夫去世后，寡妇或者她的继承人可以将嫁妆文件递交到司法机关处，司法人员就会批准寡妇从夫家的财产中恢

作者简介： (2000)

² Christiane Klapisch-Zuber, *Women Family and Ritual in Renaissance Italy*, London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 120.

³ Christiane Klapisch-Zuber, *Women Family and Ritual in Renaissance Italy*.

⁴ 俞金尧：《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寡妇再嫁》，《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38至149页。

复其嫁妆。即便夫家没有能力偿还妻子的嫁妆，政府也会从担保嫁妆的人的财产中恢复寡妇的嫁妆。¹15 世纪时，佛罗伦萨的法律和司法机构总是站在寡妇一边。1415 年，佛罗伦萨修订的法令，在重申妇女缺乏自由处置嫁妆的同时，也赋予了她们在丧偶时收回嫁妆的权利。只要寡妇坚持索回自己的嫁妆，她们最终会收回她们为这个家庭带来的财富。²此外，1396 年，米兰修订的法令也保障了寡妇再婚的嫁妆。³

在法律规定下，丈夫不得不承认寡妇索回嫁妆的权力，但为了在自己死后为家庭留下寡妇身上的嫁妆，丈夫们往往会在临终前竭尽全力，鼓励寡妇放弃任何带着嫁妆离开想法。虽然女性并不具有继承丈夫财产的权利，但为了保证妻子在自己死后放弃或延迟索回嫁妆，丈夫往往会有条件地留给妻子一份财产。威尼斯人加斯帕雷在遗嘱中除了归还妻子卡泰丽娜·祖利安诺的嫁妆外，而且额外还留给她食物、衣服和 100 达克特所产生的利息，另外还有一间配有一张床的房间，“只要她在成为寡妇之后过着守贞和让人敬重的生活。”而且，加斯帕雷还要求他的继承人把自己的妻子作为一家之主和母亲来尊敬，听从她的教诲和建议。⁴此外，丈夫们也会向他们的妻子开出经济上十分诱惑的条件，让她们不要再婚。尼科洛·穆达佐在 1420 年的一份遗嘱中，除了 1100 达科特的嫁妆外，还将 1000 达科特的国家资助债务股份收入以及她余生的衣食费用遗赠给了妻子埃莱娜。这些遗赠都是无条件的。但是如果她为了更大程度的爱和利益，愿意保持寡妇的身份，和孩子们保持住下去，她每年将从其丈夫的遗产中获得额外的 50 个达克特，两张床和她的所有衣服。穆达佐和无数效仿他的人一样，只要寡妇不再婚，他就会在许诺寡妇永久居住在丈夫家的法定权利之外，再给她一些物质上的好处。⁵在丈夫们的考虑中，应该让寡妇为子女保留嫁妆，而不是将其用于再婚。不仅如此，有些丈夫还会以指定妻子为遗产执行人的方式挽留妻子。根据 14-15 世纪威尼斯贵族男子的 104 份遗嘱内容来看，14 世纪的 55 份遗嘱中，有 35 份遗嘱指定妻子为遗嘱执行人，占遗嘱总数的 64%；在 15 世纪的 49 份遗嘱中，有 43 份遗嘱指定妻子为遗嘱执行人，占遗嘱总数的 88%。⁶将妻子定为遗嘱执行人，这是一种利益的交换，也是为了巩固丈夫死后寡妇与家庭成员间的关系，让寡妇推迟或放弃再婚，保护夫家中经济状况至少短期内的平衡与稳定。

对于继承人还是未成年人的家庭，如果家庭中的寡妇为了第二次婚姻而突然离开他们，那么这些未成年继承人就需要承担偿还寡妇嫁妆的义务，他们的经济状况显然会遭受残酷的打击。在佛罗伦萨，如若寡妇选择再婚，即便继承人未成年，前夫家也不得拖延归还寡妇嫁妆的时间。于是，为了杜绝嫁妆从家庭财产中抽离出去，留下未成年子女和年轻寡妇的遗嘱执行人会从源头上下手，通过加入许多劝阻性条款来避免寡妇短期内再嫁的风险。⁷

对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女性来说，嫁妆是其继承父亲财产的唯一来源。一旦女性得到一笔嫁妆，那么父亲的其他资产就不会再分配到她身上。如果寡妇仅仅凭着自己的嫁妆生活，尽管她们可以参加各种经济活动，但她们仍然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如果夫家世系为了在其去世后挽留妻子，在遗嘱中给予妻子的财产能够更大程度的为她们的寡居生活提供更实际与稳定的物质保障，很多寡妇就会选择放弃或延迟再婚。

二、道德规约对“残忍的母亲”的指责

如上文提及，尽管在法律上寡妇有权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再嫁与否，但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社会，那个时代的道德观念也并不鼓励寡妇的再嫁。在当时人们的认知里，寡妇被认为因品尝过肉体欢愉而更容易贪恋堕落。因此，相比鳏夫，寡妇的再婚格外容易成为道德谴责的焦点。1613 年，巴卡拉赫的一名寡妇受到讯问并被关押，理由不过是她的举止“像一名公娼”，她在深夜时与轻薄的男伙伴一起外出，而更为可疑的是，她拒绝了一名她认为“太虔诚”的求婚者。⁸这足以看出时人对于寡妇的严苛程度。

在当时，家庭中的丈夫死后，如果寡妇选择再嫁，就意味着她要为了第二次婚姻而索回她的嫁妆。如上文所提，在家庭生活中，嫁妆与男方财产往往被混淆支出。这时，如果寡妇突然索回她的嫁妆，将会对家庭中的财产继承人——通常是与她有血缘关系的子女——的经济利益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因此，不仅丈夫家的世系亲属会极力劝阻寡妇其再嫁，各方舆论也会因此将寡妇与抛弃血肉的冷酷母亲形象画上等号，对这些寡妇加以谴责。1417 年，佛罗伦萨人乔万尼·迪·尼科拉奥去世了。他的叔叔拉波痛心疾首地说，“寡妇带着 900 弗洛林离开了家，她把

¹ Stanley Chojnacki, *Women and men in Renaissance Venice: Twelve Essays on Patrician Society*,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97.

² Christiane Klapisch-Zuber, *Women Family and Ritual in Renaissance Italy*, p. 122.

³ Stanley Chojnacki, *Women and men in Renaissance Venice: Twelve Essays on Patrician Society*, p. 50.

⁴ James S. Grubb, *Provincial Families of the Renaissance: Private and Public Life in the Veneto*,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1.

⁵ Stanley Chojnacki, *Women and Men in Renaissance Venice: Twelve Essays on Patrician Society*, p. 132.

⁶ Stanley Chojnacki, *Women and Men in Renaissance Venice: Twelve Essays on Patrician Society*, p. 159.

⁷ Christiane Klapisch-Zuber, *Women Family and Ritual in Renaissance Italy*, p. 124.

⁸ 转引自林中译：《中世纪与宗教改革时期西欧寡妇状况探析》，《学术研究》2004 年第 9 期，第 85 页。

孩子扔在了稻草上,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¹在这些周围人的批判中,这些道德舆论成为了一道无形的枷锁,寡妇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心和极大的勇气,便难以在做出再嫁的选择。

大多数情况下,寡妇都因其再婚时只带走嫁妆,而遗弃子女而遭到时代道德的审判,然而,就算寡妇选择带着与前任丈夫的子女改嫁,也不一定能完全逃脱指责。以乔瓦尼·莫雷利的经历为例:年幼丧夫的莫雷利的母亲在他三岁时选择带着他的儿女们再婚,一同生活在继父屋檐下。成年后,莫雷利愤怒地指责其母亲,认为再嫁的母亲对他和他的兄弟们十分“残忍”。学者克里斯提亚娜·克拉皮什-祖伯指出,“残忍的母亲”首先被强调为“带着嫁妆离开”的母亲,然后才是抛弃年幼孩子的女人。²这是因为,尽管莫雷利声称他的母亲抛弃了他与他的兄弟,但实际上,他的童年和青春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继父的家里度过的,母亲并没有在抚养角色上缺位。他认为,与“残忍”的母亲相对的“好母亲”应该“既是父亲也是母亲”,应该拒绝再婚,“为了不让他们走向灭亡”而“不抛弃自己的孩子”。成为寡妇的母亲应当“留下来”“保持稳定”。³可以看出,在乔瓦尼的认知里,“好母亲”应当保持父系血统家族财富的传承,而所谓“残忍”的指责,就应当是出于对母亲因为索回嫁妆再婚,而造成自身父系家族的经济崩溃的抱怨。

观察乔瓦尼对“残忍”的母亲与“好母亲”的定义,不难看出,在当时人们的道德标准对寡妇相当严苛。寡妇改嫁对儿女(通常也是家庭财富的继承人)来说,除了在情义上令大众道德所失望外,更是因为索回嫁妆使孩子在经济状况上遭受到了打击。这种道德谴责实质上也是从寡妇再婚时索回的嫁妆,对作为家庭财富继承人的孩子及其父系家族经济状况所造成的影响出发的。在这样的指责声中,寡妇就算没有抛弃子女,也难逃道德指责。因此,为了避免被指责,对于丧偶女性来说唯有继续守寡才是最好的选择。

三、出生家庭的利益及对寡妇再嫁的推力

嫁妆是联结男女嫁娶双方的纽带,但当婚姻中的男方去世后,纽带联系的双方有可能出现利益的争夺。也就是说,除了这些不支持寡妇再嫁的势力之外,也会出现出生家庭支持寡妇再嫁的情况。一般来说,对于那些年轻的寡妇,按照其出生家庭的安排,从而实现再嫁的可能性往往比较大。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社会中,这些家族往往通过联姻来实现互利互惠。当时,富有却不那么知名的家族,与知名却不那么富有的家族进行联姻,是一种家族间通过姻亲纽带进行联盟的普遍现象。亚历山德拉出身马辛吉家族,是家中长女。亚历山德拉出生时,马辛吉家族仍是佛罗伦萨精英中的新晋者。1422年,尽管亚历山德拉还有五个兄弟姐妹,但当亚历山德拉与马泰奥·斯特罗齐结婚时,她的父亲还是为女儿准备了1600弗洛林作为嫁妆。以15世纪的标准来看,这份嫁妆远高于平均水平,因此可以推断亚历山德拉的父亲至少是有一定财力的。与马辛吉家族不同,其丈夫马泰奥所属的斯特罗齐家族是当时佛罗伦萨的古老贵族家族,自13世纪以来享有政治与商业领域上的盛名,然而财富微薄。⁴亚历山德拉与马泰奥之间的婚姻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家族联姻的缩影,反映出了这个时代的婚姻常常被用作一种联盟工具,用姻亲关系来巩固家族地位、扩大影响力。

而且,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婚姻联盟并不代表血缘关系的断节。也就是说,对于已出嫁的女儿,无论丈夫是否去世,出生家庭都会保护出嫁的女儿的嫁妆利益。在维罗纳,丈夫在世时,如果他被认定为滥用妻子带来的嫁妆,那么妻子的原生家庭——特别是妻子的父亲有权起诉其丈夫。⁵

所以,当女儿的丈夫去世时,出生家庭就更不会放弃控制女儿嫁妆的权利了。通常情况下,在丈夫的丧葬仪式后,如果寡妇年纪还小,那么她的出生家庭就有权利将丧偶的女儿接回家,并在家中得到抚养,这在当时甚至被称为“佛罗伦萨的习俗”。⁶在当时人们的观念里,他们从来不会完全放弃对嫁妆的控制和支配。嫁妆是他们给予女儿或姐妹们的物质性的东西,有的甚至是以牺牲男性的婚姻和财产而为女性配置一份代表家庭荣耀的嫁妆。有一位妻子坦白,“为了能给我的婚姻置办一份丰厚的嫁妆,我的父亲只将很少的一部分用于我兄弟姐妹的生活,这份嫁妆几乎超出了他所有财产的一半”,还有一位佛罗伦萨男性在1459年的家庭日志中记述到,他女儿的婚姻嫁妆甚至要比他所有的兄弟得到的东西都多。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女儿留在出生家庭中继续守寡,就无疑是白费了家庭为女儿的嫁妆付出的财富。只有使守寡的女儿成功再嫁,才可使家庭重新加入到新的姻亲联盟中。因此,当寡妇再次回到出生家庭后,她就又重新成为了婚姻策略中的一部分,出生家庭会为守寡的女儿选择一段新的婚

¹ Christiane Klapisch-Zuber, *Women Family and Ritual in Renaissance Italy*, p. 126.

² Christiane Klapisch-Zuber, *Women Family and Ritual in Renaissance Italy*, p. 128.

³ Christiane Klapisch-Zuber, *Women Family and Ritual in Renaissance Italy*, pp. 128-129.

⁴ Louise George Clubb, *Selected Letters of Alessandra Strozzi*,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 3.

⁵ Emlyn Eisenach, *Husbands, wives, and concubines: marriage, family, and social order in sixteenth-century Verona*, New York: Trum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44.

⁶ Christiane Klapisch-Zuber, *Women Family and Ritual in Renaissance Italy*, p. 123.

⁷ Merry E. Wiesner,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76 转引自程新贤:《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嫁妆体系下的女性地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2005年,第49页。

姻，从而使得她的出生家庭通过新的婚姻联盟而再次获益。

小结

综上所述，嫁妆制度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寡妇的再嫁问题上，作为一个核心的利益变量，同时牵动着夫家世系、出生家庭与社会舆论等多重力量，以各自不同的逻辑对寡妇的再嫁施加影响。夫家以遗嘱为手段，借财产安排挽留寡妇，以保全家庭经济的短期稳定；出生家庭则以联姻为目的，积极促成守寡女儿的再嫁，以期重续姻亲网络带来的社会资本；而道德舆论所建构的“残忍的母亲”形象，其实质亦指向寡妇索回嫁妆对父系世系财产造成的冲击。无论哪种力量，均将寡妇的再嫁意愿从属于嫁妆的归属与流向，而非出于对丧偶女性自身诉求的真正关切。

参考文献：

- [1] Christiane Klapisch-Zuber, *Women Family and Ritual in Renaissance Italy*, London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 [2] 俞金尧：《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寡妇再嫁》，《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 [3] Stanley Chojnacki, *Women and men in Renaissance Venice: Twelve Essays on Patrician Society*,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 [4] James S. Grubb, *Provincial Families of the Renaissance: Private and Public Life in the Veneto*,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 [5] 林中泽：《中世纪与宗教改革时期西欧寡妇状况探析》，《学术研究》2004年第9期，第85页。
- [6] Louise George Clubb, *Selected Letters of Alessandra Strozzi*,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 [7] Emlyn Eisenach, *Husbands, wives, and concubines: marriage, family, and social order in sixteenth-century Verona*, New York: Trum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8] Merry E. Wiesner,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9] 程新贤：《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嫁妆体系下的女性地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2005年，第49页。

Dowry and Widow Remarriage: The Situation of Bereaved Women in Renaissance Italy

Hu Yingy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owry system and widow remarriage serves as a crucial entry poi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situation of widowed women in Renaissance Italy. In Renaissance Italy, a dowry was generally tied to a married woman for life and reverted to her upon her husband's death; however, precisely for this reason, widows with dowries often became the focus of contention among multiple forces. The husband's lineage, seeking to prevent the dowry from being lost through remarriage, employed measures such as testamentary arrangements to persuade the widow to stay. Public opinion, using the moral discourse of the "cruel mother," sought to discipline women who chose to remarry, with its underlying essence likewise targeting the impact of dowry transfer on patrilineal family property. Meanwhile, the widow's natal family, driven by the interest in renewing marital alliances, often actively encouraged the remarriage of their widowed daughter. Thus, the dowry simultaneously acted as both an obstacle and an impetus, leaving the widow's choice of remarriage perpetually caught in the crosscurrents of multi-party negotiations. Whether a widow remarried depended largely on the ownership and disposition of the dowry, rather than being an expression of personal will.

Keywords: Italy; Renaissance; widow; dowry

20 世纪上半叶新加坡胶商的“传承”交替

林晓晓

(暨南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20 世纪初, 殖民者向东南亚引入橡胶种子之后, 马来亚 (今西马来西亚地区) 和荷属东印度 (今印度尼西亚) 迅速成为世界主要橡胶产地。新加坡作为东南亚橡胶输往欧洲消费国的必经之路, 凭借自由港政策大力发展橡胶转口贸易, 橡胶业迅速发展。最初橡胶经营者以欧洲人为主,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华人胶商人数才逐渐增多。当时新加坡橡胶业的经营者们凭借族亲、姻亲、乡亲的关系紧密联络, 交织成胶商网络, 一代接一代地推动新加坡橡胶业向前发展。

关键词: 陈嘉庚; 李光前; 新加坡橡胶业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400

前言

因早期华人垦殖橡胶之后缺乏资金和技术, 开垦出来的橡胶园大多转给欧洲企业经营,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橡胶运输被阻, 欧洲企业无暇像以前一样关注远东的分公司, 华人趁势纷纷加入经营。当时新马的橡胶制造业逐渐开始在橡胶的影响下发展起来, 虽然技术和熟练程度比不上欧洲企业, 但是凭借廉价的人工还是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1929 年, 新加坡有大约 25 家企业中有十几家是橡胶研磨厂。²

一、由盛转衰的第一代华人胶商

橡胶业的迅速发展刺激了新加坡相关加工业的发展, 也造就了一批华人橡胶巨头, 陈嘉庚在其中被称为橡胶大王, 他在第一个种植橡胶的陈齐贤的帮助下广泛种植橡胶, 还对橡胶原料进行简单加工, 进而加工成橡胶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陈嘉庚一跃成为新马最大的华人橡胶商和工业家, 旗下企业规模宏大, 业务多元化, 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陈嘉庚企业辖下之业务计有: 黄梨罐头业、碾米业及熟米厂、橡胶加工业、锯木业, 中介商业及船务。他又进一步增添了一些部门, 如机械工程、锅炉制造、橡胶及胶园与船务部等。³陈嘉庚企业发展鼎盛时期被称作马来亚工业中的第一,⁴前后创办工厂三十多家, 开设的商店百余处, 垦殖橡胶园、黄梨园各万余亩, 雇佣的职员工人常达数万人。⁵他的各种商业企业为数千名工人提供了就业和培训 他成为该地区最大最著名的橡胶生产商和制造商, 在中国和东南亚有大约 80 个销售点, 在英国 欧洲 美国和加拿大有多家销售代理⁶

林义顺是当时另一个与陈嘉庚齐名的橡胶巨头, 不同于陈嘉庚以加工橡胶及橡胶制成品为主业, 作为陈嘉庚合作伙伴及其姻亲的林义顺以橡胶种植业尾注。他垦殖橡胶、黄梨的区域, 现在已经演变为现在新加坡的义顺区,

作者简介: 林晓晓(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东南亚近现代经济史。

² W.G.赫夫著, 牛磊、李洁译, 《新加坡的经济增长——20 世纪里的贸易与发展》,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 年, 第 206 页。

³ 杨进发著, 李发沉译, 《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 集美: 陈嘉庚纪念馆, 2012 年, 第 45 页。

⁴ “Industry Malaya-No.1”, Malaya Tribune, 27 April 1925, p. 9.

⁵ 陈国庆, 《我的父亲》, 《回忆陈嘉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 福建省政协, 北京: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4 年, 第 52 页。

⁶ Oral history transcript of Mr Tan Kok Kheng, Interview conducted in English by Mr Lim How Seng,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Singapore, 1981, Reference No. A000232/81.

当时生活在义顺区的人们一开始都是受其雇佣而聚集起来的。林义顺先后在新加坡北部、西北部、和马来亚柔佛州拥有两万多英亩垦殖区。⁷

陈嘉庚不仅仅满足于接受欧洲企业的生产技术，还极为注重生产创新。据陈嘉庚之子陈国庆回忆：当时的欧洲人不生产廉价的橡胶湿片，只生产高级橡胶烟片，而陈嘉庚的公司是欧洲人以外唯一一家生产高级橡胶烟片的公司。陈嘉庚是华人橡胶制造业的先驱，这也是他被称为橡胶大王的原因。陈嘉庚工厂聘请大批外国工程师在新加坡研发并制造本土化的轮胎，该项目由陈嘉庚三子陈博爱日夜监工改进，直到制造出能与外国媲美的轮胎。陈嘉庚四女婿温凯鸿曾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化学系，毕业后曾在固特异轮胎公司工作，陈嘉庚慧眼识珠，聘请他到旗下松巴哇路工厂工作。⁸陈嘉庚企业是新加坡当时少数拥有发明专利的本土公司，共拥有四项专利权，均与橡胶制成品工艺相关。在1931年马来亚橡胶展会上，陈嘉庚企业的橡胶制品还获过奖。⁹这样一个没有欧洲企业帮助、由华人独自运营的工厂，拥有4500名工人，市场遍及马来亚、荷属印度、缅甸、中国、新加坡等地，一度引来了英国海峡殖民地总督海·克里福德爵士（Sir Hugh Clifford）的参观，¹⁰这代表了英国当局对陈嘉庚及其企业在新加坡地位的认可。

但好景不长，陈嘉庚企业的发展势头被一战结束后橡胶价格回落影响阻断，当时橡胶价格从每担一百八十余叻币跌至二十余叻币。¹¹英国殖民地政府曾为了稳定橡胶价格，从1922年到1928年实行“史蒂文生计划”，以限制橡胶产量来缓解胶价泻跌的趋势。但由于荷属东印度的橡胶生产并不受英国政策的限制，因此1927年时胶价依旧下跌，以种植业为主的林义顺受到的冲击比陈嘉庚更大。同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也成立了小组委员会，由林义顺、李光前等人负责研究胶市跌价事宜，并向英国政府当局提出改善橡胶生产限制的建议，¹²但亦无济于事。橡胶与黄梨园每年的垦殖与维护费用极高，因售价过低，资金周转受困的林义顺为此向银行抵押借款以希望度过橡胶市场低迷的困境，但随之而来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最终使他一蹶不振，大部分产业都由银行接管转让。¹³陈嘉庚企业也未能抵御低迷市场冲击，在橡胶管制实施的前三年（1923—1925年），陈嘉庚赚取了1100万叻币的利润，但他将大部分收入用于慈善，¹⁴而不是给银行还钱，导致1927年出现资金周转不灵，被迫出售资产以弥补亏损。到了1929年经济大萧条时期，陈嘉庚公司资产持续贬值，资不抵债。1931年，银行组织代表团将其公司改组为私人有限公司，公司不再由陈嘉庚全权控制，最终仍是无力回天，陈嘉庚自愿清盘。

二、第一代华人胶商失败的原因

橡胶作为战略物资，战争往往会造成橡胶业的繁荣。新马第一代华人胶商的崛起正是借助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势，但在战争结束后，从高峰跌落的橡胶价格也造就了无数人的破产，巨头更是首当其冲。陈嘉庚与林义顺因橡胶高昂的回报率而借债迅速扩张，但在经济不景气时受庞大的规模所困，导致资金链断裂，最终破产。林义顺的困境源于为维持庞大的种植园而资金周转不灵，而陈嘉庚工厂所面临的困境则更为多重：

（一）激烈的市场竞争与货币贬值。陈嘉庚的企业虽然规模庞大，却并非垄断企业，他的竞争优势是成本低

⁷ 李志贤，《烽火的烙印——二战前后新加坡林氏家族的式微与潮社权力格局的变化》，《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25页。

⁸ Oral history transcript of Mr Tan Kok Kheng, Interview conducted in English by Mr Lim How Seng,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Singapore, 1981, Reference No. A000232/81.

⁹ Rubber at The Show, Straits Times, 5 August 1931, p. 12.

¹⁰ "Sir High Clifford's Factory Tour", Straits Times, 6 June 1929, p. 10.

¹¹ 新加坡橡胶公会秘书处编，《一九五七年新嘉坡橡胶公会年鉴》，新加坡橡胶公会，1957年，第129—130页。

¹²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编，《中华总商会会议记录，1927年9月3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75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史记》，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81年，第71页，转引自李志贤，《烽火的烙印——二战前后新加坡林氏家族的式微与潮社权力格局的变化》，《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26页。

¹³ 林孝胜、林源福编，《义顺社区发展史》，新加坡：义顺区基层组织与国家档案馆，1987年，第115—116页。转引自李志贤，《烽火的烙印——二战前后新加坡林氏家族的式微与潮社权力格局的变化》，《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26页。

¹⁴ Oral history transcript of Mr Tan Kok Kheng, Interview conducted in English by Mr Lim How Seng,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Singapore, 1981, Reference No. A000232/81.

廉, 售价低于欧洲企业, 在他清盘之后, 英国下议院辩论时曾有人询问, 应如何防止像他这样的马来亚企业家在英国市场上倾销产品, 保护英国企业。¹⁵

除了欧洲企业以外, 还有来自日本、中国香港地区的橡胶制品。日本和香港在新加坡出售胶鞋的价格甚至低于陈嘉庚制鞋的成本。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 一是因为日本及香港货币对叻币大幅贬值, 而叻币因与英镑挂钩无法同等贬值, 对陈嘉庚极为不利; 二是因为上述两地货币贬值的效果并未被人力成本及管理费用的上升所抵消, 而这两者几乎占胶鞋制造总成本的一半。尽管英属马来亚出产橡胶原料的事实从未给陈嘉庚带来多大优势, 但他仍因其工厂雇员中三分之二是薪资更低廉女工, 一度保持着工资成本的竞争力。¹⁶在两地产品中, 陈嘉庚主要面临日本产品的倾销, 日本在迅速完成工业化之后, 成本降低, 利润增高, 对陈嘉庚企业的产品造成了威胁, 再加上日本为摆脱经济危机对外实施倾销政策, 进一步影响了陈嘉庚企业产品的市场销量。虽然中国、东南亚都曾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并取得一定效果, 但东南亚的华商群体并非主流群体, 独木难支。此外, 殖民地无法完全自力更生, 需要进口外来产品以满足日常所需, 殖民地政府并不愿意看到抵制日货运动对本土经济造成破坏; 同时, 部分华侨商人作为中间商, 依赖进口经销日货为生, 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也难以彻底抵制日货。¹⁷陈嘉庚旗下的橡胶工厂还曾因该运动遭受火灾。¹⁸与陈嘉庚共事过的黄奕欢认为, 陈嘉庚企业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 虽减产减销量, 但仍能维持一定水准, 最终是在日本不计成本的倾销下被斗倒。¹⁹然而陈嘉庚自己则认为, 日货倾销并非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在于英商的打击。

(二) 缺乏政府保护。经济大萧条时期, 各国政府纷纷设立起关税壁垒以保护本国经济发展, 以对外出口为主的陈嘉庚橡胶公司因此大受打击。1933 年英国在加拿大渥太华召开帝国经济会议与其他英殖民地代表讨论关税壁垒问题。会议同意给予加拿大胶靴, 胶鞋, 帆布靴, 帆布鞋(有胶底)每打一先令的优惠待遇, 藉以保障该国之厂商。新加坡金文泰总督却排拒殖民部的授意, 不同意在海峡殖民地各处设立关税壁垒, 辩称“这样一来, 势将损及英帝国属地间的团结”。²⁰最终, 英国仅增加了外国商品进入本国及其殖民地的进口税。

(三) 缺乏银行支持。日本企业有着政府在背后的支持, 日资银行还在东南亚设立分行为日本商人对外贸易提供资金援助和支持。²¹而当时的华资银行虽然已经在新加坡出现, 但并没有足够雄厚的资金提供给陈嘉庚用于扩张, 陈嘉庚借债的银行大多是英资银行。重组过后陈嘉庚公司部分控股权归英资银行所有, 后者希望他将资金留在新加坡维持商业运转, 而不是继续将大部分资金捐回国内兴办教育。况且, 英商控制下的陈嘉庚公司难以完全以公司利益为重, 据陈嘉庚本人回忆, 1933 年渥太华会议后, 英国增加了外国产品进入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入口税, 但殖民地的产品进入英国市场则不加税, 因此其企业产品销路大增, 当时橡胶厂即便加班加点、日夜不停地生产, 也无法满足来自伦敦及英国其他地区日益增加的订单。²²因此, 主导公司的英国银行家们不顾陈嘉庚的反对, 在董事会议上决定关闭东南亚 中国(包括香港在内)的 80 个销售分支机构,²³以便集中精力准备英国的订单。²⁴谁也未曾想到这一片繁荣景象就在两个月后戛然而止。英国资本为了英国之利权不容他国人染指, 牺牲

¹⁵ Mr. Guy to Mr Herbert Williams, "Rubber Footwear (Imports)", UK Parliament, Hansard, Commons: 26 July 1934, Commons Chamber,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Trade And Commerce.

¹⁶ W.G. 赫夫著, 牛磊、李洁译, 《新加坡的经济增长——20 世纪里的贸易与发展》,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 年, 第 220 页。

¹⁷ 明石阳至著, 张坚译, 《1908-1928 年南洋华侨抗日和抵制日货运动: 关于南洋华侨民族主义的研究(上)》, 《南洋资料译丛》, 2000 年第 3 期, 第 73 页。

¹⁸ 陈嘉庚, 《南侨回忆录》, 上海书店, 1989 年, 第 418 页。

¹⁹ Oral history transcript of Mr NG Aik Huan, Interview conducted in Hokkien,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Singapore, 1981, Reference No. A000035/15.

²⁰ CO 273/583(殖民部档案)殖民部 P.Cunliffe-Lister 致金文泰总督函, 1933 年 1 月 2 日。转引自杨进发著, 李发沉译, 《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 集美: 陈嘉庚纪念馆, 2012 年, 第 62 页。

²¹ 张玉宁, 《1914-1941 年英日两国在马来亚的经济摩擦》, 硕士学位论文, 广西师范大学, 2023 年, 第 27 页。

²² Why Tan Kah Kee'S Closed, Straits Times, 8 June 1934, p.13.

²³ Oral history transcript of Mr NG Aik Huan, Interview conducted in Hokkien,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Singapore, 1981, Reference No. A000035/15.

²⁴ Why Tan Kah Kee'S Closed, Straits Times, 8 June 1934, p.13.

了将要复兴的陈嘉庚工业。有一“魔商”借助其与银行的良好关系在陈嘉庚不同意的情况下强行获取陈嘉庚公司产品在英国的专卖权。在完成之前的订单之后，“魔商”拿到了专卖权反而使英国方面的销量下降，为预计订单购买的原料只能在仓库继续囤积，因这一争端，陈嘉庚与银行各股东之间的间隙加深。²⁵主导陈嘉庚公司的英国银行家们的主要目的并非使公司盈利以实现长远发展，而是偿还债务。为此，他们将除橡胶厂以外的其他工厂关闭以节省开支。在一次董事会会议中，争论达到高潮时，新加坡汇丰银行经理公开声明，当英国制造商在英国本土的利益因公司在英国和英帝国其他市场的积极竞争而受到威胁时，作为公司融资人和债权人的银行家们便不能再无动于衷了。²⁶陈嘉庚被迫引入不以这家殖民地企业利益为先的外行英资银行团来指导自己的企业，这才是导致陈嘉庚公司最终结束营业的主要原因。

（四）人才的出走。陈嘉庚企业培养出来的人才众多，新马第二代胶商大多出身于陈嘉庚企业，他们的出走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受繁荣的橡胶市场刺激，希望独立创业；二是理念不合，新生代人才成长起来后与陈嘉庚产生分歧，选择出去单干；三是经济大萧条时期，陈嘉庚企业资金链断裂，缺乏销路，无法正常运转，停产停薪，旗下经理、主管只能纷纷另谋出路。因此，陈嘉庚企业在艰难维持运转的同时，还要面对这些竞争对手的挑战。

（五）陈嘉庚本人的事业心下降。经济大萧条开始时，陈嘉庚已经 55 岁了，倘若 1922 年其弟陈敬贤没有因病退出管理，48 岁的陈嘉庚或许不会再回到新加坡接管生意了。在经历了橡胶价格下跌、管制计划实施后的回升，再到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陈嘉庚在 1933 年发表了《不景气之历史观与南洋华侨当前应探之策略》，清醒地认识到橡胶业的挫折是因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过剩”，并不是一人可以挽救的，而“欲救不景的希望，只有两事，非战争则共产。战争属于治标，共产属于治本。然治标或可较易见的，唯非根本之解决，徒演人类之惨剧。至于治本，虽生效较迟，然目的一达，则世界大同。”²⁷

陈嘉庚之前在经商之余，也在新加坡、中国福建兴办教育，利用自己的号召力参政，在知道自己无法以一力挽狂澜之后，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本来就关注的教育事业上和之后的抗日事业，从华人橡胶大王变成了教育家、慈善家等。随着陈嘉庚时代的落幕，新加坡第二代华人胶商开始主导新加坡橡胶业。

三、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华人胶商

陈嘉庚对新加坡橡胶业乃至新加坡工业的贡献在于，他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为新加坡培养和培训了一大批熟练工人与经验丰富的华商。1924-1925 年新加坡橡胶业兴旺时，他的雇员们因为各种原因开始自己独立创业，此后脱颖而出的橡胶商人，或多或少都与陈嘉庚公司有着渊源。李光前是陈嘉庚的女婿，陈六使是陈嘉庚的堂亲，陈共存是陈嘉庚的侄子，陈赐曲是陈嘉庚橡胶厂的经理……这些人都或多或少受益于陈嘉庚公司，并在其基础上继续发展壮大，最终成为新加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腾飞的工业经济中的重要力量。

其中李光前，因创办的南益公司成为继陈嘉庚之后第二个被称为橡胶大王的华商。而这个称谓并非可以继承，而是众望所归。陈嘉庚在企业运营上大量任用家人、族人、乡亲，但他开办企业的目的并非像传统家族企业那样追求传承。据陈嘉庚之子陈国庆回忆：在陈嘉庚办厂的宗旨是培养人才，而非追求利润。他将工厂视作一所“母工厂”，通过培训工人，使其具备资格后送回中国开办工厂，以让中国人掌握橡胶行业的技术。他这样做是为了中国和东南亚的长远利益，并不在意工厂本身的盈亏。²⁸因此，陈嘉庚没有将清盘后的橡胶产业都留给自己的儿子经营，而是将其租给李光前的南益、陈六使的益和经营、还有一些工厂则招请经理人合租等，以租金入股，抽

²⁵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上海书店，1989 年，第 420-421 页。

²⁶ Oral history transcript of Mr NG Aik Huan, Interview conducted in Hokkien,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Singapore, 1981, Reference No. A000035/15.

²⁷ 陈嘉庚，《不景气之历史观与南洋华侨当前应探之策略》，《南洋商报》，1933 年 4 月 46 日，第 2 页。

²⁸ Oral history transcript of Mr Tan Kok Kheng, Interview conducted in English by Mr Lim How Seng,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Singapore, 1981, Reference No. A000232/81.

取三成作为助学经费。²⁹此外,陈嘉庚在清盘之后虽将所留的不菲财产交由子女管理,但并未因此放弃慈善事业。陈国庆回忆道,父亲不打算将财产留给任何一个子女,理由是“财富会损害智者的雄心,增加愚者的愚蠢”。³⁰

一鲸落而万物生,陈嘉庚企业的倒闭,使当时的中小胶商有了喘息与扩张空间,李光前、陈六使皆得益于此。李光前还从银行手中接手了林义顺的橡胶厂。作为第二代橡胶大王,李光前和陈嘉庚的经营理念不同,陈嘉庚愿意“毁家兴学”,而李光前则是在公司存续的前提下从事慈善。李光前在陈嘉庚公司担任财务主管期间,常对公司财务状况感到忧虑,1926年,他曾劝请陈嘉庚不宜继续举贷。在离开之前,李光前曾向岳父表示有意以自己的积蓄入股公司,成为股东,陈嘉庚听后却一口回绝,说:“我赚钱是为了办教育,你赚钱却为发财”。³¹据李光前之子李成义证实,父亲如果不是外祖父的女婿,可能早已离开,而非等到1927年才独立创业。事实上,即便从1927年开始创办自己的企业,父亲仍在监督外祖父旗下大部分公司的经营。³²

除了在捐资办学的理念上存在分歧之外,李光前与陈嘉庚在为人处世与经营理念上都颇为相似:二人都节俭、认真。因陈嘉庚的失败经验,李光前比陈嘉庚行事更为谨慎,对不了解的行业绝不会盲目扩张。独立创业李光前先是做橡胶转口贸易,待对制造业有了充分了解之后,才开始涉足制造业。财务主管出身的李光前还了解橡胶价格的时效性是经营的关键,他坚持买进后立刻卖出,并不如新加坡大部分橡胶商一样赌涨跌,从而避免了因囤积而遭遇胶价下跌导致惨重损失的风险。1954年,他更引进了IBM商务机会计系统,以便更好地控制总部与各分公司的橡胶库存。³³

在员工分红上,南益的政策是将年利润的20%分给员工和经理。其中,先发给员工20%,再将剩余部分发给经理。³⁴此举旨在激发从上到下的工作动力。而从人员培训上,李光前公司“任人唯亲”,所有员工均从基层逐级晋升,即便是与家族成员有关系的员工,也须凭借自身能力获得提拔。³⁵

在工厂管理上,受时代进步与东南亚工人运动发展的影响,李光前所采取的模式较老一代胶商更为现代化。接手林义顺的橡胶厂后,他增加了轮班次数与工人薪资,规范了发薪制度,体恤工人、关心工人健康,同时提升了工头的素质。由此,管理更加顺畅,工人的动力与精神面貌亦焕然一新。³⁶

李光前与陈嘉庚这对翁婿的慈善理念虽不尽相同,但李光前在承继陈嘉庚经验的基础上创办的南益公司,却比陈嘉庚的企业走得更远,并一直传承至今。与此同时,1952年李光前创立的李氏基金会也持续运营,以捐助文教及社会公益事业为主。

结论

纵观新加坡华人胶商群体,可以清晰地看到“陈嘉庚印记”的深刻影响。大多数华人胶商都出身于陈嘉庚公司,即便不属于其公司,也与他有过商业往来。在陈嘉庚时代,除了他之外,几乎没有第二位华人从事橡胶加工业,大多数人以橡胶种植或中介贸易为主。而自陈嘉庚之后,新加坡的橡胶加工业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从马来半岛、印尼群岛进口的橡胶,经过简单加工后通过港口出口,后期则逐步转向橡胶制品的加工与出口。至今,新加坡仍是全球橡胶价格发现中心之一,并拥有世界四大天然橡胶交易所中的新加坡交易所。

与此同时,林义顺在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柔佛州开垦的数万亩土地,也在历史上永久留下了他的名字。在当时大型种植园多为欧洲企业所拥有的环境下,他凭借自身努力逐渐开垦出自己的种植园,其周边区域更发展成为实

²⁹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上海书店,1989年,第420页。

³⁰ Oral history transcript of Mr Tan Kok Kheng, Interview conducted in English by Mr Lim How Seng,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Singapore, 1981, Reference No. A000232/81.

³¹ 陈共存转述陈济民口述,转引自杨进发著,李发沉译,《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集美:陈嘉庚纪念馆,2012年,第45页。

³² Oral history transcript of Lee Seng Gee, Interview by Mr Lim How Seng,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Singapore, 1980, Reference No. A000040/8.

³³ 同上。

³⁴ Oral history transcript of Mr Tan Keong Choon, Interview conducted in Mandarin by Mr Lim How Seng,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Singapore, 1981, Reference No. A000052/24.

³⁵ Oral history transcript of Lee Seng Gee, Interview by Mr Lim How Seng,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Singapore, 1980, Reference No. A000040/8.

³⁶ Oral history transcript of Toh Ngo Tong, Interview conducted in Hokkien,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Singapore, 1985, Reference No. A000605/16.

质上的橡胶产业园，橡胶产地与加工厂连成一体。他也因此由富致“贵”，获封太平局绅头衔。

陈嘉庚与林义顺或许并非新加坡橡胶业的第一批华人从业者，但无疑是这一行业最重要的开拓先驱之一。他们在原本以欧洲人为主导的橡胶业中，为第二代华人胶商开辟了可供发展的新领域，使后辈得以吸收他们的经营经验与慈善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最终塑造出新加坡今日的商业图景。

参考文献：

- [1]W.G.赫夫著，牛磊、李洁译，《新加坡的经济增长——20 世纪里的贸易与发展》，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年。
- [2]杨进发著，李发沉译，《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集美：陈嘉庚纪念馆，2012 年，第 45 页。
- [3]《回忆陈嘉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福建省政协，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年。
- [4]李志贤，《烽火的烙印——二战前后新加坡林氏家族的式微与潮社权力格局的变化》，《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1 期。
- [5]林孝胜、林源福编，《义顺社区发展史》，新加坡：义顺区基层组织与国家档案馆，1987 年。
- [6]新加坡橡胶公会秘书处编，《一九五七年新嘉坡橡胶公会年鉴》，新加坡橡胶公会，1957 年。
- [7]《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75 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史记》，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1981 年。
- [5]明石阳至著，张坚译，《1908-1928 年南洋华侨抗日和抵制日货运动：关于南洋华侨民族主义的研究(上)》，《南洋资料译丛》，2000 年第 3 期。
- [6]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上海书店，1989 年。
- [7]张玉宁，《1914-1941 年英日两国在马来亚的经济摩擦》，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23 年。

The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of Singapore Rubber Merchant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Lim Xiaoxiao

(1.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after colonial powers introduced rubber seeds to Southeast Asia, Malaya (present-day West Malaysia) and the Dutch East Indies (present-day Indonesia) rapidly became the world's major rubber-producing regions. As a transit point along the route for Southeast Asian rubber exports to European consumer countries, Singapore leveraged its free-port policy to vigorously develop rubber entrepôt trade, leading to the rapid growth of its rubber industry. Initially, rubber traders were predominantly European; it was only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that the number of Chinese rubber merchants gradually increased. At that time, operators in Singapore's rubber industry were closely connected through ties of clan, marriage, and native place, weaving themselves into a network of rubber merchants that propelled the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s rubber industry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Keywords: Tan Kah Kee; Lee Kong Chian; Singapore Rubber Industry

20 世纪上半叶新加坡胶商的“传承”交替

林晓晓

(暨南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20 世纪初, 殖民者向东南亚引入橡胶种子之后, 马来亚 (今西马来西亚地区) 和荷属东印度 (今印度尼西亚) 迅速成为世界主要橡胶产地。新加坡作为东南亚橡胶输往欧洲消费国的必经之路, 凭借自由港政策大力发展橡胶转口贸易, 橡胶业迅速发展。最初橡胶经营者以欧洲人为主,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华人胶商人数才逐渐增多。当时新加坡橡胶业的经营者们凭借族亲、姻亲、乡亲的关系紧密联络, 交织成胶商网络, 一代接一代地推动新加坡橡胶业向前发展。

关键词: 陈嘉庚; 李光前; 新加坡橡胶业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400

前言

因早期华人垦殖橡胶之后缺乏资金和技术, 开垦出来的橡胶园大多转给欧洲企业经营,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橡胶运输被阻, 欧洲企业无暇像以前一样关注远东的分公司, 华人趁势纷纷加入经营。当时新马的橡胶制造业逐渐开始在橡胶的影响下发展起来, 虽然技术和熟练程度比不上欧洲企业, 但是凭借廉价的人工还是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1929 年, 新加坡有大约 25 家企业中有十几家是橡胶研磨厂。²

一、由盛转衰的第一代华人胶商

橡胶业的迅速发展刺激了新加坡相关加工业的发展, 也造就了一批华人橡胶巨头, 陈嘉庚在其中被称为橡胶大王, 他在第一个种植橡胶的陈齐贤的帮助下广泛种植橡胶, 还对橡胶原料进行简单加工, 进而加工成橡胶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陈嘉庚一跃成为新马最大的华人橡胶商和工业家, 旗下企业规模宏大, 业务多元化, 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陈嘉庚企业辖下之业务计有: 黄梨罐头业、碾米业及熟米厂、橡胶加工业、锯木业, 中介商业及船务。他又进一步增添了一些部门, 如机械工程、锅炉制造、橡胶及胶园与船务部等。³陈嘉庚企业发展鼎盛时期被称作马来亚工业中的第一,⁴前后创办工厂三十多家, 开设的商店百余处, 垦殖橡胶园、黄梨园各万余亩, 雇佣的职员工人常达数万人。⁵他的各种商业企业为数千名工人提供了就业和培训 他成为该地区最大最著名的橡胶生产商和制造商, 在中国和东南亚有大约 80 个销售点, 在英国 欧洲 美国 和加拿大 有多家销售代理。⁶

林义顺是当时另一个与陈嘉庚齐名的橡胶巨头, 不同于陈嘉庚以加工橡胶及橡胶制成品为主业, 作为陈嘉庚合作伙伴及其姻亲的林义顺以橡胶种植业尾注。他垦殖橡胶、黄梨的区域, 现在已经演变为现在新加坡的义顺区,

作者简介: 林晓晓(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东南亚近现代经济史。

² W.G.赫夫著, 牛磊、李洁译, 《新加坡的经济增长——20 世纪里的贸易与发展》,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 年, 第 206 页。

³ 杨进发著, 李发沉译, 《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 集美: 陈嘉庚纪念馆, 2012 年, 第 45 页。

⁴ “Industry Malaya-No.1”, Malaya Tribune, 27 April 1925, p. 9.

⁵ 陈国庆, 《我的父亲》, 《回忆陈嘉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 福建省政协, 北京: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4 年, 第 52 页。

⁶ Oral history transcript of Mr Tan Kok Kheng, Interview conducted in English by Mr Lim How Seng,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Singapore, 1981, Reference No. A000232/81.

当时生活在义顺区的人们一开始都是受其雇佣而聚集起来的。林义顺先后在新加坡北部、西北部、和马来亚柔佛州拥有两万多英亩垦殖区。⁷

陈嘉庚不仅仅满足于接受欧洲企业的生产技术，还极为注重生产创新。据陈嘉庚之子陈国庆回忆：当时的欧洲人不生产廉价的橡胶湿片，只生产高级橡胶烟片，而陈嘉庚的公司是欧洲人以外唯一一家生产高级橡胶烟片的公司。陈嘉庚是华人橡胶制造业的先驱，这也是他被称为橡胶大王的原因。陈嘉庚工厂聘请大批外国工程师在新加坡研发并制造本土化的轮胎，该项目由陈嘉庚三子陈博爱日夜监工改进，直到制造出能与外国媲美的轮胎。陈嘉庚四女婿温凯鸿曾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化学系，毕业后曾在固特异轮胎公司工作，陈嘉庚慧眼识珠，聘请他到旗下松巴哇路工厂工作。⁸陈嘉庚企业是新加坡当时少数拥有发明专利的本土公司，共拥有四项专利权，均与橡胶制成品工艺相关。在1931年马来亚橡胶展会上，陈嘉庚企业的橡胶制品还获过奖。⁹这样一个没有欧洲企业帮助、由华人独自运营的工厂，拥有4500名工人，市场遍及马来亚、荷属印度、缅甸、中国、新加坡等地，一度引来了英国海峡殖民地总督海·克里福德爵士（Sir Hugh Clifford）的参观，¹⁰这代表了英国当局对陈嘉庚及其企业在新加坡地位的认可。

但好景不长，陈嘉庚企业的发展势头被一战结束后橡胶价格回落影响阻断，当时橡胶价格从每担一百八十余叻币跌至二十余叻币。¹¹英国殖民地政府曾为了稳定橡胶价格，从1922年到1928年实行“史蒂文生计划”，以限制橡胶产量来缓解胶价泻跌的趋势。但由于荷属东印度的橡胶生产并不受英国政策的限制，因此1927年时胶价依旧下跌，以种植业为主的林义顺受到的冲击比陈嘉庚更大。同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也成立了小组委员会，由林义顺、李光前等人负责研究胶市跌价事宜，并向英国政府当局提出改善橡胶生产限制的建议，¹²但亦无济于事。橡胶与黄梨园每年的垦殖与维护费用极高，因售价过低，资金周转受困的林义顺为此向银行抵押借款以希望度过橡胶市场低迷的困境，但随之而来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最终使他一蹶不振，大部分产业都由银行接管转让。¹³陈嘉庚企业也未能抵御低迷市场冲击，在橡胶管制实施的前三年（1923—1925年），陈嘉庚赚取了1100万叻币的利润，但他将大部分收入用于慈善，¹⁴而不是给银行还钱，导致1927年出现资金周转不灵，被迫出售资产以弥补亏损。到了1929年经济大萧条时期，陈嘉庚公司资产持续贬值，资不抵债。1931年，银行组织代表团将其公司改组为私人有限公司，公司不再由陈嘉庚全权控制，最终仍是无力回天，陈嘉庚自愿清盘。

二、第一代华人胶商失败的原因

橡胶作为战略物资，战争往往会造成橡胶业的繁荣。新马第一代华人胶商的崛起正是借助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势，但在战争结束后，从高峰跌落的橡胶价格也造就了无数人的破产，巨头更是首当其冲。陈嘉庚与林义顺因橡胶高昂的回报率而借债迅速扩张，但在经济不景气时受庞大的规模所困，导致资金链断裂，最终破产。林义顺的困境源于为维持庞大的种植园而资金周转不灵，而陈嘉庚工厂所面临的困境则更为多重：

（一）激烈的市场竞争与货币贬值。陈嘉庚的企业虽然规模庞大，却并非垄断企业，他的竞争优势是成本低

⁷ 李志贤，《烽火的烙印——二战前后新加坡林氏家族的式微与潮社权力格局的变化》，《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25页。

⁸ Oral history transcript of Mr Tan Kok Kheng, Interview conducted in English by Mr Lim How Seng,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Singapore, 1981, Reference No. A000232/81.

⁹ Rubber at The Show, Straits Times, 5 August 1931, p. 12.

¹⁰ "Sir High Clifford's Factory Tour", Straits Times, 6 June 1929, p. 10.

¹¹ 新加坡橡胶公会秘书处编，《一九五七年新嘉坡橡胶公会年鉴》，新加坡橡胶公会，1957年，第129—130页。

¹²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编，《中华总商会会议记录，1927年9月3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75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史记》，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81年，第71页，转引自李志贤，《烽火的烙印——二战前后新加坡林氏家族的式微与潮社权力格局的变化》，《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26页。

¹³ 林孝胜、林源福编，《义顺社区发展史》，新加坡：义顺区基层组织与国家档案馆，1987年，第115—116页。转引自李志贤，《烽火的烙印——二战前后新加坡林氏家族的式微与潮社权力格局的变化》，《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26页。

¹⁴ Oral history transcript of Mr Tan Kok Kheng, Interview conducted in English by Mr Lim How Seng,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Singapore, 1981, Reference No. A000232/81.

廉, 售价低于欧洲企业, 在他清盘之后, 英国下议院辩论时曾有人询问, 应如何防止像他这样的马来亚企业家在英国市场上倾销产品, 保护英国企业。¹⁵

除了欧洲企业以外, 还有来自日本、中国香港地区的橡胶制品。日本和中国香港地区在新加坡出售胶鞋的价格甚至低于陈嘉庚制鞋的成本。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 一是因为日本及中国香港地区货币对叻币大幅贬值, 而叻币因与英镑挂钩无法同等贬值, 对陈嘉庚极为不利; 二是因为上述两地货币贬值的效果并未被人力成本及管理费用的上升所抵消, 而这两者几乎占胶鞋制造总成本的一半。尽管英属马来亚出产橡胶原料的事实从未给陈嘉庚带来多大优势, 但他仍因其工厂雇员中三分之二是薪资更低廉女工, 一度保持着工资成本的竞争力。¹⁶在两地产品中, 陈嘉庚主要面临日本产品的倾销, 日本在迅速完成工业化之后, 成本降低, 利润增高, 对陈嘉庚企业的产品造成了威胁, 再加上日本为摆脱经济危机对外实施倾销政策, 进一步影响了陈嘉庚企业产品的市场销量。虽然中国、东南亚都曾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并取得一定效果, 但东南亚的华商群体并非主流群体, 独木难支。此外, 殖民地无法完全自力更生, 需要进口外来产品以满足日常所需, 殖民地政府并不愿意看到抵制日货运动对本土经济造成破坏; 同时, 部分华侨商人作为中间商, 依赖进口经销日货为生, 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也难以彻底抵制日货。¹⁷陈嘉庚旗下的橡胶工厂还曾因该运动遭受火灾。¹⁸与陈嘉庚共事过的黄奕欢认为, 陈嘉庚企业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 虽减产减销量, 但仍能维持一定水准, 最终是在日本不计成本的倾销下被斗倒。¹⁹然而陈嘉庚自己则认为, 日货倾销并非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在于英商的打击。

(二) 缺乏政府保护。经济大萧条时期, 各国政府纷纷设立起关税壁垒以保护本国经济发展, 以对外出口为主的陈嘉庚橡胶公司因此大受打击。1933 年英国在加拿大渥太华召开帝国经济会议与其他英殖民地代表讨论关税壁垒问题。会议同意给予加拿大胶靴, 胶鞋, 帆布靴, 帆布鞋(有胶底)每打一先令的优惠待遇, 藉以保障该国之厂商。新加坡金文泰总督却排拒殖民部的授意, 不同意在海峡殖民地各处设立关税壁垒, 辩称“这样一来, 势将损及英帝国属地间的团结”。²⁰最终, 英国仅增加了外国商品进入本国及其殖民地的进口税。

(三) 缺乏银行支持。日本企业有着政府在背后的支持, 日资银行还在东南亚设立分行为日本商人对外贸易提供资金援助和支持。²¹而当时的华资银行虽然已经在新加坡出现, 但并没有足够雄厚的资金提供给陈嘉庚用于扩张, 陈嘉庚借债的银行大多是英资银行。重组过后陈嘉庚公司部分控股权归英资银行所有, 后者希望他将资金留在新加坡维持商业运转, 而不是继续将大部分资金捐回国内兴办教育。况且, 英商控制下的陈嘉庚公司难以完全以公司利益为重, 据陈嘉庚本人回忆, 1933 年渥太华会议后, 英国增加了外国产品进入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入口税, 但殖民地的产品进入英国市场则不加税, 因此其企业产品销路大增, 当时橡胶厂即便加班加点、日夜不停地生产, 也无法满足来自伦敦及英国其他地区日益增加的订单。²²因此, 主导公司的英国银行家们不顾陈嘉庚的反对, 在董事会议上决定关闭东南亚 中国(包括中国香港地区在内)的 80 个销售分支机构,²³以便集中精力准备英国的订单。²⁴谁也未曾想到这一片繁荣景象就在两个月后戛然而止。英国资本为了英国之利权不容他国人染

¹⁵ Mr. Guy to Mr Herbert Williams, "Rubber Footwear (Imports)", UK Parliament, Hansard, Commons: 26 July 1934, Commons Chamber,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Trade And Commerce.

¹⁶ W.G. 赫夫著, 牛磊、李洁译, 《新加坡的经济增长——20 世纪里的贸易与发展》,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 年, 第 220 页。

¹⁷ 明石阳至著, 张坚译, 《1908-1928 年南洋华侨抗日和抵制日货运动: 关于南洋华侨民族主义的研究(上)》, 《南洋资料译丛》, 2000 年第 3 期, 第 73 页。

¹⁸ 陈嘉庚, 《南侨回忆录》, 上海书店, 1989 年, 第 418 页。

¹⁹ Oral history transcript of Mr NG Aik Huan, Interview conducted in Hokkien,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Singapore, 1981, Reference No. A000035/15.

²⁰ CO 273/583(殖民部档案)殖民部 P.Cunliffe-Lister 致金文泰总督函, 1933 年 1 月 2 日。转引自杨进发著, 李发沉译, 《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 集美: 陈嘉庚纪念馆, 2012 年, 第 62 页。

²¹ 张玉宁, 《1914-1941 年英日两国在马来亚的经济摩擦》, 硕士学位论文, 广西师范大学, 2023 年, 第 27 页。

²² Why Tan Kah Kee'S Closed, Straits Times, 8 June 1934, p.13.

²³ Oral history transcript of Mr NG Aik Huan, Interview conducted in Hokkien,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Singapore, 1981, Reference No. A000035/15.

²⁴ Why Tan Kah Kee'S Closed, Straits Times, 8 June 1934, p.13.

指,牺牲了将要复兴的陈嘉庚工业。有一“魔商”借助其与银行的良好关系在陈嘉庚不同意的情况下强行获取陈嘉庚公司产品在英国的专卖权。在完成之前的订单之后,“魔商”拿到了专卖权反而使英国方面的销量下降,为预计订单购买的原料只能在仓库继续囤积,因这一争端,陈嘉庚与银行各股东之间的间隙加深。²⁵主导陈嘉庚公司的英国银行家们的主要目的并非使公司盈利以实现长远发展,而是偿还债务。为此,他们将除橡胶厂以外的其他工厂关闭以节省开支。在一次董事会会议中,争论达到高潮时,新加坡汇丰银行经理公开声明,当英国制造商在英国本土的利益因公司在英国和英帝国其他市场的积极竞争而受到威胁时,作为公司融资人和债权人的银行家们便不能再无动于衷了²⁶陈嘉庚被迫引入不以这家殖民地企业利益为先的外行英资银行团来指导自己的企业,这才是导致陈嘉庚公司最终结束营业的主要原因。

(四)人才的出走。陈嘉庚企业培养出来的人才众多,新马第二代胶商大多出身于陈嘉庚企业,他们的出走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受繁荣的橡胶市场刺激,希望独立创业;二是理念不合,新生代人才成长起来后与陈嘉庚产生分歧,选择出去单干;三是经济大萧条时期,陈嘉庚企业资金链断裂,缺乏销路,无法正常运转,停产停薪,旗下经理、主管只能纷纷另谋出路。因此,陈嘉庚企业在艰难维持运转的同时,还要面对这些竞争对手的挑战。

(五)陈嘉庚本人的事业心下降。经济大萧条开始时,陈嘉庚已经55岁了,倘若1922年其弟陈敬贤没有因病退出管理,48岁的陈嘉庚或许不会再回到新加坡接管生意了。在经历了橡胶价格下跌、管制计划实施后的回升,再到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陈嘉庚在1933年发表了《不景气之历史观与南洋华侨当前应探之策略》,清醒地认识到橡胶业的挫折是因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过剩”,并不是一人可以挽救的,而“欲救不景的希望,只有两事,非战争则共产。战争属于治标,共产属于治本。然治标或可较易见的,唯非根本之解决,徒演人类之惨剧。至于治本,虽生效较迟,然目的一达,则世界大同。”²⁷

陈嘉庚之前在经商之余,也在新加坡、中国福建兴办教育,利用自己的号召力参政,在知道自己无法以一力挽狂澜之后,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本来就关注的教育事业上和之后的抗日事业,从华人橡胶大王变成了教育家、慈善家等。随着陈嘉庚时代的落幕,新加坡第二代华人胶商开始主导新加坡橡胶业。

三、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华人胶商

陈嘉庚对新加坡橡胶业乃至新加坡工业的贡献在于,他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为新加坡培养和培训了一大批熟练工人与经验丰富的华商。1924-1925年新加坡橡胶业兴旺时,他的雇员们因为各种原因开始自己独立创业,此后脱颖而出的橡胶商人,或多或少都与陈嘉庚公司有着渊源。李光前是陈嘉庚的女婿,陈六使是陈嘉庚的堂亲,陈共存是陈嘉庚的侄子,陈赐曲是陈嘉庚橡胶厂的经理……这些人都或多或少受益于陈嘉庚公司,并在其基础上继续发展壮大,最终成为新加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腾飞的工业经济中的重要力量。

其中李光前,因创办的南益公司成为继陈嘉庚之后第二个被称为橡胶大王的华商。而这个称谓并非可以继承,而是众望所归。陈嘉庚在企业运营上大量任用家人、族人、乡亲,但他开办企业的目的并非像传统家族企业那样追求传承。据陈嘉庚之子陈国庆回忆:在陈嘉庚办厂的宗旨是培养人才,而非追求利润。他将工厂视作一所“母工厂”,通过培训工人,使其具备资格后送回中国开办工厂,以让中国人掌握橡胶行业的技术。他这样做是为了中国和东南亚的长远利益,并不在意工厂本身的盈亏。²⁸因此,陈嘉庚没有将清盘后的橡胶产业都留给自己的儿子经营,而是将其租给李光前的南益、陈六使的益和经营、还有一些工厂则招请经理人合租等,以租金入股,抽

²⁵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上海书店,1989年,第420-421页。

²⁶ Oral history transcript of Mr NG Aik Huan, Interview conducted in Hokkien,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Singapore, 1981, Reference No. A000035/15.

²⁷ 陈嘉庚,《不景气之历史观与南洋华侨当前应探之策略》,《南洋商报》,1933年4月46日,第2页。

²⁸ Oral history transcript of Mr Tan Kok Kheng, Interview conducted in English by Mr Lim How Seng,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Singapore, 1981, Reference No. A000232/81.

取三成作为助学经费。²⁹此外,陈嘉庚在清盘之后虽将所留的不菲财产交由子女管理,但并未因此放弃慈善事业。陈国庆回忆道,父亲不打算将财产留给任何一个子女,理由是“财富会损害智者的雄心,增加愚者的愚蠢”。³⁰

一鲸落而万物生,陈嘉庚企业的倒闭,使当时的中小胶商有了喘息与扩张空间,李光前、陈六使皆得益于此。李光前还从银行手中接手了林义顺的橡胶厂。作为第二代橡胶大王,李光前和陈嘉庚的经营理念不同,陈嘉庚愿意“毁家兴学”,而李光前则是在公司存续的前提下从事慈善。李光前在陈嘉庚公司担任财务主管期间,常对公司财务状况感到忧虑,1926年,他曾劝请陈嘉庚不宜继续举贷。在离开之前,李光前曾向岳父表示有意以自己的积蓄入股公司,成为股东,陈嘉庚听后却一口回绝,说:“我赚钱是为了办教育,你赚钱却为发财”。³¹据李光前之子李成义证实,父亲如果不是外祖父的女婿,可能早已离开,而非等到1927年才独立创业。事实上,即便从1927年开始创办自己的企业,父亲仍在监督外祖父旗下大部分公司的经营。³²

除了在捐资办学的理念上存在分歧之外,李光前与陈嘉庚在为人处世与经营理念上都颇为相似:二人都节俭、认真。因陈嘉庚的失败经验,李光前比陈嘉庚行事更为谨慎,对不了解的行业绝不会盲目扩张。独立创业李光前先是做橡胶转口贸易,待对制造业有了充分了解之后,才开始涉足制造业。财务主管出身的李光前还了解橡胶价格的时效性是经营的关键,他坚持买进后立刻卖出,并不如新加坡大部分橡胶商一样赌涨跌,从而避免了因囤积而遭遇胶价下跌导致惨重损失的风险。1954年,他更引进了IBM商务机会计系统,以便更好地控制总部与各分公司的橡胶库存。³³

在员工分红上,南益的政策是将年利润的20%分给员工和经理。其中,先发给员工20%,再将剩余部分发给经理。³⁴此举旨在激发从上到下的工作动力。而从人员培训上,李光前公司“任人唯亲”,所有员工均从基层逐级晋升,即便是与家族成员有关系的员工,也须凭借自身能力获得提拔。³⁵

在工厂管理上,受时代进步与东南亚工人运动发展的影响,李光前所采取的模式较老一代胶商更为现代化。接手林义顺的橡胶厂后,他增加了轮班次数与工人薪资,规范了发薪制度,体恤工人、关心工人健康,同时提升了工头的素质。由此,管理更加顺畅,工人的动力与精神面貌亦焕然一新。³⁶

李光前与陈嘉庚这对翁婿的慈善理念虽不尽相同,但李光前在承继陈嘉庚经验的基础上创办的南益公司,却比陈嘉庚的企业走得更远,并一直传承至今。与此同时,1952年李光前创立的李氏基金会也持续运营,以捐助文教及社会公益事业为主。

结论

纵观新加坡华人胶商群体,可以清晰地看到“陈嘉庚印记”的深刻影响。大多数华人胶商都出身于陈嘉庚公司,即便不属于其公司,也与他有过商业往来。在陈嘉庚时代,除了他之外,几乎没有第二位华人从事橡胶加工业,大多数人以橡胶种植或中介贸易为主。而自陈嘉庚之后,新加坡的橡胶加工业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从马来半岛、印尼群岛进口的橡胶,经过简单加工后通过港口出口,后期则逐步转向橡胶制品的加工与出口。至今,新加坡仍是全球橡胶价格发现中心之一,并拥有世界四大天然橡胶交易所中的新加坡交易所。

与此同时,林义顺在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柔佛州开垦的数万亩土地,也在历史上永久留下了他的名字。在当时大型种植园多为欧洲企业所拥有的环境下,他凭借自身努力逐渐开垦出自己的种植园,其周边区域更发展成为实

²⁹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上海书店,1989年,第420页。

³⁰ Oral history transcript of Mr Tan Kok Kheng, Interview conducted in English by Mr Lim How Seng,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Singapore, 1981, Reference No. A000232/81.

³¹ 陈共存转述陈济民口述,转引自杨进发著,李发沉译,《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集美:陈嘉庚纪念馆,2012年,第45页。

³² Oral history transcript of Lee Seng Gee, Interview by Mr Lim How Seng,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Singapore, 1980, Reference No. A000040/8.

³³ 同上。

³⁴ Oral history transcript of Mr Tan Keong Choon, Interview conducted in Mandarin by Mr Lim How Seng,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Singapore, 1981, Reference No. A000052/24.

³⁵ Oral history transcript of Lee Seng Gee, Interview by Mr Lim How Seng,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Singapore, 1980, Reference No. A000040/8.

³⁶ Oral history transcript of Toh Ngo Tong, Interview conducted in Hokkien,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Singapore, 1985, Reference No. A000605/16.

质上的橡胶产业园，橡胶产地与加工厂连成一体。他也因此由富致“贵”，获封太平局绅头衔。

陈嘉庚与林义顺或许并非新加坡橡胶业的第一批华人从业者，但无疑是这一行业最重要的开拓先驱之一。他们在原本以欧洲人为主导的橡胶业中，为第二代华人胶商开辟了可供发展的新领域，使后辈得以吸收他们的经营经验与慈善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最终塑造出新加坡今日的商业图景。

参考文献：

- [1]W.G.赫夫著，牛磊、李洁译，《新加坡的经济增长——20 世纪里的贸易与发展》，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年。
- [2]杨进发著，李发沉译，《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集美：陈嘉庚纪念馆，2012 年，第 45 页。
- [3]《回忆陈嘉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福建省政协，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年。
- [4]李志贤，《烽火的烙印——二战前后新加坡林氏家族的式微与潮社权力格局的变化》，《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1 期。
- [5]林孝胜、林源福编，《义顺社区发展史》，新加坡：义顺区基层组织与国家档案馆，1987 年。
- [6]新加坡橡胶公会秘书处编，《一九五七年新嘉坡橡胶公会年鉴》，新加坡橡胶公会，1957 年。
- [7]《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75 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史记》，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1981 年。
- [5]明石阳至著，张坚译，《1908-1928 年南洋华侨抗日和抵制日货运动：关于南洋华侨民族主义的研究(上)》，《南洋资料译丛》，2000 年第 3 期。
- [6]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上海书店，1989 年。
- [7]张玉宁，《1914-1941 年英日两国在马来亚的经济摩擦》，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23 年。

The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of Singapore Rubber Merchant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Lim Xiaoxiao

(1.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after colonial powers introduced rubber seeds to Southeast Asia, Malaya (present-day West Malaysia) and the Dutch East Indies (present-day Indonesia) rapidly became the world's major rubber-producing regions. As a transit point along the route for Southeast Asian rubber exports to European consumer countries, Singapore leveraged its free-port policy to vigorously develop rubber entrepôt trade, leading to the rapid growth of its rubber industry. Initially, rubber traders were predominantly European; it was only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that the number of Chinese rubber merchants gradually increased. At that time, operators in Singapore's rubber industry were closely connected through ties of clan, marriage, and native place, weaving themselves into a network of rubber merchants that propelled the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s rubber industry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Keywords: Tan Kah Kee; Lee Kong Chian; Singapore Rubber Industry

《自警编》版本考略

汪玉雅竹¹

(1.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赵善璵为南宋时人,其代表作《自警编》成书于嘉定年间,内容采摭宏富,具有重要的校勘与辑佚价值。通过梳理现存版本的源流可知,该书主要形成了两大版本系统,并旁及朝鲜等域外刻本。其中,南宋九江郡斋刻本为全书祖本;至明代,是书颇受重视,屡经翻刻,版本众多,虽在卷次编排与文本内容上与宋本差异较大,但对推动该书的传播与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流传至朝鲜、日本后,又衍生出受宋、明两大系统共同影响的新刻本。目前,赵善璵《自警编》尚需在更全面、深入的版本校勘基础上,整理出一部更为完善的点校本,以更好地服务于学术研究。

关键词:赵善璵;《自警编》;版本考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353

《自警编》为南宋赵善璵所撰“士箴”类著作,辑录宋代名臣言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该书被《四库全书》列入存目,馆臣评曰:“南渡而远,门衣立而党局生,议论繁而实意减,非复先民笃厚之风。故独胪陈旧德,以示断限。虽所列率人所习闻,而缕析条分,便于省览。其财赋门、兵门及拾遗一类,则并及于壬人愆夫,用垂炯戒,亦当时士大夫之药石。”^①可知赵善璵编撰是书,意在借前贤言行匡正时弊。全书分为学问、操修、齐家、接物、出处、事君上下、政事、拾遗九类,每类各分子目,凡五十有六。现存宋本主要为五卷本、不分卷本,至明以后,颇受推崇,不断有翻刻本问世,又出现了九卷本、十一卷本等等,传到朝鲜、日本后,更出现金昌集仿作之《后自警编》。

《自警编》采摭宏富,且多标注文献来源,具有重要的校勘与辑佚价值。在校勘方面,是书所载内容可为校订文献提供重要参考。如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卷三曾据《自警编》校正《国老谈苑》记载之失:“卷一称‘太宗尝幸龙图阁阅书’,考此阁乃太宗卒后所建,内置太宗御书,《宋史》以为真宗景德元年置。考《职官分纪》卷一五‘咸平四年真宗幸龙图阁’……宋赵善璵《自警编》卷六所记此事与《国老谈苑》略同,唯‘太宗’作‘真宗’,当是。”^②在辑佚方面,《自警编》所引文献,如张商英《论七臣疏》原篇多已散佚,幸赖此书事君类“上方励精有为”条得以存其梗概^③。清人编纂《全宋文》时,即自《自警编》中辑录该文,并明确标注出处。可见,《自警编》对于古书的辑佚与考订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作者赵善璵,字德纯,南海(一作歙)人,宋宗室。生卒年均不详,约宋理宗绍定中前后在世,虽《宋史》无传,然其生平事迹犹可自方志中窥见一斑。他早年以父荫入仕,授承信郎,却非安于门荫之辈,少时即胸怀远志,笃志向学,终在嘉定元年(1208年)登进士第,从此步入仕途。^④其仕途中最令人称道者,在于临危不乱的担当与为民请命的气魄。通判广德军时,适逢大饥,他毅然借调官仓钱款购粮赈济,使百姓得以度过危难;治理兴国军期间,他以卓越政绩赢得“有能名”之誉;及至知江州时,面对水患引发的粮价飞涨,他果断从各地调集三万余斛粮食,分拨各县,迅速平抑物价,保全一郡生灵。朝廷嘉奖其政绩,屡次擢升,晚年更召为尚书郎,颇受重用。惜天不假年,未几即以疾乞祠,数月后溘然长逝,官至中奉大夫。^⑤所著《自警编》一书,成为其生平思想的重要见证。

2015年出版的《全宋笔记》收录《自警编》整理本,惜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参校明嘉靖本。然二者实属同一版本系统,皆存在一定程度的文本散佚与讹误,影响整理品质^⑥。郭平《两部宋版精品〈自警编〉皆为后世祖本》、康尔平《馆藏宋刻〈自警编〉着录考》、刘冰《绝世双“壁”——两部宋版〈自警编〉》对辽

作者简介:汪玉雅竹(2002—),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宋史、历史文献学。

^①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23《子部·杂家类七》,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61页。

^② 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卷3,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27页。

^③ (南宋)赵善璵:《自警编》,辽宁图书馆藏南宋九江郡斋刻本(果亲王本),第4册,第65页。

^④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647页。

^⑤ 弘治《徽州府志》卷8《人物志》,第1026页b。

^⑥ 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7编第6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第3页。

宁图书馆所藏的两本宋刻本进行了校勘和考证,但其所涉及的版本数量有限^①;贾林晓《辽宁省图书馆藏宋刻珍本〈自警编〉考论》对此书的编纂特色、版本流传、文献价值进行了充分论证,但在版本流传部分未对版本源流进行考述,论述稍显简略^②;谢冰欣《宋元箴规小说研究》对《自警编》作者、版本体例、价值及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其版本分析偏重序跋梳理^③;本文拟在前人基础上,系统梳理《自警编》现存诸本之源流关系并评鹭其优劣,以期为后续整理与研究提供基础。

一、南宋九江郡斋刻本系统

南宋九江郡斋刻本系统包含南宋九江郡斋刻本和依其补刻、翻刻的各种版本,主要有五卷本、不分卷本。

(一) 南宋九江郡斋刻本(下简称宋本)

宋本是指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刊刻于九江郡斋的祖本。此本保留有赵善璵前序,序中言明,《自警编》始撰于嘉定十四年(1221年),成书于嘉定十七年(1224年),时隔八年后首刻于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九江郡斋,由此形成了唯一一种宋本。^④

《自警编》宋本现存四部,分藏三处:辽宁图书馆藏有两部,分别为钤有“果亲王府图书记”之果亲王本,及卷末附宋实颖跋语之宋实颖本;国家图书馆与台北“国家图书馆”亦各藏一部,皆为残本。就卷帙形态而言,除辽宁图书馆所藏宋实颖本为不分卷外,其余三部均为五卷本。诸本版式统一,皆为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双黑鱼尾。版心中题“自警编甲至戊”,下标刻工姓名,如苟道氏(或省作“苟”)、谢友、民、王必文(或作“必文”)等。书中于征引文献处,皆于条末以小字标注出处,字旁附有句读。宋讳如胤、耿、完、慎、惇、敦等字时见缺笔,然避讳未严。卷前载《宋嘉定甲申正月望赵善璵序》及全书目录,目录分“学问类、操修类、齐家类、接物类、出处类、事君类上、事君类下、政事类、拾遗”九类,下系五十六子目。全书按内容分卷如下:甲卷为“学问、操修”,乙卷为“齐家、接物、出处”,丙卷为“事君上”,丁卷为“事君下”,戊卷为“政事、拾遗”。卷末附《端平改元三月旦善璵再书》。

1. 果亲王本(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00776)

足本,卷末有翁方纲观款:“乾隆四十二年岁在丁酉夏六月十五日文渊阁校理翰林编修大兴翁方纲获观”。书中钤有“王世懋印”“敬美甫”“果亲王府图书记”等鉴藏印,据此可知其递藏源流:明代经王世懋收藏,清代入果亲王允礼府邸。

2. 宋实颖本(第一期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00777)

不分卷,残本,现存仅甲、乙、戊三卷,较足本少事君类(上)、事君类(下)两部分,即丙、丁两卷。卷末附康熙十九年宋实颖跋,其文曰:“右《自警编》壹拾贰本,俱南渡时旧刻,系虞山顾玉书先生所赠。庚申春二月初三日天气阴寒,朗诵一过,觉太和自胸中流出,后生小子勿易视之。”^⑤据此可知,宋实颖递藏之时此本尚为全帙。据康尔平考察,后人为掩饰残缺,曾将目录中丙、丁两卷篇名及子目挖除,并剔除版心甲、乙、戊等卷次标识,伪作完本之貌。^⑥故而,宋实颖本之原貌应为五卷本。是书钤有“东沙居士”“真赏斋印”“秦逢氏”“又玄斋考藏图书印”“既庭”“实颖之印”等藏印,据此可勾勒其递藏脉络:明代先后经华夏(真赏斋)、秦四麟收藏,入清后归宋实颖插架。

3. 国家图书馆藏宋本(索书号 09826)

残本,现缺丙卷,钤印“京师图书馆”。《藏园群书经眼录》曾着录此本:“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字……此书余凡见数本,北京图书馆及袁寒云(克文)藏皆是也。”^⑦《中国善本书提要》着录^⑧。

4. 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宋本(书号 07569)

残本,现缺戊卷“政事、拾遗”两类,钤印“沈慈印记十峰监藏”“十峰秘玩”“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枕碧楼藏书记”“曾在云间啸园沈氏”“贞”“元”“伯雅”等。其中“贞”“元”“伯雅”三印归属尚难确考,然据其余诸印可勾勒其递藏脉络:此本曾为清代沈慈(十峰)所藏,后归沈家本(枕碧楼),终入藏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园群书经眼录》着录。^⑨

四本虽同为宋本,亦有文字差异。如学问类“陈忠肃公在通州张无尽入相”条,宋实颖本小字注“何执中邓洵”,他本皆注“何执中邓洵武”。查《自警编》拾遗类有:“如薛昂,蹇序辰,何执中,邓洵仁,洵武”^⑩之载,可知邓洵武为人名,“邓洵”当为“邓洵武”之误。又操修类“陈忠肃公璩虽闲居容止尝庄”条,宋实颖本作“尝”,他本皆作“常”。可知宋实颖本应为初印本,他本为后印本,后印的过程中于初印之失有所订正。

(二) 宋刊明补本

宋刊明补本现存有三本,分别藏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台北“国家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文库。香港大

^① 郭平:《两部宋版精品〈自警编〉皆为后世祖本》,《辽宁日报》2023年9月6日,第1版;康尔平:《馆藏宋刻〈自警编〉着录考》,《图书馆学刊》1982年第3期。

^② 贾林晓:《辽宁省图书馆藏宋刻珍本〈自警编〉考论》,《图书馆学刊》2021年第10期。

^③ 谢冰欣:《宋元箴规小说研究》,西南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

^④ (南宋)赵善璵:《自警编》,辽宁图书馆藏南宋九江郡斋刻本(宋实颖本),第1册,第5页。

^⑤ (南宋)赵善璵:《自警编》,辽宁图书馆藏南宋九江郡斋刻本(宋实颖本),第3册第212页。

^⑥ 康尔平:《馆藏宋刻〈自警编〉着录考》,《图书馆学刊》(辽宁)1982年第3期。

^⑦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77页。

^⑧ 王冲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子部·杂家类·杂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37页。

^⑨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第778页。

^⑩ (南宋)赵善璵:《自警编》,辽宁图书馆藏南宋九江郡斋刻本(宋实颖本),第652页。

学冯平山图书馆、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皆为五卷本，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本为不分卷本，三本行款同宋本，半叶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双黑鱼尾，版心中镌“自警编甲至戊”。下记刻工，征引典籍会在每条内容末进行小字标注，字旁附句点。卷前有《宋嘉定甲申正月望赵善璪序》，卷后有《端平改元三月旦善璪再书》。

1.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本（下称汪镛本，因有汪镛手书题记故称；书架：善 178/600）

藏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五卷，第二、三卷抄配，缺目录。卷末有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汪镛手书题记。钤印“汪镛颂堂”“莫棠之印”“独山莫氏铜井文房藏书记”“吴兴刘氏嘉业堂藏”等。可知汪镛本递经汪镛、莫棠、刘承干等人收藏。此本见于《嘉业堂藏书记》。^①

2.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本（下称毛晋本，因有毛晋钤印故称；书号 07568）

藏于台北“国家图书馆”，钤印“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子晋氏”“毛晋之印”“子晋”“毛扆之印”“斧季”“泰峰所藏善本”“曾在上海郁泰峰家”“苕圃收藏”。可知毛晋本先后由毛晋、郁松年、张钧衡收藏。张钧衡，字石铭，号适园主人，吴兴（今湖州）南浔镇人。在南浔南栅补船村鹁鸪溪畔建“适园”。另建有“九松精舍”“嘉荫草堂”“择是居”“燕喜庵”“六宜阁”等，藏书十余万卷，精本亦多。国民党撤退时，将其善本一部分运至台湾地区，毛晋本亦在此时转由台北“国家图书馆”收藏。

3.静嘉堂文库藏本（资料番号 74）

不分卷，版心无“自警编甲至戊”，但记刻工名。钤印“神游心赏”“子子子孙保之”“项子京家珍藏”“项墨林父秘笈之印”“子京父印”“项叔子”“墨林山人”“墨林玩秘”“樵李”“项元汴印”“方氏世昌”“天籁阁”“朱方真逸”“钱现之印”“含晖堂”“臣陆树声”“归安陆树声叔桐父印”等。可知该本曾由项元汴、项墨林先后收藏，后流向日本静嘉堂文库。《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仪顾堂集》《项宋楼藏书记》《静嘉堂秘籍志》着录此本^②。

经以宋本与宋刊明补本对校，可知汪镛本与静嘉堂文库藏本仅存个别脱字。其中，静嘉堂文库藏本虽为不分卷本，内容与其他版本大体一致，唯“张子韶曰管仲不学”一条脱“瞻仰世皆”四字。相较于此二本，毛晋本脱文现象较为严重，多达二十余处，涉及学问类如“范纯仁尝曰”“荥阳吕公从安定胡先生瑗于太学”“张魏公在京师”“朱氏小学书嘉言篇”“范文正公少与刘某某同”诸条；见识类如“李文靖公沆为相”“南海蛮酋虐其部人”“建中之初右司谏陈公莹中”等条；以及器量类“程氏遗书云”等处。此类脱字多因保存不善致字迹漫漶，并非源于刊刻之误。此外，在学问类“荥阳吕公从安定胡先生瑗于太学”条中，毛晋本作“尽力乎苒内者”，而他本皆作“尽力呼其内者”；该本“苒”字有明显涂改痕迹，系于原刻“且”字之上叠写而成，亦可见其文本之不可靠。综上可见，毛晋本的校勘价值明显低于汪镛本与静嘉堂文库藏本。

（三）明刻本

根据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方孝孺《自警编序》与嘉靖七年（1528年）赵鹤《重刊后序》^③所载，洪武年间，蜀献王朱椿因闻方孝孺贤名，特延聘其为世子师。同年，朱椿将《自警编》重新刊刻，流布于世。至嘉靖七年，蜀成王朱让栩复命赵鹤再次刊印，以教化士人。因此，在明代前中期，《自警编》于四川地区流传较广，颇受重视。

现存宋本系统之明刻本皆刊刻于四川，主要有明洪武二十七年蜀藩覆宋刊本（以下简称“蜀藩覆宋刊本”）与明嘉靖七年蜀藩重刻本（以下简称“蜀藩重刻本”）。二者行款一致，均为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双黑鱼尾，版心中镌“自警编甲至戊”。书中记录刻工姓名，并于每条引文之末以小字标注出处，字旁附有点句。卷前载《宋嘉定甲申正月望赵善璪序》，卷末附《端平改元三月旦善璪再书》。

1.蜀藩覆宋刊本（书号：故善 008134-008145）

现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钤印“樵李”“墨林秘玩”“项子京家珍藏”“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千隆御览之宝”“天禄琳琅”“翠筠馆印”等，可知该本先后由陆时雍、项元汴、清宫“天禄琳琅”收藏。彭元瑞《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曾录入该书：“前有嘉定甲申善璪自序，后有善璪再序（时端平元年钤木于九江郡斋）。大字本。樵李项氏藏。”^④

2.蜀藩重刻本（索书号 13847）

国家图书馆藏，卷前有嘉靖七年皇宗适菴《重刊自警编序》、洪武二十七年《方孝孺自警编序》，卷后有嘉靖七年《赵鹤重刊后序》。仅一个“乙亭田氏藏书之印”钤印。根据其书后赵鹤重刊序可知，明嘉靖七年蜀藩重刻本底本为明洪武二十七年蜀藩覆宋刊本。

上文已论及，宋实颖本在学问类见识中标注小字“何执中邓洵”，少“武”字；操修类诚实中“陈忠肃公瑾虽闲居容止尝庄”条，“尝”应改为“常”，此为宋实颖本之误。在诸本中，唯蜀藩覆宋刊本和蜀藩重刻本有此误，因此蜀藩覆宋刊本、蜀藩重刻本应属宋本系统。此外，蜀藩覆宋刊本又有可补明嘉靖七年蜀藩重刻本之处。蜀藩重刻本多处都有字体漫漶的现象，如卷九拾遗类“王荆公知明州鄞县”条、“王荆公再秉政”条、“卢多逊贬朱崖”条、“石介既卒”条、“真宗既疾基殆”条等。

二、明嘉靖十九年陈光哲薇垣精舍刻本系统

①（清）缪荃孙、吴昌绶、董康等撰，吴格点校：《嘉业堂藏书记》，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67页。

② 严绍璁：《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子部·杂家类》，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138页；（清）陆心源撰：《仪顾堂集》；卷20《宋版自警编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37页；（清）陆心源撰：《项宋楼藏书记》卷58《杂家类四》，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58页；[日]河田黑撰、杜泽逊等点校：《静嘉堂秘籍志》卷28《杂家类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080页。

③（南宋）赵善璪：《自警编》，国家图书馆藏嘉靖七年蜀藩重刻本，第5册，第90-93页。

④（清）瞿镛、（清）杨绍和、（清）潘祖荫：《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5，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00页。

据万历二年(1574年)潢南道人《自警编重刊序》所载:“迨我熙朝一梓于蜀藩,再刻于岭表,复广于闽海滇南之区,其流布遐迩而昭然,在人耳目惟时。”^①由此可见,《自警编》在明代的流传范围极为广泛。该书先由四川刊印,继而于两广地区重刻,随后更流通至云南、福建等地。潢南道人(即益宣王朱翊钊)封藩于江西南城,获此书后遂命南城令李侯重新刊刻,进一步推动其传布。

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陈光哲薇垣精舍刻本系统,存世数量颇丰,目前可见包括陈光哲原刻本、陈善刻本、瑞州府刻本等八种刻本。该版本系统的版式具有较强共性:除和刻本为半叶九行二十字外,其余皆为半叶十行二十字,白口,双黑鱼尾,版心统一镌有“自警编卷之一至九”字样,且均未记录刻工姓名。在边栏样式上,除陈光哲刻本为左右双边、戴洵王弘海本为四周单边外,其他诸本均为四周双边。

就文本内容而言,该系统与宋本系统差异较大。首先,宋本征引典籍出处之小字标注,诸本存在大量脱漏的现象。其次,该系统皆为九卷本,其目录结构统一划分为“学问类卷之一”至“拾遗类卷之九”,共九卷五十六子目,与宋本系统之五卷分帙迥然有别,体现出按类别独立分卷的编排特色。再次,诸本相较宋本系统多有脱讹,唯和刻本情况稍好。以宋本与诸本对校,笔者发现在卷一学问类中,有二十二条内容以上七个刻本皆脱,四条陈善刻本、瑞州府刻本、徐枋刻本、李超刻本、戴洵王弘海本和《四库全书》本脱,一条瑞州府刻本、李超刻本和戴洵王弘海本脱,而和刻本皆不脱。此外,陈善刻本独脱器量“韩魏公徙开封府推官”“王沂公曾状元及第还青州”等五条,戴洵王弘海本独脱学问“范纯仁教子弟”“张魏公在京师”等五条。另,在卷一中各本相较宋本共有文字出入二十处,涉及“李文靖公作相”“张忠定公守蜀”“范纯仁尝曰我平生所学”等条,共有脱字二十六处,涉及“真宗祀汾阳”“杜祁公老居睢阳”“李文靖公沆为相”等条,共有衍字十一处,涉及“真宗祀汾阳”“向敏中除右仆射”“吕正献公着平生未尝较曲直”等条。最后,各本卷前多载有《宋名臣名儒姓氏号纪》等内容而宋本系统无,亦为此系统之共同特征。

(一) 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陈光哲薇垣精舍刻本(索书号善 228/190)

今藏于杭州图书馆。该书卷前刊有嘉靖十九年林庭棨所作《重刊自警编序》。书中钤有“冯贞群印”“伏跗室藏书印”二方,皆为近代藏书家冯贞群遗印。冯氏为清光绪十七年(1903年)秀才,筑“伏跗室”以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宁波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并将毕生所藏尽数捐献国家。

(二) 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陈善刻本(缩微品)

今藏于国家图书馆。该本卷首收录嘉靖十九年林庭棨《重刊自警编序》、李文田手书跋语及嘉靖四十年陈善《重刊自警编序》,卷末附莊一俊《自警编后序》。全书未见藏印。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自警编九卷,明嘉靖滇南刊本……每类各分子目,凡五十有五。”^②所着录原本乃该刻本。

李文田跋语曰:“右序见宋刊本,藏吴县潘尚书(祖荫)家。光绪十六年元日藉以校此本,乃知明刊本与宋时原本回异。惜尚书所藏宋,祇是残本未完,然每门以校,次段数增多,且所揉掇原书,多不改,并具出处,为可贵也。”^③可知,陈善刻本在内容编排、段落数量及文献出处标注方面,与宋本已有显著差异。此外,该本可见前人校笔,对宋本中的脱文、衍文及讹误进行了全面校补:脱字补于天头,衍文以笔划除,误字则在右下方标注正字。

莊一俊《自警编后序》则述及陈光哲刊刻《自警编》之缘起,言其在赴任浙江途中,得到“形山公”批注的《自警编》,赞叹其为“嗜好无逾公者矣”,并每日与陈光哲共同研习请教,深得陈光哲推重,遂促成此本之刊行流传。故可知,陈善所得底本应为陈光哲刻本。

(三) 明万历元年(1573年)瑞州府刻本(书号 07571)

今藏于台北“国家图书馆”。该刻本卷首汇集了历次重刊的重要序言,包括万历元年徐枋《重刊自警编序》、嘉靖十九年林庭棨《重刊自警编序》以及嘉靖四十年陈善《重刊自警编序》;卷末则附有莊一俊《自警编后序》。书中所钤“延古堂李氏珍藏”印,表明其曾为延古堂李士珍家族之物。《中国善本书提要》着录^④。据《善本书室藏书志》记载,此本源于万历元年徐枋巡抚江西时以滇本(即陈善刻本)为底本校刊;至万历四年徐氏移抚浙江,又于壮猷堂加以重刊。^⑤

(四) 明万历四年(1576年)徐枋刻本(索书号 110542)

现藏于南京图书馆。该刻本卷前依次收录明万历四年徐枋《重刊自警编序》、嘉靖十九年林庭棨《重刊自警编序》、万历二年潢南道人《重刊自警编序》及嘉靖四十年陈善《重刊自警编序》;书末则附有莊一俊《自警编后序》与罗汝芳《重刊自警编后序》。书中钤有“嘉惠堂丁氏藏书”印,可知此本曾为晚清著名藏书家丁丙旧藏。

(五) 明万历五年(1577年)李超刻本(索书号 A00483)

① (南宋)赵善璵:《自警编》,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年徐枋刻本,第1册,第15-19页。

② (清)丁丙撰:《善本书室藏书志》卷19《子部九下》,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6年,第112页。

③ (南宋)赵善璵:《自警编》,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年陈善刻本,第1册,第7页a。

④ 王冲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子部·杂家类·杂纂》,第337页。

⑤ (清)丁丙撰:《善本书室藏书志》卷19《子部九下》,1986年,第113页。

国家图书馆藏。卷首有万历四年徐枋《重刊自警编序》、嘉靖十九年三山小泉林庭樾《重刊自警编序》、万历二年潢南道人《重刊自警编序》、嘉靖四十年陈善《重刊自警编序》、明万历五年李超《重刊自警编序》。卷末有莊一俊《自警编后序》、罗汝芳《重刊自警编后序》。钤印“天阁”“古司马氏”“黄冈刘氏校书堂藏书记”“黄冈刘氏过眼”，“天阁”“古司马氏”范钦之印，余二印藏主身份待考，应为湖北黄冈的刘姓藏书家。

(六) 明万历年间戴洵、王弘海重刊弘治十五年(1502年)本(番号 308-0047)

日本公文书馆内閣文库藏，无格。无任何序跋但有宋名臣名儒姓氏号纪，批注、校者姓名。每页有黑色、红色两种批注字体。黑色字体在每页上方，大多已模糊不清，红色字体则对正文进行标点和校补。钤印“浅草文库”等。

(七) 《四库全书》本

《四库全书》本，无序跋亦无宋名臣名儒姓氏号纪，但卷前有馆臣所写提要。《嘉业堂藏书志》着录：“《四库提要》着录九卷，盖明嘉靖十九年三山林庭樾重刻之本也。”^①

(八) 日本享和二年(1802年)刊本(下称和刻本；番号 308-0046)

日本内閣文库藏，卷首有明洪武二十七年方孝孺《自警编序》，卷末有朝鲜金安老跋。钤印“大日本帝国图书印”“浅草文库”“昌平阪学问所”。

和刻本、陈光哲本虽同为九卷本，类目也基本相同，但从内容来看，两本有些差异。首先，在卷一中，陈光哲本所脱二十二条及征引典籍出处，和刻本皆不脱。其次，陈光哲本很多脱漏、讹误之处，和刻本改正了部分，但又有一些保留了下来。比如学问《荥阳吕公从安定胡先生瑗于太学》条，陈光哲本作“荥阳吕公从安定胡先生于太学，与黄公履邢公恕同舍，至相友善。其后复从孙先生复……而明道先生颢及横渠张先生载，孙公觉李公常”^②。而和刻本作“荥阳吕公从安定胡先生瑗于太学，与黄公履邢公恕同舍，至相友善。其后复从孙先生复……而明道先生颢及横渠张先生载，兄弟孙公觉李公常”^③。和刻本将“荥阳”之误进行了改正，并补上陈光哲本所脱“瑗”“兄弟”，但和刻本、陈光哲本同作的“复从”，宋本作“偏从”。又《李文靖公作相》《张忠定公守蜀》等条，和刻本、陈光哲本讹误之处皆同。故此本应属陈光哲刻本系统，同时用宋本校补而成。

三、其他刻本

在宋本和明本系统之外，又有一些刻本版式独特，与主流的两个系统不同。

(一) 朝鲜刻本

朝鲜刻本主要有朝鲜显宗五年刊本、吉田意庵旧藏朝鲜古活字本。在内容与条目上，此两本以宋本系统为基底，保留了宋本五卷的架构、完整的条目数量及征引出处的小字标注，文字亦多同宋本之正；在版式上，又明显受到明本系统的影响，如卷首增入明本系统特有的《宋名臣名儒姓氏号纪》，且在分类上有所调整。

1. 朝鲜显宗五年刊本(《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四辑)

五卷，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四辑收录。白口，四周单边，双花鱼尾，半叶十行十七字。卷首有明方孝孺《自警编序》。

2. 吉田意庵旧藏朝鲜古活字本(番号 308-0048)

五卷，日本内閣文库藏。半叶十行十七字，黑口，四周双边，双黑鱼尾。其分类相较宋本有所不同，共十二类五十六子目，在事君类增加了两类、政事类增加一类。卷首有明方孝孺《自警编序》。钤印“浅草文库”等。

(二) 明翻宋本(索书号 11831)

十一卷，国家图书馆藏，半叶九行十七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鱼尾下刻“自警编金、木或其他字”。征引典籍有小字标注，卷首宋嘉定甲申正月望赵善璵序。其分类相较宋本有所不同，共十一类五十六子目，在事君类增加了一类、政事类增加一类。从内容上来看，明翻宋本与宋本系统较为相似。

四、结语

《自警编》一书自南宋端平元年九江郡斋刊刻之后，至明代被四川、云南、江浙等地官员屡加翻刻，这一流传现象与明代官箴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明中后期朝局动荡，党争激烈，宦官权臣相继专权，致使士风日趋颓靡。面对如此时局，有识之士深怀忧思，亟欲重整士林风气、砥砺士节。而《自警编》藉由一系列生动的宋代名臣言行，将“清、慎、勤”等道德理念具象化为可感可循的行为典范，为明代士人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参照，从而精准回应了这一时代中士大夫阶层的精神困境与道德焦虑。

此书大致可分为两大系统且兼及朝鲜等刻本：宋本是此书的祖本，亦为最可靠的版本，但后世流传不及陈光哲刻本系统；到了明中后期，此书刊刻频繁，流传甚广，推动了此书的版本普及，但内容和版式距宋本原貌颇有

^① (清) 缪荃孙、吴昌绶、董康等撰，吴格点校：《嘉业堂藏书志》卷3《子部·杂家类》，第468页。

^② (南宋) 赵善璵：《自警编》，杭州图书馆藏明嘉靖十九年陈光哲徽垣精舍刻本，第1册，第18页。

^③ (南宋) 赵善璵：《自警编》，日本内閣文库藏和刻本，第1册，第9页。

差异,脱讹甚多;朝鲜等刻本则保留了宋本内容,又受明本影响。2015年出版的《全宋笔记》对《自警编》进行了整理,整理者在“点校说明”中说:“明清刻本多加以删削,如明嘉靖陈光哲薇垣精舍刻本,较四库全书本少数十条,但四库本无作者自序。本次整理,以文渊阁四库本为底本,以明嘉靖本为校本,并与宋诸文献对勘。”

①但根据本文分析,文渊阁四库本和明嘉靖本皆属陈光哲刻本系统,脱讹甚多,选择此两版本进行整理,实难反映该书原貌,价值不高。故笔者建议,后续整理应以辽宁图书馆所藏果亲王本这一足本为底本,以宋实颖本、静嘉堂本、洪武蜀藩本、陈光哲刻本、朝鲜活字本等为对校本,另以陈善刻本、徐枋刻本、日本享和二年刊本等为参校本。以期在版本源流清晰、校勘依据充分的基础上,推出一个更接近原貌的权威整理本。

参考文献:

- [1]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1061.
- [2] 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M].北京:中华书局,2005:327.
- [3] 宋会要辑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5647.
- [4] 傅璇琮等.全宋笔记[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3.
- [6] 康尔平.馆藏宋刻《自警编》着录考[J].图书馆学刊,1982(3).
- [7] 贾林晓.辽宁省图书馆藏宋刻珍本《自警编》考论[J].图书馆学刊,2021(10).
- [8]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9:777.
- [9]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337.
- [10] 瞿镛,杨绍和,潘祖荫等.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十[M].北京:中华书局,1995:300.
- [11]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6:112.
- [12] 缪荃孙,吴昌绶,董康等.嘉业堂藏书志[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468.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Editions of Zijing Bian

Wang Yuyazhu¹

¹*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Jinan U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Zhao Shanliao, a scholar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completed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Zijing Bian* during the Jiading period. The book is rich in content and holds significant value for textual collation and the recovery of lost texts. By examining the lineage of its extant editions, it becomes evident that the work primarily developed into two major edition systems, with additional versions printed abroad, such as in Korea. Among these, the Southern Song Jiujiang Prefectural School edition is the earliest and serves as the foundation for all later edition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he book garner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and was repeatedly reprinted, resulting in numerous editions. Although these Ming editions differ significantly from the Song edition in terms of chapter arrangement and textual content, they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dissemin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the work. As the book spread to Korea and Japan, new editions emerged, influenced by both the Song and Ming systems. At present,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critical annotated edition of Zhao Shanliao's *Zijing Bian* is needed, based on a thorough and systematic collation of its various editions, to better serve academic research.

Keywords: Zhao Shanliao; *Zijing Bian*; Edition Research

① 程郁:“点校说明”,(南宋)赵善璵撰、程郁整理:《自警编》,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7编第6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第3页。

明清聊城运河沿线墩台研究

黄睿贤

(聊城大学, 山东 聊城 252000)

摘要: 明清时期, 源于烽燧制度的墩台, 在运河区域特殊的治安与水利环境下, 其职能由单一的军事预警逐渐演变为集缉盗、护漕等于一体的复合体系。管理体制上, 明代墩台隶属于卫所军事体系, 主要由世袭军户驻守; 清代则转变为绿营、州县共管模式, 确立了以绿营汛兵负责防务、州县行政负责修缮的军政协作机制, 其性质从纯粹军事据点向基层治理节点的转型。考察聊城段运河墩台这一微观载体的变化, 能够在洞悉明清时期国家兵防与漕运如何运行的同时透视国家治理目标的转向。

关键词: 墩台; 明清运河; 职能演变; 兵防; 漕运

基金项目: 聊城市社科规划美林学子研究专项课题“明清时期聊城运河沿线墩台研究”(项目编号: ZXKT2025271)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434

墩台起源于古代烽燧制度, 其主要功能是侦察眺望 “昼举烟、夜举火”, 以传递军情。明清时期, 随着京杭大运河成为国家漕运生命线, 墩台逐渐摆脱单一军事预警属性, 转化为服务漕运、治安与巡河的综合警戒体系。运河区域河势复杂、漕船密集、盗患频仍的特殊环境, 要求墩台既要延续传统侦察任务, 又需兼顾护漕、押粮、维护河港秩序等多重职责, 其职能由此呈现出由单一向复合的显著演变。

墩台功能落地始终依托于特定的军事与漕运体系, 其隶属关系也随明清军事制度的兴衰与漕运体制的调整而不断变化。明代前中期漕运防务以卫所为主核心, 沿河墩台由卫所军士统一巡守。《明实录》载: “巡抚甘肃右佥都御史吴琛奏: 甘肃地方, 极临边境……自先至今, 各有防边定规, 每卫所离城百里, 相间设立烟墩, 拨军守了, 时遭夜不收远出, 墩外哨探, 各有信地。又于紧要路径伏军架砲, 遇贼近塞, 举烽放砲, 连接传报。”这一记载虽聚焦边镇, 但反映出明代以卫所统辖基层警戒节点的普遍制度特点。这种模式在聊城运河段同样适用, 具体转化为以东昌卫、临清卫等沿河卫所为核心的兵防体系, 卫所军士全面负责墩台的巡守与防务。

入清以后, 运河墩台的防御属性与管理归属经历了根本性重构。随着明代卫所制的瓦解, 墩台被纳入绿营营汛体系, 正如《大清会典事例》关于河营之定例: “河营额设官兵, 专司防守堤岸”, 墩台由此确立为河标弁兵驻防与防守的物理依托。而在统筹管理上, 虽防务归营, 但实体维护却呈现出行政化趋势——“各省墩台营房, 令州县官会同该汛营弁稽察”之制, 墩台的修缮之责被明确划归地方州县。两者权责互补, 使清代墩台呈现军政并

作者简介: 黄睿贤(2005—), 女,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为明清大运河兵防。

通讯作者: 黄睿贤

管的鲜明格局，其性质也彻底从单纯的军事据点，转型为综合性的基层节点。

此前，学者针对墩台已有许多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其一是针对墩台或烽燧的考察；其二为明清运河基础设施的研究；其三则是明清兵防与漕运体系。另有学者关注运河区域的治安生态。然而，现有研究存在两个盲点：第一，多关注宏观的军事权力架构，对于作为防御末梢的墩台的具体统辖机制探讨不够深入；第二，对于明清易代之际，随着卫所制度名存实亡，运河基层防御力量如何从军户世袭向绿营、州县共管转型，尚缺乏实证分析；第三，墩台是如何由单纯的烽燧预警，逐渐“异化”为兼具军事与经济的综合性治理节点。这正是本研究试图通过考察聊城段墩台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

一、明清时期聊城运河沿线墩台的分布

山东地势平坦、运河自南向北贯穿，决定了墩台的布局方式不同于沿海高地烽墩，而形成典型的“以河为界、以墩相望”的线性布防格局。墩台多建于河流堤岸，以便兼顾水源补给与河道瞭望。同时，运河沿线各墩台并非孤立分布，而是构成一条与漕运主线同步延展的警戒网络。

据光绪年间《山东运河图》载，山东段运河沿线共设墩台六十余座，自北至南贯穿德州、聊城、泰安、济宁、枣庄五地。墩台间距约十八里，以确保视觉与信号互通。

聊城段运河图中标注沿线墩台，由北向南分别为三里铺墩台、大王庙墩台、戴湾墩台、丁家墩台、土桥闸墩、叶家湾墩台、双堤铺墩台、东柳行墩台、十里墩台、于家墩台、三里铺墩。其中仅双堤铺墩台和于家墩台保留有残存本体，戴湾墩台、丁家墩台、东柳行墩台、三里铺墩已明确具体位置但地表无痕迹，大王庙墩台、土桥闸墩、叶家湾墩台、十里墩台及因年代久远，具体位置已无从考证。

二、明清时期聊城运河沿线墩台职能的演变

嘉靖《山东通志》中提到：“山东要害之地凡五：临清，南北之咽喉也；武定，燕蓟之门庭也；曹濮，鲁卫之藩蔽也；沂州，徐、淮之锁钥也；登莱，边卫海东之保障也。守咽喉则齐右安，固门庭则渤海靖，谨藩蔽则河东固，严锁钥则南顾无忧，慎保障则倭奴殄患，五要守，而山东可安也。”由于山东地理位置之重要，洪武后期，明政府先对山东沿海进行了军事部署；永乐年间明朝迁都北京，伴随大运河疏通，漕运成为维持京师物资供应的主要方式，山东段运河亦成为进京门户。故治安维稳与漕运安全变成运河兵防体系的核心，此时运河墩台作为兵防体系的前沿节点，其职能在制度环境与漕运机制变化中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演变。

（一）军事职能

1. 情报传递

墩台是军事情报传递的基础和保障，然其只是一个载体和工具，真正侦察和传递信息的是墩台戍卒。乾隆四

年正月二十六日，兵部尚书鄂善的奏折中记载：“各省水陆孔道之旁设立墩台住宿，兵丁所以护卫行人，稽查匪类。”雍正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山东布政司臣郑禅宝奏请《将墩台营房修建入于新旧交代事》的奏折中亦提到：

“各省通衢设立墩台营房，派拨弁兵挈眷居住。昼则瞭望，夜则戍守，实为弥盗安民之良法。且十里之内塘铺相望，声势相援，此诚有益于地方而兼卫乎行旅者也。”由此可知，墩台戍卒最重要的职责便是侦查并准确快速传递信息，以治理盗匪、保卫民生。

为确保烽燧信息及时传递，戍卒必须昼夜皆举，即戍卒的侦察和传递军情工作 24 小时不间断。由于昼夜能见度不同，故戍卒所举之物必须因昼夜而有所区别，如“烽与表用于日间，苣火用于夜间，积薪则日夜兼用”，“昼举蓬表，以示警号，燔燃积薪，以望火烟；夜举苣火，燔积薪，以见火光”。墩台戍卒不只是简单地传递敌情，还要根据敌人的数量、方位及入侵程度等不同情况，运用不同信号来传递信息。《洴澼百金方》中记载，墩台守军职责为瞭望敌情，察明敌军入侵方位，“昼则放炮扯旗，夜则放炮扯灯”，邻近墩台须依规接力传递信号，严格按口诀执行。若有违令或失误者，必以军法严惩。放炮扯旗口诀有二，一为“炮青旗贼在东，南方连炮旗色红，白旗三炮贼西至，四炮元旗北路逢”；一为“灯一炮贼从东，双灯双炮看南风，三灯三炮防西面，四灯四炮北方攻。”上文曾提到北方地区墩台原以燃烧狼粪升起狼烟为信号，但南方因狼粪稀少、气候潮湿，不便燃烧狼粪和柴草，后改用悬旗悬灯之法，实为便捷之策。除悬旗悬灯之法外，江阴赵鸣珂所著各省传烽歌，详述昼夜传烽之法，一日夜可疾传七千余里，堪称边防守御之良方。

2. 弥盗安民

作为墩台的基本职能——弥盗安民之责体现在防御附近的盗贼盗寇团体和匪徒等社会不安定因素。

明清山东运河区域（鲁西尤甚）民风剽悍尚武。历史上，从赤眉起义、黄巢起义到梁山造反，此地因北方部族入侵、天灾人祸，自卫性习武与官逼民反现象交织，在 19 世纪，连西方人都了解了山东人“好武”和“好义”的秉性。

从科举的角度来看，鲁西地区尚武的倾向也是十分明显的。明清山东运河区域共产生出 11 位状元其中有半数均为武状元；同时鲁西地区还产生了数量众多的武举人，这一带武举与文举的比例不仅高于山东省的平均数字，恐怕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的。

明末清初，多有响马在德州、临清一带活动，他们常出没于交通要道，拦截抢劫官民财物，对当地的社会秩序稳定产生了恶劣影响。清初，山东临清附近的滕家庄有三兄弟为响马魁，“远近州邑尝被戕，南人入都，此为畏途。”顺治十一年（1654），某吏与徐氏二兄弟联舟北上，行至临清泊头时因船只损坏被迫陆行，当地人向其提醒附近滕家庄每日有“响马来视”，后三人进入滕家庄暂住，见三兄弟凭借掠夺而来的财物，“各居大厦，环以高垣，驴马盈谷，器械射人目，厮役不计。”明清时期东昌府境内也活跃着大大小小数十伙盗寇团体，这些盗寇团

体规模一般较小，多流窜作乱。其兵器多是由民间四处拼凑而成，种类较为混乱，无统一规制，如夏津县王邦吾、于望山等为首百余人的“卞家桥贼”，其武器有“弓十张，箭二把，三眼枪四杆，单眼枪三杆，长枪二十杆，刀六口，斧五把，铁鞭一根，铁筒一根，铁棍一根。”这些武器中热兵器较少，但冷兵器形式多样，除刀枪外，铁鞭、铁铜、铁棍等民间武术中的常用武具亦为盗寇所用，可见盗寇的形成也受到了当地民间尚武风气的影响。

在山东运河调查的过程中，调查人员对张古村的村民张士德老先生进行走访调查，据村民张士德老先生所说，之前张古村中习武之人较多，且传说村中曾有劫船者，由此可推测此地之前与夏津县“卞家桥贼”一样受到了上文所述鲁西地区尚武风气的影响，匪患较为严重。结合《山东聊城段运河备览》所载的聊城段运河图来看，此村南北曾皆设有墩台，故在此地设置墩台的一大重要原因是治理匪患、维护治安。

（二）漕运职能

会通河的重新开通，拉开了大运河作为明代经济命脉的发展序幕。伴随着运河的开凿，山东运河沿岸墩台的职能也不仅仅局限于情报传递、弥盗安民的军事作用，而是与复兴的大运河联系更为紧密。

运河开通后，大运河繁荣的漕运活动也使得沿岸府州县经济有了显著的增长，运河城镇迅速发展起来，贸易往来繁多。乾隆二年（1737）十一月十二日，山东巡抚法敏在《为题请核销山东沿河沿海州县水路镇集姜家园等地方添建墩台营房用过工料银两事》的奏折中提到，临清口至直隶天津府一带的水路上盗贼猖獗，“粮船每受其累”，究其根源，盖因今岁山东夏麦歉收，加之漕运各帮所雇纤夫于农闲时无所生计，遂终流为盗匪。由于河道沿线墩台稀少，两墩相距较远，且多设于市镇人烟稠密处，反致旷野河段无兵戍守。且每段河道仅派兵四五人，需协防二三十里之长，更兼差役调度繁冗，以致漕运繁忙之际，官兵疲于应付，难以有效保护漕船。而“东昌府……运河一带为粮艘经由、商旅往来之道，较之陆路更加紧要，自应防护慎密，稽查严谨，庶于漕运行旅均有裨益”，法敏上奏建议沿河一带增设墩台并派兵驻守。“粮船重空经过之时，则墩兵分开河岸，或半里，或一里。”若遇墩兵不足之时，该段防汛汛弁应调派汛兵填补空缺，在河岸往来巡查，协助墩兵催运防护。若遇粮船通行高峰期，每墩还应酌情增派士兵支援以保障粮船通行顺畅。可见，聊城段运河沿线墩台兵丁职能明显地受运河影响而具有漕运特色，不再是单一的“谨守望、传烽火”之责。

三、结语

明清国家对基层兵防设施的定位并非静态延续，而是随国家治理需求发生调整。随着漕运在国家财政与行政运行中的地位上升，运河墩台逐步偏离以军事防御为核心的职能，转而承担护漕、秩序维持等事务性职责，并被纳入运河治理体系的基层执行层面。这一转变通过将墩台功能置于漕运治理框架之内，国家得以在不进行整体制度重构的前提下，加强对航道安全与区域秩序的日常调控。由此，运河不仅构成交通与经济通道，更成为明清国

家重塑基层设施职能分配、推进治理目标转向的重要制度场域，而墩台的职能转化正是这一过程在地方层面的具体呈现。

参考文献：

- [1] (明) 陆武等纂修. 嘉靖山东通志[Z]. 明嘉靖十二年刻本, 卷 7:242.
- [2] 黄永美. 汉代军事防御中的加密思想和行为初探——以烽燧信息传递为中心[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1(4):24-34,212.
- [3] 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 山东明清海防遗址调查报告:下册[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23:862.
- [4] 李玉颖. 营口地区明代烽火台考略[J].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1(14):55-57.
- [5] (清) 朱璐. 防守集成[Z]. 清咸丰三年刻本, 卷 6:118.
- [6] 多尔袞. 为题请拨给建造滕峰二县墩台营房需用工料银两事[Z]. 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档号:02-01-006-000863-0013.
- [7] 陈宏谋. 为核议山东巡抚题请核估东平州修理仓廩墩台营房科房等项需用工料银两事[Z]. 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档号:02-01-008-001648-0013.
- [8] 曹振鏞. 为核议山东巡抚题请核估历城县修理八涧铺等处墩台营房需用工料银两事[Z]. 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档号:02-01-008-003118-0015.
- [9] 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 山东明清海防遗址调查报告:下册[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23:869.
- [10] (清) 张度修, 朱钟纂. 乾隆临清直隶州志[Z]. 清乾隆五十年刻本, 卷 10:766.
- [11] (清) 骆大俊纂修. 乾隆武城县志[Z]. 清乾隆十五年刻本, 卷 6:105-106.
- [12] (清) 方学成修, 梁大鲲纂. 乾隆夏津县志[Z]. 清乾隆六年刻本, 卷 2:77.
- [13] 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 山东明清海防遗址调查报告:上册[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23:20-22.
- [14] 鄂善. 为酌议各省墩台驻宿兵丁惩儆办法事宜事[Z]. 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 [15] 郑禅宝. 奏请将墩台营房修建入于新旧交代事[Z]. 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档号:04-01-30-0194-004.
- [16] (汉) 司马迁撰, 裴骃集解, 司马贞补. 史记[Z]. 武英殿本:1975.
- [17] 陈直. 居延汉简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 2009:14.
- [18] 吴初骧. 汉代蓬火制度探索[C]//甘肃文物工作队, 甘肃省博物馆. 汉简研究文集.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42.
- [19] (清) 袁官桂. 泮澗百金方[Z]. 清钞本.
- [20] 赵吉士. 寄园寄所寄[M]. 合肥:黄山书社, 2008:48.
- [21] 赵吉士. 寄园寄所寄[M]. 合肥:黄山书社, 2008:49.

- [22]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台湾地区）. 明清史料:辛编第6本[M]. 北京:中华书局, 1987:1179.
- [23] 宗世昊. 明末清初山东运河区域社会的“盗寇之患”与地方秩序[D]. 聊城:聊城大学, 2023:51.
- [24] 明太宗实录[Z]. 卷113, 永乐九年二月己未条.
- [25] 郑瀛修, 何洪纂. 乾隆德州志[Z]. 明嘉靖七年刻本, 卷5:206.
- [26] 万斯同, 张廷玉等. 明史[Z]. 卷79:960.
- [27] 法敏. 为题请核销山东沿河沿海州县水路镇集姜家园等地方添建墩台营房用过工料银两事[Z]. 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档号:02-01-006-000166-0008.

Study on the Beacon Towers along the Canal in Liaocheng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uang Ryan

(Liao cheng University, Liao cheng,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eacon towers—originat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beacon-fire (fengsui) system—underwent a significant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within the distinctive security and hydraulic environment of the canal region. Their roles evolved from a singular focus on military warning to a composite system integrating bandit suppression, protection of grain transport, and other functions. In terms of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hese tower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weisuo* military system and were primarily garrisoned by hereditary military households. In the Qing dynasty, however, they were reorganized under a joint governance model involving the Green Standard Army and local civil administrations. This arrangement established a coordinated civil-military mechanism in which Green Standard troops were responsible for defense, while local governments undertook maintenance and repair. Consequently, beacon towers were transformed from purely military installations into nodes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 examination of the beacon towers along the Liaocheng section of the canal, as a micro-level case, not only reveals the operational dynamics of military defense and grain transport systems in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but also sheds light on the shifting objectives of state governance.

Keywords: Beacon Towers; Ming–Qing Canal;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Military Defense; Grain Transport.

从“会用”到“会判”：AI 辅助下高职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三层递进培养——基于营销课程的教学实践探索

乐冰洁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舟山 316021)

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普及在降低信息获取门槛的同时,也引发了学生过度依赖工具、批判性思维退化等问题。针对高职营销课程教学中学生直接复制 AI 输出、缺乏独立判断的现象,本文提出“会用 AI-会判 AI-会主导 AI”三层递进培养模式。该模式以布鲁姆认知分类法与 TPACK 框架为理论基础,将能力培养划分为工具操作、批判评价、主导应用三个层次,分别对应应用-分析评价-创造的认知发展阶段。在《营销技能应用》课程中,面向 43 名高职学生开展为期 16 周的教学实践,通过手绘波特五力分析图、BROKE 框架优化提示词、课堂反复质疑等策略,引导学生逐步从工具使用者转变为批判性评价者。教学实践表明,手绘作业能有效打破学生对 AI 的盲目依赖,BROKE 框架显著提升了提示词质量,课堂质疑培养了验证意识。本文揭示了 AI 辅助环境下能力培养的阶梯性特征,为高职教育在技术赋能与深度学习之间寻求平衡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自主学习能力；三层递进模式；高职营销教学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279

一、问题的提出

2022 年 11 月 ChatGPT 发布以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普及。截至 2025 年 6 月,我国生成式 AI 用户规模达 5.15 亿人,普及率为 36.5% (新华网, 2025)。这类工具能够根据自然语言指令快速生成文本、数据分析等内容,大幅降低了信息获取和内容生产的门槛。生成式人工智能被广泛应用于智能搜索、内容创作、办公助手等多种场景,其中利用生成式 AI 产品回答问题的用户最为广泛,达 80.9% (新华网, 2025)。

在教育领域,学生使用 AI 工具的现象日益普遍。李艳等(2024)的调研发现,超七成学生熟悉生成式人工智能,约 21.5% 的学生经常使用,71.76% 的学生偶尔使用。在科研活动、课程学习等典型使用场景中,68.1% 的学生使用生成式 AI 辅助完成课程作业。然而,工具的便捷性也暴露出令人担忧的问题。金云波等(2024)研究指出,不恰当使用生成式 AI 会导致学生过度依赖技术、元认知能力退化,甚至催生学术造假等问题。国际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现象,过度依赖生成式 AI 工具会削弱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分析推理能力和独立决策能力 (Zhai 等, 2024)。

这一问题在高职教育中同样突出。高职教育以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其技能学习强调在真实情境中的实践性与默会性 (哈满林和吴一鸣, 2023)。在技能学习过程中,学生需要通过真实情境中的反复实践来内化隐性知识,而 AI 工具提供的标准化答案恰恰跳过了这一关键过程。王佑镁等 (2025) 指出,生成式 AI 的教育应用正引发去技能化危机,技术的过度替代削弱了学习者的核心能力。李清勇等 (2024) 在计算机实践教学研究中发现, AI 工具既可能成为辅助学习的“私教”,也可能沦为削弱独立思考的“枪手”。笔者在《营销技能应用》课程教学中观察到类似问题:学生能够运用波特五力、5W1H 等分析框架完成报告,但多个小组在分析竞争环境时使用了相同的行业数据和相似的表述,缺少对自身虚拟企业情境的具体分析。报告从框架到表述都呈现出 AI 生成的典型特征,学生的独立分析能力并未得到有效训练。上述现象暴露出一个深层矛盾:生成式 AI 提高了信息处理效率,却可能削弱学生在情境分析、判断决策等核心能力上的发展。对于以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的高职营销课程,这一矛盾尤为突出。如何在 AI 辅助环境下实现工具赋能与能力培养的协同发展,成为高职营销教学亟需探索的实践课题。

二、AI 辅助下自主学习能力的“三层递进”培养模式

作者简介：乐冰洁(1987—),女,讲师,研究方向为文化研究、跨文化交际

通讯作者：乐冰洁

(一) 模式的理论基础

在为期 16 周的教学实践中,笔者持续观察记录学生在 AI 辅助下完成课程任务的表现,发现他们的能力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学生最初表现为对 AI 的完全依赖,只要 AI 输出内容就直接复制。随着学习的深入,部分学生开始质疑 AI 判断的准确性,发现 AI 引用的数据已经过时或存在错误,或者分析框架与企业实际情况不符。在此基础上,学生进一步认识到需要验证 AI 生成的内容,但由于缺乏系统的方法指导,这种验证多停留在意识层面。这一发展轨迹促使笔者反思:学生在 AI 辅助下的能力培养,呈现出什么样的发展特征?基于这些观察,笔者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反思和调整教学策略,逐步提炼出“三层递进”培养模式。第一层聚焦工具使用能力,让学生掌握 AI 工具的基本操作,能够用 AI 搜集行业信息、套用分析框架,生成营销分析报告的初步框架。第二层聚焦批判性思维培养,引导学生识别 AI 输出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包括数据时效性、情境适配性、分析深度等方面,培养学生主动优化提示词、质疑 AI 判断的意识和能力。第三层聚焦人机协作能力,鼓励学生建立以人为主导的工作模式,通过实地调研、消费者访谈、查阅行业报告与权威资料等方式验证 AI 方案,在 AI 提供的框架基础上形成更符合实际情况的营销方案。需要强调的是,这三个层次并非线性递进,而是螺旋上升的动态过程:学生可能在某些任务中达到第二层,但在新任务中又回到第一层;也可能在某一方面具备第三层能力,但在其他方面仍停留在第二层。

布鲁姆认知目标分类理论揭示了能力培养的层次规律,而 TPACK 框架则指明了技术融入教学的实施路径。将两者结合,恰好能够解释三层递进模式的内在逻辑。布鲁姆认知目标分类理论广泛应用于教育目标设定与教学设计(Sypré et al., 2025)。Anderson 和 Krathwohl(2001)对该理论进行了修订,将认知过程划分为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六个层次,从低到高呈现出能力发展的阶梯。在 AI 辅助教学场景下,这一理论的价值在于帮助教师识别不同层次的能力要求。当学生仅停留在应用层次时,他们会用工具但缺乏判断力;只有引导学生进入分析-评价层次,才能培养批判性思维;而要达到创造层次,则需要学生能够修正优化 AI 方案,产出超越 AI 原始输出的创新性成果。这一认知层次的阶梯性特征,为三层递进模式的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能力培养不能跨越式发展,必须遵循从低到高的渐进规律。TPACK 框架则回答了技术如何融入教学。该框架强调,技术融入教学并非简单地将工具引入课堂,而是要求教师在技术知识(TK)、学科内容知识(CK)与教学法知识(PK)三个维度的交互中,形成一种复杂的、情境化的教学知识(Mishra 和 Koehler, 2006)。在 AI 辅助教学的情境下,TPACK 框架提醒教师:学生不仅要掌握 AI 工具的操作技能,更要理解 AI 工具的能力边界与局限性;不仅要学会使用工具完成任务,更要运用营销学科知识来评判工具输出的质量;最终要形成技术、学科、方法三者融合的综合能力。

因此,三层递进培养模式在认知发展和知识整合两个维度上可以对应布鲁姆认知分类法和 TPACK 框架(见图 1)。这种对应关系反映了高职学生 AI 素养培养的实际需要,学生既需要从会用工具到会判工具再到会主导工具的认知发展,也需要从单一技术操作到学科知识整合的能力提升。

培养层次	布鲁姆认知层次	TPACK知识维度
第一层(会用AI)	应用 (Apply)	TPK融合
第二层(会判AI)	分析-评价 (Analyze-Evaluate)	TCK整合
第三层(会主导AI)	创造 (Create)	完整TPACK整合

图 1 三层递进培养模式

第一层“会用 AI”培养学生的工具操作与应用能力。在认知层次上对应布鲁姆认知分类法中的应用(Apply)阶段,学生学会使用通义千问、文心一言等国产 AI 工具生成波特五力分析、消费者画像等营销报告。在教学实践中,学生以虚拟公司为载体完成营销计划书的制作, AI 在信息搜集、框架生成、内容初稿等环节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知识维度上,这一层侧重 TPACK 框架中技术-教学法知识(TPK)的融合,学生掌握 AI 工具的操作方法和提示词优化技巧。第二层“会判 AI”培养学生的批判性评价能力。在认知层次上对应分析(Analyze)与评价(Evaluate)阶段,学生需要判断 AI 生成内容的准确性和适用性。在教学过程中,多名学生在课堂讨论中明确提出“AI 生成的东西需要确认真实性,不能直接用”的认知,这表明学生已经具备对 AI 输出进行批判性评价的意识。在知识维度上强调技术-内容知识(TCK)的整合,学生开始运用营销学知识评判 AI 生成内容的合理性。第三层“会主导 AI”培养学生的创新整合能力。Anderson 和 Krathwohl(2001)将创造(Create)层次定义为“将元素整合形成新的、连贯的

整体，或将元素重组为新的模式或结构”。在教学实践中，学生需要在 AI 辅助下完成营销方案的优化与创新。从学生提交的营销计划书来看，虽然初稿由 AI 生成，但学生对内容进行了修改和调整，这体现了学生开始尝试在人机协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判断哪些 AI 建议可以采纳，哪些内容需要人工修正。在知识维度上要求达成完整的 TPACK 整合，学生需要综合运用技术能力、学科知识和问题解决策略。然而，受限于 16 周的教学时长和高职学生基础，“会主导 AI”的培养目前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从学生作品来看，多数学生能够意识到 AI 输出需要核查，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但在修正的系统性和深度上仍有提升空间。这一分层达标的现实情况既体现了三层递进模式的合理性，也为后续教学改进提供了方向。

（二）模式的教学实践

三层递进培养模式在《营销技能应用》课程中落地实施。教学对象为高职应用英语专业（商务方向）一年级学生 43 人，每周 2 学时、共计 16 周 32 课时。学生按自主意愿分为 9 个学习小组（每组 4-6 人），教学以虚拟企业营销计划制定为主线，各小组分别创建了健康食品、手机壳、美甲、盲盒、杯子等不同行业的虚拟企业。这一设计既规避了真实企业商业信息获取的现实困难与伦理风险，也为学生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载体。教学聚焦营销计划中的市场分析环节，具体涉及基于波特五力模型的行业竞争环境分析和基于 5W1H 框架的消费者行为分析。研究数据来源于教学过程的持续观察与记录，主要来自学生提交的营销计划报告、手绘分析图、课堂讨论记录、教学反思日志等材料，为观察学生能力发展轨迹提供了过程性证据。教学围绕工具使用、批判思维、主导应用三个层次递进展开。

1. 工具使用能力培养——学会用 AI 辅助市场分析

工具使用能力培养旨在让学生掌握 AI 辅助市场分析的基本方法，能够运用豆包、DeepSeek 等生成式 AI 工具快速完成信息搜集与框架分析任务。营销分析对高职学生构成双重挑战：其一，信息获取渠道不明，学生难以定位行业数据与竞争情报的有效来源；其二，分析框架掌握不足，波特五力、5W1H 等工具的内在逻辑理解不深。AI 工具的引入有效降低了这两个门槛。当学生向 AI 提出问题，工具可在数秒内返回结构化信息并自动套用分析框架。原本需要数天完成的资料搜集被压缩至十几分钟，抽象的分析模型变得可视化、可操作。教学过程分为三个环节。教师在课堂上以虚拟的校园奶茶店为例，现场演示如何运用 AI 搜集行业信息并整理至波特五力框架。学生随后在各自虚拟企业情境中运用 AI 工具完成分析任务，最终产出行业竞争环境分析报告。

从 9 组学生作品来看，学生初步具备了工具使用能力。所有小组均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了行业竞争环境分析报告。从框架应用情况看，9 组报告均包含波特五力模型的完整分析，五个维度要素标注明确；从信息获取效率看，学生完成报告的平均时间约为 3-5 天。例如，创建“蜜雪冰壳”虚拟企业的手机壳小组运用 AI 快速定位了供应商类型（硅胶、TPU 原材料商）及其议价能力，识别出不同层次的竞争者（手机品牌商、电商平台低价壳等）并初步分析了各自的竞争策略；“秘盒奇遇”盲盒小组通过 AI 梳理出替代品来源（传统文具品牌的跨界竞争）并分析了替代威胁的强度。这些教学观察显示，AI 工具能够为高职学生快速搭建营销分析框架、定位行业信息来源提供有效支撑。

然而，成果背后暴露出过度依赖的深层问题。批阅报告发现，9 组报告中有 7 组的内容呈现非常明显的 AI 生成特征。首先是语言表达问题。多份报告出现“消费者市场是一切市场的基础、是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市场”等教科书式的抽象表述，缺乏针对虚拟企业的具体分析。这类语言虽然正确，但更像是概念解释，而非针对自身企业的市场判断。其次是内容针对性不足。部分小组虽然引用了行业数据，但这些宏观信息与虚拟企业几乎没有实质关联。学生并未思考宏观市场规模对一家初创型虚拟企业意味着什么，只是将 AI 提供的行业概况机械地复制进报告。再次是缺乏验证意识。在消费者行为分析中，AI 给出的判断往往偏理想化。例如 AI 判断大学生购买手机壳时最看重设计美观度，学生未加辨析便写入报告。小组成员自己购买手机壳时，设计真的是首要因素吗？价格、防护性能是否也在考量之中？学生并未进行这样的追问。这种直接复制 AI 输出的处理方式，反映出学生对 AI 的过度依赖。工具使用能力培养虽然让学生做得出来，但若停留在此层次，学生只是把 AI 当作搜索引擎，不具备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这一问题的发现推动了批判性思维培养的展开。

2. 批判性思维培养——学会判断 AI 输出质量

批判性思维培养的目标是引导学生逐步具备识别 AI 输出问题、判断内容准确性与适用性的意识和能力。针对过度依赖现象，教学设计了手绘作业、优化提示词和课堂质疑三个策略，其共同逻辑在于：放慢节奏以促进深度思考，展示对比以打破盲目信任，反复质疑以建立批判习惯。

手绘作业设计意在强迫学生放慢速度。在营销环境分析阶段布置了一项特殊作业：手绘波特五力分析图，要求结合 AI 输出与自身理解，禁止照抄。这一看似复古的教学方式，在 AI 时代反而展现出特殊价值。相比让 AI 直接生成图表，手绘过程迫使学生逐一思考每个要素的含义及其与企业的关联，这种具身化的认知过程是单纯阅读 AI 输出无法替代的。一周后收齐作业，对 9 组手绘作品进行了分析。从作品质量来看，学生绘制的分析图较为清晰，五力要素标注明确。有学生将虚拟企业置于中心，周围标注五力要素并填入具体内容；另有学生针对购买者议价能力标注讨价还价能力强、国内外品牌多且多样，针对替代品威胁标注健康问题、具体威胁能力。这些表述虽然语言朴素，但已开始超越 AI 生成的宏观套话，体现出对自身虚拟企业情境的思考。9 组作品中有 6 组

(约 67%) 的内容与 AI 输出存在明显差异。手绘作业的价值不在于绘画技能本身，而在于打破 AI 生成-复制粘贴的惯性操作，迫使学生在绘制过程中逐一理解每个要素的含义。

BROKE 框架教学旨在让学生理解提问方式对 AI 输出质量的影响。笔者在教学中借鉴了 BROKE 提示词框架 (陈颢鹏和李子菡, 2023)，该框架包含背景信息 (Background)、角色定位 (Role)、任务目标 (Objectives)、关键结果 (Key Results)、迭代优化 (Evolve) 五个要素。其核心逻辑在于：向 AI 提供的信息越具体、要求越明确，AI 的输出质量越高。在消费者行为分析课堂上，教师以校园奶茶店为例现场演示提示词优化效果。在学生课堂实践中，手机壳小组最初使用的提示词为“分析手机壳的消费者特点”，11 个字。AI 输出同样简单宏观，仅有年轻人追求个性化、保护手机等泛泛之谈。经 BROKE 框架指导，该小组将提示词优化为 249 字。优化后的完整提示词为：

【背景信息】我们是蜜雪冰壳手机壳公司，价格区间 10-30 元，主要客户是 18-25 岁大学生，产品特点是可定制图案。我们的竞争者包括官方品牌配件商和电商平台的低价供应商。

【角色定位】请你作为营销分析专家。

【任务目标】用 5W1H 框架分析我们的目标消费者购买行为。

【关键结果】WHO 部分细分出 3 类典型消费者，每类说明年龄、消费特征和营销建议；WHY 部分挖掘至少 3 个核心购买动机；WHAT、HOW、WHEN、WHERE 也要结合我们公司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最后给出 3-5 条可执行的营销策略，要具体到渠道和方式，不要泛泛而谈。

【迭代优化】如果某个部分不够详细，我会追问。

优化后 AI 立即输出结构化分析，细分出颜值社交型（追求潮流图案，在社交平台晒图）、实用防护型（注重防摔功能，价格敏感）、个性定制型（愿意为专属设计付费）三类消费者画像，并针对每类给出具体营销建议，如针对颜值社交型建议在小红书、抖音投放种草内容、设置话题挑战等。为观察提示词优化效果，笔者参考自然语言生成质量评估标准 (Tian 等, 2024)，结合营销专业要求，从完整性、相关性、信息丰富度、实用性四个维度对比了优化前后的 AI 输出。完整性指内容覆盖任务要求的全面程度，相关性指内容与企业情境的契合度，信息丰富度指分析的深度与细节，实用性指建议的可操作性。优化后 AI 输出在四个维度均显著提升。课后有学生主动询问能否用 BROKE 重新优化自己的提示词。从后续收集的学生作业来看，使用 BROKE 框架后学生的提示词质量明显提升，学生开始理解：AI 并非权威答案，而是可优化的工具；提问的质量决定回答的质量。

表 1 BROKE 优化前后 AI 输出质量对比

评价维度	简单提示词输出特征	BROKE 优化后输出特征
完整性 (Adequacy)	- 仅包含消费者需求（设计、价格、耐用性、手感） - 细分市场和消费趋势 - 缺失具体购买行为分析	- 完整覆盖 5W1H 全部维度 3 类消费者画像 4 个购买动机 - 具体购买内容、渠道、时机、场所 5 条可执行营销策略
相关性 (Relevance)	- 通用行业分析 - 包含与蜜雪冰壳无关的细分（技术爱好者、环保意识者、企业客户）	- 紧密结合企业特征进行分析 - 明确价格区间、目标客群年龄、产品核心特点等关键要素
信息丰富度 (Informativeness)	表层特征罗列：“追求个性化”“注重价格”“手机壳时尚化”等概括性描述	具体行为细节：“在社交平台晒图”“价格敏感”“愿意花更多钱打造独一无二的手机壳”“可以承载美好回忆和情感”等
实用性 (Usability)	- 行业发展趋势性建议 - 缺乏具体渠道、方式、时间等可操作要素	明确营销执行细节：小红书种草（1-5 万粉丝校园 KOC 合作）抖音直播（晚上和周末时段）校园推广（食堂宿舍楼摆摊）微信社群运营、IP 联名等

课堂质疑策略旨在建立批判性思维习惯。在市场分析阶段，教学中反复向学生提出质疑性问题：AI 说你们的客户有这些特点，你们确定吗？你们自己买东西时，真的是这样吗？怎么知道 AI 说的对不对？学生反应呈现明显演变轨迹。初期，学生沉默或模糊回应。中期，学生开始回忆实际情况，有学生说好像不太对，我一般就买便宜的。后期，部分学生明确提出质疑，有学生在课堂讨论中表示 AI 不一定对，需要验证 AI 的内容是否正确。

然而,当追问那怎么验证呢时,学生普遍表示不知道具体方法。这一现象揭示了第二层与第三层之间的断层:学生意识到需要验证 AI,但缺乏验证的手段和能力。

通过三个策略的实施,学生从工具使用进阶到批判评价,批判性思维初步形成。从手绘作业质量、BROKE 使用效果、课堂讨论表现来看,绝大多数学生能够识别 AI 输出中的部分问题,具备优化提示词的意识。与往届学生相比,本届学生在课堂上的提问更具批判性,而非单纯询问操作方法。然而,这一能力的形成仍需持续强化。学生的质疑多停留在意识层面,缺乏系统的验证方法;优化提示词的能力尚不稳定,在新任务中容易退回到简单提问模式。新的问题出现:学生意识到需要验证 AI,却不知道如何验证。如何通过实践检验 AI 判断的准确性?这成为主导应用能力培养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3.主导应用能力探索——学会主导 AI 完成分析任务

第三层主导应用能力培养在本轮教学中面临更大挑战。这一层次旨在引导学生逐步形成以人为主导的工作模式,即通过实践验证 AI 判断、创造性修正 AI 方案,最终实现学生主导、AI 辅助的应用。理想状态下,学生应具备三种能力:识别 AI 输出中的问题(如数据过时、逻辑不通、脱离实际),通过调研验证 AI 判断,创造性地修正 AI 方案。

教学实践表明,这一层次培养在本轮教学中处于起步阶段,学生能力发展呈现明显分层。从 9 组最终提交的营销计划报告来看,虽然多数小组的内容仍呈现较强的 AI 生成特征,但学生在课堂讨论中已充分具备“需要验证 AI”的意识。例如,有学生在课堂讨论中明确提出“AI 生成的东西需要确认真实性,不能直接用”的观点,有学生在提问环节询问“怎么知道 AI 说的数据是真的”。这些表现说明,学生已经认识到 AI 输出并非绝对可靠,需要进行验证。然而,由于缺乏系统的验证方法和工具,这一认知尚未转化为实际的验证行动。在 32 课时的教学周期内,多数小组未能在最终报告中体现基于实践验证的个性化修正。

制约主导应用能力培养的主要因素有三个。首先,调研方法与 AI 验证未建立联结。虽然课程讲授了观察法、访谈法、问卷设计等市场调研方法,但学生未能将这些方法与验证 AI 输出建立起联系。当教师追问“如何验证 AI 说的对不对”时,个别学生能想到运用已学的调研方法去验证。这反映出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不足,难以将课堂所学的调研工具应用于 AI 辅助学习的新情境。AI 工具的便捷性进一步强化了这一问题,当 AI 能在几分钟内生成看似完整的分析报告时,学生缺乏足够的动力去花费数天时间进行实地调研验证。其次,时间不足。32 课时的课程安排需完成营销环境分析、STP 战略、4P 组合策略等多个教学模块,难以为系统性的“AI 输出验证与修正”环节预留足够时间。虽然市场调研方法已在课程中讲授,但若要将其与 AI 验证深度整合,至少需要增加 3-4 课时:2 课时用于讲解“如何用调研验证 AI”的具体方法,1-2 课时用于指导学生完成调研并对比 AI 输出。此外,评价标准模糊。目前的营销计划报告评价标准中,未明确 AI 使用的考核要求,也缺乏主导应用能力的操作性评价指标。教师难以科学评价学生的修正质量,学生也不清楚达标要求。

针对上述制约因素,后续教学可从三方面改进。一是强化调研方法与 AI 生成内容验证的联结,在讲授市场调研工具时明确其验证 AI 输出的功能,通过案例演示如何用调研修正 AI 判断。二是优化时间安排,采用课内指导+课外执行的混合模式,可将实地调研作为课外任务,课内聚焦数据整理与 AI 输出对比。三是完善评价体系,将“基于调研的 AI 输出修正”纳入评价标准,从修正依据、修正合理性、修正深度三个维度进行评价。这些改进思路有待在下一轮教学中实施验证。

三、结语

本文基于高职营销课程教学实践,探索了 AI 辅助环境下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路径。16 周的教学观察显示,学生在 AI 辅助下的能力发展呈现从工具操作到批判评价再到主导应用的阶梯式特征。基于这一观察,笔者提出三层递进培养模式,并在《营销技能应用》课程中进行了初步尝试。教学实践中,笔者将布鲁姆认知分类法与 TPACK 框架相结合,作为理解学生能力发展的分析工具。教学观察发现,AI 工具确实降低了信息获取门槛,但也可能削弱学生的深度思考。如何在效率与思考之间寻找平衡点,引导学生在使用工具的过程中保持独立判断,是 AI 时代教育工作者需要持续面对的挑战。手绘作业、BROKE 框架、课堂追问等设计,不依赖额外投入,而是通过任务本身引导学生从使用 AI 转向评价 AI。这些策略可根据课程特点灵活调整,对面临类似困境的教师具有借鉴价值。同时,受 32 课时的课程容量限制,主导应用能力培养尚未充分展开,学生虽然意识到需要验证 AI 输出,但系统验证方法的培养仍需在后续教学中深化。虚拟企业作为教学载体,虽然规避了商业信息获取难题,但实践验证的深度受到一定限制。此外,本文的教学实践基于 43 名应用英语专业学生的单一班级,模式在其他专业和更大范围中的适用性尚待进一步探索。

当学生能在几分钟内获得看似完整的答案时,教师的价值在于引导学生质疑答案、验证答案、超越答案。这需要教师从知识传授者转变为思维训练者,从效率追求者转变为深度学习的守护者。这一转变对高职教育尤为重要,因为职业能力的核心不在于掌握某个工具,而在于面对技术变革时的适应力和判断力。三层递进模式只是这一转变的初步尝试,AI 辅助教学的完整图景仍有待更多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中共同描绘。

参考文献

- [1] 新华网.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达 5.15 亿人 [EB/OL]. (2025-10-20) [2026-01-05]. <http://www.news.cn/tech/20251020/c7c8f6c858c249e2bb69515f40eeab8b/c.html>.
- [2] 李艳, 许洁, 贾程媛, 等. 大学生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现状与思考——基于浙江大学的调查[J]. 开放教育研究, 2024, 30(01): 89-98.
- [3] 金云波, 龚盼盼, 包莹莹, 等. 强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 ChatGPT 的审视[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4(01): 105-111.
- [4] ZHAI C, WIBOWO S, LI L D. The effects of over-reliance on AI dialogue systems on students' cognitive abilities: a systematic review[J]. 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s, 2024, 11: 28. DOI: 10.1186/s40561-024-00316-7.
- [5] 哈满林, 吴一鸣. 新版专业目录推动下职业教育课程衔接的理论认知与实践路径[J]. 职教论坛, 2023, 38(08): 64-71.
- [6] 王佑镁, 王旦, 王海洁, 等. 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去技能化”危机与应对——基于反转型逆向思维分析框架[J]. 开放教育研究, 2025, 31(04): 97-108.
- [7] 李清勇, 耿阳李敖, 彭文娟, 等. “私教”还是“枪手”: 基于大模型的计算机实践教学探索[J]. 实验技术与管理, 2024, 41(05): 1-8.
- [8] SYPRÉ S, SOENENS B, VANSTEENKISTE M, et al. The effect of a teacher training based on Bloom's taxonomy on the need-based experiences, motivation, and engagement of cognitively gifted and typical students[J].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2025, 40: 47. DOI: 10.1007/s10212-025-00944-8.
- [9] ANDERSON L W, KRATHWOHL D R, AIRASIAN P W, et al. A taxonomy for learning, teaching, and assessing: a revision of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abridged edition[M]. New York: Pearson, 2001.
- [10] MISHRA P, KOEHLER M J.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a framework for teacher knowledge[J].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2006, 108(6): 1017-1054.
- [11] TIAN L, MA Z, ZHOU Y, et al. 生成式文本质量的自动评估方法综述 (A survey of automatic evaluation on the quality of generated text)[C]//Proceedings of the 23rd Chines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Volume 2: Frontier Forum). Taiyuan: Chines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ociety of China, 2024: 169-196.
- [12] 陈颢鹏, 李子菡. ChatGPT 进阶: 提示工程入门[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3.

From Tool Use to Critical Judgment: Developing Autonomous Learning in Vocational Marketing Education Through a Three-Tiered Model

LE Bingjie

(Zhejiang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ollege, Zhoushan, China)

Abstract: Generative AI has lowered barriers to information access, but educators face new challenges as students become overly dependent on these tools and show declining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ies. Vocational marketing students frequently copy AI outputs without independent judgment. This paper presents a three-tiered model for developing student capabilities: mastering AI tools, evaluating AI outputs critically, and taking charge of AI collaboration. The model builds on Bloom's Taxonomy and the TPACK framework. It organizes learning into three progressive levels—tool operation, critical evaluation, and autonomous application—aligned with the cognitive stages of applying, analyzing-evaluating, and creating. A 16-week implementation involved 43 vocational students in a marketing skills course. Teaching strategies included hand-drawn Porter's Five Forces diagrams, instruction in the BROKE framework for writing better prompts, and repeated questioning in classroom discussions. Hand-drawing assignments broke students' uncritical trust in AI. The BROKE framework improved prompt quality noticeably. Classroom questioning raised awareness about verifying AI outputs. These teaching experiences reveal how students progress through distinct stages when learning with AI assistance, providing vocational educators with practical guidance for balancing technology use and deeper learning.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tonomous learn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marketing pedagogy

基于“科普+”模式下场馆与文旅教育产业深度融合的实践与思考

白宁¹

(1.贺州市科学技术馆, 广西壮族自治区 贺州市 542899)

摘要: 本文深入探讨“科普+”模式下, 科普场馆与文旅、教育产业深度融合的路径与实践。通过分析当前科普场馆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结合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的典型案例分析, 重点研究“科普+文旅”“科普+教育”等融合模式的具体实施策略, 总结实践过程中的创新经验与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相应解决方案。研究旨在为科普场馆创新发展、文旅教育产业的协同升级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最终推动科普价值与产业效益的双重提升。

关键词: “科普+”模式; 科普场馆; 文旅产业; 教育产业; 深度融合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339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任务^[1], 对“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作出重要部署。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强调国家推动科普全面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2], 全面拓宽了科普事业新视野。在国家大力推进科普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的背景下, “科普+”模式成为推动科普场馆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科普场馆作为科学知识传播的重要载体, 与文旅产业的体验性、教育产业的专业性深度融合, 既能丰富科普形式、提升公众科学素养, 又能为文旅教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科普与文旅教育产业的深度融合有利于推动科普与文化的互促式发展, 探索“科普+”模式下场馆与文旅教育产业的融合路径, 对实现多方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科普+”模式下场馆与文旅教育产业深度融合的背景与意义

(一) 政策支持与行业趋势

当前我国科普产业的发展已经具备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科普与产业深度融合的新发展格局已现雏形, 近年来, 国家也出台了多项政策推动鼓励科普与文化、旅游、教育融合发展。例如,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公布施行, 其中第三十条明确规定了国家发展科普产业, 鼓励兴办科普企业以及促进科普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的相关内容^[2], 为科普产业发展提供了法律层面的保障与引导; 国务院印发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提出推动科普事业与科普产业发展, 探索“产业+科普”模式^[3];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提出推动科普产业发展, 培育壮大科普产业, 促进科普与文化、旅游、体育等产业融合发展^[4], 为“科普+”模式提供了政策保障。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 明确提出要“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 把文化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 在文旅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文旅消费正从“打卡式”向“沉浸式”“体验式”转变, 品质化、多样化需求快速增长; 教育部等十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 着力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 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高质量发展^[7], 教育行业注重丰富青少年的课外教育资源, 提升青少年的科学素养, 培养青少年的实践与创新能力, 满足家长和青少年的个性化需求, 持续推动中小学科学教育质量的提升, 这些都为“科普+”模式下场馆与文旅教育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创造了市场需求。

(二) 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

1. 提升科普传播效能。立足地方文旅、教育资源优势, 巧妙融入文旅、教育等沉浸式场景与多元互动, 扩大

作者简介: 白宁(1992—), 男, 学士, 助理馆员, 研究方向为科学传播研究、科学传播内容制作、科学推广普及。

科普受众覆盖面,创新科普活动形式,借助沉浸式体验手段提升科普趣味性与参与度,进一步推动科普传播效能的整体跃升。

2.推动产业价值升级。将科普教育有机融入文旅产品与教育实践,进一步提升科普文旅产品与教育实践的“知识附加值”,为相关文旅、教育产业注入核心知识内涵,加强科学文化培育,助力实现文化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双提升。

3.汇聚跨界创新合力。促进科普场馆和文旅企业及教育机构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协作联动、深度融合,实现共建共享科普资源,提升科普教育产品供给质量和科普服务能级,促进有关产业的整体科技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

三、“科普+”模式下场馆与文旅教育产业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

(一)“科普+文旅”融合模式

1.系统规划科普旅游产品线。对科技馆、博物馆、科普教育基地等核心资源进行体系化整合,通过主题化串联与一体化设计,打造高品质的科普主题旅游线路。例如,贺州市科协联合市文旅局推出“走读广西(贺州行)”科普主题之旅,串联贺州市科技馆、博物馆、气象科普教育基地、生态科普教育基地等,通过举办“华南氧吧贺州姑婆山植物初探密”科普体验行活动、“瑶药香草·智慧苗芽”非遗与现代农业研学活动、“探秘自然与科学:读懂气象、亲近湿地、玩转科技馆”科普阵地联合行动等科普旅游,挖掘贺州市地域特色的文化资源、自然资源、产业资源,将抽象的科学知识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探究的场景化体验,吸引了众多青少年和家长的共同参与。

2.打造沉浸式文旅科普场景。通过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互动装置、主题研学、情景剧等生动形式,把抽象的科学原理转化为可感知、可互动、可探索的具象体验,开发沉浸式科普文旅项目,激发观众的好奇心和主动性,将“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探索”,提升科普的趣味性、感染力和记忆留存度。例如,贺州市创新尝试元宇宙+溶洞深度融合,创新推出贺州紫云洞文旅元宇宙项目,打造国内首个沉浸式元宇宙溶洞景观,结合投影技术、云计算、MR/VR虚拟现实技术等科技手段,以“紫云秘境·幻境仙旅”定位,结合贺州民族文化,以紫云仙子为主线演绎紫云仙宫唯美元宇宙感官体验,以自然景观为舞台,以紫云仙宫秘境探索的形式,循序渐进的沉浸式带入游客,开启元宇宙仙侠之旅,让游客以互动方式了解喀斯特地貌溶洞景观知识,提升游览趣味性^{[5][9]}。

3.科普节庆与文旅活动联动。在全国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全国科普月等节点,联合文旅部门举办科普文化节、科学嘉年华等活动。例如,贺州市科协联合市文旅局等部门举办2025年全国青少年信息素养大赛华南赛区(广西)科技嘉年华暨颁奖典礼活动,通过科技互动体验、科普作品展示及科普表演、实验互动、竞赛展示、颁奖表彰相融合等形式,吸引了广西区内各地参赛选手、教师及市民参与;贺州市钟山县科协联合县文广旅局等部门在举办“科技之夜”科普活动,通过一系列集艺术与科技于一体的精彩节目,让科学知识以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触动人心;八步区以“灵峰有约”文化夜市为平台,开展巡演、快闪、夜食、夜购、夜读和夜演等活动,构建起令人耳目一新的沉浸场景,为青年群体定制多元夜间科普+文旅消费新体验。一系列的科普节庆与文旅活动联动,将科普与夜间文旅消费结合,形成品牌化活动。

(二)“科普+教育”融合模式

1.馆校合作课程建设。教育部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指出“学校教育应广泛利用校外的图书馆、展览馆、科技馆、博物馆等社会资源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6]科普场馆要与学校建立合作关系,依托科普场馆独特的资源与场景,共同研发实施面向学生的研学课程,推动教育资源整合与学习方式创新。例如,钟山县科技馆推出“科学探究营”,依托馆内独具地方特色的“开业之石”展品及相关地域文化资源,设计开发了研学课程《以“开业之石”为起点,探寻核工业科学家的精神密码》,让学生在实践体验中,深入理解“开业之石”蕴含的历史价值,感悟科学家在核工业发展中的爱国情怀、创新精神贺奉献精神,通过“做中学”“用中学”“创中学”的研学方式,有效激发学生对科学探索的兴趣,树立投身国家科技事业的志向,实现研学旅行育人目标。

3.课后服务特色教育。结合科普场馆的特色展项和教育资源,为中小学提供课后科普服务,开设机器人编程、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手工制作等特色课程。例如,贺州市科技馆积极联动八步区平安路小学等10余所学校,将该馆2025年现代科技馆体系联合行动优质科学教育资源《“触摸未来出行:新能源汽车探秘之旅”科学教育活动》科普课程,系统引入课后托管服务,不仅丰富了课后服务的内容形式,更有力呼应了学生多样化的成长需求,为其个性化学习与发展提供了生动优质的科普平台。

2.搭建科教融合桥梁。教育部、中国科协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科技教育的意见》提出以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为重点,切实加强中小学科技教育,夯实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基础,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支撑教育、科技、人才高质量一体化发展^[7]。例如,贺州市科协联合市教育局围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前沿,设置机器人基本技能竞赛、人工智能+创新挑战普及赛、3D打印笔工程挑战赛等6个赛项以及小学生科技创新成果、中学生科技创新成果、科技辅导员科技创新成果三个板块每年均举办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贺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为热爱科技的青少年提供了展示才华、交流学习的平台,激发青少年科学兴趣,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三) 产业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

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明确要求加强科普资源整合与产业协同的背景下,科普场馆正积极联动社会各方力量及资源,着力打造“科普+”的特色模式,通过与文旅企业、教育机构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实现场地、技术、人才等资源的共享与协同。例如,2025年12月31日,广西首个碳达峰碳中和科普馆在贺州市昭平县开馆,以“普及双碳知识、传播绿色理念、赋能高质量发展”为定位,通过六大篇章系统展示、数字技术沉浸体验、中外案例深度解读,让“双碳”知识可知可感,产业科普已成为贺州市科普基地特色^[8];贺州市科技馆、钟山县科技馆、富川瑶族自治县科技馆借力文旅企业渠道将科普融入旅游,携手教育机构打造定制专题科普课程,积极拓展科普服务,实现寓教于乐的深度融合。

四、“科普+”模式下场馆与文旅教育产业深度融合的对策建议

(一) 强化政策资源统筹

建议政府进一步出台科普文旅教育融合发展专项扶持政策,明确鼓励科普场馆、文旅企业、教育机构等多方协同合作,共同构建融合发展生态。编制实施科普文旅教育融合发展专项规划,出台专项政策支持研学旅行、科普旅游等新兴业态,通过专项资金扶持一批具有示范性和创新性的项目落地实施。同时,建立科普场馆、文旅、教育等部门的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完善“科普+文旅+教育”跨领域协作形式,健全制度保障体系,强化顶层设计与政策协同,打破行业壁垒,打通融合之路。

(二) 加强产品创新建设

支持科普场馆依托自身特色资源,深度融合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农耕文化、民俗风情等资源,通过科技赋能打造差异化、体验式的科普文旅产品。强化品牌建设的遗产支撑力,通过打造特色科普文旅教育IP、开发科普动漫等系列化文创衍生品、拓展互联网技术在科普文旅教育中的应用等方式,提高科普文旅教育产品的市场渗透力。同时,鼓励开展主题展览、研学课程、科技旅游路线等多形态产品开发,构建具有持续吸引力的科普文旅消费场景,激活资源价值与品牌效应。

(三) 健全人才培养体系

深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普文旅教育行业机构之间的合作,支持开设科普文旅教育交叉学科,推行“理论+实践”双师型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健全科普文旅教育人员培训与职业发展机制,通过专题研修、实践交流、资格认证、职称评审等形式,提升人才队伍在内容开发、运营管理、公众服务等方面的专业水平,为科普文旅教育融合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支撑。

五、结论

“科普+”模式下场馆与文旅教育产业的深度融合是推动社会文化繁荣的重要引擎,通过“科普+文旅+教育”等融合路径,能够有效提升科普传播效能、推动产业价值升级、汇聚跨界创新合力,但是在融合过程中仍存在配套政策支持不足、专业人才储备不足、跨界整合资源困难、市场认可程度不高等问题,我们通过强化政策资源统筹、加强产品创新建设和健全人才培养体系等措施,能够助力科普价值与产业效益的协同发展。未来,应进一步深化融合模式探索,推动科普场馆成为兼具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综合性平台,为全民科学素质提升与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EB/OL].(2025-10-23).<https://www.12371.cn/2025/10/28/ART11761640401107119.shtml>.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EB/OL].(2024-12-25).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12/content_6994555.htm.

- [3] 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的通知[EB/OL]. (2021-06-03)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6/25/content_5620813.htm.
- [4]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EB/OL].(2022-09-04).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2/content_5710610.htm.
- [5] 广西旅游协会.关于发布 2023 年广西旅游行业创新发展案例名单的通知[EB/OL].(2024-06-21).<https://gxlyxh.com/Info/5413>.
- [6] 教育部.关于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通知[EB/OL].(2001-06-08).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jcj_kcjcgh/200106/t20010608_167343.html.
- [7] 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加强中小学科技教育的意见[EB/OL].(2025-10-23).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511/content_7048731.htm.
- [8] 广西首个碳达峰碳中和科普馆在昭平开馆[EB/OL].(2026-01-04).<http://gx.people.com.cn/n2/2026/0104/c179430-41462698.html>.
- [9] 贺州紫云仙境溶洞元宇宙演艺启幕[EB/OL].(2023-04-27)<http://www.gx.chinanews.com.cn/ly/2023-04-27/detail-ihcnvyrk7962786.shtml>.

Practice and Thinking on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Venues and Cultural Tourism & Education Industry Based on th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 Model

Bai Ning¹

¹*Hezhou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Hezhou 542899,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eply discusses the paths and practices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venues with cultural tourism and education industries under th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 model. By analyzing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venues, combined with typical cases in Hezhou City,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integrated models such a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 Cultural Tourism" and "Science Popularization + Education", summarizes the innovative experience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practice proces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The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venues and the collaborative upgrading of cultural tourism and education industries, and ultimately promote the dual improvement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value and industrial benefits.

Keyword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 Mode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Venues;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Education Industry; Deep Integration

AIGC 赋能“数字资产共建”产教融合实践路径研究

张蕴¹

(1.苏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苏州 215200)

摘要:在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文创产业对复合型设计人才的需求不断提升,而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体系、数字资源供给及校企合作机制等方面仍存在一定不足。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以数字文创设计专业为研究对象,探讨AIGC赋能的“数字资产共建”产教融合实践路径。研究在界定AIGC技术与数字资产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构建以数字资产驱动的产教融合理论模型,提出“资源共建—教学转化—产业反哺”的生态闭环机制,并构建“资源贡献度、人才培养度、商业转化度”的数字资产价值螺旋评价体系。在实践层面,提出校企协同建设AIGC赋能数字资源资产库,并在此基础上推进教学体系改革与课程体系重构,形成“基础技能—项目应用—商业创新”的递进式能力培养模式,同时构建智能化教学评价与协同育人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表明,以数字资产共建为核心的产教融合模式能够有效促进教学资源与产业需求的动态对接,提升数字文创人才培养质量,并为职业教育在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新的实践路径与理论参考。

关键词:AIGC 赋能; 数字资产; 产教融合; 数字文创

基金项目:2025年度苏州市职业教育专项课题(Szzjzxlx202509); 2025年度全国计算机基础教育学研究会计算机基础教育教学研究项目(2025-AFCEC-617); 2025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5SJYB1160)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359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文创产业已成为推动文化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重要动力。《“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加快文化资源数字化进程,江苏省《关于贯彻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意见》明确建设数字文创产业集群,推动文化产业数字化与高质量发展。同时《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2025—2029年)》强调深化产教融合机制创新,构建数字化教学新生态,推动人工智能融入专业教学全过程,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互动式教学模式。这为数字文创设计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了重要政策指引。随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文创产业正经历深刻的技术与产业变革。AIGC技术在内容创作、设计生产及数字资源管理等环节显著提升效率,并推动产业链创新实践,促进数字内容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与此同时,高职数字文创设计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尚未完全适应产业发展的新需求,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之间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构性脱节。

1.2 研究问题

具体而言,存在的核心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人才培养体系相对滞后,传统课程体系对AIGC等新技术的融入不足,难以满足行业对复合型与创新型设计人才的需求;二是数字资源供给不足,学校缺乏系统化的数字资产资源库,企业数字资源复用率较低,难以有效支撑实践教学与创新设计;三是校企合作机制有待深化,合作模式相对单一,资源共建共享机制与数字资产产权管理尚不完善,制约了产教协同发展的可持续生态。

1.3 研究意义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以高职数字文创艺术设计专业跨专业创新人才培养为研究对象,结合相关政策导向,探

作者简介:张蕴(1981—),女,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数字文创、造型艺术。

索产教融合育人机制与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路径。研究通过构建校企“双元”协同机制，以“AIGC 赋能产业需求技术优化、校企数字资产共建共享、AIGC 的教学体系重构—产教融合生态闭环”为核心路径，推动形成数字化教学新生态与协同育人模式。以学生培养目标达成度为导向，持续优化人才培养过程，从而提升数字文创设计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本文的研究目标主要从理论目标与实践目标两个层面展开。构建“以数字资产驱动为核心的产教融合闭环生态模型”，共建数字文创的数字资产库，打破学校与企业资源壁垒，解决资源分散、供需错位、成果转化低效问题，提高教学资源的产业复用率，提升教学资源的产业价值。

2 研究综述

2.1 相关文献研究

通过对“产教融合”关键词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可见国内学者已开展了大量相关研究。产教融合的研究处于局部集中、整体分散的态势。学术界的研究紧跟国家政策而动，整体研究基于参与主体、体制机制创新和典型应用形成 8 大聚类。研究前沿体现在教育链供给侧改革、企业参与、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未来将会更大程度趋向“双高计划”和“产教融合型企业”的研究热点。在政策支持与学者探讨“双主体”育人模式初见成效。从参与主体展开，指出高职院校要充分扮演好融合参与者、平台构建者、关系维护者和既得利益获得者四个角色（宿哲睿等，2018）。[1]针对产教融合体制机制创新研究，在实践操作层面构建了集统筹督导、法规保障、激励补偿、多元配置和协调联动“五位一体”的质量评价机制（杨运鑫等，2014）。[2]产教融合典型应用研究的热频关键词有“人才培养、专业建设、制造业、产业集群和高质量”等。互联网+助推了各行各业数据化、智能化和信息化发展，依托大数据构建校企协同人才培养新模式势在必行（刘晓宁等，2018）。[3]从产教融合模式中师资培养出发，提出“双向嵌入”师资培育模型，强调企业技术骨干与教师团队的协同创新（章丽，2024）。[4]从产业融合模式中实训平台搭建，唯众云课堂通过虚拟化技术实现设计类课程的远程实训，但其 AIGC 整合度不足（网易学院）。近年来，随着数字文创产业的兴起，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数字资源库建设与产教融合，但尚未形成系统性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高校图书馆数字资产共建共享机制研究（李若男，2024）。[5]提出高校之间共建数字资源库，但未解决版权分配问题；AIGC 教学应用指出 AI 在设计教育中的应用多停留在理论探讨和课堂实践层面，与产业的实际需求和市场应用之间存在脱节，缺乏产业联动（王梦莎，2026）。[6]针对“数字资产资源驱动产教融合”与 AIGC 技术应用研究较少，缺乏产业联动机制的研究。

2.2 实践领域相关研究

在国外，关于 AIGC 技术与产教融合的研究中，已有一些初步的探索与实践。斯坦福大学 2024 年提出“AI-Augmented Learning”框架，验证了生成式 AI 在个性化学习资源开发中的有效性（Egunjobi D,2024）；[7]此外，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创新实验室对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核心在于跨学科、跨行业的合作保证学生能够在最前沿的技术环境中成长。数字资产库与资源共享，在研究项目中，学生可以通过实验室的数字平台访问大量的设计素材、技术工具和开发资源，这为课程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借鉴。[8]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强调学校和企业共同设计教学计划，并由企业提供实际的工作场景。荷兰的创意产业企业与教育合作项目，尤其注重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和创意产业的结合。学生可以通过实际操作接触到行业中的最新需求和技术，获得非常宝贵的经验。虽然产教融合的相关研究已经初见成效，但目前研究“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与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和人才培养体系动态更新相结合”的文献还不多见，也没有形成规范的、可操作、可借鉴的建设与应用路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不仅能够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还能为企业和学校创造价值，形成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因此，探索基于 AIGC 技术赋能的数字资产资源共建，校企协同育人机制的创新模式，成为推动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的迫切需求。本研究以数字文创设计创新人才培养为例，旨在强调“数字资产作为驱动”探索校企“双元”协同 AIGC 数字资源建设、完善数字化转型的人才培养体系、资源动态共享的产教生态闭环。

3 AIGC 赋能的“数字资产共建”产教融合实践路径研究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模型构建

首先，对本研究涉及的相关核心概念进行界定

AIGC 技术赋能是指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自动生成创意内容的技术，能够实现图像、视频、文本等多模态内容的生成与创作。在教育与设计实践中，AIGC 技术通过扩散模型、GPT 等生成式工具自动化生成教学资源、设计素材与协作工具，从而提升资源开发效率与创意生产能力。[9] 数字资产是指通过数字化技术生成并具有复用价值与经济价值的数字资源，包括数字化创意成果、设计素材、技术工具及知识产权等内容，如文化元素素材、3D 模型、音效资源与 IP 形象等。[10] 这类数字资产通常需符合行业技术标准，如 FBX 格式、4K 分辨率，并可在校企合作中通过共建、共享与运营形成具有产权属性的数字化知识产品，如 3D 模型库、IP 素材库及教学资源库等。

其次，以数字资产驱动的产教融合合作模式理论模型构建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以数字资源驱动的产教融合合作模式理论模型。该模型提出“资源共建→教学转化→产业反哺”的生态闭环路径，这一闭环模式确保教育不再是单向的人才培养，而是持续为产业提供创新能力和人才匹配。企业不再只是提供实训，而是深度参与数字资源共建与教学，共享数字资产收益。职业教育与产业实现真正的融合，推动 AI+数字文创行业的发展。第一，通过校企协同共建数字资源体系，企业提供真实项目、行业需求标准与 AIGC 工具资源，院校共同构建面向教学与实践应用的数字资源库；第二，在教学转化环节，将数字资源融入课程体系，学生基于 AIGC 工具开展设计实践与 workflow 训练，参与真实项目，实现“真实案例驱动”的实践教学模式；最后，在产业反哺阶段，通过学生参与的 AIGC 设计成果与数字资产实现产业化应用与商业转化，部分收益回流教育体系，用于持续优化教学资源，从而形成长期循环的协同育人生态。针对传统产教融合模式中合作价值难以量化的问题，本文进一步提出以“资源贡献度、人才培养度、商业转化度”为核心维度的“数字资产价值螺旋”评价体系，如图 1 所示。该体系从三个方面对产教融合价值进行评估：一是资源贡献度，主要衡量校企共建数字资产的规模与质量，包括企业提供的真实项目、AIGC 工具包以及行业能力标准等；二是人才培养度，主要评价院校基于数字资产开展 AIGC 教学改革成效，包括学生技能提升、作品质量、创新能力及产业适应性等；三是商业转化度，主要反映数字资产在产业中的应用价值，如 AIGC 生成作品被企业采用比例、共建知识产权授权及 IP 数字确权带来的商业收益。三者通过动态反馈机制形成可量化、可追踪的价值循环，推动校企合作由短期项目合作向长期资源共建共享模式转型。



图 1: “数字资产价值螺旋”评价体系

在机制保障方面，以数字资产为核心的产教融合既涉及教育资源配置，也涉及产业成果转化，因此需要建立清晰的产权分配与利益共享机制。通过构建数字资产确权与交易机制，如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确权与追溯体系，实现合作过程的透明化与规范化。同时结合政策导向与产业需求，建立动态化校企合作机制，以保障资源共建、价值分配与合作模式的长期稳定运行。

3.2 校企共创共享的“AIGC 赋能数字资产资源库”的建设方法

(1) “AIGC 赋能数字资产资源库”的建设方法

从企业需求、数字资源内容分类、人才培养体系优化三个维度展开。如图 2 所示。基于企业实际需求,搭建数字文创设计专业的相关数字资产内容分类与标准,如素材图片、视频、三维模型、LoRA 模型等。构建“企业数据接入→AIGC 清洗标注→教学资源生成→质量评审”的标准化流程,实现数字资源的高效动态生成;开发适配数字文创设计的 AI 辅助工具链,如 LoRA 微调、ControlNet 控制模块,提升资源生产效率与质量;建立数字资源库的更新与维护机制,确保资源库与行业技术同步迭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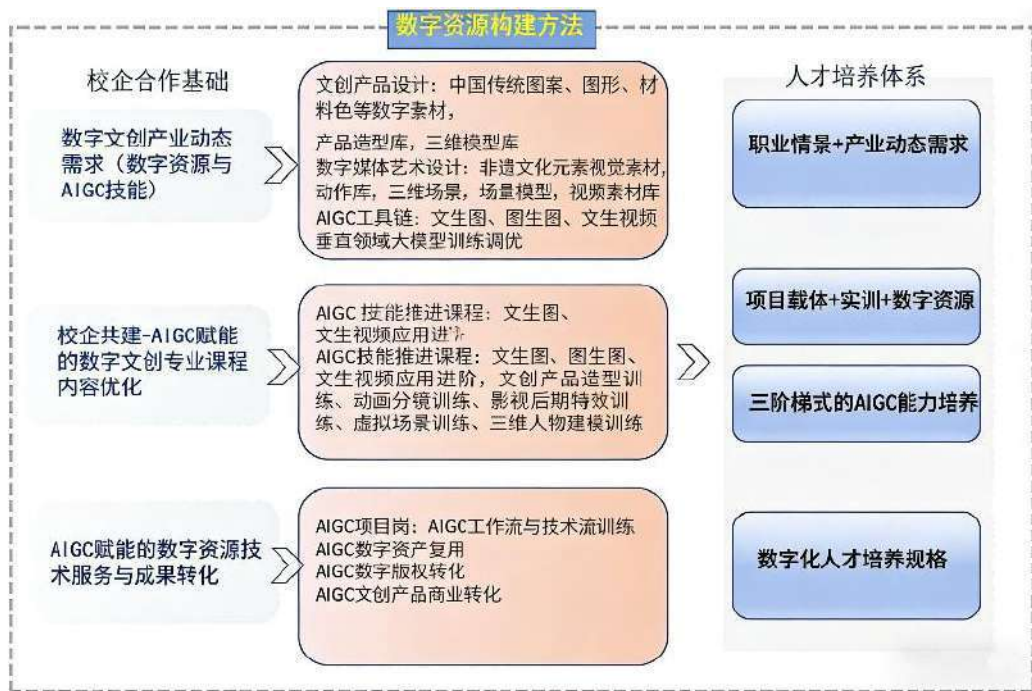


图 2:数字文创专业的数字资源构建体系和方法

探索数字资产的共建机制,分析如何通过校企合作提升数字资产库的资源价值。标准化建设的规范,制定数字资产格式规范,如文创产品设计中需要的图案图形、产品创意;动漫制作设计中需要的 IP 形象、3D 模型、动画原画风格、插画漫画风格、人物场景设计风格等;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中需要的非遗文化内容素材、音效等元数据标注规则。设置版权管理方法,基于蚂蚁链的 NFT 确权与智能合约分润机制。另外,关注动态更新,企业需求反馈与教学案例迭代机制引入 AIGC 工具,如 Midjourney 生成概念图、Blender+AI 插件优化建模。以大规模数据采集、自动化 AIGC 生成、智能资产分类管理为核心,提升校企数字资产库的运营效率。通过 AIGC 辅助生成标准化设计元素、动画资源、广告视觉素材等,加速资产生产,提高资源复用率。依托数据驱动模型,优化资产质量评估标准,确保资源高效匹配教学和产业需求。

(2) 构建 AIGC 赋能的教学资源库

在数字文创人才培养体系中,构建 AIGC 赋能的教学资源库是实现教学内容更新与实践能力提升的重要支撑。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对行业招聘信息及企业项目需求进行数据分析,可提炼数字文创岗位所需的核心能力要素,并据此生成与 AIGC 技术流程和设计工作流程相匹配的教学案例,使课程内容能够动态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同时,结合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数字化教材与教学课件,实现教学内容的快速更新与迭代,从而缩短技术更新周期,提高课程体系对新兴技术的响应能力。在资源库建设过程中,进一步整合面向职业教育的 AIGC 辅助设计工具与应用流程,形成适用于创意设计实践的工具链体系,使学生能够在真实设计情境中掌握 AIGC 在创意生成、图像设计与三维资产生产等环节的应用方法,提升设计效率与数字资产生产能力。在此基础上,通过系统梳理 AIGC 技术在职业教育中的教学适配模式,逐步形成具有可推广性的 AIGC 辅助教学规范,并依托教学资源库构建相应的课程体系与教学实施路径。通过持续开展教学实践与数据反馈,对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进行动态优化,同时利用 AIGC 技术生成个性化教学案例,使教学资源能够根据不同课程与学习需求进行自适应匹配,提升教学资源的开放性与可扩展性。进一步结合人工智能算法优化教学资源管理与学习过程支持,构建 AIGC 驱

动的智能实训平台,通过学习数据分析与学习路径推荐实现个性化学习指导,并探索“AI 导师+企业导师”的双轨协同教学模式。借助人工智能对学生作品进行辅助评估与反馈,缩短学习评价周期,从而强化实践教学の即时指导能力与学生的综合设计能力培养。

3.3 基于 AIGC 赋能的教学体系改革和课程优化

(1) 数字化人才培养规格的人才培养体系修正

在“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教育被要求通过深化校企合作构建数字化教学新生态,主动对接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的发展趋势,推进专业群的数字化改造与智能化升级,并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专业教学全过程,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互动式教学模式。基于上述政策导向与产业发展需求,本课题对数字文创专业现有人才培养体系进行系统梳理与结构优化,构建面向 AIGC 技术发展的数字化人才培养框架,为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与教学体系的协同改革提供整体结构支撑。在实施过程中,通过动态监测校企共建数字资产在企业应用中的反馈效能,持续修正与优化人才培养方案,使教学内容与产业需求保持高度匹配。同时,探索校企协同的“双向嵌入”师资培养机制,通过引入企业技术骨干参与教学与项目实践,并推动教师参与企业技术研发与产业项目,促进教学经验与产业技术的深度融合,从而提升教师团队的教学与科研能力。

在此基础上,人才培养体系的重构以“数字技能—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为核心导向,对数字文创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与教学体系进行整体重构与结构化设计,形成面向数字文创产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框架,如见图 3 所示。这一体系旨在通过课程内容、教学方法与实践平台的协同优化,推动人才培养与数字文创产业发展需求之间的深度对接。



图 3: 数字化人才培养体系

(2) 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体系优化升级

首先,针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修正,以“岗位需求牵引、AIGC 技术能力建模、项目与数字资源驱动的教学体系重构、产教融合的生态闭环”为基本逻辑。对数字文创设计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系统优化。基于数字文创产业的职业情境与岗位能力要求,构建“AI+创意设计”复合型人才能力框架,重点涵盖人工智能工具应用能力、数字化设计与创意表达能力,以及面向产业需求的商业化思维与创新问题解决能力。同时,围绕“设计作品—产品原型—市场商品”的三级孵化路径,将设计实践与产业转化相衔接,强化学生从创意生成到成果转化的全过程能力培养。在教学体系方面,将 AIGC 技术系统融入课程设计与教学实践,通过整合数字资源库中的企业案例、项目任务与共享资源,开发面向职业教育的 AIGC 工具通识课程与项目实训课程,并以真实项目驱动教学过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参与数字资产的创作、管理与应用实践,逐步形成“设计—技术—版权运营”协同发展的复合能力结构。同时,对课程的知识目标与能力目标进行重构,形成“基础技能—项目技术应用—商业

创新实践”的三阶段递进式数字化能力培养路径，以适应数字文创领域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要求。在教学评价与质量保障方面，构建以产业应用为导向的协同育人评价机制，从企业参与度、学生作品转化率、课程内容匹配度及行业认可度等多个维度对人才培养成效进行综合评估，并通过数字资产在企业应用中的反馈数据持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通过引入 AIGC 辅助工具链与智能生成技术，提升教学资源开发与设计实践效率，同时强化人工设计在创意表达中的核心作用，从而培养兼具技术驾驭能力与艺术创新能力的复合型数字文创人才。

(3) AIGC 赋能的课程体系重构

针对传统案例教学模式难以适应数字文创行业快速迭代的发展需求，本研究在人才培养模式框架下构建“真实项目与数字资源驱动”的课程体系。通过将企业项目与数字资产资源引入课程教学，使学生直接参与企业级数字资产创作，并借助 AIGC 工具提升创意设计与内容生产效率，形成面向产业需求的实践导向型教学模式。课程体系采用“三阶段递进式”的能力培养结构：第一阶段侧重 AIGC 基础工具与技术流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图像、视频等内容生成的基本方法；第二阶段通过项目式学习，将企业需求与数字资源库建设相结合，强化学生对 AIGC 技术在设计实践中的应用能力；第三阶段以真实项目实训为核心，引导学生完成设计成果的产业化应用与商业转化，从而提升设计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在此基础上，通过数字资产授权与知识产权确权机制，将课程成果反馈至企业应用场景，形成“教学实践—产业应用—资源反馈”的循环机制，进一步推动课程体系与产业需求之间的深度融合。

3.4 智能化教学体系评价指标和协同育人评价指标

传统教学评价方式在衡量学生技术掌握水平、创新能力及成果应用价值等方面存在一定局限，难以全面反映数字文创人才培养的综合成效。因此，本研究引入人工智能辅助评价机制，构建多维度的智能化教学评价体系。该体系以学生设计成果为核心评价对象，从技能掌握度、创新能力、商业价值及企业应用度等维度对学习成果进行综合评估。其中，技能掌握度主要依据学生在 AIGC 辅助设计实践中的作品质量与技术应用水平进行评价；创新能力则结合 AIGC 生成创意表现与行业导师的专业评价，对学生的创意表达与设计思维进行综合判断；商业价值通过分析学生设计成果的市场化潜力，如商业转化率与数字资源利用效率等指标进行评估；企业应用度则通过企业对学生作品的采纳情况、项目应用反馈以及学生就业与企业录用情况等数据进行综合反映。通过上述多维评价指标的协同应用，实现对教学成效的系统化评估。与此同时，在产教融合背景下，本研究进一步构建以数字资源驱动的协同育人评价指标体系，从资源利用率、课程覆盖率、师资互通率、成果转化率及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对校企协同育人成效进行综合测评。该评价体系能够从资源建设、教学实施与产业应用等多个层面反映产教融合的运行效果，为持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与教学体系提供数据支撑与决策依据。

4 结论与展望

在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文创产业对复合型设计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以 AIGC 技术为核心驱动力，围绕数字资产共建与产教融合机制，探索数字文创设计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与教学体系改革路径。研究在界定 AIGC 技术与数字资产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构建了“资源共建—教学转化—产业反哺”的产教融合生态闭环模型，通过校企协同共建数字资产资源库，将企业真实项目与教学过程相结合，推动教学内容与产业需求的动态对接。在实践路径方面，本文提出以 AIGC 技术赋能的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通过真实项目与数字资源驱动的教学方式，构建“基础技能—项目应用—商业创新”的递进式能力培养体系，并建立以技能掌握度、创新能力、商业价值及企业应用度为核心的智能化教学评价指标，以及以资源利用率、课程覆盖率和成果转化率为基础的协同育人评价体系，为数字文创人才培养提供可实施的教学改革路径。

参考文献:

- [1] 宿哲骞, 宋柏林, 盖笑松. 产教融合中高职院校的角色定位研究[J]. 收藏, 2018, 12.
- [2] 杨运鑫, 罗频频, 陈鹏. 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机制创新研究[J]. 职业技术教育, 2014, 35(04): 39-43.
- [3] 刘晓宁. 产教融合背景下校企资源共享的现实透视与藩篱跨越[J]. 职教通讯, 2018, (05): 11-17.
- [4] 章丽.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校企人才双向流动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J]. Journal of Hubei Open Vocational College, 2024, 37(9).
- [5] 李若男, 王晓霞, 李瀚茹. 高校图书馆区域联盟资源共建共享研究——以辽宁省高校开放合作办学数字资源共建项目为例[J]. 江苏科技信息, 2025, 42(08): 109-113.
- [6] 王梦莎. 双创平台联合 AI 教学在艺术设计创新人才培养中的应用观察[J]. 信息与电脑, 2026, 38(05): 251-253.
- [7] Egunjobi D, Adeyeye O J. 革新学习: 增强现实 (AR) 和人工智能 (AI) 对教育的影响[J]. 国际研究出版与评论杂志, 2024, 5(10): 1157-1170.
- [8] Sweeney D.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年度致校长的报告, MIT 媒体实验室[J]. 2024.
- [9] 黄 静. AIGC 技术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与优化 [J]. 上海包装, 2025, (09): 53-55. DOI: 10.19446/j.cnki.1005-9423.2025.09.017.
- [10] 谢友宁, 杨海平, 金旭虹. 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研究——以内容产业评估指标为对象的探讨[J]. 图书情报工作, 2010 (12): 54-58.

AIGC-Empowered Digital Asset Co-construction: A Practical Path for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Zhang Yun¹

(¹ Suzhou Colle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uzhou, Jiangsu,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the digit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has raised higher demands for interdisciplinary design talents. However,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till faces challenges in talent training systems, digital resource supply, and school–enterprise collaboration mechanism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is study takes the digit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major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explores an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path based on AI-generated content (AIGC) empowered digital asset co-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clarification of core concepts such as AIGC technology and digital asset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driven by digital assets and proposes an ecological closed-loop mechanism of “resource co-construction – teaching transformation – industry feedback”. Furthermore, a “digital asset value spiral” evaluation system is established, including resource contribution, talent cultivation, and commercial transformation dimensions. In practice, the study proposes a collaborative school–enterprise digital asset repository empowered by AIGC, promotes teaching system reform and curriculum restructuring, and forms a progressive competence training model of “basic skills – project application – commercial innovation”. Meanwhile, an intelligent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and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ssessment indicators are develop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igital asset–driven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model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alignment between teaching resources and industrial demand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digital creative talent cultivation, and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words: AIGC; Digital Assets;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Digital Creative Industry

主要照顾者类型对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 家庭功能的调节作用

张哲

(成都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为探讨主要照顾者类型对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以及家庭功能在二者间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以成都市3所幼儿园56名大班幼儿及其主要照顾者为研究对象,采用自编主要照顾者类型问卷、幼儿社会情感能力问卷、家庭功能问卷开展调查,运用SPSS26.0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幼儿社会情感能力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亲社会行为维度发展最优,问题行为维度相对薄弱;家庭功能整体处于中等水平,情感响应维度表现最佳,角色分工维度有待提升;主要照顾者类型以父母主导型占比最高,父母主导型幼儿的社会情感能力总分及核心维度得分显著优于祖辈主导型与混合照顾型幼儿,祖辈主导型幼儿问题行为得分显著更高;家庭功能在主要照顾者类型与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关联中起显著调节作用,其中沟通质量、情感响应维度的调节效应显著。本研究结果可为不同教养模式家庭的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培养、家园协同育儿指导提供实证参考。

关键词: 幼儿; 家庭功能; 主要照顾者类型; 社会情感能力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382

1 问题提出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明确将“健康”与“社会”领域列为幼儿发展的核心目标,着重强调社会情感能力对幼儿终身发展的基础性价值^[1]。社会情感能力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术、社会与情感学习协作组织界定,指“人们在成长和发展的复杂情境中,识别并管理情绪、建立并维持积极人际关系、制定并实现目标、做出负责任的决策、共情并理解他人的综合能力”^[2]。具体到幼儿阶段,幼儿社会情感能力是幼儿在社会交往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综合能力,涵盖认知、情感与行为三个核心维度,具体表现为识别和管理自身情绪、理解他人情绪、维持良好人际交往以及解决社交问题的能力^[3]。其中,正确的自我认知、良好的情绪管理能力、积极的人际交往能力与有效的问题解决能力,能够显著增进幼儿的自我效能感,是其社会情感能力培养的关键支撑^[4]。因此,有必要对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及其关键影响因素做进一步的系统探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我国学龄前儿童隔代教养比例高达58.7%,照顾者类型的多元化已然成为学前教育领域不容忽视的社会现实状况^[5]。当前,我国学前儿童家庭教养模式以父母教养、隔代教养以及父母与祖辈共同参与的混合教养三种模式并存为核心特征。然而,在教养实践过程中,普遍存在“父母教养理念先进但日常陪伴时间不足”“祖辈教养陪伴充分但教育方法相对滞后”“混合教养模式下教养理念冲突与责任边界模糊”等现实矛盾。这些教养矛盾是否会对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产生影响,急需通过实证研究加以检验。现有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父母教养与祖辈教养”的二元对比分析,缺乏对混合教养类型的深入剖析;且多关注社会情感能力的总分差异,忽略了教养模式对情绪调节、亲社会行为、问题行为等各维度的差异化影响。

家庭结构是指家庭中成员的构成、成员间相互影响与作用的状态,以及由该状态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联系模式^[6]。同时,家庭功能作为家庭内部环境的核心变量,其在主要照顾者类型与幼儿社会情感能力之间的调节机制仍有待深入探究。已有研究表明,当家庭功能处于良好状态时,家庭成员之间能够形成稳定的沟通模式与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7],这会对幼儿的情绪智力发展产生显著积极效应^[8],进而降低其问题行为

作者简介: 张哲(2000—),男,硕士,研究方向为体育教育运动训练学。

的发生率^[9],全面提升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水平。当家庭功能欠佳或失调时,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与有效沟通会受到显著阻碍,个体也难以在家庭中习得应对变化与挑战的积极方式^[10],此类消极家庭环境会对幼儿的社会适应能力发展产生显著负面影响^[11]。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主要照顾者类型对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且该影响可能会受到家庭功能的调节,即家庭功能在主要照顾者类型与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关联中发挥调节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通过前期走访幼儿园,并在园方和老师的帮助下召开班会宣讲调查内容,共有 56 位家长参与调查。数据采用问卷星平台以网络形式收集,取样前获得所在学校领导、老师和学生家长知情同意。

表 1 被试基本信息 (n=56)

名称	选项	人数	总体百分比
幼儿性别	男	29	51.8
	女	27	48.2
主要照顾者类型	父母主导型	32	57.1
	祖辈主导型	18	32.1
	混合照顾型	6	10.7
家庭背景	父母学历本科以上	21	65.6
	父母学历本科以下	11	34.4
	祖辈学历高中及以下	14	77.8
	祖辈学历大专及以上	4	22.2

2.2 研究工具

2.2.1 主要照顾者类型问卷。参考《中国城乡家庭教养方式调查报告》的相关条目,结合研究目的自编,共 5 个条目。核心条目:日常主要照顾幼儿的是;每周照顾幼儿的时长占比(针对选中的照顾者);幼儿的教育决策(如报兴趣班、制定规则)主要由谁负责;计分与分类:根据条目 2 和 3 的结果,结合前文分类标准,将照顾者类型划分为父母主导型、祖辈主导型、混合照顾型;本研究的内容效度指数为 0.92;结合预调查问卷,重测信度为 0.85,信效度良好。

1.2.2 幼儿社会情感能力问卷。参考“幼儿长处与困难问卷(SDQ)”的维度划分逻辑修订。该问卷共 24 个评估条目,分为情绪理解、亲社会行为、问题行为、注意力和社交技能五个维度。计分方式:采用 1-3 级计分,其中正向条目(如“能体谅别人感受”)1=完全不符合 2=部分符合 3=完全符合;负向条目(如“经常发脾气”)反向计分,1=完全符合,2=部分符合,3=完全不符合;各维度得分为所属条目得分之和,总分为 5 个维度得分之和,得分越高表示社会情感能力发展越好;量表整体 α 系数为 0.82,各维度 α 系数分别为:情绪理解 0.76、亲社会行为 0.79、问题行为 0.75、注意力 0.73、社交技能 0.77,均达到可接受水平。

1.2.3 家庭功能问卷。参考 McMaster 家庭功能评估模型,结合原始数据中家庭相关信息(如照顾者关系、互动模式),修订为简化版量表,共 8 个条目;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沟通质量、情感响应和角色分工采用采用 1-4 级计分,1=完全不符合,2=不太符合,3=比较符合,4=完全符合。该问卷 α 系数为 0.78,各维度 α 系数分别为:沟通质量 0.74、情感响应 0.76、角色分工 0.72。

2.3 数据统计

采用 SPSS26.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运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对所有 37 个条目(社会情感能力 24 条+家庭功能 8 条+照顾者类型相关 5 条)进行检验,未旋转前共提取 12 个公因子,第一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 28.3%,小于 40%的临界值,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 结果

3.1 描述统计分析

(1) 主要照顾者类型分布情况

如表 1 所示, 父母主导型占比最高, 达 57.1%; 祖辈主导型次之, 占比为 32.1%; 混合照顾型占比最低, 为 10.7%。在父母主导型中, 父母双方共同照顾的占比为 80.6%, 单亲父母照顾的占比为 19.4%; 在祖辈主导型中, 祖父母照顾的占比为 61.1%, 外祖父母照顾的占比为 38.9%。

表 2 主要照顾者类型分布 (n=56)

照顾者类型	人数 (n)	占比 (%)	细分类型	人数 (n)	占该类型比例 (%)
父母主导型	32	57.1	父母双方共同照顾	25	80.6
			单亲父母照顾	7	19.4
祖辈主导型	18	32.1	祖父母照顾	11	61.1
			外祖父母照顾	7	38.9
混合照顾型	6	10.7			
合计	56	100.0			

(2) 幼儿社会情感能力调查情况

由下表得知, 社会情感能力总分的均值为 41.21 (标准差 SD=3.65), 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在各维度方面, 亲社会行为维度的得分最高 (均值 M=8.52, 标准差 SD=1.23), 问题行为维度的得分最低 (均值 M=4.15, 标准差 SD=0.98)。各维度得分的排序依次为: 亲社会行为 > 社交技能 > 情绪理解 > 注意力 > 问题行为。

表 3 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各维度统计 (n=56)

维度	条目数	M	SD
情绪理解	4	7.32	1.15
亲社会行为	6	8.52	1.23
问题行为	5	4.15	0.98
注意力	4	6.87	1.09
社交技能	5	7.98	1.18
合计	24	41.21	3.65

(3) 家庭功能调查情况

如表 3 所示, 家庭功能总分均值为 22.36 (SD=3.12), 处于中等水平; 各维度中, 情感响应维度得分最高 (M=8.72, SD=1.35), 角色分工维度得分最低 (M=4.21, SD=0.89)。

表 4 家庭功能各维度描述性统计 (n=56)

维度	条目数	M	SD
沟通质量	3	9.43	1.27
情感响应	3	8.72	1.35
角色分工	2	4.21	0.89
合计	8	22.36	3.12

3.2 相关性统计分析

(1) 各变量相关性分析

下表所示, 照顾者类型与社会情感能力总分以及情绪理解、亲社会行为、社交技能维度呈现显著负相关 ($r=-0.32\sim-0.28$, $p<0.05$)。这表明, 父母主导型的幼儿在上述维度的得分显著高于祖辈主导型和混合照顾型的幼儿。同时, 照顾者类型与问题行为维度呈显著正相关 ($r=0.29$, $p<0.05$), 即祖辈主导型的幼儿在问题行为维度的得分相对更高。家庭功能总分及其各维度与社会情感能力总分以及情绪理解、亲社会行为、注意力、社交技能维度呈显著正相关 ($r=0.35\sim0.42$, $p<0.01$), 而与问题行为维度呈显著负相关 ($r=-0.38$,

$p<0.01$)。

表 5 各变量相关性矩阵 (n=56)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照顾者类型	1								
2.社会情感能力总分	-0.32*	1							
3.情绪理解	-0.29*	0.78**	1						
4.问题行为	0.29*	-0.65**	-0.52**	1					
5.亲社会行为	-0.28*	0.72**	0.61**	-0.48**	1				
6.注意力	-0.30*	0.75**	0.63**	-0.51**	0.68**	1			
7.社交技能	-0.35**	0.40**	0.37**	-0.38**	0.42**	0.39**	1		
8.家庭功能总分	-0.33**	0.38**	0.35**	-0.36**	0.40**	0.37**	0.82**	1	
9.沟通质量	-0.27*	0.36**	0.33**	-0.34**	0.38**	0.35**	0.76**	0.79**	1

注: * $p<0.05$, ** $p<0.01$; 照顾者类型: 父母主导型=1, 祖辈主导型=2, 混合照顾型=3

(2) 不同照顾者类型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差异分析

下述表格结果显示, 不同照顾者类型幼儿在社会情感能力总分及情绪理解、亲社会行为、问题行为、社交技能维度存在显著差异 ($p<0.05$), 在注意力维度差异不显著 ($p>0.05$)。

表 6 不同照顾者类型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差异分析 (n=56, M $\pm$ SD)

维度	父母主导型 (n=32)	祖辈主导型 (n=18)	混合照顾型 (n=6)	F 值	p 值
情绪理解	7.85 $\pm$ 1.02	6.52 $\pm$ 1.13	7.23 $\pm$ 1.08	4.32	0.017
亲社会行为	9.21 $\pm$ 1.15	7.35 $\pm$ 1.08	7.92 $\pm$ 1.12	6.87	0.002
问题行为	3.65 $\pm$ 0.89	4.92 $\pm$ 0.95	4.53 $\pm$ 0.91	5.12	0.009
注意力	7.02 $\pm$ 1.05	6.58 $\pm$ 1.12	6.75 $\pm$ 1.07	1.23	0.301
社交技能	8.56 $\pm$ 1.09	7.12 $\pm$ 1.15	7.83 $\pm$ 1.10	4.56	0.014
总分	43.15 $\pm$ 2.87	38.67 $\pm$ 3.54	40.23 $\pm$ 3.12	5.23	0.008

注: * $p<0.05$, ** $p<0.01$

(3) 家庭功能的调节效应检验分析

表 7 家庭功能总分的调节效应回归分析 (n=56)

变量	第一步 (主效应)	第二步 (加入家庭功能)	第三步 (加入交互项)
性别	0.08 (0.52)	0.07 (0.48)	0.06 (0.45)
年龄	0.12 (0.76)	0.11 (0.72)	0.10 (0.68)
照顾者类型	0.8256	0.966	-0.48** (-3.15)
家庭功能总分	-	0.38** (3.21)	0.42** (3.45)
照顾者类型 $\times$ 家庭功能总分	-	-	0.25* (2.03)
R ²	0.12	0.25	0.31
ΔR^2	0.12*	0.13**	0.06*
F 值	3.21*	5.67**	6.32**

注: 括号内为 t 值; * $p<0.05$, ** $p<0.01$

为了进一步检验家庭功能在照顾者类型与幼儿社会情感能力之间的调节作用,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方法。首先,将照顾者类型作为自变量,幼儿社会情感能力总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照顾者类型对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具有显著预测作用 ($p<0.05$)。接着,将家庭功能总分纳入回归方程,发现家庭功能对幼儿社会情感能力也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p<0.01$)。最后,将照顾者类型与家庭功能的交互项纳入回归方程,结果表明交互项对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具有显著预测作用 ($p<0.05$),这表明家庭功能在照顾者类型与幼儿社会情感能力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当家庭功能较好时,不同照顾者类型对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差异相对较小;而当家庭功能较差时,不同照顾者类型对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差异更为明显。

(4) 家庭功能各维度的调节效应

下表表明家庭功能中的沟通质量、情感响应和问题解决维度在照顾者类型与幼儿社会情感能力之间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而角色分工和行为控制维度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表 8 家庭功能各维度的调节效应检验 (n=56)

调节变量	交互项系数 (β)	t 值	p 值	95%置信区间
沟通质量	0.27	2.15	0.036*	[0.02, 0.52]
情感响应	0.24	2.01	0.049*	[0.01, 0.47]
角色分工	0.18	1.56	0.125	[-0.05, 0.41]

4. 讨论

4.1 幼儿社会情感能力与家庭功能的发展现状解读

本研究中,56名大班幼儿的社会情感能力总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M=41.21$),其中亲社会行为维度得分最高,问题行为维度得分最低,这与国内多数研究结果一致^{[16][19]}。原因可能在于:大班幼儿已具备基本的社交认知,在幼儿园集体生活中形成了分享、帮助等亲社会行为习惯;同时,幼儿园的规则教育与行为引导有效抑制了问题行为的发生。家庭功能总分处于中等水平 ($M=22.36$),情感响应维度得分最高,角色分工维度得分最低。这一结果反映出:多数家庭能给予幼儿充足的情感支持,但在照顾责任分工上存在模糊性,尤其是混合照顾型家庭,可能因父母与祖辈的责任边界不清晰,导致照顾效率降低,这与刘霞(2021)^[18]关于混合教养家庭“责任推诿”的研究发现一致。

4.2 不同照顾者类型对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分析

父母主导型照顾的优势验证。研究结果支持假设 H1 和 H2,父母主导型幼儿的社会情感能力总分及情绪理解、亲社会行为、社交技能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其他类型。从依恋理论视角分析,父母与幼儿的安全依恋关系能让幼儿获得充足的安全感,进而更敢于探索社交环境、表达自身情绪;同时,父母的教育理念更贴近现代育儿观,注重通过“情绪对话”“规则游戏”等方式培养幼儿的情绪理解能力与亲社会行为,这与 Bowlby (1978)^[13]的研究结论一致。但需注意,本研究中 19.4% 的父母主导型为单亲父母照顾,其幼儿的社会情感能力得分略低于双亲照顾幼儿(未达显著水平),可能与单亲父母的时间、精力有限有关,需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验证。

祖辈主导型照顾的双重影响。祖辈主导型幼儿的问题行为维度得分显著高于父母主导型,这与陈帼眉(2015)^[15]的研究结果一致。主要原因在于:祖辈受传统育儿观念影响,存在“隔代亲”导致的过度包容,对幼儿的不良行为缺乏及时纠正;同时,祖辈的社交圈较窄,幼儿的同伴交往机会较少,影响社交技能发展。但祖辈主导型幼儿的情感响应得分较高(家庭功能维度),说明祖辈的充足陪伴能为幼儿提供稳定的情感支持,这是其不可忽视的优势,现有研究往往过度强调祖辈照顾的局限性,而忽视了这一优势。

混合照顾型的中间态特征。混合照顾型幼儿的社会情感能力总分介于父母主导型与祖辈主导型之间,且与祖辈主导型差异不显著,这一结果部分支持假设 H1。原因可能在于:本研究中混合照顾型家庭占比仅 10.7%,样本量较小,且部分家庭存在父母与祖辈教育理念冲突的问题,削弱了“互补优势”;而刘霞(2021)^[18]的研究中混合照顾型家庭占比达 30%,且照顾者间协作良好,因此得出了“混合照顾更优”的结论。这

表明,混合照顾的效果并非由类型本身决定,而是由照顾者间的协作程度(即家庭功能)决定,这也为后续调节效应的结果提供了铺垫。

4.3 家庭功能的调节机制分析

整体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支持假设 H3,家庭功能总分在照顾者类型与幼儿社会情感能力间发挥显著调节作用。高家庭功能能缩小不同照顾者类型幼儿的社会情感能力差异,低家庭功能则会放大该差异。这一结果验证了家庭系统理论的观点,即家庭内部的互动模式(家庭功能)是影响外部因素(照顾者类型)作用效果的关键。例如,高沟通质量的祖辈家庭,祖辈能通过与父母的定期沟通,更新教育理念,提升情绪引导能力,从而弥补祖辈照顾的不足;而低沟通质量的父母家庭,即使父母为主要照顾者,也可能因缺乏科学的育儿方法,导致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发展不佳。

各维度调节效应差异。沟通质量和情感响应维度的调节效应显著,角色分工维度的调节效应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在家庭功能的三个维度中,“沟通”与“情感”是更关键的调节变量。具体而言:

沟通质量的调节作用。良好的沟通能让不同照顾者类型家庭形成统一的教育理念与行为准则,避免因理念冲突导致幼儿行为混乱。例如,混合照顾型家庭中,父母与祖辈通过有效沟通明确“谁负责规则引导、谁负责情感陪伴”,能让幼儿形成稳定的行为预期,促进社会情感能力发展;

情感响应的调节作用。积极的情感响应能让幼儿获得充足的心理安全感,这是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基础。无论何种照顾者类型,只要能及时回应幼儿的情绪需求,就能促进其情绪理解与调节能力发展;

角色分工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可能因为本研究中多数家庭的角色分工虽不清晰,但未严重影响照顾质量,或角色分工的影响需通过沟通质量、情感响应等维度间接发挥作用,而非直接调节照顾者类型与社会情感能力的关系。

5. 研究局限

样本局限性。采用方便抽样法,样本仅来自成都 3 所幼儿园,地域局限明显;样本量较小(56 人),尤其是混合照顾型家庭仅 6 人,可能影响结果的代表性与稳定性;

研究设计局限性。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仅能揭示变量间的相关关系,无法明确因果关系(如无法确定是照顾者类型影响社会情感能力,还是社会情感能力发展较好的幼儿更易获得父母主导照顾);

变量测量局限性:主要采用家长自我报告法,可能存在社会赞许性偏差(如家长倾向于高估幼儿的亲社会行为、低估问题行为);家庭功能量表为简化版,未涵盖“问题解决”“家庭氛围”等重要维度,测量深度有限;

调节变量局限性。仅检验了家庭功能的调节作用,未考虑其他可能的调节变量(如幼儿的气质类型、亲子互动质量),调节机制的探讨不够全面。

6. 结论

56 名大班幼儿的主要照顾者类型以父母主导型为主(57.1%),祖辈主导型次之(32.1%),混合照顾型占比最低(10.7%);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亲社会行为维度发展最佳,问题行为维度发展相对薄弱;家庭功能处于中等水平,情感响应维度表现较好,角色分工维度有待提升。

不同主要照顾者类型对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存在显著影响。父母主导型幼儿的社会情感能力总分及情绪理解、亲社会行为、社交技能维度得分显著高于祖辈主导型和混合照顾型,祖辈主导型幼儿的问题行为维度得分显著高于父母主导型;照顾者类型对注意力维度的影响不显著。

家庭功能在主要照顾者类型与幼儿社会情感能力间发挥显著调节作用。高家庭功能能缩小不同照顾者类型幼儿的社会情感能力差异,低家庭功能则会放大该差异;其中,沟通质量和情感响应维度的调节效应显著,角色分工维度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提升幼儿社会情感能力需采取“分类施策+功能优化”的双重策略。针对不同照顾者类型家庭提供差异化育儿指导,同时重点强化家庭的沟通质量与情感响应能力,通过家庭内部功能的优化,弥补照顾者类型本身的不足,促进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 [2] Weissberg R P, Durlak J A, Domitrovich C E, et al.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M]//Jones S M, Bouffard S M, Weissberg R P. Handbook of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New York: Guilford Publications, 2015: 3-19.
- [3] 梁宗保,张光珍,陈会昌,等.学前儿童社会情绪能力的发展及其与同伴接纳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2,28(04):371-378.
- [4] 刘焱,秦旭芳.学前儿童社会教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8)[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8.
- [6] 邓伟志,徐新.家庭社会学导论[M].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6.
- [7] 方晓义,徐洁,孙莉,等.家庭功能:理论影响因素及其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J].心理科学进展,2004(04):544-553.
- [8] 池丽萍,辛自强.家庭功能与儿童孤独感的关系:中介和调节效应[J].心理学报,2003(02):216-221.
- [9] 王美芳,陈会昌.儿童问题行为的研究进展[J].心理科学, 2001(03):348-349.
- [10] Epstein N B, Baldwin L M, Bishop D S. The McMaster family assessment device[J].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1983, 9(2):171-180.
- [11] 邹泓.儿童社会适应的发展特点与影响因素[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2):13-20.
- [12] Ainsworth, M.D.S. Patterns of attachment: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the strange situation[M]. Hillsdale,NJ:Erlbaum, 1978.
- [13] Bowlby,J.Attachment and loss: Vol. 1. Attachment[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9.
- [14] Minuchin, S. Families and family therapy[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15] 陈帼眉.幼儿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16] 李红,王争艳.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结构与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8,26 (5):821-830.
- [17] 张莉,隔代教养对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家庭功能的调节作用[J].学前教育研究,2020,(7): 32-41.
- [18] 刘霞.混合教养对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及机制研究[J].中国特殊教育,2021,(3):78-85.
- [19] 王争艳.隔代教养的优势与挑战:基于幼儿社会情感发展的视角[J].教育学报, 2019, 15 (2): 67-75.

The Influence of Main Caregiver Type on Young Children's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Family Functioning

Zhang Zhe

Chengdu University,Sichuan, Chengdu,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main caregiver type on young children's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family functioning between them, this study selected 56 kindergarten children from three kindergartens in Chengdu and their main caregivers as research participants. Data were collected using a self-designed main caregiver type questionnaire, a young children's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questionnaire, and a family functioning questionnaire, and analyzed with SPSS 26.0.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hildren's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was generally at an above-average level, with prosocial behavior as the strongest dimension and problem behavior as the weakest. Family functioning was at a medium level, with emotional responsiveness performing best and role division needing the most improvement. The most common caregiver type was parent-led care. Children in the parent-led group scored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otal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and core dimensions than those in grandparent-led and mixed-care groups, while children in the grandparent-led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in problem behavior. Family functioning significantly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in caregiver type and children's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specifically,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communication quality and emotional responsiveness were significant. The findings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promoting children's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in families with different care patterns and for home-kindergarten collaborative parenting guidance.

Keywords: Young Children; Family Functioning; Main Caregiver Type;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健康学习视域下幼儿体适能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李显熙

(成都大学体育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要:国家《“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共建共享全民健康”的发展理念,强调体育教育在促进儿童身心全面发展中的基础性与关键性作用。在“健康中国”战略大力推进的今天,我国对幼儿体质健康问题予以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体适能理念已经十分自然、妥帖地融入学前教育领域。与此形成呼应的是,国内学界对幼儿体适能训练的健康促进作用、课程体系构建及实施路径已有相当扎实、丰富的研究。故而本文在系统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从体适能的理论内涵、幼儿体适能课程建构模式、幼儿体适能健康促进作用及体教融合背景下的发展诸方面做了逻辑清晰、层层递进的综合述评。也由此自然地得出目前幼儿体适能课程体系化、游戏化趋势明显,但仍有课程标准不统一、实证研究薄弱等值得重视的问题。因此未来的方向宜是完善课程体系及评价机制,方能真正推进该领域良性发展。

关键词:体适能; 幼儿体适能; 课程构建; 健康促进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401

引言

由于生活方式改变、电子产品普及,儿童日常身体活动时间明显减少,而现代社会城市化又在加速发展,故学前儿童户外活动空间日趋有限,电子产品使用频率不断增加,由此身体活动不足的问题愈加突出。更值得重视的是,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幼儿体质健康水平已经出现“体能下降、肥胖率上升”的明确趋势,因此该问题已然成为公共健康领域最紧迫、最突出的课题之一。从国家战略的角度可以十分清楚、有层次地看到“健康中国”战略对儿童健康发展的有力支撑:即先明确提出“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再将其自然、妥帖地融入基础教育及学前教育体系,又据此系统、有计划地提出教育训练的具体措施。因此,体适能作为反映个体身体机能、运动能力的重要指标体系,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学前体育研究的新焦点。由于发达国家在体适能教育方面已有比较成熟、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故可很自然、妥帖地讨论美国“体适能教育课程(Fitness Education Program)”,即其以基础动作技能发展为根本,按循序渐进的原则设计课程,对我国相关研究有极好的参考意义。然而,由于我国幼儿体适能研究起步较晚,故目前虽已有较多研究,但是毋庸讳言,其理论体系尚不成熟,课程标准又未统一,因此宜先系统、有层次地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厘清研究脉络,方能据此自然、妥帖地构建课程体系。

一、幼儿体适能的理论基础研究

(一) 体适能概念界定

体适能概念的发展有十分清楚、逻辑严密的从“身体素质体力表现”到“身体素质健康促进”的转变过程:早期把体适能当作身体素质诸要素的综合表现,而现在的体育科学已经明确了体适能在健康维护、提高生活质量中的重要作用。因此目前学界普遍且一致地认为,体适能不只是身体机能指标的集合,也包括个体适应环境、完成日常活动的实际能力。由于儿童发展领域对体适能已有十分丰富、明确的教育阐述,故有学者很自然、妥帖地提出:幼儿体适能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界定为“以动作发展为基础、以健康促进为目标的综合能力体系”,并应以运动促进身心协同发展。同时,由于近年来学界对“功能性体适能”概念已有十分明确、有层次的讨论,即以模

作者简介:李显熙(2001—),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运动训练。

拟日常动作的训练来提高儿童真实情境下的运动能力,故攀爬、搬运、平衡、跳跃诸种活动都可自然、妥帖地被归类为功能性训练内容,对课程设计有极好的指导意义。

(二) 幼儿体适能概念界定

幼儿体适能是以3—6岁儿童为对象设计的,其根本目的就是用科学合理的活动方式提高身体素质,促进动作发展,同时培养儿童参加运动的兴趣,自然、妥帖地形成良好运动习惯。从结构上可以十分清楚、逻辑地划分为身体与心理两个方面:身体方面考察力量、耐力、协调性诸种指标,心理方面考察合作意识、意志品质、情绪调节能力诸种表现。因此,心理健康适能可很自然地归纳为意志品质、合作意识、抗挫能力及积极进取的态度。

(三) 幼儿发展特点与体适能训练适应性

由于幼儿期神经系统发育迅猛,所以从生理发展的角度看,幼儿期是动作技能学习极好的时期,而现有资料也十分清楚地说明,此时儿童对动作刺激极为敏感,故宜进行多种动作训练以促进神经肌肉及协调能力的发展。由于幼儿骨骼比较柔软,关节稳定性较差,故训练时必然要严格控制运动负荷及训练动作。已有充分证据表明不合理的训练方式会对儿童生长发育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也十分自然、妥帖地引出了体适能训练科学指导的重要性。由于幼儿心理发展的特点是以情绪驱动行为,幼儿参与活动一般受兴趣、情境的直接支配,故而体适能训练宜重视情感体验,用积极的反馈来增强幼儿参与的动力,教师也宜在教学中采用恰当的鼓励性评价方式,慎用比较、竞赛。此外,由于幼儿社会性发展有极重要的意义,故让幼儿参加集体活动、玩团队合作游戏,有利于其形成规则意识及团队合作意识,这也是体适能课程极好的价值体现。

二、幼儿体适能课程构建研究

(一) 课程目标研究

由于近年来课程目标体系构建中出现了十分明确、成熟的“多维整合”发展趋势,故已有若干研究在传统“三维目标”(身体、认知、情感)的基础上提出要自然、妥帖地融入社会性发展及行为习惯养成目标,由此建构起更完备的课程目标体系。由于身体发展不仅要重视体能指标的提高,而且要主动、有计划地优化训练中各动作的质量及运动表现,因此训练时宜做到动作规范,合理安排休息时间,这样才能真正提高训练效率,也更有利于安全锻炼。由于训练课程从认知的角度出发,故宜先让幼儿掌握基本的运动规则及训练安全知识,由此自然、妥帖地培养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其解决问题的能力。由于体适能课程中所选的合作游戏、团队活动有利于培养责任感及集体意识,因此从情感、社会性的角度来讨论此问题就是目前研究的热点。

(二) 课程教学原则研究

幼儿体适能教学应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坚持以幼儿为主体、以发展为导向的基本原则。在教学实施过程中,首先应体现趣味性原则,通过游戏化、情境化的活动设计激发幼儿参与兴趣,增强其运动积极性与持续性;其次应坚持循序渐进原则,依据幼儿年龄特点、动作发展水平及个体差异,科学安排教学内容与运动负荷,使教学由易到难、由浅入深,逐步提升幼儿的基本动作能力与身体素质;再次应贯彻安全性原则,在教学环境、器材使用、动作编排和组织管理等方面充分保障幼儿运动安全,避免因训练不当造成身体损伤;同时还应注重全面发展原则,将力量、灵敏、平衡、协调、柔韧等体适能要素有机融合,促进幼儿身体机能、心理品质与社会适应能力的协同提升。由此可见,幼儿体适能教学原则不仅是课程设计的重要依据,也是实现幼儿健康、全面发展的关键保障

(三) 课程内容结构研究

课程内容是教学体系最根本、最核心的部分,因此近年幼儿体适能课程已经很自然、妥帖地从单一训练转向综合化设计,少儿体适能课程在内容设计上也明确、有序地从“单一训练模块”转变为“综合化课程体系”。基

基础动作技能训练仍是基本内容,但是组织形式更加丰富,把跑、跳、投诸种动作合理地融入情境游戏之中,真正做到技能训练与兴趣培养两者的统一。从身体素质训练的角度很自然、妥帖地阐述了“隐性训练”的理念,即用游戏活动及场景变换来发展儿童体能,绝不用传统的重复训练方法,因而更符合幼儿特点,也更容易被幼儿接受。此外,由于最近几年“主题化课程”十分流行,故可很自然、妥帖地看到以“森林探险”“运动闯关”“小小消防员”诸种主题为载体,把不同训练内容有机整合起来的具体尝试。由于目前对分龄设计的研究已有很好的细化,故已有文献明确、合理地提出了按儿童发展各关键期安排不同训练内容的观点。

(四) 课程实施模式研究

由于游戏化教学在训练课程实施模式方面已经从“形式创新”发展到“核心策略”,因此可以十分自然、妥帖地用游戏来设计教学,也由此切实提高学习参与度及学习效果。同时,“情境教学模式”已经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其基本思路是创设真实或模拟的情境,让幼儿“做中学,做中练”,因此很自然地可以用“闯关任务”情境来组织爬、跑、搬、跳、运诸种动作训练。由于分层教学、个性化指导已经是十分明确的教学趋势,故教师宜从幼儿个体差异出发予以分层指导,而信息技术中所蕴含的视频反馈、数据记录诸种手段对教学改进有极好的促进作用。此外,由于信息技术的引入,课程实施就有了十分明确、有力的新手段:用视频反馈帮助幼儿掌握动作,用数据记录进行教学评价,用课后方式与家长沟通以改进幼儿的运动技术。

三、体适能训练对幼儿健康的影响研究

(一) 对身体健康的影响

从目前多数研究中可以十分清楚、有层次地看到,系统训练有利于改善幼儿体能,对协调性、灵敏性有直接而明确的积极影响,规律运动有利于控制体重,也有利于骨骼发育,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体适能训练促使幼儿神经系统发生有利适应。由于规律运动有利于提高幼儿的基础代谢率,有利于减少脂肪沉积,因此对预防儿童肥胖有直接而重要的意义,而体适能训练又有利于幼儿骨骼发育,有利于提高骨密度。此外,从现有文献中可以十分清楚、有层次地看到,幼儿早期的运动经验对今后幼儿运动能力的发展有明确的“迁移效应”,故早期训练有利于以后复杂技能的学习。

(二) 对心理发展的影响

由于幼儿进行体适能训练有利于提高幼儿的自我效能感,因此幼儿成功完成有一定难度的任务之后,自信心、自豪感都会自然、充分地得到提高。同时,由于运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积极情绪有利于幼儿缓解压力、调节情绪,故而现有若干研究都指出规律运动与注意发展之间有明确联系。

(三) 对行为习惯的影响

由于幼儿长期从事体适能活动,故有利于形成稳定、持久的运动习惯:幼儿经常参加训练活动就会形成有规律、有自觉性的运动习惯,此种习惯又自然地影响其日常行为方式,促使幼儿增加活动时间、减少久坐,因而有利于良好生活方式的养成。

四、体教融合背景下的相关研究

(一) 学校体育中的应用研究

由于体教融合的形势已经展开,故体适能理念自然、妥帖地融入了课程改革,因此更有利于调整教学目标及教学内容。从现有资料中可以十分清楚、有层次地看到,体适能导向的教学模式有利于提高幼儿课堂参与率,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也有利于评价方式从结果导向转向过程导向。

(二) 少儿体适能培训发展研究

由于近几年消费升级、教育理念又发生了很大变化,故少儿体适能培训市场发展迅猛,但是毋庸置疑,行业发展中也暴露出规范性不足的种种问题,诸如课程标准缺失、教师资质不统一等,因此学界已有合理建议:宜建立行业准入及评价机制。

(三) 协同发展研究

由于协同发展模式是以多主体协同参与为基本特征的,因此它很自然就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而今后的发展也必然需要多方协同参与,学校、家庭、社会机构各就其位方能形成完整、有力的支持体系。已有研究清楚地证明,此种模式有利于提高教育效果,也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故是体适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极佳途径。

参考文献:

- [1]刘立英,沈友青,袁一豪. 体教融合背景下少儿体适能培训产业优化策略探究——以湖北武汉为例[J].文体用品与科技,2024,(21):71-73.
- [2]芮菊萍. 基于体适能的小学体育教学实践探索[J].田径,2023,(09):38-39.
- [3]陈祥奎. 基于体适能理论的体育锻炼对学生习惯养成的影响研究[J].田径,2023,(07):26-28.
- [4]冯瑞,樊云飞. “健康第一”视域下幼儿体适能训练体系的构建研究[J].青少年体育,2022,(09):84-85.
- [5]张静. 体适能视角下中小学体育教学的创新路径研究[J].青少年体育,2022,(08):105-107.
- [6]宋博雅,孙致娴,巩红. 幼儿体适能训练对其体质健康促进作用研究综述[J].青少年体育,2021,(10):139-140.
- [7]刘南希. 体适能训练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影响发展研究[J].当代体育科技,2021,11(29):58-61.[8]杨佳俊.5-6岁幼儿体适能课程构建的实证研究[D].南京体育学院,2021.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s Physical Fitness Curriculum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althy Learning

Li Xianxi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of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China

Abstract: The national Healthy China 2030 Planning Outline clearly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for the health of all people", emphasizing the fundamental and crucial role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promoting the all-round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mid the vigorous advancement of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China has paid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the physical health of young children, and as a result, the concept of physical fitness has been naturally and appropriately integrated into the field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response, the domestic academic community has conducted substantial and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health-promoting effects of children's physical fitness trai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system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Therefore, based 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existing literature, this paper presents a logically coherent and progressive comprehensive re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physical fitness, the construction model of early childhood physical fitness curricula, the health-promoting effects of such programs, and their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It is naturally concluded that current early childhood physical fitness curricula show an obvious trend toward systematization and gamification, yet there remain noteworthy problems such as inconsistent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insufficient empirical research. Accordingly, the future direction should be to improve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s, so as to truly promote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this field.

Keywords: Physical Fitness; Children's Physical Fitness;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Health Promotion

音乐教师课堂中的多重角色建构

陈雨凡

(湖北师范大学, 湖北 黄石 435000)

摘要: 角色理论是社会学中用来解释个体在社会中如何扮演和理解各种社会角色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认为, 社会生活可以被看作是个体在不同场合下根据既定规范扮演不同角色的过程。角色理论对于理解个体如何在社会中与他人互动、如何理解自己的社会身份以及如何处理社会期望提供了重要的视角。本文基于社会学中的角色理论, 利用伪装者、拾荒者、旁观者三种角色扮演及其背后的理论逻辑, 为音乐教师在课堂中提供角色定位帮助, 更好的理解师生之间的相互作用。

关键词: 角色理论; 音乐教师角色建构; 多重角色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404

一、问题的提出

一个人对自我行为和地位的理解确实总是建立在对他人行为和地位的理解之上, 因为角色认知总是以对应的另一角色的认知为基础的。这种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关系在社会组织活动中是普遍存在的。

例如, 在医患关系中, 患者需要理解医生的角色和职责, 同时医生也需要向患者提供清晰、准确的信息, 帮助患者理解疾病和治疗的过程。这表明在医患关系中, 双方都需要通过沟通来加深对方立场的理解, 从而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在师生关系中, 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也是基于彼此的角色认知。教师需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和需求, 而学生则需要理解教师的教学意图和方法。这种相互理解和尊重是建立和谐师生关系的关键。母子关系中, 母亲的角色扮演对孩子的影响尤为重要。精神分析学说强调了母子关系的重要性, 认为母亲在情感方面的作用对孩子的成长发育至关重要。因此, 母亲需要理解自己的角色, 并通过有效的沟通与孩子建立良好的关系。

综上所述, 无论是医患关系、师生关系还是母子关系, 角色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都是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只有在与他者的关系中, 才能明确自己的立场并加深对对方立场的理解。

最先把角色概念引进社会心理学的是 G.H.米德²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中, 他对角色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定义。他特别关注于个体心理对社会群体的依赖, 以及如何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来塑造自我, 将角色定义为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反映社会期望和行为标准的身份标识。

R.林顿³在 1936 年的角色理论研究中, 具体定义和区分了“角色”与“地位”。提供了直接证据。林顿认为角色可以定义为在任何特定场合作为文化构成部分提供给行为者的一组规范。又将地位概括为“权利与义务的一种简单集合”, 将角色界定为地位的外在表现。这表明角色是地位的具体化, 是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行为规范体系的一部分, 个人接受和遵循这些规范。

对于特纳⁴来说, 角色理解就是角色建构。基于上述理论, 由于音乐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时刻要根据学习内容变化性, 在讨论教师多重角色问题上, 角色建构与角色过程这一概念的启发在于: 第一, 角色建构论强调社会关系, 社会角色是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概念, 反映了社会对个体的期望和规范, 对社会稳定和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教师作为社会运行中重要的知识传播者, 少不了他者对教师的期望和规范, 基于这种无形的期望, 教师对

作者简介: 陈雨凡(2000-), 女, 硕士在读, 研究方向为研究方向音乐教育。

² Mead, G. H. Mind, self and societ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³ Linton, R, The Study of Man[M].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1936: 113 - 114.

⁴ Linton, R, The Study of Man[M].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1936: 113 - 114.

自我角色的定位和要求是否能做到一致?第二,教师进行课堂教学是与学生信息交换以及场域互动的过程,而角色过程中的角色学习则提到一个人往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例如教师必须明确的知道教师的职责、地位和权力,同时还要学习管理班级课堂秩序的技能,懂得如何高效的传授知识点给学生,同时还要激发学生的审美能力、表达欲和创造能力,并注意从各种反馈信息中了解学生的反应,从而调整自己的角色行为。第三,基于22年颁布的新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的基础下,本文聚焦于音乐课堂中的教师,重点反思和研讨两个问题:音乐教师在不同课程任务的课堂中经常遇到哪些角色挑战?老师又该如何应对,理解和反思这些角色挑战?

二、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有学者⁵1994年在《教师课堂角色类型研究》中,通过求证我国教师课堂角色类型是否具有多变的现状,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小学教师的课堂行为进行研究,区分出了教师课堂角色的若干类型,最后得出结论表明教师职教的层次越高,课堂行为表现却更加单一,失去多样性。

近10年来,学界对教师课堂角色的关注日益增多,研究内容主要囊括了教师课堂角色、课堂角色重塑、音乐翻转课堂、角色转换、反思课堂教师角色这五种。其中教师课堂角色为主题的相关论文有105篇,课堂角色重塑7篇,音乐翻转课堂48篇,角色转换42篇,反思课堂教师角色9篇。

有关教师课堂角色的代表性研究有:杨传利、吕玉敏、青晨⁶,他们在戏剧教学的课堂中把教师课堂角色分为三个角色,分别是课堂环境的营造者、课堂活动的推动者以及课堂学习的互动者,提倡在实际教学活动中,教师应该转变观念,以一个“引导者”和“启发者”的身份带领学生探究精彩的戏剧教学。吴力⁷以“兴观群怨”从诗教观点出发,对目前音乐教学现状进行分析,以激活能力、涵养情感、梳理联系、帮助建构四个方面来阐述课堂中音乐教师应该怎样进行角色定位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

翻转课堂为主题的相关论文中离不开师生角色互换的讨论两者相辅相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费晓蕾⁸,将课堂话语权作为切入点,进行翻转课堂师生角色转换的分析,认为话语权是课堂教学中师生关系的一种直接体现,通过翻转课堂教师和学生话语权利的流动,来实现翻转课堂师生角色的转换。她⁹还借用福柯理论对翻转课堂进行讨论,把教师在教室中的行为分为三种:教师在空间权利上的转换、教师在规范化裁决上的转换、以及教师在检查方面的角色转换,认为将教师部分的权利转移和流动给学生更符合福柯的权利理论,能更好的起到规训学生的效果。

角色转换的研究中,学者李中国¹⁰在2008年提出:学校要尊重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做出重要决策的权利,在课堂教学中为教师提供条件,给教师充分对整个教学的控制权,才能有利于教师课堂角色转换的开展。另有学者吴忠才¹¹于2010年详细分析了刚进入职场的新教师会因为环境和身份的变动做出角色转换的行为,基于这种行为会产生的角色冲突,做出有效的心理预设,为新教师转换后的身份提供合适的建议。

有关课堂角色重塑的论文相对较少,学者杨雅茗¹²以宏观的角度分析教师在艺术教育改革中的角色重塑,认为教师角色重塑须适应艺术教育改革,教师需要采取一系列策略来提升自身的知识和技能作为角色重塑的基础,为角色重塑提供具体的路径方法。

在反思课堂教师角色的相关主题当中,陈梦婷、丰玉芳¹³利用产出导向法的教学流程,以驱动、促成和评价三个环节和“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原则,从更新教育教学理念、构建师生合作关系及教师自我反思与学习三个方面,为教师角色提供合理的参考。郑小华¹⁴则呼吁新时代的小学音乐教师应该积极尝试转换课堂角色,通过

⁵ 吴康宁,程晓樵,吴永军,等. 教师课堂角色类型研究 [J]. 教育研究与实验, 1994, (04): 166-170.

⁶ 杨传利,吕玉敏,青晨. 从希斯考特的“教师入戏”反思教师课堂教学角色 [J]. 基础教育研究, 2021, (17): 30-33.

⁷ 吴立. 从“兴观群怨”谈中小学音乐教师课堂角色定位 [J]. 中国音乐教育, 2023, (04): 15-20.

⁸ 费晓蕾. 基于课堂话语权的翻转课堂师生角色转换 [J]. 林区教学, 2020, (04): 56-58.

⁹ 费晓蕾.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教师课堂角色转换研究——基于福柯微观权力理论 [J].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9, (03): 46-48+54.

¹⁰ 李中国. 教师角色转换中内涵性特征的缺失与补救 [J]. 教育研究, 2008, (06): 91-94.

¹¹ 吴忠才. 试论新教师角色转换中的问题和方向 [J]. 中国成人教育, 2010, (05): 76-77.

¹² 杨雅茗. 教师在艺术教育改革中的角色重塑 [J]. 区域文化艺术研究, 2025, (01): 53-59.

¹³ 陈梦婷,丰玉芳. “产出导向法”模式下教师课堂角色转变研究 [J]. 英语广场, 2021, (19): 80-83.

¹⁴ 郑小华. 刍议新时代小学音乐教师的课堂角色转换——奥尔夫教育思想的运用探究 [J]. 福建教育学院学报, 2021, 22 (06): 93-94+106.

学习借鉴奥尔夫教育思想,根据音乐学科的艺术特点、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学生的音乐听觉感受与情感共鸣,优化音乐课堂设计做好课堂主持,积极鼓励师生之间的协作参与,让音乐课的全部活动真正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

基于上述文献的梳理,学者们对如何做出角色定位,为什么要进行角色变换,怎么样发展角色重塑都给予了不同的理论视角和丰富的实践基础,但是大多数研究者做的是宏观研究,主要针对某种学科、某个年级、某理论视角、某种教育思想、以及教学流程来分析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角色变化,从而讨论教师角色定位以及转换,尚未作出结合艺术课标中不同学段的音乐教学中教师应该做出怎样的角色调整。本文以2022年艺术课标颁布为基础,运用中观的视角,分析音乐教师在的课堂中经常遇到怎样的角色挑战,教师又该如何应对、理解和反思这些角色挑战,从而运用恰当的角色与学生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提高教学质量。

三、音乐教师课堂中的角色建构与多重角色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的资料有两个来源:其一是通过文献研究分类整理,紧跟本领域的研究进展,围绕主题进行深入思考,提出论点,为本研究实施奠定坚实的基础。其二通过理论分析法,本文应用到的理论有角色理论,通过理论知识结合教师课堂教学实际情况,整理出一套符合目前教学发展的音乐教师多重角色的优化策略。

(一) 角色“伪装者”:他人期待与自我呈现

角色期待¹⁵的产生过程通常包括三个阶段:社会和他人的角色的期待、个人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认知、通过具体的角色规范实现角色期待和角色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期望效应尤为显著。教师的期望、期待、热情关注等行为可以对学生心理及行为产生正面的、积极的影响效应。这种效应被称为“罗森塔尔效应”,即教师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期望对教学效果、学生发展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

基于上述理论,作者认为,教师在进入音乐课堂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可能不是观察学生,而是被学生观察。教师应该呈现什么样的形象和状态来满足自己和学生的期望?如果这两个期望不一致怎么办?这可能是所有进入学校任教的教师都必须考虑和处理的问题。

例如,笔者在读研期间去一所初中进行七年级音乐老师实习,穿的就如同在校大学生一样“松弛”,在进校门门前便被学校的门卫拦住。在和负责老师电话确认有这样一个访客后,门卫仍问了一句“你是哪个学校的?来实习的?”当笔者说明自己是来任课时,门卫仍坚持自己对松弛打扮的“学生”的判断,“哦,来实习的?”在这个事例当中,很显然笔者当天的衣着打扮不符合门卫对“初中老师”形象的想象和期待。笔者的衣着打扮显然不符合门卫对“初中老师”形象的想象和期待。

因此,在实习期间所遇到的情况可以理解为门卫基于传统观念和现行的教师着装规范,对教师形象有较高的期待。而笔者当天的衣着打扮显然未能达到这种预期,导致了误解的发生。为了更好地适应这一角色,笔者应当在未来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遵循相关的职业规范,以树立起更加专业的教师形象。

其次我是以一名实习老师身份进入课堂的,可能因为我说我是“实习的”,所以负责的指导老师对我的“培养方式”也相应的就是教学实践方向。而课堂中的初中生对于实习老师的角色想象就是品学兼优的研究生,并且期待幻想大学生活。笔者身处不同的角色期待中,如何正确把握角色定位呢,在有指导教师出现的场合,笔者会呈现“好学生”的形象,而在与学生私下接触时,适当的自我暴露却能够拉近与学生的距离,课堂上调动与教师互动的积极性。

无论是自我呈现的角色是否符合他者的期待,某种意义上都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异样关系的反映,这些关系需要教师不断的重构自我,“伪装”和调整的过程不仅仅是为了“适应”融入学校、融入课堂,还是为了在自我与他者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

(二) “拾荒者”:信息交换与互惠边界

音乐教师在课堂中的首要任务是与学生进行信息互换。有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是老师如同“拾荒者”,

¹⁵ A. J. L. Review: Role Theory; Concepts and Research [J]. Practical Anthropology, 1968, os-15 (6): 283-285.

在日常课堂教学中的千头万绪中“淘宝”，至于“淘”什么（学生感兴趣的音乐）如何“提炼”（教学方法），如何“鉴宝”把学生感兴趣的音乐。变成与课程目的相关的音乐，如何“垃圾分类”（信息分析），如何“变废为宝”（教学目标）则因人而异，由音乐教师设置的学习内容不同而不同。

在拾荒的过程中，拾荒者需要自己去发现和挑拣，而不是由学生按照自己提前设想的老师上的这节课的学习内容，提前对“垃圾”进行分类，并且按照“垃圾”的分类和理解中的情况给老师反映某一类垃圾。在信息互换方面，一些中小学生在课堂中很熟悉信息交换的套路，也因此很多时候实际上会对于课堂教学进行干扰。

例如在课堂上，老师对学生进行提问，而学生尽可能的会给予老师，回答出一些老师想要的答案。在老师问问题的时候，他们甚至内心在想“老师想要问出什么”，或者“标准答案应该是这样的”。这些问题的背后逻辑可能是学生把老师想象成了一个需要合谋合演一出戏的对象。也正因为学生的努力和积极配合，反而影响了课堂创新，影响了探索式的发展，这种拾荒过程就变成了一个定时定点的“收废品”。

笔者在上半年的时候参加初中音乐课堂实习老师，在上课期间经常对学生进行提问互动，收集学生学情资料。比如学唱课的环节，课程导入听完歌曲之后，问：“听完这首歌曲同学们有什么感受，这首曲子的情绪是怎样的？”学生回答的答案几乎完全一致，没有个人的想象和理解，仿佛是被标准答案入侵了一般。上完一堂课，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欠缺了些许热情，“感觉学生和老师的互动就是为了完成任务”。

上述的案例之前部分证明了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信息交换有时候并不是真实有效。这种貌似“正确且顺利”的信息收集实际上是老师与学生之间缺少了基础的信任。

（三）“旁观者”：干预困境与立场选择

基于学校情境的特殊性音乐教师往往面临的学生大多是未成年人，这就使得课堂教学具有特殊的伦理困境。成年人的知识储备是远远高于未成年人，所以很多音乐教师默认课堂中自己处于主导地位，学生处于被主导地位。那么在学生进行创编和展示环节时，作为成年人的教师是否要干预？这就涉及到了另一个角色“旁观者”。

在进行创编和展示环节时，音乐教师需要观察每个小组的创作过程，并评估每个孩子的贡献。这不仅有助于了解学生的创作过程，还能平衡小组成员之间的贡献，确保每个孩子都有重要的任务。通过观察音乐教师可以及时发现学生在创作中的问题，并给予适当的指导和帮助。例如，在小组合作学习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即兴表演和演出，将任务分解成更易于管理的部分，并选择一个“指挥”来为每个小组提供节奏。这样的组织和指导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完成创作任务。

在完成作品后，安排学生互相讨论他们的作品，并写下对自身贡献和团体音乐效果的评价。这些反馈可以为教师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帮助教师了解学生的创作过程，并在听完学生的最终作品后，教师可以提出一些问题，例如：作品是否有特定的目的？是否达到了目的？长度是否合适？表演是否听起来随意或有组织？音乐中是否有对比的声音或重复的部分？使用了多少种乐器或特定的技巧吗？孩子们能否再次演奏他们的作品，听起来是否相似？孩子们如何计划和组织他们的作品？他们对自己和同学对作品的反应如何？

教师应根据学生的不同需求和能力进行个性化指导。例如，在小组合作学习中，可以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想法，并通过模糊的词语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在指导过程中，应尽量避免直接干预学生的身体控制，而是通过鼓励独立表演和提供具体的表达方向来引导学生，做到“旁观者”的样子。在小组活动和创编展示环节结束后，组织学生进行总结和反思。通过反思，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创作过程和成果，并在下一次活动中进行改进。

在音乐教学中，教师的角色和学生的主体地位是相互依存且需要平衡的。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教师在音乐教学中通常扮演主导角色，但这种主导并不意味着完全的控制和干预，而是更多地体现在引导和促进学生主动学习上。

四、总结

本文分析了以学校为主要实践地点的音乐教师的三种角色形象建构以及关于多重角色的讨论。本文认为，音乐教师实践中的角色转换既需要重视其合理性，还要关注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多样性。合理性受到教材编配以及教学内容的影响，而实践中的多样性则受到教师本人，学生基本学情，社会环境等更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在

课堂教学的诸多“角色构建”时刻，音乐教师不仅在按照所谓的角色规范“演绎”一节音乐课应该有的样子，还在不断灵活应对“多重角色”挑战过程中作为不同角色教师的自我。

参考文献：

- [1]Mead, G. H. Mind, self and societ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 [2]Linton, R, The Study of Man[M]. New York: Appleton -Century, 1936: 113 - 114.
- [3]Biddle & Thomas, Role Theory: Concepts and Research[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66.
- [4]A. J L . Review: Role Theory; Concepts and Research [J]. Practical Anthropology, 1968, os-15 (6): 283-285.
- [5]陈美楠.角色理论视角下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其根源研究——以 L 市 L 小区为例[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9(03):114-127.
- [6]王肖星.我国乡村教师职业认同的现实困境及其突破[J].教学与管理,2020,(24):50-53.
- [7]靖东阁.角色距离:中小学教师角色转换之困[J].教学与管理,2011,(34):19-21.
- [8]吴忠才.试论新教师角色转换中的问题和方向[J].中国成人教育,2010,(05):76-77.
- [9]李中国.教师角色转换中内涵性特征的缺失与补救[J].教育研究,2008,(06):91-94.
- [10]董轩,许李萌. 教育民族志研究者的角色隐喻与伦理考量 [J]. 全球教育展望, 2020, (11): 73-83.
- [11]费晓蕾.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教师课堂角色转换研究——基于福柯微观权力理论 [J].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9, (03): 46-48+54.
- [12]杨雅茗. 教师在艺术教育改革中的角色重塑[J].区域文化艺术研究,2025,(01):53-59.
- [13]陈梦婷,丰玉芳. “产出导向法”模式下教师课堂角色转变研究 [J]. 英语广场, 2021, (19): 80-83.
- [14]郑小华.刍议新时代小学音乐教师的课堂角色转换 ——奥尔夫教育思想的运用探究.[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 2021, 22 (06) : 93-94+106.
- [15]吴康宁,程晓樵,吴永军,等. 教师课堂角色类型研究 [J]. 教育研究与实验, 1994, (04): 166-170.
- [16]杨传利,吕玉敏,青晨. 从希斯考特的“教师入戏”反思教师课堂教学角色 [J]. 基础教育研究, 2021, (17): 30-33.
- [17]吴立. 从“兴观群怨”谈中小学音乐教师课堂角色定位 [J]. 中国音乐教育, 2023, (04): 15-20.
- [18]费晓蕾. 基于课堂话语权的翻转课堂师生角色转换 [J]. 林区教学, 2020, (04): 56-58.

Multiple Role Construction of Music Teachers in the Classroom

Chen Yufan

Hu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ngshi, Hubei, China

Abstract: Role theory is a sociological framework that explains how individuals enact and comprehend various social roles within society. This theory posits that social life can be viewed as a process in which individuals perform different roles according to established norms in diverse contexts. It provides a significant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how individuals interact with others, interpret their own social identities, and navigate social expectations. Based on sociological role theory, this paper employs the three role-playing categories of impersonator, scavenger, and spectator, along with their underlying theoretical logic, to assist music teachers in positioning their roles within the classroom and to foste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s.

Keywords: role theory; music teacher role construction; multiple roles

高校篮球专项身体素质训练现状与提升对策研究 ——以兰州大学为例

李政霖

(成都大学体育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要: 篮球运动作为一项国际化的体育运动项目。不仅具有很高的竞技性, 深受广大青年人的喜爱, 同时也具有较强的娱乐性, 三五成群, 在球场上酣畅淋漓的打一场球赛, 不仅能够促进相互沟通交流, 同时也能够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篮球队是大学的重要体育组织, 通过篮球训练提高当代大学生的身体素质, 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 促进大学生身心全面发展。本次研究主要以兰州大学的篮球队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球员的身体素质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分析, 全面了解篮球队的身体素质训练现状, 并针对实际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为高校篮球专项生身体素质训练提供技术参考, 进一步提高篮球队的身体素质训练水平。

关键词: 高校篮球; 身体素质训练; 大学生; 对策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407

引言

篮球运动在我国经过长时间的发展, 已经初步形成了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另外现代篮球赛以美国 NBA 为代表的职业, 篮球的不断推动之下, 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竞技篮球运动的影响能力不断提升, 影响范围不断扩展。现代篮球运动对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尤其是对身体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在竞技赛场当中, 面对激烈的对抗和较强攻防转换, 需要篮球运动员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从现阶段的篮球运动开展情况来看, 不管是职业运动还是业余运动, 都具有节奏较快运动负荷量较大的特点, 对参与人员的身体素质、速度、耐力和灵活性都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1]。近年来, 篮球运动在当代大学体系当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 所推行的大学篮球联赛有效推动了篮球运动在高校领域的发展。但从联赛的开展情况来看, 普遍存在着学生身体素质较差, 身体素质不足的现象, 对抗能明显不足, 这反映出了当代学生篮球运动员身体素质训练不足的缺陷^[2]。因此就需要我们通过运用运动学训练学、生理学等科学知识, 进一步研究大学篮球队队员身体素质训练的现状, 以期今后的身体素质提升提供技术参考。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主要以兰州大学男子篮球队的教练员 5 名和 20 名运动员为研究对象。

(二)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采用了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和数理统计, 围绕兰州大学男子篮球队身体素质训练情况开展研究, 通过对身体素质开展情况进行调查, 全面掌握该校篮球对身体素质训练存在的问题, 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建议, 以此来提升整个篮球队的训练水平。

1. 文献资料法

根据选题需要在图书馆和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检索平台上检索有关身体素质训练和篮球身体素质训练方面的文献资源, 为本次研究奠定坚实的数据支撑。

2. 访谈法

按照列举好的访谈提纲, 分别对该校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开展一对一的访谈, 初步了解身体素质训练的基本情

作者简介: 李政霖 (1998-)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运动训练。

况。

3. 数理统计法

分别按照《大学生男子篮球运动员专项身体素质评价方法和评价标准研究》、《大学生女子篮球运动员专教素质评价方法的研究》、《青年男子篮球运动员身体素质和基本技术评价标准以及计算机评价系统研究》等文献为研究依据,制定身体素质检测检验表。从半场三角跑、助跑单脚起跳摸高、原地双脚弹跳摸高、一分钟仰卧起坐、半距折返跑、3200m 计时跑等几个层面开展测试,分别设置了非常适合、比较适合、一般适合、不适合几个标准,获得运动员的有效数据,并对各个数据进行数据统计整理,制作成表格和图像。

二、结果分析

(一) 兰州大学男子篮球队员身体形态分析

表 1 兰州大学男子篮球队身体形态分析

/	/cm	/kg
20.69±1.88	191.93±5.67	86.99±9.16

身体形态是指个体外在的特征,它反映出人的生长发育程度,由此可以判定一名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和竞技水平,在进行身体素质训练过程中,身体指标是运动员选拔过程中需要重点参考的标准,这也是一名优秀运动员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从表 1 数据能够看出,本次研究所涉及到的 20 名大学生的年龄在 20.69 周岁,平均身高在 191.93cm,平均体重在 86.9kg。详细情况如表 1 所示。

(二) 兰州大学男子篮球队身体素质测定指标与测试方法

本次研究所设计的身体素质测定指标和测定方法,主要是在相关文献的支撑之下经过专家的效度检验,获得通过之后进行的。在测定过程中涉及到的内容主要包括了半场三角跑、单脚助跑起跳摸高、原地双脚起跳摸高、一分钟仰卧起坐、变距折返跑和 3200m 跑。上述几种身体素质测试指标和测试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半场三角跑

该种测试方法主要是在篮球场的标准场地当中进行,测试的运动员需要在端线以外起跑点准备起跑,当听到起跑信号之后,由起跑点沿着篮球线对角起跑,呈现三角形。在起跑过程中要求运动员始终保持站立姿势,在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处均应该触碰到设置的标点。单项测试内容,主要是为了测定篮球运动员的反应速度、移动速度以及动作敏捷、移动变化频率、身体灵敏情况^[3]。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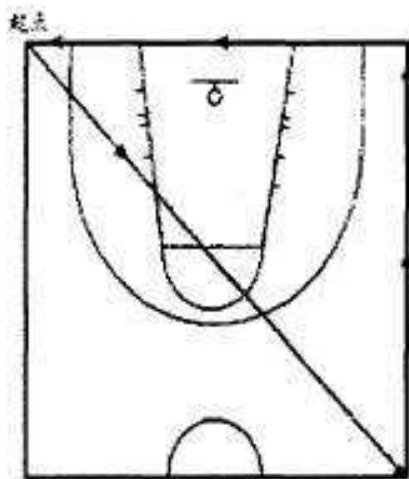


图 1 半场三角跑示意图

2. 单脚助跑起跳摸高

该项测试内容主要是设置 4~5m 的加速助跑距离,并达到助跑距离之后,在篮板处单脚起跳,当身体腾空到最高点时,用手指触摸篮板,测量运动员手指到地面的高度,然后计算出运动员原地弹跳的高度,测定过程中,每个运动员有两次尝试的机会,取两次测定的最佳成绩。

3. 一分钟仰卧起坐

一分钟仰卧起坐测就是要求运动员完成屈腿仰卧起坐,并在规定时间内计算完成标准仰卧起坐的个数。在测定过程中要求运动员在动作下放过程中肩部和背部保持水平状态,与地面紧贴,每一次起来时都应该确保主光洁,触碰到大腿。单项测定方法主要是为了测试运动员的腰肌耐力。因为在运动行进过程中,躯干的平衡性主要是依靠腰腹部的肌肉来维持。

4.变距离折返跑

测定过程中要求测试的篮球运动员在标准的篮球场地当中进行,测试的运动员应该按照特定的要求站在起跑线,然后按照起跑路线和相应的顺序,完成4次距离不同的折返跑。如图1所示。在整个测定过程中,每一名运动员只需要测定三组,组间休息时间控制在30s钟。变距离折返跑能够进一步测定运动员的耐力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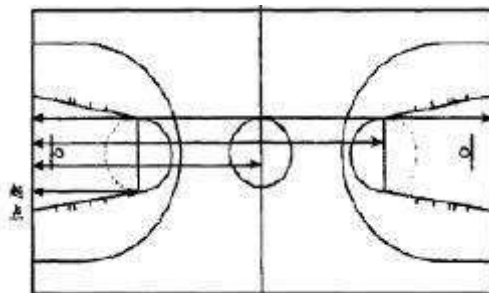


图2 变距离折返跑路线

5.3200m 长距离跑

该项测定内容,主要是在标准的田径场当中进行要求,运动员围绕田径场跑8圈,共计3200m。3200m的长跑距离,指标确定主要是因为一名篮球运动员在一场比赛过程中平均的行进距离,在3200m左右,通过进行长跑能够进一步观察运动员的耐力速度,同时也对运动员的无氧能力有着很高的要求^[4]。

(三) 兰州大学男子篮球队身体素质测定结果分析

表2 兰州大学男子篮球队身体素质测定结果分析

/s	10.41	9.00	9.65
/cm	86	66	77.38
/cm	81	57	69.38
/	72	50	56.58
/s	95.79	85.30	91.48
3200m /min	13.55	12.23	12.76

根据表2数据能够看出本次研究所涉及到的20名篮球运动员的成绩评价情况。其中半场三角跑的平均值在9.65s,综合评分为61分,20名篮球运动员的该项指标呈现中等以上水平,其中最好成绩为9.00s,最差成绩为10.41s。从标准查数据分析来看,运动员的半场三角跑的测试成绩离散度不高,队员之间的成绩相差不大。从全队的助跑单脚起跳摸高指标测定结果来看,平均值为77.38cm,对应的评分值为50分,整个队伍呈现中等水平,最好成绩为86cm,最差成绩为66cm。运动员的原地双脚踢跳摸高测试指标当中,平均成绩为69.38cm,对应的评分指标为32分,处于中等水平以下,其中最好成绩为81cm,最差成绩为57cm,队员之间所得到的数据标准差的离散度相对较大,这反映出在研究的20名运动员群体当中,原地双脚起跳素质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而一分钟仰卧起坐的平均成绩为56.58个,其中最好的是72个,最差的是50个,评分为55分,队员之间的标准差离散度相对较高,这反映出不同队员之间的腰腹力量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队员折返跑的平均时间为91.48s,最佳的

是 85.30s, 最差的是 95.79s, 评分为 82 分, 评分标准处于中上等水平, 但是数据标准差反映出测定的数据存在较大的离散度, 队员之间的变速跑速值存在一定差异。3200m 跑的测定指标中, 平均时间为 12.76min, 最短的为 10.23min, 最长的为 13.55min, 评分为 55 分, 指标评价为中等水平队员之间的标准差, 离散度不高, 反映出扬州的 20 名运动员 3200m 的耐力跑差异性不大, 能够发现助跑单脚起跳成绩、双脚原地起跳成绩和一分钟仰卧起坐成绩三个指标之间的差异性明显, 这说明了各个相关项目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 相互促进的情况。

(四) 教练员和运动员对身体素质训练满意度的分析

表 3 教练员和运动员对身体素质训练满意度的分析[n (%)]

0	0.00	0	0.00	2	40.00	3	60.00	0	0.00
10	50.00	6	30.00	3	15.00	1	5.00	0	0.00

从表 2 和图 3 数据当中能够看出, 5 名教练员和 20 名篮球运动员, 教练员中有 3 名认为基本满意, 7 名认为不太满意。运动员中有 10 名非常满意, 6 名很满意, 3 名基本满意, 1 名不太满意。根据上述结果能够看出教练员对于篮球运动员的身体素质训练水平不是太满意, 但是从运动员角度来考虑, 大部分运动员对教练员所制定的训练计划以及身体素质训练效果是认可的, 认为自己的身体素质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详细情况如表 2 和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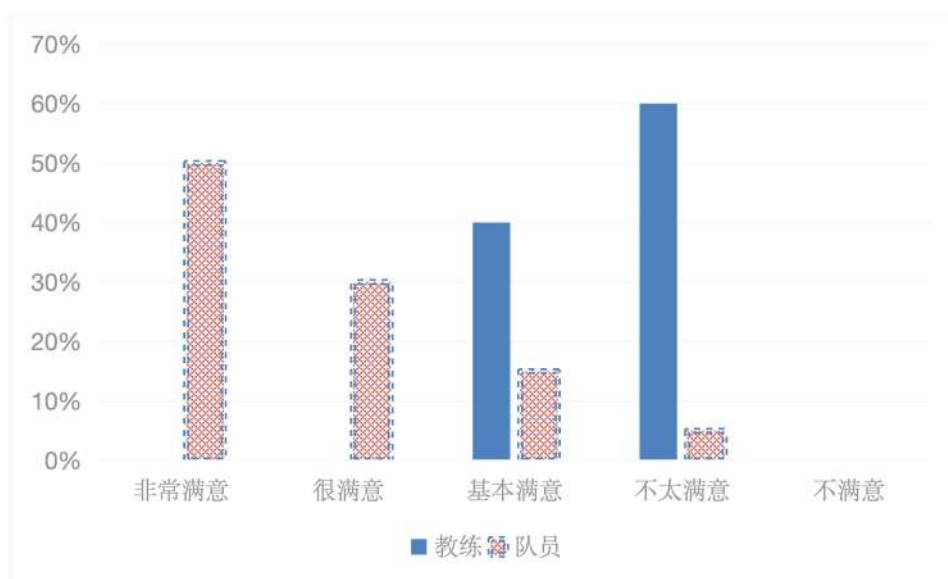


图 3 教练员和运动员对身体素质训练满意率

(五) 篮球运动员对身体素质训练中负荷的主观适应能力

表 4 篮球运动员对身体素质训练中负荷的主观适应能力

/	4	5	7	3	1
/%	20.00	40.00	35.00	15.00	5.00

篮球运动在日常训练过程中, 通过体育运动员一定强度的训练负荷之后, 运动员通过一定的适应恢复阶段之后, 身体素质水平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但是不同运动员的身体情况存在很大差异, 当受到强负荷刺激之后, 所表现出来的训练效果也是不相同的。根据表 3 数据能够看出当前 20 名运动员对身体素质训练中负荷强度的适

应性存在一定差异性。现阶段教练所制定的训练程度,对于队员的自我完全适应能力和很适应性的成员来说刺激不足,这对提升自身的身体素质水平会产生一定影响,而对于那些自我适应能力较差或者一点不适应的运动员来说,如果强加负荷往往会面临较大的疲劳,甚至会引发一系列的伤病,威胁到成员的身体健康。

(六) 兰州大学男子篮球队身体素质训练存在的问题与提升对策

1. 兰州大学男子篮球队身体素质训练存在的问题

身体素质训练过程控制不到位

篮球运动员在身体素质训练过程中影响到整体训练效果的主要包括了两方面原因,一个是运动员自身的遗传特征。良好的遗传特征,能够为运动员更好的适应高强度的身体素质训练奠定精神基础。另一方面就是后天的训练,如果能够进行科学有效的后天训练,能够更好的提高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水平。在进行身体素质训练过程中,训练效果是运动员遗传因素和后天训练相结合的结果。因此在身体素质训练过程中,只有制定科学长期有效的训练计划,并对身体素质训练的整个过程进行有效的监控,才能够形成良好的训练成效。但从本次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教练员在进行篮球运动员身体素质训练过程中,对身体素质训练过程的控制还不是很到位。在进行阶段性的身体素质效果评价过程中,没有充分的掌握相应的反馈信息,造成了身体素质训练过程中存在问题。

运动员在身体素质训练的认知有待进一步提升

身体素质训练过程中训练成效往往是运动员的参与态度有着很大的联系,通过调查能够看出很多运动员往往是被动参与到身体素质训练当中,主动参与身体素质训练的积极性不强。由于参与较为被动,影响到球员的整体训练效果。

学校教练人员配置不足缺乏专门的身体素质训练教练

通过对兰州大学从事篮球教学的训练员进行进一步调查能够发现,训练人员配置严重不足,总共有 10 名训练人员,并且缺乏从事专门身体素质训练的教练,人员严重不足。由于人才供给不足,缺乏专门的身体素质训练,造成了篮球队的身体素质训练把握不够细致,教练人员的工作精力不足,无法对每一名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健康情况进行全面的掌握,最终造成各种问题出现,影响到身体素质训练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2. 兰州大学男子篮球队身体素质训练对策

加强身体素质训练过程控制

在今后的身体素质训练控制过程中,一方面应该从时间角度入手,另一方面还应该从身体素质训练的目标角度出发。具体训练时要构建完善的身体素质训练目标体系,从横向角度出发,确保各个要素都确定相应的训练目标,并在确定各个训练目标的情况下,要制定不同的训练计划。同时还应该将身体素质训练过程监控和身体素质训练效果评价纳入到整个训练计划当中,将运动员的身体检查、身体素质测试、训练结果测试列为训练计划的重要任务去抓,为每一名篮球运动员建立身体素质训练监控档案。

提高对身体素质训练的重视程度

对于普通大学的篮球队来说,训练工作并不只是简单地掌握篮球的技巧,涉及到的内容多种多样,包括了技战术提升、体能、身体专项素质,所以篮球训练是一个十分系统且综合性的工作,在实际训练过程中,应该将技术和身体素质训练充分融入其中,将两者兼顾,促进大学生篮球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全面发展^[5]。因此在今后的身体素质训练过程中,应该加强对运动员身体素质训练重要性和必要性的主观认知,培养要确保运动员能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每一个身体素质训练环节当中,只有运动员能够切实重视身体素质训练,才能够提升整体的训练效果。在具体的训练过程中,应该确保运动员能够从思想、健康、准备活动、自我恢复等四个方面入手,严格自我控制。

加大师资队伍建设

要想提升综合素质,就要求学校和教师共同作出努力。教师和教练是篮球队身体素质训练的组织和实施者,所以教师对篮球身体素质训练的认知十分重要。作为篮球队的教练人员和教师人员,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学校也需要加强对篮球训练队伍的有效建设,通过各种途径来提升教练和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6]。例如可以安排篮球教师教练去省级或者国家队的篮球训练基地开展学习,革新专业知识和专业理念,加强对身体素质训练的认知。另外教师在日常工作队伍当中也需要不断加强学习,重点加强身体素质科学训练篮球科学训练方面的专业知识学习,积极参与关于篮球身体素质训练的相关培训和专业考试,取得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提升整个篮球教练队伍,教师队伍的专业素质,从而为实施身体素质训练奠定坚实的教师队伍支撑。

结论

通过本次研究能够看出兰州大学男子篮球队队员的平均年龄相对较小,而年轻运动员参加高水平的比赛机会

不足,整个队员的身体条件虽然较好,但整体体重较轻,身体偏瘦,这在对抗激烈的篮球运动中会处于劣势^{[7][8]}。通过对运动员的身体各项指标进行测定,能够发现20名男足运动员的半场三脚跑、助跑、单脚起跳、原地双脚起跳、一分钟仰卧起坐、折返跑和3200m跑步的测试平均成绩均处于中等以上水平,某些指标的测试数据之间的离散度相对较大,个体差异较大。

通过对教练员和运动员进行实际的访谈,能够得出教练员对身体素质训练的满意度不是很高,并且在身体素质训练计划安排过程中,对于球员个体之间的差异性重视不足。运动员对身体素质训练的负荷适应能力也存在较大差异性,需要对身体素质训练计划做出进一步的调整,提升训练效果。

今后男子篮球对身体素质训练过程中构建完善的训练机制,通过定期对运动员的身体指标进行有效的测量检查,定期开展身体素质测试,拓展训练课程,及时掌握训练反馈,并为每一名运动员构建针对性的能训练监控档案。

在实际训练过程中,应该注重加强运动员身体素质训练的思想、自我健康训练、前后准备、自我恢复等方面的重视程度^{[9][10]},着重培养篮球队队伍的意志品质,确保运动员能够以更加高昂的态度,攻克枯燥乏味的训练,从而提升最佳训练效果。

在今后身体素质训练过程中,应该进一步完善人员配置,增加专门的身体素质训练师,并与教练一起共同制定详细的身体素质训练计划,对训练方法训练内容作出进一步的拓展,要重视球员之间的身体差异,保证每一名成员都能够通过有效的身体素质训练提升身体素质。

参考文献:

- [1] 冯俊鹏,严翊.国内外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现状分析——基于2018年《全球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报告》[J].中国运动医学杂志,2019,0(12):1094-1100.
- [2] 吴艳艳,江立航.优秀女子短距离仰泳运动员江立航全程性多年训练回顾[J].运动精品,2020(3):79-80.
- [3] 梁微.试论核心力量训练对高职大学生身体素质的影响[J].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20(2):79-81.
- [4] 赵凡,黄涛.对地方本科院校篮球主修学生身功能性筛查与矫正的研究[J].体育世界:学术版,2019,0(10):176-179.
- [5] 解光明.论篮球运动员的力量训练[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2(S1):40-41.
- [6] 马行风.篮球运动员少儿时期弹跳力训练探讨[J].体育科技(广西),2003,0(4):15-18.
- [7] 马腾.青少年篮球运动员体能训练存在的问题研究[J].当代体育科技,2020,10(1):27-29.
- [8] 邓勇,高勇,郑力,刘天聪,等.中国篮球运动员的相对年龄效应[J].湖北体育科技,2020,39(1):47-52.
- [9] 李鑫.2016-2019年我国女子排球后备人才专项身体素质指标动态比较研究[J].青少年体育,2020(8):86-87.
- [10] 耿笑.青少年篮球运动员体能训练的重要性及其所存在的问题分析[J].文体用品与科技,2020(12):70-71.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of Physical Fitness Training for Basketball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 Case Study of Lanzhou University

Li Zhengli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of Chengdu University, Sichuan, Chengdu, China

Abstract: Basketball is an international sport. It is not only highly competitive and deeply loved by the majority of young people, but also has strong entertainment. In groups of three or five, playing a game on the court can not only promote mutual communication, but also enhance the physical quality of students. The basketball team is an important sports organization of the university. Through basketball training, it improves the physical quality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achieves the effect of physical fitness, and promotes the comprehensive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This research mainly takes the basketball team of Lanzhou Univers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careful and meticulous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physical quality of the players, we can fully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hysical quality training of the basketball team,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to the actual problems, so as to provide technical reference for the physical quality training of college basketball students. Examination, further improve the physical quality training level of the basketball team.

Keywords: College Basketball; Physical Fitness Training; College Students; Countermeasures

酒店业数字化转型下职教教师复合数字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基于 DigCompEdu 框架

张惠媛, 翁星佳

(苏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苏州 215200)

摘要: 酒店业数字化转型对职业教育教师团队的复合能力提出了新要求。本研究以欧盟 DigCompEdu 框架为理论基础, 通过对 228 名酒店专业职业院校教师的实证调研, 明确了教师团队复合能力的内涵结构、发展现状及其对学生学习成果的影响效应, 并据此构建了系统化的能力提升路径。研究发现: 教师复合数字能力可聚合为专业参与、数字资源、教学与学习、评估、赋能学习者、促进数字素养六个维度; 当前教师能力整体处于中等水平, 但“赋能学习者”等高阶维度存在明显短板; 同时教师复合能力对学生学习成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上述结论, 本研究从行业需求、技术融合、团队协作三个维度出发, 设计了“三维驱动、四级递进”的教师团队复合能力提升路径, 并配套提出制度、资源、评价三位一体的保障机制。

关键词: 酒店业数字化转型; 职业教育; 复合能力; DigCompEdu

基金项目: 全国酒店管理类专业职业教育教师创新团队协作共同体委托课题: 基于酒店业数字化转型的职业教育教师团队复合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409

一、绪论

酒店业数字化转型深化, 催生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刚需。云计算、大数据、AI、物联网深度渗透全产业链, 推动行业向数智化运营、服务与管理升级, 智能 PMS、OTA 运营、机器人服务、大数据收益管理等成为核心场景, 倒逼从业者具备数字化操作、跨场景应用、技术迭代适应与数字服务思维。职业教育作为人才培养主阵地, 需同步升级教学体系、师资能力与培养模式, 实现人才供给与行业需求精准对接。“十五五”期间, 国家以数字赋能为核心推进职教数字化转型。《“十五五”职业教育发展规划(2026—2030 年)》明确, 到 2030 年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达标率 100%、教师数字素养达标率 90%, 打造 100 个“人工智能 + 教育”示范项目、500 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教育部《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要求完善教师数字素养标准、推进全员培训与测评, 强化数字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酒店职教兼具行业实践性与技能性, 教师需具备“酒店数字化素养 + 数字技术教学融合 + 数字化团队协作”复合能力。当前教师数字能力培养多聚焦通用技术, 针对酒店业的行业专属复合能力体系尚未完善, 师资能力与行业人才需求的差距亟待弥合。

教师数字能力评估框架本土化适配不足, 酒店职教领域研究亟待突破。在教师数字能力评估与培养领域, 欧盟委员会 2018 年开发的 DigCompEdu 框架是国际上认可度较高、应用较广泛的系统性理论体系, 该框架将教师数字能力划分为专业参与、数字资源、教学与学习、评估、赋能学习者、促进学习者的数字能力六个核心维度, 为教师数字能力的测量与培养提供了标准化框架 (Li et al., 2026)。该框架已在欧洲、亚洲多个国家的教育领域得到验证与应用, 但针对中国职业教育背景的本土化适配研究仍较为有限, 鲜有研究将其应用于酒店业职业教育教师群体, 检验其在行业特色鲜明的职业教育场景下的有效性与适用性 (Wang & Chu, 2023)。从国内研究来看, 学者们虽已开展教师数字能力量表编制 (桑国元等, 2023)、二阶因子结构验证 (刘景超 & 郭丽君, 2022) 等相关研究, 为教师数字能力研究奠定了基础, 但针对酒店业职业教育教师团队复合数字能力的概念界定、结构验证及提升路径构建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 且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单一教师的数字能力, 忽视了酒店业数字化教学

作者简介: 张惠媛(1997-), 女,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银发经济、旅游危险感知。

通信作者: 翁星佳(1996-), 女, 硕士, 助教, 研究方向为酒店服务。

资源开发、课程设计等工作对教师团队协作的需求，难以满足酒店业数字化转型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双重需求。

结合酒店业数字化转型需求、国家职业教育政策要求与行业发展趋势，构建酒店业职业教育教师团队复合能力提升路径与实施策略。结合研究背景与研究内容，本研究提出以下四个核心研究问题：1.酒店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职业教育教师团队的数字能力现状如何？其复合能力需求呈现出哪些特征？2.DigCompEdu 框架所包含的专业参与、数字资源、教学与学习、评估、赋能学习者及促进数字素养六个维度，能否有效聚合为适用于酒店业职业教育教师的“复合数字能力”二阶核心构念？3.验证后的职业教育教师团队复合数字能力（二阶潜变量），对酒店专业学生的学习成果是否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其对学习成果变异的解释力如何？4.基于实证研究结论与酒店行业数字化转型要求，如何构建科学、可行的职业教育教师团队复合能力提升路径与保障机制？

二、数据收集及分析方法

本研究在明确核心变量界定、操作定义与研究假设的基础上，以欧盟 DigCompEdu 框架为理论支撑，标准化设计研究量表与调研问卷，通过科学的抽样与数据收集流程获取研究数据，并采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与检验，以此验证 DigCompEdu 框架在酒店业职业教育场景的适配性，探究教师复合数字能力对学生学习成果的影响效应，为后续研究结论推导与提升路径构建提供实证依据。

本研究以欧盟委员会开发的 DigCompEdu 框架为教师复合数字能力评估的核心理论基础，该框架是国际上认可度较高的教育者数字能力评估体系，将教师数字能力系统划分为专业参与（PE）、数字资源（DR）、教学与学习（TL）、评估（AS）、赋能学习者（EL）、促进学习者的数字能力（FC）六个核心维度，全面、多维度衡量教育者在数字化教学场景中的综合能力水平。调查对象为国内开设酒旅会展专业的职业院校在职教师，选取兼顾院校区域分布、办学层次与教师教龄、职称结构，以确保样本的代表性与数据的有效性。调研过程中采用线上问卷发放+线下实地调研、访谈的混合方式，于 2025.8.21~2025.10.12 间开展正式数据收集工作，全程严格遵循自愿参与、匿名作答、信息保密的原则，向被调查者明确调研目的、内容、数据使用规范及调研意义，最大限度保证调研数据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共发放问卷 250 份，回收问卷 235 份，问卷回收率为 94.00%；经后期数据清洗，剔除作答不完整、连续规律性作答、作答时间过短等无效问卷 7 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228 份，有效回收率为 91.2%，符合社会科学研究中问卷有效回收率不低于 80%的标准。能够充分满足后续描述性统计、信效度检验、相关性分析及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等统计分析要求。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本次描述性统计共对酒店业职业教育教师复合数字能力 6 个一阶维度、教师复合数字能力整体及学生学习成果展开分析，各维度题项数与研究量表题项设置保持一致。

表 1 教师复合数字能力与学习成果各维度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潜变量/维度	题项数	均值 (M)	标准差 (SD)	维度整体水平评价
专业参与 (PE)	8	3.85	0.62	中等偏上
数字资源 (DR)	4	3.91	0.58	中等偏上
教学与学习 (TL)	4	3.72	0.69	中等偏上
评估 (AS)	3	3.76	0.65	中等偏上
赋能学习者 (EL)	3	3.42	0.84	中等
促进数字素养 (FC)	6	3.48	0.81	中等
教师复合数字能力 (总)	28	3.7	0.64	中等偏上
学习成果 (LO)	3	3.88	0.6	中等偏上

注：本研究采用 5 点李克特计分法对各题项进行评分，1 = 完全不符合，2 = 不太符合，3 = 一般符合，4 = 比较符合，5 = 完全符合；维度整体水平判定标准为：均值≥3.7 为中等偏上，3.3~3.69 为中等，<3.3 为中等偏下；

教师复合数字能力整体均值为 3.70，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表明酒店业职业教育教师团队整体具备一定的复合数字能力；学生学习成果均值为 3.88，略高于教师复合数字能力整体水平，呈中等偏上态势。从教师复合数字能力各一阶维度来看，能力发展呈现明显的层级差异：基础应用类维度（专业参与、数字资源、教学与学习、评估）均值均≥3.72，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数字资源维度得分最高，表明教师在数字资源获取整合、专业

数字化交流、数字技术融入教学及数字化评估等基础应用层面能力相对扎实；高阶赋能类维度（赋能学习者、促进数字素养）均值处于 3.3~3.69 的中等区间，显著低于基础应用类维度，是教师复合数字能力发展的明显短板。从标准差来看，各维度标准差介于 0.58~0.84 之间，其中赋能学习者、促进数字素养标准差相对较高，表明研究对象在这两个高阶赋能维度上的能力水平差异较大；数字资源维度标准差最低（SD=0.58），表明教师在数字资源应用层面的能力水平相对均衡。

（二）测量模型信效度检验

教师数字能力的二阶因子结构测量模型检验结果，整体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48、组合信度(CR)为 0.956、平均方差提取值 (AVE) 为 0.682，表明该二阶潜变量具有优异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聚合效度；下属 6 个一阶潜变量的 Cronbach's α 系数介于 0.813~0.910 之间，CR 值介于 0.851~0.921 之间，AVE 值介于 0.527~0.703 之间，均达到 $CR \geq 0.60$ 、 $AVE \geq 0.50$ 的判定标准，且各观测题项对对应一阶潜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 0.60，无明显交叉载荷，表明各一阶维度的测量信效度良好。KMO 与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结果达标，证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各一阶潜变量对二阶潜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介于 0.73~0.82 之间，充分说明 6 个一阶维度可有效聚合为数字能力这一核心构念。

教师数字能力二阶因子模型的整体拟合度检验结果如表所示，模型 $\chi^2/df=2.67$ ，处于 1.00~3.00 的适配区间；RMSEA=0.072（90% 置信区间 [0.065, 0.079]），小于 0.08 的临界值；CFI、TLI、NFI 均大于 0.90，GFI=0.886 大于 0.80，所有拟合指标均符合结构方程模型的适配标准，表明教师数字能力的二阶因子结构与实测数据高度契合，构念结构效度得到验证。

表 3 教师数字能力二阶因子模型 整体拟合度指标表

拟合指标	适配判定标准	本研究实测值	适配结果
卡方自由度比 (χ^2/df)	1.00~3.00	2.67	适配
均方根误差近似值 (RMSEA)	≤ 0.08	0.072	适配
比较拟合指数 (CFI)	≥ 0.90	0.928	适配
塔克-刘易斯指数 (TLI)	≥ 0.90	0.919	适配
规范拟合指数 (NFI)	≥ 0.90	0.912	适配
拟合优度指数 (GFI)	≥ 0.80	0.886	适配

注：模型 $\chi^2=1025.00$ ， $df=384$ ， $p<.001$ ；RMSEA 的 90% 置信区间为 [0.065, .079]，落在适配阈值内，表明二阶因子模型与实测数据拟合良好。

学习成果为单维度潜变量，该变量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53、CR 值为 0.896、AVE 值为 0.752，远高于信效度判定临界值，各观测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介于 0.897~0.909 之间，载荷水平较高；KMO 与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均达到显著水平，单维度 CFA 模型核心拟合指标达标，表明学习成果的测量工具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和聚合效度，题项能有效反映该潜变量的核心内涵。

表 4 学习成果 (LO) 单维度潜变量 测量模型检验结果 (信度、效度、因子载荷)

潜变量	观测题项	标准化因子载荷	Cronbach's α	CR	AVE
学习成果 (LO)	LO1	0.905	0.853	0.896	0.752
	LO2	0.909			
	LO3	0.897			

注：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 .747，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chi^2=164.258$ ， $df=3$ ， $p<.001$ ，表明数据适合因子分析；单维度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 $\chi^2/df<3.0$ 、RMSEA<.08，拟合良好， $CR \geq .80$ 、 $AVE \geq .70$ ，信度与聚合效度优异。

综上，本研究针对教师数字能力二阶潜变量与学习成果单维度潜变量开展的测量模型检验均取得理想结果，各研究变量的测量工具均通过内部一致性信度、聚合效度与模型拟合度的多重检验，各项指标均达到或优于教育与心理测量领域的判定标准，充分证明本研究所采用的测量量表具有良好的科学性、有效性与适用性。

（三）路径分析

本研究构建的 SEM 路径模型整体拟合度良好，所有核心拟合指标均达到适配标准，表明模型能有效反映教师数字能力与学习成果之间的结构关系。路径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教师数字能力对学生学习成果存在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 $\beta=0.754$, $t=7.658$, $p<0.001$ ），且该影响效应达到强相关水平。

表 6 教师数字能力对学习成果影响的路径模型拟合度指标表

拟合指标	适配判定标准	本研究实测值	适配结果
卡方自由度比 (χ^2/df)	1.00~3.00	2.79	适配
均方根误差近似值 (RMSEA)	≤ 0.08	0.075	适配
比较拟合指数 (CFI)	≥ 0.90	0.923	适配
塔克 - 刘易斯指数 (TLI)	≥ 0.90	0.915	适配
规范拟合指数 (NFI)	≥ 0.90	0.908	适配
拟合优度指数 (GFI)	≥ 0.80	0.879	适配

注：模型 $\chi^2=1108.65$, $df=397$, $p<0.001$ ；RMSEA 的 90% 置信区间为 [0.068,0.082]，完全落在 0.08 适配阈值内，表明教师数字能力对学习成果影响的路径模型与实测数据拟合良好，模型设定合理。

路径分析进一步将教师数字能力作为整体二阶构念检验其对学习成果的综合影响，相较于维度层面的单独关联，整体构念的解释力更强（ $R^2=0.569$ ），也印证了前期将六大维度聚合为二阶核心构念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同时为后续探究教师数字能力影响学习成果的中介、调节机制提供了核心基础结论。证实所有测量工具均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且 DigCompEdu 框架的六大维度有效聚合为教师数字能力二阶核心构念；结构方程模型（SEM）路径分析进一步验证了教师数字能力对学习成果存在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且该影响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表 7 教师数字能力对学习成果的路径效应检验表

影响路径	<i>B</i>	<i>SE</i>	β	<i>t</i>	<i>p</i>	R^2
教师数字能力→学习成果	0.582	0.076	0.754	7.658	$p<0.001$	0.569

* 注： $p<0.001$ ，标准化路径系数 β 为核心效应指标，决定系数 R^2 表示内生潜变量的变异被外生潜变量解释的比例。

四、结论

本研究围绕预设的四个核心研究问题，通过文献分析、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及结构方程模型（SEM）等方法，对酒店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职业教育教师团队的复合能力结构及其对学习成果的影响进行了系统探究。教师数字能力现状与复合能力需求特征、酒店业数字化转型对职教教师提出了“技术+教学+行业”的复合型能力要求，具体结论如下：

（一）研究问题一

教师数字能力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维度发展呈现不均衡特征。本次调研针对开设酒店管理专业的职业院校教师开展问卷施测，采用 5 点计分法对各维度得分进行统计。结合描述性统计结果，本研究设定均值 ≥ 3.7 为中等偏上水平，3.3~3.69 为中等水平， < 3.3 为中等偏下水平。结果显示，酒店专业职业教育教师的复合数字能力总体均值为 3.70，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从各一阶维度来看，能力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梯化不均衡特征，优势维度集中在基础应用层面，其中数字资源（DR, $M=3.91$ ）与专业参与（PE, $M=3.85$ ）得分最高，评估（AS, $M=3.76$ ）与教学与学习（TL, $M=3.72$ ）紧随其后，均达到中等偏上水平。这反映出在职业教育数字化校园建设的推动下，教师已熟练掌握数字化资源的获取整合及专业交流工具的使用。短板维度则集中在高阶赋能层面，赋能学习者（EL, $M=3.42$ ）与促进数字素养（FC, $M=3.48$ ）的均值均处于中等水平，显著低于其他维度。这一数据特征清晰表明，教师虽具备基础的数字工具应用能力，但在利用数字技术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培养学生适配酒店数字化岗位的核心素养方面，仍存在显著能力短板，与酒店业数字化转型对人才培养的高阶需求存在差距。

为进一步探究酒店专业教师数字能力发展的现实困境，本研究对 3 所职业院校的 3 名酒店管理专业教师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其中某高职院校具有 8 年酒店专业教学经验的孙老师的表述具有典型性：

“现在学校要求开展数字化教学，我们也学了一些线上教学平台、课件制作的方法，基本的数字资源找一找、用一用都没问题，但是放到酒店专业教学中就感觉很吃力。让我们搭建数字教学资源，谈何容易？压根也都还没有系统的掌握这项技能。像咱们酒店专业、重实操，像前台接待、客房服务这些内容，想做虚拟仿真教学，没有适配的资源；另外，现在酒店行业都是智能 PMS 系统、机器人服务，我们自己都没长期接触过，更不知道怎么

用数字技术教学生掌握这些技能,也不清楚怎么通过数字化手段引导学生主动去了解行业的数字化变化,感觉数字技术只是停留在做课件、课堂上用用数字平台搞搞教学活动,留作业的层面,没法真正融入酒店专业教学,也达不到培养学生数字化岗位能力的目的。”

该困惑反映出当前酒店业职业教育教师数字能力发展的共性问题——基础数字工具应用能力与专业教学融合能力脱节,行业数字化素养的缺失导致数字教学无法对接酒店行业数字化转型需求,这也与本研究描述性统计中“赋能学习者”、“促进数字素养”维度得分偏低的结果高度契合,同时为后续界定复合能力的核心内涵与结构框架提供了重要的质性依据。基于上述现状短板与访谈证据,结合酒店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趋势与职业教育教学本质要求,当前酒店业职业教育教师团队的复合能力需求已突破单一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的范畴,且与DigCompEdu框架下专业参与、数字资源、教学与学习、评估、赋能学习者、促进数字素养六大能力领域形成深度契合。六大能力领域围绕职业教育教学规律与行业数字化发展需求,相互支撑、协同发力,共同构成酒店行业数字化素养、数字技术与职教教学融合能力、数字化教学团队协作能力三维融合的复合能力核心特征。首先、需以专业参与、数字资源两大能力为基础,夯实酒店行业数字化素养。教师既要通过专业参与实现行业数字化知识的持续交流与动态更新,主动掌握酒店PMS系统、智能客服系统、收益管理系统等行业数字化场景与工具的应用逻辑。又要依托数字资源能力,高效筛选、整合并重构行业数字化内容,将酒店真实运营数据、数字化服务流程转化为适配职业教育的教学资源,使六大能力领域的发展始终锚定酒店行业数字化的真实需求。其次、要以教学与学习、评估两大能力为核心,锻造数字技术与职教教学的融合能力。针对酒店专业“理实一体化”的教学特点,教师需依托教学与学习能力,将数字技术与项目化教学、场景化模拟等职教教学模式深度结合,例如利用虚拟仿真技术还原高星级酒店智能前台操作场景。同时,通过“评估”能力构建数字化、过程化的多元评价体系,借助学习分析技术追踪学生在数字化实训中的表现,彻底避免数字技术在课堂中的形式化应用。

(二) 研究问题二

DigCompEdu框架的本土化适配性与二阶构念验证 DigCompEdu框架所包含的六个维度可有效聚合为适用于酒店业职业教育教师的复合数字能力二阶核心构念,本研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对框架的本土化适配性与构念结构进行检验,证实该二阶因子模型适配酒店业职业教育场景。测量模型信效度指标优异,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教师数字能力二阶因子结构测量模型的信效度检验结果、各维度核心指标均达到心理测量学判定标准,测量工具具有良好的科学性与有效性。信度方面,组合信度(CR)均高于0.85,量表具有极佳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效度方面,聚合效度良好,无明显交叉载荷,题项能有效反映对应维度的核心内涵。同时调研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二阶因子模型拟合良好,构念结构设定合理,所有核心拟合指标均符合结构方程模型适配标准,证实六维度聚合为二阶核心构念的模型设定合理。模型卡方自由度比处理理想适配区间,均方根误差近似值小于0.08的临界值,各一阶潜变量对二阶潜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介进一步证明六个维度可有效聚合为酒店业职业教育教师的“复合数字能力”二阶核心构念,DigCompEdu框架经本土化检验后,适用于解释酒店业职业教育教师的数字能力结构。

(三) 研究问题三

验证后的职业教育教师团队复合数字能力(二阶潜变量)对酒店专业学生的学习成果具有显著的强正向直接影响,且对学习成果的变异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本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路径分析,探究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面、教师复合数字能力各维度与学生学习成果均呈显著正相关。教师复合数字能力对学生学习成果的正向直接效应显著且解释力较强。在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以教师复合数字能力为外生潜变量、学生学习成果为内生潜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开展路径分析,检验二者之间的直接影响效应,路径模型整体拟合良好,各项指标均达到适配标准,模型设定与实测数据高度契合,能有效反映二者之间的结构关系。其次,路径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教师团队复合数字能力对学生学习成果的标准化路径系数表明教师复合数字能力对学生学习成果存在极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

(四) 研究问题四

基于上述实证研究结论,结合酒店业数字化转型的行业要求与酒店业职业教育教师团队的能力短板,本研究摒弃单一的技术培训式提升思路,从行业需求、技术融合、团队协作三大核心维度出发,构建科学、可行的酒店职业教育教师团队复合能力提升路径,并配套建立落地保障机制,实现教师复合能力的系统性、阶梯式提升。

提升路径的总体框架 本研究构建的教师团队复合能力提升路径,以行业需求驱动、技术融合驱动、团队协作驱动为三大核心动力,紧扣酒店业数字化转型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双重需求,针对教师复合能力的发展规律,将能力提升过程划分为基础适应、融合应用、创新引领、团队共生四个递进式阶段。该路径旨在推动教师团队从掌握基础数字工具应用方法的基础适应阶段,向实现数字技术与酒店教学深度融合的融合应用阶段、引领酒

店专业数字化教学创新的创新引领阶段迈进, 最终达到跨学科、跨团队数字化教学能力共生共融的团队共生, 实现教师复合数字能力的全面、持续提升。

提升路径的具体实施策略。一、行业需求驱动, 补齐酒店行业数字化素养短板。针对实证研究中发现的教师赋能学习者、促进数字素养维度能力不足的问题, 从酒店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实际需求出发, 推动教师行业数字化素养的提升。建立酒店业数字化师资实践基地, 与如万豪、希尔顿等头部数字化酒店集团及本土标杆酒店合作, 定期安排酒店专业教师进入酒店顶岗实践, 熟悉智能前台、机器人服务、大数据收益管理、数字化客户关系维护等酒店行业真实数字化场景, 积累行业数字化实践经验; 二、组建行业导师+职教教师联合教学团队, 邀请酒店数字化转型专家、酒店一线数字化岗位技术骨干参与酒店管理专业的教学设计、课程开发与教学实施, 将酒店行业真实的数字化项目、案例转化为教学内容, 实现行业数字化需求与职业教育教学的精准衔接。三、开设酒店行业数字化专题研修课程, 系统讲解酒店行业数字化发展趋势、数字化岗位能力要求、数字化运营管理模式等内容, 帮助教师建立对酒店行业数字化的系统性认知。

同时, 聚焦数字技术与职业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避免数字技术在教学中的形式化应用, 提升教师的数字化教学应用能力。开展问题导向、逆向设计的精准化数字化教学培训, 摒弃传统的软件操作式培训, 围绕酒店管理专业教学中的痛点、难点问题, 设计数字化教学解决方案, 开展工作坊式培训。如虚拟仿真技术在酒店实操教学中的应用, 大数据平台在学生评估中的应用等, 提升教师解决实际教学问题的数字化能力。搭建酒店专业数字化教学资源库, 整合并开发适配酒店管理专业的微课、虚拟仿真教学项目、交互式课件、数字化教学案例等资源, 建立资源共享、持续迭代的管理机制, 为教师数字化教学实施提供资源支撑。鼓励教师申报酒店专业数字化教学改革相关课题, 以研促教, 同时举办校级、市级数字化教学竞赛, 以赛促学, 推动教师在实践中探索数字技术与酒店教学的融合路径。激活教师团队复合能力共生效应, 基于教师复合数字能力的二阶构念特征, 充分发挥各维度之间的关联作用, 以团队协作为纽带, 激活教师团队的能力共生效应。实施教师数字能力共同体计划, 将擅长数字技术应用、酒店专业教学、课程设计的不同教师进行跨学科、跨教研室整合, 组建数字化教学团队, 共同开展数字化课程开发、教学资源制作、教学模式改革等工作, 实现团队成员的能力互补。建立传帮带阶梯式教师培养机制, 将数字化教学能力较强的骨干教师与能力薄弱的教师结成帮扶对子, 通过备课研讨、课堂观摩、教学指导等方式, 实现数字化教学能力在教师团队内部的传递与提升。搭建数字化教学交流平台, 定期组织校内、校际间的数字化教学交流研讨活动, 分享数字化教学经验、成果与问题解决方案, 促进教师团队之间的相互学习与共同进步。

提升路径的落地保障机制的有效实施, 从制度、资源、评价三个层面建立配套保障机制, 为教师团队复合数字能力的提升提供全方位支撑。首先应建立健全制度保障, 完善数字化能力提升相关制度设计。院校层面出台“教师数字能力提升五年发展规划”, 明确教师数字能力提升的总体目标、阶段任务与实施要求。将数字能力纳入教师职称评审、绩效考核、评优评先的核心指标, 建立数字化教学工作的激励机制, 激发教师提升数字能力的内生动力。制定教师数字化实践、培训、研修的管理制度, 保障教师参与行业实践、专题培训、课题研究等活动的时间与权利。其次加强资源保障、加大数字化教学资源投入力度, 加大院校数字化教学硬件设施投入。完善多媒体教室、虚拟仿真实验室、数字化教学机房等教学场地建设, 配备适配酒店专业教学的数字化教学设备。设立教师数字能力提升专项经费, 用于行业实践基地建设、数字化教学培训、教学资源库开发、课题研究等工作。引进专业的数字化教学平台与工具, 为教师数字化教学实施与能力提升提供技术支撑。最后, 强化评价保障、建立发展性教师数字能力评价体系, 摒弃单一的结果性评价, 建立过程与结果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发展性教师数字能力评价体系。评价内容涵盖教师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数字化教学设计能力、数字化教学实施能力、行业数字化素养、团队协作能力等多个方面。结合教师自评、团队互评、学生评价、专家评价等多种形式, 不仅作为教师考核的依据, 更用于为教师制定个性化的能力提升计划提供参考, 实现以评促建、以评促升。

参考文献:

- [1]国务院.(2021).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国发〔2021〕29号). 北京: 国务院.
- [2]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等.(2020). 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教职成〔2020〕7号).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3]刘景超, 郭丽君.(2022). 高校教师专业发展能力的二阶因子结构验证及差异分析 [J]. 高等教育研究, 43(8), 76-83.
- [4]桑国元, 王凯, 李森.(2023). 高校教师数字能力量表的编制与验证 [J]. 教育技术研究与发展, 71(1), 99-115.
- [5]中共中央办公厅, & 国务院办公厅.(2023). 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 北京: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 [6]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 & 石基信息. (2024). 中国酒店业数字化转型趋势报告——创造价值 [R].
- [7]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DigCompEdu: European Framework for the Digital Competence of Educators.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 [8]Indonesi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2011). Kerangka Kualifikasi Nasional Indonesia (KKNI) No. 01. Jakarta: Badan Standar Nasional Pendidikan.
- [9]Li, Y., Anuar, N., & Mansor, A. Z. (2026). Validation of DigCompEdu Framework Among Higher Education Lectur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struction* 19: 437 – 456.
- [10]Margarita Núñez Canal, María Mercedes de Obesso, Carlos Alberto Pérez Rivera. (2024). Does educators' digital competence improve entrepreneurial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 Research*.
- [11]Núñez Canal, M., de Obesso, M. M., & Pérez Rivera, C. A. (2024). Does educators' digital competence improve entrepreneurial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 Research*.
- [12]Redecker, C. (2017). European framework for the digital competence of educators – DigCompEdu: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Luxembourg
- [13]Suyitno, S., & Dalhari. (2025). Analysis of digitalization-based teacher education models on learning outcomes, digital competence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prospective teachers. *Multidisciplinary Science Journal*, 8(1), 2026108.
- [14]Wang, Zhaorui, and Zuwang Chu. (2023). Examin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eachers' Self-Perception of Digital Competence, Self-Efficacy, and Facilitating Condi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Sustainability* 15(14): 10945.

Research on the Paths to Improving Vocational College Teachers'

Comprehensive Digital Competence Unde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Hotel Industry

— Based on the DigCompEdu Framework

Huiyuan Zhang, Xingjia Weng

Suzhou Colle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uzhou, China

Abstract: The hotel industry'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emands new competenci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er teams. Based on the EU DigCompEdu framework, this study surveys 228 hospitality management vocational college teachers to clarify the connotative structure, current status of teachers' comprehensive competencies and their impact on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and constructs an improvement path. The results show teachers' comprehensive digital competencies include six dimensions, with a moderate overall level but deficiencies in high-order dimensions like “empowering learners”; these competencies exert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Accordingly, a “three-driven, four-stage progressive” improvement path is designed from industry demand, technology integration and team collaboration perspectives.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hotel industry; vocational education; comprehensive competencies; DigCompEdu.

AIGC 赋能高校软件测试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探索

付丽方, 王天顺, 王骏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河南郑州 451191)

摘要: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传统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人工智能时代的需求, AIGC 的出现促使高校必须进行教育教学改革, 探索新的实践范式和优化方案。本文立足 AIGC 技术与高等教育融合发展趋势, 针对高校软件测试应用型人才培养中教学模式固化、实践与行业脱节等痛点, 开展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研究。将 AIGC 技术融入到软件测试专业的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实践环节中, 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为高校软件测试专业人才培养改革提供了实践参考与可行路径。

关键词: 人工智能; 人才培养; 软件测试

项目基金: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2026 年度立项课题: AIGC 赋能高校软件测试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探索 (编号: SD-XB2026039)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405

一、引言

在数字经济浪潮中, 软件产业在规模、复杂度和迭代速度上持续升级。AI 技术正深度赋能软件测试的全流程, 大幅提升了测试效率、覆盖范围与精准度, 成为破解传统测试“人力密集、效率低下、覆盖不足”痛点的核心驱动力。从产业需求端来看, 当前市场对“AI+软件测试”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 但人才供给存在严重缺口。另外, 现有高校软件测试相关课程体系存在明显滞后性。多数课程仍以传统手工测试、基础自动化测试内容为主, 缺乏 AI 相关知识模块, 未形成“AI 技术+测试业务”的系统性培养框架。因此, 构建面向产业需求的“AI+软件测试”复合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成为当前高校改革以及产业人才队伍建设的迫切需求。

二、AIGC 赋能高校软件测试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AIGC 正全面作用于软件测试领域, 它逐步改变测试专业设置、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 优化测试管理流程与系统特征; 重塑测试人才培养目标, 推动教学内容与实践范式创新, 重构质量评价体系并强调测试伦理; 同时也带来测试结果可靠性、法律道德争议、环境复杂性与内容真实性等一系列挑战。

(1) 改变课程体系

难以适配行业对智能化测试人才的需求, AIGC 视域下的软件测试课程体系需打破传统学科边界, 构建“基础核心+智能进阶+实践融合”的三维架构。基础核心层保留软件测试原理、黑盒/白盒测试方法等核心内容, 筑牢学生专业根基; 智能进阶层新增 AIGC 测试工具原理与应用、智能测试用例生成与优化、基于 AIGC 的缺陷分析与定位等跨学科模块, 强化学生对智能化测试技术的掌控力; 实践融合层则依托校企协同平台, 设置真实项目驱动的实训课程, 引导学生运用 AIGC 工具解决复杂测试场景问题, 在实战中锤炼“人机协同”测试能力。同时, 课程体系还需融入行业前沿标准与政策导向, 配套建设 AIGC 测试资源库与案例库, 通过模块化、动态化的课程设置, 实现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的深度融合, 为培养适应智能化时代需求的复合型软件测试人才提供体系支撑。

(2) 重塑人才培养目标

AIGC 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深刻重塑软件测试行业的生态格局, 也推动软件测试教育形态发生根本性转变。传统以理论讲授和基础技能训练为主的软件测试教育模式, 其培养目标已随 AIGC 的渗透而发生系统性重塑。相较于传统聚焦测试用例编写、基础测试执行等单一技能的培养方向, AIGC 视域下软件测试人才培养目标更凸显“智

作者简介: 付丽方(1981-), 女,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人工智能、软件工程;

王天顺(1980-), 男, 硕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

王 骏(2002-), 男, 在读学生, 专业为软件工程。

能化协同”与“复合型能力”双核心，旨在培育既精通软件测试核心原理、掌握黑盒/白盒测试等基础方法，又能熟练运用 AIGC 测试工具实现智能用例生成、缺陷精准定位与测试方案优化的专业人才。同时，更注重塑造学生的技术创新思维、跨学科整合能力与行业适应性，使其不仅能胜任“人机协同”测试场景下的高效作业，还能主动应对 AIGC 带来的行业变革，具备测试流程优化、智能测试方案设计等高阶能力，最终成长为契合数字化转型需求、兼具实践能力与创新素养的软件测试复合型人才。

（3）更新教学方法

AIGC 技术的深度渗透正全面更新软件测试的教学方法，推动传统“理论讲授+单一实操”的教学模式向“智能化、场景化、协同化”转型。在教学实施中，AIGC 打破了传统教学的时空限制与场景壁垒，通过引入智能测试助手、虚拟仿真测试平台等工具，将抽象的测试原理转化为可交互的实践场景——例如利用 AIGC 快速生成多样化测试案例、模拟复杂系统的缺陷场景，让学生直观理解不同测试方法的应用逻辑。同时，项目式教学与 AIGC 的融合更为深入，教师可依托真实企业测试项目，引导学生组建团队，借助 AIGC 工具完成测试需求分析、智能用例设计、测试方案优化等全流程作业，在“人机协同”的实践中锤炼问题解决能力。此外，个性化教学得以落地，AIGC 可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与能力短板，精准推送定制化学习资源与实操任务，如针对黑盒测试薄弱的学生生成专项强化案例，针对智能工具应用不足的学生匹配实操教程，实现“千人千面”的教学指导，显著提升软件测试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4）推动人智协同教学框架

AIGC 技术的深度赋能，正推动构建以“人智协同”为核心的软件测试教学框架，实现传统教学模式的系统性升级。该教学框架以“培育人机协同测试能力”为核心目标，搭建“三维联动”体系：其一，场景驱动的协同实践维度，依托 AIGC 构建虚拟测试实训平台，模拟真实企业级软件缺陷场景、复杂业务测试场景，引导学生借助智能测试助手完成测试用例生成、缺陷定位等实操任务，在“人主导、智辅助”的交互中深化对测试逻辑的理解；其二，项目引领的协同探究维度，整合校企资源设计真实测试项目，组织学生以团队形式，协同 AIGC 工具完成从需求分析、测试方案设计到测试报告生成的全流程作业，锤炼学生在实际项目中统筹协调、利用技术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其三，精准适配的协同赋能维度，借助 AIGC 的数据分析能力，动态追踪学生学习进度与能力短板，个性化推送测试知识点讲解、工具实操教程、专项强化案例等资源，实现“千人千面”的精准指导。整个教学框架通过明确“人”与“智”的协同边界与互动机制，既筑牢学生软件测试核心理论根基，又强化其智能化工具应用能力，为培养适配行业需求的复合型测试人才提供体系化支撑。

三、AIGC 赋能高校软件测试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成效

（1）AI 赋予软件测试课程思政新内涵

将 AIGC 技术融入软件测试课程思政建设，打破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脱节的壁垒，赋予课程思政全新的时代内涵与专业特色。结合 AIGC 在软件测试领域的应用案例，向学生传递技术创新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引导其认识软件测试的核心价值，树立严谨的专业态度与质量意识。同时以 AIGC 技术的发展与规范应用为切入点，融入网络信息安全、数据伦理等思政元素，引导学生树立正确技术价值观，培养坚守道德底线、遵守行业规范的职业素养，实现专业能力培养与思想价值引领的同频共振。

（2）培养学生创新意识与科学思维

AIGC 技术融入软件测试人才培养，为教学注入创新活力，有效激发学生创新意识，培养科学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课程教学中，借助 AIGC 智能工具辅助测试用例设计、脚本开发等环节，引导学生突破传统思维，探索高效测试方法；实践教学依托 AIGC 仿真场景与实训平台，让学生直面复杂问题，运用科学方法分析拆解并结合技术探索方案，锤炼实操与创新思维。同时鼓励学生利用 AIGC 开展个性化研究实践，培养自主探究与技术应用能力，助力形成“技术应用—问题探究—创新优化”的科学思维模式。

（3）加强教师 AI 软件测试师资培训，提升教学水平

以 AIGC 赋能人才培养为契机，构建系统化 AI 软件测试师资培训体系，全方位提升教师专业教学与技术应用能力，打造兼具软件测试专业功底与 AIGC 技术应用能力的双师型师资队伍。通过专题培训、行业研讨、企业挂职、校企教研等形式，让教师掌握 AIGC 在教学与实践指导中的应用方法，熟悉各类智能测试前沿技术实操；同时组织开展教学改革教研，推动教师将 AIGC 技术融入课堂与实践指导各环节。师资能力提升让教学更具时代性与专业性，也为实践教学提供专业指导，整体提升了软件测试专业的教学质量与水平。

(4)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开展项目教学

依托 AIGC 技术赋能, 秉持问题导向教学理念创新软件测试项目教学模式, 推动教学从“理论灌输”向“实践探究”转变。借助 AIGC 工具结合行业岗位测试痛点与需求, 设计贴合实际的测试项目, 将抽象知识转化为具体问题, 让学生在解题中掌握专业技能。教学中以项目问题为核心, 引导学生围绕测试全流程开展团队协作, 依托 AIGC 辅助项目分析、实施与复盘, 理解测试核心逻辑。该模式让学习更具针对性, 培养学生团队协作、项目管理能力, 提升岗位适配度, 实现专业学习与行业实践无缝对接。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 在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 AIGC 对软件测试行业的重塑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面向产业需求开展 AIGC 赋能的高校软件测试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 既是破解当前人才供需失衡、课程体系滞后等现实问题的关键路径, 也是推动高校计算机类专业转型升级、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与岗位适配度的重要举措。通过重构课程体系、更新培养目标、创新教学方法、构建人智协同教学框架, 并融入课程思政、强化师资建设与项目化实践, 能够有效培养出兼具专业功底、智能技术应用能力与创新素养的复合型软件测试人才。未来, 随着 AIGC 技术的持续迭代与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 高校将进一步打通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之间的壁垒, 为我国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稳步推进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与智力保障。

参考文献:

- [1] 赵超, 刘洋洋. AI 赋能的测试用例系统建设研究[J]. 现代信息科技, 2025, 9(23): 121-125. DOI: 10.19850/j.cnki.2096-4706.2025.23.022.
- [2] 王艳娇, 伍燕丹, 苏艺博, 等. 探析大数据背景下软件测试技术发展[J]. 中国信息界, 2025, (11): 145-147.
- [3] 唐欢. 人工智能技术在软件自动化测试中的应用[J]. 智慧中国, 2025, (11): 106-107.
- [4] 李英. 融合知识图谱的智测引擎在人工智能软件测试中的应用[J]. 无线互联科技, 2025, 22(22): 38-41.
- [5] 高利鹏, 蔡文静, 郑伟, 等. 大模型与知识图谱驱动的软件测试智能辅导系统[J]. 软件导刊, 2025, 24(11): 49-53.
- [6] 吴伶琳. AIGC 驱动的高职软件测试教学资源人机协同开发研究[J]. 办公自动化, 2025, 30(21): 50-52+98.
- [7] 刘小飞, 崔海燕, 李美满. “以赛促学、以赛促练、锤炼良匠”的软件测试实践教学改革[J]. 计算机教育, 2025, (10): 120-126. DOI: 10.16512/j.cnki.jsjy.2025.10.024.
- [8] 孟洁. 软件开发类课程思政教学探索[J]. 计算机教育, 2025, (10): 184-190. DOI: 10.16512/j.cnki.jsjy.2025.10.035.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AIGC-empowered Training Mode for Applied Talents in Software Testing in Universities

Fu Lifang, Wang Tianshun, Wang Jun

School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Zhengzhou Shengda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raditional talent training models in universities can hardly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AI era. The emergence of AIGC has urged universities to carry out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reforms, and explore new practical paradigms and optimization plan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AIGC technology and higher education,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pain points in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ed software testing talents in universities, such as rigid teaching models and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practice and the industry, to conduct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of training models. It integrates AIGC technology into the curriculum system, teaching methods and practical links of the software testing major, cultivates compound talents with innovative spirit and practical ability, and provides practical references and feasible paths for the reform of talent training in university software testing majors.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alent training; Software Testing

数智赋能高等教育科学评价与人才质量提升： 困境、挑战与突围路径

吴建红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 教育评价是保障人才质量、引导高校发展的核心指挥棒, 其科学化转型关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当前, 我国高等教育评价体系存在评价导向失衡、维度单一和功能异化三大困境, 难以适应新发展格局下对拔尖创新人才的迫切需求。数智技术为构建多维度、全过程、增值性的科学评价体系提供了可能, 然其应用在教学落地、伦理规制与制度协同层面仍存挑战。本文旨在系统探讨上述困境与挑战, 确立“以人为本、技术向善”的核心价值观, 构建“融通、智能、安全”的技术体系, 并通过政策引导、能力提升与多元协同完善评价实施生态, 最终推动高等教育评价回归育人本质, 实现人才质量的有效提升。

关键词: 数智技术; 高等教育评价; 科学评价; 人才质量提升

基金项目: 杭州师范大学 2025 年研究生科研创新推进项目-Deepseek 赋能小学语文个性化教学设计的路径研究 (2025HSDYJSKY096)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303

一、前言

“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指挥棒”^[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 事关教育强国成败。^[2]这深刻揭示了教育评价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 其评价体系的科学性, 直接关系到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质量, 进而影响国家在全球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

然而, 我国传统高等教育评价体系在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 也逐渐暴露出其与新时代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深层矛盾。“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五唯”倾向, 成为制约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顽瘴痼疾^[3]。这种评价体系难以全面、客观、动态地反映高校的办学成效、学科的真实水平、教师的教学贡献和学生的综合素养, 导致人才培养与国家战略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

数智技术的迅猛发展, 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它使得对学习过程的全程记录、对能力素养的多维刻画、对成长轨迹的增值评价成为可能, 为实现从“知识本位”向“能力本位”和“素养本位”的评价转型提供了强大技术支撑。但是, 技术赋能并非一蹴而就的坦途。其应用过程本身也伴随着数据孤岛、算法偏见、伦理失范、制度惯性等复杂挑战, 是一场涉及价值重塑、技术攻坚与制度创新的系统性工程。

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评价转型, 本文遵循“困境剖析-挑战识别-路径构建”的逻辑脉络, 为确保数智技术真正服务于高等教育评价的科学化转型和人才质量的全面提升的, 必须确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构建完善的技术体系, 并通过多方协同完善实施生态, 方能履行数智技术赋能高等教育现代化、助力人才强国使命。

二、传统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的时代困境

传统高等教育评价体系所面临的深层困境, 并非简单的技术或方法问题, 而是深植于其价值导向、设计逻辑与系统功能之中的结构性矛盾。这一矛盾并非孤立存在, 而是呈现为一个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条。因此, 系统剖析这一矛盾综合体, 是构建新时代科学评价体系不可逾越的逻辑起点。

(一) 评价导向失衡: 知识灌输与创新能力培养的断裂

传统教育评价体系使得教育方式和人才培养模式侧重于对知识灌输。该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沿袭工业化时代

作者简介: 吴建红(2001—), 女, 硕士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为基础教育。

通讯作者: 吴建红

的逻辑，侧重于对显性、确定性知识传授效率和易于量化的学术成果产出的考核。这种导向在高校中具体表现为“重科研轻教学”、“重知识灌输轻思维激发”的普遍倾向。然而，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数智时代，社会对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需求已从“知识继承者”转向“创新开拓者”。在蕴含“知识灌输”意味的教育评价体系之下，高校教师的教学内容易于聚焦于知识点的灌输，学生的学术训练则可能蜕变为对论文发表技巧的追求，逐渐忽视批判性思维与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这会大大削弱我国创新型人才储备队伍力量。

受到“分数”与绩效长期挂钩的教学评价体系影响，其结果是，高等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培养了大量擅长应试和完成规定动作的“优秀考生”或“标准学者”，却难以培育出能够面对不确定未来、勇于进行原始创新的“创新型人才”。具体而言，这种断裂表现在：在认知维度上，评价侧重于对已有知识的掌握和再现，普遍忽视了对学科前沿的洞察、跨学科整合以及创新构想等高阶思维的评估与引导。在能力维度上，它难以衡量在真实科研与产业实践中至关重要的协作攻关能力、实验设计能力及创业精神。这一断裂的本质，是评价的“指挥棒”效应所强化的目标异化。教师的教学内容聚焦于考点，学生的学习活动蜕变为对知识点的记忆和答题技巧的反复演练。最终，这种失衡的导向导致高等教育产出与国家战略需求错位，构成了传统评价体系在价值逻辑上的核心困境。

（二）评价维度单一：静态分数与动态综合素养的脱节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教育评价需要破“五唯”，“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4]。在高等教育领域，“五唯”集中表现为过度依赖一系列静态、易量化的终结性指标。例如，用GPA（平均学分绩点）衡量学生整体学习水平，用SCI/SSCI论文数量、影响因子代表教师的学术水平，用国家级人才头衔、科研项目经费来评判学科实力。这种评价方式的根本缺陷在于，它将复杂、多维、动态演进的教育过程和人的发展，简化、压缩为少数几个冰冷的数字。这种评价方式与当代高等教育所倡导的“促进学生综合素养全面发展”和“引导高校特色发展”这一动态、多元的目标之间，产生了显著脱节。

对大学生而言，单一的分数和论文指标无法反映其品德修养、团队协作、社会实践、心理健康以及职业适应能力等关键素养。对高校教师而言，唯论文、唯项目的评价难以全面衡量其教学水平、学术指导贡献以及对校园文化的积极影响。这种“脱节”所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它首先导致高等教育实践的窄化，形成“评什么就教什么、研什么”的功利主义倾向，使得那些无法被简单量化的通识教育、课程创新、社会服务等价值被边缘化。其次，它对师生个体价值的评判变得片面且不公，抑制了其个性化、多样化发展的空间与内在动力。最终，教育评价本应承担的“发展性功能”被其“管理性功能”所淹没，体系自身也因此陷入了无法真实反映高校育人成效和人才真实质量的困境之中。

（三）评价功能异化：选拔甄别与促进学生发展的背离

传统教育评价体系最深层的时代困境，在于其核心功能的系统性异化。从应然层面看，教育评价的根本宗旨应服务于学生发展，其理想功能是“以评促学、以评促教”，即通过持续的诊断、反馈与激励，优化教学进程并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然而在实然层面，该体系在高压力的社会竞争语境下，已异化为一个以分等、筛选和淘汰为核心的功利性选拔工具，导致了手段与目的的严重背离，评价功能发生严重异化，进而对教育生态和个体成长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

这种功能异化的发生机制源于高校评价结果与稀缺社会资源分配的强关联。当分数成为升学、就业等关键人生通道的几乎唯一“通行证”时，评价便不再仅仅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是演变成了教育竞争的终极目标本身。这一转变彻底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学习不再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而是为了在评价中获胜。

于学生个体而言，这种评价功能异化压抑了其学习的内在动机。对外部奖励和避免惩罚的过度追逐，侵蚀了由好奇心、探索欲和求知本身带来的愉悦感，导致学习焦虑普遍滋生，个性化发展空间被统一的应试标准所挤压。于教育整体生态而言，它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课程内容趋于狭窄和僵化，教学方式强调机械训练而非理解创造，师生关系亦被简化的“教—考”绩效契约所主导。最终，教育评价从其促进发展的“仆人”，异化为支配一切教育活动的“主人”，背离了其以人为本的初衷，构成了传统体系难以自我超越的结构性困境。

三、数智技术赋能高等教育科学评价的现实挑战

数智技术赋能高等教育评价的转型，绝非简单的技术嫁接，而是一场触及深层学术治理结构的范式革命。但其赋能过程远非技术叠加的线性进程，而是在与学术治理结构深度互嵌中引发了一系列复杂挑战。这些技术、伦理与制度层面的挑战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数智赋能需要突破的多重障碍。

（一）技术层面的应用挑战

尽管数智技术为教育评价转型描绘了宏伟蓝图，但其在实际应用层面仍面临诸多严峻的技术性挑战。这些挑战若不能得到有效破解，将成为阻碍评价改革落地的现实壁垒，甚至可能引发新的教育风险。

首先，是“数据孤岛”问题。技术是工具而非目的，需要“科学规范技术应用在教学评价中的适用边界，合

理赋值教学评价指标”^[5]理想中的全景式评价依赖于对学生学习全过程数据的全面采集与融合。然而现实是,数据通常散落、封闭于不同的系统和平台中,众多高校内部的教务系统、科研管理系统往往一分为二,而这就会导致数据之间出现割裂。这些数据格式不一、标准各异,形成了严重的“数据孤岛”。

其次,是算法本身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模型的透明性、可解释性与可能存在的偏见。人工智能算法,特别是复杂的深度学习模型,常被视为“黑箱”,其内部决策机制难以被常人理解。当AI用于评价诸如研究生招生筛选、奖学金评定算法等复杂素养时,其给出的评分或诊断结果若无法被教师和学生所理解和信任,其教育价值将大打折扣。更甚者可能会放大教育不公,形成技术赋能下的“新歧视”,这与教育公平的初衷背道而驰。

最后,是普遍存在的技术门槛。这包括基础设施不均衡与师生数字素养不足。一方面,不同层次学校之间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存在显著差距,部分双一流高校与地方应用型高校中之间可能会由于地区、资源的差异而形成天然的“数字鸿沟”。另一方面,师生的数字素养是决定技术能否“用好”的关键。高校是否开设数字素养课程的训练、对数字课程的重视程度也会导致师生数字素养存在不平衡的结果。若缺乏相应的培训与准备,再先进的技术也无法转化为有效的教育生产力,甚至可能因使用不当而产生反效果。

(二) 伦理与价值层面的潜在风险

在处理教育大数据与人的相互关系时应遵循“有用”“无害”的伦理诉求^[6],教育评价涉及到对人进行价值判断,这无疑会带来一定的伦理问题,若缺乏审慎的规制与人文关怀,技术理性可能异化为一种压迫性力量,侵蚀教育的本质。

数智评价和人之间的首要风险在于数据隐私的边界模糊。为实现全过程、多维度的评价,技术系统需持续采集海量学生数据,从学习行为、社交互动到甚至生物信息,几乎构建了一个数字化的“全景监狱”^[7]。这就由技术引发了严峻的隐私安全与数据所有权之问,若缺乏严格的法律法规与伦理审查,这种全面的数据监控不仅可能侵犯学生隐私,更可能使学生从“教育主体”异化为被观测、被利用的“数据客体”。

最深层的风险在于评价的异化,即技术理性对教育人文价值的侵蚀。当技术的使用逐渐忽视人伦理性,一切教育现象都被量化为数据时,教育中那些难以量化的珍贵品质——如好奇心、同理心、批判精神、道德勇气——也将面临被忽视和边缘化的命运。作为教育评价的核心评价主体,教师评价素养对于评价结果的质量取向、评价改革的进程深入有着深远的影响^[8]。教师的教育直觉、艺术性和情感关怀被冰冷的算法评分所替代,教学不再是充满创造性的师生互动,过度依赖数字技术也会教师产生“教学惰性”,一切教学以数字技术给定的内容为准,教学过程进而丧失其最根本的育人温度与人文精神。

总之,伦理与价值风险是数智化评价转型中最深刻、最致命的挑战。它警示我们,必须将伦理规制置于技术应用之上,确保技术始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让人屈从于技术的逻辑。

(三) 实践与制度层面的实施困境

数智技术赋能高等教育评价的最终落地,深受实践环境与制度安排的制约。当前,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进程中,实践与制度层面存在着深层次的实施困境,存在“最后一公里”难题。

首要困境是强大的路径依赖与学术治理惯性的阻力。数十年来形成的世界一流大学以“五唯”指标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已深度嵌入高校管理的肌理。许多管理者习惯于依赖简洁的量化指标进行决策;教师担忧数智化评价的复杂性和额外工作量,且对其能否公正评价教学学术等软性贡献心存疑虑。这种强大的惯性使得新评价体系难以有效推行。

其次,科学、统一的标准与规范的普遍缺失。目前,对于如何利用学习分析进行增值评价、相关教育数据的产权归属与使用边界等关键问题,尚无权威的国家标准或行业共识。这导致各高校、各技术企业的探索“各自为战”,可能催生出一批缺乏教育测量学验证的“黑箱”产品,损害评价的公正性与权威性。

最后,多元主体间的协同不足与治理机制缺位。大学的信息化建设不是一个封闭系统,其创新发展与国家、政府的制度环境息息相关^[9]。同样的,基于信息化的数智化评价也是一项需政府、高校、技术企业、学术专业组织多元共治的系统工程。然而目前,政府在顶层设计、标准制定与监管问责上的角色有待强化,高校作为需求方和应用主体能力不均,企业在商业利益与教育公益之间需找平衡点。各方权责利模糊,难以形成推进科学评价的合力。

四、数智技术赋能高等教育评价转型的突围路径

面对传统评价体系的深层困境与数智赋能过程中的复杂挑战,高等教育评价改革必须超越局部优化的思路,转向价值重塑、技术攻坚与生态重构协同推进的系统性路径,才能最终实现高等教育评价回归育人本质的根本目标。

(一) 确立“以人为本、技术向善”的评价价值观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面对数智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首要的突围路径在于进行价值重构与理念引领,必须

旗帜鲜明地确立“以人为本、技术向善”的评价核心价值观。这一理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调的“以人中心”的人工智能发展原则高度契合^[9]，即教育领域的人工智能必须服务于增进人类能力和权益的根本目标。此核心价值观必须深刻融入高校治理理念和学术文化之中，确保技术发展始终服务于师生全面发展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这一根本目的。

技术的应用必须被约束在伦理的框架之内。为确保数据安全与算法公正，高校应率先建立校级“数智评价伦理审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应包括教育专家、伦理学者、技术专家、法律工作者、教师及学生代表，对重大数据应用项目进行前置性伦理评估，严格遵循“目的明确、最小够用、知情同意、安全可控”的原则。其次，必须建立常态化的算法审计与影响评估机制。要求对核心评价算法的设计逻辑、训练数据构成及决策结果进行定期审查与评估，检测并消除其中可能存在的偏见，确保算法的公平性与正义性。^[10]

技术工具的设计理念直接决定了其应用的导向。必须大力倡导并推动包容性设计，开发公平、透明、可解释的智能评价系统。“公平”要求工具的设计充分考虑不同学科、不同类型高校、不同群体师生=的适用性。“透明”与“可解释性”则要求评价系统能提供清晰的解释性反馈，这能将技术从“评判者”转变为“赋能者”，服务于师生的发展。

（二）构建“融通、智能、安全”的评价技术体系

先进的理念与价值观需要依托坚实的技术基础方能落地。推动数智技术赋能教育评价转型，当务之急是攻克核心技术难题，着力构建一个集“融通性、智能性、安全性”^[11]于一体的新一代数字教育评价体系。数据是数智化评价的基石，推动高校建设校级“教育数据中台”或“人才培养数据中心”，制定校内统一的数据标准，强制要求各类业务系统依标对接。实现多源异构数据的融合治理。这是实现全景式、过程性评价的底层基础

马克思指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12]在教育数字化飞速发展的当下，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因其可提高评价过程的效率与准确性，使评价结果更加客观、公正，并能为教育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持^[13]，有研究者就从学校特色理念和方向的适切度、特色课程和管理的一致度、师生和学校发展的优质度三个维度，构建了学校特色发展的测评体系。

算力与算法是数智化评价的核心引擎。未来的技术攻坚方向必须从单纯的知识点评估转向对核心素养的精准刻画。应汇聚教育测量专家、学科专家与人工智能科学家，共同研发基于多模态数据的下一代评价模型，从而将评价内容真正引导至素质教育所倡导的核心素养轨道上来。

安全与信任是技术体系得以可持续运行的保障。在数据融通与应用的同时，必须将隐私保护技术深度嵌入系统架构的底层。如差分隐私、联邦学习等，在保障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最大化地发挥数据价值，建立师生对数智化评价的信任。为了进一步提升协作学习的成效，研究者还提出了多元化的协作策略，如同伴对话反馈策略^[14]、在线学习支架策略等^[15]。通过这些技术手段，在最大化发挥数据价值的同时，最小化隐私泄露风险，筑牢教育数据安全的技术防线。

（三）完善“协同、渐进、规范”的评价实施生态

数智技术赋能教育评价的最终成功，不仅依赖于技术体系的构建，更在于其能否在一个健康、可持续的生态中落地生根。这要求从政策、人与治理三个维度协同发力，构建一个“协同、渐进、规范”的实施环境。

强有力的顶层设计与政策引导是避免市场混乱、确保改革方向的关键。国家及教育主管部门应牵头制定数智化评价的课程标准、数据标准、质量标准和伦理标准，明确“评价什么、怎么评价、为了什么评价”。数据如何管理以及算法需遵循的伦理底线，为各类实践提供清晰、统一的规范框架。同时，应采取“试点先行、典型引路”的渐进式推广策略。选择有条件的地区和学校开展示范项目，鼓励其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探索多种模式，最终实现由点及面、稳步推进的健康发展，有效降低全面铺开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高校教师与管理人员的评价素养与数据素养是决定改革成败的核心，其专业能力是决定技术能否“用好”的核心，因此，我们必须对其进行系统的数据素养与评价素养培训。评价素养培训则需帮助教师掌握数智化评价的新理念、新工具与新方法，理解其优势与局限，学会在人机协同中发挥主导作用——技术负责处理海量数据和常规分析，教师则专注于技术难以衡量的情感关怀、创造力激发和价值观引领等高级育人工作。

数智化评价跨越教育、技术、法律等多个领域，绝非任何单一主体能够独立承担，必须构建一个多元共治的新格局。政府应承担起宏观规划，统筹管理的“元治理”角色；高校作为主阵地，负责具体实施、日常管理以及营造健康的评价文化；技术企业则需恪守伦理底线，提供安全、可靠、透明的技术与产品，并建立良好的售后服务和迭代升级机制；学术专业组织应参与标准制定与质量认证。通过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协商机制，明确各方的权责利边界，方能形成推动评价改革持续深化的强大合力。确保这场数智时代高等教育评价的深刻变革能够真正落地见效，惠及每一个高校学生。

参考文献:

- [1]周光礼.破“五唯”立新标: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36(03):15-18.
- [2]习近平: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EB/OL].(2023-09-15).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9/content_6904156.htm.
- [3]张炜.高校人才评价改革如何突破“五唯”困局[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0(3):5-11.
- [4]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N].人民日报,2018-09-11(1)
- [5]于孟任,何晓芳,牛姝颖.器道之间:论大学教学新技术应用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J].当代教育论坛,2024(6):68-75.
- [6]戚万学,等.教育大数据的伦理诉求及其实现[J].教育研究,2019,(7)
- [7]韩炳哲.精神政治学[M].关玉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49-53
- [8]刘永贵,郑旭东.专业协会在大学创新发展中的独特作用——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的成功之道探秘[J].复旦教育论坛,2009,(01):21-24+29.
- [9]UNESCO. (2021). AI and education: Guidance for policy-makers. Paris: UNESCO.
- [10]Selwyn, N. (2021). Digital Ethics. Bloomsbury Academic.
- [11]范涌峰,宋乃庆.学校特色发展测评模型构建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2):68-78.
-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6.
- [13]倪娟.高质量基础教育评价体系的内涵、重点及实现策略[J].人民教育2024(10):10-14.
- [14]张缨斌,陈孝然,胡小勇.协作学习中同伴对话反馈策略的异质效应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25,(5):86-93、102.
- [15]李梅,葛文双.基于项目的在线协作学习支架策略探究[J].现代远距离教育,2021(1):40-47.

Empowering Higher Education with Digital Intelligence for Scientific Evaluation and Talent Quality Improvement: Dilemmas, Challenges, and Breakthrough

Paths

JianHong Wu

(Jing Hengyi school of Educatio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name, HangZhou, China)

Abstract: Educational evaluation is the core guide to ensuring talent quality and dir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its scientific transformation is crucial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Currently,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faces three major challenges: imbalanced evaluation orientation, single-dimensional criteria, and functional distor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to meet the urgent demand for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framework.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make it possible to build a scientific evaluation system that is multidimensional, full-process, and value-added; however, their application still faces challenges in terms of technological implementation, ethical regul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above challenges, establish the core values of people-oriented, technology-for-good, construct a technological system that is integrative, intelligent, and secure, and improve the evaluation implementation ecosystem through policy guidance, capacity building, and multi-stakeholder coordination, ultimately promoting a return to the educational essence of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and effectively enhancing talent quality.

Keywords: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Scientific evaluation; Improvement of Talent Quality

汉字构形学视角下中小學生书法教育培训摭谈

张鑫

(云南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书法是以汉字为书写载体的一门艺术, 书法与汉字的内在关联为跨学科教学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尝试将书法教学与汉字教学深度耦合, 以探索汉字构形学视角下中小學生书法教育培训的方法、内容、原则, 力求为当下中小學生书法教育培训这一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可能路径。

关键词: 书法; 中小學生教育培训; 汉字构形学; 跨学科教学

基金项目: 云南大学 2025 年春季学期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20251191)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414

一、引言: 中小學生书法教育培训行业概况

自 2021 年 7 月“双减”政策实施以来, 文化培训市场虚火大降, 学科教育类培训机构受到冲击大幅压减, 艺术教育类培训机构迎来新的发展空间。多数原本以 K12 主科应试教育为业务重心的经营者为探索新的增长点, 逐步转向为学生提供素质文化教育培训资源。^[1]书法教育培训因其与中小學生语文课程的紧密关联, 在提升学生主科应试能力与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发展这两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小學生教育培训行业中的地位有显著的上升趋势。

作为文化产业, 中小學生书法教育培训一般在节假日为中小學生提供硬笔书法、毛笔书法的线下指导和培训, 与中小學校内的书法教育这一文化事业进行着良性互动, 共同挖掘和发挥书法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以德润心的多维育人价值功能, 从而推动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相较于学校教育, 中小學生书法教育培训具有灵活性强、周期性短、区域性强、学员不稳定、规模较小等特点, 整个行业缺乏较强实力和品牌影响力的书法培训机构。据付梦楠、董光华, 朱芳红、马文英、李赟、金京、任亚萌等学者的研究, 当前的中小學生书法教育培训多以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等事业单位组织的书法考级作为教学与考核的重点。^[2-7]对此, 张卫清在《中国书法产业学概要》中对中小學生书法教育培训行业现状做出了“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的论断, 并指出未来的中小學生书法教育培训将围绕实现课程体系、教学系统的差异化和体系化迈入竞争更加激烈的产业化升级阶段。^[8]如何实现差异化, 提供更为中小學生接受的书法教育培训? 如何形成体系化, 制定愈发标准完善的教学培养教案? 成为了当下把握中小學生书法教育培训的新增长与新机遇的关键所在。

二、跨学科教学思路下书法教育与汉字构形学的深度耦合

2.1 书法为表, 汉字为里

书法是以汉字为书写载体的一门视觉艺术, 书法与汉字两者犹如花与根, 互为依存。当先民还在利用卜辞进

作者简介: 张鑫 (2003—), 男, 云南大学文学院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民间文学、汉语言文字学。

通讯作者: 张鑫

行占卜时,已开始追求甲骨文的美感。随着工具和书写材料的进步,书法作为艺术逐渐形成。秦统一文字后,小篆成为正式字体,其圆转的笔法为书法奠定了基础。汉代流行了隶书,书法的笔法中出现了方笔与折笔。魏晋时期,草书、行书、楷书发展迅速,为唐宋元明清的书法繁荣做好铺垫。近现代,草书楷化简化字则引发了对书法与简化字新关系的讨论。书法的发展历程与汉字文化的演变互为映射,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审美追求和智慧结晶。也正是如此,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才会于开篇处指明“汉字和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并且进一步提出书法教育要能够让学习者“感受汉字与书法的魅力,增强文化自行和爱国情感”的总体目标。^[9]

在书法教学中忽视汉字这一书写载体,势必会影响书法教学的成效。陈振濂在《书法教育学》认为书法应该是一种文化现象,包括了古典文学、文字学、篆刻、绘画四个侧面:“(古典文学、文字学、篆刻、绘画)是站在书法以外——或是一种泛艺术式的、泛修养式的立场上。正因为书法教育学是一门非常复杂、非常丰富又具有多层次的多维构成的学科,所以它不会把这种非本体的学科结构拒之门外,对它而言,这种横向结构只会为书法教学本身带来莫大好处。”^[10]既然将文字学知识扩展到书法教学中有能预见“莫大好处”,那么如何实现跨学科思路下的书法教学与汉字教学的有机结合,就成了当下教学创新的重点。

2.2 作为关锁的汉字构形学

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有理据的构形是汉字的基本特点,也称为字理。对于汉字构形的探索,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如《左传》“止戈为武”“反正为乏”“皿虫为蛊”,《韩非子》“自环谓之私,背私谓之公”。这些分析或出于某种意图,但确实为人们对汉字构形最朴素的认知。“六书”是汉字构造的系统讨论,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周礼》把六书作为教育贵族子弟的六艺之一来看待,但没有具体说明其内容。到了汉代,班固、郑众、许慎各举其说,把“六书”解释为文字的六种结构类型。许慎著《说文解字》,就是以小篆形体为依托,解释构意、确立部首,归纳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六种汉字的构成模式和使用方式,影响此后上千年的汉字构形研究。

汉字构形学理论是对许说“六书”的扬弃,属于当今汉字学研究的重要基础理论,以探讨汉字的形体依一定的理据构成和演变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基础科学,其中演变规律包括个体字符的构成方式和汉字构形的总体系统中所包括的规律。^[11]理论脱胎于王宁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发现的小篆构形系统。王宁利用从元素、结构与层次、结构模式三个方面测查出的相关数据,验证了《说文解字》小篆构形系统的存在状况,并展示了小篆构形系统的面貌。在小篆构形系统的发现中,王宁归纳出来一套借用现代科学术语和系统论的方法并且适用于历代的、各种字体的汉字的描写分析理论,也就是汉字构形学理论。该理论于1995年以《汉字构形学讲座》为题在《中国教育报》上连载。其后,王宁以其为基础,经过对理论长时间的运用、修改与补充,于2002年、2015年先后出版了《汉字构形学讲座》与《汉字构形学导论》,正式建立起汉字构形学理论体系。

汉字构形学是系统的、科学的、与时俱进的。从汉字因义构形的表意特征与汉字构形系统两大方面出发,王宁先生做到了对汉字的理性解读。在《汉字构形学导论》中,王宁讨论了汉字构形学于汉字学中的分支地位,多角度揭示了汉字的性质,梳理了汉字与汉语的密切关系和区别,着重探讨了构形与构意、构件在组合中的功能、汉字的构形模式、汉字构形的共时关系、汉字构形的历时关系和汉字构形系统,提及了汉字构形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以及汉字构形规律与识字教学等方面的重要问题。

2.3 汉字构形学视角下中小學生书法教育培训的路径设想

汉字构形学视角下的中小學生书法教育培训需要在教学方法上充分继承传统书法教育培训的结构意识,在内

容层面做到对汉字构形系统的理论简化,并且坚持以“书法教育培训为正、汉字构形学理论为奇”的教学原则。

2.3.1 以拆分构件厘清结构概念

作为花的书法与作为根的汉字,二者的关系虽紧密相连而又有所区分。实际上,书法教学与汉字教学存在着一定的模糊地带,就比如在两大领域中均频繁运用的概念——结构。

林志强在《汉字学十六讲》中将书法结构和造字结构对举,对“结构”这一模糊概念进行了阐释:“书法结构不考虑形音义关系,而是单纯从外形上看汉字各组成部分之间在空间上是什么关系,如上下结构、左右结构等。造字结构是指汉字体现其形音义关系的结构,如象形、指事、会意等。”^[12]林说可从,“结构”一词在两大领域中的确存在明显的意义区分。在书法中,“结构”是一种书写概念,通常用来描述汉字的笔画、偏旁的状态,包括外部轮廓、构件布局、空间疏密、全字重心等方面的信息。至于汉字构形学中的“结构”,则是一种形音义关系,指代由组成汉字的构件所搭建的构形模式,如全功能构件代表的独体字、表形构件和标示构件组成的标形合成字、表形构件和表义构件组成的形义合成字。

无论是书法结构还是造字结构,在认识过程中都离不开拆分的方法,并且在大部分情况下,二者的拆分结构是可以重合的。比如“菊”在书法结构中是上下结构,上“艹”,下“矦”;在造字结构中则是从艸、矦声的义音合成字。又如“信”在书法结构中是为左右结构,左“亻”,右“言”;在造字结构中则是从人、从言的会义合成字。既如此,拆分构件是书法和汉字构形在学习“结构”的过程中都离不开的基本方法,那么在书法结构的教学中插入造字结构的串讲就有了可行性保障。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汉字的构造、演变之理是客观存在的,受到形体系统和语言系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而不能随意联想和编造。构件的拆分需要严谨、客观,不能随意联想。在《汉字构形原理与中小学汉字教学》中,李运富介绍了随意联想拆分字理及其严重危害:“把‘悲’讲成‘心里面长韭菜’,把‘照’讲成‘一个日本人拿着一把刀杀了一口人滴了四点血’,把‘要’讲成‘西方的女人东方要’,把‘饿’讲成‘我要吃饭’……或误解字形、或违背事理、或错乱层次、或不顾系统、或形义无关。这样讲解汉字虽然‘新鲜’‘有趣’,就个别字来说也可能容易记住,但它破坏了汉字的结构规律和系统,不利于学习相关的其他字,也不利于用形义关系来掌握词义系统,势必给学生以后得学习带来负面影响。”^[13]在构件拆分中,不根据构意而进行的无理拆分难以正确地认识汉字的构形模式,将无理拆分的“发明创造”引入中小學生书法教育培训,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2.3.2 内容:对理论简化契合学习阶

自古以来,汉字构形教学,也就是小学中的文字学问,讲究着循序渐进的方针原则,探索着那少有的执简御繁之法。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的王筠在《文字蒙求·自序》中提过这样的设想:“苟于童蒙时先令知某为象形,某为指事,而会意字即合此二者以成之,形声字即合此三者以成之,岂非执简御繁之法乎?”^[14]王说以“六书”中的前四书为启蒙阶段的认字类别,指出了初学者应从象形字、指事字,到会意字,再到形声字逐步学习的阶梯式路径。通过学习前四书,的确能够直接接触汉字的形音义。清代著名的文字学家戴震曾将许说“六书”细分为“四体二用”,认为前四书是造字法,是汉字构意的直接体现,至于转注、假借则是用字法,为字义、词义的运用关系。如今,汉字构形学理论是当下汉字形体的理据构成和演变规律的集大成总结,是对“四体”理论的系统化梳理、现代化完善。王的设想用可以利用汉字构形学理论进一步解释,就是要先学习全功能构件代表的独体字和具有表示构件的准独体字,在此基础上熟悉表形构件、表义构件之前的组合关系,进而深入掌握具有示音构件的形声字。其思路具有前瞻性,对于当下中小學生接触汉字构形仍有指导意义。

需要注意,系统的、完整的汉字构形学理论对于中小學生而言过于理论化,学习难度相当大,强行灌输的吸收效果必然不佳。故而,合理简化汉字构形学理论,将汉字构形的思路引入中小學生书法教育培训的过程之中,

才是符合中小学生学习阶段性的必要处理。总体来看,王的设想较为符合客观现实,在一定的创造性转化后可以作为汉字构形学视角下中小学生学习书法教育培训的教学参考。

首先,在进行构件拆分后,可以引导学生留意所拆分出来的部件,逐步搭建起“笔画—偏旁—独体字—合体字”的层级关系,激发学生对汉字构意的探究兴趣。其次,可适当介绍构件在组合中的表形功能、表义功能、示音功能和标示功能,有条件的可以再讨论汉字究竟属于表意文字还是表音文字,明确汉字的意音属性。再次,为较高年级的学生简单介绍“结构—功能”分析法,以汉字构形学的理论视角讨论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的造字结构。同时,需注意坚持“先具象,后抽象”的认知习惯,从最容易理解的表形构件出发,理解全功能零合成字、会形合成字;再由形及义学习表义构件,了解形义合体字、会义合体字;接着学习标示构件,领悟标形合成字、标义合成字;此后接触示音构件,对形音合成字、义音合成字以及标音合成字有初步印象。以上便可称为对汉字构形学理论在教学中的恰当简化了。

至于前文汉字构形学理论中较为晦涩、深奥的部分,如汉语的字词关系、异写字与异构字的区分、繁体字与简化字的历时讨论等等,其实并不适合中小学生学习过早地进行系统学习,应该尽量在教学内容中略过、隐去,以适中的学习难度激发中小学生对汉字文化的求知兴趣。

2.3.3 原则:守书法主体活用汉字构形

以“结构”为切入点拆分构件,凭理论简化明确引入内容,是中小学生学习书法教育培训实现差异化的重要抓手。而创新还需守正,汉字构形学视角下的中小学生学习书法教育培训,还需要坚持“以书法教育培训为正,汉字构形学理论为奇”的原则,将重点落实在书法教育培训这一主体上,将汉字构形学理论当作为突出特色穿插于书法教育培训的实践过程中。

对于中小学生学习来说,教师循规蹈矩地讲解汉字的形音义、系统梳理汉字的构形模式,在理论上是可行的,然而这种教学模式并没有真正将汉字与书法相结合,缺少了书写的趣味性。书写之所以有趣,在于其对静态文字的活态化处理。笔分羊毫、狼毫、兼毫,可以适应不同的书写力度;纸分生宣、熟宣、半生熟,能够匹配各异的书写速度;墨有焦、浓、重、淡、清五色,记录着自然书写的笔势变化。书写的体验是自由的、自觉的。控制笔、驾驭纸、活用墨,借助意义载体汉字,或隐喻,或转喻,锚定书写者各自的精神追求、内心世界,是书法的乐趣所在。过于理论化的教学会阻碍中小学生学习书法的乐趣,打击学习的自主性,反而违背了跨学科教学的初衷。

故而,中小学生的书法教育培训应该着重对汉字的书写进行规范,恰到好处地将书法的艺术性感悟以美的形式自由传达出来,在有余力时引导学生了解汉字的理据构成和演变规律,切忌盲目灌输、揠苗助长。

三、余论:对汉字构形学视角下中小学生学习书法教育培训范式的展望

将汉字构形学理论引入中小学生学习书法教育培训,在逻辑上是可行的,在路径上是可循的,而在范式的探索上依然是充满挑战的。范式,犹榜样也,是某领域内可量化的、公认的模式。依靠汉字构形学理论,创新当下中小学生学习书法教育培训的模式,推行一套区分难易程度、便于中小学生学习群体迅速掌握的教案,是范式探索的重中之重。当然,仅仅凭借优秀的教案仍无法确保培训的顺利进行,培养出一批能运用好汉字构形学理论的优秀书法教育者,方为保障范式行稳致远的真正动力。

书法,作为一门根据汉字的特点来造型的独特艺术,是文化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统一体。汉字构形学理论,正是解锁书法文化内核、夯实书法学习基础的关键切入口。中小学生学习借助其进行书法学习,从汉字的造意出发,了解构件理据、演变规律,既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未来,为把握中小学生学习书法教育培训的新增长与新机遇,或可扎根于汉字构形学理论的土壤,以完善的培训范式为支撑,以优秀的教育者为引领,让教案更具针对性、教学更具科学性、学习更具实效性。

参考文献:

- [1] 陈晓姗.SS 书法教育公司发展战略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23:1-3.
- [2] 付梦楠.小学语文教育中软笔书法教育的现状及策略研究[D].鲁东大学,2016.
- [3] 董光华,朱芳红.书法教师队伍现状及培养策略研究[J].美术教育研究,2019,(10):112-113.
- [4] 马文英.小学书法教育课程实践与成效的策略研究[J].科技资讯,2020,18(07):107-108.
- [5] 李赟.J 小学书法艺术的教育现状及发展策略研究[D].陕西科技大学,2021.
- [6] 金京.现代书法教育文化传承功能实现路径与策略研究[J].文化学刊,2021,(09):175-177.
- [7] 任亚萌.书法跨文化教学问题及策略研究[D].西南科技大学,2023.
- [8] 黄建新.中国书法产业学概要[M].浙江: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2:106-112.
-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EB/OL].(2013-01-25)[2026-02-10]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s8001/201301/t20130125_147389.html
- [10] 陈振濂.陈振濂学术著作集 书法教育学[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21-22.
- [11] 王宁.汉字构形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72.
- [12] 林志强.汉字学十六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124.
- [13] 李运富.汉字构形原理与中小学汉字教学[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1:43-44.
- [14] 王筠撰;林贤,刘娜点校.文字蒙求[M].北京:中华书局,2021:1.

A Study on Calligraph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haracter Morphology

Zhang Xin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Abstract: Calligraphy is an art form that takes Chinese characters as its writing carrier. The inherent connection between calligraphy and Chinese characters lays a solid and feasibl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eply integrate calligraphy teach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so as to explore the methods, contents and principles of calligraph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haracter morphology, and strive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ossible paths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of calligraph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Keywords: Calligraph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Chinese character morphology;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小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现状分析与提升路径

丁建华, 董 辉, 王环宇

(唐山师范学院, 河北 唐山 063009)

摘要: 本文以《教师数字素养》标准为指导, 通过问卷与访谈对唐山市小学英语教师的数字素养现状展开调查。研究发现, 当前小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整体处于中上水平。差异分析表明, 教龄是影响教师数字化意识的显著因素, 教龄越短数字化意识越强。但在数字知识、技能与应用等实践维度上, 不同教龄、学历及职称教师之间均无显著差异, 揭示出实践困境具有普遍性。基于研究发现, 本文从环境支持、校本实践、个体发展三个层面系统构建小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路径。

关键词: 小学英语教师; 数字素养; 现状分析; 提升路径

基金项目: 唐山师范学院 2025 年度校级科研 (学科建设) 项目 (课题批准号: 20251143002)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419

一、引言

教育部 2022 年 11 月发布的《教师数字素养》成为教师数字素养发展的指导性文件。《教师数字素养》对教师数字素养的定义是指教师适当利用数字技术获取、加工、使用、管理和评价数字信息和资源, 发现、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问题, 优化、创新和变革教育教学活动。在基础教育数字化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 小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的发展已成为驱动学科教学创新与育人模式转型的关键支点。本文旨在对区域小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发展现状进行调查研究, 以期为地方小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提供一些参考。

二、研究设计

本文参考《教师数字素养》对教师的要求和已经制定的中小学教师数字素养问卷 (彭红超, 朱凯歌, 2024) 制作小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调查问卷。

表 1 小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调查问卷指标描述示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描述
数字化意识	数字化认识	数字技术对于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技术与资源正在促使教育向数据化、个性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数字化意愿	能够主动了解数字技术资源的功能作用, 积极探索数字技术支持的教学实践, 如与智能设备或工具协同教学。
		合理使用数字技术资源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习成绩。
	数字化意志	在使用数字资源过程中, 能够主动解决出现的问题。

问卷包含一级指标 5 个, 二级指标 13 个, 指标描述 28 项 (表 1)。问卷第一部分为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学历等基本信息, 第二部分为问卷主体, 从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数字社会责任、数字专业发展五个维度对数字素养现状进行了解。问卷除基本信息外, 选项采用 Likert5 级量表, 1-5 分分别为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一般、比较符合、完全符合。问卷量表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61。问卷以线上匿名填写方

作者简介: 丁建华(1992—), 女,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董 辉(1978—), 女, 硕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外语教学与翻译研究;
王环宇 1979—), 男, 硕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式,面向唐山市内小学英语教师发放。收回问卷 99 份,有效问卷 98 份。问卷分析后,对部分英语教师进行访谈。

三、研究结果和分析

(一) 小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现状

在收回的问卷中显示,男性教师占比 10.81%,女性教师占比 89.19%。其中年龄在 20-30 岁之间的占比 43.24%,31-40 岁之间的占比 29.73%,41-50 岁之间的占比 24.32%,51 岁及以上的占比 2.7%。调研的教师中,教龄在 1-5 年的占比 54.05%,数量最多;教龄在 6-10 年的占比 16.22%,教龄在 11-15 年之间的占比 21.62%,在 16 年及以上的占比 8.11%。教师学历本科的占比 70.27%,研究生 29.73%。取得一至三级职称的占比 64.86%,取得高级职称的占比 5.41%。

问卷结果显示,唐山市内小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发展水平存在差异(表 2)。整体来看,教师的数字素养水平处于中上层次,但在不同维度上表现出显著的内部差异。五个一级指标的得分情况由高到低分别是数字化意识、数字社会责任、数字专业发展、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这一结果表明,教师的数字化意识最为突出,且在数字社会责任方面的自我评价也相对积极,但在涉及具体实践的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尤其是数字化应用层面,平均得分相对较低,成为其数字素养结构中的相对薄弱环节。

表 2 唐山市小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发展整体情况

变量名	平均值	标准差
数字化意识	4.249	0.584
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	3.73	0.808
数字化应用	3.67	0.997
数字专业发展	4.061	0.956
数字社会责任	4.189	1.009

本研究分别邀请了教龄 2 年、8 年、11 年的教师进行访谈,三位教师的职称分别是尚未取得职称、二级、和高级。访谈内容中也呈现了小学英语教师在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层面的困境。教师普遍认同数字素养的重要性,一位有 11 年教龄的高级教师提到,“现在科技融入教学是发展趋势,所以教师们意识上肯定都到位了”。然而,当谈及具体应用时,挑战则普遍存在。一位刚工作 2 年尚未取得职称的教师表示,“培训学了很多软件和理念,但真到自己设计一堂融合技术的课,还是不知道怎么下手,怕课堂失控,也怕流于形式”。另一位从教 8 年的教师则指出了结构性困境,“日常教学任务、各类比赛已经占满了时间,很难有精力去系统钻研和打磨技术融合的课”。这些叙述共同揭示了从意识到应用之间存在困难,涉及技能转化、时间精力与课堂管理等多重现实约束。

(二) 小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差异分析

本研究就不同教龄、不同学历和职称的教师呈现的数字素养得分情况进行差异性分析。根据不同的变量,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影响因素差异性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学历和职称的教师五个一级指标下得分均未呈现显著性差异。不同教龄的教师,在数字化意识这个指标下呈现出了显著性差异(Welch's $F=5.036$, $p<0.05$)。事后多重比较(LSD)结果表明,1-5 年教龄教师的数字化意识平均得分($M=4.49$, $SD=0.42$)显著高于 11-15 年教龄($M=3.90$, $SD=0.63$; $MD=0.59$, $p=0.009$)与 16 年及以上教龄的教师($M=3.53$, $SD=1.29$; $MD=0.957$, $p=0.005$)。同时,6-10 年教龄教师($M=4.27$, $SD=0.62$)的得分亦显示出高于 16 年及以上教龄教师的趋势($MD=0.733$, $p=0.050$)。其余教龄组间的两两比较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四、研究结论和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唐山市小学英语教师的问卷调查与访谈分析,发现当前小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整体处于中上水

平,呈现出“意识领先、应用滞后”的显著特征。教师普遍对数字化教学的必要性具有高度共识,且在数字社会责任层面自我评价积极,但在将技术知识转化为有效的课堂应用与掌握核心技术技能方面存在明显短板。不同教龄的教师在数字素养上呈现差异化特征,教龄越短的教师,其拥抱数字化的内在认同与倾向性越强。在涉及具体知识、技能与应用的维度上,不同学历、职称及教龄的教师均未表现出显著差异。这表明,实践层面的挑战是全体教师面临的共同困境,而非特定群体的独有问题。

(二) 小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提升建议

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建立“需求调研-精准培训-课堂实践-成果评估”的闭环。建设并推广本土化、学科化的数字资源库。推行分层、精准的培训模式。设立数字素养提升专项激励与认可机制。

学校应将数字素养提升深度嵌入英语教研组活动。建立学科-技术融合的校本教研新常态。鼓励形成青年技术导师+资深教学导师的跨龄结对组合。明确鼓励教师在常态课中进行技术尝试,提供安全、可及的技术试错环境。

教师在应用技术时,应首先明确本节课的核心语言学习目标,再反向思考何种技术或数字资源能最有效地服务于此目标。要确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技术应用观。拓展个性化学习路径,主动利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MOOCs等资源,进行有针对性的自学。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发布《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的通知[EB/OL]. (2022-12-02) [2023-06-20].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2302/t20230214_1044634.html.
- [2] 彭红超,朱凯歌. 中小学教师数字素养测评问卷的本土化构建——基于《教师数字素养》行业标准[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24, 36(5): 72-82.
- [3] 杜岩岩, 黄庆双. 何以提升中小学教师数字素养——基于X省和Y省中小学教师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21(4): 62-69.
- [4] 张曼. 小学英语教师的数字素养提升研究[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24, 40(12): 101-105.
- [5] 金志杰, 陈星. 数字化背景下中小学教师数字素养现状与提升路径[J]. 教师教育研究, 2024, 36(5): 74-82.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Digital Literacy Among Elementary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and Pathways for Improvement

Ding Jianhua, Dong Hui, Wang Huanyu

International Affairs Office,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Tangshan, Hebei, China

Abstract: Guided by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teachers,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igital literacy of elementary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in Tangshan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digital literacy of teachers is at an above-average level. The variance test shows that the age of the teachers' teaching is a signific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teachers, and the younger the teaching tenure, the higher the digital awareness of teachers; bu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digital awareness of different age of teaching, etc. among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ages of teaching, backgrounds and titles, for their practical aspects such as digital knowledge, digital abilities, digital application, which indicates the practical problems are common. This article further builds a path of how to improve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institution-level support, school-level practice, and individual-level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findings.

Keywords: Primary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Current situation analysis; Improvement path

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思政教育实践路径研究 ——以侗族琵琶歌为例

杨 婧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0)

摘 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将非遗文化融入思政教育, 有助于丰富教育内容、创新育人方式、增强文化自信。侗族琵琶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承载着侗族的历史记忆、道德规范、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 具备天然的思政教育属性。本文以侗族琵琶歌为研究对象, 阐释其融入思政教育的价值内涵, 分析当前融合过程中存在的现实困境, 并从课程建设、教学模式、实践平台、师资队伍、保障机制五个方面提出实践路径, 为非遗文化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提升立德树人实效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思政教育; 侗族琵琶歌; 实践路径

基金项目: 湖南省学校文化建设促进会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思政教育实践路径研究——以侗族琵琶歌为例”(WCH25YB64)成果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416

思想政治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环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思政教育的根与魂, 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传统文化最鲜活、最贴近生活的表现形态。侗族琵琶歌流传于湘黔桂侗族地区, 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1]。侗族琵琶歌中所蕴含的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民族精神, 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追求, 热情善良的淳朴民风以及团结友爱互助的集体观念和严格自律自强的道德观等美德都非常值得借鉴与弘扬。^[2]以歌载道、以歌传情、以歌育人, 与思政教育的价值目标高度契合。将侗族琵琶歌融入思政教育, 既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需要, 也是推动思政教育守正创新的重要举措。

一、侗族琵琶歌融入思政教育的价值内涵

侗族琵琶歌是广泛流传于贵州、湖南及广西三省(区)侗族南部方言区的以侗语南部方言演唱, 以侗族民间自制琵琶为主要伴奏乐器, 兼具抒情与叙事功能的民间歌曲。^[3]侗族琵琶歌是侗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口头传统与表演艺术, 集历史叙事、道德教化、情感表达、文化认同于一体, 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教育性与时代性。将其融入思政教育, 能够为思政课堂注入传统文化养分, 实现价值引领、文化传承、情感浸润与实践育人的多重目标。

(一) 道德教化价值

涵养道德品格, 筑牢育人根基。侗族琵琶歌以歌唱为载体、以美德为内核, 将中华传统美德融入质朴动人的旋律与歌词之中。其传唱内容广泛涉及诚实守信、尊老爱幼、勤劳节俭、团结互助、友善待人等道德规范, 这些内容源于日常生活、贴近百姓情感, 语言朴实、朗朗上口, 易于在学生中传播和接受。与抽象的理论说教不同, 侗族琵琶歌以故事化叙事、情感化表达、艺术化呈现的方式, 将道德准则自然而然地融入具体情境之中。学生在欣赏与学唱的过程中, 不是被动接受道德训诫, 而是在歌声的感染与故事的熏陶中, 潜移默化地明辨是非、涵养品德、修身立德。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教化方式, 有助于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在情感认同中实现价值认同, 在审美体验中完成道德内化, 从而夯实思想政治教育的道德根基, 实现以文化人、以美育人的教育目标。

作者简介: 杨婧(1993—), 女,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通讯作者: 杨婧

（二）家国情怀价值

厚植爱国情感，铸牢民族认同。侗族琵琶歌作为侗族人民世代传唱的口头艺术，承载着他们对家乡山水的深切眷恋、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定认同、对伟大祖国的真挚热爱。众多曲目或歌颂各民族团结和睦、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或赞美祖国山河壮丽、地大物博的锦绣画卷，或颂扬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的火热实践，字里行间蕴藏着深沉厚重的家国情怀。将侗族琵琶歌融入思政教育，不是简单的外来点缀，而是以鲜活的民族文化为载体，让学生在歌声中触摸历史的脉搏、感知时代的变迁，国家的发展与民族的进步，从而在情感深处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归属感与自豪感。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引导报国之行，让爱国主义不再是书本上的口号，而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精神力量，真正实现爱国主义教育的具象化、生活化与常态化。

（三）文化自信价值

传承非遗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侗族琵琶歌源于乡野、传于民间，历经数百年口耳相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侗族历史记忆、审美观念与精神追求的活态载体。它以歌声记录民族的迁徙足迹，以旋律传递先民的生活智慧，以词章承载世代的价值追求，凝聚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血脉与精神气质。通过课堂学习、曲目赏析、技艺体验等方式，学生能够直观感受非遗艺术魅力，理解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与博大精深，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这有助于打破对传统文化的陌生感与疏离感，引导学生自觉传承中华文脉，增强文化自信，成为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参与者、推动者，在民族复兴的时代进程中贡献青春力量。

（四）情感浸润价值

以美润心育人，提升人文素养。侗族琵琶歌曲调悠扬、意境深远，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与情感张力。以音乐艺术为媒介开展思政教育，能够突破传统课堂的单向灌输模式，将思想政治教育与非遗技艺体验有机融合，实现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在欣赏、学唱、体验过程中，学生的审美能力、情感表达能力与心理调适能力得到提升，人文素养与精神境界不断丰富，让文化与价值观念得以内化于心，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从“明理”到“动情”再到“践行”的深度转化，实现认知、情感、行动三者的深度统一与良性循环。

（五）实践育人价值

推动知行合一，强化责任担当。侗族琵琶歌不同于静态的文本知识，强调口传心授、群体传唱与现场演绎，本身具有鲜明的实践性，这使得琵琶歌天然具备“在做中学、在学中悟”的实践品格。融入思政教育后，可以突破“知”与“行”之间的壁垒，为学生提供丰富而鲜活的实践载体。通过采风调研、曲目创编、舞台展演、志愿服务等活动，提升组织协调、团队合作与创新实践能力，引导学生在非遗传承中理解社会责任与文化使命。这种从“知”到“行”、从“行”到“责”的递进，有助于强化青年一代的历史主动精神与时代担当意识，引导他们将个人成长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在传承中华文脉的实践中书写青春答卷。

二、非遗融入思政教育的现实困境

（一）课程融合不足

当前，非遗内容在思政课程中的融入方式多为零散补充或课外活动点缀，尚未形成与课程体系有机衔接的长效机制。侗族琵琶歌等非遗资源虽然具有丰富的教育价值，但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如何将其自然、贴切地嵌入思政课的知识体系和教学环节，仍有待进一步探索。目前，二者的结合多停留在简单介绍或临时性活动层面，缺乏在教学方案、课堂设计等方面的系统整合，导致非遗所承载的文化精神与思政教育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尚未实现深度融合。

（二）教学方式单一

当前，课堂教学仍以理论讲授、文本解读为主要形式，教学方式相对传统单一。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往往侧重于对政策理论、价值理念的系统讲解与逻辑阐释，虽有助于学生建立基本的认知框架，但在调动学生感官体验、激发情感共鸣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具体到侗族琵琶歌等非遗资源的教学运用，目前尚未充分引入赏析体验、传承人现场演示、情景再现、田野调查等更具参与感和互动性的教学方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对非遗文化内涵的直观感受与情感共鸣，也难以充分发挥非遗“以文化人、以美润心”的独特优势。

（三）师资力量薄弱

当前，思政课教师在非遗专业知识及文化解读方面存在一定知识盲区，对侗族琵琶歌等非遗资源中蕴含的思政元素的挖掘与转化能力有待提升；而民间非遗传承人虽然技艺精湛、文化积淀深厚，但普遍缺乏教育学背景与系统的思政教学经验，在将文化传承与思想引领有效结合方面尚需探索。两类师资之间缺乏常态化的协作机制，容易出现“懂思政的不熟悉非遗，懂非遗的不擅长思政教学”的现象。

（四）实践平台有限

目前，校内外可供开展非遗实践教学基地数量偏少，功能也相对单一，多以参观性、展示性场所为主，缺乏能够支持学生深度参与、动手实践、互动体验的综合性平台。受此制约，常态化开展采风调研、田野记录、展演交流、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面临较大困难，难以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实践教学机制。学生在学习侗族琵琶歌等非遗内容的过程中，大多局限于课堂听讲与资料查阅，鲜有机会走进侗族村寨近距离聆听原生态演唱，也较少能参与传承人的工作坊、技艺传习等活态传承活动。实践环节的薄弱，使得学生对非遗的理解停留在知识层面，难以将课堂所学的价值理念与文化认同转化为亲身感知与实际行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思政教育“知行合一”目标的实现。

（五）长效机制缺失

目前，部分高校尚未将非遗融入思政教育纳入顶层制度设计，在专项经费支持、固定课时安排、考核标准制定、激励政策配套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缺口。由于缺乏稳定的资源投入与制度支撑，相关融合工作多以短期项目、临时活动或个别教师的自发探索为主，难以形成系统推进、持续深化的良好态势。现有的教学评价体系仍以传统理论考试为主，侧重于对学生知识掌握程度的考查，而对学生在文化传承、实践参与、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的表现关注不足。这种评价导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师生参与非遗融入思政教育的积极性与持续性，也使得融合工作容易出现“短期化、运动化”倾向，难以建立起常态化、长效化的运行机制。

三、侗族琵琶歌融入思政教育的实践路径

民族民间音乐文化是我们丰富的教育资源，在民族文化中蕴含着无穷的智慧，需要通过教育来进行传承。^[4]针对当前非遗融入思政教育的现实困境，以侗族琵琶歌为具体载体，从课程、教学、实践、师资、机制五个维度构建系统化、可操作、可持续的实践路径，推动非遗文化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协同育人。

（一）构建融合型课程体系，夯实教学基础

将侗族琵琶歌等非遗资源系统嵌入思政课程体系，形成“必修课+社会实践+专题模块”的课程结构。把侗族琵琶歌中的家国情怀、道德规范、民族精神、文化自信等内容，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形势与政策》等课程，开发特色教学案例与专题章节。同时设计专题社会实践教学课件，明确教学目标、内容、课时与考核要求，实现非遗文化与思政教育从“简单相加”走向“深度相融”，确保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有机统一。

（二）创新沉浸式教学模式，提升育人实效

打破传统理论讲授模式，构建“听、赏、学、演、创”一体化沉浸式教学模式。邀请侗族琵琶歌非遗传承人走进课堂现场教学，开展歌曲赏析、歌词解读、故事讲述、情景模拟、学唱表演等互动活动；利用短视频、微课、线上展厅等数字化手段，拓展教学时空；采用案例教学、小组研讨、主题汇报等方式，引导学生主动挖掘琵琶歌中的思政内涵。通过实践活动，增强学生对侗族琵琶歌的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深入领会侗族琵琶歌的优秀德育思想，吸取侗族琵琶歌德育内容养分，提升整体思想道德水平，^[5]让思政课堂从“单向灌输”变为“双向互动”，显著提升吸引力、感染力与实效性。

（三）搭建校内外实践平台，推动知行合一

搭建“校园文化+社会传承”双场域实践平台。用民族文化进校园的形式，让侗族琵琶歌在校园中得到传承和发展，为社会培养更广泛的传承人和受众。^[6]在校内举办侗族琵琶歌展演、非遗文化节、主题班会、演讲比赛、文创设计等活动，营造文化育人氛围。在校外与侗族村寨、非遗保护中心、文化馆、传承基地合作，建立稳定的思政实践教学基地。组织学生开展实地采风、田野调研、文化志愿服务、非遗记录与宣传等活动，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理解文化价值、强化责任担当，实现思政教育从课堂走向生活、从认知走向践行。

（四）建设复合型师资队伍，强化专业支撑

打造“思政教师+非遗传承人+专业教师”三位一体的复合型教学团队。定期对思政教师开展非遗知识、文化解读、艺术鉴赏等专项培训，提升教师挖掘非遗思政元素的能力；聘请优秀侗族琵琶歌传承人担任兼职教师、实践导师，参与课堂教学与实践指导；建立跨学科教研机制，推动思政教师与音乐、文学、传统文化等学科教师协同备课、联合教研，破解“懂思政不懂非遗、懂非遗不懂思政”的难题。

（五）完善长效保障机制，确保常态运行

推动侗族琵琶歌有效融入思政教育，需要在制度、经费、评价等方面逐步建立相应保障。在制度层面，可将非遗融入思政教育纳入学校立德树人整体规划，在教学安排、师资协作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在经费方面，无需

单设专项,可依托美育建设、社会实践、校园文化等既有渠道统筹使用资源。在评价方面,可将文化理解、参与态度、实践表现等纳入过程性考核,替代单一理论考试。通过制度化、长效化推进,使融合工作从“短期探索”走向“常态开展”,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四、结语

侗族琵琶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集道德教化、家国情怀、文化传承、美育浸润于一体,是非遗资源有机融入思政教育的典型样本与优质载体。以侗族琵琶歌为抓手推进思政教育创新发展,既能激活优秀民族文化的当代价值,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又能打破传统思政教育的内容局限与形式单一,显著提升思政教育的针对性、亲和力与实效性。

当前,非遗与思政教育的融合仍面临课程碎片化、教学模式传统、师资支撑不足、实践场域有限、长效机制欠缺等现实问题,需要以系统思维统筹推进、逐项破解。通过构建融合型课程体系、创新沉浸式教学模式、搭建立体化实践平台、建设复合型师资队伍、完善制度化保障机制,能够真正实现非遗文化与思政教育同向同行、协同育人。

新时代背景下,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融入思政教育,是落实“第二个结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未来应持续深化文化育人实践,让非遗文化从“课堂”走向“生活”、从“传承”走向“创新”,不断增强青年学生的文化自信、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 [1]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侗族琵琶歌[EB/OL].(2025-04-10)[2025-04-24].<https://www.ihchina.cn/art/detail/id/12469.html>
- [2] 杨宛.黔东南黎平县非遗文化侗族琵琶歌德育价值及实现路径研究[D].桂林电子科技大学,2024.DOI:10.27049/d.cnki.gglde.2024.000227.
- [3] 胡小东.歌唱与生活:侗族琵琶歌研究[D].广西民族大学,2022.DOI:10.27035/d.cnki.ggxmc.2022.000015.
- [4] 罗卉.侗族民间器乐的文化内涵解析——以侗琵琶为例[J].艺术品鉴,2020,(09):331-332.
- [5] 张志刚,杨宛.贵州少数民族非遗文化德育价值及实现路径研究——以黎平县侗族琵琶歌为例[J].中国民族博览,2023,(24):35-37.
- [6] 王灿然,卢笛.试论广西侗族琵琶歌的文化价值与传承发展[J].黄河之声,2016,(16):96-97. DOI:10.19340/j.cnki.hhzs.2016.16.065.

Research on the Practical Path of Integra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aking Dong Pipa Song as an Example

Yang Jing

Hunan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Changsha, Hunan, China

Abstra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a valuable resourc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Integra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elps enrich educational content, innovate education methods, and strengthen cultural confidence. As a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ong Pipa Song carries the historical memory, moral norms, national spirit and patriotism of the Dong people, and has natur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ttributes. Taking Dong Pipa So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value connotation of its integration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alyzes the practical dilemmas in the current integration process, and puts forward practical paths from five aspects: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teaching mode, practice platform, teaching staff and guarantee mechanism,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morality education.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ong Pipa Song; Practical Path

心理情景剧在提升唇腭裂儿童自我效能中的实践应用

项毅馨¹, 宋方港², 倪宸好², 陈涵涵², 袁伊尔²

(1.温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浙江 温州 325025, 2.温州大学教育学院, 浙江 温州 325035)

摘要:唇腭裂患儿由于生理特点, 容易遭遇社交难题和心理方面的困扰, 自我效能感的缺乏会明显对其治疗配合度和社会适应状况产生影响, 传统的心理支持手段存在体验性欠佳的问题。以心理情景剧作为干预途径, 分析该群体在医疗康复、人际互动与情绪调节方面面临的效能感难题, 给出医院社工服务、团体心理疏导、学校与社区融合教育三个方面的应用途径。针对跨学科团队稀缺、剧本设计失当与评估体系不合理等状况, 组建跨学科协作团队, 确立优势视角、积极叙事 SRT 剧本准则, 建立过程与效果相融合的评估体系, 帮助唇腭裂儿童重新建立自我认知、积累应对方面的经验。在未来需基于制度化的合作以及标准化的开发, 把它纳入唇腭裂综合序列治疗当中, 以促进儿童自我效能感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推动其实现社会融入。

关键词:心理情景剧; 唇腭裂儿童; 自我效能; 心理社会适应; 干预策略

基金项目:温州大学 2025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 (JWXC2025040)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420

唇腭裂是在胚胎发育期间面部结构融合出现障碍而导致的一种先天性颅面畸形, 是口腔颌面外科、整形外科中是较为多见的疾病, 也是全球学术领域普遍关注的先天性病症。先天性唇腭裂儿童的治疗周期往往长达数年, 大部分唇腭裂儿童治疗的过程同时也是从童年期到青春期的成长过程, 但在此过程中唇腭裂儿童因外貌缺陷、发音障碍等状况, 更易遭受同伴取笑、社交排斥乃至校园欺凌, 导致他们产生社交忧虑、敏感脆弱、抑郁等负面情绪, 且对其自我概念的建立造成深远影响, 特别是影响了自我效能感的建立。自我效能感作为支持个体顺利完成特定任务的信念, 成决定其是否能坚持治疗、积极交友的主要心理概念。但是传统心理支持手段通常局限于理论知识的单向传授, 缺乏与患儿实际情境的联系以及情感的互动反馈。

心理情景剧借鉴了心理剧疗法, 在中国本土化实践中融入了更贴近中国文化的元素, 被广泛应用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及特殊人群的心理矫治。心理情景剧基于角色扮演激起情感共鸣, 既能够加强患者自我认知和情绪管理的能力, 又可以用具象体验的途径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在这一进程中使心理矛盾外化, 开展心理疗愈并探寻可行的应对办法。对于唇腭裂儿童而言, 这种心理干预方式可将抽象且无趣的心理辅导转变为贴近生活实际的真切体验, 为他们建立起认识自我、学习人际应对、打破心灵封闭桎梏的有效平台。

一、唇腭裂儿童自我效能感的特点

唇腭裂患儿的自我效能感发展, 由于其特殊的生理体验和社会境遇, 展现出复杂且脆弱的特性。这不仅涉及他们怎样看待自身完成特定任务的能力, 还明显地影响着其康复进程、社会融入以及心理承受力。它的发展受到生理限制和外部反馈的共同影响, 在医疗康复、人际互动和情绪调节这三个主要领域面临严峻难题, 这些难题彼此关联, 很容易形成恶性循环。

(一) 自我效能感降低形成的医疗阻抗

作者简介: 项毅馨(2006—), 女, 财务管理专业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公益组织管理;
宋方港(2004—), 男, 应用心理学专业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特殊儿童心理学;
倪宸好(2004—), 女, 小学教育专业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小学教育;
陈涵涵(2005—), 女, 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特殊儿童教育;
袁伊尔(2005—), 女, 小学教育专业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小学教育。

通讯作者: 袁伊尔

自婴儿阶段起,唇腭裂儿童就要应对一系列如唇裂修补、腭裂修补等手术以及漫长的序列医治。在这一进程里儿童会经历疼痛发作、繁杂术后护理以及他人异样目光,易产生恐惧、焦虑和无力之感。这种效能感的缺乏,直接降低他们坚持枯燥康复训练的内在动力。

(二) 自我效能感缺乏导致的人际阻碍

社交互动是唇腭裂儿童心理挑战的主要场域。脸部瘢痕、鼻唇部畸形以及因这些状况引发的构音困难、发音不清晰等情况,让他们在人际交往时常常碰到难题。在人际交流中遇到的困境或是异样目光,都可能形成针对自身社交能力的负面回馈。这类负面评价使得他们人际交往的自我效能感大幅降低。这种效能感的降低,在人际互动的情景中外显为社交不安、回避行为,最终在集体活动中处于边缘状态。唇腭裂儿童内心期盼联结,却因担忧不良后果而自行回避,此种心理冲突进一步制约其社交能力的提高,造成恶性循环。

(三) 自我效能感缺失引发的情绪失调

长时间处于社会偏见、同伴疏离以及持续治疗压力的多元环境中,唇腭裂儿童相较于普通儿童,更易感受到集中的负面情绪,像自卑、沮丧、委屈乃至愤怒。但因年纪尚轻或缺少引导,他们通常不具备辨别和有效管控这些复杂情绪的方法。消极情绪若无法疏解,不断积累不但会诱发抑郁、焦虑等心理状况,还会很大程度上消耗其心理能量,降低应对挫折的韧性(心理韧性),导致其整体的自我效能感明显下降。

二、心理情景剧在提升唇腭裂儿童自我效能感中的实践路径

对于唇腭裂儿童来说,心理情景剧的开展不只是单独的娱乐项目,而要深度融入其综合关怀方案,建立多元、协作的应用方式,进一步系统性加强他们在医疗、社交、学业以及情绪调控等主要方面的自我效能感。

(一) 与患儿医务社工支持项目有机结合,转化赋能内源性安全体验

在大型口腔专科医院或儿童医院的唇腭裂诊疗中心,医务社工可与心理治疗师协同,把心理情景剧规划成序列治疗里的常规心理支持单元。这种嵌入式的运用,把引发焦虑的医疗情境转变为儿童能够主动参与并掌控的游戏,进一步直接加强其医疗与康复的效能感。当患病儿童在剧情感受里顺利战胜恐惧,实则是在安全的情境里预演应对之策,这种成功的预先体验能够明显加强其对实际医疗程序的掌控感,确实缓解未知引发的恐惧。

另外对于唇腭裂儿童最为常见的社交难题,医院的帮扶项目能够开设社交模拟剧场。使患儿既扮演处于困境的主角,又依次扮演友好的同伴、有耐心的老师等起到支持作用的角色。此种角色对换,恰是心理剧镜子技巧的显示,可使儿童从多方面领会社交往来。在治疗师的引导之下,他们能够在戏剧里安全地操练怎样简洁阐释自身的状况、怎样开启对话、怎样在紧张之际进行深呼吸等具体技能。

(二) 与唇腭裂儿童团体心理辅导深度融合,构建支持性成长共同体

对于有明显社交焦虑、低自尊或者情绪方面困扰的唇腭裂儿童,封闭式团体心理辅导可提供更深入的干预。心理情景剧作为团体辅导的主要技术,其流程本身便是一场结构化的治愈之旅。起始阶段的破冰活动与简易角色扮演,目的在于营造既安全又富有趣味的团体环境,这是开展有效干预的基础。

进入剧本共创环节,心理咨询师引领成员根据真实经历一同构思剧本,此过程富有赋权价值。当唇腭裂患儿们发觉自身的困扰成为群体一同研究的话题时,孤独感会明显降低,取而代之的是被理解与共同化解难题的归属感。排演时期采用替身手段使扮演者吐露内心独白,亦或采用镜像手段让观察者演绎主角的别样可能,这些专业方法能够帮助儿童加深对自我与他人心理状况的认知,激发更多解决问题的思路。

演出结束后的交流分享阶段,是效能感实现内化的重要节点。心理咨询专业人员能够基于巧妙设计的开放式问题,引领成员从旁观者与参与者这两种视角展开反思。这种结构化的探讨,可把戏剧里的象征性成果与成员自身的实际经历相联系,推动认知重建——也就是将畏惧尝试以及否定自我转化为自信和勇于尝试的胆量。最终把剧中的应对办法归纳成勇气秘诀,并且激励成员在实际生活里认领并实行一项策略,实现从戏剧情境到现实生活的效能感转移。

(三) 与学校社区融合主题教育协同联合,营造包容性社会支持生态

唇腭裂患儿的自我效能感既来自内部转变,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其所在社会环境的作用。所以心理情景剧的运用要走出诊疗室和团体辅导空间,走进学校与社区,由全社会一同努力营造一个理解、包容的支持性环境。对于已经入学的儿童而言,和心理老师的协同开展针对全班的融合教育主题工作坊非常主要。

总体而言心理情景剧加强唇腭裂儿童自我效能感的途径是多维且丰富的。从医院里的专项演练,到团体辅导

时的深入研究，再到学校社区的氛围营造，这三条途径彼此补充、逐步推进，一同帮助把唇腭裂儿童从被动的病患或问题承担者，转变为有本事应对挑战、积极融入社会的主动实行者

三、应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不足与挑战

（一）跨学科指导团队匮乏

心理情景剧在特殊儿童群体中应用时，要求心理咨询师不仅要拥有心理剧或戏剧治疗的基础素养，还得深入掌握唇腭裂的医学知识、儿童心理发展特性、该群体常见的心理社会问题以及可能存在的语言表达局限。当下能够同时精通这些领域的复合型专业人才非常匮乏。

（二）心理剧本主题规划失当

为营造戏剧冲突与感染力，剧本或许会过度夸大唇腭裂儿童所遭遇的歧视、孤立以及痛苦，演变成单纯的悲情诉说。这种沉浸式感受或许反倒强化儿童对受害者身份的认同，加剧他们的无助感，而非提高效能感。

出于保护目的，一些心理咨询师会设定一些和唇腭裂特点毫无关联的通用主题（如一般性的考试焦虑），难以触及特殊儿童真正的主要困扰，干预浮于表面，成效有限。

（三）后期评估科学性不足

当下的评估方法较为单一且简易，一般仅从表演成效、舞台显示等方面开展评价，却忽略心理情景剧给学生心理健康带来的作用。评价方面缺少一套科学且成体系的评价指标，导致难以全方位衡量学生在心理认知、情绪调控和人际交往等方面是否基于参与心理情景剧实现提高。缺少前测与后测的对照，也未对干预效果的长期持续性进行追踪，导致无法证实干预成效。

四、心理情景剧应用于唇腭裂儿童的优化策略

（一）构建与培训跨学科协同指导团队

组建由儿童心理治疗专家、唇腭裂系列治疗医师、沟通指导顾问、戏剧教育授课教师等多种身份组成的核心小组。定时组织联合培训，实现共识加强干预的科学性与有效性。经过理论研习与实践研究，根据特殊儿童的普遍性发展与特殊性发展情况，研发并实施康复课程，把医学康复和教育进行有机融合，将其作为推动教育成效的一种有效辅助方法。

（二）确立“优势视角、积极叙事”的剧本设计原则

剧本创作需遵循 SRT 模型：第一是要真实（Sincere），剧本的感染力首要源自真实。创作应当牢牢立足于唇腭裂儿童的原始生活感受，精确抓取他们在多个挑战里的主要情绪动态。这种真实的展现，规避美化，使儿童觉得自身的经历被关注、被懂得，这是建立干预信任的首个步骤。第二是要重塑（Reframe），在提出问题之后，主要要转向应对与发展，使儿童在这一进程中持续尝试并取得进步，确实帮助患儿自我效能感的建立。第三是要转变（Transform），在剧情里自然嵌入积极心理特质，像坚韧、风趣、求助的智慧、自我认同。把核心矛盾转变为对个人成长以及自我实现的深入思索，最终实现儿童自我认知的提高，实现从缺陷叙述到优势叙述的彻底转变。

（三）强化科学评估体系

建立过程性评价（记录参与状况、情绪展现）和成效评价（运用标准化工具像《儿童一般自我效能量表》或针对性情境问卷）。基于干预前后的对比以及质性访谈的方式，全方位对心理情景剧的治疗效果展开评估。

五、结论

心理情景剧凭借其体验性、创造性以及团体动力的长处，为提高唇腭裂儿童的自我效能感开拓一条颇具潜力的干预路径。它突破简单的心理健康教育讲授，在做里学、演中悟的方案下，使唇腭裂儿童处于安全可控的戏剧情景中，正视主要挑战、操练有效办法、体会成功感觉、重塑自我叙述，进一步渐渐树立起自信。

但是要把心理情景剧这一常规的教育戏剧形式，转变为针对唇腭裂这一特定群体的有力心理干预手段，需要攻克专业化不够、主题设计有误以及评估缺乏等多个难题。未来的实践和研究应着力于：其一促进跨学科合作模式实现制度化，打造专业人才团队；其二深度开发符合优势视角以及唇腭裂儿童心理发展规律的标准化主题剧本库和活动手册；其三开展更多设计严密的实证研究，科学验证其短期和长期成效，同时研究其对不同年龄段、不同严重程度患儿效果的差异；其四探寻将数字技术与心理情景剧相融合，营造更具沉浸感、更具个性化的干预场。

景 最后经由科学的规划、专业的执行和系统的评测,心理情景剧有望成为唇腭裂儿童综合序列治疗里不可或缺的心理社会康复单元,不但提高其自我效能感,还推动其整体生活品质的提高,帮助他们以更自信、更积极的状态融入社会,实现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 [1] 王国民,袁文化,邱蔚六.我国唇腭裂序列治疗的现状[J].口腔颌面外科杂志,1999,(03):58-60.
- [2] 林崇德.发展心理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 [3] 朱晓玥.情景剧中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研究[J].智力,2021,(31):160-162.
- [4] 刘天航.等待——小学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情景剧[J].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23,(32):40-43.
- [5] 王娟,何侃.特殊儿童心理康复课程群建立的实践研究[J].煤炭高等教育,2013,31(06):77-79.
- [6] 郝诗宇.我不孤单——初中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教育情景剧[J].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23,(36):36-38.
- [7] 洪燕萍.情景剧在幼儿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实践研究[J].家教世界,2024,(26):59-60.
- [8] 许越杭.心理剧改善小学一年级多动倾向学生人际关系[D].云南师范大学,2024.
- [9] 陈振亚,刘芳,陈红燕,等.心理情景剧应用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特色、功能与建议[J].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22,(13):28-31.
- [10] 姜桂芳.心理情景剧提升中学生心理资本的实践研究[J].文教资料,2024,(15):146-148.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Psychological Scenario Drama in enhancing Self-Efficacy of children with Cleft Lip and Palate

Xiang Yixin¹, Song Fanggang², Ni Chenhao², Chen Hanhan², Yuan Yier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China; 2 School of Education,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Children with cleft lip and palate are prone to social difficulties and psychological challenges due to their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lack of self-efficacy significantly impacts their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social adaptation, while traditional psychological support methods often exhibit suboptimal experiential efficacy. This study employs psychological situational drama as an intervention approach to analyze efficacy-related challenges faced by this population in medical rehabilitatio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Three application pathways are proposed: hospital social work services, group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integrated school-community education. Addressing issues such as interdisciplinary team scarcity, inappropriate script design, and unreasonable evaluation systems, a multidisciplinary collaborative team is established. Guidelines for positive narrative structured response training (SRT) scripts are developed, and an integrated process-effect evaluation system is implemented to assist children with cleft lip and palate in rebuilding self-awareness and accumulating coping experience. Future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institutionalized collaboration and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 to incorporate this approach into comprehensive cleft lip and palate treatment protocols, thereby enhancing children's self-efficacy, quality of life, and social integration.

Keywords: Psychological situational drama; Children with cleft lip and palate; Self-efficacy; Psychosocial adaptation;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智慧治理场景下社会工作者的角色转型与能力重构

殷瑞芳¹

(1.安徽师范大学,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 智能技术在社会治理领域的深度应用正重塑传统服务模式。本文以浙江省杭州市 Y 社区这一国家级智慧社区标杆为例, 探究智慧治理场景下社会工作者的角色转型与能力重构。研究发现, 在 Y 社区“社区微脑”平台的实践中, 社工的角色从服务执行者转向技术引导者、伦理研判者与人机协同者, 其能力重构则体现为技术素养、伦理反思与人文关怀的复合提升。研究进一步提出, 应通过构建多方协同的责任治理体系、加强数据安全与数字素养建设等路径, 实现智能技术对社会工作专业的可持续赋能。

关键词: 智能技术; 智慧治理; 角色转型; 能力重构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341

一、引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 智慧城市作为全球科技与城市化融合的战略方向, 已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载体。智慧治理作为其基层实践单元, 依托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 重构社区服务生态, 推动管理精细化与服务可及性提升。我国从《“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到党的二十大报告, 均明确将数字社会与智慧城市建设列为重点任务, 2022 年民政部等九部门进一步发文要求社会工作者借助大数据实现精准需求识别与风险预判, 并提出 2025 年建成“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智慧平台目标, 全面推动服务“网上办、指尖办、就近办”。在这一系列顶层设计与政策推动下, 智慧治理已超越工具层面, 深刻重塑治理逻辑与服务场景, 社会工作的场域从线下物理社区延伸至线上数字空间, 服务内容也从个案帮扶扩展至数据驱动的群体性干预, 这一转型既来自技术迭代的外在推动, 也契合了社会治理现代化对专业化与智能化的内在需求。

人工智能技术融入社会工作领域, 正系统改变传统服务范式: 一方面, 技术显著赋能服务效能, 借助算法解析群体需求差异, 协助制定精准干预计划; 通过远程平台突破时空限制, 扩大服务覆盖; 利用预警模型预判高风险个案, 降低社会风险。另一方面, 技术应用也带来多重挑战, 包括过度依赖技术导致社工主体性弱化、算法黑箱与数据隐私引发伦理困境、效率导向挤压“助人自助”的价值内核, 以及数字鸿沟加剧服务排斥。这一“赋能-挑战”并存的张力, 深刻触及社会工作的价值根基——当标准化任务逐渐由技术代劳, 社工的核心竞争力需转向情感共鸣、伦理判断和复杂问题解决等机器不可替代的维度。因此, 角色转型亟需实现技术能力与人文价值的双重突破。然而, 既有研究尚未系统回应当前技术-行政双重压力下, 社会工作者应如何统筹技术赋能与专业自主, 如何实现角色调适与能力升级, 以达成服务效能与人文关怀兼具的实践目标。本文据此聚焦智慧治理中的社工角色与能力重构, 并选取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Y 社区作为研究案例。该社区是深度整合浙江省“基层治理四平台”与杭州“城市大脑”的“未来社区”典范, 其“社区微脑”的运营为社会工作者在智慧治理场景下的实践提供了丰富场域。通过对该案例的深入剖析, 本文旨在从技术素养、协同能力和价值伦理三个维度, 探讨社工角色的转型路径与能力的系统性重构, 以助力构建符合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社会工作体系。

二、现有研究回顾及分析框架

(一) 现有研究回顾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智慧治理中的深度应用, 现有研究围绕社会工作领域的变革形成了三个主要聚焦方向: 技术应用中的伦理挑战、社工角色的多元化转型以及专业能力的适应性重构。学者们普遍采用二元框架分析技术

作者简介: 殷瑞芳(2001—),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

通讯作者: 殷瑞芳

赋能与伦理风险的并存,从多场域考察角色拓展趋势,并从不同维度探讨能力提升路径。

1. 技术应用与伦理挑战的二元论述

既有研究普遍关注人工智能在社会工作领域带来的双重影响,形成了“技术赋能-伦理风险”的二元分析框架。在技术赋能方面,学者们肯定了AI在需求评估、资源匹配及危机干预中的积极作用,如通过算法解析群体需求差异、借助远程平台扩大服务覆盖范围,以及利用预警模型降低社会风险发生率^[1]。与此同时,伦理挑战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数据隐私、算法偏见和责任界定等方面。训练数据偏差可能导致算法对特定群体(如种族、性别)的歧视性判断^[2],而AI的“非具身性”限制其替代人类共情和伦理判断的能力^[3-4]。Grant (2018)的CAIS案例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在平衡群体与个体利益时可能存在局限^[5]。然而,这些研究多将伦理问题视为技术应用的“衍生后果”,未能深入分析智慧治理中技术逻辑与行政逻辑交织如何系统性重塑伦理实践语境,也未能充分回答社工在科层制效率追求与技术黑箱的双重压力下如何保有专业自主权。

2. 角色转型的多元拓展与智慧治理

国内外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关注到社会工作者角色的多元化转型趋势。Lombard (2008)在南非社会转型背景下发现,社工从传统服务提供者转向资源整合与政策倡导者^[6];袁文丽与杨丹(2025)在电商视域下提出社工需承担宣传者、教育者与资源链接者等新角色^[7];叶梦竹(2025)则在智慧社区场景中进一步将社工角色细化为“智慧服务引导者”、“需求挖掘者”与“多元合作者”^[8]。这些研究揭示了角色扩张的多种面向,但存在明显局限:一方面,多数研究孤立探讨特定场域(如电商、社区)的角色变化,缺乏对智慧治理这一宏观范式转型如何系统性重塑社工角色体系的整体分析;另一方面,现有研究未能充分回应技术-行政双重压力下角色转型的内在张力,特别是科层化目标与人本实践之间的冲突如何影响角色调适。这种语境脱节使得现有角色理论难以充分指导智慧治理中的实践转型。

3. 能力重构路径的分散性与系统化整合的缺失

在能力重构方面,研究从不同层面提出了发展路径。Bay与Macfarlane (2011)强调批判性反思对角色调适能力的核心价值^[9];陈星星(2022)提出通过专业培训、督导机制化解角色模糊与冲突^[10];魏玺昊等人(2023)则指出文化敏感性与参与引导能力在特定场域的关键作用^[11]。此外,Dos Santos与Lo (2024)研究发现,职业转型者的能力适应依赖实习-就业转化、价值整合与伦理内化等机制^[12]。然而,这些研究呈现明显的“视角分离”:技术研究聚焦工具理性,制度研究侧重规则构建,专业研究强调个体适应。三者虽并行发展,却缺乏整合性分析框架揭示技术、制度与专业实践之间的动态互动。高代宇(2023)和Jacobi与Christensen (2023)的研究虽触及技术与专业的矛盾(如算法透明性不足削弱社工反思能力),但未能结合治理场景中的制度性约束进行联动分析^[13-14]。这种分散性导致现有研究难以回答“在怎样的系统支撑下,社工才能有效承担‘伦理研判者’与‘技术引导者’角色”这一根本问题,也为本研究留下探索空间——通过解构“技术-行政”双重逻辑的交互作用,为智慧治理中的能力重构提供系统化整合路径。

(二) 理论分析框架

因此,本文构建了一个整合性的“技术—制度—专业主体”三维分析框架,用对Y社区的智慧治理实践进行解析。该框架说明了技术应用、治理结构与专业行动三者间的动态互构关系。理论分析框架如下图1所示。

技术应用维度聚焦智能技术嵌入社工实践的具体方式与作用机制。基于“技术—社会互构”视角,本研究关注算法决策、智能派单与数据画像等技术在直接服务、间接支持与宏观倡导等多层面的应用。智能技术不仅具备提升服务效能的“赋能”属性,更通过重塑工作流程与决策机制,催生“数据解读员”“算法协同干预者”等新角色,并引发数据素养、人机协作等新能力需求。

治理结构维度剖析智慧治理中的制度环境对专业实践的形塑作用。运用“制度同形”理论,本框架分析行政逻辑(如数据化考核)与技术逻辑(如标准化、效率优先)如何通过强制性、模仿性及规范性机制,渗透至社会工作的组织与服务中,进而与外来的专业逻辑(如关怀伦理、案主自决)产生张力甚至冲突。国内外研究指出,为应对技术赋能所带来的伦理困境与专业自主性受限等问题,需在制度层面构建本土化伦理规范并加强算法审查^[15];同时还应强化社工的“人机协同”能力^[16],国外研究进一步主张其应担任“技术中介者”,通过跨学科合作主导价值判断^[17]。

专业主体维度将社会工作者视为能动的行动者,重点分析其如何认知并应对技术与制度的双重变革。该维度关注社工在实践中的角色调适、能力策略与专业认同重构,尤其强调其通过“在地化”改造、伦理转译与批判性应用等技术实践,将专业价值嵌入技术流程,以更好地回应服务对象需求。社工的此类行动亦会反向微调技术应用与制度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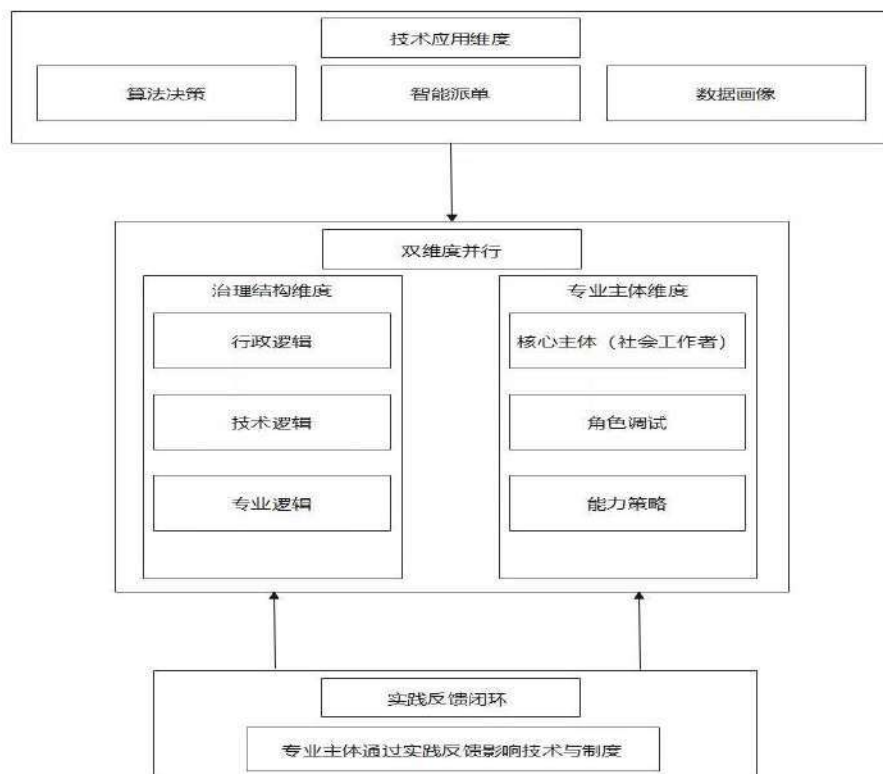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分析框架

三、智慧治理场景下，智能技术对社会工作者角色转型和能力重构带来的机遇

（一）制度性张力与专业自主权的博弈

智慧治理的科层化逻辑与社会工作的专业理性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当前如民政部“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等要求迫使社工异化为“数据填报员”，弱化其专业判断空间，却未深入剖析技术如何成为行政权力渗透的媒介。例如，Y社区社工为应对“城市大脑”下派的标准化巡查任务，创新“数据+家访”双轨模式，在完成线上指标的同时，通过线下深度访谈捕捉算法无法覆盖的情感支持需求。卜禾等（2025）提出的“情感-创造性”双重价值，在智慧治理的效率导向下面临边缘化风险——算法决策系统虽优化政策解读效率，却难以处理文化敏感性问题，导致“技术增效”与“价值流失”并存^[18]。

（二）角色转型的实践机制：从被动适应到主动调适

现有的文献大多静态描述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如“技术引导者”），忽视社会工作者在多元主体权力博弈中的动态调适策略。实践表明，社工需在多重角色缝隙中建立韧性：作为“技术驯化者”，如Y社区社工在运营“社区微脑”公共服务模块时，将冰冷的政策条文转化为通俗的图文和短视频，并设置“人工客服”兜底，扮演了“政策转译者”和“温情守护者”的角色；作为“伦理转译者”，Y社区的社工曾接到“社区微脑”平台根据行为数据对一名青少年发出的“高风险”预警。社工通过多次家访，发现该预警源于其家庭复杂的沟通模式而非实质性危险，遂将详尽的质性评估报告反馈至系统，最终修正了算法的单一判断，并补充了“家庭关系质量”这一评估维度。作为“跨界联结者”，如儒林街道社工以“智力驱动”链接高校资源，将农学院智库导入社区“儒邻书苑”，同时以“智能驱动”协调无人机巡航与志愿者巡查，实现“人工+智能”的自治闭环，这一过程凸显社工在政府监管权、企业技术权、社区自治权间的协商能力，远超越静态的“资源链接者”角色。

（三）技术赋能下的服务效能跃升与能力边界拓展

智能技术为社会工作者角色转型与能力提升创造了多重机遇。在Y社区，“社区微脑”平台构成了“互联网+社会工作”的神经中枢。社工通过平台大数据分析，能快速精准定位需关注的服务对象，如连续多日未产生外出记录的独居老人。此举大幅降低了线下摸排的成本与时间损耗。同时，平台集成的社情民意监测系统能捕捉居

民高频反馈的共性诉求，为社工进行社区倡导与政策优化提供了精准的数据依据。人工智能凭借自主学习与海量数据处理能力，进一步赋能专业服务：在医务社工领域，智能轮椅、运动机械骨骼等设备延伸服务触角；在决策层面，通过智能评估系统提供数据化动态参考，助力干预方案优化。其动态追踪功能既便于实时评估服务成效并迭代改进，更为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的构建提供技术支撑，推动社会工作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防转型，使社工得以在技术辅助下突破传统服务边界，实现专业能力的多维拓展。

四、智慧治理场景下，智能技术对社会工作者角色转型和能力重构带来的挑战

（一）技术伦理困境与责任机制缺位

智能技术正重塑社会工作伦理框架。传统依赖人际情感联结的服务模式遭遇根本性挑战——人工智能无法替代人类的情感互动，尤其在实时群体服务中难以回应情感动态等深层需求^[19]。责任归属的模糊地带在 Y 社区的实践中已有显现。例如，平台算法曾因未能识别临时照护关系，将一位被亲友妥善照料的失能老人错误标记为“无人监护”状态，触发了不必要的紧急警报。此事引发了关于数据责任方（平台开发者）、管理方（社区）与执行方（社工）之间责任如何界定的深入讨论。更严峻的是，算法基于带有历史偏见的数据进行决策，可能固化对弱势群体的结构性歧视。这就需要社会工作者转型为技术伦理的协同建构者时，既要推动算法透明度制度建设，又要设计人机责任共担模型，确保技术应用不背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二）数据安全脆弱性与隐私保护升级

海量数据驱动智能治理的同时，催生了系统性隐私风险。在 Y 社区推进“智慧养老”项目初期，需收集长者的健康数据，部分居民对此表示出对隐私泄露的深切担忧。这一度成为服务推进的阻力。这具体揭示了在数据从采集、存储到应用于服务的全过程中，居民对技术防护能力与管理规范的不信任，构成了现实的“数据安全脆弱性”。黑客攻击可窃取家庭关系图谱，管理疏漏可能导致健康档案泄露，这类事件不仅违反社工伦理守则，更将引发机构公信力崩塌^[20]。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技术易损群体的困境：老年人使用智能工具时，既因数字素养不足易受诈骗，又因隐私保护意识薄弱成为信息滥用重灾区。这要求社会工作者掌握数据治理的双重能力：技术层面需运用区块链等加密工具构建安全防火墙；服务层面需通过情景模拟训练提升弱势群体风险防范意识，在数据价值挖掘与权利保障间建立动态平衡。

（三）技术能力断层与普惠性危机

人工智能技术虽具有推动服务公平化的潜力，却因“数字鸿沟”加剧了社会排斥。在 Y 社区，智慧治理的普惠性危机具体表现为：许多长者面对社区的智能门禁和线上服务申请系统束手无策，而部分社工在平台运营初期也因不熟悉数据看板的功能，难以有效利用其进行需求分析，导致“社区微脑”的效能未能充分发挥。这凸显了服务对象与专业工作者两端同时存在的“技术能力断层”。更深远的问题在于，技术资源的分配不公——缺乏网络与设备支持的边缘社区难以接入智慧服务系统，进而陷入“技术排斥的循环”^[21]。社会工作者需扮演技术普惠的催化剂：一方面通过“数字技能工作坊”提升自身智能工具应用能力；另一方面创新“技术托管”模式（如社区 AI 助手服务站），为弱势群体提供低门槛技术代理服务，破解智慧治理的普惠性难题。

（四）公众信任瓦解与技术人文冲突

网络场域中的规则失范与技术滥用持续冲击公众信任基础。以网络投票与公益评选为例，在 Y 社区尝试使用线上系统进行“社区惠民项目”投票时，部分居民因不熟悉操作流程或怀疑票数被操控，对最终结果的公平性提出质疑。这种不信任源于技术过程的“黑箱”感知，导致线上民主议事的效率反而低于传统的线下举手表决，构成了“公众信任瓦解”的典型情境^[22]；而智能推送制造的信息茧房，更可能割裂社区共识。最根本的冲突源于技术替代性焦虑——传统职业消亡引发的认同危机，使公众将智能系统视为生存威胁而非服务工具。当技术理性挤压人文关怀空间时，社会工作者需成为价值秩序的守护者：通过开放算法听证会提升决策透明度，借助社区对话机制转化技术恐惧，在工具理性与人文精神间重建共生关系。

五、结论与对策

智能技术在 Y 社区的智慧治理场景中清晰呈现“赋能-挑战”的双重性：一方面，通过“社区微脑”平台驱动服务精准化与风险预警前置化，显著拓展了社会工作的效能边界，推动社工角色向技术引导者与跨界整合者转型；另一方面，来自“城市大脑”的行政逻辑与技术自身的算法逻辑相互叠加，挤压了基于专业价值的自主判断空间，而算法黑箱、数据隐私及数字鸿沟等问题，也持续考验着“助人自助”核心价值的守护。本文通过对 Y 社区案例的

剖析揭示, 社工通过技术驯化、伦理转译和制度协商等韧性实践, 能够实现角色的动态调适与能力的创造性重构。这证明, 唯有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中, 才能实现中国式智慧治理对服务效能与人文温度的双重诉求。

(一) 构建根植于社区实践的“多方协同”技术伦理与责任治理体系

针对 Y 社区实践中暴露的算法误判、责任模糊等问题, 需建立“政府主导-机构实施-社工参与-公众监督”的协同治理框架。政府层面应加快出台细分领域的智能技术应用伦理规范, 明确算法决策的边界与禁区。社区服务机构需建立“三阶伦理审查机制”: 技术引入前, 可借鉴 Y 地区“数据安全议事会”的经验, 邀请社工、伦理专家及居民代表开展合规性论证; 应用过程中, 通过匿名个案跟踪持续监测算法偏差; 应用后, 组织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以系统性修正伦理风险。社工应深度参与算法模型的优化过程, 将“社会正义”、“关怀伦理”等专业价值转译为技术逻辑, 同时推动建立“人机责任共担清单”, 在出现服务争议时, 明确开发者、机构与一线社工的责任划分, 避免陷入权责真空。

(二) 打造“技术防护与社区素养”并举的双层数据安全屏障

为化解 Y 社区居民曾深切担忧的数据隐私风险, 需从技术硬防护与社区软素养两方面同步发力。技术层面, 社工机构可引入区块链等加密技术对敏感数据进行分布式存储, 并设立“数据使用白名单”制度, 严格限定核心工作人员的访问权限, 筑牢安全防线。在社区素养层面, 应系统化推广 Y 社区“银龄数字课堂”的成功经验, 针对老年人等技术易损群体, 设计“情景化数字安全工作坊”, 通过模拟电信诈骗、演示隐私设置等方式, 提升其数据自护能力。同时, 必须建立规范的“数据泄露应急响应机制”, 一旦发生信息安全事件, 社工能第一时间启动个案安抚、风险预警与责任追溯流程, 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的二次伤害。

(三) 实施“精准分层”的技术赋能计划, 跨越数字鸿沟

针对 Y 社区出现的“两端(服务对象与社工)技术能力断层”问题, 需构建覆盖全员的、精准的分层赋能体系。对资深社工, 重点开展“智能工具实操+伦理批判”的融合课程, 提升其对技术局限性的洞察力, 使其成为技术的合格“驾驭者”而非被动“使用者”。对新入职社工, 则应强化“数据分析+跨系统协作”的技能培训, 使其能熟练运用平台工具识别社区需求规律。对于老年、残障等服务对象, 应延续 Y“社区 AI 助手服务站”的“技术托管”思路, 开发“简化版智能服务终端”, 并将数字技能培训融入日常服务。同时, 可大力推动“校社共建”模式, 邀请高校师生组成“技术支援小队”定期下沉社区, 为社工提供持续的技术顾问支持, 防止智能工具因使用不畅而沦为“摆设”。

(四) 加快透明化和人文文化的技术信任重建

为解决 Y 社区在线上投票等事务中遭遇的公众信任危机, 需从技术透明与人文融合双轨切入。在技术透明方面, 社工可定期组织“算法开放日”活动, 用通俗语言和流程图向居民解释 AI 决策的逻辑, 主动拆解“黑箱”, 消除公众因未知而产生的恐惧与猜忌。在人文融合方面, 应系统总结 Y 社区通过社工改造 AI 客服、注入方言与温情的“温情化改造”经验, 并将其推广至更多的智能交互场景中, 让技术工具具备社区的“温度”。此外, 应搭建“社区技术对话平台”, 邀请不同年龄、背景的居民分享技术使用的真实体验, 通过积极的案例沟通与情感互动, 逐步消解“技术替代焦虑”, 在社会层面重塑对于“人机协同”的信任共识。

参考文献:

- [1] Reamer F 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social work: Emerging ethical issu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ork Values and Ethics, 2023, 20(2): 52-71.
- [2] 夏莹莹. 人工智能嵌入社会工作: 协同创新、困境突破与可持续发展[J]. 公关世界, 2025, (11): 160-162.
- [3] 张瑞凯, 王玉佳.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社会工作情感劳动的优势与风险[J]. 中国社会工作, 2023, (25): 28-30.
- [4] 吕慧敏. 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青少年社会工作模式浅析[J]. 华东科技, 2023, (01): 116-118.
- [5] Grant D G. Ethic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public health social work[J].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social work, 2018: 231-249.
- [6] Lombard A. The impac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non - government welfare sector and the social work profess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008, 17(2): 124-131.
- [7] 袁文丽, 杨丹. 电商视域下社会工作者角色转型的路径研究[J].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1): 2382-2387.
- [8] 叶梦竹. 智慧社区建设背景下的社会工作者角色转型与技能升级研究[J]. 国际公关, 2025, (01): 86-88.

- [9]Bay U, Macfarlane S. Teaching critical reflection: A tool for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in social work?[J]. Social Work Education, 2011, 30(7): 745-758.
- [10]陈星星. 社会工作者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调适研究[D]. 贵州民族大学, 2022.
- [11]魏玺昊, 王寒温, 许艳萍, 等. 社会工作促进易地搬迁村民社区参与的转化机制——以云南省苗村专业实践为例[J].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23, 23(02): 74-84.
- [12]Dos Santos L M, Lo H F. Motivations, career decisions, and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of mid-aged master of social work students[J]. Social Work Education, 2024, 43(8): 2135-2153.
- [13]高代宇. 机遇与挑战: 人工智能时代下社会工作的未来发展[J].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8): 4444-4449.
- [14]Jacobi C B, Christensen M. Functions, utilities and limitations: A scoping study of decision support algorithms in social work[J]. Journal of Evidence-Based Social Work, 2023, 20(3): 323-341.
- [15]缪姝涵. 人工智能在社会工作新本土化发展中的应用探析[J/OL]. 甘肃开放大学学报, 1-11[2025-07-24].
- [16]叶佳媚, 王海波. 人工智能赋能社会工作新质生产力的三维重构——基于生产力三要素的视角[J].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5, 38(04): 16-18+23.
- [17]Goldkind L. Social work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o the matrix[J]. Social Work, 2021, 66(4): 372-374.
- [18]卜禾, 汤尧, 段文杰. 人工智能背景下社会工作的实践向度[J].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25, 25(01): 10-18.
- [19]Wong J M 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supported group facilitation: emerging potentials, cautious approaches, and ethical considerations in social work practice[J]. Social Work with Groups, 2025: 1-14.
- [20]李奇. “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给社会工作的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J]. 电脑知识与技术, 2021, 17(20): 182-183.
- [21]Hodgson D, Goldingay S, Boddy J, et al. Problemati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social work education: Challenges, issues and possibilities[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22, 52(4): 1878-1895.
- [22]赵万林. 网络社会工作: 概念、内涵与发展路径[J].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16, 35(01): 110-114.

Role transformation and capability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workers in the context of smart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Yangliujun Community in Shangcheng District, Hang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Yin Ruifang¹

¹ An hui Normal University, Anhui,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The in-depth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in the field of social governance is reshaping traditional service models. This paper takes Y Community in Hangzhou, Zhejiang Province, a national-level smart community benchmark,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role transformation and capability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workers in the context of smart governance.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in the practice of the "Community Micro Brain" platform in Y Community, the role of social workers has shifted from service executors to technology guides, rational analysts, and human-machine collaborators. Their capability reconstruction is reflected in the compound improvement of technical literacy, ethical reflection, and humanistic care. The study further proposes that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 multi-party collaborative responsibility governance system and strengthening data security and digital literacy building, the sustainable empowerment of social work by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can be achieved.

Keywords: Intelligent Technology; Smart Governance; Role Transformation; Capability Reconstruction

何以陷入“塔西佗陷阱”：网络舆情中的信息生态位演化

李紫寒¹

(1.山东大学(威海), 山东 威海 264209)

摘要: 本文基于信息生态位理论,以“天价耳环事件”为例,系统考察了主流媒体、微博意见领袖与普通网民三类舆情主体在时间、功能与资源三个生态位维度上的行为分化及其对“塔西佗陷阱”形成的推动作用。研究发现,在时间生态位上,主流媒体活跃度与官方通报节奏高度同步。在功能生态位上,主流媒体侧重于事件调查与权威发布,构建理性叙事框架;意见领袖则依赖“拼贴式真相”与情绪化表达,助长了谣言的扩散与固化。在资源生态位上,意见领袖在网络中占据中介中心性位置,成为连接不同舆论圈层、影响信息跨群流动的关键节点。

关键词: 信息生态位;网络舆情;舆情主体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361

一、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的演进,社交媒体已深度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公众获取信息、参与社会讨论与表达观点的重要场域。然而,伴随互联网技术的持续深化,网络舆情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在社交媒体时代,传播生态呈现出去中心化、场域分化与后真相化的新特征。在舆情事件中,公众的碎片化解读、信息不对称与回音壁效应相互叠加,共同助推了塔西佗陷阱的产生^[1]。塔西佗陷阱是指在突发公共事件的网络舆情发生时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即当事件爆发时,相关部门无论发表任何言论、做出何种努力,人们都会给予其负面评价,从而使政府的公信力丧失^[2]。

现阶段,塔西佗陷阱已经成为日常社会管理中需要频繁面对的挑战。一旦陷入该陷阱,公众往往倾向于对官方话语进行对抗式解码,并基于刻板印象形成惯性归因,同时相关谣言亦可能不断滋生与扩散^[3]。即便突发事件本身得到妥善解决,其所加剧的不信任情绪仍有可能成为下一轮舆情危机的潜在引信。因此,掌握舆情引导的主动权,防止公共空间的讨论滑向非理性的情绪宣泄,避免塔西佗陷阱的形成,对维护舆论生态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在网络舆情的演化中,政府、媒体、受众等多元主体进行信息交互,共同构建起网络舆情的动态互动机制,要实现有效引导,关键在于精准识别各主体的角色与作用,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管与治理。鉴于此,本研究将从网络舆情事件中的关键行动主体出发,系统剖析不同主体在舆情演化的不同阶段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功能及其影响,以期深化对舆情演化规律的理解,并为构建理性、包容、有效的公共沟通与治理路径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 信息生态理论及舆情研究

信息生态(information ecology)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 Horton 年提出,他将生态学的观点和理念引入信息学范畴,构建了描述人、信息和环境协调发展的信息生态理论^[4]。1998年,国内学者李美娣首次提出信息生态系统,将其界定为信息本身与其生命体及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并指出信息、信息人与信息环境是构成信息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5]。网络舆情生态系统可以被视为信息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是指在网络环境中围绕特定舆情事件,由信息人、信息与信息环境共同构成的一种信息生态系统^[6]。

当前,学界针对网络舆情演化规律的研究主要遵循主题演化、平台传播与情感演化三条路径^[7],大多聚焦于信息本体和信息环境,针对信息人这一要素的探讨尚显不足。此外,也有学者从整体视角出发,结合信息生态理论,探究网络舆情生态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舆情传播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生态要素对舆情传播的

作者简介: 李紫寒(2003—),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网络舆情与媒介文化。

通讯作者: 李紫寒

驱动作用存在阶段性差异与“殊途同归”现象,在舆情形成期与蔓延期,信息人往往发挥主导作用^[8]。由此可见,信息人在舆情演化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基于此,本研究将聚焦信息人这一关键要素,探究其在网络舆情动态演化过程中的角色与影响机制。

(二) 信息生态位

在信息人研究中,“生态位”是一个关键概念,指的是信息人在信息生态环境中所占据的特定位置^[9]。国内学者娄策群将信息生态位分为三个维度:信息功能生态位、信息资源生态位和信息时空生态位。信息时空生态位是包括信息时间生态位和信息空间生态位,空间生态位是指信息人生存空间和活动空间的类型与区位。由于在网络舆情事件中,不同主体的活动空间高度集中于社交媒体平台,差异并不显著,因此本研究不对空间生态位进行过多探讨。

信息时间生态位是指信息人的信息活动占用的时间段。从时间维度来看,网络舆情拥有独特的生命周期^[10],以微博平台的舆情周期为例:初始信息发布触发舆情萌芽,意见领袖转发、激发微博用户参与讨论,在短时间内热度顶峰并逐渐蔓延;最终关注热度逐渐下降直至舆情消失殆尽^[11]。由此可见,舆情生命周期的推动,是多元主体的信息生态位在时间维度上动态演化的结果。

舆情生命周期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任何舆情事件皆会经历从萌发到消亡的过程;二是指网络舆情的演进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12]。基于不同划分依据与研究视角,学界提出了多样的舆情阶段模型:从阶段特征出发,可分为三阶段、四阶段、五阶段乃至六阶段模型;就划分标准而言,则有信息发布数量、关键事件节点、舆情峰值数量等多种判别依据^[13]。探究信息人的信息活动所占据的时间段,核心在于厘清不同舆情阶段内各类信息人所承担的角色与发挥的功能。基于此,本研究提出问题一:

Q1 在舆情事件中,网络舆情的演化呈现怎样的阶段特征,不同主体的信息时间生态位发生了怎样的演化?

信息功能生态位是指信息人在信息环境中所充当的角色及其所承担的社会职能。从生态学视角出发,舆情生态系统中的信息人通常可划分为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与分解者等角色^[14]。也有学者依据行为对主体功能进行区分:普通公众多为消息源与意见表达者,主流媒体承担报道与阐释职能,政府部门则负责信息发布与舆情治理^[15]。现有研究对舆情主体的探讨多基于整体视角,缺乏结合舆情生命周期视角的动态演变特征。基于此,本研究提出问题二:

Q2 在舆情演化的不同阶段,不同信息主体的传播行为呈现怎样的特征,各主体的信息功能生态位如何变化?

信息资源生态位是指信息人在信息环境中占有和利用信息资源的状况,主要包括信息内容资源、信息技术资源和信息客户资源。在内容资源的获取上,主流媒体具有天然的优势。而在技术资源与客户资源的掌控上,社交媒体的赋权致使舆情场域内信息资源实现了向下流动与再分配。以微博平台为例,“大V”等关键节点通过议程设置与情感动员形成级联传播效应;普通用户的转发行为则遵循“情感共振—社交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成为信息传播网络的重要支撑^[16]。因此,舆情主体的信息资源优势,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各个主体的互动关系与主体在信息网络中的位置。基于此,本研究提出问题三:

Q3 在舆情传播和演化的过程中,哪些主体成为了关键传播节点,这种结构性位置如何影响其信息传播效能?

三、研究设计

(一) 案例选取

2025年5月10日,演员黄杨钿甜在社交媒体发布其高中成人礼照片,其耳环被指为某奢侈品牌限量款,网传价格高达230万元,从而引发网络关注。随后,舆论焦点从“天价耳环”事件本身转向对其家庭背景的讨论,其父杨某过往的公职人员身份以及工作经历遭受质疑,更有谣言将其收入来源与“雅安地震灾后重建”项目进行主观关联。在谣言持续扩散的背景下,即便7月16日新华社权威发布了联合工作组的详细通报,部分网民仍对调查结论持怀疑或否定态度。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微博平台的高级检索功能,以“黄杨钿甜天价耳环”为关键词,检索2025年5月10日-7月20日的全部热门微博,借助八爪鱼数据采集器对样本帖文的多维信息进行结构化采集,最终获取有效数据426条。为刻画信息时间生态位的动态特征,本文结合事件脉络与微博帖文数量变化,将舆情生命周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并依据微博认证机制将参与主体划分为主流媒体、微博意见领袖与普通网民三类,通过统计各阶段贴文数量分布,分析舆情演化中主导传播主体的更替。同时,运用LDA主题模型对文本进行主题挖掘。该无监督概率模型可基于词语共现关系识别舆情中的语义主题,从而揭示情绪动员、监督问责或娱乐调节等信息功能,进而分析不同主

体的信息功能生态位变化。此外，引入社会网络分析（SNA）方法，通过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等指标测量节点在网络中的影响力与信息传播潜势，将抽象的社会关系转化为可量化指标，为“信息资源生态位”的测量提供工具。

四、研究发现

（一）信息时间生态位

通过对热门贴文数量的时序变化进行梳理，可以发现此次舆情事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在舆情发酵初期，相关讨论持续活跃。尽管中间曾出现热度回落，但在雅安市官方发布初步通报后，公众关注度再次攀升。在随后近两个月的事件调查期内，公众讨论进入短暂停滞，发帖数量显著减少，几乎处于静默状态。直至7月16日，雅安市工作组正式通报发布后，事件热度攀升至峰值，但讨论未形成持续效应，持续三天后便迅速消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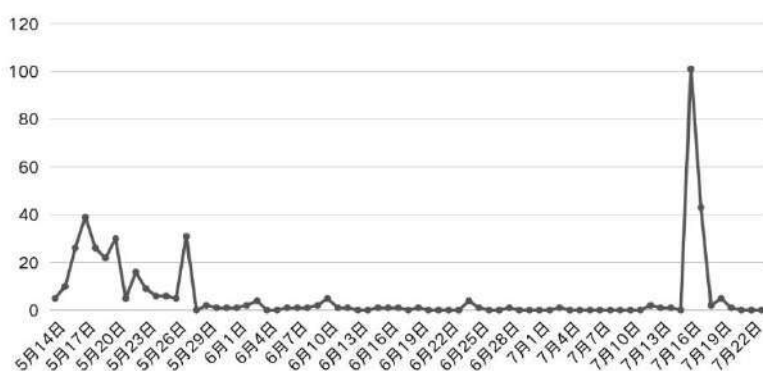


图1 案例相关热门贴文数量变化

基于上述热度演变轨迹，本研究将此次舆情事件的发展周期划分为三个阶段：爆发期（5月14日—5月27日）、拉锯期（5月28日—7月15日）与消退期（7月16日—7月23日）。对各阶段不同舆情主体发布的热门贴文数量进行统计，在整个舆情生命周期，微博意见领袖所发布的贴文在数量上始终占据显著优势。一方面可能由于该群体基数庞大、覆盖领域广泛，另一方面也与其较高的发帖频率和互动积极性有关。

相较之下，主流媒体的发帖数量则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仅在具有官方通报的爆发期和消退期较为活跃，这反映出主流媒体在此类舆情中往往采取审慎跟进、等待官方定调的策略。与此同时，普通网民仍保持一定的讨论态势，在拉锯期其热门贴文占比显著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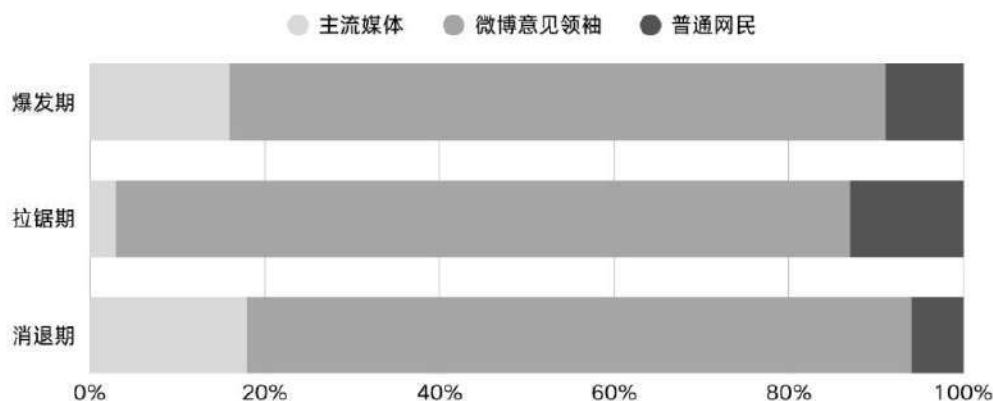


图2 舆情生命周期各主体发帖数量占比

（二）信息功能生态位

在信息功能生态位层面,本研究聚焦于各阶段热门帖文数占比最高的两类主体,基于 Python 工具对各时间段内不同主体发布的文本内容进行 LDA 主题建模,通过提取核心主题、挖掘主题内涵,系统识别舆情场域中各类主体的信息传播行为与功能特征。

LDA 主题建模结果显示,主流媒体在舆情爆发期的议题集中于事件调查与舆论监督两大维度,凸显其作为公共舆论监督者与权威信息发布者的核心角色。相比之下,微博意见领袖承担了情绪动员与话题扩散的功能,其贴文内容往往通过娱乐化解构、嫁接消费符号与网络热梗等浅表化议题,降低公众参与讨论的门槛,扩大话题的社会触及面与传播热度。这种戏谑化、娱乐化的表达风格,也不可避免地冲击并稀释了主流媒体所构建的理性话语空间。

除此之外,在推动议题进入公共视野的同时,微博意见领袖也借助其在社交平台上的传播优势,对公权力展开质疑与追问,发挥了一定的舆论监督作用。然而,受限于可获取的公开信息范围,其监督行为往往缺乏全面、完整的事实支撑,大都通过选取事件片段与符号化细节,进行主观化联想与片面化重构,生产出情绪鲜明、易于传播的内容。在此过程中,各类偏离事件真相的谣言在传播链条中被不断赋予“事实”属性,逐步侵蚀公众对官方权威信息的信任基础。

表 1 舆情爆发期主流媒体贴文主题分布

主题	主题关键词	分布概率
事件跟踪调查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深圳市、东阳市、成立	59.7%
进行舆论监督	公众、期待、真相、深入调查、权威、公平	40.3%

表 2 舆情爆发期主流媒体贴文主题分布

主题	主题关键词	分布概率
对公权力的质疑	社会、腐败、疑问、法人、生二胎、调查	56.5%
娱乐化耳环事件	仿款、火彩、校花、淘宝、面相、义乌	40.3%

在舆情拉锯期,官方媒体发帖数量减少,舆论场的话语权转移至微博意见领袖与普通网民手中。根据 LDA 主题建模结果,二者共同构建了一个“没有事实,只有情绪”的舆论场域,讽刺性表达成为两类主体共用的传播策略,成为公众宣泄不满、表达诉求的主要出口。意见领袖部分承接了主流媒体在爆发期的舆论监督功能,但表达更为民间化与情绪化,形成了民间的“非正式监督”力量。他们延续并深化了其在爆发期的角色,通过对事件信息进行“拼贴式”的调查与联想,试图拼凑出事件的“真相”。从主题词分布来看,他们的讨论焦点已逐步偏离事件的核心事实,滑向对“灾后重建腐败”“公职人员经济来源”等缺乏事实依据的关联性猜测。官方声音的持续缺席与谣言充斥的舆论环境相互叠加,导致虚假信息在此期间广泛传播,公众对事件的认知逐渐固化,对官方信源的不信任持续累积,塔西佗陷阱在舆论拉锯中悄然形成。

表 3 舆情拉锯期微博意见领袖贴文主题分布

主题	主题关键词	分布概率
质疑并深挖事件	公职人员、灾后、别墅、招标、违规	45.9%
讽刺事件	嚣张、讽刺、真假	32.2%
进行舆论监督	舆情、依旧、未明、留下	21.9%

表 4 舆情拉锯期普通网民贴文主题分布

主题	主题关键词	分布概率
质疑事件调查结果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深圳市、东阳市、成立	37.3%
讽刺事件	公众、期待、真相、深入调查、权威、公平	62.7%

在舆情消退阶段,主流媒体发帖数量显著回升,通过构建“通报—回应—总结”的传播闭环,系统完成对事件的权威定调,推动舆情实现软着陆。在此过程中,官方话语重新进入舆论场中心,并与民间声音逐步达成有限共识。微博意见领袖的表述风格也发生了转变,情绪化表达明显收敛,更多侧重于对官方通报内容的转发、解读与评议,呈现出从情绪动员到信息中介的角色调适。

然而,舆情消退阶段的持续周期普遍较短,在信息快速迭代的社交媒体时代,公众的注意力已转向其他议题,对原有事件的关注度明显下降。即使官方发布了全面、权威的通报,澄清了此前的不实信息,但前两阶段形成的

碎片化叙事与情绪化认知已在公众心中固化,形成难以逆转的思维定势。官方信息在接收过程中往往容易遭遇选择性接触或情感性抵触。在事实滞后与信任先失的共同作用下,塔西佗陷阱仍难以消除。

表 5 舆情消退期主流媒体贴文主题分布

主题	主题关键词	分布概率
处罚结果通报	依据、辞退、违纪、中国党员、经查、规定	44.8%
回应公众质疑	鉴定、质疑、谣言、证实、司玲霞、刘芳芳	42.1%
总结事件	焦点、推波助澜、此次、连日来、编造、追踪	13.1%

表 6 舆情爆发期主流媒体贴文主题分布

主题	主题关键词	分布概率
回应公众质疑	司玲霞、刘芳芳、新闻记者、几百元、封面新闻	33.6%
评价事件	证明、正常、贪过、便利、巨款、查清	34.8%
传播调查结果	理性、管理、针对、雅安市、所赠、经查	28.5%

综上所述,在“天价耳环事件”的舆情演化过程中,不同主体基于其传播行为呈现出功能生态位的差异。主流媒体主要承担舆情监督与权威信息发布的作用。与之相对,微博意见领袖在舆情生命周期全程发挥民间监督作用,但其监督多建立在“拼贴式”猜测与情绪化表达的基础上,进一步助长了谣言的传播与固化。在权威信息缺位、情绪表达泛滥的传播环境中,意见领袖与普通网民共同构建的情感化舆论场,不断消解官方话语的公信力,最终完成了塔西佗陷阱的认知闭环。

(三) 信息资源生态位

本研究基于“天价耳环事件”博文转发关系,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网络:以转发量最高帖文为一级节点,筛选转发超 1000 的为二级,再逐级遍历转发量大于零的微博直至覆盖全部节点,最终构建出完整的转发关系网络。在此基础上,运用 Gephi 软件对该网络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天价耳环事件”舆情网络中共有 332 个节点、371 对连接关系,网络密度为 0.003,平均路径长度为 1.867。由此可见,“天价耳环事件”的传播链路极短,节点联系较为分散,信息扩散高度依赖少数核心用户,呈现明显的“头部效应”。

点度中心度是指与某个网络节点直接相连的其他节点的数目,表示行动者的信息接收或传播能力。其中,点出度代表用户发布的信息被他人转发的频率,反映其在现实舆情中作为信息源的重要性。表 7 列出了点出度排名前十的节点数据。由表可知,官方媒体拥有较高的点出度,表明其在信息发布方面仍承担着重要的角色。鲜娱君、橘子娱乐等娱乐类博主凭借在文娱领域的广泛覆盖与高互动性,点出度排名靠前,成为此次事件中不可忽视的信息放大节点。

表 7 转发关系网络点出度排名

序号	网络节点	用户类型	点出度
1	鲜娱君	微博意见领袖	54
2	来去之间	微博意见领袖	35
3	北京日报	官方媒体	35
4	封面新闻	官方媒体	34
5	橘子娱乐	微博意见领袖	30
6	吃瓜群众 CJ	微博意见领袖	28
7	八卦名探	微博意见领袖	26
8	江宁婆婆	微博意见领袖	22
9	凤凰网	官方媒体	17
10	新华社	官方媒体	13

中介中心性反映的是用户在舆情传播中充当信息桥梁的能力,能够反映用户在传播网络中连接多个社群、影响多元舆论的能力。根据表 9 数据,科技类博主“来去之间”、社会时事类博主“江宁婆婆”等意见领袖的中介中心性显著突出,处于网络中的“结构洞”位置,能够有效连接多个相对封闭的用户社群,成为舆情实现跨圈层扩散的

关键枢纽。相比之下，官方媒体虽也具备一定的中介功能，如“北京日报”的中介中心度相对较高，但其角色更侧重于信息的权威发布，而非充当连接多元社群的传播枢纽。

表8 转发关系网络中介中心度排名

序号	网络节点	用户类型	中介中心度
1	来去之间	微博意见领袖	372.5
2	江宁婆婆	微博意见领袖	165.0
3	鲜娱君	微博意见领袖	108.0
4	北京日报	官方媒体	90.0
5	吃瓜群众 CJ	微博意见领袖	72.0
6	橘子娱乐	微博意见领袖	68.0
7	封面新闻	官方媒体	31.0
8	八卦名探	微博意见领袖	26.1
9	凤凰网	官方媒体	18.0
10	sweetblower	微博意见领袖	14.9

由此可见，在信息资源生态位中，官方媒体与微博意见领袖虽均占据优势地位，但二者的资源优势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官方媒体在信息源头具有权威性优势，然而在信息的二次传播与跨圈层渗透方面则相对薄弱。相比之下，意见领袖凭借其中介性优势，成为连接不同舆论圈层的关键枢纽。

五、研究结论与实践启示

（一）主流媒体：把握舆情引导主动权

从资源维度来看，主流媒体在内容权威性、传播渠道与受众信任方面具备显著优势，是官方信息的核心出口。在舆情事件中，主流媒体不仅承担着信息发布与舆论监督的职责，更扮演着理性话语守护者的角色。因此，在舆论引导中，主流媒体应重视并主动把握舆情演变的沟通角色。具体而言，主流媒体可以协同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阶段性调查进展，既可以澄清不实信息，也能维持公众信任与对事件的合理关注。此外，主流媒体也可以通过扮演“公众疑问收集者”的角色，为最终通报构建认知过渡的桥梁。例如，在“天价耳环事件”中，极目新闻等媒体通过梳理事件疑点与网民关心话题，既履行了监督职能，也为后续官方回应提供了针对性的议题方向，使信息发布更聚焦、回应更具说服力。

（二）意见领袖：警惕“拼贴式”真相的传播风险

在整个舆情周期中，意见领袖在传播影响力方面始终处于优势地位。凭借其高连接性、高互动性与情感动员能力，在资源生态位上占据了信息流通的关键位置。他们既是民间话语的放大器，也是不同信息圈层之间的连接枢纽。在“天价耳环事件”中，部分意见领袖的监督行为并非基于系统事实核查，而是依赖于“拼贴式”猜测——即选择性截取事件片段，并嫁接公众情绪进行传播。一旦其未经核实的信息广泛传播，极易推动尚未了解事件全貌的公众形成先入为主的认知定式，解构理性对话的空间。

意见领袖的中介中心性地位决定了其不仅是信息传播的节点，更是风险与责任的关口，其公共角色有待进一步自觉与规范：一方面，网络意见领袖需要建立“事实前置”的传播自律，在涉及公共事务的讨论中强化信息核实；另一方面，在官方通报发布后，网络意见领袖可以积极利用其跨圈层传播优势，促进权威信息深入不同话语社群，修复被情绪叙事侵蚀的公共信任基础。

（三）意见领袖：警惕“拼贴式”真相的传播风险

普通网民作为舆情生态中基数最大的主体，虽然多处于信息接收端的位置，但其情感反应与传播行为，为舆情演化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在“天价耳环事件”中，由于权威信息供给不足与情绪化内容泛滥，许多公众基于碎片信息形成了以讽刺、戏谑为代表的情绪化表达。这种表达在无形中巩固了“权威不可信”的认知预设，从而完成了塔西佗陷阱的认知闭环。因此，在后真相的传播环境下，普通网民的媒介素养提升尤为关键。公众应逐步培养对信息来源的批判意识，在参与讨论时主动辨识事实陈述与情绪动员之间的区别，避免被情绪化叙事所裹挟，从而能够在复杂舆情中保持理性站位，为构建良性舆论生态奠定公众基础。

参考文献

- [1] 张昊轩, 张燕. 复合治理: 网络舆情中“塔西佗陷阱”的消弭策略[J]. 新媒体研究, 2021(7):54-56.
- [2] 李枫, 刘福媚. 网络舆情视阈下的塔西佗陷阱及其引导策略[J]. 出版广角, 2018(23):72-74.
- [3] 钱敏, 章瑞. 公开、共振与共情: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塔西佗陷阱”的消解策略[J]. 黑河学院学报, 2020(11):82-84.
- [4] Horton F W. Information ecology[J]. Journal of Systems Management, 1978, 29(9):32-36.
- [5] 李美娣. 信息生态系统的剖析[J]. 情报杂志, 1998(4):3-5.
- [6] 王建亚, 宇文姝丽. 网络舆情生态系统的构成及运行机制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4, 37(1):55-58.
- [7] 黄微, 刘逸伦, 周东阳. 基于信息生态理论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多平台演化路径及实证研究[J]. 情报杂志, 2025, 44(09):164-175.
- [8] 杨波, 谢乐. 企业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传播态势生成机理研究——基于信息生态的多阶段 fsQCA 分析[J]. 管理评论, 2022(7): 339-352.
- [9] 娄策群. 信息生态位理论探讨[J]. 图书情报知识, 2006(5):23-27.
- [10] 晏敬东, 杨彩霞, 张炜南. 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微博舆情引控研究[J]. 情报杂志, 2017(8):88-93.
- [11] 邓春林, 周舒阳, 隆征帆. 基于情绪归因理论的突发事件微博用户情绪演化分析[J]. 科技情报研究, 2021(3):60-72.
- [12] 谢科范, 赵湜, 陈刚, 等. 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的生命周期原理及集群决策研究[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4):482-486.
- [13] 王姝雅, 张博. 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舆情演化研究综述[J]. 新媒体研究, 2022(8):6-10.
- [14] 李钟隽. 风险沟通视角下突发事件融媒体信息生态系统要素关系识别研究[J]. 现代情报, 2024(12):122-136.
- [15] 弓伟波. 网络公共领域多元主体的角色定位及功能发挥[J]. 青年记者, 2020(29):4-5.
- [16] 成全, 刘国威, 李艺全. 考虑用户主题兴趣度的网络舆情演化建模与仿真研究[J]. 管理评论, 2020(11):128-139.

Why Does the Tacitus Trap Occur? The Evolution of Information Niches in Online Public Opinion

Zihan Li¹

⁽¹⁾ School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Shandong, Weihai,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information niche theory, this study takes the “Sky-High Earrings Incident” as a case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differentiated behaviors of three types of public opinion actors—mainstream media, Weibo opinion leaders, and ordinary netizens—across three niche dimensions: time, function, and resources. It further analyzes how these differentiated behaviors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Tacitus Trap. The findings show that, in terms of the temporal niche, the activity of mainstream media is highly synchronized with the rhythm of official briefings, which results in an “official information vacuum”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stage of the event. Regarding the functional niche, mainstream media primarily focus on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and authoritative information release, thereby constructing a rational narrative framework; in contrast, opinion leaders tend to rely on “collaged truths” and emotionally charged expressions, which facilitate the spread and entrenchment of rumors. In the resource niche, opinion leaders occupy positions of high betweenness centrality within the network, acting as key nodes that connect different opinion clusters and influence cross-group information flows.

Keywords: Information Niche; Public Opinion; Opinion Leaders

城镇流动儿童多维贫困测度及影响机理探析 ——基于广东省佛山市的调查

胡诺琪, 王成超, 徐丹*

(佛山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广东 佛山 528000)

摘要: 在乡-城人口迁移转向家庭迁移背景下, 流动儿童相对贫困问题是当前建设共同富裕社会的瓶颈之一。随着大量流动人口涌入佛山, 处于发育关键期的流动儿童进入新城市会面临身心融入挑战。基于广东省佛山市流动儿童232份问卷调查数据, 选择营养、健康、生活水平、教育、住房、家庭陪护6个维度构建多维贫困指标体系, 采用A-F法探究多维贫困特征, 再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发现影响因素, 揭示流动儿童致贫机理框架和致贫因子。研究表明: (1) 当 $k=0.33$ 时, 流动儿童贫困发生率高达80%; (2) 营养、生活水平、家庭陪护等维度贫困贡献率突出; (3) 社交状态、父亲职业、养育的子女数量、老家所在地是流动儿童多维贫困的主要致贫因子。测度流动儿童多维贫困状况, 有利于更好地满足流动儿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共同富裕的实现。

关键词: 流动儿童; 多维贫困; 贫困测度; 影响因素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红壤生态脆弱区农户可持续生计演化过程与机理”(42171284);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22YJCZH199); 广东省社科项目(GD23CGL02); 2025年佛山大学学术基金项目(xsjj202508zsb02); (xsjj202508zsc04)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286

一、研究背景

自2020年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以来, 我国的扶贫工作重点转为解决我国妇女、儿童、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相对贫困问题。据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21—2022》, 全国流动儿童规模达7109万人, 占儿童总数的23.9%^[1], 随着大量儿童流入父母打工的城市, 城市社会制度保障体系不全面、家庭贫困代际传递与外地人群融入难等问题愈发显著, 体现出流动儿童多维贫困问题存在的普遍性及研究的重要性。贫困始终是困扰全球发展的重要议题。传统理论认为贫困主要由收入引起, 是个人或家庭无法获得基本的生活需求从而导致贫困状态^[2]。但贫困是一种社会相对现象, 其定义随社会日益发展而不断进化^[3]。伴随目前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 各研究组织给出的儿童贫困定义繁多, 但其共识是将儿童贫困概念拓展到了多维^[4], 贫困结果不止涵盖收入因子, 同时有教育、心理等因子。基于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多维贫困理论, 采用以能力定义贫困的方法, 其测量角度超越传统单一的收入维度, 从多个维度评估个人的贫困状态^[5-7]。多维贫困理论的发展使贫困研究能更全面考虑社会结构性因素, 为解决贫困问题提供更有效的路径。

在贫困内涵拓展、有效测量方法增加的背景下, 儿童多维贫困的研究数量日趋增多。目前研究主要聚焦识别多维贫困^[8-10]、影响因素分析^[11-13]两方面展开。前者多采用A-F方法^[6], 因不同学者使用的研究数据与研究主题不同, 儿童多维贫困维度主要集中在健康、教育、生活水平、水源、卫生设施等维度上; 后者多由早期关注年龄、户口等个人特征逐渐拓展至地理因素与区域特征等外部环境。然而, 现有研究对流动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贫困研究并不充分^[12, 14], 较少考虑流动儿童的营养吸收、家庭的耐用消费品拥有率、居住与活动空间以及融入新社会时所需的家长陪护等维度; 且流动儿童多维贫困的影响机制尚未明晰, 尤其缺少探究致贫机理。鉴于此, 测度流动儿童多维贫困水平与影响机理探析, 既有利于探究流动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身心需求, 也能更好满足流动儿童对

作者简介: 胡诺琪(2004—), 女,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为人文地理学与可持续发展;

王成超(1979—), 男,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乡村地理学和区域可持续发展。

通讯作者: 徐丹(1982—), 女,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与GIS应用。

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实现。

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的出台,户籍制度带来的城乡区域双重隔离主要体现在大中城市。本文采纳吕利丹等人对流动儿童概念的界定,流动儿童是指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且流动到户籍登记地所在区县以外的人^[15]。以往的流动儿童贫困研究虽然成果丰富,但存在较多不足,针对当前研究局限性,本文以广东省佛山市城镇流动儿童为研究对象,选取营养、健康、生活水平、教育、住房、家庭陪护 6 个维度共 10 项指标综合测度该市城镇流动儿童多维贫困状况,再基于个人、家庭和区域特征提出影响机理研究框架,最后使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探究流动儿童多维贫困的致贫因子。

二、研究方法与指标体系构建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 Alkire 和 Foster 所创立的“双界限法”测度城镇流动儿童多维贫困。根据此思路,先计算多维贫困发生率再计算平均剥夺份额,得到多维贫困指数为:

$$MPI \quad (PI=H(k) \times A(k)) = \frac{q}{n} \times \frac{\sum_{i=1}^N c_{ij}(k)}{q} \quad (1)$$

其中, MPI 为佛山市流动儿童多维贫困指数, H 为佛山市流动儿童多维贫困发生率, A 为平均剥夺份额, q 为佛山市流动儿童多维贫困人口, n 为调查样本总人口,体现了贫困广度; $c_{ij}(k)$ 表示为个体 i 在不同维度 k 下被剥夺的指标数量,体现了贫困深度。

当因变量是二分类时,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能够科学判断其影响因素。本研究被解释变量为流动儿童的多维贫困状态,如果流动儿童在值下处于贫困,则记为 1,反之则记为 0,建立二元 Logistic 模型如下:

$$\log itP = \ln\left(\frac{P}{1-P}\right) = \alpha_0 + \sum_{i=1}^k \alpha_i x_i \quad (2)$$

P

α_0

α_i

(二) 流动儿童多维贫困指标体系构建

在实际调查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择取营养、健康、生活水平、教育、住房、家庭陪护 6 个维度,其中选取 BMI 即身体质量指数^[11,16]、医疗保险^[17]、生病频率^[18]、人均生活支出^[19]、耐用消费品^[12]、到校时间^[20]、独立书房、独立卧室^[21,22]、父母看护^[13]、亲子活动频率^[22]共 10 项指标,其中每个维度的权重相等。基于此,最终构建城镇流动儿童多维贫困识别体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广东省佛山市城镇流动儿童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及权重

维度	指标	指标的剥夺临界	权重
营养	BMI	低于或高于标准值赋值为 1, 否则为 0	1/6
健康	医疗保险	没有商业保险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赋值为 1, 否则为 0	1/12
	生病频率	儿童三个月内生病两次赋值为 1, 否则为 0	1/12
生活水平	人均生活支出	小于等于佛山市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平均值 (每个月 3677 元) 赋值为 1, 赋值为 0	1/12
	耐用消费品	家庭没有任何一个以下耐用品: 摩托车或电动车、电脑、空调、冰箱、洗衣机赋值为 1, 否则为 0	1/12
教育	到校时间	上学路途时长超过 15 分钟赋值为 1, 否则为 0	1/6
住房	独立书房	家中没有独立书房供孩子学习赋值为 1, 否则为 0	1/12
	独立卧室	家中没有独立卧室供孩子休息赋值为 1, 否则为 0	1/12
家庭陪护	父母看护	长期没有父母 (或一方) 陪伴赋值为 1, 否则为 0	1/12
	亲子活动	两周以上家长没有与孩子娱乐、游戏等活动赋值为 1, 否则为 0	1/12

三、调研点概况及数据来源

佛山市地处广东省中南部,处于珠江三角洲核心地段。第二产业是佛山经济的中流砥柱,制造业更是其经济的核心根基,机械装备、家电家具、陶瓷建材等传统产业优势十分明显。伴随佛山经济持续增长与人口不断流入,

流动儿童规模也在稳步扩大。2024 年，佛山常住人口一共是 961.54 万人，其中有 452.47 万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占 47.1%，流动儿童数量约 60 万。佛山市制造业发展壮大，工人需求量多，因此吸引了大批携带家庭的外来打工一族与农民子弟，因此佛山流动儿童群体逐渐庞大。

本研究采集数据的方法为问卷调查和访谈法。数据的获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进行正式调查之前，2023 年 12 月进行了预调查，团队从佛山市随机选取 2 个镇，每个镇抽取 5-10 名流动儿童进行预调研，并根据调研结果对问卷进行修改和完善。第二阶段：2024 年 1 月开始正式调研，采用分层抽样，选取 4 个镇，各镇依据区域位置和流动儿童学费区间划分为城镇中心与城郊地区两类空间，以及 3000-4000 元、4000-5000 元、5000-6000 元和 6000 元以上四个学费层次，选取流动儿童较为集中的学校进行实地问卷派发。调研地点分布在祖庙街道、石湾街道、南庄镇与张槎街道。每次调研持续 2 到 3 小时，每位儿童的调研平均时长为 15 至 20 分钟。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238 份，筛选后获得有效问卷 232 份，有效问卷率为 97%。

四、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 多维贫困特征

佛山市城镇流动儿童多维贫困水平高。如表 2 所示，随着贫困临界值 k 值的增大， H 值和 MPI 不断减小，而 A 值不断上升，说明处于严重多维贫困状态的流动儿童人数逐渐减少，但他们的贫困程度和维度剥削状态不断加深。当 k 从 0.2 增加到 0.6 时，贫困发生率 H 值从 92.3% 下降为 21.97%，表明该区域流动儿童多集中在 $k=0.2-0.6$ 之间受到剥夺。学术界常用 $k=0.33$ 时作为测度多维贫困的剥夺临界值，当 $k=0.33$ 时佛山市城镇流动儿童的多维贫困发生率 H 值为 79.55%，平均剥夺份额 A 值为 52.22%，多维贫困指数 MPI 为 0.415，这表明佛山市城镇流动儿童多维贫困状况严重。

(二) 指标和维度贡献率

当 $k=0.33$ 时，BMI、生活水平、到校时间位居前三，分别为 14.84%、13.43%、10.8%，这些指标是流动儿童多维贫困治理中的重点。如表 3 所示，在不同 k 值下，将多维贫困指数分别按 10 个指标和 6 个维度分解。指标贡献率呈现三种趋势，第一种是维持高贡献率，如 BMI，表明其是流动儿童普遍被剥夺的指标；第二种是随 k 值增加而贡献率上升，包括到校时间、独立卧室、父母看护，表明这些是深度贫困的个体主要被剥夺的指标；第三是贡献率下降，如生活水平，表明对深度贫困的流动儿童来说，遭受多方面贫困剥夺。在 5 个维度中，营养、生活水平、家庭陪护维度贡献率较高，反映佛山市家庭生活水平普遍较低，流动儿童身体营养少，父母职业收入少、工作时间较长导致陪护流动儿童时间短。

表 2 多维贫困测度结果

贫困临界值 (k)	贫困发生率 H(k)	平均掠夺份额 A(k)	多维贫困指数 MPI(k)	人数
0.1	96.97%	46.94%	0.455	128
0.2	92.42%	48.43%	0.448	122
0.3	79.55%	52.22%	0.415	105
0.33	79.55%	52.22%	0.415	105
0.4	62.88%	57.23%	0.360	83
0.5	49.24%	61.54%	0.303	65
0.6	21.97%	71.55%	0.157	29
0.7	8.33%	79.55%	0.066	11

表 3 不同 k 值下维度和指标贫困贡献率

k	营养 (BMI)	健康	医疗保险	生病频率	生活	耐用消费品	到校时间	住房	独立书房	独立卧室	家庭陪护	看护情况	亲子活动
0.1	16.1%	14.1%	8.5%	5.7%	26.5%	11.9%	12.2%	15.1%	8.6%	6.5%	16.0%	6.7%	9.3%
0.2	16.4%	14.0%	8.2%	5.8%	25.8%	11.7%	12.4%	15.4%	8.7%	6.6%	16.1%	6.8%	9.3%
0.3	16.1%	14.6%	8.5%	6.1%	24.8%	11.4%	12.5%	15.5%	8.7%	6.8%	16.6%	7.0%	9.6%
0.33	16.1%	14.6%	8.5%	6.1%	24.8%	11.4%	12.5%	15.5%	8.7%	6.8%	16.6%	7.0%	9.6%
0.4	16.8%	13.7%	7.9%	5.8%	23.5%	11.2%	14.4%	15.6%	8.8%	6.8%	16.0%	7.0%	8.9%
0.5	16.3%	13.3%	7.9%	5.4%	22.7%	11.3%	15.4%	15.8%	8.8%	7.1%	16.5%	7.5%	9.0%
0.6	16.9%	12.0%	7.6%	4.4%	21.3%	10.8%	17.7%	14.9%	7.6%	7.2%	17.3%	8.0%	9.2%
0.7	17.1%	11.4%	7.6%	3.8%	19.0%	10.5%	21.0%	16.2%	8.6%	7.6%	15.2%	7.6%	7.6%

(三) 流动儿童多维贫困影响因素与机理框架

将 $k=0.33$ 时作为贫困临界值,此时的测度结果具有科学性与广泛性,此时贫困发生率为79.55%。样本城镇流动儿童多维贫困状态作为被解释变量,若城镇流动儿童在 $k=0.33$ 状态下处于多维贫困状态,则记为1,反之则记为0。本研究将影响佛山市流动儿童多维贫困的因素划分为三类: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区域特征。

回归分析显示,社交状态、父亲职业、养育的子女数量、老家所在地,对流动儿童多维贫困的影响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在个人特征方面,朋友少于10人的流动儿童比多于10人的流动儿童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高。在监护人特征方面,父亲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职业的比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的流动儿童的概率高。在家庭特征方面,养育的子女数量越多,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越高。从地区方面来看,老家位于我国中部与西部比东部的流动儿童陷入多维贫困概率高。具体数据如表4所示。

表4 城镇流动儿童多维贫困发生影响因素模型结果

		B	显著性	EXP(B)
个人特征	性别(参照组=男性)			
	女性	0.499	0.488	1.647
	年龄	0.076	0.792	1.079
	健康自评(参照组=更健康)			
	更差	0.194	0.805	1.214
家庭特征	社交数量(参照组=朋友数量多于10个)			
	朋友数量少于10个	1.312	0.096*	3.714
	全家规模	0.043	0.85	1.044
	赡养的老人数量	-0.374	0.441	0.688
	养育的子女数量	0.862	0.074*	2.369
	家庭年收入	-0.038	0.659	0.963
	父亲职业(参照组=以脑力劳动主导)			
	体力劳动主导	1.991	0.065*	7.32
	母亲职业(参照组=以脑力劳动主导)			
	以体力劳动主导	0.973	0.322	2.647
区域特征	就读学校学费区间(参照组=3000-4000元)		0.112	
	4000-5000元	-1.32	0.273	0.267
	5000-6000元	-2.406	0.083*	0.09
	6000元以上	2.491	0.061*	12.075
	就读学校地区(参照组=城镇中心)			
	城郊地区	1.784	0.146	5.953
	老家所在地区(参照组=东部)		0.071*	
	中部	2.191	0.053*	8.948
	西部	1.475	0.074*	4.373
	常量	-4.72	0.231	0.009

注:括号内为对照组, * $p < 0.1$, ** $p < 0.05$, *** $p < 0.01$

结合影响因素分析,本研究进一步搭建流动儿童多维贫困的致贫机理框架(图1)。综合显著因子可得:(1)家庭因素是影响流动儿童多维贫困的关键因子,并与区域因子交互影响,解决流动儿童贫困的根源需要从监护人的教育与经济水平入手。家庭与流动儿童的生活紧密相连,贫困流动儿童家庭的流出地多集中于我国中西部地区,其经济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相较于东部地区明显滞后;监护人普遍学历较低,流入新城市后,因工作技能不足及新社会制度与生活的排斥,家庭收入偏低,难以享受流入城市居民的同等福利,导致流动儿童教育资源匮乏;此外,贫困家庭多数为农村户口,生育政策相对宽松,家庭内儿童抚养人数较多,使得家庭教育负担沉重。(2)流动儿童个人因素受家庭因素与区域因素双重制约,贫困代际传递、家庭关注少与监护人的学历水平等都会影响流动儿童在融入社会时的身心发展。监护人的工作性质多为高强度、长时间、低收入的职业类型,导致他们较少关注流动儿童的个人与社交情感需求,加之流入地的排斥,使得流动儿童社交融入困难,表现为朋友数量少且交友范围狭窄;再者,家庭生活水平和学校伙食水平低下,直接影响流动儿童的身体素质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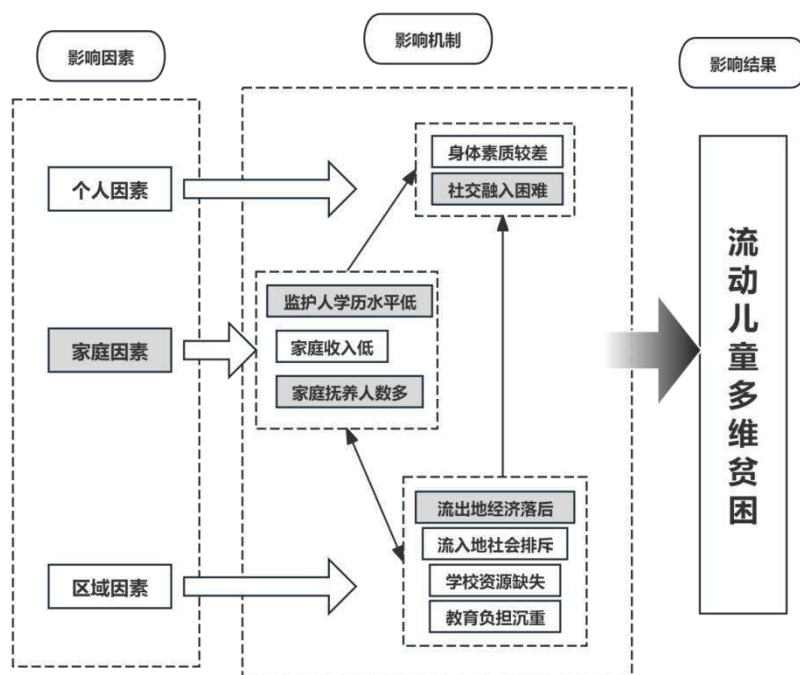


图1 流动儿童多维贫困影响机理

五、结论与讨论

针对上述研究结果，主要有三方面的发现：（1）研究结果显示当 $k=0.33$ 时，流动儿童多维度贫困发生率为80%，高于前人研究成果40-70%^[12, 20, 23]，主要原因在于指标体系构建的差异，前人注重个体健康、生存、日常保护、家庭资本等方面，而本研究引入流动儿童父母陪护、亲子活动频率、独立书房与独立卧室等因素进行测度。

（2）维度贡献率数据显示，营养、生活水平、家庭陪护维度贡献率较高。营养补给是健康资本存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影响儿童健康贫困^[18]，此时流动儿童处于身体发育与身体免疫系统的关键期，他们对营养必需品补给需求量大，需要及时为他们补充营养。因为父母外出务工，不重视或没有时间陪伴孩子，主动与孩子沟通交流，同时孩子的烦恼也无法及时向他们诉说，会降低儿童幸福感、自信心和人际交往的意愿，妨碍儿童健全人格的塑造^[24]。（3）从影响因素来看，社交状态越低频、数量越少会更容易陷入多维贫困，社会交往是导致儿童多维贫困的重要因素^[17]。一个家庭中孩子数量越少，父母对一个儿童的关注和照顾相对来说就会越多，那么该儿童就越不容易陷入多维贫困状态^[12]。父母从事医生、会计、律师、政府工作人员等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工作类型会比从事建筑装修、商场服务人员与运输司机等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类型的教育水平更高，父母的学历水平越高，孩子陷入多维贫困的机会越小^[23]。老家所在地位于中部和西部的流动儿童比老家位于东部的流动儿童更容易陷入贫困，原因可能是我国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基础教育设施落后，工作机会少，老家位于中、西部的贫困流动儿童流入佛山的数量比东部多。综合以上分析来看，除了儿童个人因素如营养、社交状态影响着其多维贫困状态之外，父母教育、父母陪伴、家庭中孩子个数等因素也是流动儿童的多维贫困的重要因子。因此，无论是政府、社会还是家庭，对待敏感脆弱的流动儿童时都该给予更多的关注。

六、政策建议

随着中国开放力度变大，各城市间的流动活力提高，流动儿童对流动地的身心融入挑战难度大，他们难以享受与本地儿童同等的福利，是需要城市特别给予关心和爱护的对象群体，所以引导社会关注流动儿童的多维贫困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相关建议：

第一、搭建社会流动儿童多维贫困动态监测与保障体系。根据《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等最新文件，各级政府可以参照国家标准，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建立流动儿童数据库，制定流动儿童服务基础清单，对流动儿童的实际生活情况进行数字化。并且重点监测营养、陪护等维度的变化，重点标注父亲职业如小商贩、零工从业者、体力劳动从业者等，多子女家庭，老家所在地等高风险标签。根据对当地的实际摸排工作后，实时调配资源至到如工业园、产业园、城郊等周边流动人口较多的地区。

第二、改善流动儿童生活环境,促进身心健康发展。为流动儿童提供公共学习活动区域,在流动人口聚集地周边社区建设爱心之家,配备自习室、心理咨询室,缓解流动家庭居住压力。为流动儿童发放适量食品券,针对性地对儿童生活必需品进行优惠,并联合志愿者定期入户指导膳食搭配,为家长提供知识普及教育,增强流动儿童营养补给。在心理健康发展方面,社区可邀请专家讲授新市民融入指南课程,定期开展亲子交流活动,提升家庭陪护质量,呼吁家长关注儿童融入新社会的情感需求,引导儿童积极乐观地学习与生活。在社交状态方面,学校可开展各种校本课程,结合当地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流动儿童对居住地地认同感,社区可以爱心之家在可组织各种游戏与活动,增强其对社区的归属感。

第三、脱贫政策因地制宜,缓解流动儿童家庭贫困代际传递。一方面,结合当地的流动儿童流入实际情况,联合相关流出地,共同推动居住证与户籍地政策联动,完善跨区域救助衔接机制,统筹就业、失业补助资金等经费,完善新市民融入的衔接机制,解决因“老家所在地”导致的保障断裂问题,比如流入佛山的流动儿童多为湖南、广西、四川等地;同时流入地与流出地的政府可以寻找产业联动的机会,不仅可以提升经济活力也可以吸引部分流动人员返乡创业就业;流入地政府可建立新市民技能培训基地,提升人力资本,为流动人口提供适应当地需求的培训活动,如建筑、物流、制造与电商直播技术等,促进流动人口稳定就业,提高收入,提升创业质量和层次,提高流动家庭的收入。另一方面,对养育3名及以上子女的家庭,可以根据家庭人数与实际经济情况提供阶梯式现金补贴,推动多子女家庭子女就近入学,减轻家长接送负担;鼓励企业设置弹性岗位、育儿假,打造友好型企业。

参考文献:

- [1] 韩嘉玲. 流动儿童蓝皮书: 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21—2022)[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3.
- [2] Chaudry A, Wimer C. Poverty is not just an indicat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poverty, and child well-being[J]. *Academic pediatrics*, 2016, 16(3): S23-S29.
- [3] 刘凯, 王卓祺.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贫困面貌的演变——概念、测量与时空比较[J]. *社会保障研究*, 2023, (02): 95-111.
- [4] Minujin A. Making the case for measuring child poverty[J]. Ortiz I, Daniels LM, Engilbertsdóttir S. *Child Poverty and Inequality: New Perspectives*: UNICEF, 2012: 14-16.
- [5] 徐蓉烨, 褚淑贞. 中国居民多维健康贫困的测度与分解研究[J]. *卫生经济研究*, 2024, 41(04): 43-46+50.
- [6] Sen A. Poverty, inequality and unemployment: Some conceptual issues in measurement[J].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1973: 1457-1464.
- [7] Alkire S, Foster J.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1, 95(7-8): 476-487.
- [8] 宋扬, 刘建宏. 儿童时期多维贫困的长期影响——基于 CHARLS 生命历程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9, 33(03): 72-85.
- [9] 李玲, 刘林, 刘一波, 等. 早期儿童多维相对贫困识别及其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来自西部偏远山区的证据[J]. *中国电化教育*, 2023, (09): 9-17.
- [10] 李晓明, 杨文健. 儿童多维贫困测度与致贫机理分析——基于 CFPS 数据库[J]. *西北人口*, 2018, 39(01): 95-103.
- [11] 吕文慧, 苏华山, 黄姗姗. 被忽视的潜在贫困者: 农村留守儿童多维贫困分析[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8, 33(11): 90-99.
- [12] 高琴, 王一. 中国儿童多维贫困的水平、趋势与模式研究——基于 2013—2018 年 CHIP 数据的证据[J]. *社会保障评论*, 2022, 6(03): 98-123.
- [13] 蔡佩汝, 汪侠, 闫艺涵, 等. 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时空格局变化及其影响因素[J]. *地理学报*, 2021, 76(10): 2551-2567.
- [14] Meng F, Zhou G, Liu Z, et al. Measurement and decomposi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mong migrant children: Evidence from China[J]. *Cities*, 2024, 150: 105077.
- [15] 吕利丹, 王非. 人口流动与儿童教育: 基本事实与解释[J]. *人口研究*, 2017, 41(06): 45-57.
- [16] 易欢. 多维贫困视角下儿童禀赋差异识别[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0, 31(19): 150-151.
- [17] 海少琪, 汪侠, 史舒悦. 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性别差异: 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J]. *热带地理*, 2023, 43(5): 897-912.
- [18] 黄莹. 相对贫困视角下儿童健康贫困的逻辑机理及策略研究[J]. *黑龙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2021, (16): 21-23.

- [19] 罗蔚翹, 温慧, 黄婉婷, 等. 进城农民工多维贫困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广东省佛山市为例[J]. 台湾地区农业探索, 2024, (06): 51-58.
- [20] 王卓, 郭真华. 儿童相对贫困的标准建构与多维测度——基于 2021 年四川凉山州的专题调查[J]. 农村经济, 2022, (08): 1-11.
- [21] 刘佳纯, 王子成. 广州市流动人口住房变动趋势及动因分析——基于 Oaxaca-Blinder 与 Fairlie 方法的分解[J]. 调研世界, 2019 (6): 21-26.
- [22] 杨晨晨, 刘云艳. 早期儿童多维贫困测度及致贫机理分析——基于重庆市武陵山区的实证研究[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19, 40(03): 58-66.
- [23] 魏乾伟, 王晓莉, 郝波, 等. 山西和贵州贫困地区儿童多维贫困测量及现状分析[J]. 中国公共卫生, 2018, 34(02): 204-209.
- [24] 李玲, 胡小兰, 黄莉. 家庭多维贫困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基于西部五区县的实证研究[J]. 民族教育研究, 2024, 35(02): 85-96.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and Its Influencing Mechanisms for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 Areas: An Analysis 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Fosh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Nuoqi Hu, Chengchao Wang, Dan Xu^{*}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 Foshan University, Guangdong, Foshan 528000, China)

Abstract: With rural-urban migration shifting to family migration, relative poverty among migrant children has become a key bottleneck in building a society of common prosperity. As a large number of migrants flow into Foshan, migrant children fac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challenges in the new city. Based on 232 questionnaires of migrant children in Foshan, Guangdong,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icator system covering nutrition, health, living standards, education, housing and family companionship. Using the Alkire-Foster (A-F) method to explor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characteristics and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to identify influencing factors, we infer a poverty-causing mechanism framework for migrant children to reveal core poverty-inducing factors. Results show: (1) Migrant children's poverty incidence reaches 80% at the deprivation cut-off (k)=0.33; (2) Nutrition, living standards and family companionship contribute prominently to poverty; (3) Social status, paternal occupation, number of children raised and place of origin are the main poverty-inducing factors. Measuring their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helps meet migrant children's aspirations for a better life and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Migrant Childre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Poverty Measurement; Influence

非遗技艺文化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路径 ——以罗城仫佬族剪纸为例

黄雅晴, 莫艳婷, 杨艳

(广西科技大学, 广西 柳州 545006)

摘要: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剪纸, 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文化基因、价值理念和民族互动等元素, 对增进民族交流、连结民族情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区级仫佬族非遗剪纸为研究对象, 探讨该剪纸的渊源及其在日常生活和礼仪过程中有关元素运用、图案设计和功能用途等面向, 进而分析其中关于剪纸题材选择、技艺互鉴、作品共享和经济交流等交互特征, 据此探析通过非遗技艺文化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技艺文化; 仫佬族剪纸;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广西乡村风俗移易与文化遗产发展研究”(23FMZ015); 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仫佬族传统节日传承机制与振兴路径研究”(2023KY0329); 广西科技大学博士基金项目“仫佬族传统节日婆王节的文化元素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校科博21S12)成果。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384

1. 引言

2023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铸就,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必将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2024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 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可见, 促进各民族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当下民族工作及其研究的重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民族关系的集中展现, 存在初级到高级的层次递进关系, 三者辩证统一、动态交织。民族交往是交流交融的基础, 涉及民族生存发展的各领域, 包括民族与民族间、民族内部个人与组织的或直接或间接的往来互动; 民族交流是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现实领域的更深层次交往, 是保存自身主体性的同时促进不同民族在思想、知识、技术等文化领域的互通互鉴; 民族交融则蕴含着“和”与“合”价值, 是交往交流自然进展的最终产物, 但交融不等于完全消除族群差异的“同化”, 更不等于彻底消弭族际边界的“融合”, 它表现为不同民族、民族成员之间共同心理认同的增加^[1]。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而非遗技艺文化是有具体物质形态的非遗文化之一, 长期以来, 在各民族不断交流、借鉴中, 非遗技艺中的图案、纹样和工艺等面向得到不断完善, 推动着非遗技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

从非遗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来看, 各学者指出非遗是多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中相互采借和涵化形成的文化结晶^[2], 可以从文化、社会、心理三个维度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同时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维系民族团结并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3]。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阈下, 如何探讨非遗剪纸中的民族交互关系也是当前学界研究的重点。如徐珍指出非遗剪纸有助于地域文化的传播与交融, 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4]。乔晓光分析了非遗剪纸传承实践方式, 指出非遗剪纸有极强的文明承载力和融合力, 是跨越语言障碍和文化陌生感受的交流方式^[5]。郭晓英探讨了和林格尔剪纸语义的现代转变, 并指出和林格尔剪纸从民间走向官方所倡导的

作者简介:黄雅晴(2001-),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民族社会工作;

莫艳婷(1984-), 女, 讲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研究方向为民族社会学、民族社会工作;

杨艳(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研究方向为民族社会工作。

文化交流,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碰撞,唤起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6]。杨小雪以贵州省归兰乡境内的水族非遗剪纸为例,分析了水族剪纸的技艺、功能、发展规律和共享机制,进而提出互通互用剪纸意象符号能促进族与族交往,互学互鉴剪纸文化能促进民族交流,共建共享剪纸文化能促进民族交融^[7]。王锋以敕勒川地区的非遗剪纸艺术为例,分析了当地剪纸艺术的历史渊源和艺术特色,并探讨其中图案纹样、题材内容、技艺传承中蕴含的民族交融特征,进而提出当地剪纸艺术中有助于各民族间的情感交流与文化认同、推动民族团结进步^[8]。仫佬族剪纸技艺于2018年被列入了第七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现有的文献看,仫佬族剪纸研究肇始于20世纪末,一是从整体性视角,较为全面、系统的描述了在仫佬族不同的人生礼俗^[9]、日常俗信^[10]和节日庆典^[11]中有关剪纸类别、图样和用意,据此为本研究提供了有关仫佬族剪纸的整体性参照。二是集中在探讨仫佬族剪纸发展策略^[12]、数字赋能活态传承^[13]、助力乡村振兴^[14]和文化交流桥梁^[15]等面向。

综上所述,当前学术界有关非遗剪纸的研究关注到非遗剪纸作为文化交流媒介、非遗剪纸中的民族认同,以及非遗剪纸中的民族交互等面向,其中亦具体设计到非遗剪纸的纹样、题材、技艺、功能、发展规律和共享机制;但分别从非遗剪纸的历史渊源、图案纹样、结构工艺和功能用途等方面系统挖掘其中呈现出来的多民族交互的面向,进而探讨通过非遗技艺文化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存在不足。且既有研究虽有助于深入了解仫佬族非遗剪纸技艺的文化特征和功能,但各类研究主要聚焦于仫佬族非遗剪纸技艺本身的传承发展方面,而挖掘仫佬族非遗剪纸技艺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元素,进而探讨非遗技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创新途径研究也存在不足。因此,本研究将重点从罗城仫佬族非遗剪纸的渊源、图案、纹样、工艺和用途等方面,探讨蕴含其呈现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特征,分析其中呈现出来的仫佬、汉等民族间的互动交流,进而探讨当代通过非遗技艺文化助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途径。

2. 仫佬族剪纸的文化内涵

2.1 仫佬族剪纸历史渊源

仫佬族剪纸技艺历史悠久,最早出现在唐代,历经宋、元、明、清,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是一种根植于农业社会的民间艺术,是仫佬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从地理位置看,仫佬族主要居住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周围群峰延绵且河网密布,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造就了仫佬族剪纸细腻写实的剪纸风格。从剪纸材料角度看,民国期间贝江及黄金两处造的粗纸不敷供给^[6],纸为仫佬族剪纸广泛传播提供了物质保障。从民俗文化看,仫佬族的春社、婆王诞期节、牛生日节、八月社、依饭节等民族文化^[17]被剪纸记录为仫佬族剪纸多样性的局面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从发展角度看,剪纸技艺与实用手工业的结合推动了剪纸技艺的精细化发展,著名的仫佬族背带中背带芯的制作工艺为以硬纸板图案为刺绣底样的仫佬族剪纸绣,刺绣底样运用的剪纸技艺便是仫佬族剪纸技艺发展的开端。

仫佬族剪纸因其可操作性强而群众性广泛,地域性鲜明且情感丰富,是民族日常生活的记录也是民族思想灵魂的表达。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为保护传承该文化于2010年在罗城文化馆非遗展厅和仫佬族博物馆设立了仫佬族剪纸展厅,2016政府把仫佬族民间剪纸技艺列入了县级保护代表性项目名录,2017年仫佬族博物馆建立了文化扶贫基地并设有仫佬族民间剪纸技艺展示和传习厅。2018年12月,由于仫佬族民间剪纸艺术内涵丰富、用途广泛、风格独特、富含地域性色彩,在历史文化、民俗、美术、文学、民族等多学科学术方面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在当下仫佬族人民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且可操作性强,同时已有吴谢氏、吴思丽、吴桂芝、吴朝勇、罗华清五代传承人,仫佬族剪纸技艺被列入广西第七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2 仫佬族剪纸艺术特色及功能用途

仫佬族剪纸形式丰富多样,蕴含浓厚的仫佬族民族文化特色,呈现出独具一格的艺术特征。剪纸元素选取方面分为花卉类、历史故事类、神话传说类、民间故事类、吉祥图案类、图腾符号类、民俗传统类、祭祀类、山水风光类、花鸟虫鱼类、人物动物类、现实生活题材类。在纹样运用方面,仫佬族剪纸纹样主要为动物纹样、植物纹样和几何纹样,常见的有双鱼纹、石榴纹、柳叶纹、太阳纹、水滴纹、锯齿纹、祥云纹、螺旋纹等,如藤蔓和动物图案中会运用螺旋纹、云朵和花朵图案中会运用祥云纹。技艺表现上,阴剪是最常用的仫佬族剪纸技法,即将图案的轮廓线保留在纸张内并将内部部分剪掉,该技法使剪纸作品具有较为复杂的内部图案和线条,令其轮廓更加清晰和突出;同时,为呈现出整体且有结构性的剪纸作品,仫佬族剪纸手艺人也会结合运用阳剪、折剪、刻纸、撕纸等技法。

仫佬族剪纸的形成与产生与仫佬族生产生活紧密关联,其功能不仅限于日常生活中的实用领域,在民俗活动和情感交流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功能。常见的实用功能为用于刺绣底样,即将剪纸作为刺绣底样辅助完成绣品,该技艺被称为剪纸绣,是制作仫佬族衣饰、鞋帽、背带、枕头、手巾中运用的刺绣技法,如仫佬族著名的背带剪纸绣;民俗功能为在人生礼仪和节庆仪式中用作张贴和摆衬,仫佬族会在嫁娶仪式中张贴大量双喜字、石榴、鸳鸯等喜花在建筑和物品中,在丧葬礼仪中将纸张剪裁成各种纸扎祭品,如纸幡、纸房子、纸车、纸神灵等用于祭奠逝者,在春节张贴龙、蛇、兔图案等生肖类和福字、吉字等文字类窗花和墙花,在依饭节中剪出各种神灵、吉祥物用于道场布置和祈福庆贺。此外,仫佬族剪纸也常被用于情感交流的载体,常见的福、喜、吉字和凤凰、祥云、牡丹等剪纸代表着人们对福气、吉祥、富贵等的期待,石榴剪纸是人们对家族兴旺与民族团结友爱的情感寄托,双鱼纹剪纸是内心希望年年有余情感的载体。

2.3 仫佬族剪纸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特征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汉族、回族、壮族等多个民族在此地长期和睦共处,共同构建了绚烂多彩的文化篇章。仫佬族非遗剪纸文化更是凝聚各民族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多元文化的相互融合与各族群众互动交流的呈现,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极大提升了仫佬族非遗剪纸作品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特别是汉族文化对仫佬族剪纸作品的影响更是长久而深远。

仫佬族剪纸形成于各民族手工艺人的文化交流碰撞之中,这一创造过程生动诠释了人类中的文化共生理念,即多元文化交流互鉴、和谐共生。仫佬族剪纸作品精美细腻,各族手工艺人在各制作环节过程中相互协调,推动着不同佳作源源不断出现。如关于“十二生肖”的仫佬族剪纸作品是在仫佬族的引领下,选取汉族的十二生肖为作品创作题材,将汉族的深厚文化底蕴融入到仫佬族剪纸作品设计稿中所设计的剪纸作品,不但体现了仫佬族和汉族文化的传承,也彰显了不同民族之间关于仫佬族剪纸艺术创作中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各族群体互动时对剪纸题材及元素的共同性解读。“十二生肖”剪纸作品具体制作过程中,剪纸手艺人使用的各类剪刀、刻刀、垫板等工具的使用融合了各民族的剪纸工具使用特点,仫佬族手艺人技法精湛,面对复杂的线条和图案主要以仫佬族常用的阴剪技法为主,刻画出了十二生肖中主要的动物图案,同时也结合了剪纸发展过程中所融合的其他民族手艺人使用的阳剪技法,呈现了作品中的花、太阳等图案纹样,阴阳结合是手艺人跨民族交流剪纸技艺的具体体现,使得剪纸作品整体线条流畅,构图均衡且充满韵律美,且擅长不同技法的手艺人在文化互通互享的过程中进行跨民族、跨地域的交流不但是实现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交融,也是传承人了解多元文化,助力多元文化共融的重要途径。此外,仫佬族剪纸文化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不仅限于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在仫佬族剪纸作品的传播和展示层面也广泛呈现者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十二生肖”剪纸作品的传播和展示一方面是以纸张为载体供不同民族欣赏,人们在接触到该剪纸作品时,不但会因仫佬族剪纸技法的精湛性进行讨论,而且会关于其中蕴含的汉族文化进行交流;另一方面,剪纸作品会以文创产品的形式进行传播和展示,仫佬族剪纸手艺人会和汉族、壮族等剪纸手艺人以“十二生肖”剪纸作品为基础共同设计非遗剪纸文创产品,各族手艺人将其与日常生活用品(如水杯、折扇、摆件等)进行联合设计的交流设计过程中不但增进了情感交流,也丰富了剪纸产品的商业价值,让其在传播过程中作为消费品在潜移默化中加强各民族关于经济交往与文化互鉴方面的链接,促进各族群众在经济活动中的文化交往交流。

3. 以剪纸为媒: 技艺文化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路径

3.1 丰富各界资源, 保障文化发展

随着仫佬族非遗剪纸技艺保护与传承工作的不断深入,仫佬族非遗剪纸技艺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罗城非遗办可对仫佬族非遗剪纸技艺历史、技法、元素、图案、作品等现有资源进行系统收集整理,以文字记录的形式丰富仫佬族非遗剪纸技艺文化资源;罗城县可通过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共同丰富仫佬族非遗剪纸技艺资源,筑牢仫佬族非遗剪纸技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根基。政府首先需根据罗城多民族杂居的实际情况制定出能够推动仫佬族剪纸技艺发展的政策体系,为仫佬族非遗剪纸技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制度保障。其次应为仫佬族非遗剪纸传承人、仫佬族非遗剪纸手艺人、仫佬族非遗剪纸文创设计师、当地非遗文化企业家提供经济及场地支持,为仫佬族非遗剪纸技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夯实人才资源。

3.2 加强非遗教育, 助力文化传递

教育能打破非遗传统师徒传承的模式,让非遗能够通过中小学及社区等多方平台进行传递。学校教育具有公共服务性特征,能让各民族师生以较低成本达成大规模互动,如今不同民族的学生离开常居地融入学校进行学习和生活,使得校园逐渐转变为各族师生广泛三交的重要空间^[18]。仫佬族剪纸技艺传习馆可与学校合作定时开展仫佬族非遗剪纸技艺教育培训课程,鼓励不同民族的同学参与,系统讲解仫佬族非遗剪纸技艺的历史渊源、发展现状、制作技巧,让学生动手制作仫佬族非遗剪纸作品,引导学生将仫佬族非遗剪纸技艺与其他民族特色相融合,加深其对仫佬族非遗剪纸文化的理解,如通过制作仫佬族石榴花剪纸作品感受中华民族团结精神等,强化学生群体对共同文化的认知,促进民族多元文化融合。此外,社区依托文化符号也能营造多层次的文化互动场域,以此促进不同族群居民的社会联结,从而成为传播非遗文化、促进民族交流的重要场所^[19]。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可加强与非遗传承人联系,共同组建社区仫佬族非遗剪纸技艺文化培训宣传队伍,针对不同群体定期开展仫佬族非遗剪纸技艺活动,如为儿童及其家长开设学习仫佬族非遗剪纸技艺培训班,为青年举办仫佬族非遗剪纸作品大赛,为全体社区居民设立仫佬族非遗剪纸作品展览平台等,在各项活动中增进族群互动和文化认同。

3.3 创新交流方式,提升文化体验

近年来,旅游促三交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旅游可以为民族三交提供实践平台,平台中的文化符号还可以作为旅游资源,吸引着多元族群共筑旅游大生态,由此在推动旅游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增进各族群众的接触往来与交流互鉴^[20]。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作为唯一的仫佬族自治县远近闻名,仫佬族非遗剪纸技艺在丰富仫佬族非遗文化内涵和优化游客非遗文化体验中都是不可或缺的旅游资源,以仫佬族非遗剪纸技艺为载体在罗城各个景点建立多个仫佬族非遗文化体验空间,如讲解仫佬族非遗剪纸技艺空间、制作仫佬族非遗剪纸作品空间、体验仫佬族非遗剪纸艺术服装空间等能让游客在游玩中将仫佬族非遗剪纸技艺与本身记忆中已有的各民族文化进行融合,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此外,数字技术的发展可以催生新的民族非遗文化表达方式,也让多民族通过数字技术以非遗文化为媒介而产生文化体验交流^[21]。罗城县政府可充分利用数字空间助力非遗剪纸传承人在微信公众号、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展示非遗剪纸作品及制作过程,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系统性呈现仫佬族非遗剪纸技艺发展历史,让更广泛的群体认识仫佬族非遗剪纸技艺,加强各民族群体在线上的交流互动,同时也推动非遗剪纸技艺与时俱进,促进其与不同文化交流融合。

3.4 扩大传播范围,深化民族认同

仫佬族非遗剪纸技艺蕴含复杂多元的文化价值,各民族以仫佬族非遗剪纸技艺为媒介紧密进行交往交流,不但能大范围促进文化融合,也能在文化互动过程中凝聚各族群众思想共识。罗城县应加强推广仫佬族非遗剪纸技艺现有发展成果,积极助力仫佬族非遗剪纸技艺手艺人及传承人参与各地非遗论坛、非遗展览等活动,推动仫佬族非遗剪纸技艺在不同民族之间传播,也让仫佬族非遗剪纸技艺文化成为促进民族交流的纽带。全球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传播对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也有重要意义^[22]。罗城县政府要关注仫佬族非遗剪纸技艺海外受众群体,与海外人员交流也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环节,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会,有效实现文化的转译和扩散,积极联系国外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等国外人所熟知的平台充分宣传、展示、体验和交流仫佬族非遗剪纸技艺,坚持践行以仫佬族非遗剪纸技艺为载体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升海外华裔及外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拓展跨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范围。

4. 结语

仫佬族非遗剪纸技艺蕴藏着丰厚的仫佬族文化,其有形的形态可以被感知、被触摸、被体验;有感的状态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进行参与,并且拥有获得感和幸福感;特色的发展成果可以提升民族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表达。在发展过程中,随着各民族之间的互动交流,无论是技艺方法还是图案纹样,仫佬族非遗剪纸技艺都不同程度体现了其与汉族等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非遗技艺跨民族、跨时间、跨空间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未来可通过丰富各界资源、加强非遗教育、创新交流方式、扩大传播范围助力仫佬族非遗剪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推动其成为认同度更高的非遗文化。

参考文献:

- [1]徐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途径[J].学术探索,2025,(08):77-86.
- [2]谭志满,罗淋丹.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传承[J].民俗研究,2025,(03):79-87+159.
- [3]孔庆夫,郝达.交往交流交融驱动粤闽浙非遗系统性保护的实践进路[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7(03):74-84.
- [4]徐珍,王宝升.增强文化自信的实践之维——以非遗剪纸艺术为例[J].湖南社会科学,2021,(01):153-158.
- [5]乔晓光.田野研究与学科建设:以民间剪纸为个案的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实践[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8(03):101-108.
- [6]郭晓英.文化融合视域下的和林格尔剪纸研究[D].内蒙古大学,2022.
- [7]杨小雪.剪纸文化基因及其多民族共享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2023.
- [8]王锋.敕勒川剪纸艺术对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作用[J].中原文学,2025,(02):186-188.
- [9]李干芬,胡希琼著.民族知识丛书·仫佬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
- [10]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仫佬族百年实录[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
- [11]潘琦.仫佬族通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
- [12]管海朱.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策略研究[J].企业科技与发展,2020,(08):242-244.
- [13]尹佳琪.广西剪纸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设计及推广研究[D].桂林电子科技大学,2020.
- [14]梁金燕.乡村振兴视域下广西仫佬族非遗传承发展[J].大众文艺,2022,(14):1-3.
- [15]庞淑清.生态翻译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策略研究——以仫佬族剪纸文化为例[J].作家天地,2023,(05):122-124.
- [16]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 [17]黄敏珍.浅谈罗城仫佬族的节日文化及其功能[J].才智,2013,(23):200-201.
- [18]洪雷.学校教育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及其实现[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2(02):159-168.
- [19]郭永平,贾璐璐.“非遗在社区”与“社区在非遗”——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非遗保护与社区营造的互动与互构[J].河南社会科学,2025,33(09):99-107.
- [20]明庆忠,韩璐,刘宏芳.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阐释和内在逻辑[J].广西民族研究,2023,(03):8-16.
- [21]汤书昆.“数字化生存”条件下中华多民族非遗传播的新生态[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2(03):1-17.
- [22]涂晓晗,陈波.空间、势能与场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传播的解释框架[J].中国软科学,2025,(11):87-98.

The Practical Path of Promoting Ethnic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through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kills and Culture

—Taking the paper-cutting of the Mulao ethnic group in Luocheng as an example

Yaqing Huang, Yanting Mo, Yan Y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rts and Design, 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uzhou, Guangxi, China

Abstract:As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aper-cutting embodies elements such as the historical memory, cultural genes, value concepts and ethnic interactions of a n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nhancing ethnic communication and connecting ethnic emotion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district-level Miao ethnic paper-cutt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exploring its origi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related elements, pattern design and functional uses in daily life and ritual processes. It further analyzes the interactive features such as the selection of paper-cutting themes, mutual learning of techniques, sharing of works and economic exchanges. Based on this, it explores the practical path of promoting ethnic exchanges,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through the cultur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echniques.

Keywords: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kills Culture; Miao Ethnic Paper-Cutting; Ethnic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引下的机制创新与路径前瞻

周伟

(中共新乡市委党校, 河南 新乡 453000)

摘要: 基层强则国家强, 基层安则天下安,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再次提出, 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本文客观剖析了当前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所面临的突出瓶颈: 权责失衡、机制僵化、能力短板等。基于此, 提出构建“政治势能-数字赋能-组织动能”三位一体的机制创新框架, 以“双向嵌入”制度创新实现权责协同、以智慧党建平台建设驱动流程再造、以培育“红色枢纽”激发多元共治, 从而实现党建引领的“有形覆盖”到“高效能治理”的深度转化。

关键词: 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 二十届四中全会; 机制创新

基金项目: 2025 年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 (项目编号 SKL-2025-113); 2025 年新乡市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 (项目编号 B25220)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403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 要“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拥有着关键性的地位, 这一点毋庸置疑。随着全球化形势愈发复杂, 国内外环境剧烈变化, 社会治理要应对诸多严峻状况: 国外出现诸多不可预见的因素, 内部社会矛盾也层出不穷, 并且愈发错综复杂, 各种潜在的风险相互碰撞交织, 传统的管理办法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当下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 提升基层治理的精准化、精细化与高效能水平, 已经变成需要破解的重要课题之一。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对此作了前瞻布局 and 系统擘画: “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这些论述既强调了党在基层治理中的核心引领作用, 又明确了体系完善、功能拓展、技术赋能的推进实现路径。基层治理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做, 并且成效明显, 比如上世纪 60 年代就形成的“枫桥经验”, 但为什么要把党建引领放进来呢? 我理解,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并不是简单 $1+1=2$ 的关系, 而是要实现 $1+1>2$ 的效果。这也就意味着, 进行基层治理不仅要靠传统的治理方式, 还要把党的领导与基层治理相结合, 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系统性地转化为基层治理的高效能。

当然, 理论和政策都是基于完美的假设,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转化却存在多种现实困扰。比如, 党建和治理存在两张皮现象, 党建引领如何真正嵌入治理现实确实不易; 在人工智能加速演进的今天, 党建优势怎样与新兴科技深度融合提升治理效能也费人思量……这些问题的涌现, 迫使我们在四中全会精神的引领下进行深入的学理剖析和实践探索。

正是基于以上现实考量, 本研究期望在剖析实践问题的前提下, 以四中全会的相关部署为引领, 探索切实有效的机制创新路径, 以期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理论认识、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实践提供一定程度的学术参考。

一、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重大意义

(一) 政治引领: 巩固执政根基与确保治理方向的根本保障

作者简介: 周伟(1982—),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政治学。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管党治党，重在基础。基层党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首要意义，在于确保基层治理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从根本上巩固党的执政根基。

首先，党建工作是国家政策在基层落地的重要抓手。按照四中全会精神，“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重点是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和统筹协调作用。从实际操作角度出发，“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层级架构保障了党的方针政策有效传导，变为群众自发行为，防止执行过程中信息流失或者理解偏差的情况发生。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开展“老旧小区改造”等重大任务部署的时候，地方党组织迅速凝聚共识，整合资源，妥善应对各种挑战，从而做到了中央决策目标精准落地并达成了预期效果。

其次，党建引领是应对复杂局势、守护社会稳定的关键支柱。基层是社会矛盾集中爆发、风险大量聚集的关键区域，还是突发状况频发的前沿阵地、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场域，在处置重大突发事件或群体性事件的时候，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能够及时反应、给出指导，展现出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力--这正好吻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所提出的“统筹发展与安全”战略要求，“党建+社会治理”的革新模式能够明显提高整体防控水平，为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筑牢坚实根基。

（二）效能提升：破解基层治理碎片化与低效化的核心路径

当前基层治理陷入“碎片化”发展困境，究其根本是多主体协同机制缺失、职能边界不清、信息流通不畅等诸多因素交织的结果，这种分散化的管理模式使得行政效率低下、响应速度迟缓、公共服务质量下滑，在此情形下，依靠党建引领形成系统性整合框架，已成为破解这一难题的重要路径之一。

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推动“组织整合”与“利益协调”二者相互融合，在现有的行政治理体系当中，街道办事处和乡镇政府经常会碰到职能界定不清，权力责任界限模糊，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状况。依靠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机制以及相关平台载体，比如共建委员会，基层党组织可以跨越地域限制，统筹协调区域内各方面的主体资源，围绕一些特定的公共事务，像社区环境治理或者养老服务体系的创建，进行协同共治的实践。北京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本质上就是通过强化街道党工委的“吹哨权”（统筹协调权），促使上级职能部门响应“哨声”、下沉资源，从而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治理盲区问题。

此外，党建引领推动治理体系变革，由过去传统的“垂直管理”朝着现在的“网络化协同”方向转变，浙江省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实行“党建统领、网格智治”的措施，党支部或党小组进驻基础治理单元，党员担任网格负责人或者骨干，党的组织体系同社会治理平台相对接，并非直接叠加，而是涉及重塑信息流、业务流、责任链等，形成党组织统筹情况下，区域内人口、地理、事件动向、物质属性和组织架构等的数据库资源可高效收集、仔细分析和准确使用，凭借党员干部和网格员途径促进群众诉求通道畅顺，实现政策落实和服务供给之间的双向互动提升，经考察，当处于党建网格全部覆盖的区域里，民生问题办结时效比没有覆盖的地方要短很多，平均接近30%以上。

（三）民心凝聚：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的实践载体

基层治理的最终目标是服务人民、造福人民。四中全会重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恰恰是将这一思想落到实处的最直接、最生动的实践载体。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扎根群众实践，天然具有亲民属性和信任优势，在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模式之下，“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成为核心理念，使得工作重心从传统的管理领域转型到现代服务范畴。“三会一课”制度、党员责任区划分以及主题党日活动等具体举措，让党组织能够精准地把握民众的需求并迅速回应诉求，在帮助弱势群体发展方面成果突出。以上海市为代表的地区创造性地形成居民区党组织统筹协调机制，整合驻区单位资源与在职干部力量开展志愿服务，成功推出“银龄伙伴计划”、“四点半课堂”等一系列具有特色的项目品牌，独居老人照料难题、双职工家庭子女课外辅导压力等问题得以缓解，这些“温情化”治理举措极大增强了居民的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

同时，党建引领给基层民主协商和矛盾化解赋予了权威保障。在利益多元化，诉求多样的社区环境当中，经党组织带头创建“红色议事厅”或者“邻里调解室”，利用各种资源按照法律法规和社会伦理规则展开互动交流，往

往可以实现更为公平高效地解决问题并且达成共识的效果。这个过程本身也是宣传党的政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公共精神的过程,有助于形成“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良好治理氛围,从根本上促进社会和谐,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二、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突出瓶颈

尽管基层治理中党建引领成效明显,不过向“高效能”转型时仍存一些深层次和结构性难题,仔细探究并精准把握这些瓶颈问题,成为推进制度革新所需的重要前提之一。

(一) 权责失衡:基层党组织的“责任无限”与“资源有限”困境

这是当前最为突出的矛盾。在“压力型体制”下,大量行政事务、考核任务通过“属地管理”原则层层下压至乡镇(街道)和村(社区)。乡镇(街道、村(社区)成为基层党组织及其负责人实际承担多种职能的执行人,虽然他们要承担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公共服务、安全监管等多项任务,但受制于人力物力资源和执法权限不足,在实际操作中容易出现职能虚置现象,上级部门下发指令频繁但缺少相应授权和配套支持,政策落地效果大打折扣。

上述权责失衡的状况,引发基层党建工作陷入功能泛化,重心偏移的险境。有些党组织过度介入本该由行政机构操刀的日常事务性事务,陷入繁杂签章,冗长会议以及繁琐考核之类的形式主义困境。经由实证调查可得知,在某些区域社区当中,党员干部把超过六成时间花费在上级分派的文件处理和迎检任务上,而真正投入到群众联系服务,组织活动筹划以及长远规划上的时间却大为缩减,这种情形从本质上削减了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力量,价值塑造效果及其统筹协调职能。“党建引领”慢慢变成“包揽式”或者“替代型”的操作模式,其治理成效也就很难继续改进。

(二) 机制僵化:党建与治理“两张皮”与新兴领域覆盖不足

“党建引领”和“基层治理”的融合推进在实践中会遇到瓶颈,二者之间容易脱节,虽然“党建+”模式正在逐步走向规范化发展道路,但部分党组织在具体落实中存在形式化倾向,出现“三会一课”内容单一枯燥、“主题党日”活动表面化等形式主义问题。目前党建工作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支持大多停留在表面,在重大事项决策、执行监督、效果评估等关键流程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导致整体效能难以得到充分释放。

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的组织架构及运作方式,还没有完全符合社会结构深刻的转型,出现了“覆盖面不够”和“功能减弱”的状况。城镇化推进步伐加快,商品房小区,商务楼宇,产业园区等新式居住空间持续不断产生。平台经济兴起,造就了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众多的流动就业人群,而且还带来了多种网络社交平台和虚拟社区,传统以单位或者户籍为依托的老式党建管理模式,在处理这些新兴领域群体时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三) 能力短板:基层干部队伍的素养与数字赋能挑战

党建引领高效能治理,最终要靠人来实现,尤其依赖于基层干部队伍(包括党务工作者和基层行政干部)的能力素养。当前,能力短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法治化与专业化治理能力需提升。基层组织是社会治理的关键主体,面对各种利益交织和矛盾冲突的时候,一定要按照法律的要求来进行处理,部分干部在运用法治理念解决复杂难题的时候会有局限性,倾向于用行政命令或者强制手段来解决问题。有时候因为程序方面存在缺陷而引发新的社会矛盾,特别是在物业管控,环境监管,社区规划这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事务当中,工作人员的知识体系和技术能力存在不足,难以很好地履行引领和推动的责任。

二是数字化转型中存在诸多现实障碍。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基层治理平台建设,推动基层治理平台向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方向发展”,各地也相继开发并推广智慧社区平台、政务移动终端应用,当前实践存在“重建设、轻运营”的倾向。部分老年群体数字操作能力不足,使“数字鸿沟”进一步加深。跨部门数据整合难度较大,造成部门间形成系统信息壁垒,即“数据孤岛”,阻碍大数据分析指导下党建指导策略的优化与实际成效的提升。“数字赋能”在基层治理领域处于摸索阶段,其潜力亟待进一步发掘,部分发达地区已经开始尝试通过

大数据技术开展社会风险预警,通过智能化的方式简化服务流程,但是其整体的实践成果十分有限,且受到诸多限制,“数据驱动”的理念尚未完全融入日常工作体系,尤其在党群关系线上互动方面更加明显,社区工作者对新出现的各种信息技术的实际操作水平普遍较低,数据分析工具的应用能力也比较有限,仅有少数地区比例超过20%。

三、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机制创新

要冲破现有的发展瓶颈,就要依照四中全会精神,展开全方位,系统性的体制机制革新,关键是要推动党建引领模式从“物理叠加”向“化学反应”这一深层次转变,并创建起“政治势能—数字赋能—组织动能”这三个要素协同的治理体系,以此达成治理效能的最大化。

(一) 制度创新:构建“双向嵌入”的权责协同与资源下沉机制

解决权力和责任失衡的关键在于制度设计上促进党的组织体系与基层治理体系实现“双向嵌入”和深度融合,治理资源向基层实体性转移。

首先,深化“党建引领下的治理共同体”制度建构。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制的推广和完善,不是简单地多几个兼职委员,而是要赋予其实质性的议事协调权和资源调配建议权。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对街道辖区内的重大事项、重大工程、重大矛盾进行共议共商,决议后由各成员单位(政府部门派出机构、驻区单位、社会组织等)根据职责落实,党组织进行跟踪督办。党组织由行政事务的“执行末端”变为区域治理的“协调中枢”。

其次,建立“清单化”权责划分模式,建立“赋能型”资源倾斜机制。上级党委和政府应共同制定并不断调整完善《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清单》,明确基层组织的责任、辅助性事务以及上收的行政职能,从根本上减轻基层负担。在权力下放或责任转移时,要同时配套相关资源投入(如财政支持、人力资源和技术保障,同时给予基层一定的统筹协调权和相关绩效评估参与权利,使政策实施效果得到质的提升。例如,成都等地探索的“社区保障资金”制度,由区级财政直接向社区拨付一定额度的资金,社区党组织牵头,通过民主议定程序决定资金使用项目,有效增强了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和整合资源的能力。

(二) 工具创新:建设智慧党建平台驱动治理流程再造

数字技术的应用水平是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驱动力,党建工作数字化转型已成必然,“智慧党建+基层治理”一体化平台随之应运而生,并要围绕“集约化、智能化”目标展开设计与优化,“数据共享”、“业务协同”、“智能分析决策”是该平台的核心功能定位与发展重心,“流程再造”实现整体提升也成为打造高效能治理体系的重要抓手。

一是应该重视跨部门协同的数据整合,依靠党员信息系统,政务服务网络平台以及综治网格管理模块等多种数据资源,在保证信息安全的情况下形成基层治理主题数据库。这给党组织全方位把握区域发展情况,精准判断潜在风险并制定精准服务方案赋予了可靠依据。

二是要开发贴合基层实际的应用场景。例如,开发“党员线上报到与任务认领”模块,引导在职党员根据自身特长在居住地社区参与治理服务;开发“民情直通车”模块,群众可通过APP随手拍、随时报,信息直达网格党员和社区党组织,并形成“上报—分流—处置—反馈—评价”的闭环管理;开发“重点人群智能关爱”模块,通过物联网设备(如智能水表、门磁)与数据分析,对独居老人等群体实现异常情况自动预警、党员志愿者及时上门。

上海市搭建的“一网统管”市域治理平台,渐渐做到了同党建系统的数据互通有无,管理者经由这个系统,可以即时得到网格区域之内党员的分布情况,活动轨迹(在保障隐私安全的前提下,以及各自承担的任务,并且在遇到突发状况或者难处理的事务的时候,迅速调集附近区域的党员人员前往现场开展工作,这种党建带动下的应急管理体系表现得淋漓尽致,“平急结合”的高效运作模式增强了基层的治理效果。

(三) 主体创新:培育“红色枢纽”型组织与激发党员先锋动能

高效的治理需要充满活力的多元主体。党建引领的作用在于孵化、引领和整合各类治理主体,形成“一核多元、协同共治”的生动局面。

一方面,要着力培育形成以“红色枢纽”为特点的社会组织体系与自治平台。基层党组织不可过多涉及具体事

务,主要扶持,引领社区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以及物业公司的规范化发展。在这些组织内部植入党建要素,经由在符合条件的业委会中设置党务工作组,推荐优秀党员参与竞聘,社区党委带头组建公益服务型或者功能性社团,诸如养老互助社,创建兼具服务功能与精神引领作用的“红色阵地”。对于快递物流、网约车等新就业群体,可通过建立流动党员党支部、设立“小哥驿站”并嵌入党建服务功能等方式,将其逐步纳入基层治理网络,使之成为社区治理的“流动哨兵”和“前哨探头”。

另一方面,要想激活党员主体功能,就要打造“内生先锋动力”的革新机制。打破传统岗位职责和承诺践诺的老套模式,就得探寻更具针对性的激发途径。基层治理可以把“积分制”这样的管理方法作为关键手段,把党员在社区的服务贡献变成具体数值,并纳入绩效评定体系予以考量。对于复杂的治理问题,则可以成立以党员干部为主体的专门小组或者智囊团,经由数字化平台发布定制任务清单,微心愿项目等,促使党员主动去对接群众需求,保证其先进性在基层实际中得到充分发挥并不断改善。

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前景展望

基于新时代发展脉络,以全会精神为指引,党建引领下的基层治理正朝着系统化深化和效能提升的新阶段迈进。

(一) 治理范式转型:从“管理主导”到“价值引领与制度整合并重”

未来党建工作的发展动向将会逐步走出传统微观事务管理的层面,重点在于“元治理”职能的有效实施。在这个过程中,党组织的任务是做基层社会的“治理体系设计者”和“规则秩序守护者”,并且会采用“塑造价值共识”、“完善制度体系”、“规范主体行为”和“维持公平正义”等方式达成目标。其特点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强化价值引领,塑造基层公共精神。党组织将更加注重通过宣传教育、文化熏陶、榜样示范等方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契约精神、责任意识和共同体观念,为基层治理凝聚最深层的价值共识,化解因价值观差异导致的治理冲突。

二是深化制度整合,形成系统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民主协商机制,公众参与途径,监督网络等关键因素以推动党建工作程式化,流程化发展。并为各类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健全而明确的支撑,以契合四中全会“共建共治共享”的根本目标。

(二) 技术深度融合:智慧党建驱动治理形态系统性重塑

数字技术将与党建引领产生更深层次的“化学反应”,驱动基层治理形态发生系统性重塑。

一是预测性治理能力显著增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加上大数据分析手段,智慧党建平台能够做到对社会舆情动态,潜在风险因素以及安全隐患的即时监测,并且给予精确的预报警告,促使治理体系从传统的被动应付模式转变为主动预防和预先控制,基层党组织就能事先安排防控举措,在问题刚冒头的时候就实施干预并妥善处理。

二是治理场景无限延展与虚实融合。党组织自我工作的领域性边界不再局限于原先简单物理定义,逐渐向网上平台、社交媒体等领土渗透延展,并尝试用“数字化双生社区”技术仿真模拟分析基层社区实际运作状况以及相关政策执行结果等“线下效果”,为下游决策制定提供数据参考与改进思路。

三是个性化与精准化服务成为常态。通过对居民需求数据的有效挖掘分析,基层党组织整合各类资源,推出针对性更强的各类服务方案和相关民生保障措施。服务模式逐步从单向供给向双向互动转变,通过智能化手段提高各类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使群众的满意度和社会治理效能大幅度上升。

(三) 全球话语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模式贡献基层智慧

中国在党建引领下探索的基层高效能治理实践,正在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治理知识体系和实践方案,其全球意义日益凸显。

在全球治理危机频发的社会矛盾、公共服务能力衰退背景下,中国模式却蕴含着独特的“整合-共识”创新范式,它凭借坚强政治领导力,很好凝聚分散资源,协调多元利益诉求,制订系统化区域发展(战略)部署计划,维持社会稳定并促使其可持续发展。“共建共治共享”以党的建设为核心理念,为破解普遍存在于国际社会中的“集体行

动困境”，构建起十分具有本土化特色且富含价值的典范经验。

讲好中国基层治理的故事，阐释好“党建引领”背后的制度逻辑、文化基因和实践效能，有助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治理话语垄断，为丰富和发展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这不仅是学术研究的责任，更是增强“四个自信”，特别是“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 [EB/OL]. (2025-10-23)[2025-12-31]. 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2386/202511/content_7047415.html.
- [2] 翟文康,惠长虹. 功能型平台：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逻辑机理与创新路径 [J]. 中国行政管理, 2025, 41 (08): 108-118.
- [3] 佟亚洲. 数字智能驱动基层治理的三重悖论及其调适 [J]. 中州学刊, 2025, (08): 73-82.
- [4] 刘开君. 公众参与城市基层治理的发展趋势、实践困境与策略优化[J].南京社会科学,2025,(12):83-93.
- [5] 苏长好,刘颖艳.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困境与出路——评《基层治理现代化实践探索》[J].管理世界,2025,41(12):227.
- [6] 李娜. “三化联动”破解基层治理难题[J].党建,2025,(12):57-58.
- [7] 陈立中.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效果评价——基于 C 市的个案研究[J/OL].湖南社会科学,2025,(06):114-123.
- [8] 张龙,张新文. 统合治理：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与运作机制——基于川西 Z 村的个案观察[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5(06):88-99.
- [9] 曾盛聪,董沁昕. 激活“新”力量：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组织化的机制与路径[J].探索,2025,(06):74-88.
- [10] 毛一敬,刘建平. 党建引领村民自治的结构优化与效能提升研究——基于河南省新密市 S 村的调查[J].求实,2025,(06):15-25+107-108.
- [11] 程奎.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出场逻辑、功能任务、实践路径 [J]. 贵州社会科学, 2025, (07): 21-27.
- [12] 张婷,崔史歌. 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十四五”回顾与“十五五”展望[J].改革,2025,(10):42-55.
- [13] 高立伟. 党建引领“三新”群体参与基层韧性治理的协同机制研究[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5,(18):38-49.
- [14] 赵淑梅,陈问天.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求、挑战与路径[J].治理研究,2025,41(05):88-100+159.
- [15] 文宏,梁家婧.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何以共创公共价值？[J].行政论坛,2025,32(06):158-170.

Party Building as the Guide for High-Efficiency Grassroots Governance: Mechanism Innovation and Future Path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Zhou wei

Party School of Xinxiang Municipal Committee, Xinxiang, China

Abstract: A strong grassroots foundation ensures a strong nation, and stability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ensures the stability of the state; grassroots governance serves as the cornerston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ce again emphasized strengthen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rough Party building. This paper objectively analyzes the prominent bottlenecks currently faced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led by Party building, namely, imbalances in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rigid mechanisms, and capability deficiencie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is study proposes a tripartite mechanism innovation framework of "political momentum,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organizational vitality." This is achieved through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two-way embedding" to achieve power-responsibility synergy, the construction of a smart Party building platform to drive process reengineering, and the cultivation of "red hubs" to stimulate diverse participation in co-governance. Consequently, this facilitates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tangible coverage" of Party building leadership to "high-efficiency governance."

Keywords: Party building guidance;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Mechanism Innovation

抑郁症状对低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 主观收入水平的调节作用

张嘉伊^{1#}，周树彤^{2#}，李树芳³，陈一鸣⁴，贾紫阳⁵，王洋洋⁶，张明晓⁷，葛蒲⁸，白倩^{9,*}

(1. 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0, 2. 山东中医药大学卫生管理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55, 3.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山东 泰安 271000, 4. 河北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200, 5. 郑州大学护理与健康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6. 洛阳市中心医院, 河南 洛阳 471000, 7.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山东 潍坊, 262500, 8. 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 北京, 102400, 9.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 301617)

摘要：目的：检验主观收入水平在低龄老年人抑郁症状和主观幸福感中的调节作用。方法：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2年数据，筛选3666名60-74岁低龄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开展描述性统计、单因素分析与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探究主观幸福感的关联因素，采用Hayes的PROCESS程序检验主观收入水平在抑郁症状和主观幸福感关系之间的调节效应。结果：总样本中，抑郁症状对低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B=-0.148, P<0.001$)；主观收入水平的调节效应显著($B=0.052, P<0.001$)，中低主观收入水平群体中抑郁症状的负面影响更强($B=-0.164, P<0.001$)，高主观收入水平群体中该影响相对较弱($B=-0.112, P<0.001$)。结论：抑郁症状显著削弱低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主观收入水平在二者关系中发挥显著调节作用，高主观收入水平可缓冲抑郁症状的负面影响。应系统开展低龄老年人抑郁筛查与心理干预；通过提升社会保障质量，增强其主观收入感知。

关键词：低龄老年人；抑郁症状；主观幸福感；主观收入水平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402

1 引言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1]。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5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3.02%。低龄老年人作为老年群体中的“中坚力量”，身体机能相对完好，其生活质量与主观福祉不仅关系到个体晚年幸福，更对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影响^[2]。

主观幸福感作为反映老年群体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整合了个体对生活的认知评价与情感体验^[3]，其影响因素复杂多元。心理健康状况与经济状况作为两大核心维度，在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4,5]。抑郁症状作为老年群体最常见的心理障碍之一，其患病率在低龄老年群体中呈上升趋势^[6]。而主观收入水平作为个体对经济状况的主观感知与评价，涵盖了与参照群体的比较、经济安全感等心理层面的认知，更能反映经济资源对主观幸福感的实际影响^[7]。此外，资源补偿理论指出个体拥有的各类资源能够相互补偿，缓冲风险因素带来的

作者简介：张嘉伊(2006—)，女，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社会学；

周树彤(2002—)，女，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医药政策、健康管理与卫生经济；

李树芳(1990—)，女，本科，主管护师，研究方向为老年健康与慢性病管理；

陈一鸣(2002—)，男，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老年健康与慢性病管理；

贾紫阳(2002—)，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临床专科护理，骨科护理；

王洋洋(1989—)，女，本科，主管护师，研究方向为护理学；

张明晓(1997—)，女，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为中药分析，药物质量评价；

葛蒲(1997—)，男，博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健康管理；

白倩(1994—)，女，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卫生经济评估、老年人健康管理、医疗保障。

通讯作者：白倩

#表示共同第一作者，*表示通讯作者

负面影响^[8]。主观收入水平较高的老年人可通过获取更多健康服务等途径,缓解抑郁症状对主观幸福感的侵蚀。

当前研究多聚焦于抑郁症状与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关系,既未能充分揭示抑郁程度的连续变化对主观幸福感的梯度影响,也未补充主观收入水平调节效应的实证证据^[9-11]。鉴于此,本研究依托 CFPS 2022 年全国代表性数据,系统检验主观收入水平在抑郁症状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调节机制,为构建老年服务政策提供依据,助力推进积极老龄化战略实施。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2022 年调查数据。CFPS 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采用多阶段、分层、概率比例抽样方法,覆盖全国 25 个省(市、自治区),样本具有良好的全国代表性与可靠性^[12]。调查内容涵盖家庭人口学特征、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等多个维度,为研究低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支撑。

本研究的纳入标准为:(1)年龄在 60-74 岁之间;(2)核心变量(抑郁症状、主观收入水平、主观幸福感)与控制变量(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无缺失值。经筛选与清洗,最终得到 3666 个有效样本。

2.2 变量定义

2.2.1 因变量:主观幸福感

采用 CFPS 核心问卷中的主观幸福感条目测量,该条目为单题项连续变量,受访者根据自身主观感受评分,范围为 0-10 分,得分越高表示主观幸福感越强。

2.2.2 自变量:抑郁症状

采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简化版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8, CES-D 8) 测量受访者的抑郁症状程度,信效度良好^[13]。该量表共包含 8 个条目,涵盖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睡眠障碍等核心抑郁症状,采用李克特 4 级评分法:“几乎没有 (<1 天)”计 0 分、“有些时候 (1-2 天)”计 1 分、“经常有 (3-4 天)”计 2 分、“大多数时候有 (5-7 天)”计 3 分。其中,条目 D “我感到愉快”和条目 F “我生活快乐”为反向计分条目,将所有条目得分相加得到抑郁总分,总分范围为 0-24 分,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症状越严重。本研究将抑郁总分作为连续变量纳入分析,以更精准地揭示抑郁程度对主观幸福感的梯度影响。本研究采用的 8 条目 CES-D 8 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71,对于条目数较少的简版量表而言,该结果表明其在本研究样本中具备理想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2.2.3 调节变量:主观收入水平

采用 CFPS 问卷中的单一条目测量:“您觉得您家的收入水平在当地处于什么位置?”,选项分为 5 级:1=远低于平均、2=低于平均、3=平均水平、4=高于平均、5=远高于平均。为便于分析调节效应,将其重编码为二变量:中低主观收入水平 (1-3 分) 与高主观收入水平 (4-5 分)。

2.2.4 控制变量

一般特征:性别 (1=男性, 0=女性)、年龄 (连续变量,单位:岁)、教育程度 (0=文盲/半文盲, 1=小学, 2=初中, 3=高中/中专/技校/职高, 4=大专及以上);城乡属性 (1=城镇, 0=农村)。

健康特征:自评健康状况 (0=不健康, 1=一般, 2=比较健康, 3=很健康, 4=非常健康)、有无慢病 (1=有, 0=无)。

2.3 统计分析方法

使用 SPSS 26.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频数、百分比描述分类变量的分布特征,采用均数 $\pm$ 标准差描述连续变量的集中趋势与离散程度。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方差分析比较分类变量在主观幸福感上的差异。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检验连续变量（如年龄、抑郁总分）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通过多重线性回归分析低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联因素。采用 Hayes 的 PROCESS 程序检验主观收入水平的调节效应，并对调节效应进行简单斜率分析。通过共线性检验（方差膨胀因子 VIF）判断模型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用德宾-沃森（D-W）统计量检验模型残差的自相关性。所有统计检验均为双侧检验，检验水准 $\alpha=0.05$ 。

3 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

共纳入 3666 名低龄老年人，其中农村样本 1873 人，占 51.09%；城镇样本 1793 人，占 48.91%。性别分布中男性 1915 人，占 52.24%；女性 1751 人，占 47.76%。年龄均值为 66.400 岁，中位数为 66.000 岁。教育程度以文盲/半文盲（32.95%）和初中（26.05%）为主，大专及以上学历教育程度仅占 3.25%。自评健康状况以比较健康为主（39.80%），不健康者占 24.69%；慢病患者 1125 人，占 30.69%。

抑郁总分均值为 5.804 ± 4.483 ，25.18% 的受访者处于抑郁状态（总分 ≥ 9 分）；主观幸福感均值为 7.624 ± 2.174 ，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主观收入水平方面中低自评为主，占 68.74%，详见表 1 和表 2。

表 1 连续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类别/赋值	均数 $\pm$ 标准差
主观幸福感	连续变量（0-10 分）	7.624 ± 2.174
抑郁总分	连续变量（0-24 分）	5.804 ± 4.483
年龄	连续变量（岁）	66.400 ± 4.105

3.2 老年人抑郁症状与主观收入水平对其主观幸福感影响

3.2.1 各变量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常住地、慢病患病状况、抑郁状态、自评健康状况和主观收入水平的低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得分有统计学差异（ $P < 0.05$ ），详见表 2。

表 2 受访者一般情况及不同特征受访者主观幸福感单因素分析

变量	类别	n (%)	主观幸福感 (Mean $\pm$ SD)	t/F	P 值
性别	男性	1915 (52.24%)	7.681 ± 2.094	1.681	0.093
	女性	1751 (47.76%)	7.560 ± 2.258		
常住地	城镇	1793 (48.91%)	7.742 ± 2.029	3.234	0.001
	农村	1873 (51.09%)	7.510 ± 2.299		
有无慢病	是	1125 (30.69%)	7.429 ± 2.235	-3.546	<0.001
	否	2541 (69.31%)	7.710 ± 2.141		
是否抑郁状态	是	923 (25.18%)	6.582 ± 2.498	-15.451	<0.001
	否	2743 (74.82%)	7.974 ± 1.932		
教育程度	文盲/半文盲	1208 (32.95%)	7.546 ± 2.413	0.849	0.494
	小学	772 (21.06%)	7.610 ± 2.129		
	初中	955 (26.05%)	7.716 ± 2.067		
	高中/中专/技校/职高	612 (16.69%)	7.645 ± 1.960		
	大专及以上学历	119 (3.25%)	7.647 ± 1.754		
自评健康状况	不健康	905 (24.69%)	6.935 ± 2.408	52.219	<0.001
	一般	500 (13.64%)	7.432 ± 2.046		
	比较健康	1459 (39.80%)	7.705 ± 2.025		
	很健康	393 (10.72%)	8.178 ± 1.941		

主观收入水平	非常健康	409 (11.16%)	8.557 ± 1.981	-13.252	<0.001
	低自评	2520 (68.74%)	7.315 ± 2.157		
	高自评	1146 (31.26%)	8.301 ± 2.055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抑郁总分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 ($r=-0.344$, $P<0.001$), 即抑郁症状越严重, 主观幸福感越低, 详见表 3。

表 3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

	年龄	抑郁总分	主观幸福感
年龄	1		
抑郁总分	-0.029	1	
主观幸福感	0.054**	-0.344***	1

注: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表示 $P<0.001$ 。

3.2.2 多重线性回归结果

如表 4 所示, 抑郁总分对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向影响 ($B=-0.148$, $P<0.001$), 即抑郁症状越严重, 主观幸福感越低; 主观收入水平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B=0.825$, $P<0.001$); 年龄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 ($B=0.020$, $P=0.013$); 自评健康状况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效应 ($B=0.223$, $P<0.001$), 值得注意的是, 慢病对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正向影响 ($B=0.236$, $P=0.002$), 具体机制见讨论。总样本线性回归模型整体显著, $F(8, 3657)=94.368$, $P<0.001$, 说明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Durbin-Watson 值为 1.859, 接近 2, 提示残差序列独立性良好, 无明显自相关问题; 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 (VIF) 均小于 1.3, 远低于 10 的临界值, 表明自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4 多重线性回归结果

变量	B	标准误	β	t	P	VIF
抑郁总分	-0.148	0.008	-0.305	-18.662	<0.001	1.181
年龄	0.020	0.008	0.039	2.472	0.013	1.082
教育程度	-0.023	0.031	-0.013	-0.760	0.447	1.243
自评健康状况	0.223	0.029	0.130	7.695	<0.001	1.250
性别 (参照组: 女性)	-0.127	0.069	-0.029	-1.851	0.064	1.103
常住地 (参照组: 农村)	0.106	0.069	0.024	1.544	0.123	1.102
有无慢病 (参照组: 无)	0.236	0.076	0.050	3.108	0.002	1.146
主观收入水平 (参照组: 中低主观收入水平)	0.825	0.072	0.176	11.414	<0.001	1.047

注: B 为非标准化系数, β 为标准系数, VIF 为方差膨胀因子。

3.3 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纳入抑郁总分与主观收入水平的交互项, 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 ($B=0.052$, $P=0.001$), 说明主观收入水平的调节效应显著。此时, 抑郁总分的主效应仍显著为负 ($B=-0.164$, $P<0.001$), 主观收入水平的主效应显著为正 ($B=0.835$, $P<0.001$)。

表 5 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N=3666)

变量	B	标准误	t	P	95%CI
抑郁总分	-0.164	0.009	-17.641	<0.001	[-0.182, -0.146]
主观收入水平 (参照组: 中低主观收入水平)	0.835	0.072	11.567	<0.001	[0.694, 0.977]
抑郁总分*主观收入水平	0.052	0.016	3.273	0.001	[0.021, 0.083]

简单斜率分析结果显示, 中低主观收入水平群体中, 抑郁总分每增加 1 分, 主观幸福感下降 0.164 分 ($B=-0.164$, $P<0.001$, 95%CI: -0.182~-0.146); 高主观收入水平群体中, 抑郁总分每增加 1 分, 主观幸福感下降 0.112 分 ($B=-0.112$,

$P<0.001$, 95%CI: -0.139~-0.086), 表明高主观收入水平显著缓冲了抑郁症状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 详见表6和图1。

表6 简单斜率分析结果

调节变量 (主观收入水平)	<i>B</i>	标准误	<i>t</i>	<i>P</i>	95%CI
中低水平	-0.164	0.010	-17.641	<0.001	[-0.182, -0.146]
高水平	-0.112	0.014	-8.307	<0.001	[-0.139, -0.0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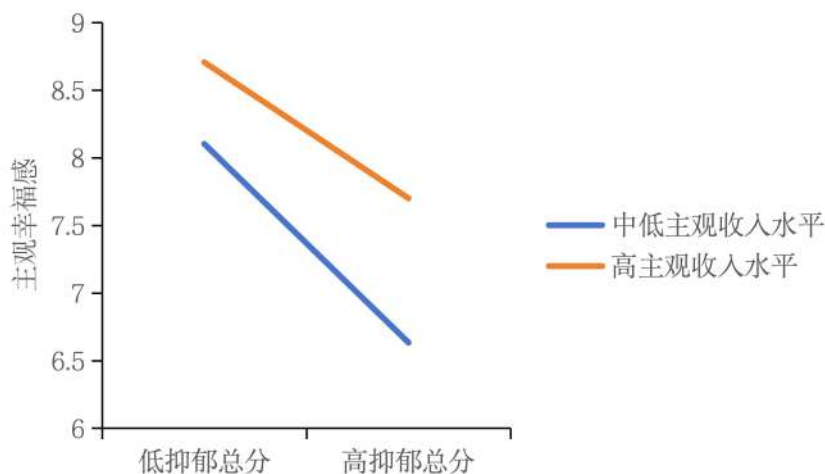


图1 低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抑郁症状的简单斜率分析图

4 讨论

4.1 低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联因素分析

多重线性回归结果表明, 年龄和自评健康状况均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 个体情绪调节与共情能力不断成熟, 有能力应对各类负性事件, 进而提升主观幸福感水平^[14]。此外, 本研究发现自评健康状况越好, 主观幸福感越强, 与张嘉琪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15], 进一步证实良好的健康状况是提升低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支撑。

本研究还发现,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中, 患慢病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单因素分析显示其总效应为负向, 这表明慢病可能主要通过降低自评健康间接损害幸福感, 与隋欣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16]。控制自评健康等因素后, 其直接效应转为正向, 这可能是由于慢性病患者常伴随更多医疗关注与社会支持, 从而提升了主观幸福感。

4.2 抑郁症状对低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主效应

抑郁症状对低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表明抑郁症状的出现会直接侵蚀老年人的积极心理体验, 降低其主观幸福感水平, 这与既往研究结论一致^[17]。同时本研究将抑郁症状作为连续变量纳入分析, 进一步发现这种影响呈现明显的梯度特征, 即 CES-D 8 量表总分每增加 1 分, 主观幸福感显著下降 0.148 分, 更精准地揭示了“抑郁程度越高, 幸福感越低”的线性关系, 说明即使是亚健康水平的抑郁症状也会损害低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这提示在基层老年健康管理中, 不应仅仅关注达到临床诊断标准的重度抑郁患者, 对于处于亚临床或轻度情绪低落状态的低龄老年人, 早期心理干预同样可产生显著效益。

低龄老年人虽身体机能相对较好, 但仍面临退休适应、角色转变、慢病困扰等多重压力, 这些压力因素与抑郁症状相互叠加, 进一步加剧了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从心理机制来看, 首先, 抑郁症状会引发持续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等负面情绪体验, 直接降低个体对生活的积极评价。其次, 抑郁会损害认知功能, 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思维迟缓, 影响个体对生活事件的认知加工, 使其更易产生负性认知偏差^[18]。此外, 社会参与是提升老年

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抑郁症状会减少社会参与行为, 导致社交隔离, 使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进一步降低^[19]。

4.3 主观收入水平的调节效应

研究证实, 主观收入水平在低龄老年人抑郁症状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显著调节作用。在中低主观收入水平群体中, 抑郁症状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更强, 而在高主观收入水平群体中该影响较弱, 说明较高的主观收入水平能够缓冲抑郁症状的冲击。该结论与资源补偿理论观点相一致^[20], 即个体在衰老过程中会面临内生性资源的持续损耗 (如抑郁), 而可自主支配的外源性资源 (如收入) 可通过补偿性策略, 缓冲资源流失带来的负向影响, 维持个体福祉水平的稳定。

这一调节效应的内在机制, 可分为经济安全感与社会资源两个核心层面。一方面, 较高的主观收入水平意味着更强的经济安全感, 老年人无需过度担忧医疗、养老等经济支出, 从而减少心理压力, 缓解抑郁症状带来的负面情绪^[21]。另一方面, 主观收入水平较高的老年人更有能力参与社交活动、文化娱乐等, 丰富的社会参与能够提升自我价值感, 分散对负面情绪的注意力, 进而缓冲抑郁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22]。

4.4 研究的优势、局限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的优势如下: 基于 CFPS 全国代表性数据, 采用主观收入水平反映个体对经济状况的主观评价, 而非客观收入绝对值, 包含了与参照群体的比较、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期等心理层面的因素, 更能体现经济资源对心理健康的实际影响。此外, 将抑郁症状作为连续变量纳入分析, 可以更好地揭示抑郁程度对幸福感的梯度影响。

本研究的局限性如下: 采用横断面数据, 无法推断因果关系; 主观幸福感、主观收入水平依赖单一题项测量, 可能存在测量误差; 未考虑社会支持、早期生活经历等变量, 可能遗漏重要关联因素。

未来可考虑采用纵向研究设计, 探究抑郁症状、主观收入水平与幸福感的长期动态关系; 并结合客观收入水平与主观收入水平, 分析二者交互作用; 同时纳入社会支持、早期生活经历等变量, 构建更全面的影响机制模型。

5 结论

抑郁症状对低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主观收入水平在抑郁症状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 较高的主观收入感知能够有效缓冲抑郁症状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应系统开展低龄老年人抑郁筛查与心理干预; 注重提升自评健康感知与健全社会支持网络; 还可通过提升社会保障质量, 增强其主观收入感知。

参考文献:

- [1] 刘慧君, 吴鹏. 中国经济发展、人口老龄化与健康老龄化服务的耦合协调性 [J]. 地理科学, 2025, 45(02): 278-289.
- [2] 衡元元. 上有老、下有小: “夹心层”低龄老年人代际挤压困境的形成及治理 [J]. 社会保障研究, 2025, (06): 72-86.
- [3] ORTEGA-GIL M, GARCIA A, ELHICHOU-AHMED C. The Effect of Ageing, Gender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J]. Land, 2021, 10(12).
- [4] 唐莉, 米拉依, 胡莹, 等. 老年人乐观人格与抑郁、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22, 42(05): 1195-1197.
- [5] 董芳, 郑晓, 肖淑娟, 等. 山西省不同慢性病患者状况下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分析 [J]. 医学与社会, 2022, 35(11): 88-94.
- [6] 徐金燕, 曹秀清. 老年人认知衰退与抑郁的动态关系及社会参与的调节作用 [J]. 中国人口科学, 2025, 39(02): 29-44.
- [7] 李实, 张尉. 收入水平、不平等感知与主观福祉 [J]. 北京社会科学, 2023, (12): 106-121.
- [8] 王永丽, 卢海陵, 杨娜, 等. 基于资源分配观和补偿理论的组织公平感研究 [J]. 管理学报, 2018, 15(06): 837-846.
- [9] 张杰, 张静平, 李树雯, 等. 空巢老人心理弹性与焦虑抑郁情绪、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 [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6, 36(16): 4083-4085.
- [10] 车晓萍, 宋旭红, 李丽萍, 等.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抑郁、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20, 40(03): 656-658.
- [11] 刘叶, 高广峰, 周亦凡, 等. 老年人群中视听障碍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抑郁倾向的中介作用 [J]. 复旦学报

(医学版), 2024, 51(04): 558–565.

[12] 谢宇, 胡婧炜, 张春泥.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理念与实践 [J]. 社会, 2014, 34(02): 1–32.

[13] O'HALLORAN A, KENNY R, KING-KALLIMANIS B. The latent factors of depression from the short forms of the CES-D are consistent, reliable and valid in community-living older adults [J]. *European Geriatric Medicine*, 2014, 5(2): 97–102.

[14] CHEN Y, PENG Y, FANG P. Emotional Intelligence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J]. *Int J Aging Hum Dev*, 2016, 83(2): 91–107.

[15] 张嘉琪, 刘钰曦, 区翠红, 等. 慢性病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J]. 中国健康教育, 2025, 41(07): 625–632.

[16] 隋欣, 王文超, 宫云娜, 等.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和抑郁在慢性病共病对空巢老人自评健康的链式中介效应 [J]. 现代预防医学, 2026, 53(01): 142–147.

[17] 何南芙, 李冉然, 陈怡冰, 等.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24, 44(21): 5347–5351.

[18] 孙超凡, 安川, 令国兴, 等. 中国老年人不同健康状况轨迹与认知障碍风险的关联: 一项纵向队列研究 [J]. 中华疾病控制杂志, 2025, 29(10): 1162–1170.

[19] 张冲, 梁晓林. 健康状况在社会参与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作用分析 [J]. 医学与社会, 2023, 36(05): 91–96.

[20] BALTES P B, BALTES M M. *Successful Aging: Perspectives from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34.

[21] 李燕, 刘坤, 孙晓杰. 山东省 3 县农村老年人与收入相关的健康不平等状况及影响因素 [J]. 山东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6, 54(06): 91–96.

[22] 朱亚鑫, 吴炜, 张怀文, 等. 老年人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 [J]. 中国卫生统计, 2022, 39(05): 699–701+706.

The Impac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Young-Old Adult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ubjective Income Level

Zhang jiayi¹, Zhou shutong², Li shufang³, Chen Yiming⁴, Jia ziyang⁵, Wang yangyang⁶, Zhang mingxiao⁷, Ge pu⁸, Bai qian⁹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China; 2 School of Health Manage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China; 3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ndong First Medical University, Taian, China; 4 Department of Nursing, Hebe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Shijiazhuang, China; 5 School of Nursing and Health,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China; 6 Luoyang Central Hospital, Luoyang, China; 7 Weifang Nursing Vocational College, Weifang, China; 8 School of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China; 9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ubjective income level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young-old adults. METHODS: Based on the 2022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3,666 young-old adults aged 60–74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ampl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univariate analysis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were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associated factor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Hayes' PROCESS macro was used to test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ubjective income level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RESULTS: In the total sample, depressive symptoms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young-old adults ($B=-0.148$, $P<0.001$).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ubjective income level was significant ($B=0.052$, $P<0.001$). The negative impac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was stronger in the low-to-medium subjective income group ($B=-0.164$, $P<0.001$) and relatively weaker in the high subjective income group ($B=-0.112$, $P<0.001$). CONCLUSION: Depressive symptoms significantly impair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young-old adults, and subjective income level plays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role in this relationship. A high level of subjective income can buffer the adverse effec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Systematic depression screening an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should be carried out for young-old adults. Meanwhile, the quality of social security should be improved to enhance their subjective income perception.

Keywords: Young-old adults; Depression symptoms; Subjective well-being; Subjective income level

医务社会工作的伦理困境

方玲玲¹ 高静¹

(1.广西科技大学, 广西 柳州 545006)

摘要:医务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工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关键实践形式,不仅致力于回应患者及其家庭在疾病过程中遭遇的社会、心理与资源需求,也着眼于推动医疗服务走向更具人文关怀与综合效能的方向。但在具体服务过程中,医务社会工作者常常需要应对来自知情权、案主自主决定权、隐私保密、资源调配等多个方面的伦理难题。这些困境的成因并不只是个体层面的判断偏差,更多是医疗体系的运行逻辑、专业价值的内部冲突、以家庭为单位的决策习惯以及本土文化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在厘清医务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生成缘由的前提下,采用综合案例研究的方法,运用Reamer的伦理决策框架与ETHIC模型,剖析医务社会工作者在临终关怀场景下所经历的真实决策过程,着重展现他们在“患者知情—家庭保护—医疗判断”这三重张力中所体验到的情感波动、价值考量与行动策略。文章指出,中国医务社会工作所面临的伦理困境带有突出的本土特质,其关键并非“患者自主”与“家庭代理”之间简单的二元对立,而在于如何依托关系网络,借助渐进式沟通、对意愿的持续探询以及多方的协商互动,最终在实践层面完成向“关系自主性”的转化。据此,本文提出一系列制度性建议,包括建立医院社会工作者伦理决策清单、健全“社工—医护—家属”三方参与的伦理沟通机制、加强督导与记录制度建设,以及推进本土化伦理规范的构建,期望为我国医务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与伦理治理提供相应借鉴。

关键词:医务社会工作; 伦理困境; 关系自主; 本土化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410

引言

医务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专业嵌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形式,主要指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知识、价值理念与方法,协助患者及其家庭应对疾病相关的社会、经济、家庭、心理与适应性问题,以提升医疗服务效果并促进康复^[1]。随着我国医疗服务从“疾病治疗”向“整体照护”转型,医务社会工作在医院中的功能日益凸显,尤其在肿瘤、慢病管理、器官移植、儿科重症与安宁疗护等领域,其专业价值愈发明显^[2]。

但与专业发展并行的是伦理困境的持续加深。一方面,医院制度强调效率、风险控制与诊疗服从;另一方面,社会工作强调自决、尊重、赋权与关系支持,两种逻辑在医疗现场经常发生碰撞^[3]。近年的相关研究显示,医务社会工作者面临的伦理难题已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保密、资源分配或双重关系,更包括组织等级结构下的道德压力、跨专业协作中的价值边缘化,以及家属代理决策与患者真实意愿之间的张力。

现有研究虽然已对医务社会工作伦理困境进行了较多讨论,但仍存在三方面不足:其一,实证材料偏少,较多研究停留在原则性概述层面;其二,对伦理困境的分析多采用一般伦理原则,较少借助具体伦理决策模型展开过程性分析;其三,对“本土化”的论述多停留于“中西差异”层面的宏观描述,尚缺乏对“家本位”伦理具体运作机制的深入讨论。基于此,本文尝试在原有讨论基础上进行深化,通过综合案例与理论模型分析,进一步揭示医务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生成逻辑与制度出路。

一、现阶段我国医务社会工作伦理困境产生的原因

(一) 价值观的多元性

作者简介:方玲玲(2001-),女,硕士,研究方向为医务社会工作;

高静(1982-),女,博士,研究方向为民俗学。

致谢:感谢导师的指导

医务社会工作的服务流程往往需要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其中包括医务社会工作者、专业医护人员、临终患儿及其家属以及医院行政人员等。由于各主体所秉持的价值观存在差异,在复杂的实务场域中常引发冲突与摩擦。例如,这些冲突可能体现为医务社工与服务对象之间的价值观差异、医务社会工作理念与现代医疗体系价值观的不协调,以及医务社会工作专业伦理与从业者个人价值观之间的张力等。价值观作为个人对周遭人事物的认知、评价与行动取向的系统,深受其成长环境、社会文化背景及身心发展条件的影响,因而呈现出多元的形态。正是这种价值观的多样性,使得在多方协作的服务过程中,不同立场与理念的碰撞成为常见的实践挑战。价值观的多元性进而导致行为主体的利益和需求的多样性,两难的伦理困境相伴而生。

(二) 西方与我国的环境背景差异

社会工作专业起源于西方社会,其价值观与核心理念植根于西方文化中的人本主义、平等互助及公平公正思想,强调对个体生命、尊严、价值与独特性的尊重,并将个人自我实现与权益置于重要位置。相比之下,中国社会深受人情文化与集体主义传统的影响,注重家庭责任与社会义务,个体常常被置于家庭与集体关系网络中,民主参与意识相对较弱。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使得源自西方的社会工作理念,如平等服务与案主自决原则,在我国实践中可能遭遇一定的张力:部分公众对陌生专业服务存在疑虑甚至抵触,可能将接受帮助视为“被动接受帮助”,同时个体自主决策的意愿与能力也往往受关系网络与集体取向的制约,从而在客观上增加了医务社会工作推行的难度^[4]。

(三) 伦理依据的多元性

面对不同的主体,医务社会工作的在实践中的伦理依据并不是一层不变的。例如,儿童临终关怀社会工作的伦理依据主要来源于两个层面:社会工作专业伦理体系与临终关怀服务伦理体系。在社会工作专业伦理体系框架内,一项核心的伦理守则是医务社会工作者应致力于协助案主发掘自身潜能、应对困境,并促进其社会功能的恢复与维护,而在临终关怀服务伦理体系中,服务目标主要是给予患者爱与关怀,提高人生最后一段生命的幸福感。在儿童临终关怀服务中,社会工作伦理体系体现出明显的“赋能”导向,致力于激发个体内在力量与自主性;而临终关怀伦理体系则更侧重于对患者的全面“关怀”,强调在生命末期给予身心社灵的照护与安抚^[5]。两种伦理取向的差异要求医务社工必须具备更高的角色整合能力。然而,恰当地履行每一种角色职能,往往给医务社会工作者带来显著的压力与挑战,这也成为伦理困境产生的重要根源。

(四) 现阶段中国医务社会工作制度的缺失

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的医务社会工作仍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尚未建立起系统完善的职业伦理规范及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章制度。因此,在面对资源有限性、分配公平性、医学技术的适用条件与实施程序等现实问题时,医务社会工作领域缺乏明确的行为指引,容易在实务中引发伦理冲突与专业挑战^[6]。

二、医务社会工作在实践中的伦理困境

(一) 知情权引发的伦理困境

在临终关怀情境中,社工常面临伦理困境:一方面,患者依法享有知情同意权,有权获知病情现状、治疗方案及费用等信息,以便做出自主判断;另一方面,家属出于保护心理,可能要求隐瞒病情以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这种矛盾构成了落实患者知情权的现实阻力。但是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人们往往重视生的意义和价值,对死亡采取回避和否定的态度。这就导致部分服务对象以及他们的家人抵触死亡,产生逃避死亡和害怕死亡的心理。就目前而言,住院患者无权得到医院提供的详细的疾病诊断、治疗和预后的资料,只能在出院的时候得到摘要性、总结性的病历而非完整的病历,以避免可能会出现医疗失误,避免造成紧张的医患关系。在面对重大疾病时,案主家属往往出于保护目的,要求医务社会工作者对患者隐瞒真实病情,以避免其因知情而丧失治疗信心或产生更大心理负担^[7]。尽管此类请求多出于善意,却可能忽略案主自身对病情的知情意愿与自主决定权。医务社会工作者在此情境下面临双重责任:医务社会工作者在履行专业职责时,需要平衡双重任务:一方面需协助医疗机构提供全面且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与信息,另一方面也必须尊重并维护患者在医疗过程中的参与权及对自身病情

的知情权。这两种责任之间存在的张力，常常导致医务社会工作者陷入伦理层面的两难抉择。

（二）由“患者自主决定”引发的伦理困境

“患者自主决定”是医务社会工作遵循的基本伦理原则之一，主张在不侵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案主有权依据自身意愿做出选择并付诸行动。基于此，医务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应充分尊重患者的自主权，积极引导并支持其根据个人价值观与生活目标，自主决定行为方式与生活形态。然而，医务社会工作所强调的知情与自主原则，与医学领域中传统的专业价值观存在明显差异^[8]。在传统医疗模式下，医生往往依据专业判断为患者制定治疗方案，并期望患者予以服从与配合，患者在此过程中通常缺乏实质性的选择空间。当患者不接受医生建议的治疗方案时，医务社会工作者应如何采取协调策略，便成为一个需要谨慎处理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深受传统家庭观念影响，普遍认同个体应服从家庭整体利益，强调个人与家庭乃至宗族共同体的统一性。这种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伦理观念，赋予家庭在价值序列中的优先地位。

（三）保密与隐私权引发的伦理困境

保密原则要求医务社会工作者对案主的个人信息、疾病诊断、治疗内容等相关资料予以严格保密。这些信息均属于患者隐私权的核心范畴，而隐私权作为一项基本道德准则，其目的在于保障个体身心发展的自主与自由，体现了在尊重人的尊严与价值基础上对个体自律与自我决定的维护。保密原则是其专业伦理的核心要求，旨在维护案主的隐私权与尊严。然而在实务中，医务社工常因法律义务、安全考量或为避免对案主或他人造成重大伤害等特殊情況，无法实现绝对的保密。此时，他们需要在尊重案主隐私与履行法定或保护性职责之间进行审慎的伦理权衡。例如，艾滋病患者从感染到出现症状之间的潜伏期可长达数年甚至十几年，在此期间患者外表与常人无异，对公众健康产生巨大威胁。在某些情况下，为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与公共卫生安全，可能需要艾滋病患者在一定程度上让渡个人权利，例如适当公开诊断信息以配合必要的公共卫生应对。然而，此类信息的披露往往会使患者面临社会污名与歧视，对其心理状态与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尽管工作者已向患者说明信息仅用于指定用途且会严格保密，仍可能引发患者的疑虑与不配合，导致相关工作难以顺利推进。当患者未进入相关名单，却依然享受国家政策与医疗资源时，容易引发信息不对称，进一步加剧医患之间的不信任感。

（四）资源分配引发的伦理困境

在我国人口基数庞大的背景下，医疗卫生资源整体紧缺且分布不均，这使得医务社工在医疗实践中常常难以充分回应患者多元化的需求。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难题：如何将有限的资源进行公平而合理的分配。患者的需求多集中在经济困难、资源获取途径不足以及社会福利支持亟待增强等方面，这些都需要医务社工在资源受限的情况下作出权衡与应对。医院与医务社会工作者虽已竭尽全力，通过链接社会资源、拓宽资金渠道来援助患者，然而面对规模庞大、需求复杂的患者群体，这些努力依然显得力不从心。

三、基于伦理决策模型的案例分析

（一）一线医务社会工作者伦理决策的深度访谈案例

为更加真实地呈现医务社会工作者在伦理困境中的决策过程，本文在文献分析基础上，通过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对某三甲医院安宁疗护病区的一名医务社会工作者（化名L社工）进行了访谈，并结合其叙述整理形成以下案例。

L社工在访谈中回忆了一次令其印象深刻的个案。该案例发生在某肿瘤医院安宁疗护病区。患者张某，男性，69岁，肺癌晚期，已出现多处转移。主治医生判断患者生存期有限，建议停止积极化疗并转入舒缓治疗。然而患者家属坚持要求继续治疗，并要求医护人员及社会工作者不要向患者透露真实病情。

L社工在访谈中描述当时的情境：“家属很明确地跟我说：‘千万不要让他知道是晚期，他要是知道了就会绝望。’但患者其实已经多次私下问我：‘我是不是好不了了？是不是没多少时间了？’当时我真的很纠结。”在这一情境下，医务社会工作者面临典型的伦理冲突：一方面，社会工作专业伦理强调尊重案主知情权与自主决定权；另一方面，在中国家庭文化背景下，家属往往承担着重要的照护责任，其意见也具有重要影响。如果社会工作者

直接向患者说明病情，可能会破坏家庭关系并导致家属对医疗团队产生不信任。

L 社工进一步回忆了当时的心理过程：“我当时其实很紧张。一方面我觉得患者应该有权知道自己的情况，但另一方面我也能理解家属的担心。他们其实不是故意隐瞒，而是害怕老人承受不了。”在经过团队讨论和督导咨询后，L 社工并没有采取直接“告知”或完全“隐瞒”的方式，而是选择了一种渐进式沟通策略。首先，L 社工通过多次支持性访谈，与患者讨论其对疾病的理解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期待。在访谈过程中，患者逐渐表达出对自己病情的怀疑，并表示希望“心里有个准备”。在确认患者具有知情意愿后，L 社工与主治医师共同与家属进行了沟通，向家属解释患者已有一定心理准备，并强调让患者适度了解自身情况有助于其进行人生安排和情感表达。经过多次沟通，家属最终同意由医生在相对缓和的方式下向患者说明治疗效果有限，并介绍舒缓治疗的选择。在访谈最后，L 社工总结道：“这件事让我意识到，伦理困境其实很少是‘对’或‘错’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不同价值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我们既要保护患者的权利，也要理解家庭的情感和压力。”

从这一案例可以看出，在中国医疗文化情境中，医务社会工作者在处理伦理困境时往往需要在患者自主、家庭责任以及医疗团队意见之间进行复杂协调。通过渐进式沟通、家庭协商以及跨专业合作，社会工作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伦理冲突，并推动形成更加符合患者意愿的决策方案。

（二）ETHIC 模型的应用

ETHIC 模型强调五个步骤：审视个人与专业价值（Examine）、运用伦理标准（Think）、评估相关假设与情境（Hypothesize）、寻求督导与咨询（Identify）、比较后果并采取行动（Choose）。该模型长期被用于社会工作伦理教学与实践分析^[9]。

1.Examine：审视价值冲突

社工首先需要辨识自身可能存在的价值预设。若社工过度认同“知情越充分越好”，容易忽略中国家庭在疾病照护中的承载功能；若过度顺从家庭保护逻辑，又会牺牲患者主体性。因此，本案中冲突的并非抽象的“告知/不告知”，而是患者自主、家庭责任、医疗善意与关系稳定之间的多重价值碰撞。

2.Think：调用伦理规范与法律原则

从专业伦理看，尊重、自主、知情同意、诚实沟通和保护弱者都具有重要地位；从医疗伦理看，有利、不伤害与公正同样不可忽视^[7]。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患者知情与自决不能被简单取消，但其实现方式可以是渐进、情境化和关系化的，而非机械、一次性的“事实宣告”。

3.Hypothesize：评估情境与假设

社工对几种可能性作出判断：若继续隐瞒，患者可能在模糊不明中承受更强不安；若直接全盘告知，家属可能激烈抵触，患者也未必能在毫无铺垫下承受；若先评估患者的知情承受能力与表达意愿，再推动分阶段沟通，则更可能兼顾家庭接受度与患者主体性。近年的中国研究也表明，在家庭中心决策文化下，患者自主更适合通过渐进沟通、间接表达与关系协商来实现。

4.Identify：咨询督导与跨专业会商

社工随后与督导、护士长和主治医师进行小型会商，确认几个操作边界：第一，不对患者说谎；第二，不在家属情绪激烈时强行推进；第三，先由社工单独评估患者意愿表达，再决定是否进入家庭会谈；第四，整个过程形成简要记录。这一环节体现了伦理决策不应由社工个人孤立完成，而应借助督导与跨专业支持。

5.Choose：行动选择

最终，社工采取了“渐进式知情—家庭协商—共同决策”的路径：先通过支持性访谈探询患者是否希望了解真实病情；患者表达“我想知道个大概，也好心里有数”；社工将这一意愿反馈给家属，向其解释“探知患者意愿”并不等同于“残酷告知”；随后在医生参与下进行阶段性沟通，先讨论治疗效果与舒适照护目标，再逐步进入安宁护理选择。在这一方案中，社工并未把患者从家庭中抽离出来，而是以关系为载体推动患者意愿进入决策场域。

（三）Reamer 伦理决策思路的补充分析

Reamer 的伦理决策思路强调：识别相互冲突的伦理责任，梳理受影响群体，审查相关专业守则、法律与机

构政策,咨询同侪或督导,评估不同行动的短期与长期后果,并做好决策记录^[10]。相关社会工作伦理教育材料也持续强调,专业人员应能借助伦理决策模型、法律与规范进行系统判断,而非依赖个人直觉。用这一思路回看本案,可以看到:患者是直接受影响者,家属、医疗团队和机构也是重要利益相关方;若社工只维护家庭和谐,可能伤害患者主体性;若只强调患者自主,可能削弱家庭照护系统;最优路径并非“单一原则胜出”,而是寻找损害最小、关系可持续、患者意愿可进入决策的折中方案。这也说明,在中国医务社会工作中,伦理决策更接近“协调型判断”,而非“单原则裁决”。

四、“本土化”再阐释:从家本位到关系自主性

(一)“家本位”并非患者自主的简单对立面

既有讨论常把西方“个体自主”与中国“家庭决策”视为二元对立,但医学伦理研究指出,家庭参与型决策模式在东亚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家庭在中国医疗决策中既可能压制患者意愿,也可能是患者表达意愿的重要媒介。许多患者并不追求脱离家庭独立决策,而是希望在“不给家人添负担”的前提下保有尊严和选择空间。近年的研究提示,中国安宁疗护与预立照护计划实践中,患者的决定通常通过家庭关系、间接沟通和情感秩序展开,关系自主性因此比“原子化自主”更具解释力。

(二)关系自主性在医务社会工作中的实践含义

所谓关系自主性,并不意味着将决定权交给家属,而是承认人的决定总是在关系中生成。对医务社工而言,这意味着专业任务不只是“替患者发声”,更是创造条件,让患者可以在关系安全、信息适量和情绪可承受的情境中表达真实意愿。换言之,社工需要做的不是将患者从家庭关系中剥离,而是通过专业技术减少关系压制、提升关系支持。

(三)探知患者真实意愿的技术性路径

在本土医疗场景中,尊重家属代理决策与探知患者真实意愿并非不可兼容。社工可通过以下方式推进:第一,采用“意愿探询”而非“直接摊牌”的进入方式,如询问患者希望知道多少、由谁陪同讨论、最担心什么;第二,运用分阶段沟通,将“病情认知—照护目标—治疗取舍”拆分处理;第三,鼓励患者以偏好表达、价值排序、生活目标叙述等方式间接呈现意愿;第四,在家庭会谈中把“患者说过的话”转译为讨论依据,降低正面冲突;第五,对患者承受能力、家庭情绪与团队准备程度进行持续评估^[11]。相关中国研究与案例分析均提示,文化适配后的安宁疗护沟通,往往依赖这种渐进、间接、关系导向的操作方式。

五、医务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发展出路

(一)建立医院社工“伦理决策清单”

为减少社工在高压情境下完全依赖经验判断,医院可设计一份标准化“伦理决策清单”,建议至少包括以下内容:第一步,识别问题是否涉及知情权、自决、保密例外、资源分配、双重关系或公共安全。第二步,确认主体谁是直接案主,谁是关键利益相关者,谁拥有正式决策权,谁承担实际照护责任。第三步,评估风险若维持现状,谁会受到伤害;若改变方案,是否会引发更大风险;是否涉及法律责任。第四步,探知意愿患者是否有表达能力;是否已表达偏好;是否存在家属代言替代患者发声的情况。第五步,查阅依据核对专业伦理、医院规定、相关法律与科室惯例。第六步,咨询支持是否已向督导、资深社工、医生或伦理委员会咨询。第七步,比较方案列出至少两种可行方案,比较其短期与长期后果。第八步,记录过程记录核心事实、价值冲突、咨询过程、最终行动与理由。这类清单的意义不在于替代判断,而在于让判断过程可见、可讨论、可追溯。

(二)构建“社工—医护—家属”三方伦理沟通机制

针对高频出现的病情告知、放弃治疗、安宁疗护转介等议题,医院可建立标准化三方沟通流程:

第一阶段:信息汇总,由主治医生说明医学判断,护士补充照护观察,社工梳理患者与家属心理社会处境。

第二阶段：社工预评估，社工分别与患者、主要照护者进行简短访谈，评估其知情意愿、情绪状态与冲突焦点。第三阶段：小型会商，社工、医生、护士先行内部统一口径，避免多头表达和信息冲突。第四阶段：分层会谈，先与家属讨论照护目标与沟通边界，再在适当时机引入患者；必要时分两次以上完成。第五阶段：决策确认，对达成的方案进行复述，确认是否理解一致，明确下一步责任分工。第六阶段：持续追踪，对患者与家属的情绪反应、方案执行情况和新增伦理问题进行跟进。这一机制的关键，不是“谁赢得争论”，而是让各方在专业支持下进入可持续协商。近期关于医疗伦理困难与家庭角色的研究，也强调多方对话、关系视角和组织支持的重要性。

（三）将伦理督导制度化

伦理困境高度情境化，单次培训难以解决。医院与社工机构应建立常态化伦理督导机制，以提升医务社会工作者在伦理判断、跨专业协调及资源整合方面的专业能力，包括个案复盘、同侪讨论、困难案例升级会商和决策记录抽查。尤其对临终关怀、儿科重症、精神科与传染病等高风险领域，应设立优先督导通道。这样既能提升决策质量，也能缓解社工长期积累的道德压力。

（四）推动本土化伦理规范建设

我国医务社会工作不能停留于照搬西方伦理术语，而应在本土实践中重新界定若干关键概念，如“家属参与的正当边界”“渐进式知情的条件”“关系自主性的操作标准”“保密例外的最低必要披露原则”等。只有将这些内容转化为机构规程、培训模块和文书模板，伦理建设才不会停留在抽象口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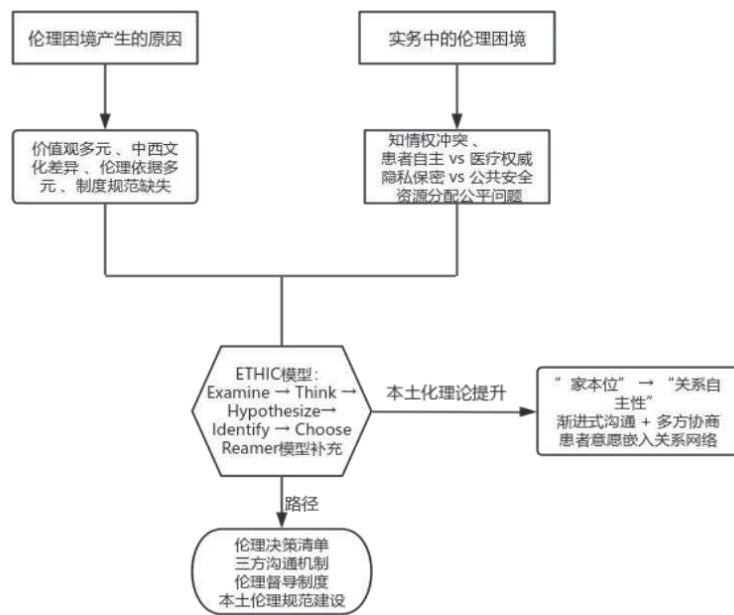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框架

结语

医务社会工作的伦理困境并非单一原则之间的抽象冲突，而是专业价值、医院制度、家庭伦理与文化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在原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从实务过程出发，借助综合案例与伦理决策模型分析了医务社会工作者在知情权、家庭保护、患者自主与关系维系之间的复杂抉择。文章认为，在中国医疗语境中，“本土化”不应仅被理解为中西价值差异的表面比较，更应被理解为如何在家本位伦理和关系网络中，为患者真实意愿创造表达、进入与被尊重的空间。

因此，未来医务社会工作伦理建设的重点，不只是继续强调原则本身，而是发展一套可操作、可记录、可协商、可培训的制度工具。只有当伦理判断从个人经验走向组织支持，从原则宣示走向程序设计，从“患者—家庭”二元对立走向“关系自主性”的情境实现，医务社会工作才能真正形成具有中国实践解释力的伦理体系。

参考文献:

- [1]马会明.医务社会工作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 [2]刘继同.中国医务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发展[J].社会工作,2018(3):3-10.
- [3]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M].3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 [4]李迎生.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7(4):1-20.
- [5]吕秋丽.医务社会工作实务中的伦理困境及对策研究[J].社会工作与管理,2018,18(6):73-79.
- [6]黎玮玮,莫艳婷.我国医务社会工作发展现状、困境及建议[J].社会科学前沿,2023,12(4):1748-1752.
- [7]Stocklassa S.Cultural implications for disclosure of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toward terminally ill cancer patients in China[J].Palliative&Supportive Care,2022,20(2):283-289
- [8]HO A.Relational autonomy or undue pressure?Family's role in medical decision-making[J].Scandinavian Journal of Caring Sciences,2008,22(1):128-135.
- [9]Fan R.Self-determination vs.family determination:Two models of autonomy in bioethics[J].Bioethics,2019
- [10]REAMER F G.Social work values and ethics[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
- [11]陈功,张莉.安宁疗护中的伦理问题与社会工作介入路径[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20,13(6):56-62.

Ethical Dilemmas in Medical Social Work

Fang Lingling¹, Gao jing¹

¹ 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uangxi, Liuzhou 545006, China

Abstract: Medical social work is an important practical form of the social work profession in the healthcare field. Its service goals not only aim to respond to patients' and familie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resource needs during the disease process but also to promote the humanistic care and overall effectiveness of medical services. However, in actual practice, medical social workers often face multiple ethical dilemmas, including the right to know, client self-determination, confidentiality and privacy,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rofessional boundary issues. Such dilemmas do not simply arise from individual judgment errors but are shaped collectively by the logic of the medical system, conflicts in professional values, family decision-making traditions, and local cultural structures. Recent studies further show tha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there is a continuing tension between family-centered decision-making, avoidance of death-related topics, relationship harmony orientation, and patient autonomy; simply applying the Western individualistic principle of 'self-determination' often fails to explain the complex situations encountered in local practice.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ethical dilemmas in medical social work,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a comprehensive case study approach and, with the support of Reamer's ethical decision-making framework and the ETHIC model, analyzes the re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of medical social workers in end-of-life care scenarios. [It focuses on presenting their emotional experiences, value considerations, and action logic within the triple tension of patient information—family protection—medical judgment.]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ethical dilemmas of Chinese medical social work have distinct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re is not a simple opposition between 'patient autonomy' and 'family agency'; rather, it is about how to achieve the practical transformation of 'relational autonomy' within networks of relationships through gradual communication, intention discovery, and multi-party negotiation.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proposes institutional recommendations, such as establishing hospital social work ethical decision-making checklists, improving the 'social worker—medical staff—family' tripartite ethical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and documentation system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ized ethical norms,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ethical governance of medical social work in China.

Keywords: Medical Social Work; Ethical Dilemmas. Relational Autonomy; Localization

偷换二维码取财行为的罪名适用问题研究

朱昊楠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1)

摘要: 以偷换二维码为手段非法获取他人财物的行为, 已成为伴随新型支付方式发展而衍生的典型犯罪形态。侵占罪说不能充分评价案涉行为的整个过程, 且行为人在偷换二维码时就具备了非法占有的目的。另设新罪说没有考虑到法益侵害仍指向财产权利, 与传统财产犯罪并无本质区别。主张诈骗罪说的各种学说观点都难以合理解释商家和顾客具有主观上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的意识, 同时顾客的支付转账行为与商家的指示交付行为亦难以界定为构成诈骗罪的处分行为。行为人秘密调换二维码的行为侵入他人支配领域, 对商家丧失货款的规范占有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应当定性为盗窃罪。

关键词: 偷换二维码; 处分行为; 规范占有; 盗窃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408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支付方式的数字化转型与移动支付技术的成熟, 二维码收付款因便捷无纸化迅速普及, 成为民众日常消费的重要支付方式。但这一新型支付模式在为交易活动提供便利的同时, 也为不法分子实施财产犯罪带来了新的可乘之机。实践中出现了利用顾客扫码付款的习惯将商家收款二维码秘密替换, 从而非法占有本应归属于商家的款项。针对此类偷换二维码取财行为的刑法定性, 我国司法机关的裁判立场与刑法理论界的观点存在明显分歧。某法律检索平台专门做过偷换二维码案件的实证分析, 在186份裁判文书中认定为盗窃罪的案件数最多, 为170件, 占比89.47%。诈骗罪案件数为18个, 占比9.47%。不难看出, 实践中将偷换二维码取财行为定性为盗窃罪占绝大多数, 只有极少数判决以其他犯罪论处。^[1]但与司法裁判观点较为统一不同的是, 其罪名适用问题引发了学界广泛讨论, 其中主流观点为盗窃罪与诈骗罪, 当然定性之争也非仅限于盗诈, 学说观点的林立繁杂反映该问题在理论上存在诸多困惑亟待厘清。造成此类行为定性分歧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对新型财产犯罪本质属性缺乏深入认识,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界分标准仍不够清晰。本文主张偷换二维码取财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盗窃对象为财产性利益, 行为人秘密调换商家的收款二维码从而非法移转了货款, 与商家的财产损失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商家享有对第三方支付机构债权的规范性占有, 下文就以上结论展开详细论述。

二、偷换二维码取财行为刑法定性的学说争议

(一) 现有学说观点概述

第一, 诈骗罪说。关于一般诈骗说中受骗人的认定, 学界和实务界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主张顾客为被骗人, 理由是在整个支付流程中顾客在扫码前实际占有钱款, 扫码后款项直接进入行为人账户, 商家自始至终未能建立对钱款的占有。行为人通过偷换二维码实施欺骗, 致使顾客误认为所扫二维码属商家所有而付款, 进而遭受财产损失。^[2]还有观点主张商家属于受骗方, 行为人通过替换二维码的行为, 致使商家对二维码的权属产生错误认识, 并基于该错误认知引导消费者扫码付款。在此情形下, 商家既是错误认识的承受者, 也是损失的最终承担者, 其损失体现为合同债权, 行为人则非法获取了该债权所对应的货款。^[3]第三种观点为双向诈骗说, 主张偷换二维码行为并非单纯作用于商家或顾客一方, 而是同时对交易双方产生了欺骗效果, 致使买卖双方均对“收款二

作者简介: 朱昊楠(2002—),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刑法学。

通讯作者: 朱昊楠

维码系商家所有”陷入错误认识。^[4]

传统三角诈骗说认为,该行为构造中受骗者为顾客,受害者为商家,商家所遭受的损失体现为顾客扫码支付至行为人账户的款项。行为人通过替换二维码使顾客误认扫码对象为商家收款码,进而基于该错误认识实施支付。该支付行为若满足善意且无重大过失之条件,则对商家发生清偿效力。基于清偿效果的发生,顾客被视为在事实上处分了商家的财产,即顾客在支付过程中充当了将商家应收货款转移至行为人一方的角色。^[5]相较之下,新型三角诈骗说与上述观点的核心不同在于被骗人所处分的财产归属问题。被骗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成立传统三角诈骗;被骗人处分自身财产却导致被害人财产损失的,则成立新型三角诈骗。^[6]

诈骗罪的间接正犯说认为,“行为人一头骗顾客,一头骗第三方支付平台,顾客刷二维码付钱转让的是自己的债权,处分的是商家的债权,第三方支付平台处分的才是商家的财产权。”^[7]不同于双向诈骗说,间接正犯说认为行为人并未直接介入商家与顾客之间的交易关系,而是通过利用顾客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错误认识,将二者作为无过错的工具,间接实现了对商家财物的非法占有,从而构成诈骗罪的间接正犯。

第二,盗窃罪说。盗窃货款说主张行为人通过秘密替换商家收款码的方式,违背商家意愿将货款非法转移至自身控制之下,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8]该观点在司法实务中亦有体现,以邹某敏案为例,审理法院将收款二维码类比为商家的“收银箱”,认为顾客扫码付款相当于向该收银箱投入款项,行为人私自替换二维码,则相当于以自身收银箱替换商家收银箱,致使本应进入商家账户的款项转而流入行为人处,侵害了商家对货款的控制与占有。针对商家尚未实际取得货款这一质疑,支持者进一步指出,刑法判断财产归属时应立足规范视角下的法律事实:在扫码支付完成瞬间,应视为货款已由商家占有,行为人通过秘密替换手段切断该占有关系,从而成立盗窃罪。^[9]但该说需要澄清的疑问是,即认为行为人窃取了商家应收货款就需要论证商家对该款项具备事实上的占有或支配地位。^[10]遗憾的是,实务中多数判决对此缺乏深入说理,往往仅笼统表述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构成盗窃罪”,或与诈骗罪简单对比定性,未能充分回应盗窃罪构成要件的具体涵摄过程。盗窃商家债权说则将商家对顾客享有的支付请求权视为一种可转让的财产性利益,行为人秘密替换二维码是在未经商家同意的情况下,将该债权非法转移至自身名下导致商家丧失对顾客的合法债权。行为人所侵害的并非具体款项本身,而是一种具有财产属性的请求权。^[11]

除前述两种有力观点外,亦有学者提出偷换二维码取财行为既不符合诈骗罪亦不构成盗窃罪,但可解释为侵占罪。该观点认为,行为人在实施盗窃或诈骗后占有他人财物的状态,通常可作为侵占罪评价,但由于该行为属于共罚的事后行为,一般已被前罪吸收评价。若前行为因不符合盗窃或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而无法成立犯罪,则事后的侵占行为便具备独立入罪的基础。^[12]依此逻辑,行为人通过替换收款二维码非法获取本应属于商家的款项,其取得财物的行为本身虽难以认定为其他财产犯罪,但在占有他人财物后拒不返还的行为则可能独立构成侵占罪。

第四,另设新罪说。也有论者在分析了偷换二维码取财行为的性质及现有财产犯罪的构成要件后,得出了将该类型行为扩大解释进现有刑法规制范围会牺牲构成要件明确性、有造成财产犯罪口袋化风险的结论,从而主张在立法上补齐由新型支付方式所引发犯罪行为的短板,另外设立计算机诈骗罪等网络犯罪予以规制。^[13]

(二) 对少数观点的商榷

侵占罪要求将本人已合法占有之物非法转为所有,行为本身并不涉及对他人既有占有状态的破坏。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侵占罪的犯罪对象仅限于他人所有但由行为人占有的财物,具体包括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遗忘物及埋藏物。^[14]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偷换二维码案中行为人最终占有的款项能否被纳入侵占罪的涵摄范围。对此,有论者尝试将该类案件类比为“错误汇款”情形,认为当顾客基于错误认知将款项转入行为人控制的账户时,该款项即非基于权利人本意脱离其占有,处于行为人偶然取得且无委托关系介入的状态,符合“非基于他人本意而脱离占有,由行为人偶然取得或占有人不明”的遗忘物特征,进而可纳入侵占罪的调整范围。^[15]应当承认的是,侵占罪说敏锐地捕捉到侵占罪在财产犯罪体系中可能发挥的补充性功能,即在面对新型财产犯罪难以精确归入其他罪名时,似乎只要行为人非法占有本应属于他人的财物,便可诉诸侵占罪予以规制。但将偷换二维码取财行为纳入侵占罪的评价框架,意味着刑法的关注重心是行为人取得财物后拒绝返还的行为,而偷换二维码本身作为违反他人意志、转移财物占有的行为却难以在侵占罪构成中得到充分评价。此外,侵占罪的成立以行为人占有财物时不具有非法所有目的为前提,非法所有目的产生于占有存续期间且需通过一定行为将占有转化为不法所有。^[16]这一主观要件结构使得侵占罪难以涵摄行为人在偷换二维码之初即具有非法占有意图的情形,从而在行为定性上产生体系性障碍。据此,由于行为人在偷换商家二维码时即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定性为侵占罪难言妥当。

另设新罪考虑到刑法的谦抑性固然值得肯定,可期待通过刑事立法的方式设立类似于计算机诈骗罪的罪名并不贴合实际。刑法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应在于对刑法的解释而非批判,并非只有批判刑法才有利于成文刑法的完善。^[17]刑法条文语义的模糊性和概括性固然囿于立法者的有限理性,不可能对任何值得科处刑罚的危害行为均考虑周全,但同时也为刑法解释提供了广阔空间,偷换二维码取财行为虽然是新型支付方式下出现的新问题,但其所侵犯的法益仍指向财产权利,与传统财产犯罪不存在本质区别,只不过在犯罪手段上有所创新突破。

综上,脱离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定性之争转而提倡侵占罪说、另设新罪说等其他路径往往仅具形式意义,对于解决偷换二维码取财行为的刑法定性缺乏实质助益,^[18]学界也仅有少数学者采纳上述观点主张。故而后文的讨论重点仍将聚焦在此类行为成立盗窃罪还是诈骗罪的问题上。

三、偷换二维码取财行为构成诈骗罪的批驳

(一) 一般诈骗说之否定

如果认为偷换二维码取财行为构成一般诈骗,被骗人与被害人就需要具有同一性,对于被害人的认定直接影响到顾客的扫码付款行为是否构成有效的债务清偿。具体来说,如果顾客是被害人,行为人利用商家提供的支付环境使顾客发生误认并将价款转移至行为人账户,顾客对于商家支付商品对价的义务没有因二维码的偷换而消灭,此时从民事法律关系的角度考察,商家对顾客的债权仍得以主张;反之,如果商家是被害人,尽管由于二维码的更换导致实际收款人出现偏差,但并不影响顾客支付商品对价义务的应然消灭,在此情况下顾客的清偿义务应当视为已经完全履行,商家不得再向顾客提出支付价款的要求。

本文主张被害人应认定为商家而非顾客,具体理由如下:首先,商家作为经营场所的实际管理者,对交易空间具有主导性控制权,负有保障支付过程安全、维护交易秩序的义务。悬挂于商铺或由商家主动出示的二维码,具有商家收款码的权利外观,顾客在此情境下缺乏辨别二维码真实性的能力与义务。同时,顾客的扫码付款行为通常伴随明确的外在动作或确认环节,该行为在商家可感知或默许的范围内进行。一旦支付完成并经系统提示成功,买卖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告终结。其次,从交易结构的整体性来看,电子商务或移动支付场景下的交易具有瞬时性与一体性特征。无论是商家出示二维码,还是顾客扫码付款,均构成交易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行为人通过替换二维码介入交易过程,其主观目的在于破坏商家取得货款的权利,非法占有本应归属于商家的财产。只有将商家认定为被害人,才能全面评价行为人利用电子支付方式实施的侵财行为,准确反映犯罪所侵害的法益归属。再者,根据“实质的个别财产损失说”,顾客在交易中获得了与支付货款相等价的商品或服务,其整体财产状况未受减损,不具备成为财产犯罪被害人的实质条件。^[19]笔者认为该观点具有可采性,顾客的支付行为与商家的收款行为应作为交易整体加以理解,不应割裂评价。商家在交付商品的同时即取得对应价款的权利,行为人通过偷换二维码截取该款项,直接导致商家财产利益受损。从财产实际流向看,顾客支付对价后已实现交易目的,并无实质损失;而商家在履行给付义务后却未获得相应价,其损失与行为人的取财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因此,将商家认定为被害人更符合交易结构与财产损失的实际状况,而将顾客同时视为被骗人以及被害人的“顾客被骗说”难以自洽。

传统理论对盗窃罪和诈骗罪主要是从两罪的犯罪手段、主观认识等方面进行区分,盗窃罪突出秘密窃取,强调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非法获取他人财物;而诈骗罪的特征则体现在行为的欺骗性上与被害人因受欺骗而“自愿”交付财物,这种“自愿性”实际上是被欺骗的结果,与真正的自愿大相径庭,由于网络支付方式下行为手段盗窃性获取和诈骗性使用并存的特征使得原有区分标准逐渐难以适用于复杂犯罪行为的判断。“主观处分意识与客观处分行为是主客观相一致的关系。”^[20]本文主张被骗人客观上是否做出处分行为以及主观上是否具有处分意识是二维码支付方式下区分盗窃罪和诈骗罪的判断标准。

第一,诈骗罪中的财产处分指被骗人因行为人的欺诈而自愿、直接做出造成自身经济意义上财产减损的客观行为。^[21]尽管我国刑法未明确将处分行为规定为诈骗罪的犯罪构成,但基于学界普遍认同“处分行为必要说”的共识,^[22]处分行为应属于诈骗罪不成文的积极构成要件要素,在欺诈行为与财产损失间发挥衔接作用。具言之,被骗人陷入错误认识实施了处分行为,该行为直接导致行为人取得财产,并最终造成财产损失。需要强调的是,处分行为不能仅从形式上理解为财物的简单交付,而应要求其直接源于被骗人的错误认识,且未受其他介入因素的中断或干扰。第二,我国刑法理论中“处分意识必要说”占据优势地位,强调“如果受骗人没有财产处分意识,无论其行为在客观上是否引起了占有转移的效果,该行为都无法成为财产处分行为。”^[23]处分意识要求被骗人主观上至少认识到自己正将财物占有转移给行为人,而客观上的处分行为则是该意识的外在表现,体现为主动将财

物或财产性利益转移给对方。^[24]诈骗罪的“处分意识”有三点要求：一是认识到财产占有状态，即明确知晓自身控制支配着财产；二是对占有转移的认识，即意识到自己占有的财产转移给他人占有；三是财产处分须出于自愿，非受到外界强制或胁迫。与盗窃罪中行为人违背权利人的意愿、侵犯财产的占有不同，诈骗罪为被害人因受到欺骗而主动、自愿地转移了对财物的占有。由此，先前的欺骗行为不妨碍处分行为的有效性，有意识地财物处分行为是体现诈骗罪作为“自我损害”型犯罪的重要特质。

商家被骗说主张偷换二维码案件中被骗人和被害人均为商家，认为商家指示顾客进行扫码支付即为此处的处分行为，这实际上是有失偏颇的。当顾客与商家订立买卖合同、形成价款债权时，商家指示顾客付款的行为不能被认作一种处分行为，其理由可以从民刑两个层面展开。其一，指示付款仅为债权请求权之行使，本身并不直接导致债权债务关系的消灭。即便商家已作出付款指示，在顾客实际支付之前，商家仍保有对顾客的债权。行为人虽因偷换二维码而在外观上取得了对价款债权的行使可能，但商家在法律上仍具备以其他方式实现债权的空间，例如要求顾客以现金或其他支付方式履行义务。只有当顾客实际完成支付时，商家价款债权的实现才在事实上受阻，其对财物的占有才受到实质性侵害。^[25]其二，诈骗罪的构成要求被害人基于认识错误自愿处分财物，而在此交易场景中，商家在提供商品或服务后，指示顾客付款是基于合同履行的常规行为，其对象始终指向顾客，而非行为人。^[26]商家并未将债权转移给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亦未放弃对债权的占有或控制。^[27]由此可见，商家指示付款的行为欠缺处分意识与处分行为的实质内涵，无法符合诈骗罪对处分行为的构成要求。

总之，商家指示付款行为并不等同于直接实行付款行为，无法绕过顾客向行为人账户付款这一客观事实。商家主观上没有转移财产给第三人的意思，没有因受欺骗而做出诈骗罪意义上的处分行为。一般诈骗说中的顾客被骗说与商家被骗说均难以成立，以一般诈骗说为基础的双向诈骗说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根基，故不再重复赘述。

（二）三角诈骗说之否定

传统三角诈骗说在行为结构上似乎比一般诈骗说更契合偷换二维码取财行为，行为人通过调换二维码使顾客陷入错误认识并扫码付款，行为人取得钱款而商家作为被害人实际遭受财产损失。不过三角诈骗说虽然能够解释财产处分人与被害人的非同一性，但其成立仍需满足被害人具备处分权限或处分地位的要件，而顾客并不具备这一地位。一方面，商家指示或提醒顾客扫码付款，并不能被理解为对顾客处分权限的授予。根据社会一般观念，顾客向商家支付货款是履行合同义务，而非行使某种处分权利。另一方面，财产处分人与被害人须存在特定关系，即因具有此种关系才能使得行为人与被害人在规范上建立“沟通交流”，将处分行为所导致的财产损失归责于被害人。^[28]该类案件中顾客和商家互不认识，不存在特定关系，顾客也没有义务保护商家利益，难以定性为传统三角诈骗。

新型三角诈骗说理论本身即受到质疑，其首要问题在于能否经得起诈骗罪特征的检验。诈骗罪在罪质上属于“被害人自我损害型犯罪”，^[29]即被害人在行为人的欺骗下基于错误认识主动处分财物，从而导致自身财产受损。该语境下被害人处分的是自己的财产却造成商家损失，显然与诈骗罪中被害人自我损害型犯罪的本质存在矛盾。被害人处分自身财产却使他人的财产减损，难以在罪质层面与诈骗罪形成内在一致性。此外，诈骗罪作为财产转移型犯罪，其成立要求满足“素材同一性”要件，即行为人获得的财产利益与被害人所遭受的财产损害必须源于同一处分行为，且二者在内容上具有对应关系。换言之，得利与损害应基于同一财产流通过程，具有直接的因果关联。^[30]而新型三角诈骗说将素材同一性从最终的财产损害环节前移至处分行为环节，将之视为被害人处分自身财产的一部分，实质上割裂了得利与损害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背离了素材同一性要件旨在保障财产转移关系的制度初衷。^[31]如此一来，该说虽试图在形式上维持三角结构，却以牺牲诈骗罪罪质特征为代价，其理论自治性值得怀疑。即便退一步承认新型三角诈骗说的合理性，作为被骗人的顾客是否做出了处分行为也同样值得商榷。商家指示或同意顾客付款的行为本身即构成处分行为，顾客完成付款后商家的债权随之消灭，该处分行为也告完成。^[32]按照这种观点，似乎顾客将货款进行转让的行为就是处分行为，但事实上仅以客观上的转账行为认定为处分行为是不准确的，在该类案件中顾客或商家并没有和行为人进行财产决策上的交流，顾客也只是按照交易习惯或商家指示进行付款，商家对于付款码被置换也并不知道，因此不能仅以客观上的付款行为认定财产处分行为。

（三）诈骗罪间接正犯说之否定

诈骗罪的间接正犯说主张行为人同时欺骗了顾客与第三方支付机构，这一观点同样存在问题。在移动支付的技术流程中第三方支付机构虽然承担了资金划转功能，但只要用户完成合法注册，资金的存取与流转即依据指令

自动执行,第三方支付机构本身并无实质审核交易真实性或收款二维码真伪的义务。既然其不负有审查义务,便不存在陷入认识错误的可能,更无从谈起被欺骗。顾客扫码支付的行为在性质上仅为履行其对商家的付款义务,既无处分商家债权的权限,也无处分他人财产的主观意图。不能仅因商家最终承担了财产损失,就倒推出顾客在行为意义上处分了商家债权。因而将顾客或支付机构视为被利用的工具而主张成立间接正犯缺乏理论与事实依据。

四、偷换二维码取财行为构成盗窃罪之提倡

(一) 盗窃对象为财产性利益

“随着财产形态的变化发展,有体性不再是认定财物的唯一标准,应当注重财产自身的经济价值水平高低。”^[33]有体财产主要包含动产和不动产两大类,这是物理意义上具体可感的财产形态,而财产性利益则是指除狭义财物之外在财产方面所享有的各种权益,不仅涵盖积极财产的增加,如投资收益、工资收入,同时还包括了消极财产的减少,比如债务的免除或支出的减少。^[34]我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四款采用列举方式对具有明确经济价值的财产性利益作出规定,反映出立法层面对财产性利益作为刑法保护对象的认可。从该条款的设置来看,刑法所保护的“公私财产”并不局限于有体物,而是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亦未将盗窃罪的犯罪对象限定于有形财物,例如盗窃欠条、虚拟游戏装备等案件,虽然涉案对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有体物,但仍被认定为盗窃罪。此类裁判表明,财产性利益在实务中已被普遍接受为盗窃罪的适格对象。可见将财产性利益纳入盗窃罪的保护范围,已成为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共同立场。

在偷换二维码案件中,商家与顾客之间的债权债务清偿需借助第三方支付平台完成。顾客通过扫码支付,实质上是将其对支付机构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商家,以履行合同付款义务。商家作为该债权的受让人,本应通过账户数字变动体现该权利的实现。然而,行为人通过偷换二维码,使商家未能实际收到款项,从而阻断了商家对顾客债权的有效行使,导致其财产利益受损。在此情形下,商家无权再向顾客主张付款。货款背后隐含着因顾客付款而使商家享有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债权,鉴于债权是财产性利益的一种表现形式,可以成为行为人秘密窃取行为的侵害对象。行为人所侵犯的并非有体财物,而是商家依法享有的财产性利益。

(二) 取财行为本质属于盗窃行为

偷换二维码取财行为的犯罪流程可以提炼为行为人替换或覆盖商家二维码——顾客扫码付款——行为人取得财产。应当承认,在特定情形下,偷换二维码行为本身尚不具有刑法上的危害性,例如在顾客尚未扫码支付前,尚难以认定其对财产性利益构成实质侵害。反对将此类行为定性为盗窃罪的观点认为,其一,秘密性并非盗窃罪的专属特征,诈骗罪中亦存在以秘密方式实现财产转移的情形。其二,盗窃罪所要求的秘密性应体现于实行行为本身,而非犯罪流程中的其他环节。在此类案件中,秘密性并不体现在实行行为本身,即没有体现于财产转移的直接行为,而是体现在作为预备行为的偷换二维码环节。由于盗窃罪中秘密性的判断应以实行行为为基准,故不宜将此类行为认定为盗窃罪。^[35]

笔者认为秘密性并非成立盗窃罪的必要要件,只需要以平和方式将他人占有的财产非法转移为自己所有即可。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关键仍在于被害人有无处分行为以及处分意识。在偷换二维码案件全程中,商家始终处于不知情状态,既未作出任何财产处分的意思表示,也未实施任何转让行为。行为人通过秘密替换二维码的方式,直接导致商家丧失对货款的占有,其取财行为与商家的财产损失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倘若坚持盗窃行为须具备秘密性,从行为进程上进行两阶段分析:第一阶段为行为人替换二维码的行为,该行为完成后,实行行为即告终结。此时行为尚未对既有财产状态造成实质侵害,非法占有目的的实现仍需借助后续环节。第二阶段为顾客基于对商家的信任扫码付款的过程,正是在此阶段,行为人通过已铺设的二维码实现了对财产的非法转移,完成对商家财产的实质侵害。秘密性不仅体现在预备阶段,更贯穿于实行行为始终。^[36]

(三) 商家享有对第三方支付机构债权的规范占有

如前所述,债权作为财产性利益的一种,已被认可为财产犯罪的侵害对象。但在刑法语境下债权是否能够成为占有的客体,以及被害人是否具备对债权的支配与控制能力仍存有争议。盗窃罪作为典型的占有转移型财产犯罪,成立以行为人侵犯被害人对财物的占有为前提,反之如果被害人无法实现对债权的占有,则难以将此类行为评价为盗窃罪。民法上的占有指对物的事实控制与支配状态。由于调整对象与规范目标不同,刑法中的占有与民法占有既存在差异,又具有内在关联。传统财产犯罪以有体物为保护对象,因此刑法中的占有原型是对有体物的

事实性支配,而这种支配以一定的物理时空关系为基础。^[37]不难看出传统刑法理论强调占有的物理性与现实性,对间接占有、占有改定等观念性占有形态未予采纳。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实体财产不断向虚拟化、数字化形态演变,物理空间归属判断的适用性逐渐减弱,传统事实性占有概念在行为认定中暴露出僵化性。”^[38]立足于物理性与现实性的事实占有说,已难以回应动态社会关系的需求,亦无法实现占有概念背后的规范保护目的。事实上刑法上的占有虽通常表现为现实性外观,其本质却是规范性的,最终判断须依赖社会一般观念。在法律解释层面,占有概念的建构无法脱离规范视角与规范性要素的参与。与传统财产犯罪中物理性占有主导、规范性占有辅助的模式不同,网络空间中的财产占有已呈现出完全规范化的特征。^[39]相较于德日刑法,我国刑法中“财产”概念的外延更为模糊,包容性更强。据此,将以债权为代表的财产性利益纳入规范占有的解释框架,不仅未超出刑法解释论的边界,亦能为司法实践应对新型财产犯罪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储户对第三方支付机构享有的存款债权属于即时性债权,可依其指令随时用于履行合同义务。在对偷换二维码取财行为进行刑法评价时,即便事实占有有例外地承认部分财产性利益可以作为占有对象,仍难以认定存在事实层面的占有转移。究其原因,商家自始至终没有实际控制支配该笔款项,“即时贷款”并未转化为实际取得的款项,从而导致在被害人遭受实际财产损失的情形下无法被事实占有说评价为占有转移,而难以成立盗窃罪。^[40]应当认为,凝结了人类一般劳动且形式合法的财产权益,若由特定行为人合法管理并享有支配地位,则该财产性利益一旦被非法占有,理应纳入盗窃罪的规制范围。在偷换二维码案件中,商家与顾客已订立合同并完成相应合同义务,二维码作为双方债权债务实现的交易媒介,顾客扫码付款后,款项经由第三方支付机构流转,在即将进入商家控制账户的过程中被行为人截取。依据社会一般观念,顾客完成扫码付款时,其对贷款的占有即已转移至商家,商家亦因此成为顾客债权的合法受让人,对第三方支付机构享有相应债权。作为债权的合法持有人,商家对该债权应享有绝对、排他的支配力。偷换二维码取财行为正是对即将归属于商家的贷款进行截留,从而打破了商家对债权的规范占有。^[41]

参考文献:

- [1] 小包公. 偷换二维码侵财行为定性研究[EB/OL]. <https://mp.weixin.qq.com/s/HprSvvhxU5uuOg-rtKrnX-g>, 2023-12-22.
- [2] 刘梦雅,张爱艳. 偷换商家支付二维码案的刑法认定[J]. 中国检察官, 2018, (02): 12-15.
- [3] 蔡颖. 偷换二维码行为的刑法定性[J]. 法学, 2020, (01): 124-137.
- [4] 张庆立. 偷换二维码取财的行为宜认定为诈骗罪[J]. 东方法学, 2017, (02): 123-131.
- [5] 高磊. 论清偿效果之于三角诈骗的认定[J]. 政治与法律, 2018, (05): 52-64.
- [6] 张明楷. 三角诈骗的类型[J]. 法学评论, 2017, 35(01): 9-26.
- [7] 姜涛. 网络型诈骗罪的拟制处分行为[J]. 中外法学, 2019, 31(03): 692-712.
- [8] 付立庆. 二维码案件中诈骗罪说的质疑与盗窃罪说的论证[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52(01): 51-66.
- [9] 种政. 偷换二维码侵犯财产的刑法规制[J]. 人民检察, 2021, (12): 57-60.
- [10] 刘明祥. 偷换收款二维码取财行为定性探究——兼与孙运梁教授商榷[J]. 清华法学, 2024, 18(05): 5-25.
- [11] 柏浪涛. 论诈骗罪中的“处分意识”[J]. 东方法学, 2017, (02): 97-106.
- [12] 张开骏. 偷换商户支付二维码侵犯商户应收款的犯罪定性[J].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 2018, 33(02): 107-119.
- [13] 徐凌波. 置换二维码行为与财产犯罪的成立[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8, 26(02): 34-47.
- [14] 张明楷. 刑法学[M]. 第6版.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21: 1266.
- [15] 胡洁人, 王运翔. “偷换二维码取财”行为性质之争议[J].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2022, 34(04): 57-65.
- [16] 徐剑. 二维码替换案的罪名适用研究[J]. 法律适用, 2021, (02): 131-141.
- [17] 张明楷. 刑法学研究中的十关系论[J]. 政法论坛, 2006, (02): 3-19.
- [18] 范硕. 偷换二维码行为的法教义学析解[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04): 162-172.
- [19] 王唯鉴. 盗窃罪规范性占有的认定与建构——从偷换二维码行为切入[J]. 政法学刊, 2025, 42(03): 50-63.
- [20] 柏浪涛. 《刑法》第266条(诈骗罪)评注[J]. 中国应用法学, 2025, (02): 182-197.
- [21] 孙运梁. 财产性利益诈骗中的处分行为与处分意识: 以债的诈骗为中心[J]. 政治与法律, 2023, (03): 67-80.
- [22] 周光权. 刑法各论[M]. 第4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 143.

- [23] 邹兵建. 诈骗罪中处分行为的体系位置与内容构成[J].政治与法律,2022,(04):57-73.
- [24] 王立志. 认定诈骗罪必需“处分意识”——以“不知情交付”类型的欺诈性取财案件为例[J].政法论坛,2015,33(01):119-131.
- [25] 徐凌波. 财产犯罪中财产性利益的事实占有:以存款债权为中心[J].法学研究,2024,46(05):133-149.
- [26] 周铭川. 偷换商家支付二维码获取财物的定性分析[J].东方法学,2017,(02):112-122.
- [27] 董玉庭,杜文辉. 论偷换二维码非法侵财犯罪行为[J].山东社会科学,2020,(06):172-177.
- [28] 喻浩东. 三角诈骗中被害人人与被害人间的“特别关系”[J].西部法学评论,2020,(03):33-48.
- [29] 王钢. 德国判例刑法(分则)[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194.
- [30] 荒木泰貴. 詐欺罪における間接的損害について[J].慶應法学,2017,37(02):419-440.
- [31] 付立庆. 三角诈骗: 肯定立场、构成特征与实践展开[J].政治与法律,2023,(12):61-73.
- [32] 蔡颖. 偷换二维码行为的刑法定性[J].法学,2020,(01):124-137.
- [33] 储琪. 我国刑法中的财物应包括财产性利益[N]. 人民法院报, 2020-06-04(6).
- [34] 张明楷. 刑法学[M]. 第6版.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21: 1213.
- [35] 王复春,张驰. 偷换二维码取财行为的刑法定性——修正的双向诈骗说之提倡[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21,34(05):80-89.
- [36] 王奕琛. “偷换二维码案”的定性问题研究[J].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8(02):95-103.
- [37] 车浩. 占有概念的二重性:事实与规范[J].中外法学,2014,26(05):1180-1229.
- [38] 孙运梁. 数字时代财产性利益规范占有的教义学分析——以偷换收款二维码案件为例[J].清华法学,2023,17(03):57-74.
- [39] 陈兴良. 论未来刑法学的十大着力点[J].法治研究,2024,(01):13-26.
- [40] 王恩海,李胜男. 数字化背景下财产犯占有判断的应然理论——二元论项下规范占有说的提倡[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04):44-53.
- [41] 王华伟. 论网络盗窃中的规范占有[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1,29(06):102-120.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Criminal Charges to Acts of Obtaining Property by Replacing QR Codes

Zhu Haonan

Kenneth Wang School of Law,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he act of illegally obtaining others' property by replacing QR codes has become a typical form of crime derived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ayment methods. The theory of embezzlement cannot fully evaluate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act involved, and the perpetrator already possesses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when replacing the QR codes. The theory of establishing a new crime fails to consider that the infringement of legal interests still targets property rights, which is not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property crimes. Various doctrines supporting the fraud theory cannot reasonably explain that merchants and customers have the subjective intention to transfer property to the perpetrator. Meanwhile, the customers' payment and transfer behavior, as well as the merchants', are difficult to be defined as the act of disposition required for fraud. The perpetrator's secret replacement of QR codes invades others' domain of control and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causing merchants to lose normative possession of the payment. Therefore, such act should be qualified as theft.

Keywords: Replacing QR Codes; Act of Disposition; Normative Possession; Theft

儿童性引诱行为的刑法规制研究

吴亚红

(苏州大学, 江苏 苏州 215000)

摘要:“性引诱”概念虽源于域外,但在我国性侵害犯罪流程中普遍存在,威胁儿童合法权益,具备刑法处罚空间。对此,学界提出增设性引诱罪、以猥亵儿童罪论处两种入罪路径:前者误解域外立法及我国刑法现有规定,缺乏正当性;后者虽注意到引诱与猥亵的内在联系,但因行为类型涵摄不足、论证薄弱而亟待完善。为解决儿童性引诱行为的规制难题,需立足行为本身展开规范分析。引诱在犯罪流程中处于预备阶段,其中部分严重的性引诱行为因对儿童重大法益造成紧迫性危险,具备刑事可罚性。而在入罪路径上,根据猥亵儿童罪的保护法益和“猥亵”的基本内涵,严重的性引诱可认定为侵犯儿童身心健康权的猥亵行为,以猥亵儿童罪定罪量刑具有合理性。

关键词:儿童性引诱; 犯罪预备; 猥亵儿童罪;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422

一、引言

近年来,在我国刑事法框架下的性侵害犯罪始终是侵犯未成年人权益最严峻的犯罪类型。据《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4)》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强奸罪、猥亵儿童罪等性犯罪起诉人数合计仍占全部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一半以上。随着多起线上线下儿童性侵害案被持续曝光,作为新型侵害手段的“性引诱”行为正逐步进入公众视野,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

关于“性引诱”概念,其于20世纪80年代由西方性犯罪学及临床医学领域的学者首次提出。为保障儿童在健全的人类环境中全面发展,2007年《欧洲委员会保护儿童免遭性剥削和性虐待公约》第23条首次将其入罪化,明确规定“成年人以对儿童实施性虐待或制作儿童色情制品等犯罪行为为目的,借助信息通信技术故意邀约未达到性承诺年龄的儿童见面,且在‘邀约’发出之后还实施了促成双方会面的实际行为”,即构成犯罪。在欧盟对理论概念的不断完善下,目前域外已有多个国家通过刑事立法对性引诱行为予以规制。相比之下,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类行为关注较少。

作为性侵害违法犯罪的前置环节,儿童性引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容忽视。行为人在实施性侵害前,常通过交友搭讪、物质利诱、情感操控等方式获取儿童信任,并借助淫秽内容逐步加深的身体接触,使儿童对性刺激产生脱敏。这种犯罪预备行为不仅为后续性侵害创造便利条件,提高犯罪既遂几率,期间还极易与制作、传播、销售儿童色情制品等性剥削行为之间形成恶性循环的风险。加之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以物理空间为载体的传统犯罪形态得以向网络空间延伸,网络性引诱行为的发案率与危害性均呈显著上升趋势,这无疑对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体系构成了新的挑战。

可见,在儿童性侵害犯罪持续高发的背景下,不论是回应域外立法趋势,抑或考虑到国内严厉打击未成年人性侵害犯罪的现实需求,有必要将性引诱行为纳入刑法研究视域。本文拟从梳理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制现状入手,剖析既有思路的不足,进而以性引诱行为的犯罪预备属性为核心,结合类型化视角对其构成要件与处罚依据进行解构,以论证将严重情节的性引诱行为以猥亵儿童罪论处的正当性与必要性。

二、儿童性引诱行为的现有规制路径与评析

作者简介:吴亚红(2002—),女,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刑法学。

通讯作者:吴亚红

（一）增设性引诱罪

学界普遍认同儿童性引诱行为具有可罚的社会危害性，但在规制路径上存在分歧。其中主张借鉴域外立法、将其设为独立罪名是目前的主流共识。具体包括：一是建议在《刑法》第237条后补增一款，明确“以性侵害儿童为目的，利用互联网或其他通信设备与儿童交流性内容，并邀请、引诱或强迫儿童进入任何地点意图实施性侵害行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1]；二是针对特殊主体，对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负有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等特殊职责人员针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性引诱且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2]

支持增设新罪的理由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顺应国际立法潮流。据国际失踪和受到剥削儿童中心(ICMEC)调研，截止2017年全球已有63个国家在刑法或特别法中明确将儿童性引诱行为规定为独立罪名。如英国《性犯罪法》(2003)第15条针对与未满16周岁者进行性引诱互动并会面或安排会面的行为，区分简易罪和可诉罪规定最高10年监禁。第二，国内司法裁判隐含独立犯罪化倾向。在检例第43号“骆某猥亵儿童案”中，上下级法院就通过网络强迫儿童拍摄裸照并传输观看的行为是否构成猥亵儿童罪产生争议。有学者认为，争议行为符合性引诱儿童罪的构成要件，尽管一审法院未以性引诱罪论证，但其一案两判中与猥亵儿童罪的区分思路已彰显独立犯罪处理的实质合理性。[1]第三，现有罪名难以填补处罚漏洞。性引诱行为与猥亵儿童罪最为相关，但若以后者论处将面临预备犯普遍处罚依据的缺失、罪名口袋化等正当性疑问。因此，若仅处罚接触性侵害行为，将使性引诱者处于法律真空，无法发挥刑法的评价与预防功能，难以满足现实处罚需求。

笔者对此持反对观点，在刑法教义学背景下增设性引诱罪既不正当也无必要。

其一，域外立法例与理论层面的性引诱概念存在偏差，论证严谨性不足。为支撑儿童性引诱独立入罪的国际趋势，学者多以英、美、德等国法条为依据，但相关解读存在过度阐释的嫌疑。英国《性犯罪法》第15条仅处罚性诱骗后与儿童实际会面的行为，性诱骗仅为预备手段，线下会面才是具备可罚性的实行行为，因其使儿童面临实际侵害风险；而该法第15A条“与儿童进行性通信罪”虽体现性引诱的立法化特征，却与我国网络猥亵行为相近，难以支撑独立入罪主张。此外，以《德国刑法典》第174条为论据亦欠妥当，该条侧重对被保护人的性滥用，并未涉及性引诱场景。而美国模范刑法典第18卷第2252A条主要规制儿童色情材料相关违法犯罪行为，强调儿童性剥削，更类似于我国引诱卖淫类罪名，与性引诱所指向的性侵害意图存在显著差异。

其二，忽视了通过解释论将性引诱纳入我国现行刑法规制的可能性，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我国与域外国家在儿童性侵犯罪的立法体例、构成要件等方面均差异显著，这要求不可盲目借鉴域外经验。以德国为例，《德国刑法典》以第176条至176e条对性侵害儿童犯罪采取分类罗列、具体描述的规范模式，具体包括实施性行为、在儿童面前进行性行为、通过色情内容或言论影响儿童以令其为性行为三种实行行为类型。因各法条针对性极强，新增条款成为应对新型犯罪的必然选择。相反，我国主要依靠强奸罪和猥亵儿童罪进行规制，犯罪体系较为笼统。以猥亵儿童罪为例，“猥亵”作为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无明确语义边界，且简单罪状赋予其极强的包容性和宽泛的认定范围。有学者认为，该罪可以对不构成奸淫幼女罪的一切性侵儿童问题作出回应。[3]这种弹性空间为通过解释论涵射新型性引诱行为提供规范基础，因而增设新罪并非必要。

其三，增设新罪既无法解决规制难题，还会引发规范适用冲突，徒增司法压力。学者提倡的性引诱罪条文中，无论是“交流性内容”还是“实施性引诱行为”，其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具有强烈的道德评价色彩，边界并不明晰，而行为人性侵害目的的证明、是否要求实际会面等核心问题也存在争议。上述构成要件的模糊性不仅会混淆恶意引诱与正常社交的边界，也会引发此罪与猥亵儿童罪、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等罪名的法条竞合争议，此时非但无助于解决规制问题，反而可能陷入更复杂的司法困境。

（二）构成网络型猥亵儿童罪

“猥亵”的弹性解释为猥亵儿童罪的扩张适用提供空间，有学者据此论证该罪在网络儿童性引诱场合的适用规则。根据是否实际约见儿童，将网络性引诱行为分为接触型和非接触型，前者以后续实际的侵害方式定罪量刑，严重的非接触型性引诱则通过扩张解释猥亵儿童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处罚。[4]

笔者认为，该方案兼顾刑法体系稳定与犯罪网络化趋势，类型划分的思路值得借鉴，但仍有一定局限。其一，

规制范围狭窄,存在处罚漏洞且逻辑矛盾。将性引诱限定于网络空间本身具有局限性,且学者主张接触型与非接触型均构成猥亵儿童罪,却以线下猥亵为接触型处罚依据、以线上引诱为非接触型处罚依据,论证逻辑自相矛盾——认可线上引诱行为的可罚性,就不应以实际侵害发生与否作为处罚前提。若线上引诱后线下侵害未遂定未遂,仅线上引诱满足性刺激目的却定既遂,同款引诱行为的量刑差异将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其二,论证说理不足,未触及问题本质。在提出“严重性引诱以猥亵儿童罪规制”观点后,并未围绕性引诱本身展开充分的法教义学分析。性引诱是行为人以性为目的,与儿童建立性正常化不当联系的行为,其引诱过程中的淫秽行为与猥亵行为虽联系密切,但并不等同。将性引诱直接等同于猥亵的做法,将导致规制问题异化为猥亵儿童罪的网络适用,未能打通性引诱纳入该罪的理论通道,论证缺乏力度。

综上所述,儿童性引诱行为的现有规制观点不可取,根源在于均未揭示性引诱的行为本质。只有对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才能进一步根据是否存在违法性与有责性而进行定罪,构成要件由此形成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5]笔者认为,性引诱行为的规制路径需以行为构成要件的规范分析为逻辑起点,优先依托现有法律框架探索可能的归责空间。

三、犯罪预备视域下性引诱行为的类型化廓清

(一) 性引诱行为的类型划分

根据脱敏说,性引诱是指成人为获得儿童信任,通过一系列修饰行为降低儿童抑制性侵犯或虐待敏感度,最终使其对不当行为或关系脱敏的过程。理论上,预备是指为了实现犯罪,以谋议以外的方式实施的准备行为。[6]性引诱不仅在于同受害儿童建立不当交互关系,更为后续性犯罪的实行创造便利条件,即可在强奸罪或猥亵儿童罪的犯罪预备阶段进行研究。

第一, 行为阶段划分。

根据域外代表性观点,性引诱由对象选择、接触并孤立、建立信任、性脱敏以及事后维持五个步骤组成,笔者将其概括为引诱准备、引诱实施、虐待后的侵害维持三个阶段。

首先,引诱准备阶段是为实施引诱而展开的准备行为,在性质上系“预备的预备”,非刑法意义上的犯罪预备。这一阶段中行为人通常借助情感支持、物质诱惑等方式与儿童建立联系,前者如关心问候、交流兴趣爱好,后者包括发红包、送礼物等单纯获利行为。此类举措在客观上虽具有“制造条件”形式,但主观故意外的行为模式却与成人-儿童日常互动高度重合,且距离法益侵害尚远,未制造法所不允许的风险,因而本质上仍处于社会相当性范畴,不应认定为犯罪预备。其次,引诱实施阶段因存在与儿童的实质性接触,显现法益侵害端倪,是核心的犯罪预备行为。在取得儿童信任后,行为人试图在日常交往中以性话题试探、渗透色情制品、升级身体接触等手段,将性正常化并逐步突破接触禁忌,打破社会规范阈值,迫使受害儿童丧失对性权利的控制状态。此类行为既反映性引诱的不法本质,也具有侵害法益的现实危险性,系刑法重点关注的犯罪行为。最后,侵害维持阶段不属于犯罪预备。此阶段以性侵害完成为前提,意在控制儿童、防止其暴露罪行以达到长期侵害的目的,在犯罪完成形态上属于犯罪既遂。引诱行为的目的在于保障性侵害实行,当侵害发生时,引诱目的即已达成,预备行为随之终结,二者属于前后衔接的犯罪进程。因此,狭义上该阶段行为不属于预备行为,不在笔者讨论的范畴内。

第二, 行为表现形态划分。

从行为表现形态进行划分,实施阶段的性引诱行为大致可分为语言型、视觉型和动作型三种。理论上,从语言软暴力到直接的感官刺激,再到实际身体接触,儿童所受冒犯以及对身心健康、人身安全等个人法益造成的侵害或危险应逐步加重。即在相同要素配置下,语言型、视觉型、动作型引诱行为的危害性、不法性程度呈现递增关系[7],需结合手段程度再度筛选,明确刑法规制的预备行为范围。

其一,排除法益侵害危险显著轻微性引诱。具体包括:语言型中擦边提问、性意味隐蔽的黄色玩笑、网络热梗等;色情画面非直接淫秽、暴露时长占比低或画质模糊等视觉型引诱;以及短暂触碰腰部、背部、肩部等非性隐私部分的身体接触。这些不得体行为对儿童权益侵害显著轻微,仅引发不适而非强烈的屈辱感、羞耻感[8],无须进行刑法评价。但若多次或针对多名儿童实施,可考虑予以行政处罚。

其二,手段严重的性引诱因法益侵害性突出,应界定为犯罪预备。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1)语言型。

频繁向儿童传播或要求其发表色情言论、对儿童身体或衣着进行性化评价、使用侮辱性词汇辱骂儿童等行为,扭曲儿童对性的正确认知,冲击其尚未健全的性心理。(2)视觉型。发送或要求发送含有性隐私部位特写的图片或视频;在儿童面前自我猥亵;诱导儿童点击不良链接进入色情网站;赠送带有性暗示的玩具、衣物等物品等,将儿童暴露在色情低俗的视觉信息之中,通过视觉刺激打破性羞耻。(3)动作型。抚摸儿童胸部、臀部、生殖器等性隐私部位;亲吻;诱导儿童触摸自己或他人身体;故意摩擦性部位或通过肢体接触模拟性行为等以肢体动作直接作用于儿童身体进行不适当的身体接触、侵犯性隐私的行为。

综上,广义的性引诱属于犯罪预备阶段的复合型行为,各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存在差异,需从行为阶段、表现形式进行类型化廓清与差异化处理,避免混为一谈。笔者认为,仅引诱实施阶段中手段严重的性引诱行为,才能界定为犯罪预备行为。

(二) 性引诱行为的刑事可罚性依据与边界

1. 预备行为实行化的正当性依据

有学者对性引诱行为入刑持谨慎态度,认为从刑法谦抑性原则出发,没有单独进行法律评价的必要。笔者认为,刑法谦抑性原则并非简单强调非罪化或尽可能限缩犯罪圈,而是在以“限制”为主的精神意蕴中引入“妥当性”的思考维度,即犯罪圈可以调整但应有限且科学。[9]立足于犯罪预备这一本质,性引诱是否入刑即转化为在教义学视域下探究预备行为的处罚根据及限度。

不同于域外刑法仅例外处罚个别重罪的预备行为,我国《刑法》第22条确立了预备犯普遍处罚原则,但其正当性与操作性备受质疑,促使预备行为实行化成为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10]在此基础上,预备犯分为形式预备犯和实质预备犯:前者于法理上存在正当性疑问,处罚仅为例外;后者通过立法设置独立构成要件,对重大法益产生抽象危险,具备形式合法性与实质正当性。[11]我国也因此形成了总则规定形式预备犯、分则设立形式预备犯的立法体例。尽管预备行为理论上可罚,但刑事处罚前置化会突破刑法作为保障法的体系定位,处罚范围必须予以限制。对此,德国危险递增理论得到国内众多学者支持,如张明楷教授指出,“只有当某种预备行为的发展,必然或极有可能造成重大法益或者大量法益的侵害时,才有必要处罚犯罪预备。”[12]笔者认为,如果预备行为具备客观不法和主观不法,抑或结果无价和行为无价,其本质上就具备刑事可罚性,属于可罚的预备行为。

第一,指向重大法益。预备行为对法益侵犯的间接性决定了其入罪范围必须是针对重大法益。[11]根据法益保护位阶,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民生命健康权等核心利益是维系社会共同体或个体存在的根本前提,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基础性价值,若遭到侵犯将产生严重危害,需刑法优先保护。第二,对重大法益造成紧迫性危险。值得刑法处罚的预备行为应与实行行为紧密衔接,其发展进程必然直接指向法益侵害结果的发生,且危险程度突破社会容忍边界、具有随时实现的现实盖然性。即,可罚的预备行为应具有一般观念意义上的、与实行行为紧密相接的显性特征。[13]相反,若距离实行行为过远,动用刑罚不仅过度干预公民自由,也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比例原则。第三,主观上具备实施后续犯罪的意图。刑法理论上的预备犯都是目的犯。[14]预备行为以促进后续实行行为既遂为目的,因而其社会危害性需要借助后续犯罪的主观目的进行判断。主观犯意是区分预备行为与日常合法行为的关键,只有将预备行为与主观故意相结合,才能体现行为人的主观不法,也使预备行为具备升级为实行行为、造成法益侵害的可能。

2. 严重的性引诱行为具有刑事可罚性

依据上述的犯罪预备行为处罚限度,笔者认为,严重的儿童性引诱行为具备充分的刑事可罚性,有必要通过预备行为实行化或正犯化的路径予以刑事规制。由于性引诱者主观上明确具备实施后续强奸或猥亵犯罪的故意,满足可罚预备行为的主观不法要求,因此笔者将重点围绕其他两个条件进行论证。

第一,刑法重点保护儿童的切身利益。由于儿童正处于生理与心理快速发育的关键时期,认知、辨别是非以及性自我防卫能力均较为薄弱,法律必须对其予以特殊保护、优先保护。正如有学者指出,当性侵犯发生在儿童身上时,刑法需予以较多保护与干预,这既是国家兑现儿童作为独立个体且为弱势群体而应享受到最大化利益保护之承诺,亦是基于儿童为国家未来“财产”而予以保护的特殊要求。[15]严重性引诱行为作为性侵害的前置关键环节,直接将儿童带入违背其意愿的性相关情境,迫使其接触不当性内容,本质上已构成对儿童性权利的侵害。

这种危害性不仅体现在妇科炎症、发育不良甚至梅毒、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等直观的身体损害，还会引发更为持久、严重的心理创伤，大多数受害儿童会出现创伤后应急障碍，产生恐惧、绝望、焦虑等负面情绪，伴随冷漠、呆滞、自责感甚至有自残、自杀倾向。此种侵害会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持续发酵，严重影响正常的学习、生活及社交活动。更为重要的，性引诱不仅直接伤害儿童个体，更会破坏社会对儿童保护的信任体系，冲击社会公序良俗，因而完全契合刑法所保护的重大利益范畴，具备侵害重大法益的可罚前提。

第二，严重的性引诱具备高度危险性。在性犯罪链条中，当引诱手段达到严重程度时，其充斥着性意义的行为因超出正常社交边界而与后续猥亵、强奸等实行行为紧密衔接，其发展趋势自然必定朝着实际的性侵害演进，无自然终止可能。不同于前期的引诱准备阶段，此时行为彰显明显犯罪意图，是行为人有指向性犯罪计划的核心环节。另一方面，结合儿童辨别是非、性自我防卫能力薄弱的特点，一些严重的性引诱行为足以使儿童在认知模糊、意志受抑的状态下逐步丧失反抗能力，实现性脱敏目的。此时，行为人无需进一步实施预备行为即可开展后续性侵害，法益侵害危险已从抽象、遥远的可能性，转化为逼近紧迫状态的现实盖然性，儿童在其操控下随时面临性侵害风险。需明确的是，网络犯罪预备行为的刑法评价客观上应区别于线下行为，对其予以处罚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应得到更为明确的承认。[16]依托信息通信技术的匿名性、即时性、跨时空特性，线上性引诱可加速对儿童的心理操控，显著提升引诱成功率，行为人得以用最小成本获取儿童受控资本，使得儿童面临的法益侵害危险更为迫切，其紧迫性显著高于线下性引诱。

四、儿童性引诱行为的定罪路径：以猥亵儿童罪为视角

（一）本罪保护法益为儿童的身心健康权

目前学界关于猥亵儿童罪保护法益有性自主权说、性羞耻感说、性健全发展说以及儿童的身心健康权等观点。

1.性自主权说

持该观点的学者主张，性自主权是指个体对自己所涉及的性活动的意志支配力[17]，通常包括关于性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形式与对象拥有自主决定的自由。笔者认为，性自主权说与刑法对儿童贯彻的法律家长主义精神相悖，不宜为本罪保护法益。性自主权的核心是个体对性活动的意志支配与自主决定，性同意的有无决定犯罪是否。但由于儿童身心发育尚未成熟，缺乏对性的成熟认知与辨别能力，无论其主观是否同意，刑法均应推定相关性行为违背其真实意志。这是国家为维护弱势群体权益而进行的强干预，彰显法律家长主义精神。

2.性羞耻说

日本学者山口厚教授指出，猥亵行为是指具有性意义的行为，也就是作为本人的性方面的羞耻心之对象的行为。[18]相较于其他犯罪，性犯罪中被害人因被迫接受不正当性活动而产生的心理羞耻深刻揭示“性”之本质，具有法益分类机能。但笔者认为性羞耻系主观抽象感受，因人而异，极易导致法益侵害的判断缺乏统一的客观标准，进而引发犯罪圈限缩或扩张的极端，难以指导司法实践。

3.性健全发展说

基于《德国刑法典》第176及余条文的保护法益为“儿童不受干扰的性发展”这一通说，有学者主张猥亵儿童罪的保护法益为儿童的正常性发育，即性健全发展。[3]该观点突出本罪性侵本质，有力说明了将非身体接触的性行为纳入刑法打击范围的合理性。[19]但笔者持反对意见，理由在于“性发育”概念具有模糊性，其正常与否需借助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专业评估，认定标准不明确。并且，将性认知、性道德纳入法益内容，混淆道德与法律边界，加之事后判断的不确定性，无法为行为时的危害程度提供客观依据。

4.儿童的身心健康权

笔者认为，儿童身心健康权应是猥亵儿童罪的保护法益本质，即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免受性行为的阻碍。儿童生理与心理均处于关键定型期，其脆弱性决定了性侵损害后果具有多重性，进而要求刑法保护的法益内容并不单一，而将身心健康权作为本罪保护法益，不仅可全面覆盖侵害后果，充分对行为不法性进行否定性评价，也着重彰显国家最大程度保护儿童权益的坚定立场。正如上述指出，严重性引诱行为所造成的伤害往往兼具心理与生理双重属性，与本罪规范保护目的深度契合，也进一步印证身心健康权作为保护法益的合理性。

（二）性引诱行为系猥亵

在我国规制性侵儿童犯罪的刑法体系中,猥亵儿童罪承担了处罚除传统性交以外一切性侵行为的任务,这使得“猥亵”具有外延宽泛、涵射性强的特点。学界多致力于对该词做出明确界定,其中通说认为,猥亵是指奸淫以外、能够满足性欲和性刺激的,有伤风化、有害他人心理、性观念,有碍于身心健康的性侵犯行为。[20]但由于“猥亵”属于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判断标准具有相对性,导致语义边界始终处于模糊状态。此时原应获得刑法解释论充分确认的文义解释失效。

针对这一困境,不少学者提出破解路径。其中,以分类列举方式明确猥亵行为范围的思路因直观具体而获得多数学者支持。张明楷教授将猥亵行为划分为性进入行为、性接触行为、在场但不接触的猥亵以及利用电信网络的猥亵四种[12];段卫利教授则将其分为身体接触型、近距离非身体接触型、借助网络实施的非身体接触型三种情形。[21]与此同时,实质解释论也有很大的适用空间:有学者指出,认定核心应聚焦“刑法力图通过猥亵儿童罪排除对儿童施加的何种影响”,只要行为对儿童产生不当性影响,即可认定为猥亵[3];再者,还有学者认为这需结合普通成人的性观念,判断行为是否具有刺激、兴奋或满足性欲的性质。结合上述“猥亵”的解释路径与认定标准,笔者主张严重的儿童性引诱行为应当归入猥亵范畴。[22]

第一,形式层面而言,猥亵儿童罪中“猥亵”内涵模糊、外延宽泛的特质是严重性引诱行为归入猥亵范畴的正当前提。行为人实施的严重性引诱行为,如聊天中频繁发表色情言论、发送或诱骗儿童发送色情图片或视频、故意暴露性器官,以及触碰儿童胸部、臀部等性隐私部位,均带有明确性意味,本质上属于淫秽下流行为,是性活动的特殊表现形式。将其认定为猥亵,未突破“猥亵”用语的语义射程,且契合社会公众对性的一般认知。随着道德水平提升和性认知拓展,此类引诱手段明显违背公序良俗、有伤风化,符合一般人对猥亵概念的预测可能性,不存在过度解释嫌疑。

第二,实质层面来看,该认定契合猥亵儿童罪的功能定位,对保护儿童权益、打击性侵犯意义重大。我国刑法主要通过强奸罪、猥亵儿童罪规制性侵未成年人行为,其中猥亵儿童罪需回应奸淫幼女以外的一切性行为。文义解释失效背景下,该罪构成要件分析的核心的是行为对儿童身心健康的实质危害,而非手段、场地等形式要素。严重性引诱行为对儿童身心健康的损害,与常见的猥亵行为具有同等社会危害性,将其归入猥亵并以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既满足性侵儿童犯罪治理需求,也契合本罪保护儿童身心健康的本质特征,彰显刑法对儿童权益的特殊保护立场。

因此,笔者认为,根据猥亵儿童罪的保护法益以及猥亵的基本内涵,为贯彻落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基本要求,当行为人实施的严重性引诱行为使得未满14周岁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受到性行为的不当妨碍,就有必要考虑以猥亵儿童罪进行规制。

五、结语

性侵犯罪因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易造成重大侵害,始终是全球刑法治理的核心议题。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4条明确禁止一切形式的儿童性剥削、性虐待行为。在儿童利益最大化这一国际原则下,各国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不断加大刑法规制力度,呈现更为严厉且严密的刑事政策走向。相应地,我国不断完善《刑法修正案》,凸显对儿童性权益的高度重视,向社会释放出积极信号。本文聚焦犯罪预备阶段的儿童性引诱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通过最高法、最高检发布的典型案例可知,性侵犯罪的未成年受害人面临性引诱风险的例子并不罕见。在整个犯罪流程中,性引诱行为的实施不仅本身已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侵害,更为后续性侵犯犯罪创造有利条件,促使最终强奸或猥亵儿童犯罪既遂。可以说,性引诱的本质和目的均为对儿童的性剥削或性虐待。因而,本人主张将部分具有刑事可罚性的严重性引诱以猥亵儿童罪予以定罪量刑,贯彻落实我国严厉打击性侵儿童犯罪、切实保护儿童合法权益的需求。然而,从更宏观的视角看,现行刑法也需在坚守既有规范框架的基础上通过持续的解释优化与立法完善,顺应世界刑法的发展趋势。其中呼声最大、难度最大的,应属改变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依附性侵犯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模式,突出前者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以建构更为严密的防护体系,切实回应儿童安全的迫切期待。

参考文献:

- [1]赵希.网络儿童“性引诱”的域外法律规制及启示[J].犯罪研究,2025,(01):24-34.
- [2]史立梅,孙若尘.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语境下的性引诱行为研究[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2,41(05):123-131.
- [3]赵星,高峰.无接触型性侵儿童行为的刑法规制研究——《德国刑法典》第176a条之镜鉴[J].法学论坛,2024,39(06):140-152.
- [4]陈梦寻.论猥亵儿童罪在网络儿童性引诱中的适用[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21,(01):43-51.
- [5]陈兴良.教义刑法学[M].第3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61.
- [6]周振杰.日本刑法要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238.
- [7]谢铠.网络猥亵犯罪的理论建构与刑法适用[J].青少年犯罪问题,2023,(05):95-110.
- [8]王政勋.论猥亵行为违法性程度的判定[J].法治现代化研究,2018,2(04):92-106.
- [9]田宏杰.立法扩张与司法限缩:刑法谦抑性的展开[J].中国法学,2020,(01):166-183.
- [10]梁根林.预备犯普遍处罚原则的困境与突围——《刑法》第22条的解读与重构[J].中国法学,2011,(02):156-176.
- [11]阎二鹏.预备行为实行化的法教义学审视与重构——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的思考[J].法商研究,2016,33(05):58-65.
- [12]张明楷.刑法学[M].第6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434.
- [13]郑延谱.预备犯处罚界限论[J].中国法学,2014,(04):236-249.
- [14]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第3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255.
- [15]张鸿巍,江勇.猥亵儿童罪中“儿童”概念的界定及展开[J].中国应用法学,2019,(02):82-97.
- [16]梁根林.传统犯罪网络化:归责障碍、刑法应对与教义限缩[J].法学,2017,(02):3-13.
- [17]谢海定.性骚扰概念在中国法上的展开[J].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27(01):210-224.
- [18]山口厚.刑法各论[M].王昭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20.
- [19]李高伦.“性身心保护”罪质观下网络隔空猥亵儿童行为的刑法处罚[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23,(01):4-14.
- [20]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第7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466.
- [21]段卫利.猥亵儿童罪的扩张解释与量刑均衡——以猥亵儿童的典型案例为切入点[J].法律适用,2020,(16):118-130.
- [22]阮齐林.猥亵儿童罪基本问题再研究[J].人民检察,2015,(22):17-23.

Research on the Criminal Regulation of Child Sexual Enticement

Wu Yahong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the concept of "sexual enticement" originates from outside China, it is prevalent in the process of sexual assault crimes in China, which seriously endangers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hildren and has the space for criminal punishment. In response to this, the academic circle has proposed two conviction paths: adding the crime of sexual enticement and convicting it as the crime of molesting children. The former misinterprets foreign legislation and the existing provisions of China's Criminal Law and lacks legitimacy; while the latter, although noting the inherent connection between enticement and molestation, urgently needs to be improved due to insufficient coverage of conduct types and weak argumenta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gulating child sexual enticement,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a normative analysis based on the conduct itself. Enticement is in the preparatory stage in the criminal process, and some of the serious sexual enticement conducts have criminal punishability because they pose an imminent danger to the major legal interests of children. In terms of the conviction path, according to the protected legal interests of the crime of molesting children and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molestation", serious sexual enticement can be identified as a molestation conduct that infringes on children's right to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it is reasonable to convict and sentence it as the crime of molesting children.

Keywords: Child Sexual Enticement; Criminal Preparation; Crime of Molesting Childre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Principle

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探索

毛 林

(吉林大学,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在数字中国战略深入推进与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的时代交汇点, 数字化已成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重塑乡村经济社会形态、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核心引擎。本文立足于乡村振兴现实困境与数字时代发展特征, 系统剖析当前我国乡村数字化转型进程中面临的数字人才短缺、数据要素沉睡、基础设施薄弱及可持续模式缺失等现实梗阻。在此基础上, 从人才培养、数据开发、基建完善、产业可持续四个维度, 构建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体系, 推动数字技术与乡村发展深度融合, 旨在为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战略目标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 数字化; 乡村振兴; 数字人才; 数据要素; 数字基础设施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423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要求“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1]。与此同时,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5G 通信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加速迭代, 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渗透到经济社会各领域, 为破解乡村发展面临的资源约束紧、产业层次低、公共服务弱等传统难题提供了全新可能。但就目前而言, 我国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较为突出, 传统发展模式已难以适应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要求^[2]。乡村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 导致乡村“空心化”“老龄化”问题加剧, 农业生产面临“谁来种”“怎么种”的困境; 乡村产业多以传统种养业为主, 产业链短、附加值低, 抗风险能力弱, 难以支撑农民持续增收与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此外, 乡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相对薄弱, 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资源供给不足, 难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此背景下, 数字化凭借其高效性、普惠性、创新性特征, 成为破解乡村发展难题的关键抓手, 对于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

(一)乡村数字人才短缺: 数字化转型的“人力梗阻”

数字人才是推动乡村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主体, 也是连接数字技术与乡村实际需求的关键纽带^[3]。当前, 我国乡村数字人才短缺问题已成为制约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的首要瓶颈^[4], 具体表现为“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留存困难”三重困境。

从总量上看, 乡村数字人才供给与数字化建设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缺口。乡村数字人才供给与数字化建设需求之间的不平衡现状在农业生产数字化领域表现尤为突出: 随着智能农机、物联网设备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 急需大量掌握农业技术与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进行设备操作、维护与数据分析, 但目前这类人才的供给量仅能

作者简介: 毛林(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第31页。

③ 陈雯, 陈诚, 高金龙. 迈向知识驱动的乡村新内生发展[J]. 地理学报, 2025, 80(02): 259-271.

④ 刘丁蓉, 孙仕. 数字治理能否促进城市生态韧性提升?——来自信息惠民国家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证据[J/OL].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1-17.

⑤ 江泽林, 徐卓顺, 王天新. 数字化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机理阐释与推进路径[J]. 农业经济问题, 2025, (07): 4-12.

满足需求的 30% 左右；从留存机制看，乡村数字人才留存面临“引力不足、保障薄弱”的问题。一方面，乡村在就业机会、发展空间、生活环境等方面与城市存在较大差距，难以吸引数字人才长期留在乡村。乡村数字企业多为小微企业，规模小、产业链短，人才晋升空间有限；乡村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资源不足，难以满足数字人才及其家庭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乡村数字人才保障体系不完善，缺乏针对性的扶持政策。就薪资待遇而言，乡村数字人才平均薪资仅为城市同类人才的 60% 左右，且缺乏住房补贴、创业扶持等政策支持；而在职业发展方面，乡村数字人才缺乏系统的职业培训和技能提升机会，难以适应数字技术快速迭代的需求。

（二）数据利用不足：数字技术价值释放的“要素梗阻”

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是释放数字技术价值、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当前，我国乡村数据资源丰富，但数据利用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存在“数据碎片化、标准不统一、应用场景单一”等问题，导致数据要素的价值难以充分释放，无法为乡村振兴提供有效支撑。

当前，乡村数据存在“碎片化、分散化”问题，难以形成有效数据资产。乡村数据涉及农业生产、农村治理、农民生活等多个领域，来源广泛且分散，包括农业部门的生产数据、民政部门的人口数据、市场监管部门的企业数据、电商平台的交易数据等。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数据采集标准和共享机制，各部门、各平台的数据往往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形成“数据孤岛”。另乡村数据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严重制约数据利用效率。目前，我国尚未出台统一的乡村数据分类、编码、存储等标准，各地区、各部门根据自身需求制定的数据标准存在较大差异，导致数据兼容性差，难以进行跨地区、跨部门的数据整合与共享。当前，乡村数据应用主要集中在农产品电商、农业生产监测等浅层领域，在农业精准决策、农村智慧治理、乡村公共服务优化等深层次领域的应用较少。尤其是在农业生产领域，数据应用多停留在简单的生产环境监测（如温度、湿度监测），而在农作物病虫害预测预警、产量预测、品质溯源等深度应用方面仍较为薄弱。此外，乡村数据应用缺乏专业的技术支撑和运营团队，难以将数据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和治理效能。就目前现实情况来看，部分乡村虽然建立了大数据平台，但由于缺乏专业的数据分析人才和运营团队，平台仅能实现数据展示功能，无法进行深度数据分析和应用开发，导致平台成为“摆设”。

（三）乡村数字配套基础设施仍需完善：数字化转型的“硬件梗阻”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5]，包括网络基础设施、数据中心、智能终端设备等。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乡村数字化发展需求相比，仍存在“覆盖不均、质量不高、应用不足”等问题，难以满足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的需要。

一方面，乡村地区在网络基础设施方面存在“城乡差距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虽然我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已大幅提升，但与城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截至 2024 年底，我国城市互联网普及率达 82.3%，而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仅为 65.8%，差距达 16.5 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乡村地区数据中心、云计算平台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数据中心是存储、处理、分析数据的核心设施，也是数字技术应用的重要支撑。目前，我国数据中心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乡村地区数据中心数量极少，且规模小、算力不足，难以满足乡村数据存储和分析需求。乡村地区智能终端设备普及率低、应用场景有限。智能终端设备是数字技术与农民生产生活连接的“最后一公里”，包括智能手机、智能农机、智能家电等。虽然我国农村智能手机普及率已达 80% 以上，但智能终端设备在农业生产和农村治理中的应用仍较为有限。在农业生产领域，智能农机（如无人播种机、无人收割机）的普及率不足 10%，多数农民仍采用传统农机进行生产，尚未实现农业生产智能化，难以满足农村智慧治理的需求。

（四）乡村数字化可持续模式有待建成：数字化转型的“机制梗阻”

①代金辉,张泽惠,孟国峰.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及收敛特征[J].统计与决策,2025,41(19):60-66.

乡村数字化可持续模式是指能够实现“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农民主体”多方协同,兼顾经济、社会、生态效益,长期稳定推动乡村数字化发展的运行机制。当前,我国乡村数字化建设多依赖政府短期投入和外部企业支援,尚未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存在“政府依赖度高、市场参与不足、农民主体性不强”等问题,难以保障乡村数字化建设的长期稳定推进。

首先,就政府层面而言,乡村数字化建设存在“重投入、轻运营”“重硬件、轻服务”的问题。近年来,政府在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推广等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运营机制,部分数字化项目建成后难以持续发挥作用,在乡村数字化建设中过度注重硬件设施投入,而忽视了数字技术培训、数据服务、运营维护等软件服务的提供,导致农民和乡村企业难以有效使用数字化设施和技术,无法充分发挥数字化的价值。

其次,从市场层面来看,乡村数字化市场参与度低、商业模式不成熟,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市场驱动机制。乡村数字化建设具有投资大、周期长、回报慢、风险高等特点,导致许多企业尤其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对乡村数字化市场缺乏兴趣,参与度较低。目前,参与乡村数字化建设的企业多为小型地方企业,资金实力弱、技术水平低、运营能力不足,难以承担大规模的乡村数字化建设项目。同时,乡村数字化商业模式不成熟,多数项目仍以政府补贴为主,缺乏市场化的盈利模式,导致企业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再次,从农民角度出发,农民在乡村数字化建设中的主体性不强、参与度低,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内生动力。一方面,部分农民数字素养较低,缺乏对数字技术的了解和应用能力,对乡村数字化建设缺乏认同感和参与意识;部分农民对智慧农业技术持怀疑态度,认为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更可靠,不愿意尝试新的数字技术。另一方面,农民在乡村数字化建设中的话语权不足,难以参与到数字化项目的规划、设计和运营中,导致数字化项目与农民的实际需求脱节。

二、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一) 推进乡村数字人才引进培育,为乡村全面振兴夯实基础

乡村数字人才是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①,推进乡村数字人才引进培育,需要构建“引才、育才、留才”三位一体的人才发展体系,解决乡村数字人才短缺问题,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在人才引进渠道方面,坚持“精准引才、柔性引才”相结合。针对乡村数字化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开展精准引才。围绕农产品电商、智慧农业、农村智慧治理等重点领域,明确人才需求清单,通过举办乡村数字人才招聘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人才合作机制、引进返乡创业数字人才等方式,吸引一批具备专业技能和实践经验的数字人才投身乡村振兴。在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方面,构建“分层分类、产教融合”的人才培育体系。开展分层分类的数字技能培训,针对不同群体的需求制定个性化的培训方案。对于农民群体,重点开展基础数字技能培训;对于乡村干部和合作社负责人,重点开展数字治理和数字经营能力培训,提高他们的数字化管理和决策能力;推进产教融合,建立乡村数字人才培育基地。加强高校、职业院校与乡村数字企业的合作,建立“校地企”合作的乡村数字人才培育基地,将企业的实际需求融入人才培养过程,实现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无缝对接。提高乡村数字人才的留存率,应完善“政策保障、环境优化”的人才留存机制。出台针对性的人才扶持政策,为乡村数字人才提供良好的发展保障。在薪资待遇方面,建立乡村数字人才薪资补贴制度,对在乡村工作的数字人才给予一定的薪资补贴,缩小城乡数字人才薪资差距;二是优化乡村发展环境,提高乡村对数字人才的吸引力。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乡村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体系,改善乡村生活环境;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鼓励乡村数字人才大胆创新、积极创业,对优秀的乡村数字人才和创业项目给予表彰和奖励。

(二) 开发利用乡村数据资源,为乡村全面振兴补全短板

①陈阳.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9(02):34-41.

在数据采集方面,需“统一标准、多元采集”,实现乡村数据的全面、准确、实时采集。制定统一的乡村数据采集标准,明确数据分类、编码、格式、采集频率等要求,实现数据的标准化采集;构建多元的数据采集体系,综合运用人工采集、智能设备采集、平台对接等多种方式,提高数据采集效率和质量。在数据治理方面,应“统一管理、质量管控”,提升乡村数据的质量和可用性。建立统一的乡村数据管理平台,实现乡村数据的集中存储、管理和共享;加强乡村数据质量管控,建立数据质量评估、清洗、修复机制,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一致性和时效性。在数据应用方面,应拓展“农业、治理、服务”多领域的数据应用场景,充分释放数据要素的价值。在农业生产方面,利用农业生产数据、气象数据、土壤数据等,开展农作物病虫害预测预警、产量预测、品质溯源等应用,实现农业生产精准化、智能化。在农业经营方面,利用农产品交易数据、市场需求数据,开展农产品产销对接、品牌推广、价格预测等应用,提高农业经营效益;在农村治理领域,推动数据赋能乡村治理,提升乡村治理精细化、科学化水平。利用农村人口数据、治安数据、环境数据等,开展乡村矛盾纠纷预警、社会治安防控、环境监测等应用,实现乡村治理智能化。

(三) 推动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保障

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推动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构建“网络、数据、终端”全方位的基础设施体系,解决乡村数字基础设施覆盖不均、质量不高、应用不足等问题,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硬件保障。

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加大乡村网络基础设施投入,重点加强中西部地区、偏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乡村网络全覆盖,提升乡村网络质量,提高网络带宽和网速,增强网络稳定性;在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构建乡村数据基础设施体系。在乡村地区合理布局小型数据中心和边缘计算节点,满足乡村数据存储和计算需求。根据乡村数字化发展需求,在县域或乡镇层面建设小型数据中心,为本地农业生产、农村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提供数据存储和计算服务;在乡村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农产品电商产业园部署边缘计算节点,降低数据传输延迟,提高数据处理效率;在智能终端设备建设方面,应针对农业生产、农村治理、农民生活等领域的需求,推广应用智能农机、物联网设备、智能监控设备、智能手机、智能家电等智能终端设备,同时出台智能终端设备补贴政策,降低农民和乡村企业的购买成本并完善乡村智能终端设备服务配套体系,保障设备正常使用。

(四) 助力乡村数字产业可持续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增添动能

乡村数字产业是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助力乡村数字产业可持续发展,需要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农民主体”的协同发展机制,培育壮大乡村数字产业,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为乡村振兴增添动能。

要加强乡村数字产业发展规划引领,明确产业发展方向和重点必须结合各地乡村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制定乡村数字产业发展规划,明确农产品电商、智慧农业、乡村数字文旅、农村数字服务等重点产业的发展目标和路径。政府部门需出台乡村数字产业扶持政策,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依托乡村特色资源和产业基础,建设乡村数字产业园区和产业基地,吸引相关企业集聚发展。创新乡村数字产业商业模式,提高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鼓励企业结合乡村实际需求,创新商业模式,实现盈利可持续。建立农民与乡村数字产业的利益联结机制,保障农民分享产业发展成果。同时,提升农民的数字产业参与能力,加强对农民的数字技术培训和产业经营培训。针对农民在乡村数字产业发展中的需求,开展数字技术应用、产业经营管理、市场分析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农民的参与能力。做到能够保障农民在乡村数字产业发展中的参与权和话语权,让农民参与到产业发展的规划、设计和运营中。另外,在乡村数字产业项目建设过程中,应当充分征求农民意见,确保项目符合农民需求,保障农民利益。

三、结语

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是顺应数字时代发展趋势、破解乡村发展难题、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乡村数字化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但仍面临数字人才短缺、数据利用不足、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数字产业可持续模式缺失等现实挑战。破解这些挑战,需要从推进乡村数字人才引进培育、开发利用乡村数据资源、推动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助力乡村数字产业可持续发展四个维度构建实践路径,形成“人才支撑、数据驱动、基建保障、产业引领”的数字化赋能体系。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农民等多方协同发力,久久为功。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数字人才的不断集聚、数字产业的不断壮大,数字化将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实现农业强国和共同富裕目标作出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 [1]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1页。
- [2] 陈雯,陈诚,高金龙.迈向知识驱动的乡村新内生发展[J].地理学报,2025,80(02):259-271.
- [3] 刘丁蓉,孙仕.数字治理能否促进城市生态韧性提升?——来自信息惠民国家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证据[J/OL].湖北经济学院学报,1-17.
- [4] 江泽林,徐卓顺,王天新.数字化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机理阐释与推进路径[J].农业经济问题,2025,(07):4-12.
- [5] 代金辉,张泽惠,孟国峰.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及收敛特征[J].统计与决策,2025,41(19):60-66.
- [6] 陈阳.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9(02):34-41.

Exploration of Practical Paths for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Digitalization

Mao Li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Province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intersecting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Digital China strateg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digitalization has emerged as a core engine for dismantling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reshap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morphology of rural areas, and unlocking 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momentum. Grounded in the practical predicamen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defining features of the digital era,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sects the key bottlenecks impeding China's rur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including the scarcity of digital talent, the underutilization of data elements, inadequat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the absence of sustainable operational models. Building on this analysis, a practical framework for digital empower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constructed across four dimensions: targeted talent cultivation, data element activation, infra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industrial sustainability. This framework aims to advanc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with rural development, thereby providing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actionable guidance for realizing the strategic objectives of strong agriculture, beautiful countryside, and prosperous farmers.

Keywords: Digitaliz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Digital Talent; Data Element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绿色化转型的影响

张育卿¹

(1.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 沙坪坝区 401331)

摘要:在全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绿色化转型已成为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关键路径。本文基于2008-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绿色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绿色认知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化转型,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在高管绿色认知与企业绿色化转型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本研究丰富了企业绿色化转型的理论研究,为企业管理者 and 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决策参考。

关键词: 高管绿色认知; 企业绿色化转型; 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管理创新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340

一、引言

随着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如全球气候变暖、资源短缺、生态系统退化等,企业的绿色化转型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其发展模式对环境和资源有着深远的影响。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向绿色化转型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高管作为企业战略决策的核心主体,其认知和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发展方向。高管绿色认知体现了其对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解与重视程度,这种认知能够影响高管的战略决策^[1],进而对企业绿色化转型产生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于高管绿色认知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化转型的内在机制尚未形成系统且深入的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作为企业绿色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因素^[2-3],在高管绿色认知与企业绿色化转型之间可能扮演着关键的中介角色。绿色技术创新能够帮助企业开发和应用节能环保技术,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环境影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4];绿色管理创新则通过优化企业的管理流程和制度,将绿色理念融入企业的日常运营^[5],推动企业绿色化发展。因此,深入探究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在高管绿色认知影响企业绿色化转型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对于揭示企业绿色化转型的内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 高管绿色认知的经济后果研究

高管绿色认知是指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对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和可持续发展的认知、态度和价值观^[6]。它反映了高管对绿色发展重要性的主观判断,以及将绿色理念融入企业战略和运营的意愿。高管绿色认知不仅包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理解^[7],还涵盖了对企业在环境保护中应承担责任的认同,以及对绿色发展机遇的敏锐洞察力^[8]。

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提升,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备受关注,众多研究成果从不同维度揭示了其经济后果。在信息与治理层面,高管绿色认知可通过拓宽信息传递渠道,显著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有效减少ESG评级分歧^[9];在绿色创新领域,高管绿色认知不仅能够提升企业实质性 with 策略性绿色创新水平,且对后者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10],还能通过缓解管理短视、吸引绿色投资者^[11]以及提升ESG绩效^[12]等路径,为绿色技术创新注入动力。而在企业绿色实践方面,高管绿色认知能促进绿色管理创新,进而有效缓解“漂绿”行为,尤其在董事长与总经理角色分离的治理结构下,该抑制效果更为突出^[13]。此外,在全球价值链层面,已有研究证实高管绿色意识能推动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绿色升级,从而助力企业更高效地实现绿色升级,提升在全球贸易中

作者简介: 张育卿(2002—),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绿色经济发展。

通讯作者: 张育卿

的可持续竞争力^[14]。

综上所述, 现有研究从多方面揭示了高管绿色认知的经济后果, 但学术界对高管绿色认知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化转型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探讨。本文将深入剖析两者关系, 旨在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微观实证依据, 为企业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参考。

(二) 企业绿色化转型的影响因素

企业绿色化转型是指企业通过调整战略、技术和管理模式, 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共进的系统性变革过程^[15]。这一过程涉及企业从产品设计、生产工艺、供应链管理到市场营销等各个环节的绿色化变革, 旨在减少企业运营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绿色转型是指将传统生产和运营模式转变为可持续生产的过程, 其特点是大量投资、重大创新风险和固有的不确定性^[16]。

企业绿色转型受内外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外部因素涵盖绿色工厂认证政策、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环境治理等多个关键方面。其中绿色工厂认证政策在企业绿色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它不仅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还能激发企业内部绿色创新活力, 同时吸引绿色投资者的目光以及媒体的关注, 这些积极影响共同推动企业加快绿色转型进程^[17]; 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 其发展能够刺激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 并且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为企业绿色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持^[18]; 而数字环境治理则是通过强化环境监管力度进而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但该效应会受到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19]。从企业内部来看, 董事会性别多元化、数实融合和连锁股东等均对绿色转型影响显著。具体地, 董事会性别多元化能够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从而有效减少企业污染排放, 提升环境表现, 助力企业实现绿色转型^[20]; 数智融合则通过提升高管绿色认知、激发绿色创新, 为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注入动力^[21]; 连锁股东凭借其独特地位, 发挥其在信息、资源和治理方面的优势, 从而推动企业绿色化转型^[22]。尽管目前学术界对绿色化转型的各类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但现有研究未涉及高管绿色认知这一关键内部因素。高管在企业决策、资源分配和战略规划中占据核心地位, 其绿色认知可能从根本上影响企业绿色化转型的战略制定与执行。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 深入探究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绿色化转型的影响机制, 这对完善企业绿色转型理论、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绿色化转型的直接影响

高阶理论认为, 组织的战略选择和绩效很大程度上受高层管理者特征的影响^[23]。高管作为企业决策核心, 其价值观和认知基础决定了他们对企业目标的设定和战略方向的选择。具有较高绿色认知的高管, 能够更加敏锐地洞察到环境问题带来的挑战和机遇^[24], 并深刻认识到绿色化转型对于企业长期发展的战略意义。他们更有可能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企业的战略规划中, 积极推动企业采取绿色化转型措施。

一方面, 高管绿色认知能够促使企业重新审视自身的发展战略, 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纳入企业的核心目标。在制定战略时, 高管会更加注重企业的环境责任和社会形象, 主动寻求与环境友好的发展路径, 推动企业向绿色化方向转型。例如, 高管可能会决定加大对绿色产品研发和生产的投入, 开拓绿色市场, 以满足消费者对环保产品的需求, 提升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 高管绿色认知还能够为企业绿色化转型提供内部支持和动力。高管可以利用其领导地位和决策权, 引导企业内部形成绿色文化, 激励员工积极参与绿色化转型。他们可以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 鼓励员工提出绿色创新建议, 推动企业在各个层面实现绿色化变革。同时, 高管还能够协调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 为绿色化转型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基于以上分析,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 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绿色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 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绿色化转型的间接影响

绿色技术创新是以减少环境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目标的技术研发、应用和扩散活动^[25]。它包括开发新的绿色技术、改进现有技术以降低环境影响, 以及将绿色技术应用于生产实践中, 是企业实现绿色化转型的重要技术支撑。而高管的绿色认知是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驱动力。具有较高绿色认知的高管, 更能意识到绿色技术创新对于企业降低环境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增强竞争力的重要性。他们会积极推动企业加大对绿色技术研发的投入, 吸引和培养绿色技术创新人才, 建立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关系, 以获取更多的绿色技术创新资源。此外, 绿色技术创新能够为企业绿色化转型提供技术支持。通过研发和应用绿色技术, 企业可以改进生产工艺, 降低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 提高产品的绿色性能。例如, 企业可以采用新能源技术替代传统的化石能源, 减少碳排放; 应用节能减排技术, 降低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 开发资源循环利用技术, 提高资源的利用效

率。这些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能够直接推动企业的绿色化转型，提升企业的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绿色技术创新在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绿色化转型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绿色管理创新是指企业在战略规划、组织架构、生产运营等环节融入绿色理念的管理模式创新^[26]。它包括制定绿色战略、建立绿色管理体系、实施绿色生产和绿色营销等措施，通过优化企业管理流程和制度，推动企业绿色化发展。当企业实施绿色管理创新时，能够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绿色管理体系^[27]，对企业的生产运营过程进行全面的环境管理和监控。高管绿色认知能够引导企业进行绿色管理创新^[28]。具有较高绿色认知的高管，会将绿色理念融入企业的管理体系中，推动企业建立绿色管理战略、绿色组织架构和绿色管理制度^[10]。他们会运用自身的领导权力和影响力，打破企业内部原有的管理模式和思维定式，引导企业进行管理创新变革。在高管的推动下，企业会加大在绿色管理创新方面的资源投入，完善绿色管理体系，加强员工培训，营造良好的绿色创新氛围，从而有效提升企业的绿色管理水平。同时，绿色管理创新能够优化企业的运营流程，提高企业的环境管理水平，推动企业绿色化转型^[29]。通过绿色管理创新，企业能够更好地整合内部资源，优化生产运营流程，提高环境管理效率，进而实现企业的绿色化转型。绿色管理创新使得企业的各项活动更加符合环保要求，降低了企业的环境风险，提高了企业的环境绩效，为企业绿色化转型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绿色管理创新在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绿色化转型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选取 2008-2022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对样本进行如下筛选：（1）鉴于金融行业特殊经营模式与监管要求，将其上市公司予以剔除；（2）排除被标记为 ST、PT 的存在财务异常风险的样本；（3）剔除企业中资产负债率低于 0 或高于 1 的样本；（4）对于关键变量数据缺失，以及样本期内仅出现一期的样本，也一并予以剔除。最终，本文得到 2008-2022 年的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共 41077 个观测值。在数据处理环节，为降低极端值对研究结果的干扰，对连续变量进行了首尾 1% 的缩尾处理。其中，核心变量高管绿色认知与企业绿色化转型的原始数据，均依托 Python 爬虫技术，从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中提取获取；其余变量数据则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变量定义及说明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Green	绿色化转型	绿色化转型词频数经加 1 后取自然对数
解释变量	EGC	高管绿色认知	高管绿色认知词频数经加 1 后取自然对数
	Size	公司规模	年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Lev	资产负债率	年末总负债/年末总资产
	Liquid	流动比率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FIXED	固定资产占比	固定资产净额/总资产
	Loss	是否亏损	当年净利润小于 0 取 1，否则取 0
控制变量	TMTAge	管理层平均年龄	董监高年龄的平均数
	Dual	两职合一	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同一个人 1，否则为 0
	FirmAge	公司成立年限	$\ln(\text{当年年份}-\text{公司成立年份}+1)$
	Opinion	审计意见	若公司当年的财务报告被出具了标准审计意见，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FinBack	董监高是否具有金融背景	现任的董监高中有人具有金融背景，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二）模型设定

为实证检验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绿色化转型的影响，本文构建了模型（1）：

$$Green_{i,t} = \beta_0 + \beta_1 EGC_{i,t} + \beta_2 Controls_{i,t} + Year + Ind + \varepsilon_{i,t} \quad (1)$$

在式（1）中，被解释变量 $Green_{i,t}$ 代表企业 i 第 t 年的绿色化转型程度，核心解释变量 $EGC_{i,t}$ 表示企业 i 第 t 年的高管绿色认知水平， $Controls_{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用于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企业绿色化转型的因素。此外，为消除时间趋势与行业特性对估计结果的干扰，模型中同时引入年份固定效应（ $Year$ ）和行业固定效应（ Ind ）。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2呈现了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绿色化转型影响的基准回归分析。在第(1)列模型中,仅纳入行业与年份控制变量后,EGC系数为0.487,且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进一步地,第(2)列在原有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此时EGC系数为0.472,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进一步证明高管绿色认知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驱动企业绿色化转型进程,验证了假设1。

表2 高管绿色认知与企业绿色化转型

	(1) Green	(2) green
GEC	0.487*** (63.02)	0.472*** (60.73)
size		0.074*** (12.01)
lev		-0.044 (-1.20)
liquid		-0.002 (-1.41)
fixed		0.029 (0.60)
loss		-0.025** (-2.02)
tmtage		-0.006*** (-3.24)
dual		0.022* (1.75)
firmage		-0.090*** (-4.52)
opinion		0.001 (0.03)
finback		-0.001 (-0.05)

(二) 稳健性检验

1.滞后解释变量。由于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绿色化转型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作用,因此本文选取高管绿色认知滞后一期(L.GEC)代替本文的自变量进行回归,表3第(1)列报告了回归结果,通过结果可知L.GEC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绿色化转型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

2.替换模型。为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研究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表3列(3)为面板分位数回归结果,可以看出,GEC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研究结论在不同数据分布特征及模型设定下具有稳定性,进一步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3.改变时间跨度。考虑到2020年新冠疫情可能存在潜在干扰,故将2020-2022年数据予以剔除,基于2008-2019年样本重新对模型进行估计。从表3第(5)列回归结果来看,调整时间跨度后,GEC的回归系数不仅保持正向,且在统计上显著,这与主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高度契合,有效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与说服力。

表 3 稳健性检验

	(1)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2) 面板分位数回归	(3) 剔除 2020 年及之后年份
L1.GEC	0.366*** (45.27)		
GEC		0.473*** (64.12)	0.505*** (58.67)

(三) 机制分析

1.绿色技术创新。本研究借鉴已有的研究方法^[30-31]，采用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加 1 后取自然对数作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GTI）的度量指标。表 4 第（1）、（2）列报告了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结果表明，EGC 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符号为正，这意味着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第（2）列回归结果说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高管绿色认知影响企业绿色化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也就是说，高管绿色认知能够激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力，进而为企业绿色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假设 2 得以验证。

2.绿色管理创新。本研究参考席龙胜和赵辉（2022）^[32]的研究框架，从五个维度构建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评价体系，作为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代理变量（GMI）。分析表 4 第（3）、（4）列的回归结果发现，EGC 和 GMI 的系数均呈现显著的正向特征，说明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绿色管理创新能力的显著促进作用，且中介效应检验也通过显著性标准。这意味着高管绿色认知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绿色管理创新水平，进而推动企业实现绿色化转型，假设 3 得以验证。

表 4 机制检验结果

	(1) 绿色技术创新	(2) Green	(3) 绿色管理创新	(4) Green
变量	GTI	Green	GMI	Green
EGC	0.043*** (78.62)	0.042*** (77.18)	0.043*** (78.62)	0.041*** (75.89)
GTI		0.118*** (23.70)		
GMI				0.130*** (41.33)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结论

本文选取 2008-2022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深入探究了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绿色化转型的影响。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高管绿色认知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推动企业绿色化转型。第二，机制检验显示，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在高管绿色认知与企业绿色化转型之间存在中介效应。这表明高管绿色认知不仅直接驱动转型，还通过“技术-管理”双轮驱动机制间接促进转型，二者共同构成企业绿色化转型的核心动能。

(二) 政策建议

第一，强化高管绿色认知培育与激励机制。政府部门可通过制定高管环保培训制度、将绿色绩效纳入企业高管考核体系，推动形成“绿色认知-决策执行”的正向循环，对通过绿色管理认证的企业高管给予税收减免或荣誉奖励，提升其绿色战略意愿。同时，董事会应设立环境治理专门委员会，定期组织高管参与绿色转型研讨会，引入外部专家提供可持续发展战略咨询，将绿色认知纳入高管选拔与晋升的评估指标。

第二，双轮驱动技术与管理创新协同发展。政府可设立绿色技术研发专项基金，对企业的清洁生产技术、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给予补贴；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共建绿色技术创新联盟，加速技术转化与应用。此外，还要完善绿色管理体系建设，通过推广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绿色供应链管理等成熟模式，引导企业建立覆盖

全流程的环境管理制度。例如,在建筑、制造等行业推行“绿色施工标准”“循环生产模式”,通过管理创新降低单位产值能耗。

第三,培育绿色文化与市场需求导向。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公益宣传、绿色产品认证标识等方式,提升公众对绿色产品的认知度与支付意愿,形成“绿色消费-企业转型”的市场驱动机制。例如,在电商平台设立“绿色产品专区”,对通过环保认证的商品给予流量扶持。与此同时,还应定期评选“绿色管理创新示范企业”,推广其在高管认知培育、技术管理协同创新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并通过行业峰会、案例白皮书等形式扩大影响力。

参考文献:

- [1] 罗韵轩,周敏.漂绿行为、企业声誉与企业价值——基于我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商业会计,2024,(18):53-61.
- [2] 王馨,王营.绿色信贷政策增进绿色创新研究[J].管理世界,2021,37(06):173-188+11.
- [3] 许晖,王泽鹏,刘田田,等.数据驱动下高污染制造企业的绿色转型机制研究——基于新天钢的探索性案例分析[J].管理学报,2023,20(12):1750-1761.
- [4] 陈树广,刘宇轩,王贝.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机制与空间溢出效应[J/OL].统计与决策,2025,(08):107-112.
- [5] 郭晓旭,张尧.“环保费改税”政策发挥了信号传递效应吗?——来自企业绿色治理的证据[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4,44(05):79-94.
- [6] 陈泽文,陈丹.新旧动能转换的环境不确定性背景下高管环保意识风格如何提升企业绩效——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9,40(10):113-128.
- [7] 李亚兵,夏月,赵振.高管绿色认知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3,40(07):113-123.
- [8] 张巍,徐可欣,李丹妮.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研究[J/OL].西安理工大学学报,1-17.
- [9] 董延安,展嘉宜,彭影.高管绿色认知对ESG评级分歧的影响研究[J/OL].贵州财经大学学报,1-12.
- [10] 宋敬,陈志斌,王龙梅.恰到好处还是过犹不及?——高管绿色认知如何赋能企业绿色创新[J].当代会计评论,2023,16(04):45-69.
- [11] Liu Y, Chen Y. Executives' green cognition and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J].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 Business Excellence, 2024, 35(9-10):23.
- [12] Wu L, Wang C, Ren H, Zhang W. How does executive green cognition affect enterpris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SG performance. Heliyon. 2024 Jul 8;10(14):e34287.
- [13] Hao XL, Miao EX, Wen SF, et al. Executive Green Cognition on Corporate Greenwashing Behavior: Evidence From A - 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J].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25, 34 (2): 2012 - 2034.
- [14] Huang, X. B., & Xie, J. W. (2025). Sustainability of Global Trade: The Impact of Executive Green Awareness on the Global Green Value Chain of Enterprises. [J]. Sustainability, 2025, 17 (4): 1510.
- [15] 冯帆,马皓巍.政府环境审计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化转型——基于创新补偿视角[J].现代经济探讨,2025,(04):81-91.
- [16] Li, Z.; Zhou, Q. Does Corporate Behavior Related to the Overseas Market Promote Enterprises' Green Transformation?—Evidence from China. Sustainability 2024, 16, 4362.
- [17] Nie S, Wang G.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Led Green Certification on Enterprise Green Transformation — Evidence from Green Factory Recognition. Sustainability. 2025; 17(5):2271.
- [18] Guo, B.; Hu, P.; Lin, J. The effec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n enterprise green transformation. Int. Rev. Financ. Anal. 2024, 92, 103085.
- [19] Zhao X, Zhang S, Lu F. The Impact of Digit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n Green Transformation: Theoretical Mechanism and Empirical Test from China. Sustainability. 2025; 17(1):157.
- [20] 姜富伟,张杉,丁慧,等.董事会性别多元化、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绿色转型[J].金融评论,2024,16(02):75-96+156-157.
- [21] 邝嫦娥,刘江月,李文意.数智融合赋能与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J].当代财经,2024,(05):114-127.
- [22] 郑伟,李雅晴,刘羽,等.连锁股东与企业绿色转型:推动抑或阻碍? [J].财务研究,2024,(06):55-68.
- [23] Hambrick D C, Mason P A.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 9 (2) : 193-206.

- [24] 邢丽云,俞会新.绿色动态能力对企业环境创新的影响研究——环境规制和高管环保认知的调节作用[J].软科学,2020,34(06):26-32.
- [25] 史丹,张瑾,史可寒,等.新型工业化的典型特征及其对能源消费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5,35(01):1-16.
- [26] 高蔚然.新任 CEO 职业忧虑会加剧企业“漂绿”行为吗?[J/OL].科技进步与对策,1-12.
- [27] 齐丽云,王佳威,刘旸,等.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影响研究[J].科研管理,2023,44(04):175-184.
- [28] 白福萍,黄宇杰,王京,等.入芝兰之室:企业绿色文化与绿色创新[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5,47(01):137-152.
- [29] YANG Y, NIE P, HUANG J. The optimal strategies for clean technology to advance green transition[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20, 716(18): 134439.
- [30] 马永强,赵良凯,杨华悦,等.空气污染与业绿色创新——基于我国重污染行业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产业经济研究,2021,(06):116-128.
- [31] 岳宇君,柏玉馨.金融科技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基于沪深 A 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6(05):175-190.
- [32] 席龙胜,赵辉.高管二元环保认知、绿色创新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J].经济管理,2022,44(03):139-158.

The Impact of Senior Executives' Green Awareness on Corporate Green Transformation

Yuqing Zhang¹

¹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 efforts to actively combat climate change and vigorously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rporate greening has emerged as a pivotal pathway for achieving coordinated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progress. Drawing upon data from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spanning 2008 to 2022, this study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executive green cognition on corporate greening initiatives. Findings reveal that executive green cogni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s corporate green transformation, with this conclusion remaining robust after a series of stability tests.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green management innovation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ecutive green cognition and corporate green transformation. This study enriches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corporate green transformation, providing valuable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s for corporate managers and policymakers.

Keywords: Green Awareness Among Senior Executives; Corporate Green Transformation;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reen Management Innovation

快速交通影响下的旅游景区可达性研究 ——以安徽省为例

郭苑

(广西大学, 广西 南宁 530004)

摘要: 景区可达性对区域旅游业的空间布局及未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为探究快速交通网络对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格局演变的驱动作用, 本文以安徽省 4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为例, 运用 ArcGIS 的网络分析与空间分析工具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比引入快速交通前后的平均通行时间与可达性系数, 定量评估了景区可达性的变化特征与空间演变规律。研究表明, 快速交通网络显著提升了旅游景区的整体可达性水平, 且空间圈层结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关键词: 快速交通; 旅游景区; 可达性; 空间格局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364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大众休闲需求的提升, 旅游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部分资源型城市(如黄山市)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于旅游产业。快速交通(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的普及显著提升了客源地与景区间的空间联系, 对旅游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交通便捷度不仅是游客出行选择的重要考量, 更是决定景区市场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可达性的含义非常广泛, 有时空意义上的可达性, 也有社会学、心理学意义上的可达性。作为城市交通网合理性、运输效率的评价指标, 我们主要考虑时空意义上的可达性^[1]。它反映了交通节点间相互作用的机会大小。因此, 探究快速交通对景区可达性空间格局的影响, 对区域旅游开发与空间科学布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 研究进展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交通可达性开展了广泛研究。国外研究起步较早, 重点关注高等级公路网络体系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国内研究近年来发展迅速, 侧重于不同交通方式对特定区域或特定类型景区可达性及空间结构的影响, 方法体系日益丰富。鉴于此, 本文汲取现有研究经验, 聚焦安徽省, 定量分析快速交通对其旅游景区可达性格局的重塑效应。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安徽省地处我国中部, 地形呈现北平南险的特征, 山地旅游资源极为丰富。近年来, 全省旅游市场实现跨越式增长, 截至 2025 年底, 全省接待游客规模已突破 9.1 亿人次, 旅游总收入正式跨入万亿级台阶, 成为支撑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快速交通建设方面, 安徽省展现出显著的先发优势, 截至 2025 年底, 全省高铁营业里程达 2900 多公里, 稳居长三角第一位; 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 7000 公里, 实现了从县县通到县城通的高水平覆盖。以合肥为中心的“米”字型高铁网与高密度公路网深度耦合, 为区域旅游可达性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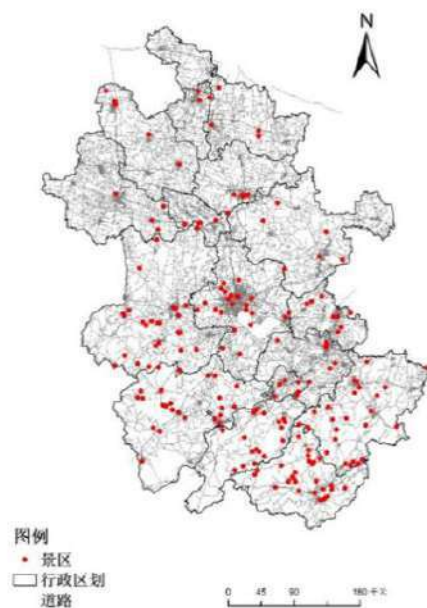


图1 安徽省旅游景区与公路交通网络

地图来源：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安徽省标准地图服务

2.3 可达性测算模型

空间可达性作为测定空间距离的一项有效的综合性指标，它是指利用特定的交通系统从某一区位到达指定活动区位的便捷程度^[2]。可达性的计算方法有多种，常用的有缓冲区分析法、最小距离法、旅行成本法和吸引力指数法等^{[3][4][5]}。国内对可达性的相关研究也较为丰富，已形成相对完整的研究体系^{[6][7]}。

本文通过 ArcGIS 软件测算地级市到景区的最短通行时间，并构建出平均通行时间与可达性系数模型。相关计算公式如下：

$$A_i = \frac{\min \sum_{j=1}^n T_{ij}}{n}$$

$$A'_i = \frac{a_{ij} A_i}{\sum_{j=1}^n a_{ij}}$$

上式中， A_i 表示旅游景区的平均通行时间， T_{ij} 表示某地级市 j 到旅游景区 i 的最短通行时间，即游客从所在地到达景区所需的平均最短时间。在本篇论文中 j 代表安徽省内16个地级市。 A'_i 代表景区的可达性系数， a_{ij} 为表征区域经济水平的权重系数，本文采用各地级市GDP进行赋值。在网络分析赋值阶段，对不同等级道路设定差异化行车速度（如高铁250km/h、高速100km/h等），以确保测算精度。

3 空间格局与可达性演变分析

3.1 空间分布特征

安徽省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与集聚特征。从整体格局来看，全省高等级旅游景区（4A及以上）的分布重心明显偏向中南部，呈现出南密北疏、局部团聚的非均衡态势。皖南山区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与深厚的徽州文化底蕴，形成了以黄山、池州、宣城为核心的高密度资源富集区。该区域内，自然山水型与历史人文型景区交织共生，构成了全省旅游产业的核心极核。相比之下，皖北平原地区受制于地形地貌的单一性，高等级旅游景区相对匮乏，景区分布较为零散，尚未形成具有强辐射效应的连片旅游区。

与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格局不同，安徽省的高速路网及快速交通体系表现出强烈的核心-边缘与北密南疏特征。受地形建设成本及区域经济能级的影响，全省的交通基础设施高度向江淮之间及沿江平原地区倾斜。合肥作为省会及区域交通枢纽，其周边的路网密度达到峰值，形成了向外辐射的“米”字型密集路网骨架。皖北地区依托广阔的平原地形，公路网络纵横交错，连通度极高。然而，在旅游资源最为密集的皖南及皖西大别山区，由于山地地形复杂、地势起伏剧烈，交通主干线的建设受到较大制约，路网密度显著降低，形成了明显的交通洼地。

综合对比两者的空间特征，安徽省呈现出鲜明的交通-旅游资源空间错位现象。即交通网络的高密度区（中北部）缺乏世界级旅游吸引物，而旅游资源的高密度区（南部）则面临相对明显的交通进入性瓶颈。这种空间配置的不对称性，构成了本研究探讨快速交通网络介入对重塑全省旅游可达性格局、促进区域旅游均衡发展的重要现实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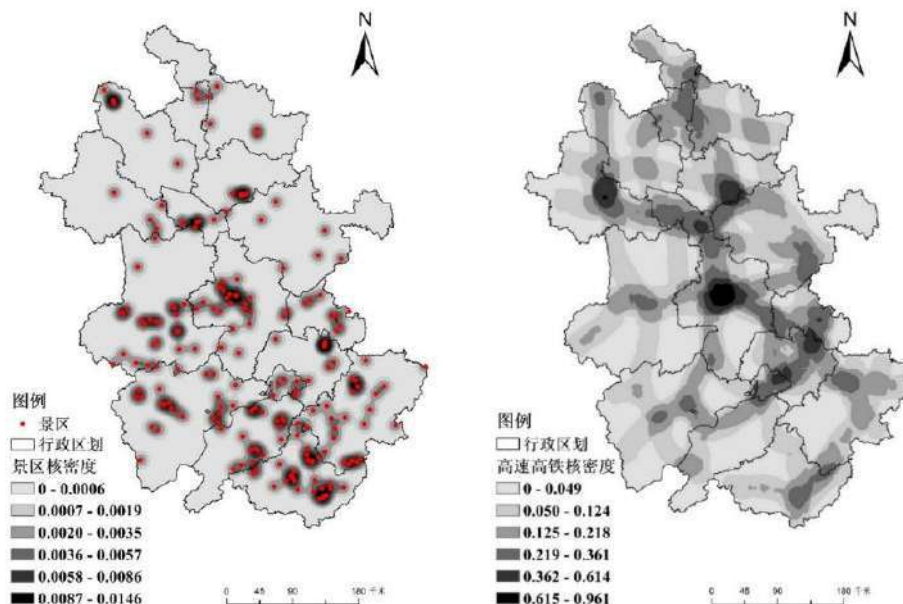


图 2 旅游景区核密度分析 图 3 快速交通（高速、高铁）核密度分析

地图来源：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安徽省标准地图服务

3.2 平均通行时间演变

快速交通网络的介入对安徽省旅游景区产生了剧烈的时空压缩效应，显著重塑了全省的可达性版图。在无快速交通的情境下，全省旅游景区的平均通行时间空间差异极大，表现出以合肥为单一核心向外周递增的同心圆状结构。此时，高通达度区域极度萎缩，仅局限于江淮之间的核心地带；而广大的皖南山区、皖西大别山区以及皖北边缘地区均处于深红色的高时耗区间，平均通行时间普遍超过 4 小时，地理阻隔成为制约这些区域资源转化的主要瓶颈。

随着快速交通网络的全面覆盖，全省景区的可达性空间格局实现了从单核制约向多中心轴向扩散的实质性跨越。从等值线的演变趋势看，原有的规整同心圆结构被打破，低时耗区（冷色调区域）沿着高速铁路与高速公路干线呈现出显著的星芒状延伸。合肥作为交通枢纽的辐射半径大幅扩张，并与芜湖、马鞍山、滁州等市的低值区连通成片，在省内中东部构建起了一个广阔的一小时旅游交通圈。

值得注意的是，快速交通对边缘落后地区展现出了极强的通达性补偿功能。对比图 4、图 5 可以发现，原本处于时空边缘的皖南和皖北地区，其通行时间等值线变得稀疏，高值区覆盖范围大幅消退，空间阻力梯度显著平缓。这种演变不仅缩短了游客的在途时间，更在逻辑上模糊了传统地理上的核心与边缘界限。通过快速交通对时空距离的折叠，原本偏远的高品质景区得以进入大众市场的有效半径内，为全省旅游经济的均衡化发展与空间整合提供了根本性的技术支撑。

4 结论与优化建议

4.1 研究结论

4.1.1 快速交通引致的时空压缩效应显著

研究表明，随着安徽省 2025 年“米”字型高铁网与县县通高速网的高水平覆盖，全省旅游景区的时空距离被极大地压缩。平均通行时间从 2019 年的 2.42 小时降至 2025 年的 1.56 小时，下降幅度达 35.5%。这种时空压缩效应不仅提升了单个景区的通达度，更从根本上改变了游客的出行心理门槛，使得省内一日游和跨市深度游成为常态，为全省旅游收入跨越万亿台阶提供了核心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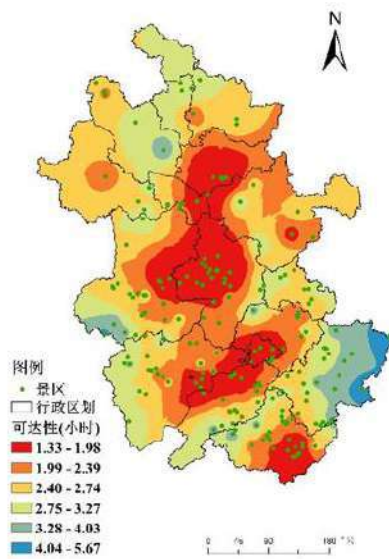


图 4 旅游景区可达性格局
(无快速交通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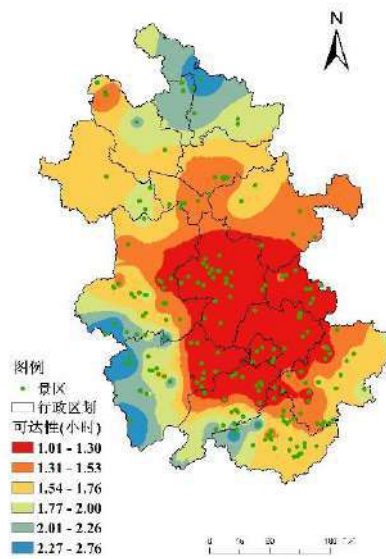


图 5 旅游景区可达性格局
(有快速交通网络)

地图来源：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安徽省标准地图服务

根据下表也可以清楚看到各地级市旅游景区平均通行时间的变化情况。

表 1 各地级市旅游景区平均通行时间

序号	城市	无快速交通网络	有快速交通网络
1	合肥市	1.88705221	1.146635505
2	芜湖市	2.370887238	1.110570901
3	滁州市	2.446761449	1.525000491
4	阜阳市	2.598754003	1.776070209
5	安庆市	2.396910365	1.782590701
6	马鞍山市	2.80717693	1.252469655
7	蚌埠市	1.584404205	1.453702701
8	宿州市	2.578431734	2.159173396
9	六安市	2.517795525	1.694409976
10	亳州市	2.711959106	1.632849126
11	宣城市	3.245751217	1.455802054
12	淮南市	2.073116278	1.475943806
13	铜陵市	1.906108937	1.214497702
14	淮北市	3.123929483	2.248277321
15	池州市	2.223004119	1.421661501
16	黄山市	2.289085182	1.660728343
	平均	2.422570499	1.563148962

4.1.2 空间格局呈现南移与均衡化双重特征

快速交通网络的完善重塑了安徽旅游的空间版图。在空间分布上, 全省可达性中心呈现明显的向南偏移趋势,

皖南山地旅游带从早期的交通末端转变为交通枢纽，极大地释放了黄山、九华山等世界级资源的吸引力。同时，可达性系数的极差显著缩小，高通达度区域由合肥单核向合马芜、皖南、皖北多极演化，区域间的旅游机会差异得到有效平抑，空间均衡化水平大幅提升。

4.1.3 交通可达性与旅游经济增长高度耦合

实证分析显示，景区可达性的提升与当地旅游收入增长、客源结构优化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快速交通通过提升节点景区的通达性，产生了显著的廊道效应与溢出效应，带动了沿线中小景区的联动发展。可达性系数较高的区域，其旅游经济的韧性与资源转化效率明显优于低可达性区域。

4.2 空间布局优化建议

4.2.1 构建一核两翼多集群的空间战略格局

立足全省快速交通路网全面覆盖的新阶段，区域旅游空间布局应顺应通达性演变规律，从传统的点状单极开发向轴辐式网络化布局转变。首先，应强化合肥作为全省旅游集散门户的核心枢纽功能。依托其“米”字型高铁中心与综合交通优势，将合肥打造为跨省及国际客源的第一落地点与中转分流中心。其次，做强南北两翼。南翼以黄山世界级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为战略策源地，借力杭黄、池黄等高铁干线，打破黄山、池州、宣城、安庆的行政边界，深度整合徽州古村落、康养秘境与名山大川资源，构建高能级的山地文旅融合发展带；北翼则依托密集的高速公路网与商合杭高铁，积极承接中原城市群客源，深挖楚汉文化、淮河风情与红色研学资源，培育差异化、主题化的文旅集群，以此实现全省旅游版图的南北联动与优势互补。

4.2.2 完善“高铁+景区”的末端微循环接驳体系

快速交通网络虽有效打通了连接各大地市的交通大动脉，但客运枢纽至景区的最后一公里接驳问题仍是制约旅游资源转化率的核心瓶颈。针对这一痛点，建议在现有快速交通基础上，全面推进运游一体化交融融合服务。重点针对皖南山区、大别山革命老区等地形地貌复杂、景区空间分布较为分散的区域，打破常规大巴公交模式，引入旅游专线微巴士、定制客运以及高铁站无缝落地自驾等多模式联运体系。同时，鼓励在高铁站、高速公路服务区内前置旅游集散与导览功能，最大程度缩减游客在换乘环节的非有效时间耗损，推动区域旅游可达性从城市节点通达向景区实体通达的深度演进。

4.2.3 实施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精准时空营销策略

快速交通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大幅扩展了景区的有效客源半径，这要求旅游营销模式必须从粗放型向精准化转型。建议文旅部门联动铁路、交通运输及大数据运营商，建立动态的游客时空行为画像。一方面，针对高铁3小时交通圈内的高能级客源市场（如长三角核心区、京津冀城市群），精准投放“高铁票+景区门票+酒店”的定制化组合套餐，利用价格杠杆和便利性克服地理空间上的距离衰减效应；另一方面，针对省内及周边省份的庞大高速自驾群体，依托皖南川藏线、大别山国家旅游风景道等特色路网，开发最美风景道及房车露营主题游径。通过精准识别不同交通工具下游客的行为偏好与消费特征，实现旅游资源在时空维度上的科学配置与削峰填谷式的高效营销。

4.2.4 深度融入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协同发展

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国家战略背景下，安徽应将其高铁营业里程长三角第一的物理先发优势，充分转化为区域旅游一体化的势能优势。应主动摒弃传统的单向客源地思维，积极承接上海、南京、杭州等核心城市的文旅

产业转移与消费溢出。具体而言,可联合长三角其他省市共同探索推行长三角旅游一卡通及异地旅游公共服务同城化机制;推动省内知名景区与苏浙沪顶级文旅 IP 建立线路互推、客源互送、节庆互动的深层次协作。通过快速交通廊道的无缝衔接,彻底打破省际旅游的心理边界,将安徽独特的自然生态与在地文化优势,转化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超级休闲后花园,借力交通网络深度嵌入国家级旅游产业大循环。

参考文献:

- [1] 杨涛, 过秀成. 城市交通可达性新概念及其应用研究[J]. 中国公路学报, 1995, (2): 25-30.
- [2] 李平华, 陆玉麒. 可达性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地理科学进展, 2005, 24(3): 69-77.
- [3] Emily Talen. Neighborhoods as service providers: a methodology for evaluating pedestrian access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 2003, 30: 181-200.
- [4] Handy S L, Niemeier D A. Measuring accessibility: an exploration of issues and alternatives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997, 29: 1175-1194.
- [5] Geurs K T, Ritsema van Rck J. Accessibility measures, review and applications [J]. National Institute of Public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2001: 136-144.
- [6] 钟业喜, 刘影, 赖格英. 江西省红色旅游景区可达性分析及空间结构优化研究[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版), 2011, 35(2): 208-212.
- [7] 孙栋, 段文军. 高速公路影响下的广西旅游景区可达性格局研究[J]. 四川旅游学院学报, 2017, 130(3): 74-78

Study on The Accessibility of Tourist Attractio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apid Traffic——A Case study of Anhui Province

Author, Yuan Guo

School of Business,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China

Abstract: The accessibility of tourist attractions exert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spatial layout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tourism. To investigate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rapid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on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study focusing on 4A-level and above tourist attractions in Anhui Province, leveraging the network and spatial analysis tools of ArcGIS 10.5.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verage travel time and accessibility coeffici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apid transportation, this study quantitatively assesses the change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evolution patterns of attraction accessibility.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rapid transportation network ha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overall accessibility level of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narrowed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accessibility, while the spatial concentric structure has maintained a relative degree of stability.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development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spatial optimization of tourist attractions in Anhui are proposed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and strategic reference for regional tourism layout.

Keywords: Rapid Transportation; Tourist Attractions; Accessibility; Spatial Pattern

网络情境中积极情绪对旅游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李季蓉

(广西大学, 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 基于SOR理论, 本文构建了网络情境下积极情绪影响旅游行为的理论模型, 引入在线满意感与信任感为中介, 社交互动强度为调节。通过320份问卷的结构方程分析发现: 网络积极情绪显著提升潜在游客的在线满意感与信任感, 进而促进重游意愿与在线口碑传播; 积极情绪对冲动预订有直接正向影响; 在线满意感与信任感起部分中介作用; 社交互动强度正向调节积极情绪与口碑传播的关系。研究为理解数字旅游情绪传播提供了新视角, 并对目的地与平台营销具有实践启示。

关键词: 网络情境; 积极情绪; 旅游行为; 在线满意感; S-O-R理论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373

1 引言

伴随互联网与移动媒介的普及, 网络平台已成为游客获取旅游信息的重要渠道。在互联网与移动媒介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网络平台已成为游客获取旅游信息和表达旅游体验的重要渠道。游客出行前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等网络平台获取信息, 其分享的积极情绪体验(如开心、惊喜)会引发浏览者共鸣, 影响目的地态度与决策。研究表明, 情绪在消费行为中作用显著[Bigne & Andreu, 2004]^[1], 但现有研究多聚焦实地情境, 对网络情绪机制的探讨有限。周廷封(2025)指出, 新媒体通过沉浸式内容形成“认知—情感—行为”决策闭环, 提示网络情绪传播具有独特效应^[2]。数字化背景下, 网络平台已成旅游决策主阵地。本文基于S-O-R理论, 探究网络积极情绪如何通过在线满意感与信任感影响游客行为, 并分析社交互动强度的调节作用。

2 文献综述与假设

2.1 S-O-R理论

S-O-R理论由Mehrabian与Russell于1974年提出, 旨在阐释环境刺激如何诱发个体行为, 该理论被视为环境心理学的指导性原则^[3]。该理论认为, 外部环境中的刺激(Stimulus)会作用于个体的情绪或认知状态(Organism), 而这些内在状态进而驱动其行为反应(Response), 这一过程既可能是有意识的, 也可能是无意识的^[3]。在消费者行为领域, S-O-R框架已被广泛用于解析多元情境下的决策过程: 刺激可涵盖产品特征、商店氛围、广告信息等外部因素; 有机体则涉及愉悦、唤醒、满意度、信任等心理变量; 反应则表现为接近或规避行为, 如购买意愿、口碑传播、重购意向等。与侧重于认知过程的技术接受模型(TAM)或计划行为理论(TPB)相比, S-O-R模型的一个关键优势在于其整合了情感反应, 能够更深入地捕捉情感投入至至关重要的消费互动情境^[4]。已有研究证实, 在虚拟旅游体验中, 感官质量和信息质量可通过心流体验这一有机体状态影响游客的访问意向^[5]; 亦有纵向研究发现, 刺激因素通过意愿等有机体状态间接影响旅游者的可持续行为^[4]。在网络旅游情境中, 用户浏览的旅游内容、评论、图片及视频等信息可视为典型的外部刺激。这些信息所蕴含的情绪表达可能引发浏览者的情绪共鸣与认知评价, 进而塑造其行为决策。近年来, S-O-R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日益受到关注, 尤其是在数字化和虚拟现实旅游等新兴领域, 该理论为理解技术环境下的游客行为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6]。借鉴S-O-R理论的基本逻辑, 本文构建了积极情绪影响旅游行为的理论模型: 将网络情境中的积极情绪作为刺激变量(S), 将在线满意感和信任感作为有机体状态(O), 将重游意愿、在线口碑传播行为和冲动预订行为作为行为反应(R), 以系统揭示情绪在数字化旅游环境中的传导路径。

2.2 研究假设

作者简介: 李季蓉(1994—), 女, 硕士, 旅游目的地与跨境合作

2.2.1 积极情绪与在线满意感、信任感

在网络旅游情境中,浏览他人分享的积极旅游体验会使潜在游客产生替代性的愉悦感受。这种情绪体验会影响其对信息内容的评价,使个体更容易产生正面评价和满意度。同时,愉悦的情绪会降低个体的防御性认知加工,从而增强对信息内容的信任感 (Isen, 2001) [7]。因此,本文提出:

H1: 网络情境中的积极情绪正向影响在线满意感

H2: 网络情境中的积极情绪正向影响信任感

2.2.2 在线满意感、信任感与旅游行为

在线满意感是指潜在游客对浏览旅游信息这一过程的主观评价和情感反应。当个体获得满足感时,更可能对目的地形成积极态度,从而增强重游意愿。同样,对网络信息内容的信任感会提升信息的说服效果,促使个体将信息内化为自己的态度和意向,并可能主动分享信息,形成在线口碑传播行为 (Hallak et al., 2017) [8]。因此,本文提出:

H3: 在线满意感正向影响重游意愿

H4: 在线满意感正向影响在线口碑传播行为

H5: 信任感正向影响重游意愿

H6: 信任感正向影响在线口碑传播行为

2.2.3 积极情绪与冲动预订行为

冲动预订行为是指潜在游客在浏览旅游信息后产生的非计划性、缺乏深思熟虑的预订决策。积极情绪可能会降低个体的认知控制,增强其行动倾向,从而直接触发冲动预订行为 (吕兴洋等, 2025; Zhang et al., 2025) [9][10]。这种影响可能不通过满意感和信任感的中介,而是一种更为直接的情绪驱动反应。因此,本文提出:

H7: 网络情境中的积极情绪正向影响冲动预订行为

2.2.4 在线满意感与信任感的中介作用

基于 S-O-R 理论,外部刺激(积极情绪)对行为反应(旅游行为)的影响可能部分通过有机体状态(在线满意感、信任感)的中介作用实现,即积极情绪通过提升浏览过程中的满意感和对信息的信任感,间接增强旅游行为意向 (Japutra, 2020) [11]。因此,本文提出:

H8: 在线满意感在积极情绪与旅游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H9: 信任感在积极情绪与旅游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2.2.5 社交互动强度的调节作用

社交互动强度是指用户在网络平台上与他人进行评论、点赞、分享等互动的频率和深度。在高互动强度的环境中,情绪内容更容易被传播和放大,浏览者可能通过他人反馈强化自身情绪体验,从而增强积极情绪向口碑传播行为的转化 (Zhang et al., 2025) [10]。据此,本文提出:

H10: 社交互动强度在积极情绪与在线口碑传播行为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即互动强度越高,积极情绪对口碑传播的影响越强。

综上,基于 S-O-R 理论,本文构建网络情境中积极情绪影响旅游行为的研究模型。其中,积极情绪作为刺激变量 (S),在线满意感与信任感作为有机体变量 (O),重游意愿、在线口碑传播行为和冲动预订行为作为行为反应 (R)。同时,社交互动强度作为调节变量,用于检验其在积极情绪与在线口碑传播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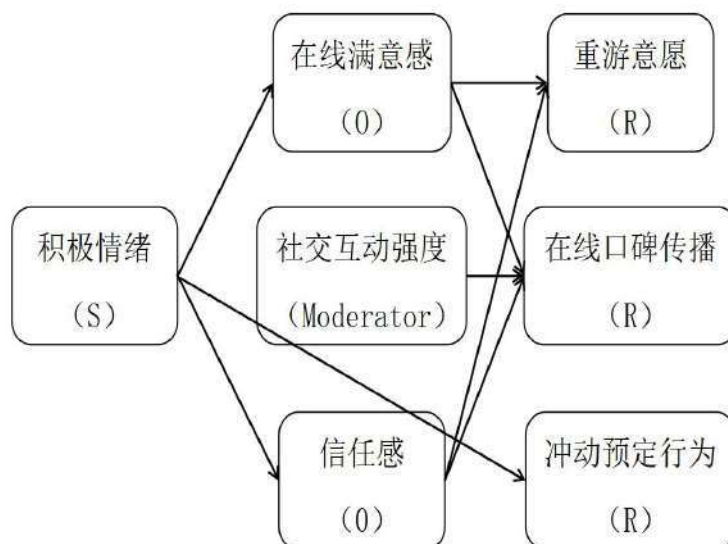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模型图

3 研究方法

3.1 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研究对象为曾通过网络平台（如小红书、抖音、携程、马蜂窝等）获取旅游信息的潜在游客。问卷通过问卷星平台在旅游社群、社交媒体等渠道线上发放，数据收集时间为 2024 年 10 月至 11 月。共回收问卷 350 份，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样本 320 份，有效回收率为 91.4%。样本构成方面，男性占 46.3%，女性占 53.7%；18-35 岁青年群体占比 78.1%；本科/大专学历占比 65.6%。

3.2 变量测量

本研究所用量表均在参考成熟量表的基础上，结合网络旅游情境进行适当调整。所有题项均采用 Likert 五点量表进行评分（1 表示“非常不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其中，积极情绪的测量参考 Hosany 与 Gilbert (2010)^[12]的研究，包含 4 个题项，示例条目如“浏览他人分享的旅游内容让我感到愉快”“这些内容让我产生兴奋的感觉”。在线满意感参考 Bigne 与 Andreu (2004)^[1]的研究，包含 3 个题项，如“我对浏览这些旅游信息的过程感到满意”。信任感参考 Kim 与 Kim (2019)^[13]的研究，包含 3 个题项，如“我相信这些旅游内容是真实的”。重游意愿参考 Hosany 与 Prayag (2013)^[14]的研究，包含 3 个题项，如“我将来会考虑去这些地方旅游”。在线口碑传播行为参考 González-Rodríguez 等 (2020)^[15]的研究，包含 3 个题项，如“我愿意将这些旅游内容分享给朋友”。冲动预订行为参考吕兴洋等 (2025)^[9]的研究，包含 3 个题项，如“浏览后我有时会冲动地想去预订”。社交互动强度参考 Zhang 等 (2025)^[10]的研究，包含 3 个题项，如“我经常在旅游内容下方评论”。所有量表在正式分析前均经过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具有良好的测量质量。

3.3 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 SPSS 26.0 进行描述性统计和信度分析，采用 AMOS 24.0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中介效应检验采用 Bootstrap 方法，重复抽样 5000 次计算置信区间 (Cheung & Lau, 2008)^[16]。调节效应检验采用分层回归分析。

4 实证结果

4.1 信度与效度检验

信度分析结果显示，各变量的 Cronbach's α 系数介于 0.812 至 0.887 之间，组合信度 (CR) 介于 0.826 至 0.891 之间，均高于推荐标准，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测量模型的拟合指数 ($\chi^2/df=2.134$, GFI=0.912, CFI=0.938, TLI=0.929, RMSEA=0.052) 均处于可接受范围内 (Hu & Bentler,

1999) [17], 说明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各变量的平均方差提取量 (AVE) 介于 0.612 至 0.703 之间, 均高于 0.5, 且各变量 AVE 的平方根大于其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 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

表 1 信度与收敛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题项数	Cronbach's α	CR	AVE
积极情绪	4	0.887	0.891	0.672
在线满意感	3	0.846	0.859	0.671
信任感	3	0.832	0.847	0.649
重游意愿	3	0.865	0.872	0.694
在线口碑传播	3	0.848	0.861	0.675
冲动预定行为	3	0.812	0.826	0.612
社交互动强度	3	0.835	0.849	0.653

4.2 假设检验

表 2 结构模型路径检验结果

假设	路径	β	p 值	结果
H1	积极情绪→在线满意感	0.524	<0.001	支持
H2	积极情绪→信任感	0.487	<0.001	支持
H3	在线满意感→重游意愿	0.396	<0.001	支持
H4	在线满意感→在线口碑传播	0.352	<0.001	支持
H5	信任感→重游意愿	0.308	<0.001	支持
H6	信任感→在线口碑传播	0.291	<0.001	支持
H7	积极情绪→冲动消费	0.327	<0.001	支持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 各路径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 研究假设 H1—H7 均得到支持。

4.3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 Bootstrap 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结果如表 3 所示。所有间接效应的 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 表明中介效应显著。同时, 在控制中介变量后, 积极情绪对重游意愿和口碑传播行为的直接效应仍然显著, 表明在线满意感和信任感发挥部分中介作用。H8 和 H9 得到支持。

表 3 中介效应 Bootstrap 检验结果

路径	效应值	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积极情绪→在线满意感→重游意愿	0.208	0.042	[0.131, 0.295]
积极情绪→在线满意感→口碑传播	0.184	0.038	[0.115, 0.266]
积极情绪→信任感→重游意愿	0.150	0.035	[0.089, 0.226]
积极情绪→信任感→口碑传播	0.142	0.033	[0.083, 0.214]

4.4 调节效应检验

表 4 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β	p 值
积极情绪	0.364	<0.001
社交互动强度	0.217	<0.01
积极情绪×社交互动强度	0.186	<0.01

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积极情绪与社交互动强度的交互项对在线口碑传播行为的回归系数显著 ($\beta=0.186$, $p<0.01$), 且 ΔR^2 为 0.027 ($p<0.01$), 表明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简单斜率分析表明, 在高社交互动强度组, 积极情绪对口碑传播的影响 ($\beta=0.483$, $p<0.001$) 强于低社交互动强度组 ($\beta=0.291$, $p<0.001$)。因此, H10

得到支持。

5 讨论

5.1 研究发现的解释

本研究发现,网络情境中的积极情绪能够显著提升游客的在线满意感与信任感,印证了情绪一致性效应(Isen, 2001)^[7]。在线满意感和信任感进一步促进重游意愿和口碑传播行为,揭示了情绪通过改变个体的认知评价来间接影响行为的内在机制,这与 Hosany 与 Prayag (2013)^[15]的研究结论相呼应。值得注意的是,积极情绪对冲动预订行为具有直接影响,该路径不通过满意感和信任感的中介。这表明冲动预订行为更多依赖于情绪驱动的启发式决策,而非基于认知评价的理性决策,与吕兴洋等(2025)^[9]关于冲动性旅游决策模型的研究发现一致。社交互动强度的正向调节效应表明,网络平台的互动功能能够强化情绪传播效果,当用户通过评论、点赞等方式参与互动时,情绪体验得到强化,从而增强向口碑传播行为的转化。这与 Zhang 等(2025)^[10]关于关系强度调节作用的研究结论相契合。此外,本研究基于 S-O-R 理论构建的分析框架得到了实证支持,说明该理论在解释旅游情境中的情绪影响机制方面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5.2 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将 S-O-R 理论拓展至网络旅游情境,构建了“积极情绪—在线满意感/信任感—旅游行为”的解释框架,揭示了情绪影响旅游行为的中介和调节机制,响应了周廷封(2025)^[2]关于新媒体环境下“认知—情感—行为”决策闭环的理论构想。

在实践层面,本研究为旅游营销者提供了参考。首先,应重视内容中的情绪表达,制作能引发积极情绪体验的内容。其次,平台应优化互动功能设计,鼓励用户互动以强化情绪传播效果。再次,管理者应关注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度,避免损害用户信任(Kim & Kim, 2019)^[13]。

6. 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 S-O-R 理论探讨了网络情境中积极情绪对旅游行为的影响机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网络情境中的积极情绪能显著提升游客的在线满意感与信任感;第二,在线满意感与信任感进一步促进重游意愿和在线口碑传播行为;第三,积极情绪对冲动预订行为具有直接影响;第四,在线满意感与信任感在积极情绪与旅游行为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第五,社交互动强度正向调节积极情绪与口碑传播行为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样本以年轻用户为主,未来研究可扩大样本范围。其次,本研究采用横截面数据,无法严格推断因果关系,未来可采用实验法或纵向研究(Kaur et al., 2024)^[18]。再次,本研究聚焦于积极情绪,未来可同时考察消极情绪的作用进行对比分析。最后,不同网络平台的特征可能影响情绪传播效果,未来可进行多平台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 [1] Bigne J E, Andreu L. Emotions in segmentation: An empirical study[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4, 31(3): 682-696.
- [2] 周廷封. 新媒体对旅游意愿的影响: 机制、挑战和优化路径[J]. *当代旅游*, 2025(6).
- [3] Hochreiter V, Benedetto C, Loesch M. The 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SOR) paradigm as a guiding principle in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comparison of its usage in consumer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 theory[C]//Global Business Conference 2022 Proceedings. 2022, 42.
- [4] Erensoy A, Mathrani A, Schnack A, et al. Consumer behavior in immersive virtual reality retail environment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using the stimuli - organisms - responses (S - O - r) model[J]. *Journal of Consumer Behaviour*, 2024, 23(6): 2781-2811.
- [5] Kim M J, Lee C K, Jung T. Exploring consumer behavior in virtual reality tourism using an extended 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model[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20, 59(1): 69-89.
- [6] Saliha Ç. The Application of SOR Theory in Tourism Research: Mapping WOS Data-Based Research[J]. *Prace i Studia Geograficzne*, 2025, 70(3): 21-36.
- [7] Isen A M. An influence of positive affect on decision making in complex situations: Theoretical issues with

practical implications[J].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001, 11(2): 75-85.

[8] Hallak R, Assaker G, El-Haddad R. Re-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erceived quality, value, satisfaction, and destination loyalty[J]. *Journal of Vacation Marketing*, 2017, 24(2): 118-135.

[9] 吕兴洋,袁子昕,韩小云,等.从诱发到行动: 一个新的冲动性旅游决策模型[J].*旅游学刊*,2025,40(06):13-27.

[10] Zhang Y, Li X, Wang C. How tie strength and face consciousness moderate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on impulsive travel intentions: a social-technical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Technology*, 2025, 16(3): 479-495.

[11] Japutra A. The relations among attachment styles, destination attachment and destination satisfaction[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20, 23(3): 270-285.

[12] Hosany S, Gilbert D. Measuring tourists' emotional experiences toward hedonic holiday destinations[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0, 49(4): 513-526.

[13] Kim M, Kim J. The influence of authenticity of online reviews on trust formation among travelers[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20, 59(5): 763-776.

[14] Hosany S, Prayag G. Patterns of tourists' emotional responses, satisfaction, and intention to recommend[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3, 66(6): 730-737.

[15] González-Rodríguez M R, Domínguez-Quintero A M, Paddison B.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influence of experience quality on satisfaction: The importance of emotions[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20, 23(22): 2779-2797.

[16] Cheung G W, Lau R S. Testing mediation and suppression effects of latent variables: Bootstrapping wit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J].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2008, 11(2): 296-325.

[17] Hu L T, Bentler P M. Cutoff criteria for fit indexes in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Conventional criteria versus new alternatives[J].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1999, 6(1): 1-55.

[18] Kaur B, Kaur J, Pandey S K, et al. What drives tourists towards sustainable behaviour? A longitudinal study[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24, 29(3): 352-374.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Online Contexts on Tourism Behavior

Li Jirong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SOR)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impact of positive emotions on tourism behavior in a networking context, introducing online satisfaction and trust as mediator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tensity as a moderator. Through structural equation analysis of 320 questionnaires, it is found that online positive emotions significantly enhance potential tourists' online satisfaction and trust, thereby promoting revisit intention and online word-of-mouth (eWOM) communication; positive emotions have a direct positive impact on impulsive booking; online satisfaction and trust play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tensity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emotions and eWOM communication. The resear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digital tourism emotional contagion and offer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destination and platform marketing.

Keywords: Online context; Positive emotions; Tourism behavior; Online satisfaction; S-O-R theory

基于空间可达模型的名人文旅景点 k-近邻聚类算法

周啸¹ 潘娟¹ 赵太萍¹ 田江鹏²

(1.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文化旅游学院, 四川 乐山 614000; 2. 信息工程大学地理空间信息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 在分析问题背景的基础上, 构建了文旅景点和交通枢纽之间的空间可达模型, 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文旅景点 k-近邻空间聚类方法。以四川省内江市及张大千文旅景点为研究对象, 首先采集了市内主要交通枢纽和张大千文旅景点的地理空间数据, 建立了以空间坐标为基础的空间可达模型, 计算张大千文旅景点与交通枢纽之间的空间可达度。在搜索张大千文旅景点与交通枢纽最优空间可达度的基础上建立了空间聚类模型, 确定了各文旅景点与交通枢纽之间的空间关系, 为名人文旅景点推荐服务和旅游决策服务提供了科学量化依据, 同时也为其他旅游城市提供了参照。

关键词: 空间可达模型; 文旅景点; k-近邻聚类; 旅游规划

基金项目: 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资助课题 (四川名人文化旅游空间的模型构建, DFWH2024-012); 乐山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基于“人工智能+文旅”创新融合模式的乐山非遗文化旅游空间决策模型构建, SKL2025B12)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380

一、研究背景

旅游交通是旅游者行前规划的重要决策因素, 是决定出行成本的必要条件。狭义的旅游交通指的是旅游者从旅游客源地出发抵达旅游目的地城市采用的交通方式及其产生的出行成本, 同时也包括从旅游城市内的出发点抵达旅游目的地景点采用的市内交通工具及其产生的出行成本。通常, 旅游者乘坐交通工具前往旅游城市时首先到达城市的重要交通枢纽, 如机场、火车站、高铁站、汽车站、公交枢纽站等, 它们是旅游者到达城市从事旅游活动的首要目的地。旅游者抵达交通枢纽后需换乘市内交通工具前往旅游景点, 从交通枢纽前往旅游景点的过程中, 乘坐的市内交通工具是产生旅游成本的主要因素。本文研究中, 对于某个旅游城市而言, 不讨论旅游客源地到旅游目的地城市之间的旅游交通和成本, 重点讨论旅游者从市内交通枢纽抵达旅游景点的交通方式和成本, 以构建市内旅游景点空间聚类模型, 分析景点基于不同交通枢纽所产生的不同交通成本。郑云扬等^[1]对南昌市内的旅游景点进行了空间可达的特征分析, 重点对景点分布状态进行了论述。黄远君等^[2]在多种交通系统模式下讨论了南宁市内的景点空间可达性, 考虑了不同交通方式下景点空间可达的不同性。李婷等^[3]对影响福州市内景点空间结构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并对福州市景点发展提出了建议。周海涛等^[4]以省域为单位分析了内蒙古红色旅游景点的空间分布特征, 为规划红色旅游线路提供了参考依据。青果等^[5]基于空间句法构建了广西阳朔县旅游景点的空间可达模型。对景点空间可达性研究进行分析可知, 城市景点空间可达性研究主要围绕几个方面进行, 一是研究景点的总体空间可达性, 分析其空间可达特征, 对景点分布状态进行规划分析; 二是研究影响空间可达性的主要因

作者简介: 周 啸 (1986—), 男, 博士后, 教授, 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智慧旅游;

潘 娟 (1986—), 女,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

赵太萍 (1990—), 女,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

田江鹏 (1987—), 男,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地理信息系统

通讯作者: 周啸

素。通过对主要因素的分析做出进一步旅游规划；三是结合交通方式研究景点空间可达性，为旅游部门决策规划提供依据。

分析研究现状可知，现有的景点空间可达分析方法仅从计算空间可达度层面分析景点通达的难易程度，没有深入研究和获取景点之间、景点与交通枢纽之间的空间关系知识，也没有从数据挖掘角度为旅游管理部门和旅游者提供决策依据，复杂的空间可达度数据难以转化成决策知识。因此，景点空间可达度分析还需要融合数据挖掘方法，以深入研究旅游者与景点之间的空间关系规律，获取空间关系知识^[6]。当旅游者从不同交通枢纽所在点位出发点时，市内景点对于交通枢纽而言具有不同空间可达度，将产生不同空间聚类分布状态，导致出行交通成本产生较大差异，这是影响旅游决策的重要知识和依据。

二、研究方法 with 模型构建

以旅游城市四川省内江市及其文旅景点为例，研究目标是构建基于不同交通枢纽可达度的景点空间聚类模型，挖掘不同交通枢纽条件下文旅景点的空间分布规律，为旅游管理部门进行合理交通规划和旅游决策规划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的基本流程为：第一步，确定内江市内主要交通枢纽和文旅景点，获取其基本地理信息数据，如经纬度坐标。第二步，以每个交通枢纽为中心构建交通枢纽与文旅景点之间的空间可达模型，计算文旅景点与交通枢纽之间的空间可达度。第三步，构建以交通枢纽为中心的文旅景点空间聚类模型，分析不同交通枢纽条件下文旅景点的空间聚类特征，获取为旅游管理部门提供决策支持的空间知识。

（一）研究对象及地理信息数据采集

内江市位于四川省东南部，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旅游城市，以张大千文化旅游著称，市内分布着数量众多、规模各异的文旅景点。近年来，内江市交通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市内交通便捷，拥有内江火车站（A1）、内江高铁站（A2）、东兴汽车客运站（A3）等重要交通枢纽，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发达，与周围省市的联系非常密切，为旅游提供了便捷的交通条件^[7]。内江是中国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的故乡，市内以张大千为主题的文旅景点众多，代表性文旅景点有大千园（T1）、内江市文化馆（T2）、东兴区文化馆（T3）、市中区文化馆（T4）、大千广场（T5）、东兴老街（T6）、大佛寺（T7）等。以内江市主要交通枢纽和代表性文旅景点为研究对象，采集研究对象的地理信息数据如表1所示。

表1. 内江市主要交通枢纽和文旅景点地理空间坐标

主要交通枢纽						
A1		A2		A3		
105.037		105.084		105.070		
29.587		29.609		29.603		
T1	T2	T3	T4	T5	T6	T7
105.059	105.051	105.074	105.065	105.071	105.074	105.062
29.593	29.576	29.590	29.579	29.592	29.589	29.583

（二）景点空间可达模型构建

空间可达的概念用于描述空间中的某一点抵达空间中另一点的难易度，通常用空间直线距离或两点间的通路距离表示。两点之间的空间可达度越高，说明两点之间越容易通达，两点之间的空间可达度越低，说明两点之间越不容易通达^[8]。当用空间经纬度表达点的坐标时，可以用经纬度计算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表达空间可达度。式

（1）为构建的交通枢纽与代表性文旅景点之间的空间可达模型。

$$S_A = \delta \times \frac{1}{\sqrt{|x_1 - x_2|^2 + |y_1 - y_2|^2}} \quad 1$$

式(1)中 S_A 表示空间可达度, δ 表示归一化因子, 将空间可达度约束在 (0,1) 区间内。 (x_1, y_1) 表示交通枢纽的经纬度坐标, (x_2, y_2) 表示代表性文旅景点的经纬度坐标。

(三) 文旅景点空间聚类模型构建

空间可达度反映各文旅景点与交通枢纽间的通达难易程度, 为内江市文旅景点空间数据挖掘提供了基础数据。空间数据挖掘的过程是通过构建空间聚类算法对代表性文旅景点的潜在空间关系进行知识获取的过程^[9]。内江交通枢纽地理坐标、文旅景点地理坐标和文旅景点空间可达度均为离散无规则数据, 从中挖掘对旅游决策规划和旅游者选取景点有用的空间知识, 是建立空间数据挖掘模型的核心目标。基于内江交通枢纽地理坐标、文旅景点地理坐标和文旅景点空间可达度构建文旅景点空间聚类模型, 获得文旅景点与交通枢纽之间、文旅景点与文旅景点之间的聚类关系, 可以为旅游者抵达后确定交通枢纽最优选址、节约出行成本提供决策依据, 同时也为旅游管理部门提供决策和规划的依据。

在空间聚类算法中, k-近邻聚类具有计算简便、算法简单、易于实现的特点, 利用 k-近邻聚类算法能够有效实现空间分布实体的聚类。k-近邻聚类算法中, k 值的选取具有特殊性, 其数值大小决定空间聚类簇的数量^[10]。本研究中, 定义 k 值为内江市交通枢纽的数量, 聚类目标定义为搜索与交通枢纽具有最优空间可达度的文旅景点。根据建模基本原理, 构建式(2)所示的文旅景点空间聚类矩阵, 矩阵的每一行代表 1 个景点聚类簇 $C_{(i)}$, 每个元素 T_{ij} 代表文旅景点, 其中, i 为景点聚类簇的编号, j 为景点簇内景点的编号。

$$C = \begin{bmatrix} T_{11} & T_{12} & \dots & T_{1n} \\ T_{21} & T_{22} & \dots & T_{2n} \\ & & \dots & \\ T_{m1} & T_{m2} & \dots & T_{mn} \end{bmatrix} \quad 2$$

根据 k-近邻聚类算法逻辑和内江市文旅景点空间特征, 构建以最优空间可达度模型为聚类目标函数的改进 k-近邻空间聚类算法, 算法步骤如下:

Step 1: 确定 k 个聚类种子点, 每个种子点为 1 个交通枢纽, $p_{(i)}$ 为第 i 号交通枢纽, $i = 1, 2, \dots, k$ 。

Step 2: 确定文旅景点数量为 a , 标记每个文旅景点为 $T_{(x)}$, $x = 1, 2, \dots, a$ 。

Step 3: 遍历 $x = 1, 2, \dots, a$, 计算 $T_{(x)}$ 与 $p_{(i)}$ 间的空间可达度 $S_A(T_{(x)}, p_{(i)})$:

Step 3.1: 遍历 $i = 1, 2, \dots, k$, 计算 $T_{(1)}$ 与 $p_{(i)}$ 间的空间可达度 $S_A(T_{(1)}, p_{(i)})$, 取 $\max S_A(T_{(1)}, p_{(i)})$ 对应的 $p_{(i)}$, 其中 $p_{(i)}$ 的编号 i 对应第 i 个景点聚类簇。将 $T_{(1)}$ 存入矩阵第 i 行第 1 个元素 T_{i1} 。

Step 3.2: 遍历 $i = 1, 2, \dots, k$, 计算 $T_{(2)}$ 与 $p_{(i)}$ 间的空间可达度 $S_A(T_{(2)}, p_{(i)})$, 取 $\max S_A(T_{(2)}, p_{(i)})$ 对应的 $p_{(i)}$, 其中 $p_{(i)}$ 的编号 i 对应第 i 个景点聚类簇。

(1) 若 $T_{i1} = 0$, 将 $T_{(2)}$ 存入矩阵第 i 行第 1 个元素 T_{i1} ;

(2) 若 $T_{i1} \neq 0$, 将 $T_{(2)}$ 存入矩阵第 i 行第 2 个元素 T_{i2} ;

Step 3.3 按照相同算法, 计算 $T_{(x)}$ 与 $p_{(i)}$ 间的空间可达度 $S_A(T_{(x)}, p_{(i)})$, 判断 $T_{(x)}$ 归于第 i 个景点聚类簇, 并存储 $T_{(x)}$ 至第 i 行元素。

Step 4: 取具有最大元素的行 i 中的景点 $T_{(x)}$ 数量为 n , 定义为矩阵 C 的列秩, 则有其他 $n-i$ 行的元素数量 b 一定满足 $0 \leq b \leq n$ 。

Step 5: 第 i 行的前 b 个非零元素为属于聚类簇 $C_{(i)}$ 的景点 $T_{(x)}$, 后 $n-b$ 个元素设置为 0。聚类算法结束。

三、实证研究与分析

我们将模型应用于四川省区域旅游空间范围，以四川省内江市张大千名人文化旅游为例，通过对内江市交通枢纽和代表性文旅景点进行地理信息数据采集，计算各文旅景点对于每个交通枢纽的空间可达度，结果如表 2 所示。表 2 中的符号规则为：

- 内江火车站（A1）
- 内江高铁站（A2）
- 东兴汽车客运站（A3）
- 大千园（T1）
- 内江市文化馆（T2）
- 东兴区文化馆（T3）
- 市中区文化馆（T4）
- 大千广场（T5）
- 东兴老街（T6）
- 大佛寺（T7）

图 1 为每个交通枢纽条件下文旅景点空间可达度趋势图。分析表 2 和图 1 结果数据可知，各文旅景点对于交通枢纽的空间可达度不同，当景点与某个交通枢纽的空间可达度最大时，该文旅景点趋于该交通枢纽所在的聚类簇。由图 1（1）-（3）可知，旅游者选择任意交通枢纽的条件下，文旅景点的空间可达度呈现波动趋势。从空间分布结果上看，景点更趋于东兴汽车客运站（A3）所在的聚类簇。只有个别景点趋于内江火车站（A1）所在的聚类簇。而对于空间距离较远的内江高铁站（A2），各文旅景点与其空间亲密度最低。

表 2. 张大千文旅景点对于每个交通枢纽的空间可达度

交通枢纽	空间可达度			
	T1	T2	T3	T4
A1	0.439	0.562	0.269	0.343
	T5	T6	T7	
	0.291	0.270	0.395	
A2	T1	T2	T3	T4
	0.337	0.214	0.466	0.282
	T5	T6	T7	
A3	0.467	0.447	0.294	
	T1	T2	T3	T4
	0.673	0.303	0.735	0.408
	T5	T6	T7	
	0.905	0.687	0.464	

根据表 2 和图 1 的计算结果输出文旅景点聚类簇，如表 3 所示。由表 3 可知，归属于聚类簇 $C_{(1)}$ -A1：内江火车站的文旅景点有内江市文化馆（T2）；归属于 $C_{(3)}$ -A3：东兴汽车客运站的文旅景点有大千园（T1）、东兴区文化馆（T3）、市中区文化馆（T4）、大千广场（T5）、东兴老街（T6）和大佛寺（T7）。由内江高铁站（A2）构成的景点聚类簇 $C_{(2)}$ 是空集，即没有景点归属于景点聚类簇 $C_{(2)}$ 。分析聚类结果，内江市内绝大多数文旅景点集中在东兴汽车客运站所在的空间聚类簇 $C_{(3)}$ 范围内。因此，旅游者选择东兴汽车客运站（A3）作为抵达内江市

的交通枢纽目的地时, 前往除内江市文化馆之外的文旅景点更为便捷, 能够节约更多的交通成本。

内江市内所有代表性文旅景点中, 仅有内江市文化馆 (T2) 一个文旅景点归属在景点聚类簇 $C_{(1)}$ 的空间范围内, 旅游者若要前往内江市文化馆游览, 且需要节约交通成本时, 选择内江火车站 (A1) 作为抵达目的地可以使前往该景点的交通成本最低。对于内江高铁站 (A2) 而言, 分析聚类簇计算结果和该站点在内江市内的地理空间位置可知, 内江高铁站的位置距离主城区较远, 因此内江高铁站距离各个文旅景点的空间距离也更远, 空间可达度低, 旅游者需花费的交通成本更高。从算法计算结果看, 内江高铁站没有构成包含代表性文旅景点的空间聚类簇。旅游者若选择内江高铁站作为抵达内江市的交通枢纽目的地, 前往文旅景点的交通成本会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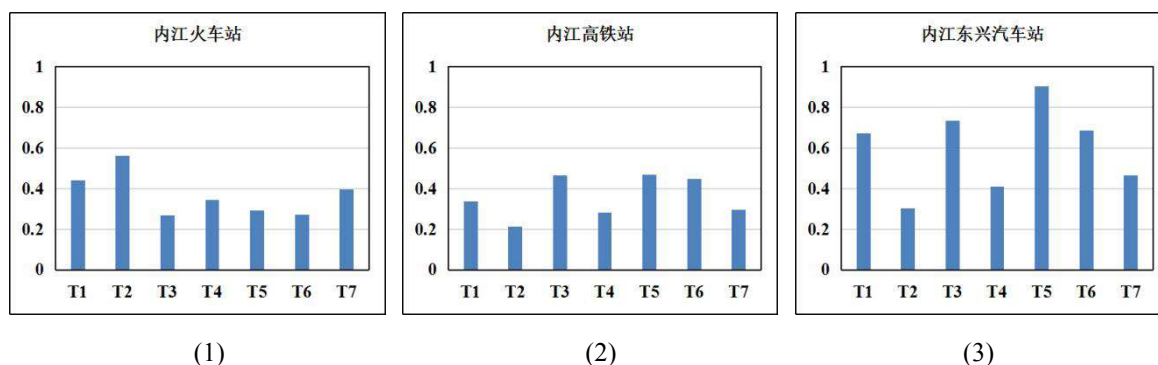


图 1.

基于表 2 和图 1 计算结果, 我们进一步分析各个文旅景点的空间可达度优先级。集聚在景点聚类簇 $C_{(1)}$ 内的景点仅一个, 旅游者前往内江市文化馆游览, 选择内江火车站 (A1) 可以最大程度减少交通成本。集聚在景点聚类簇 $C_{(3)}$ 内景点较多, 根据空间可达度计算结果可知, 各景点的空间可达度优先级为: 大千广场 (T5) > 东兴区文化馆 (T3) > 东兴老街 (T6) > 大千园 (T1) > 大佛寺 (T7) > 市中区文化馆 (T4) > 内江市文化馆 (T2)。从优先级比较结果可知, 旅游者选择东兴汽车客运站 (A3) 作为抵达内江市的交通枢纽目的地时, 若聚类簇 $C_{(3)}$ 内的景点均满足旅游者兴趣, 选择大千广场 (T5)、东兴区文化馆 (T3)、东兴老街 (T6) 和大千园 (T1) 这四个空间可达度相对更优的景点游览, 可以最大程度减少交通成本。相比之下, 若选择大佛寺 (T7)、市中区文化馆 (T4) 和内江市文化馆 (T2) 这三个空间可达度相对较弱的景点游览, 需要花费的交通成本较高。因此, 从节约交通成本的角度, 为旅游者推荐的文旅景点是: 大千广场 (T5)、东兴区文化馆 (T3)、东兴老街 (T6) 和大千园 (T1)。

表 3. 内江市文旅景点聚类簇计算结果

聚类簇		张大千文旅景点				
$C_{(1)}$ -A1		T2				
$C_{(2)}$ -A2	$\emptyset$					
$C_{(3)}$ -A3		T1	T3	T4	T5	T6
		T7				

四、结论与决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内江市主要交通枢纽和代表性文旅景点进行地理信息数据采集, 构建了文旅景点与主要交通枢纽之间的空间可达度模型。利用文旅景点与交通枢纽之间的空间可达度模型构建聚类目标函数, 搜索与文旅景点空间可达度最优的交通枢纽, 并将各文旅景点纳入交通枢纽所在的聚类簇。通过文旅景点空间聚类, 得到文旅景点与交通枢纽之间的空间规律知识, 为旅游者前往内江市游览文旅景点提供决策支持, 为节约交通出行成本提供科学依据, 也为旅游管理部门进行旅游规划和决策提供了依据。

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旅游决策建议:

(1) 对于喜好名人文化的旅游者, 前往内江进行游览活动前, 提前掌握内江市交通枢纽和文旅景点的地理位置、分布情况以及景点特色、市内交通等信息非常必要, 有助于做好旅游规划, 确保游览过程的通畅、顺利。

(2) 内江市内绝大多数文旅景点集中在老城区东兴汽车客运站所在的空间聚类簇范围内, 因此对于省内旅游者以及内江市辖区旅游者, 乘坐客运班车前往内江后再转由市内交通前往景点, 是节约成本的最优选择。

(3) 内江高铁站处于新城区, 距离文旅景点的距离较远, 因此, 高铁虽然是前往内江市的主导交通方式, 但对于节约市内交通成本并非最优选择, 旅游者应根据经济预算和时间成本综合考虑交通枢纽。

(4) 选择相对位置集中的东兴汽车客运站聚类簇包含的文旅景点, 可以在有限时间内游览更多的景点, 节约交通成本。

参考文献:

- [1] 郑云扬,李倩.南昌市旅游景点空间分布特征研究[J].中外建筑,2023,(10):63-69.
- [2] 黄远君,江培智,谢小魁等.基于多模式交通系统的旅游景区空间可达性分析——以南宁市为例[J].北部湾大学学报,2023,38(02):70-76.
- [3] 李婷,林斌,颜逸静等.福州市热门旅游景点空间结构及影响因素研究[J].闽江学院学报,2023,44(02): 103-109.
- [4] 周海涛,马钰松,樊亚宇等.内蒙古红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及可达性分析[J].干旱区地理,2023,46(05): 814-822.
- [5] 青果,胡金龙,艾烨等.基于空间句法的旅游景点可达性研究——以广西阳朔县为例[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22,50(03):32-40.
- [6] 肖政.基于空间数据挖掘的个性化旅游景点推荐系统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6.
- [7] 蔡袁.基于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内江文旅融合发展对策研究[J].内江科技,2024,45(07):19-21+76.
- [8] 简易,林岩,张书涵.基于 POI 数据的徐州市旅游景点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J].智能建筑与智慧城市,2024,(06):36-39.
- [9] 李涛,徐江.基于 GIS 辅助的多源地理空间矢量数据挖掘方法[J].计算机仿真,2024,41(09):465-469.
- [10] 赵志忠,陈素根.基于相互 K 近邻的密度峰值聚类算法[J].安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4, 30(02):41-46.

A k-nearest Neighbor Clustering Algorithm for Celebrity Cultural Tourism

Attractions Based on Spatial Accessibility Model

Zhou Xiao¹, Pan Juan¹, Zhao Taiping¹, Tian Jiangpeng²

¹ School of Culture and Tourism, Lesh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Leshan, Sichuan Province, China

² Institute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 background, a spatial accessibility model between cultural tourism attractions and transportation hubs is constructed, upon which a k-nearest neighbor spatial clustering method for cultural tourism attractions is established. Taking the Neijiang city's Zhang Daqian cultural tourism attractions in Sichu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 geographic spatial data of the city's main transportation hubs and the Zhang Daqian cultural tourism attractions are firstly collected. A spatial accessibility model based on spatial coordinates is established, and the spatial accessibility between the Zhang Daqian cultural tourism attractions and transportation hubs is then calculated. On the basis of searching for the optimal spatial accessibility between the Zhang Daqian cultural tourism attractions and transportation hubs, a spatial clustering model is established to determine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each cultural tourism attra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hub. This provides a scientific quantitative basis for cultural tourism attraction recommendation services and tourism decision-making services in Neijiang, while also serving as a reference for other tourism cities in Sichuan province.

Keywords: spatial accessibility model; cultural and tourism attractions; k-nearest neighbor clustering; tourism planning

中式养生护肤产业的商业模式创新与价值创造研究

张明珠¹, 初琦¹, 尹欣然¹, 李佳纯¹, 张烨涛²

(1.哈尔滨金融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2.山西农业大学, 山西 晋中 030801)

摘要: 健康消费升级、国潮文化扩散与功效护肤深化, 共同推动了中式养生护肤赛道的形成。中式养生护肤并非传统草本护肤的简单延伸, 而是在中式养护理念、现代护肤技术与当代消费审美交汇基础上形成的新型产业形态。近年来, 该领域在市场关注、产品创新与内容传播方面表现活跃, 但也面临产品同质化、功效支撑不足、渠道运营对流量依赖较强、用户沉淀能力有限以及产业链协同程度不高等问题。文章围绕中式养生护肤产业的发展动因、商业模式约束、优化方向与价值生成展开分析。研究认为, 中式养生护肤的持续成长并不取决于中式符号的叠加, 而取决于能否围绕产品研发、场景组织、内容传播、渠道协同与生态延展, 对价值主张、价值传递与价值获取机制进行系统重构。

关键词: 中式养生护肤; 商业模式创新; 价值创造; 国潮消费; 护肤产业

基金项目: 哈尔滨金融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中式养生护肤 app——百草寻真(X202410245006)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418

一、引言

中式养生护肤的兴起, 体现了护肤消费健康化、文化认同强化与产业环境重组的交汇趋势。近年来, 护肤消费的关注重点已由基础清洁与补水保湿逐步转向屏障修护、敏感维稳、情绪舒缓与长期调理等复合性需求。与此相应, 皮肤健康管理观念不断强化, 消费者对于“温和、安全、持续改善”的偏好显著提升。已有研究指出, 中医药在皮肤屏障修复、炎症调节和皮肤稳态维持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与实验依据^[1]。围绕中医药皮肤研究的文献计量结果亦表明, 该领域正由经验性应用持续转向机制性阐释^[2]。这一研究进展为中式养生护肤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知识支撑, 也使其在概念上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天然草本护肤。

国潮消费扩散使本土文化资源重新进入主流消费秩序。东方审美、中式生活方式与民族文化符号在数字媒介中的高频呈现, 强化了消费者对本土品牌的情感接受与文化认同。研究显示, 民族文化元素能够显著提升中国化妆品品牌的文化感知, 并进一步影响国家身份认同^[3]。与此同时, 国潮产品的消费意愿仍受到民族中心倾向与产品评价的共同影响^[4]。这表明, 中式养生护肤的市场基础并不仅来自“天然”“温和”等一般性认知, 更与其所承载的本土文化表达和生活方式想象密切相关。

需要注意的是, 市场热度并不直接等同于产业成熟。随着《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的施行, 化妆品行业在注册备案、功效宣称和安全责任等方面进入更为严格的制度环境^[5]。在此背景下, 依赖视觉包装与模糊叙事的粗放式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对于中式养生护肤而言, 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 不在于中式元素是否能够吸引消费者, 而在于中式资源如何被组织为具有持续竞争力的商业模式。基于此, 本文围绕产业发展基础、商业模式约束、优化进路与价值创造展开分析。

二、中式养生护肤产业的发展基础与演进态势

(一) 需求升级与文化重估推动品类生成

作者简介: 张明珠(2002—), 女, 哈尔滨金融学院本科在读;
初琦(2004—), 女, 哈尔滨金融学院本科在读;
尹欣然(2005—), 女, 哈尔滨金融学院本科在读;
李佳纯(2004—), 女, 哈尔滨金融学院本科在读;
张烨涛(2007—), 男, 山西农业大学本科在读。

健康导向消费给中式养生护肤赋予了稳定的需要根基。传统的护肤消费重在即时的功能满足,但是现在的消费者更看重低刺激、重建稳态和长期调理。有关中医药修复皮肤屏障功能的研究显示,中医药对于炎症的缓解、屏障的修复以及多通路的干预有较好的效果^[1]。根据2014-2024年间中医药治疗皮肤疾病文献计量分析可知,该领域研究数量不断增多,研究范式也由原来的依靠经验的应用转向了现在的机制解释^[2]。这些研究成果不能直接等同于具体的品牌或者产品市场成功,但是可以说明中式养生护肤不是没有科研基础的概念性建构,而是一个有知识储备、转化潜力的产业方向。

文化认同使中式养生护肤品牌所表达的范围变得更加宽广。护肤品不但是功能性消费品,也是高度依靠形象塑造、使用感受和情感认同的具有文化属性的商品。中国化妆品牌在数字传播里加入民族文化元素,可以加强受众对于品牌文化属性的认识,进而对身份认同产生影响^[3]。但是相关研究也表明,文化因素虽然很重要,但是消费意愿不会脱离产品评价而单独存在^[4]。这就意味着中式养生护肤的文化优势是有边界的。文化叙事可以打开认知的入口,也可以使品牌产生差异化的表达,但是不能单独完成品牌的沉淀。只有文化表达同产品表现、使用体验、消费信任产生有效的耦合,中式养生护肤的文化资源才有可能变成竞争优势。

(二) 数字平台扩张中的市场演进特征

数字媒介的普及显著提升了中式养生护肤的传播效率。短视频、直播、电商社区与私域运营,使“草本成分”“节气护肤”“屏障修护”“中式生活方式”等概念得以迅速扩散。相较于传统广告模式,这种内容化、互动化传播环境更适合中式养生护肤这类需要持续阐释的品类。有关社交商务的研究表明,知觉价值、互动质量与信息透明度会显著影响消费者的复购意愿^[6];顾客参与程度及平台属性,则进一步影响品牌关系的稳固程度^[7]。因此,数字平台所带来的并不仅是传播机会,也重塑了这一赛道的经营逻辑。

就产业运行而言,中式养生护肤由原来的零散概念逐渐变成有明显识别度的消费类别。一方面,品牌在成分叙事、场景表达、生活方式内容等各方面的拓展使得该赛道持续升温,另一方面,市场扩张并没有必然导致模式的成熟,品牌之间的发展路径也存在差异。能够实现文化表达、产品供给、关系经营三者之间稳定联动的品牌,将来在竞争中会占据有利地位。

三、中式养生护肤产业商业模式的结构约束

(一) 产品逻辑、功效证成与科研转化尚未形成闭环

就现实运行而言,中式养生护肤市场已经形成了较高的热度,但是产品扩张和差异化不足并存。大量品牌以“本草”、“东方”、“养肤”、“温和”、“修护”等关键词为依托进行表达,但是在具体的商品上,成分逻辑趋同、功效路径重叠、场景定位不清的现象比较普遍。消费者可以识别出某种视觉风格和文化调性,但是很难区分不同的品牌在产品机理、适用人群、使用逻辑上存在的真实差别。

商业模式研究显示,价值创造不是单靠某个产品属性决定的,而是由企业创建出新的、可持续的价值配置方式所决定的^[8]。从电子商务的角度来展开相关研究,互补性以及锁定机制都是企业形成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9]。如果品牌中式表达只是停留在命名、包装、传播语境的层次上,并没有在产品矩阵、使用系统、复购机制上产生结构性的区别,那么所谓的中式养生护肤很容易被复制成一种表层风格,不能形成真正的竞争壁垒。

科研储备与商品能力之间的断裂进一步加剧了上述问题。围绕《中国药典》的研究指出,外用与经皮植物制剂体系拥有较为丰富的植物药和辅料资源^[10]。较早的研究也表明,部分传统中药提取物在美白、抗氧化和皮肤维护方面具有较高开发潜力^[11]。然而,这些资源如何被稳定转化为现代消费品,仍然面临较高门槛。多组学研究综述指出,中医药具有多成分、多靶点、多通路的复杂特征,现代研究方法虽为作用机制识别与质量评价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但复杂性本身依旧构成转化难点^[12]。对于中式养生护肤品牌而言,关键挑战并非只是发现某一“有效成分”,而是将成分筛选、提取工艺、复配逻辑、肤感控制、稳定性评价、法规适配与消费者可理解表达组织为一个完整系统。

(二) 流量获取与关系沉淀之间存在断裂

平台传播塑造了中式养生护肤的增长路径,也固化了其流量依赖特征。短视频与社交种草降低了品牌教育成本,却更多作用于认知和兴趣层面。研究显示,复购不仅取决于首次购买体验,还受到知觉价值与互动机制的持续影响^[6]。进一步而言,顾客参与与平台属性会对关系黏性产生显著作用^[7]。由此可见,中式养生护肤品牌若将

增长重心过度置于平台曝光与即时转化,而忽视后续的用户陪伴、使用反馈与社群经营,便容易陷入“首单活跃、复购疲弱”的困境。

对于强调长期调理与周期护理的中式养生护肤而言,这一问题更具结构性影响。若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无法获得持续解释、及时回应和稳定服务,品牌的中式叙事便难以沉淀为关系资本,增长基础亦将相应变得脆弱。平台带来的并不仅是流量红利,也是一种更高要求的关系经营机制。

(三) 产业链协同不足制约价值延展

中式养生护肤原本就具备向情绪疗愈、睡眠修护、头皮养护、香氛体验、中式生活方式服务等方向延伸的能力,但是现实中大部分品牌依然把单品销售作为核心业务,没有形成很强的生态联动能力。因此,上游的草本资源没有形成技术壁垒,中游的研发成果还没有形成品牌信任,下游的内容传播和体验也没有形成完整的闭环,产业的价值大部分停留在前端的销售环节上。

价值共创研究显示,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由原来的单向的产品供给变成多主体资源整合和服务生态的构建^[13]。从这一角度看,中式养生护肤的根本问题并不是缺少资源,而是资源之间还没有形成高质量的链接。产业链各个环节虽然已经开始进入该赛道,但是价值还没有形成一个更长的收益链和更高的品牌势能。

四、中式养生护肤产业商业模式的优化进路

(一) 以场景化定位和现代研发重塑产品供给

中式养生护肤商业模式优化的起点,就是重新界定它的服务对象和问题边界。与笼统地提出“东方养肤”不同,以敏感肌维稳、熬夜肌修护、轻熟龄抗初老、换季屏障恢复这些具体的使用场景为依据来定位,更能体现出具体的价值主张。只有当品牌可以明确地回答出服务什么样的人群、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对应什么样的场景的时候,中式养生护肤的表达才会从抽象的概念变成具体的方案。

因此产品开发逻辑也要从以草本叙事为主转向以草本加科技为双翼的支撑。现有的研究已经证明,中药外用对于皮肤的保养和屏障修复有基础^[1]。对于《中国药典》外用和经皮植物制剂的全面梳理,又为本草资源在配方开发中留出了广阔的天地^[10]。同时一些传统的中药提取物在美白、抗氧化等各方面都有了明确的应用前景^[11]。多组学和机制研究的发展给传统成分筛选、活性识别、质量评价提供更好的方法支持^[12]。在这种情况下,中式养生护肤产品之间的竞争不应该再停留在谁更善于讲述本草故事上,而应该转向谁更能用现代研发的方式把本草资源转化为有效的产品。

(二) 以方案供给和内容运营强化关系经营

中式养生护肤天然具有过程性特征,“养肤”意味着持续调理,而非一次性修复。正因如此,其商业模式更适合同样围绕方案供给而非单品销售展开。品牌可以基于节气变化、肤质波动、作息习惯与情绪状态,设计更具连续性的使用路径,将洁面、精华、面霜、面膜、头皮护理、香氛及相关生活建议整合为完整的养护方案。价值生成越来越发生在企业与消费者的互动过程中^[13]。方案式供给的意义不仅在于提高客单价,更在于将这种互动过程嵌入日常消费实践之中。

运营端则需要形成“内容传播—用户教育—关系沉淀”的闭环。节气护肤、草本知识、肤质管理、作息与肤况关系等内容,本可成为品牌长期积累的知识资产,但现实中不少品牌仍然更倾向于将内容作为促销话术,而非认知建设工具。已有研究表明,顾客参与、信息质量与互动体验与复购意愿密切相关^[6]。这意味着,中式养生护肤品牌若希望摆脱单纯依赖流量的增长方式,就必须将内容传播、用户教育与私域服务有机连接起来。公域平台主要承担新客触达与初步认知建构功能,私域空间则负责持续解释、使用反馈、肤质陪伴与会员关系维护。

(三) 以渠道协同和生态延展拓宽价值边界

中式养生护肤的吸引力并不完全建立于参数比较与即时效果之上,它还依赖气味、肤感、仪式感与生活方式联想。因此,其渠道结构不宜仅停留在电商交易逻辑之中,而应逐步形成公域引流、私域运营与线下体验相互支撑的协同关系。在线下场景中,无论是气味感知、护理流程、空间设计,还是围绕节气、睡眠、情绪和中式生活方式展开的场景化表达,都更有利于完成信任建立与体验强化。

从更长周期看,中式养生护肤还需要由单一护肤品牌向养生生活方式品牌延展。商业模式创新研究强调,互

补性是企业拓展价值边界的重要条件^[9]。在商业模式设计层面,资源、渠道、关系与收益结构的系统配置同样决定了价值能否持续沉淀^[4]。对这一赛道而言,护肤品可以与头皮护理、身体护理、香氛疗愈、睡眠产品及轻养生服务等领域形成互补,从而构成更长的用户接触链条。由此,护肤品不再是唯一利润来源,而成为品牌进入用户日常生活系统的关键入口。

五、中式养生护肤产业的价值创造维度

(一) 消费者价值与企业价值的协同生成

中式养生护肤的价值生成具有多维性。就消费者层面而言,其价值并不局限于功能改善。皮肤屏障修护、炎症调节与长期维稳是当下护肤消费的重要方向^[1],而中式养生护肤能够以更温和、更过程化的方式回应这些需求。由于其在节气、气味、审美和养护方式上的独特表达,消费者从中获得的还包括文化贴近感、情绪安抚与生活方式认同。功能价值、体验价值与文化价值在此呈现出交织生成的特征。

就企业层面而言,商业模式优化有助于推动收益结构由短期交易导向转向长期品牌资产积累。商业模式研究指出,竞争优势不仅来源于产品本身,也来源于价值创造与价值获取方式的整体设计^[8]。有关电子商务价值创造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互补资源之间的有效组织,是企业形成持续优势的重要条件^[9]。当品牌能够完成由单品销售向方案供给、由流量购买向用户沉淀、由文化包装向认知信任的转换,其客单价、复购率、会员黏性与品牌溢价能力都将获得更稳固支撑。尤其在平台流量成本上升、市场竞争加剧的环境下,这种以内容、服务和关系为基础的收益结构,有助于显著提升企业增长的稳定性。

(二) 产业升级与文化转译的双重效应

就产业层面而言,中式养生护肤的发展推动了本草资源、研发评价、数字传播与消费服务之间的再连接。过去,上述资源往往彼此分散,缺乏紧密衔接;而随着产品科学化、传播内容化与服务场景化程度不断提高,产业链上下游之间将逐步形成更强的协同关系,进而推动中式养生护肤由概念赛道向体系化产业演进。

就文化层面而言,中式养生护肤为传统养护观念进入现代生活提供了现实路径。其文化价值并非附属品,而是与产品价值和体验价值相互嵌套的组成部分^[13]。当品牌能够在产品开发、使用方式与品牌表达中保持逻辑一致,传统知识便不再只是被表层调用,而是在现代条件下获得新的组织形式和传播方式。

六、结论

总体来看,中式养生护肤产业的兴起,反映了护肤消费健康化、文化消费本土化与传播环境数字化的叠加趋势。其发展并不缺少原料基础、文化资源与市场关注,真正决定其产业高度的,是这些资源能否被有效组织为稳定的商业模式。当前行业的核心问题主要表现为产品同质化、功效表达不足、流量依赖较强、复购机制薄弱以及产业链协同不充分。若要摆脱概念化扩张所带来的脆弱增长,中式养生护肤需要沿着场景化细分、产品科学研究、方案式供给、内容认知建设、渠道协同与生态延展等方向持续深化。只有当中式养生护肤能够将中式资源真正转化为产品体系、用户关系与品牌结构,其商业模式创新方可真正完成,价值创造也才具备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 [1] Yang J, Guo J, Tang P, et al. Insights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Restoring Skin Barrier Functions[J]. *Pharmaceuticals*, 2024, 17(9): 1176. DOI: 10.3390/ph17091176.
- [2] Li L, Zhang L, Li Y, et al. Overview of Current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Skin Disease Treatment: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from 2014 to 2024[J]. *Pharmaceutical Biology*, 2025, 63(1): 27-41. DOI: 10.1080/13880209.2024.2443415.
- [3] Li Y, Sun J, Zhu L. Ethnic Elements in Chinese Cosmetic Brands: An Exploration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Effects on the Recogni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J].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Reports*, 2023, 10: 100046. DOI: 10.1016/j.teler.2023.100046.
- [4] Tie C, Hou Y, Lei Y. Impact of Consumer Ethnocentrism on China-Chic Product Consumption: A Multigroup Analysis of Ethnic Attributes[J].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2025, 12: 110. DOI:

10.1057/s41599-025-04435-5.

[5] 国务院.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Z]. 2020-06-29 发布, 2021-01-01 施行.

[6] Guo J, Li L.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ommerce Features and Consumers' Repurchase Intentions: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Value[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2, 12: 775056. DOI: 10.3389/fpsyg.2021.775056.

[7] Busalim A H, Hollebeek L D, Lynn T. The Effect of Social Commerce Attributes on Customer Engage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Internet Research*, 2024, 34(7): 187-214. DOI: 10.1108/INTR-03-2022-0165.

[8] Teece D J. Business Models, Business Strategy and Innovation[J]. *Long Range Planning*, 2010, 43(2-3): 172-194. DOI: 10.1016/j.lrp.2009.07.003.

[9] Amit R, Zott C. Value Creation in E-Busines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22(6-7): 493-520. DOI: 10.1002/smj.187.

[10] Gu J, Lane M E, Dos Santos B D S, et al. Topical and Transdermal Botanical Formulations of the Chinese Pharmacopoeia—A Review[J]. *Phytotherapy Research*, 2024, 38(9): 4716-4735. DOI: 10.1002/ptr.8286.

[11] Wang K H, Lin R D, Hsu F L, et al. Cosmetic Applications of Selected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J]. *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 2006, 106(3): 353-359. DOI: 10.1016/j.jep.2006.01.010.

[12] Zhao M, Che Y, Gao Y, et al. Application of Multi-Omics in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J]. *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 2024, 15: 1431862. DOI: 10.3389/fphar.2024.1431862.

[13] Prahalad C K, Ramaswamy V. Co-creation Experiences: The Next Practice in Value Creation[J]. *Journal of Interactive Marketing*, 2004, 18(3): 5-14. DOI: 10.1002/dir.20015.

[14] Osterwalder A, Pigneur Y. Business Model Generation: A Handbook for Visionaries, Game Changers, and Challengers[M]. Hoboken: Wiley, 2010. ISBN: 9780470876411.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Value Creation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Wellness Skincare Industry

Zhang Mingzhu¹, Chu Qi¹, Yin Xinran¹, Li Jiachun¹, Zhang Yetao²

(¹Harbin Finance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China; ²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inzhong, Shanxi, China)

Abstract: The ri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wellness skincare has been jointly driven by the upgrading of health-oriented consumption, the diffusion of China-chic culture, and the deepening of efficacy-based skincare. Rather than being a simple extension of herbal skincare, this sector represents a new industrial form shaped by the converg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are philosophies, modern skincare technologies, and contemporary consumer aesthetics. In recent years, the field has shown strong momentum in market attention, product innovation, and content communication; however, it still faces structural constraints such as product homogeneity, insufficient efficacy support, heavy dependence on traffic-based channels, limited user retention, and weak industrial-chain coordination. Focusing on the driving forces, business-model constraints, optimization paths, and value-creation mechanisms of this industr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sustainable growt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wellness skincare depends less on the accumulation of cultural symbols than on the systematic reconstruction of value proposition, value delivery, and value capture through product R&D, scenario design, content communication, channel coordination, and ecosystem extension.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wellness skincar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value creation; China-chic consumption; skincare industry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绿色技术创新与经营绩效

洪蓓高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 404100)

摘要: 本文基于 2013-2023 年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相关数据, 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框架, 探究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机制。通过 CiteSpace 软件开展文献计量分析, 发现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的融合研究已成热点, 但产权异质性视角下三者联动机制的系统性探讨存在缺口。研究表明, 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经营绩效, 且绿色技术创新发挥中介作用; 产权性质存在异质性影响, 国有企业的提升效果更显著。基于此, 从政府、企业二元视角提出政策建议, 助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绩效提升。

关键词: 数字化转型; 制造业; 经营绩效; 绿色技术创新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421

1 引言

在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革新推动下, 数字化转型成为我国制造业突破发展瓶颈的核心路径。自 2020 年国家将大数据列为核心战略并出台《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 加之《中国制造 2025》的明确指引,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被赋予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义。而制造业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 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深度发展要求相呼应, 绿色创新成为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路径。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对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计量分析发现, “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企业绩效”已形成核心研究网络, 但现有研究多聚焦两两关系或整体样本分析, 缺乏对产权异质性调节作用的深入探讨, 且研究缺口与“双碳”目标下的政策导向和企业实践需求脱节。当前国内外研究多关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与影响因素, 针对“双碳”背景下三者联动关系的研究仍显不足。本文立足国家战略与产业实践, 探索数字化转型驱动绿色创新、提升经营绩效的内在机制, 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2 文献综述

本研究以 CNKI 为检索源, 以“数字化转型”为主题词检索 2019 年 1 月-2025 年 12 月的文献, 经筛选保留 444 篇, 利用 CiteSpace 从发文量、作者共现、关键词共现与聚类等方面分析, 梳理领域研究现状与空白。

2.1 发文量分析

2019-2021 年相关文献发文量增长平缓, 领域处于起步积累阶段; 2022 年后发文量快速攀升至峰值, 2024 年略有回落, 反映该领域研究热度随行业实践需求显著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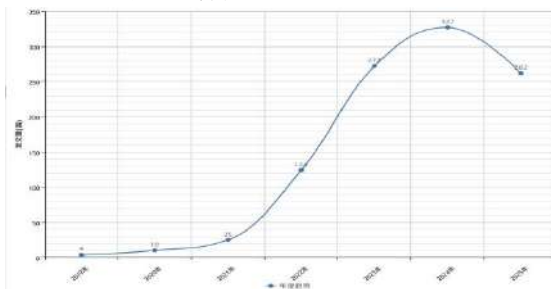


图 1 相关领域年度发文量分布情况

作者简介: 洪蓓高(2002-),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企业数字化转型。

2.2 作者共现网络分析

作者共现图谱中节点 199 个、线段 136 个，网络密度 0.0069。巫强、蒋真儿[1]等为领域核心研究者，分别聚焦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路径机制、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关联；李鑫、周云波[2]等学者的研究围绕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展开，与本文产权异质性分析主题呼应。作者合作网络呈现“小聚集、大分散”特征，跨群体、跨方向协作较少，存在明显“孤岛”现象，虽利于细分方向深度挖掘，但限制了跨领域融合研究，后续需加强不同研究团队联动。



图 2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领域作者共现网络图

2.3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共现图谱含节点 81 个、连线 84 个，密度 0.0259。高频关键词包括“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国有企业”“企业绩效”等，与本文研究主题高度契合。“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数字经济”连线强度高，“国有企业”与“环境规制”“政策效应”关联紧密，“绿色创新”“碳约束”等为近年研究新热点，契合“双碳”战略需求。整体呈现“数字化+绿色化+制度因素”融合趋势，但“绿色创新中介效应的细分路径”等关键词关联较松散，存在研究缺口。



图 3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领域关键词共现图谱

2.4 关键词聚类分析

采用 LLR 聚类统计功能，得到模块值 $Q=0.82$ 、平均轮廓值 $S=0.93$ 的聚类结果，聚类有效且同质性优秀，形成 5 个核心聚类：#0 数字经济、#1 数字化、#2 绿色创新、#3 人力资本、#4 中小企业、#5 国有企业。结合聚类规模与聚焦度，将领域研究热点归纳为三方面：一是数字化与经济基础[4]，作为底层背景，聚焦数字技术对制造业的赋能逻辑与数字化转型路径；二是绿色创新实践[13]，为核心研究主题，围绕“数字化赋能绿色创新”展开，验证了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三是企业异质性视角[8]，涵盖产权与规模异质性研究，但不同产权、规模企业的研究相对独立，产权与规模交叉异质性的调节作用仍为研究空白。



图 4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领域关键词聚类图谱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3.1 直接效应假设

数字化转型由 Negroponte[9]在 1995 年首次提出，涵盖生产要素数字化、生产活动数字化创新、生产关系数字化重建。当前制造业面临成本与竞争双重压力，数字化技术通过整合数据要素打破信息不对称，推动生产模式从规模化向定制化转型，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推动企业组织架构扁平化，实现各环节实时协同，降低管理成本与决策滞后性。基于此，提出 H1：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经营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3.2 中介效应假设

数字化转型通过深度挖掘数据要素，精准识别生产环节的资源消耗与环境风险点，为绿色创新明确方向，形成“数字化识别需求—绿色创新响应—绩效提升反馈”闭环；同时，数字化平台促进跨领域技术融合，降低绿色创新技术转化成本，数据要素的边际效益递增特性强化了绿色创新对绩效的驱动[12]。数字化转型企业的绿色创新投入强度更高，绿色创新带来的成本下降可转化为产品竞争力，提升经营绩效。基于此，提出 H2：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3：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经营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4 研究设计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选取 2013-2023 年中国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年报与国泰安（CSMAR）数据库。经剔除金融类、ST/PT 类、关键变量缺失样本，并对连续变量缩尾处理后，最终得到 20251 个观测样本。

4.2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经营绩效（ROE），采用净资产收益率衡量，后续以总资产收益率（ROA）进行稳健性检验。2、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DT），采用文本分析法抓取企业年报中数字化相关关键词词频占比，经“词频总数+1”自然对数化处理后度量。3、中介变量：绿色创新投入（GREEN），选取绿色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之和，经自然对数化处理后度量。4、控制变量：选取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营业总收入增长率（Gro）、股权集中度（top1）、研发强度（RD）、现金流量（cflow）、流动比率（Liq）、流动资产周转率（Ltr），并引入年份（year）和行业（Ind）固定效应。

4.3 模型设计

基准模型。为检验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基准模型：

$$ROE_{it} = \alpha_0 + \alpha_1 DT_{it} + \alpha_2 Control_{it} + \sum year + \sum Ind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α 为重点关注系数，若显著为正则 H1 成立。

中介模型。为研究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其经营绩效的作用机制，本文借鉴相关研究通过逐步回归方法，以企业绿色创新投入（GREEN）为中介变量，构建如下中介模型：

$$GREEN_{it} = \beta_0 + \beta_1 DT_{it} + \beta_2 Control_{it} + \sum Year + \sum Ind + \varepsilon_{it} \quad (2)$$

$$ROE_{it} = \gamma_0 + \gamma_1 GREEN_{it} + \gamma_2 DT_{it} + \gamma_3 Control_{it} + \sum Year + \sum Ind + \varepsilon_{it} \quad (3)$$

5 实证分析

5.1 基准回归结果

引入控制变量并固定年份、行业效应后，数字化转型（DT）对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正向促进经营绩效，H1得证。控制变量中，企业规模、流动资产周转率、股权集中度等对经营绩效呈显著正向影响，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等呈显著负向影响。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ROE	(2) ROE	(3) ROE
DT	0.0058*** (6.7420)	0.0027*** (3.2363)	0.0037*** (4.0628)
size	0.0171*** (17.9275)	0.0187*** (18.8432)	0.0188*** (18.8938)
Lev	-0.2376*** (-21.4246)	-0.2429*** (-21.4841)	-0.2428*** (-21.4642)
Ltr	0.0115*** (8.4068)	0.0192*** (12.3933)	0.0189*** (12.2061)
top1	0.0007*** (13.2184)	0.0008*** (14.1946)	0.0007*** (13.9594)
Gro	0.1048*** (31.9271)	0.1009*** (31.8862)	0.0997*** (30.6846)
Liq	-0.0014*** (-3.6939)	-0.0010*** (-2.6504)	-0.0011*** (-2.8963)
RD	-0.0024*** (-8.6708)	-0.0029*** (-9.9121)	-0.0028*** (-9.6475)
cflow	0.5191*** (35.0770)	0.5054*** (34.4154)	0.5148*** (34.6455)
_cons	-0.2988*** (-16.0278)	-0.3211*** (-7.4794)	-0.3207*** (-7.9159)
year	是	否	是
Ind	否	是	是
N	20251	20251	20251
adj. R2	0.304	0.315	0.318

5.2 稳健性检验

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ROE 替换为 ROA）、剔除疫情期间样本（2020-2022 年）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 2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ROA	(2) ROE
DT	0.0014*** (3.6929)	0.0055*** (4.6174)
控制变量	是	是
_cons	-0.1094*** (-6.4164)	-0.2934*** (-7.1107)
year	是	是
Ind	是	是
N	20251	11796
adj. R2	0.443	0.293

5.3 异质性分析

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两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两类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均对经营绩效产生1%水平上的显著正向影响，但国有企业的回归系数更高，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更为突出。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具备更强的战略前瞻性，能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战略深度融合；同时拥有天然政策优势，在财政、税收等方面获得更多支持，为数字化转型注入充足资本与动力。

表 3 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国有企业 ROE	(2) 非国有企业 ROE
DT	0.0073*** (3.6291)	0.0024** (2.3080)
控制变量	是	是
_cons	-0.3199*** (-7.2760)	-0.3504*** (-10.9870)
year	是	是
Ind	是	是
N	4965	15286
adj. R2	0.291	0.333

5.4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数字化转型（DT）对绿色创新投入（GREEN）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H2 得证；将绿色创新投入纳入模型后，其对经营绩效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仍显著为正，H3 得证，表明绿色创新投入在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业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发挥显著中介作用，数字化转型可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间接提升经营绩效。

表 4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1) GREEN	(2) ROE
DT	0.3210*** (2.7938)	0.0036*** (3.9956)
GREEN		0.0002*** (6.4634)
控制变量	是	是
_cons	-91.7155*** (-10.0987)	-0.3028*** (-7.4740)
year	是	是
Ind	是	是
N	20251	20251
adj. R2	0.078	0.318

6 结论与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以 2013-2023 年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化转型、绿色技术创新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及产权异质性影响，得出核心结论： 1.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经营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绿色技术创新在二者间发挥中介作用，数字化转型可通过提升绿色创新投入间接提升经营绩效，该结论经稳健性检验验证可靠。 2. 产权性质对数字化转型的绩效提升效应存在异质性，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均能显著提升经营绩效，但国有企业因战略前瞻性更强、政策支持更充分，其数字化转型对经营绩效的提升效果更为突出。

6.2 政策建议

基于研究结论，从企业和政府二元视角提出针对性建议，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融合，提升企业经营绩效：

企业层面：强化战略融合，深化数字化与绿色创新协同发展。1. 融合战略规划：国有企业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深度融入企业发展战略，利用区块链优化供应链绿色管理；非国有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聚焦 AI 质检、柔性生产等场景，将绿色创新目标纳入战略规划。 2. 完善治理机制：引入独立董事监督数字化与绿色创新项目，建立数字化投入、绿色研发强度与高管薪酬、绩效考核挂钩的激励机制，定期披露转型进度与绩效关联报告，提升管理透明度。 3. 加速技术转化：搭建开放实验室或创新孵化器，引进高端人才，推动数字化与绿色

技术成果落地;深化产学研合作,与高校、科研机构共建研发平台,为转型与创新提供技术支撑。

政府层面:优化政策体系,推动不同产权企业协同转型。1. 优化扶持结构: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数字化改造补贴等财政、税收政策上向非国有企业倾斜,缩小国企与非国企的政策差距,鼓励非国有企业加大绿色创新投入。2. 强化战略引导:为国有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专业指导,助力其深化战略融合;通过政策引导非国有企业制定适配的数字化战略,推动其与行业龙头企业合作,提升战略规划能力。3. 保障技术落地: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企业开展数字化与绿色创新技术研发应用,对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绿色生产中的应用给予资金补助;搭建技术交流平台,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加速技术成果转化;对治理机制创新突出的企业给予政策奖励,推动企业治理与数字化、绿色创新深度融合。

参考文献:

- [1] 熊立春,赵利媛,等.数字化水平对农林上市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23,28(12):290-306.
- [2] 解学梅,朱琪玮.企业绿色创新实践如何破解“和谐共生”难题? [J].管理世界,2021,37(01):128-149+9.
- [3] 苏艳丽,张佳慧,刘书娜.数字化转型、ESG表现与企业绩效研究综述[J].财会月刊,2023,44(20):53-57.
- [4] 朱晶婷,郭飞云,林贻.数字化程度、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J].中国注册会计师,2023,(09):63-67.
- [5] 叶永卫,李鑫,郭飞,等.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经营成本变动[J].世界经济文汇,2023,(02):70-90.
- [6] 赵宸宇.数字化发展与服务化转型——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21,24(02):149-163.
- [7] 赵树宽,张铂晨,蔡佳铭.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J].科技管理研究,2022,42(06):211-220.
- [8] 杨静,施建军.企业生态创新与经济绩效曲线关系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32(13):95-99.
- [9] Lang D L ,Behl A ,Phuong D N N , et al.Toward SM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supply chain context: the role of structural social and human capital[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ysical Distribution & Logistics Management,2023,53(4):448-466.
- [10] 傅颖,郭爱其,陈磊,等.促进还是抑制:家族涉入对专精特新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54(09):63-83.
- [11] 许松涛,魏宇琼,董梦园,等.CEO开放性特征与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创新[J].华东经济管理,2022,36(10):43-55.
- [12] 孙佳哲,李勇坚.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J].税务与经济,2025,(03):78-86.
- [13] 刘娅玲.绿色创新对先进制造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分析[J].市场周刊,2025,38(13):15-18.
- [14] 黄文举.企业环保投入、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D].湖北大学,2022.
- [15] 杨静,施建军.企业生态创新与经济绩效曲线关系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32(13):95-99.

Digital Transformati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Hong Beigao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data from A-share listed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from 2013 to 2023, this paper uses a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 and a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framework to explore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By conducting bibliometric analysis using CiteSpace software,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green innovation has become a research hotspot, but there is a gap in the systematic exploration of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among the thre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perty rights heterogeneity. The study shows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lays a mediating role; the nature of property rights has a heterogeneous impact, with the enhancement effect being more significant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ased on thi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to suppor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anufacturing;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从符号狂欢到价值共赢：用户共创式舆情生成逻辑 与转化机制研究

李文琦¹

(1. 东莞城市学院, 广东 东莞 523000)

摘要: 2026 马年春节营销期间, “伊利签约马伊琍”事件从网友自发的谐音玩梗, 逐步发酵为全民参与的共创式舆情奇观, 成为新媒体时代品牌正向舆情运营的典型案例。本文以该事件为研究对象, 采用案例研究法与内容分析法, 选取微博#马伊琍代言伊利#话题下 1000 条帖文为样本, 探讨用户共创式舆情的生成逻辑与转化机制。研究发现, 该事件的成功源于“马年生肖-马伊琍人名-伊利品牌”的三重符号契合, 以及品牌“听劝式”响应构建的用户信任; 基于此, 本文提炼出适配快消行业的正向舆情转化“STEP 模型”。研究为新媒体时代品牌正向舆情运营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本。

关键词: 用户共创; 网络舆情; 符号互动; 听劝式营销; 品牌传播

基金项目: 东莞城市学院教改课题 (2025yjg053)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356

一、引言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 网络舆情已从传统的“品牌单向传播”转向“用户参与共创”的新形态, UGC (用户生成内容) 不再是品牌传播的配角, 反而成为舆情生成与发酵的核心驱动力。春节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传统节庆, 是品牌营销的黄金节点, 也是用户 UGC 创意集中爆发的时期。2026 马年春节期间, 乳业头部品牌伊利遭遇了一场“意外”的舆情狂欢——网友在马思纯代言伊利的微博评论区, 自发玩起“马年请马伊琍代言伊利”的谐音梗, 该梗快速扩散, 形成#马年请马伊琍代言伊利#热门话题, 最终推动伊利正式签约马伊琍, 实现了“用户创意→舆情发酵→品牌响应→价值共赢”的完整闭环。

这一事件打破了传统品牌营销“自嗨式”传播的困境, 展现了正向用户共创式舆情的强大价值, 但也引发了一系列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在节庆营销语境下, 正向用户共创式舆情的生成逻辑是什么? 品牌如何精准捕捉用户 UGC 中的正向信号, 实现从“网络玩梗”到“品牌资产”的有效转化? 基于此, 本文以 2026 马年伊利代言事件为案例, 聚焦用户共创式舆情的生成与转化机制, 结合符号互动论、使用与满足理论, 展开深入分析, 为品牌正向舆情运营提供参考。

二、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一) 核心概念界定

本文的核心概念为“用户共创式舆情”, 其区别于传统的被动舆情, 是指在新媒体语境下, 用户基于自身需求与兴趣, 自发产生创意内容并形成初步舆论, 品牌通过监测识别、主动响应、创意采纳等方式, 与用户共同推动舆论发展, 最终实现品牌与用户双向价值增值的正向舆论形态。其核心特征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主体性, 用户是舆情的发起者与参与者, 品牌是舆情的响应者与推动者; 二是正向性, 舆情整体呈现积极、正面的情感倾向,

无明显负面争议；三是共创性，品牌与用户形成双向互动，共同完成舆情的生成与转化，实现“双赢”。

（二）理论支撑

符号互动论可追溯至 20 世纪初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与社会心理学思潮，其核心奠基人是乔治·赫伯特·米德。核心观点认为社会互动的本质是符号的意义建构与传递，人们通过对符号的解读与互动，形成共同的意义认知。^[1]在本文中，“马”作为马年生肖符号，承载着“吉祥、奋进”的节庆内涵，具有极强的国民度；“马伊琍”作为公众人物符号，其“知性、可靠”的个人形象具有高辨识度；“伊利”作为品牌符号，承载着“健康、放心”的品牌内涵。三者通过“马”字的生肖关联与“伊利”的谐音关联，形成符号互动，为舆情生成提供了天然的基础。

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用户接触媒介、参与传播活动，本质上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特定需求。^[2]在马年伊利代言事件中，用户参与玩梗、传播相关舆情，主要是为了满足三个方面的需求：一是娱乐需求，春节期间用户处于休闲放松状态，谐音梗的趣味性能够满足其娱乐消遣的需求；二是社交需求，通过玩梗、分享创意内容，用户能够获得社交货币，实现与他人的互动交流；三是参与需求，用户通过提出创意、呼吁品牌响应，获得“被重视、被认可”的参与感与归属感。

三、伊利代言事件的舆情演进三阶段

2026 马年伊利代言事件的舆情演进，大致可分为萌芽与发酵、响应与落地、延续与沉淀三个核心阶段，每个阶段均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且伴随着关键数据的变化，完整展现了用户共创式舆情从自发产生到价值沉淀的全过程。

（一）第一阶段：萌芽与发酵

时间为 2025 年底至 2026 年 1 月初。该阶段的触发点的是伊利官宣马思纯为品牌代言人，网友在其微博评论区自发玩起“马年就该请马伊琍代言伊利”的谐音梗。UGC 的病毒式传播常常伴随着模因效应，也就是某个视觉符号、语言梗或者情感基调在复制与变异的过程中引起群体的模仿行为，从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网络热点。^[3]初期仅为少数网友的娱乐互动，传播范围有限，互动量较低。随着玩梗网友的增多，相关内容逐步在微博、小红书、抖音等平台扩散，形成初步的舆论氛围。

（二）第二阶段：响应与落地

时间为 2026 年 1 月中旬至 1 月 19 日。在舆情发酵至顶峰时，伊利展现出高效的舆情响应能力，仅用 48 小时就捕捉到网友玩梗的正向信号，通过官方微博互动回应，表达对用户创意的关注与重视。随后邀请大鹏导演拍摄《寻找马伊琍》互动短片，短片中巧妙融入网友创造的谐音梗，采用小品式风格，增强内容的网感与互动性。1 月 19 日，伊利正式官宣马伊琍为品牌代言人，同步组建马伊琍、马思纯、李现的代言矩阵，在官宣文案中明确致谢网友的创意，将用户的“玩梗”切实转化为品牌的“营销行动”。该阶段舆情热度达到峰值，微博核心话题#马伊琍代言伊利##马年搭子选伊利#阅读量均破亿，讨论量超 50 万，实现品牌现象级流量破圈。

（三）第三阶段：延续与沉淀

时间为 2026 年 1 月下旬至 2 月。为实现舆情热度的持续转化，伊利并未停留在代言官宣层面，而是进一步深化用户共创，将网友创意融入品牌营销的全过程。发起“马伊琍马年选伊利”上联征集活动，将单向代言宣布转变为全民参与的互动游戏，不少网友纷纷调用各类 AI 工具生成下联参与互动，激发了用户 UGC 二次创作的热情。AIGC 互动营销通过技术赋权用户，使节日符号从品牌单向输出转向双向共创，既增强情感共鸣，又提升传播裂变效率。^[4]该阶段，舆情热度逐步平稳，但品牌价值持续沉淀，据新浪财经行业报道及公开财经分析数据显示，伊利以 350 万元的低成本（含马伊琍代言费及传播成本），撬动了超 4 亿元的品牌收益，实现高达 114 倍的投资回报率，成功将短期的网络狂欢转化为长期的品牌资产。

四、用户共创式舆情的生成与转化机制分析

（一）生成逻辑：三重契合下的符号狂欢

2026 马年伊利代言事件中，用户共创式舆情的爆发并非偶然，而是符号契合、情感契合、主体契合三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三者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共同推动舆情从“小众玩梗”走向“全民狂欢”。

符号契合是舆情生成的基础前提。如符号互动论所揭示的，符号的意义建构与传递是社会互动的核心，而本次事件的核心优势就在于“马年生肖-马伊琍人名-伊利品牌”的三重符号完美耦合。从符号关联来看，“马伊琍”人名中的“马”与马年生肖符号完全重合，“伊琍”与伊利品牌名称同音，这种谐音与生肖的双重关联，无需额外解释即可被用户快速理解和记忆，极大降低了传播门槛。从符号意义来看，马年生肖符号承载着“吉祥、圆满”的节庆内涵，马伊琍“知性、可靠”的国民形象，与伊利“健康、放心”的品牌定位高度契合，使得符号互动不仅停留在“玩梗”层面，更实现了意义的正向传递。这种符号耦合，让伊利无需额外投入预热成本，就实现了 UGC 内容的自发扩散，为舆情发酵奠定了坚实基础。

情感契合是舆情发酵的核心动力。结合使用与满足理论，春节语境下的用户需求，为舆情发酵提供了重要支撑。春节期间，用户处于休闲放松的状态，对娱乐化、轻量化的内容接受度极高，而“马伊琍代言伊利”的谐音梗，恰好契合了用户“轻松玩梗”的核心需求，形成了强烈的情感共鸣。从情感倾向来看，样本帖文中 82% 的正面评论，体现了用户对玩梗创意、对伊利品牌的认可与期待，这种积极情绪的扩散，使得舆情始终保持正向发展，未出现对立、争议等负面倾向。同时，用户通过创作广告语、表情包等 UGC 内容，获得了“被关注、被认可”的创作快感，“全民玩梗”的氛围也让用户获得了归属感，进一步激发了用户的参与热情与传播意愿。

主体契合是舆情持续的关键保障。品牌的形象与态度，直接影响用户的参与意愿与舆情的发展方向。伊利作为乳业头部品牌，长期以来塑造了亲民、务实的品牌形象，这种“不端不装”的品牌气质，为用户敢于“劝签”、乐于参与提供了心理安全区。与部分品牌忽视用户声音、坚持“自嗨式”传播不同，伊利在舆情萌芽期就展现出开放、谦逊的态度，没有对网友玩梗进行忽视或打压，而是主动关注、积极互动，这种姿态让用户感受到“被重视、被尊重”，进一步强化了用户的参与感，推动舆情持续发酵。

（二）转化机制：STEP 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基于 2026 马年伊利代言事件的实践，结合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本文提炼出适配快消行业的正向用户共创式舆情转化“STEP 模型”，该模型分为四个环节，层层递进、闭环衔接，清晰展现了从“用户玩梗”到“品牌资产”的完整转化路径，具体如下：

第一，Scan（监测识别）：品牌通过舆情监测工具，快速捕捉萌芽期的正向 UGC 信号，这是舆情转化的前提。在本次事件中，伊利建立了完善的 UGC 舆情监测机制，能够及时捕捉到网友在马思纯代言评论区的玩梗内容，准确判断舆情的情感倾向、传播趋势与用户需求，并在 48 小时内完成舆情信号的识别与响应，避免了舆情“降温”或“跑偏”。建立并完善社交媒体场景下的舆情监控系统，是品牌安全管理的重要保障。因此，企业需要构建健全的社交媒体舆情监测体系，依托科技手段对各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实时巡查，及时捕捉与企业发展相关的舆论动态。^[5]重点关注正向 UGC 创意的传播动态，是实现舆情转化的关键一步。

第二，Take（采纳响应）：在舆情发酵至峰值时，品牌以官宣、致谢等方式正式采纳用户创意，完成舆情转化的核心转折。伊利在相关话题登上热搜、舆情达到顶峰时，及时官宣马伊琍为品牌代言人，明确致谢网友的创意，将用户的“玩梗”切实转化为品牌的“营销行动”。同时，伊利采用“泄密式官宣”策略，通过网友曝光海报、拍摄路透等方式维持热度，进一步放大了舆情效应。这种“用户所想即品牌所为”的响应方式，极大提升了用户的认同感，推动舆情从“用户自发传播”转向“品牌与用户共同传播”。

第三，Embed（深度融合）：品牌将采纳的 UGC 创意，深度融入品牌广告、公关活动、产品推广等各个环节，实现 UGC 创意与品牌价值的深度绑定，这是舆情转化的关键路径。伊利邀请大鹏导演拍摄《寻找马伊琍》互动短片，短片中巧妙融入网友创造的谐音梗，采用小品式风格，通过马思纯、李现出镜制造疑惑、自嘲广告套路的方式，增强内容的网感与互动性，最终以马伊琍惊喜亮相呼应主题，并在结尾鸣谢贡献创意的网友；同时发起“马伊琍马年选伊利”上联征集活动，巧妙将单向代言宣布转变为全民参与的互动游戏，极大降低了传播门槛，激发了 UGC 二次创作热情，使品牌信息在趣味互动中完成深度渗透。

第四, Profit (价值沉淀): 通过前面三个环节的有序推进, 实现舆情热度向品牌资产的有效转化, 这是舆情转化的最终目标。本次事件中, 伊利仅投入 350 万元低成本, 便撬动了超 4 亿元的品牌收益, 实现高达 114 倍的投资回报率, 刷新了乳业营销效率的天花板。具体来看, 代言官宣后, 全网曝光量超 63 亿次, 相关话题阅读量破 1.3 亿, 品牌认同度显著提升。伊利成功将短期的网络狂欢, 沉淀为长期的品牌资产, 实现了流量与收益的双重突破, 也验证了 STEP 模型的可行性与实用性。

结语

本文以 2026 马年伊利代言事件为案例, 对用户共创式舆情的生成逻辑与转化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 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用户共创式舆情的爆发需具备“符号天然契合”的前提, “马年生肖-马伊琍人名-伊利品牌”的三重符号耦合, 为本次舆情生成提供了天然基础, 降低了传播门槛; 第二, 情感契合与主体契合是舆情发酵的核心动力, 春节语境下的娱乐需求与用户参与需求, 以及伊利亲民、开放的品牌姿态, 共同推动舆情从“小众玩梗”走向“全民狂欢”; 第三, 品牌的“快速响应、真诚采纳”是正向舆情成功转化的关键, 基于此提炼的“STEP 模型”(监测识别-采纳响应-深度融合-价值沉淀), 为快消品牌正向舆情运营提供了可复制的路径; 第四, 用户共创式舆情不仅能够实现品牌价值的提升, 还有利于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环境, 能够为企业经营提供启示。

参考文献:

- [1]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 赵月瑟,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 [2]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 [3] 李洁.用户生成内容在数字营销中的力量及其对品牌声誉的双向影响[J].国际品牌观察, 2026, (02): 95-97.
- [4] 周瑶.符号消费视阈下 AIGC 驱动品牌节日营销创新研究[J].中国广告, 2025, (07): 80-85.
- [5] 李子薇.社交媒体营销对企业品牌影响力的提升研究[J]. 2025(19): 46-48.

From Symbolic Carnival to Value Win-Win: A Study on the Logic and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User Co-Creation in Public Opinion Generation

Li Wenqi¹

¹Dongguan City University, Guangdong, Dongguan 5230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marketing period of the 2026 Year of the Horse, the incident of "Yili signing Ma Yili" evolved from spontaneous homophonic memes created by netizens into a national co-created public opinion spectacle, which has become a typical case of positive brand public opinion management in the new media era. Taking this incident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this paper adopts the case study method and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selecting 1,000 posts under the Weibo topic #MaYiliEndorsesYili# as research samples to explore the generation logic and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user co-created public opin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success of this incident lies in the triple symbolic fit among "the Year of the Horse zodiac, Ma Yili's name, and the Yili brand", as well as the user trust constructed by the brand's "advice-accepting" response strategy.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paper refines the "STEP Model" for positive public opinion transformation applicable to the fast-moving consumer goods (FMCG) industry. This study provides a replicable practical paradigm for brand positive public opinion management in the new media era.

Keywords: User Co-creation; Online Public Opinion; Symbolic Interaction; Advice-accepting Marketing; Brand communication

“破圈”与“重构”：共情传播视角下非遗的年轻化路径研究

徐沁怡¹ 王奕然²

(1.华中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2.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与年轻化传播, 是数字化语境下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命题。在非遗年轻化行动主体离散、符号转译悬置、叙事共鸣失效、传播渠道依赖及价值认同断裂的五维困境下, 共情传播具有拓展理论纵深、助推代际传承、激发社群裂变的赋能价值。依托共情传播的实践进路, 以情感共同体协同、情感化符号转译、生命叙事创新、沉浸式渠道构建及渐进式认同培育为核心, 能有效实现文化“破圈”与生态“重构”。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共情传播; 年轻化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358

1 共情驱动下非遗年轻化传播的价值揭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 “青年是事业的未来和希望”^[1-2]。当前,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转型期, 共情式交往是面向青年舆论引导的理想模式。^[3]以共情传播构建“价值揭示—困境探析—路径重构”分析框架, 有助于搭建非遗与青年间的情感联结桥梁, 推动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与可持续发展。

共情传播以非遗研究的视角跃迁、非遗传承的代际转译、非遗传播的数字演化, 在理论建构、文化传承、社会传播维度, 体现了拓展理论纵深、助推代际传承、激发社群裂变的赋能价值。

共情传播为非遗研究提供从客体到主体的分析视角跃迁。推动视角转化, 助推研究由文本、形式、历史的考据, 转向对情感、体验、意义的分析。丰富理论工具, 助推研究超越功能主义的局限, 引入情感社会学、符号互动论、具身认知论等多元分析框架。形成实践导向, 通过强调传播过程中的主体性、情境性、现实性, 助推研究关注年轻叙事策略、生活嵌入机制、现实适应转化等现实问题。

共情传播为非遗传承提供从技艺到价值的代际交互动能。重塑话语体系, 助推传承介质由知识、技能、经验的单向灌输, 转向文化底蕴、群体智慧、生活美学的动态转译。革新体验机制, 助推传承过程超越技艺规训, 强化审美体验、心理疗愈、身份认同的情感连接。重构信任契约, 助推传承关系规避流量化、商业化、娱乐化的侵蚀, 确立情感互信、价值共享、社群共育的师道传承机制。

共情传播为非遗传播提供从实体到数字的社群交流样态。重塑传播内容, 推动传播焦点从物态展演、工艺规程、历史知识的单向展示, 转向情感故事、场景体验、价值共鸣的立体叙事。创新传播机制, 驱动传播路径从机构主导、线性发布、地域限制的固化模式, 转向用户共创、算法助推、跨界联动的裂变式扩散。拓展传播效能, 促使传播目标从文化普及、形象塑造、资源导流的短期曝光, 深化为认同建构、社群培育、生态激活的持续运营。

2 共情缺失下非遗年轻化传播的困境探析

共情缺失下, 非遗年轻化面临主体协同断裂、符号转化失当、内容表达失焦、渠道构建错位、认同建构乏力

作者简介: 徐沁怡(2005—), 女, 本科, 新闻学;

王奕然(2002—),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通讯作者: 徐沁怡

的困境，致其在组织动员、文化转译、叙事创新、媒介适配、价值内化层面遭遇系统性梗阻。

2.1 主体协同困境

行动主体的离散，导致非遗传播过程中合力的消解。非遗年轻化传播过程中，传承人、行政主体、市场主体、学界、媒体及年轻群体等各主体间呈现出目标不一、行动分散、衔接松散的离散状态，导致传播资源在内耗中空转，传播链条在隔膜中断裂，传播效能在离散中衰减。传承人以原真性守护为导向，致使年轻化陷入传统稀释的保守困境；行政主体以政策考核为导向，致使年轻化陷入指标化的形式困境；市场主体以商业回报为导向，致使年轻化陷入符号消费的浅层困境；学界以理论建构为导向，致使年轻化陷入实践脱节的疏离困境；青年群体以被动接受为定位，致使年轻化陷入参与缺位的边缘困境。

主体离散的现状，在于各方对非遗的根本价值认知存在差异，且缺乏以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为基础的联动纽带。一是认知维度错位，内在驱动逻辑迥异。各主体基于自身场域诉求，形成了行政绩效逻辑、资本回报逻辑、学科规范逻辑和文化本位逻辑，影响了共识目标的形成。二是话语体系冲突，有效沟通渠道淤塞。各主体基于自身交流范式，形成了政策文件话语、影响传播话语、理论批判话语和经验体悟话语，构成了实质沟通屏障。三是协同平台匮乏，长效联动架构虚化，现有合作体现出项目制、活动化、展演性特征，导致各主体间的合作停留在构想性、临时性、渐次性层面。

2.2 符号转化困境

文化符号的悬置，导致非遗传播过程中意义的阻隔。非遗符号在跨域传播与年轻化转译过程中遭遇“去语境化”的意义剥离，导致文化意义在解码中扭曲，情感能量在转译中流失，价值底蕴在展示中空心。一是符号形态的固化与孤立呈现。非遗符号常常被孤立化、静态化、标本化进行展示，剥离了其原有的生产生活、工艺流程与使用场景。二是符号阐释的权威与单向灌输，非遗符号常常被抽象化、宏观化、标准化解读，缺乏开放性的解读空间与互动性的意义协商。三是符号语境的剥离与关联断裂。非遗符号常常被碎片化、娱乐化、浅层化传播，导致符号文脉被切割、意义被重组。

符号悬置的困境，源于传播主体在转化策略、叙事方法与连接机制三个层面的系统性能力不足。一是现代化转译与创造转化能力不足。现有符号转化多停留在物理形态的简单复制、机械移植、暴力拼贴，缺乏应用当代设计美学、数字呈现技术、青年文化元素的能力。二是情感化叙事与共情编码策略匮乏。现有符号叙事多停留于情况说明、内容解读、信息传播，未能将符号转化为具有人格魅力、情感张力、命运感召的情节叙事。三是场景化连接与意义激活机制薄弱。现有符号传播缺乏基于叙事重构、场景体验、文化共创的再造过程，未能将符号嵌入青年的生活场景、社交场景与消费场景中。

2.3 内容表达困境

叙事方式的固化，导致非遗传播过程中共鸣的失效。在叙事层面，非遗传播长期陷入视角单一、话语陈旧、形态固化的程式化困境，导致传播内容在触达中遇冷，情感体验在接收中降维，心理共鸣在互动中消解。一是叙事视角的宏大化与仰视化，传播叙事往往侧重于历史的厚重、技艺的崇高、价值的宏大，导致用户产生心理畏惧和情感疏离。二是叙事内容的器物化与技艺化，传播重心往往聚焦于器物的精美构造、流程的繁复细节、材料的考究来源，剥脱了人的命运、情感、经历。三是叙事语态的严肃化与说教化，传播语态往往呈现单向度的灌输、封闭式的独白、排他性的宣讲特征，难以适应互联网场域特征。

叙事固化的根源，在于传播主体叙事逻辑转换、情感价值挖掘与媒介话语适配上的系统性滞后。一是传播逻辑与受众心理的错位。传播主体固守于传统的教育逻辑、宣传逻辑、保存逻辑，忽视了青年群体追求的情感逻辑、社交逻辑、娱乐逻辑。二是情感挖掘与故事重构能力的匮乏。现有叙事能力多停留在对非遗事实的陈述、考证、罗列层面，缺乏运用戏剧化冲突、悬念式结构、人格化塑造等手法进行故事重构的能力。三是媒介语境与话语体系的适配脱节。非遗数字化传播长期体现研究滞后、媒介单一、同质严重、忽视受众的现状^[4]，缺乏运用短视频叙事、交互式叙事、游戏化叙事等新型语态的能力。

2.4 渠道适配困境

传播路径的依赖,导致非遗传播过程中圈层的分化。非遗传播长期固守线下展演、官方媒体、行政动员等传统路径,导致传播范围在圈层中固化,交互深度在单向中停滞,受众规模在壁垒中萎缩。一是传统渠道的惯性依赖。非遗传播路径多局限于官方媒体的通报式发布、博物馆体系的陈列式展示、电视节目的观赏性播出,缺乏进入青年场域的主动性。二是算法推荐的流量封锁。传播内容在数字平台遭遇算法选择、流量分发、信息过滤,难以突破“信息茧房”。三是交互场景的浅层连接。非遗传播形态多停留在平面的图文浏览、静态的视频观看、简单的点赞转发,难以形成强关系的社交连接。

路径依赖的根源,在于传播主体对数字化连接逻辑、算法分发机制与社群交往规则的适应性缺失。一是技术理性对文化理性的挤压。平台算法优先推荐高热度、强娱乐、快节奏的快消内容,非遗内容因其慢节奏、深积淀、弱刺激的特性,在流量竞争中处于劣势。二是圈层渗透与社群运营能力的不足。传播主体缺乏运用垂直类社区、兴趣化圈层、社群化运营进行精准触达的能力,难以实现破圈传播。三是场景构建与社交属性挖掘的滞后。现有体系未能将传播渠道转化为青年的社交货币、情感纽带、身份标识,导致传播止于信息的触达而非情感的连接。

2.5 认同建构困境

情感联结的断裂,导致非遗传播过程中身份的疏离。当前非遗传播未能建立起“文化认知—情感认同—身份构建”的路径,导致文化认同在表层中悬浮,价值内化在阻隔中断联,护持行动在冷漠中缺位。一是心理认知的客体化与疏离化。青年群体倾向于将非遗视为与现代生活割裂的历史遗存与静止对象,缺乏基于生活关联的心理投射与情感共振。二是身份建构的边缘化与悬置性。非遗文化符号难以嵌入青年的个性表达、自我概念与社群社交体系,导致主体归属感的缺失。三是文化实践的即时性与消费性。青年对非遗的接触多呈现为视觉层面的短暂消费与符号层面的简单掠取,缺乏向长效实践转化的行为逻辑。

情感断裂的根源,在于传播过程忽视了青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知的底层逻辑,即信息流动的去中心化、虚拟空间的情感共鸣、社交网络的身份构建^[5]。一是集体记忆的代际断层。现代化场域阻隔了非遗所依附的农耕记忆、乡土场域与社群氛围,导致青年群体缺乏共鸣的经验基础、情感线索、感悟路径。二是自我投射的镜像缺失。传播内容未能建立非遗精神与青年心理的同构关系,导致青年无法在非遗中寻求理想映射投射。三是移情机制的引导失效。现有传播缺乏引导青年进行角色代入、情感转移、价值内化的心理机制设计,未能让非遗成为青年获得社交资本、情感抚慰、精神寄托的载体。

3 共情赋能下非遗年轻化传播的路径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特色文化逻辑的仪式行为^[6]。其传播年轻化既是技术迭代过程,也是情感共同体构建过程。基于此,应在主体、符号、内容、渠道及认同五个维度,重构非遗传播实践的情感机制。

3.1 主体联动路径

非遗传播中,各行动主体体现了目标离散化、行动原子化、纽带形式化的格局。应以情感共同体理念重塑传播关系,打破行政、市场与文化的壁垒,建立基于平等对话与价值共创的协同机制,实现从“物理拼凑”到“化学融合”的转变。一是建立青年参与式治理机制。打破行政主导的单向决策模式,在非遗项目规划、内容创作、活动设计中,设立青年议事会、校园大使、社群共创团等制度化参与渠道,赋予青年从“被传播对象”转向“共创主体”的话语权与决策权,使青年情感需求与生活经验直接嵌入非遗传播顶层设计与执行过程。二是打造跨界协同创意平台。搭建连接传承人、设计师、媒体从业者、青年领袖、平台运营者的常态化协作空间,通过主题工作坊、创意孵化营、联合实验室等形式,推动非遗技艺与青年文化符号、数字技术、潮流美学进行跨界融合,形成多方价值共创、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协同创新机制。三是完善共情导向的评价体系。改革以活动场次、报道数量为指标的绩效考核,引入青年情感共鸣度、社群活跃度、内容二次创作率、身份认同深化度等共情指标,将青年参与度、满意度、归属感纳入主体协同成效的核心评估维度,引导各主体从“完成任务”转向“建立连接”。

3.2 符号更新路径

基于非遗符号在年轻化转译中遭遇的语境悬置、形态固化、意义扭曲等问题,应推行情感化编码策略,将晦涩的文化符号转译为符合审美习惯、社交语境、生活场景的情感符码,实现从“历史标本”到“社交货币”的形态跃迁。一是实施符号的场景化再编码。将非遗符号从博物馆、展演厅的静态展示中解放出来,嵌入青年日常的学习、社交、消费、娱乐场景,通过表情包、输入法皮肤、游戏道具、潮玩手办等轻量化载体,实现符号形态从“历史标本”向“生活道具”的转译,降低青年认知与使用门槛。二是强化符号的情感化叙事。摒弃对符号物理形态与工艺细节的机械复述,转向挖掘符号背后的匠人命运、家族记忆、乡土情感,运用短视频剧情、漫画故事、播客访谈等形式,将符号转化为承载情绪张力、人格魅力、命运起伏的情感叙事,激活青年情感投射与价值认同。三是促进符号的交互式共创。开放符号的数字化版权与创作接口,鼓励青年通过二创、混剪、改造等方式参与符号再生产,在共创过程中赋予符号新的时代内涵与青年个性表达,形成符号意义在代际间的动态协商与共同演进。

3.3 内容创新路径

针对传统渠道路径依赖、商业平台算法封锁、交互场景浅层基础导致的现状,应构建具身在场的沉浸式传播场景,突破算法茧房,实现从单向观看向全感官参与、深度交互的传播生态转型。一是构建微叙事与日常化视角。打破宏大历史叙事与官方宣讲语态,转向青年可感知的微观生活场景,通过“非遗+校园生活”“非遗+职场解压”“非遗+社交货币”等切口,将非遗嵌入青年日常焦虑、情感困惑、身份探索的具体问题,实现从“讲历史”到“讲故事”、从“教知识”到“解困境”的视角转换。二是塑造可代入的人物形象。摒弃“模范匠人”的脸谱化塑造,呈现传承人的成长困惑、代际冲突、创新挣扎,打造“青年传承人”“跨界手艺人”“返乡创业者”等具有身份接近性与情感共鸣点的角色模板,使青年在“他者镜像”中完成自我投射与人生想象。三是开发沉浸式体验内容。超越图文视频的平面展示,运用VR/AR技术还原非遗生产场景、设计互动剧情场景、开发游戏化任务,让青年在具身体验中感受技艺的温度、文化的肌理与情感的张力,实现从“观看”到“在场”的体验升级。

3.4 渠道优化路径

共情传播引起的社会性情感共鸣能形成特定的记忆场域^[7]。在路径依赖、算法封锁、圈层壁垒问题下,应基于共情传播构建具身在场的沉浸式传播场景,突破算法茧房,实现从单向观看向全感官参与、深度交互的传播生态转型。一是深耕青年聚集的垂直平台。放弃“一网打尽”的粗放投放,精准进入B站、小红书、抖音、豆瓣、知乎等青年高频使用的垂直社区,依据各平台话语风格、内容形态、互动规则进行差异化内容定制,实现从“入驻”到“融入”的平台适配。二是构建跨平台联动机制。打通线上内容生产与线下活动体验的双向通道,通过线上话题预热、线下快闪体验、线上二次创作、线下成果展示的全链路设计,形成“线上种草—线下体验—线上分享—社群沉淀”的传播闭环,突破单一平台的流量天花板。三是强化社群化深度运营。将渠道从“信息发布端口”升级为“社群互动空间”,建立非遗兴趣小组、同城体验社群、线上共创部落,通过定期话题互动、成员故事分享、专属权益设计,培育青年对非遗社群的归属感与身份认同,实现从“流量”到“留量”的运营转型。

3.5 认同培育路径

传播在情感、态度层面引起的认同,比认知层面引起的认同更容易引起一致的行动^[8]。针对青年群体的认同断裂问题,应通过传播过程,引导青年将非遗文化内化为自我身份的一部分,完成从旁观者到传承者的角色蜕变。一是设计渐进式认同梯度。放弃一蹴而就的宏大认同诉求,建立“认知好奇—情感好感—价值认同—行动参与—身份内化”的渐进路径,通过轻量化入门内容降低认知门槛,通过情感故事触发初步好感,通过社群互动深化价值认同,通过实践体验促进行为转化,最终使非遗成为青年自我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打造青年文化偶像。培育与青年同龄、气质相近、经历相通的“青年非遗传承人”“Z世代手艺人”“赛博技术传承者”等新型文化偶像,通过他们的社交媒体、直播分享、线下沙龙,为青年提供可模仿、可接近、可互动的身份模板,使非遗传承从“远观”变为“可及”的人生选项。三是建立可见的反馈机制。将青年的关注、点赞、分享、参与转化为对

传承人、对社区、对非遗项目的实际支持,通过透明的项目进展公示、贡献者名单展示、参与者权益回馈,让青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情感投入如何转化为文化守护的实际行动,在可见的反馈循环中强化身份归属与行动承诺。

4 结论

探寻能够连接历史遗产文脉与当代青年情感的传播范式,既是青年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是媒介变革的时代之需。基于共情传播视角,非遗年轻化需超越技术适配层面,转向以青年情感体验为中心的组织机制创新、话语体系再造与身份关系重构,最终构建多元主体共创、青年深度参与、文化持续再生的活态传承新生态。未来,应注重上述路径的协同整合,持续关注非遗传承演进、融媒技术迭代、青年文化动态,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J].求是,2024,(8):4-13.
- [2] 习近平.奏响睦邻友好主旋律 共谱命运与共新篇章——会见中越人民大联欢活动代表时的致辞[N].人民日报,2025-4-15(2).
- [3] 赵永华,赵家琦,石俊,窦书棋.动之以情:面向青年舆论引导的情感交往模式——基于情感联结与同一的探索性研究[J].当代传播,2024,(5):37-43.
- [4]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的研究现状、现实困境及发展路径[J].理论月刊,2021,(9):87-94.
- [5] 徐用祺.当代青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网络表征与未来路向——以微博、抖音、“B站”网络社交平台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2025,(4):87-94.
- [6] 冯梦瑶.仪式传播与非遗传承:文化空间逻辑及其数字转化路径[J].南京社会科学,2025,(11):178-188.
- [7] 聂智,施婉仪.共识、共情与共享:Z世代红色文化认同的提升路径[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9(4):177-181.
- [8] 赵建国.论共情传播[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5,(9):47-52.

"Breaking out of the circle" and "reconstruction": A study on the path of youthific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athy communication

Xu Qinyi¹, Wang Yiran²

(¹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China; ²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China)

Abstract: The living inheritance and youth-oriented dissemin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in cultural construction within the digital context. Amidst the five-dimensional dilemmas of dispersed youth-oriented action subjects, suspended symbol translation, ineffective narrative resonance, dependent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fractured value recognition, empathetic communication possesses empowering values in expanding theoretical depth, facilitating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and stimulating community fission. Relying on the practical approach of empathetic communication, with emotional community collaboration, emotional symbol translation, life narrative innovation, immersive channel construction, and gradual identity cultivation as the core, it can effectively achieve cultural "breakthrough" and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mpathy communication; rejuvenation

感官愉悦与审美体验 ——ASMR 疗愈研究

冯光祥 杨欣悦

(云南大学,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ASMR 作为当代活态的审美艺术现象, 具有多元的类型特征、受众偏好与性别差异。其缓解焦虑的功能虽存在争议, 但多数研究仍支持其正面作用, 是契合当下人群需求的低成本便捷疗愈方式。各类 ASMR 均有差异化的审美特质, 当前 ASMR 视频也存在猎奇化、剧场性缺席等问题。作为数字时代审美实践与生理需求的结合, ASMR 未来可通过融入传统文化、构建叙事场景实现深度转型, 也可纳入慢速现代化语境展开深入阐释。

关键词: ASMR; 感官愉悦; 超现实; 暴力美学; 审美接受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360

引言

ASMR (Autonomous Sensory Meridian Response) 全称译为“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 是一个用于描述感知现象的词 (提出于 2007 年), 可被定义为由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刺激而让人在颈部、头皮、背部或者身体其他范围内产生一种独特的、令人愉悦的似电击刺痛的感觉, 这种感觉常伴有放松和幸福的感受, 表现为头皮发麻、身体放松、愉悦感蔓延等反应, 又名耳音、颅内高潮, 常被人描述为对睡眠有帮助和缓解压力的。而引发这种自发性知觉高潮反应的触发音源多种多样, 这些音源通常由某些从事此类音源制作的人利用高清录音设备进行制作收集并发布, 在 ASMR 视频集中的抖音、小红书和 Bilibili 等视频网站上, 最受欢迎的触发视频内容为重复某一单一任务、耳语和个人关注、各类清脆的声响、缓慢动作等。

有关 ASMR 的研究中, 近几年多集中于国外, 国内的关注并不是很多。如知网中关于 ASMR 的权威研究资料寥寥无几, 因此中国在 ASMR 领域的学术研究亟待完善。不过, 在对国外学术论文的研究中可以发现, 这些研究结论大部分都指出 ASMR 对焦虑情绪和抑郁情绪有一定的抑制作用。ASMR 的神经科学机制明确, 触发音可激活前额叶皮层、岛叶等情绪调节区域, 促进多巴胺、血清素分泌。巴拉特&戴维斯 (Barratt & Davis) 2015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 约有 80% 体验过 ASMR 的用户表示这是一种“独特但舒服”的身体反应, 而另一部分人则完全无法产生这种感觉 (下附调研报告)。尽管就 ASMR 的概念于 2007 年被提出以来, 相关研究已经进行了十多年, 但有关 ASMR 相关视频缓解抑郁和焦虑作用, 依旧有一些相反的声音, Thomas A.Ditchbum 就曾指出 ASMR 不能有效地改善普通人群的心理健康和焦虑抑郁症状, Agnieszka B.Janik 等人也在其关于恐音症的研究中指出, 那些有 ASMR 经历的人, 恐音症的水平是更高的, 认为 ASMR 不能有效地改善普通人群的心理健康, 这就对该领域的结论发起了挑战。

ASMR 作为一种新兴的感官体验和放松方式, 近年来迅速流行并逐渐融入主流文化。剑桥大学 2022 年的对照实验揭开了 ASMR 助眠的量化证据: 实验组在睡前聆听 20 分钟 ASMR 音频后, 入睡时间平均缩短 37%, 深度睡眠时长增加 22%。一项 2015 年的 bilibili 哔哩哔哩用户群体活跃时间段数据报告则指出, B 站日均活跃用户 (DAU) 约 1.07 亿, 其中深夜时段 (0:00-2:00) 的活跃用户数为 2890 万人, 占 DAU 比例 24.5%, 深夜时段 (0:00-2:00) 中 18-24 岁用户使用 B 站的占比为 71% (全天的 1.3 倍), 其中 ASMR 占比为 38%。《心理健康蓝皮书: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 (2023~2024)》显示, 超过 60% 的都市人群存在轻度焦虑, 但是传统心理咨询成本高、时间

作者简介: 冯光祥 (2004—), 男,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世界文学与文艺理论;

杨欣悦 (2005—), 女,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通讯作者: 冯光祥

成本大。尽管 ASMR 对于抑郁和焦虑的缓解作用可能仍有待商榷，但是凭借低经济成本、低时间成本的优势，ASMR 受到年轻群体的喜爱，在轻量化疗愈领域占据重要地位。

2025 年 9 月 30 日，OpenAI 发布 Sora 2，作为新一代视频生成模型，Sora 2 为短视频行业带来了崭新的面貌。首先在短视频领域爆火的，就是 AI ASMR 视频。AI 为短视频领域的 ASMR 更新了种类，其中最显著的就是生长类 ASMR。这部分将在“视觉、听觉戏剧性”那一节中详细介绍。在 AI 赋能的时代背景下，ASMR 视频具有光明的未来，结合技术迭代也不断迭代着自身的类型，在该领域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一、不同 ASMR 现象的审美机制

（一）AI ASMR：感官愉悦与数字想象力的满足

1. 熟悉的生理性快感

ASMR 是由感官等刺激而让人在颈部、头皮、背部或者身体其他范围内产生一种独特的、令人愉悦的似电击刺痛的感觉，这种感觉常伴有放松和幸福的感受，表现为头皮发麻、身体放松、愉悦感蔓延等反应。同时，ASMR 的神经科学机制明确，触发音可激活前额叶皮层、岛叶等情绪调节区域，促进多巴胺、血清素分泌。这些对于 ASMR 的定义，明确表示了这属于一种生理反应。而产生这种生理反应的机制，在于生物体内调节情绪的化学元素的产生和释放。AI ASMR 对这种生理性快感的触发，本质上是身体本能审美的激活。并且，这种身体本能反应需要审美经验的积累。正是因为听到了熟悉的，能够让你自己愉悦的声音，因而对熟悉的感觉唤起了“回忆”，进而产生了快感。例如，当你的脑子想到酸的东西，就会情不自禁留下口水，这是一种生理性的快感。因此，当熟悉的审美经验通过陌生形式对感官进行刺激，人的生理本能仍会产生与审美经验符合的似曾相识的愉悦和快感。

2. 超现实的梦境具象化

AI ASMR 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能够超越现实，具有超现实性。它类似于人类的梦境，是一种幻觉，当做梦处在“梦境”的环境，能够自动补全本不应同时发生的逻辑空缺，让人难以发现其与现实的逻辑差异，形成一种虚幻的“逻辑自治体”。AI 视频工具正是这种梦境的超现实性的体现。它是梦境的、超现实的，但在某种环境中，又彰显着能够自治的逻辑。例如切割透明水果的 ASMR 视频，透明苹果、透明香蕉是不存在于现实之中的，然而，刀切割玻璃水果留下的透明平整截面，以及切割玻璃发出的清脆的声音，还有刀落在案板上的声音，都能够唤醒我们经验当中的熟悉感。

同时，AI 视频生成的条件，是需要人类能够用标准的语言去规定它的生成模式，类似于作者创作虚构小说时脑海中的虚构画面，但 AI 视频却能够将这种虚构画面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被视觉或者听觉接受。综合上述两种说法，我们可以看出 AI ASMR 视频是源于审美经验而又“反经验”的——梦境的形式存在于现实，而梦境的内容具有超现实性。这种“反经验”与由“经验”唤起的生理性快感相互对峙而又相互补充：一方面，经验中的熟悉的舒适场景形成了能够触发我们愉悦感的“回忆”中的听觉或者视觉特性，然而，AI 生产的场景的新颖性又激发了我们来自于新的对象的愉悦——新奇。生理性快感源于对熟悉事物的“回忆”，而新奇的场面又激发了我们的“想象”，两种来自不同对象的愉悦感交织着，形成了更加具有冲击性的愉悦感。

同时，AI 为短视频领域的 ASMR 更新了种类，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切万物”视频。这类视频内容的流行，源于其实现了“超现实梦境的具象化”，超现实的梦境变成了在现实的虚拟世界中可视可知的，这本身就是一种突破。这类内容呈现的“非自然”的状态，例如，切割透明水果，刀切割水果发出的清脆音，以及切割留下的完整光滑平面，都给人一种类似于强迫症得到满足的舒适感。到后来甚至发展出了切铁球、切自然灾害等等，这些视频均超越了现实经验的边界，激发着新奇感而产生的愉悦感。这是数字时代人类“审美想象力与技术的结合，满足了人们对于“超验”的新奇感。

3. 视觉、听觉戏剧性

AI ASMR 具有极强的戏剧性，这种戏剧性与传统戏剧中强调的情节矛盾和突转不同，传统的戏剧性是在符合现实范围内产生的矛盾与意想不到的结果，而 AI ASMR 的戏剧性是以超现实性为基础的。例如 AI ASMR 视频中有人喷某种发胶，光头就会生长出晶体头发，同时配合着晶体碰撞的悦耳的清脆音；或者将一种液体倒入培养皿中，培养皿瞬间生长成一个积木拼接的城市，同时配合着听觉感受上合理，但不存在于现实当中的悦耳的积木生长的声音。这些近似于蒙太奇手法的 ASMR 表现形式，对观众的视听感官造成了强烈的对比冲击，带来了新奇的审美体验。这种“戏剧性”能够有效激发感官审美的涌现，这些审美愉悦感大多来自于多巴胺的释放，十分契合短视频的节奏。因此，就算它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只是通过变幻着各种让人耳目一新的形式，来吸引人们驻足观看，它也一直受到欢迎。这种即时的审美愉悦，挑拨着人们生理上想要获得快感的因子，这时，ASMR 已经与疗愈相去甚远了，这也许也是人们认为 ASMR 视频不能助眠的原因。AI ASMR 的戏剧性特点甚至能够激起

人们的神经，导致更加兴奋的情绪，反而不利于助眠效果的发挥。

（二）破坏、复合类 ASMR：“暴力美学”与秩序平衡的审美张力

破坏美学的疗愈价值已得到艺术实践验证，通过“破坏与重构”的行为可实现情绪释放与心理沉淀。除了几乎只有 AI 能够完成的生长类 ASMR 视频之外，破坏和复合类也作为 AI ASMR 的一部分，同时获得了喜欢 AI ASMR 与破坏、复合类 ASMR 的群体的认可。当然，我们也不能否定它们自身具备的 ASMR 触发品质。

破坏与复合类，一类是纯粹的破坏。例如刮太空沙、捏捏乐等。这类 ASMR 视频在观看时，首先被观众所接受的，便是“破坏”这一行为；之后，观众能够看到，太空沙或者捏捏乐被“破坏”以后，便形成了一种令人舒适的“完整”感。太空沙被切割以后，形成的纵截面平整光滑，构成了另一种视觉上的“完整”。而捏捏乐被捏扁后逐渐复原的过程，也让人感到发自内心的舒适。这些 ASMR 视频的吸引力在于，“暴力美学”的快感与“秩序平衡”的心理满足。这里的“暴力美学”并非疯狂无序的暴力，而是被规定在一定范围之内的“暴力”。这种“暴力”更应该被看成是一种具有规律性的“破坏”，或者说被“破坏”的对象是可以被复原的。这种“破坏”行为所带来的感官刺激，是对日常生活秩序化的短暂突破，形成了“暴力”与“美感”的张力——如刮太空沙场景中，“刮除”的破坏行为与“表面平整”的秩序结果形成微妙平衡，恰好契合了部分用户的强迫症审美心理，实现了“秩序重构”的审美愉悦。

（三）人声、咀嚼类 ASMR：审美接受中的“日常性”与个体差异

人声和咀嚼类 ASMR 视频的一个重要共性，在于它们的日常性。英国心理学家布洛曾提出，主体需与审美对象保持适度的心理间隔，以超越实用功利进行纯审美观照。距离过近则易陷入现实，过远则丧失审美联系。人声、呼吸声等声音，过于贴近日常，导致了审美距离过近，便失去了纯审美的意味。而这类 ASMR 与日常过于贴近的结果就是，难以激发观众的审美兴趣。

同时，咀嚼声、耳语感等刺激具有比较明显的个体差异性。调研过程中有部分人反馈“咀嚼声”和“耳语感”反而会让它们感到生理不适。你可以想象，当你准备进入梦乡，听到有人在你旁边窃窃私语或者大声咀嚼，你还能不被干扰而睡着吗？因此，对于部分人来说，这些声音更可能导致烦躁情绪。不过，这部分的争议较为显著。于江森、王如兵教授经过研究证明咀嚼音在具有更高焦虑等级的群体中舒缓效果更加显著。鉴于目前国内外研究在这一领域的稀缺，人声、咀嚼音的疗愈效果仍待商榷。

（四）道具 ASMR：性别差异化的审美经验对审美趣味的塑造

女性用户对道具类 ASMR，尤其是化妆品类型的 ASMR 的偏好，反映了生活经验对于审美趣味的塑造。洛伦佐说，审美是一种能够生成存在主义框架的经验方式，我们由此成为“审美领域”的一部分，这是一种涉及客观、欣赏、创造性和表演维度的经验情境。人类的审美趣味既有他自己的感受，也有来自于生活经验的塑造。不同性别的经验存在不同，从大众的角度来说，女性接触化妆品相较于男性更加普遍，因此，女性对于化妆品的审美经验是更丰富的。她们对化妆品的质地、声音具有更加敏锐的感知力，这些内容唤醒了他们在生活经验当中的熟悉感，进而产生了更强的审美共鸣，形成了性别差异化的 ASMR 审美偏好。

二、对 ASMR 现象的评价和反思

（一）缓解压力的审美实践及反思

根据前面提到的《2024 年中国国民心理健康蓝皮书》，超过 60% 的都市人群存在轻度焦虑。在节奏变快的信息化时代，每个人都是信息洪流中那个被裹挟的蚂蚁。我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在生活中行进着，有时难免会陷入忙碌却不知为何而忙的困境，这就助长了空虚感的诞生。与此同时，闪光的一面在互联网被不断放大，而芸芸众生则在互联网不断生产焦点的过程中泯然，自身的空虚感与他人的充实生活形成对比，容易让人陷入一种自责和自卑的状态，进而产生焦虑。焦虑成为一种正常却又不得不经常面对和克服的情绪。因此，很多人选择将目光放在 ASMR 上，通过即时的感官刺激来激发愉悦感，舒缓焦虑。这种低成本、易获取的放松方式，是人类通过感官审美来调节心理平衡的一种简捷的方式，是数字时代审美实践与生存需求的结合。

然而，如果将 ASMR 作为唯一的压力缓解方式，短暂的多巴胺快感并不能真正舒缓我们的情绪，反而会陷入“屏幕依赖”的困境。审美实践的多样性是文化健康发展的基础，我们还需要构建多元的压力舒缓的审美体系，让回归自然、线下社交活动等都成为缓解压力的重要选择。

（二）“猎奇化”导致的文化内涵缺失及其反思

ASMR 视频虽然可能具有某些舒缓和疗愈作用,但我们不得不正视 ASMR 视频本质上是通过刺激感官来获得某种愉悦感。因此,当 ASMR 发展到成熟阶段,尤其是 AI ASMR 类视频诞生以后,“猎奇”的审美品味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猎奇”审美的产生,实质上是过度追求感官体验,是感官审美极端化的过程。例如,对新奇、罕见场景的极端追求,部分用户喜欢看密密麻麻的挤黑头视频(属于祛垢 ASMR,光看封面就让人直冒鸡皮疙瘩);以及各种“出生月份=你的发型”之类的 AI ASMR 视频:或是光头直接冒出杂乱的海带,或是嘴唇直接变成两根烤肠(这类视频激发观众对应自己的生日及发型,当看到虚拟中的“自我”会产生诸如海带头发,而其他月份则是较为美观的头发时,这种强烈对比便会触发某种感官刺激的情绪)。这种“猎奇”视频所体现的就是纯粹的感官刺激而产生的愉悦,最终让观众陷入“感官消费”的浅层化困境。

要如何才能让 ASMR 视频脱离这种成熟之后的极端化的“猎奇”审美呢?要知道,“猎奇”审美的来源主要是极端的感官刺激,这种刺激是生理性的,是缺乏思想内涵的。因此,要解决这种困境,可以从增加 ASMR 视频的文化内涵做起。目前,ASMR 的内涵化路径几乎人迹罕至。在流量为王的互联网时代,我们要怎样做,才能让 ASMR 视频在保持流量的同时,兼顾人文内涵的融入呢?最经典的做法,莫过于将传统文化融于其中,例如强调传统非遗手工艺的制作声音。像榫卯拼接的视觉和听觉享受,或者是传统纸作为道具来实现的 ASMR,这些传统文化内容,既能丰富其文化意蕴,又能实现感官刺激与文化输入的平衡,避免落入“猎奇化”的窠臼。目前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尚显薄弱,这一方向可成为未来数字审美实践的重要探索路径。

(三)“剧场性”的缺席

AI ASMR 常常因其可观照的超现实性而导致其视觉戏剧性的突出,然而,在戏剧性突出的同时,其“剧场性”却呈现出“缺席”短板。AI ASMR 内容多聚焦于视听刺激,缺乏情节叙事、情感共鸣与文化场景的构建,导致审美体验流于表面,难以形成持久的吸引力。审美是一种能够生成存在主义框架的经验方式,如果将审美人类学作为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的一种经验方式,说明了审美实践是要有意义和价值的。而在 AI ASMR 视频中,这种意义的建构,则需要“剧场”来支撑。而“剧场性”的关键就在于,通过叙事与场景构建来赋予审美行为以意义。因此,增加 ASMR 类视频的剧场性,也许可以成为未来 ASMR 发展的方向。当然,“剧场”对于 ASMR 的介入,其过程必将困难重重。ASMR 视频本身的目的就是激发一种愉悦感,与文化内涵的需求实质上是相矛盾的。但是,ASMR 视频在发展过程中难免流入纯感官而导致的“猎奇”文化的漩涡当中。再新奇的东西,千遍万遍地被观看,观者也会感到无聊透顶。因此,加入文化内涵,其实是推动 ASMR 视频从制造“多巴胺”转向制造“内啡肽”,从短暂的感官刺激向长久的心理体悟的根本性转变。

总结

在信息时代下,ASMR 作为互联网视频领域的重要生产内容,在审美体验和轻量化疗愈方面具有独特作用。尤其是在 AI 发展迅捷的时代,ASMR 迎来了飞跃式的发展。AI ASMR 作为 2025 年 AI 视频的衍生品之一,通过经验性刺激激活人的生理本能快感;同时,AI 能够实现的“超验性”内容,又在试图模仿着人类的梦境,通过突破现实逻辑的手段,不断弥合着作为梦境的“逻辑自洽体”,以现实的“反经验”来符合梦境的“经验”,既能触发对于熟悉事物的“回忆”,又能激发“想象”的愉悦,两者交织,最终形成更具冲击力的审美体验。此外,具备视听戏剧性的 AI ASMR 又以某种经验化场景开篇,又通过蒙太奇手法实现反经验的高潮,以此强化生理性快感的刺激。然而,过度的强感官刺激可能是导致兴奋而难以入眠的罪魁祸首。

而其他传统 ASMR 视频,如破坏、复合类,人声、咀嚼类以及道具类 ASMR,则以各自的方式实现着审美愉悦的作用。破坏、复合类 ASMR 通过“暴力美学”来实现情绪释放,但这种“暴力”并非无序的,而是在秩序规约下的“暴力”,因此才具备“暴力美学”的特征。它的目的不是造成恐惧和混乱,而是通过秩序化的“暴力”来实现“暴力美学”的快感与“秩序平衡”的心理满足。而破坏后对于被破坏者的重构过程,进一步激活了部分观众对于秩序感恢复的快感,又形成了近乎于强迫症得到满足的审美愉悦。

不过,ASMR 并非完全能够带来审美愉悦,不同人对于不同的 ASMR 类型具有不同的感受。例如,人声、咀嚼类 ASMR 面临着“距离过近”而导致的无聊甚至反感的审美接受困境。而道具 ASMR 则在某些类型,如化妆品体验和化妆第一视角等限制在女性群体,体现了 ASMR 的审美经验具有性别差异化。

然而,面对 ASMR 是否能够缓解焦虑的争议,以及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也需要保持理性来看待。ASMR 对感官的即时性、直接性的刺激,可能会导致“屏幕依赖”;而某些 ASMR 视频的猎奇化倾向则剥夺着审美体验的敏感度,单一的 ASMR 内容带来的“剧场性”缺席与“戏剧性”过度,这些过度追求多巴胺的分泌而忽视了深度的审美体验则不利于纯粹的审美品味,只流于感官刺激。浅薄和单调的内容也制约着 ASMR 视频内容产生

长久的吸引力,导致审美疲劳。因此,“剧场性”的进入和 ASMR 内容生产领域向文化向度或者情感向度的延伸,可能会成为缓解这些弊端的方式。

另外,作为以生理性快感为触发点的、直接的审美体验,无需经过某种深度的思考和冥想就能够得到愉悦和快感,在加速度的现代化,无疑是压缩经济成本、时间成本甚至是教育成本的最具性价比的“慢下来”的方式。“慢速现代性”在当下得以彰显,它被定义为增强主体对当下的感知,一种叠合过去与未来、远与近、加速与慢速的同时性所构成的当下。它们都最终指向了对日渐萎缩的“当下”时态的充盈,以及对于人全部感性存在的重新占有和解放。而 ASMR 则将现代技术融入到审美体验中,恰似短视频洪流中的一股清流、快节奏其中的一个“斑点”,促使人们在快节奏和碎片化的生活中关注自己的意识和感受,向内看而不仅仅只向外,获得短暂的驻足与感受,成为现代人实现自我疗愈和感受片刻的重要手段。未来,通过深入研究 ASMR 与慢速现代性的关联,既能够丰富审美人类学的理论体系,也能为人们在加速度时代寻找身心平衡提供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 [1] 于江淼,王如兵,蔡思思,等.ASMR 咀嚼音对不同人格大学生群体焦虑情绪的缓解作用[J].科学咨询,2022,(12):36-39.
- [2] AHUJA, A., & AHUJA, N. K. Clinical roleplay in autonomous sensory meridian response(ASMR) videos: Performance and placebo in the digital era[J]. Jama, 2019, 321(14): 1336-1337.
- [3] Barratt E L, Davis N J. Autonomous Sensory Meridian Response (ASMR): a flow-like mental state[J]. PeerJ, 2015, 3: e851. <https://doi.org/10.7717/peerj.851>.
- [4] MCERLEAN, A. B. J., & BANISSY, M. J. Increased misophonia in self-reported autonomous sensory meridian response[J]. PeerJ, 2018(6): e5351.
- [5]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心理健康蓝皮书: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3~2024)[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5.
- [6] 于海波. 三大系列作品中的疗愈美学与哲学内核[EB/OL]. 网易新闻, 2025-10-27.
- [7] 林崇德. 心理学大辞典.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 [8] 洛伦佐·巴塔莱西, 孙文刚. 从审美心理到人类文化: 走向审美人类学[J]. 民族艺术, 2024, (03): 148-157. DOI: 10.16564/j.cnki.1003-2568.2024.03.014.
- [9] 〔德〕卢茨·科普尼克《慢下来: 走向当代美学》, 石甜、王大桥译, 东方出版中心, 2020: 19-21.
- [10] 向丽. 后农业文明视野下的慢速现代性建构——以地扪生态博物馆为考察中心[J]. 民族艺术, 2024, (04): 22-33. DOI: 10.16564/j.cnki.1003-2568.2024.04.008.
- [11] 伍尔夫. 墙上的斑点: 伍尔夫短篇小说集[G], 徐会坛, 刘慧宁, 安友人, 钟珊译.,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Sensory Pleasure and Aesthetic Experience: A Study on ASMR Therapy

Feng guangxiang, Yang xinyue

(Kunming, Yunnan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As a contemporary living aesthetic and artistic phenomenon, ASMR exhibits diverse typ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udience preference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Although its anxiety-alleviating function remains controversial, most studies support its positive effects, positioning it as a low-cost and accessible healing modality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contemporary people. Various types of ASMR possess distinct aesthetic qualities; however, current ASMR videos are plagued by issues such as sensationalization and the absence of theatricality. As a fusion of aesthetic practice and physiological needs in the digital age, ASMR can achieve in-depth transformation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 scenarios. It can also be interpreted within the context of slow modernity for further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Keywords: ASMR; Sensory Pleasure; Surreality; Violent Aesthetics; Aesthetic Acceptance

中华文化数字化传播策略研究 ——以抖音平台文化类短视频为例

彭心怡

(贵州民族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数字媒介浪潮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亟需数字化传播转型。本文将以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的困境着手, 并结合抖音平台上的中华文化类短视频为案例, 提出一些中华文化数字化传播的可行建议, 从而供相关短视频从业者、运营者等传播主体参考。短视频成为中华文化数字化传播的重要渠道, 激发了用户尤其是“Z世代”网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与热爱, 为其传播与弘扬开辟了新的阵地。在数字时代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不能仅局限于传统传播媒介, 而从当前的传播实践来看, 短视频作为一种热门的数字化传播形态, 为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更佳的实践路径,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提供了新思维。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 短视频; 数字化传播; 传播策略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363

一、引言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 文化强则民族强^[1], 中华传统文化传播是当前重要的传播课题之一。而在数字化传播浪潮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亟需数字化转型, 短视频作为当前最热门的传播形态, 成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力渠道, 当前, 部分文化类博主及MCN机构等已在抖音平台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实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的广泛触达。中华文化类短视频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数字化展演, 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方式和实践路径。当前借助抖音平台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传播存在一些困境, 比如, 这些文化类短视频同质化显著、简单重复的演绎难以深入挖掘文化精髓, 容易使受众产生审美疲劳, 其次, 其数字传播的互动力比较欠缺, 未能激起观看者对视频创造的互动, 难以达到最佳传播效果。本文将抖音平台作为研究其文化类短视频的平台, 结合其短视频传播实践来分析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的策略路径, 剖析其当前的困境, 进而提出适应于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转型可行性的优化路径。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的困境探析

(一) 中华文化资源挖掘深度不够, 难以产制高品质文化视频

抖音平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展演提供了传播效果更佳的渠道, 然而当下一个突出困境在于这些文化类短视频对中华文化资源的挖掘较肤浅, 高品质文化类短视频在抖音平台的呈现较少。许多文化视频创作者在

作者简介: 彭心怡(1995—),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网络与新媒体

[1]王宝林,刘奕汛.数智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内在机理、隐忧风险及实践进路[J/OL].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8[2026-03-16].<https://link.cnki.net/urlid/42.1855.C.20260305.1646.002>.

选择题材时,仅停留在海内外受众较为熟知的文化资源,对于更广泛的传统文化题材挖掘和探索较少。比如,在物质文化层面的传统建筑领域,大部分短视频博主热衷于展现故宫、颐和园等知名古建筑的外观与形式,而对于这些古建筑的建造工艺与历史底蕴故事等呈现地较少,使得观看者无法更全面地领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广袤魅力。再比如,抖音平台上以传播传统节日的短视频内容仅仅展现了贴春联、放鞭炮等习俗,未能深挖春节习俗的起源、及这些传统文化在不同地域的演变等,受众观看后仅仅是对这些文化浅层的了解,未能更深入地利用短视频来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次,从文化类短视频的产制层面来看,亦存在不足,部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传播内容的创作者,受限于自身短视频制作能力等因素,导致视频制作较粗糙,画面剪辑不够流畅等,难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韵味与美感通过精湛的数字化传播呈现出来。比如,一些戏曲类短视频,因拍摄角度、收音效果不佳等,使得戏曲演员的表演在呈现上大打折扣,削弱了这些文化短视频的传播力和感染力,进而制约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抖音平台上的数字化传播效果。

(二) 传播内容同质化倾向,文化类短视频缺乏创新意识

当前基于抖音平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短视频数字化传播内容呈现出多元化传播的表象,但细究之下,内容同质化问题仍较严重,成为制约其深度传播与长远发展的一大困境。众多中华文化短视频创作者往往关注于热门传统文化元素,如诗词歌赋、中华美食、传统服饰等,这些短视频呈现出同质化特点,使得受众在观看中极易产生审美疲劳。一旦传统文化短视频以某种文化元素“出圈”,短期内便会涌现大批短视频博主对其模仿,不仅内容相同,传播的呈现形式也趋于同质,而未结合自身特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传播,这种缺乏原创性的做法,不仅导致平台上文化类短视频内容在呈现上单一,还使得受众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被局限于算法推荐的信息茧房中。例如,知名文化博主李子柒所制作的中华文化类短视频在抖音平台火爆“出圈”后,在李子柒断更的期间内,抖音平台涌现出诸如中华田园生活记录式博主“谢大炮”等,这些中华文化短视频博主的传播内容呈现同质化倾向,多数视频创作者创新意识淡薄,习惯于模仿跟风。其次,这些同质化传播内容也削弱了传统文化短视频的传播竞争力,抖音平台所推送的视频类型多元化,用户每日接触海量的传播信息,中华文化类短视频不能以独特鲜活的魅力脱颖而出,在海量信息流中难以获得广泛关注,进而削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力。长此以往,不仅降低了受众对文化类短视频的期待值与关注度,还阻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抖音平台实现更为广泛且精准的传播,难以达成弘扬文化传播的目的。

(三) 文化类短视频叙事话语欠佳,削弱中华文化数字化传播感染力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短视频的数字化传播中,话语力作为关键要素,其构建与运用对于提升短视频的吸引力和传播力至关重要。在当前抖音平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实践中,文化类短视频叙事话语方面的问题凸显,影响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的感染力与传播效果。比如,一些文化类短视频往往采用单一的开场介绍方式,如单调地介绍中华文化主题背景,传播内容单场景地罗列相关知识点,这样的传播内容很难吸引受众观看,也难以增加文化类短视频的粉丝粘性,从而不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传播。此外,部分文化类短视频在内容叙事节奏的把控也欠佳,视频内容关注过多文化要素,节奏过快,观看者在短视频几分钟内难以对所传播的文化内容全盘接收,导致中华文化的传播效果不尽如人意。部分文化类短视频在叙事语言的运用也存在不足,叙事语言不够以观看者乐于接收的方式传达,难以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的感染力,削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能力。

（四）互动反馈能力不足，缺乏与受众深度连接能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是展示中华文明历史进路的精神瑰宝^[3]，抖音平台的兴起与蓬勃发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传播提供了更佳的渠道，中华文化类短视频虽然借助抖音平台拥有了海量传播机会，却也深陷了与受众互动反馈不佳、难以与其深度连接的困境，这也导致搭载抖音平台的文化短视频传播效果不佳。在一些文化短视频的评论区，许多博主较少回复受众的评论留言，未能及时回应受众对中华文化背景及细节的追问，也较少针对视频内传播的内容进行深入探讨。比如，当有观看者在针对古代礼仪的短视频评论区进行留言，好奇这些中华礼仪的起源，创作者往往未能及时对其进行回应，长此以往，受众的互动热情减弱，进一步影响其对于中华文化短视频的观看兴趣。其次，即便这些中华文化短视频博主有与其受众进行互动，但从互动形式来看较为单一，大部分中华文化类短视频仅设置简单点赞、评论、转发、收藏等功能，缺乏更加多元化的创新性互动反馈机制，文化类短视频博主较少在其评论区进行互动评论，提出一些问题激发受众参与，使其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反馈，这不仅激发受众的互动兴趣，而且也能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短视频进行数字化传播的效果。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的路径策略

（一）聚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高品质中华文化短视频

中华传统文化短视频本身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内核的内容产品，中华传统文化则是中华传统文化短视频的叙事中心，因此，中华文化短视频要深深根植于我国历史源远流长的文化瑰宝，从而深挖文化内核来打造高质量的中华文化短视频。短视频平台的海量资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提供了丰富素材^[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借助抖音等平台基于优质文化打造高质量文化短视频，在中华文化数字化传播的路径探索时，要牢牢立足于中华文化根源，打造高品质中华文化短视频。中华文化短视频创作者需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与价值底蕴，可对各类中华文化资源展开多元的传播，这些多元的中华文化都能够被传播者进一步深挖与探索，为高质量中华传统文化短视频的传播奠定基础。此外，这些内容创作还应注重文化内涵与背景的深度阐释与挖掘，比如，以专业的文化学者、非遗手艺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作为传播的主体，对这些专业人士的采访，进一步对传统文化进行介绍与传播，使中华传统文化成为这些文化视频的基底和支撑。通过这些传播实践，打造出既具文化底蕴又有视觉吸引力的高品质中华文化短视频，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抖音平台的数字化传播筑牢根基与奠定坚实基础。

（二）中华文化视频差异化传播，打造独具特色的创新性传播

在抖音平台中存在海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短视频，要实现其差异化与创新性传播是取得良好传播效果的必由之路。中华文化短视频创作者可以深度挖掘小众且独特的文化元素，尽量避免同质化的视频内容生产，比如，个别文化传播博主关注闽戏等小众文化，其短视频获得了较高的点赞数与关注量，还有一些博主关注地方少数民族文化等，配合精心的拍摄和细致的讲解，抓住观众对这些小众文化的好奇心，开拓了其文化认知的新边界，同时也传播了差异化的中华民族文化，打造更加有特色的文化传播。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短视频的传播创新其形式也十分重要，当前，传统文化的传播可以借助新兴形式来进行创新打造，比如，央视出品的文化节目《经典

[3] 段鹏,张丁.互动·互嵌·互塑:数智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J].出版广角,2024,(06):25-30+37.

[4] 吴增礼,肖佳.价值维度·现实限度·优化向度:短视频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8(05):9-16.

咏流传》将传统诗词与潮流音乐相结合或邀请流行音乐人对古代诗词进行改编二创，用时下流行的方式演绎古诗词，在音乐中融入诗词的韵律与意境，让受众耳目一新，重新激起受众对古典诗词的热爱与关注，相关短视频在抖音平台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而在智媒时代下，中华文化短视频创作者还可以借助 AI 等技术强化内容的呈现，从技术层面实现其内容的差异化传播，从而通过持续的差异化、创新性传播，打造独具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传播模式，让中华文化借助抖音平台实现更佳的传播效果触达。

（三）强化中华文化短视频的叙事能力，提升文化数字传播的感染力

话语是叙述故事的方式、语境和风格，它不仅关乎如何以语言为载体有效传达文化信息，更涉及如何通过特定的话语风格、修辞策略和叙事技巧来增强故事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助抖音平台进行数字化传播的过程中，强化短视频叙事能力是提升中华文化数字传播感染力的重要环节。文化类短视频传播主体可以根据自身的传播内容来具体构建适应于自身内容特点的叙事框架，以更高效的叙事手段“讲故事”，从而增强此类短视频的吸引力和传播的感染力。此外，抖音平台的中华文化视频创作要更加精准地把控叙事的节奏，由于抖音短视频有一定时长范围，需在有限时间内将中华文化呈现出来并能够抓住受众关注，因此，文化视频创作者需要提前对视频内容进行构思，精心设计和设置悬念等，从而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传播能力，进而更好地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在叙事语言方面，中华文化创作者尽可能采用通俗易懂的叙事语言，用更加“接地气”的话语方式来进行叙事，善于运用流行词汇、网络热梗等来传播传统文化，拉近与受众尤其是年轻观看者的距离，让中华文化数字传播兼具深度与温度，全方位提升中华文化短视频的感染力与传播力，助力传统文化在短视频平台持续“出圈”，从而传播好中华文化。

（四）强化与受众的互动反馈能力，重视受众对文化短视频的关切

借助抖音平台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短视频实践中，强化与受众的互动反馈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起着巨大的作用，其目的在于激起受众对中华文化短视频的关注，从而关注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数字化时代下，短视频极大地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展演、大众化传播和创新性传承^[5]，而短视频平台作为一种社交媒介，其强大的社交功能属性为传受双方都提供了便捷的渠道，其互动性就成为提升其传播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这些文化类短视频博主可以在视频发布前、发布中、发布后对其传播内容进行互动叙事元素的体现，比如，短视频博主可以在视频文本标题添加设置提问等方式，提升受众互动参与度和兴趣。其次，短视频博主主要积极在评论区与受众进行互动，针对其感兴趣的方面及时回应与讨论等，此外，还可以在评论区进行互动评论的方式与受众讨论，从而加强受众与中华文化的连接性，进一步传播与传承文化。创作者还可以结合大数据进行互动的优化，深入分析观众观看时长、兴趣偏好等主要信息，精准定位受众的关注点及感兴趣的文化传播领域，根据受众喜好，进一步调整叙事及文化视频的选题，为受众提供更加精准的文化类短视频，进一步加强和受众之间的联系，提升受众对于中华文化类短视频的参与积极性，从而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短视频平台的数字化传播能力。

四、结语

数字化浪潮下，短视频作为一种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兴载体，在中华文化的数字化传播中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当前的文化传播仍然面临一些困境，亟待提出具有更加有针对性的路径来作为未来的实践参考。数字技

^[5] 廖秉宜,狄鹤仙.何以“出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短视频的叙事策略与美学表达[J].中国编辑,2024,(09):59-66.

术的发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6]。本文通过聚焦抖音平台的中华文化类短视频传播阵地进行分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传播的当前困境及相应策略展开探究,通过对传播困境的剖析,以期挖掘出更多的可行性传播路径。抖音平台在未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传播中仍然是最主要的传播平台,而我国的文化传播也将持续进行数字化传播转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将随着传播媒介的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得到广泛传播与传承。

参考文献:

- [1]王宝林,刘奕汛.数智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内在机理、隐忧风险及实践进路[J/OL].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8[2026-03-16].<https://link.cnki.net/urlid/42.1855.C.20260305.1646.002>.
- [2]段鹏,张丁.互动·互嵌·互塑:数智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J].出版广角,2024,(06):25-30+37.
- [3]吴增礼,肖佳.价值维度·现实限度·优化向度:短视频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8(05):9-16.
- [4]廖秉宜,狄鹤仙.何以“出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短视频的叙事策略与美学表达[J].中国编辑,2024,(09):59-66.
- [5]程华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路径研究[J].天府新论,2024,(01):146-152.

Research on the Digital Narrative Strategy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 Tak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Short Videos on Douyin Platform as an Example

Peng Xiny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wave of digital media,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urgently require digital communication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will start with the dilemma of the current digit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ombine the Chinese cultural short videos on the Tiktok platform as a case to put forward some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the digit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so as to provide relevant short video practitioners, operators and other communication subjects with reference. Short video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the digit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spiring users, especially Generation Z netizens, to have an interest and lov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opening up new avenues for its dissemination and promotion. In the digital age, the dissemin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annot be limited to traditional media alone. From current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short videos, as a popular form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provide a better practical path for the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offer new thinking for the "two innovations"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short video; Digital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strategy

^[6] 程华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路径研究[J].天府新论,2024,(01):146-152.

艺术疗愈的数字化转型：沉浸式技术与生成式人工智能 及其设计框架

徐晨¹ 王建民¹ 张健²

(1.同济大学 设计创意学院, 上海 200092; 2.唐山师范学院, 河北 唐山 063000)

摘 要: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重塑艺术疗愈的理论范式与实践形态。本文聚焦两类技术路径: 一是以VR、AR为代表的沉浸式艺术疗愈, 二是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人机协同艺术疗愈。系统梳理了2005—2025年间国内外相关文献, 从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心理学、具身认知等理论根基出发, 勾勒出艺术疗愈数字化转向的关键驱动力与发展脉络。在VR、AR领域, 本文综合分析了VR绘画疗愈、虚拟暴露治疗、虚拟疗愈环境等干预模式的实证研究成果, 揭示了临场感、具身表达和沉浸感等核心心理机制。在AI领域, 本文聚焦AIGC赋能下的人机协同创作工具及AI辅助心理评估系统, 审视了数据隐私、算法偏见和治疗关系变化等伦理议题。本文还从积极设计、积极计算和情感计算视角构建了数字艺术疗愈的交互设计理论框架, 并针对当前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未来议程。研究发现, 数字艺术疗愈领域仍处于概念验证阶段, 亟需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和跨学科协作以推动循证实践。本文尝试从设计学视角对数字艺术疗愈研究进行跨学科综合评述, 为该领域的理论深化和实践创新提供了系统性的知识图景和分析框架。

关键词: 艺术疗愈; 数字化转型; 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 人工智能; 生成式艺术; 交互设计; 具身认知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357

艺术疗愈 (art therapy) 是以视觉艺术创作为核心媒介的心理治疗方法, 其基本假设在于艺术创作过程本身具有促进身心康复的内在价值。该方法自20世纪40年代在欧美正式建制以来, 逐步形成了以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和表达性治疗为支柱的多元理论体系。杨晓光等^[1]对艺术治疗的概念、发展及教育进行了系统梳理, 指出其核心在于借助创作过程促进个体的心理整合与情感表达, 治疗师通过观察来访者的创作行为和作品内容获取心理信息, 并以此为基础建构治疗干预策略。周丽^[2]在对绘画心理疗法的综述中进一步指出, 绘画创作通过非言语途径表达深层情感, 尤其对难以用语言表述内心体验的来访者而言, 如儿童、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和语言障碍群体, 艺术创作提供了一条独特且不可替代的治疗通道, 对传统言语治疗形成了重要补充。

近十年来, 虚拟现实 (VR)、增强现实 (AR) 和人工智能 (AI) 等数字技术的飞速迭代, 正从根本上改变艺术创作的物质基础和治疗互动的时空结构, 催生出“数字艺术疗愈”这一新兴跨学科领域。数字工具不仅拓展了艺术创作的媒介边界, 从物理画布延伸至三维虚拟空间, 从手工绘制延伸至人机协同生成, 更重新定义了治疗关系的互动模式, 使远程干预、异步疗愈和个性化反馈成为可能。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暴发迫使艺术治疗师从面对面工作室转向在线远程干预, 进一步加速了这一数字化转型进程, 使得原本处于边缘探索阶段的数字艺术疗愈迅速进入主流学术视野。疫情期间, 越来越多艺术治疗师开始使用视频会议、数字绘画软件等工具开展远程干预, 行业的数字化实践明显加速。

然而, Zubala等^[3]对数字艺术疗愈文献的整合性综述仅筛选出12项实证研究, 揭示出该领域虽快速扩张但证据基础仍然薄弱的现实。在中国, 艺术疗愈近年来已受到艺术学、设计学与心理健康研究的持续关注。崔巍和王建民^[4]基于CiteSpace的文献计量分析, 对CNKI中371篇中文论文和WOS中1920篇英文论文进行了系统梳理, 揭示出国内研究较多聚焦艺术教育、特殊儿童和社区服务等应用场景, 而国际研究则更重视疗效验证、跨学

作者简介: 徐 晨(1995-), 女, 博士, 研究方向为设计思维、艺术疗愈、健康设计和情感计算;

王建民(1973-), 男,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数字媒体艺术、智能媒介设计与艺术疗愈和人工智能生成式艺术;

张 健(1985-), 女,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教育学、教育心理学。

科协作和方法创新。这一差异表明，中国在该领域具有广阔的实践基础，但在高质量实证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一、艺术疗愈的理论基础与数字化转向

（一）理论谱系：从精神分析到具身认知

艺术疗愈的早期理论主要沿两条彼此关联但重心不同的路径展开。其一是 Margaret Naumburg 发展的动态取向艺术治疗。该路径受精神分析影响较深，强调自发性的图像表达能够使个体更接近难以言说的内在经验，并将艺术作品视为一种“象征性言语”，治疗的重点不在于由治疗师对图像进行单向“解码”，而在于借助作品促进来访者对自身情绪、冲突与经验的表达和理解^[5]。其二是 Edith Kramer 提出的“art as therapy”路径。与 Naumburg 相比，Kramer 更强调创作过程本身的治疗价值，认为艺术活动能够通过升华、组织与审美经验促进心理整合；她后来提出的“第三只手”概念，指的也不是作品通往潜意识的通道，而是治疗师在不干扰来访者主体表达的前提下，为其创作过程提供适度、非侵入性的支持^[6]。由此可见，艺术疗愈的经典理论并非简单对立与解释作品或只重过程，而是在象征表达、创作过程与治疗关系三者之间建立了不同侧重的理论结构。

本文所称“数字艺术疗愈”，是指以视觉艺术创作为核心媒介、以情绪表达、心理调节或治疗性支持为目标，并由数字技术提供创作环境、交互方式或辅助分析的干预形态。为避免概念混淆，本文进一步将相关研究区分为三类：其一，以 VR、AR、MR 为媒介的数字艺术创作型干预；其二，以虚拟环境为载体的心理支持或恢复性体验；其三，以生成式 AI 和算法分析为基础的共创与辅助评估工具。后两类研究并不完全等同于艺术治疗，但可为数字艺术疗愈提供方法和机制参照。

在中国语境中，艺术治疗的引入虽起步较晚，但近二十年来发展迅速。张日昇率先将箱庭疗法（沙盘游戏治疗）引入心理临床实践，其理论和方法对国内艺术治疗的本土化发展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此后，绘画治疗、音乐治疗、舞动治疗等多种艺术治疗形式在中国逐步推广，形成了从高校心理咨询到医院临床康复、从特殊教育到社区服务的多层次应用格局。人本主义心理学视角则为艺术疗愈注入了以来访者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强调自我实现和创造性自我表达在治疗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传统形成了深层次的文化共鸣。

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理论构成了理解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理论桥梁。叶浩生^[7]指出，身体并非心智的容器，而是认知的构成要素，感知运动系统在概念形成和知识建构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这一观点从根本上挑战了传统离身认知范式，也为理解艺术创作中身体性参与。如握笔的力度、涂抹的节奏、颜料的触感、空间的感知，何以具有治疗价值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在数字化语境中，具身认知理论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当创作媒介从物理材料转变为数字工具时，身体性参与的减少是否会削弱治疗效果？这一问题贯穿了本综述的各个章节。在实证层面，Joschko 等^[8]在 JAMA Network Open 发表的系统综述与荟萃分析纳入了多项随机对照试验，研究结果表明，主动性视觉艺术治疗在减轻焦虑和抑郁症状、改善心理社会功能以及提升生活质量等方面均表现出显著效果，为艺术疗愈的有效性提供了迄今为止最高等级的循证依据。

（二）数字化转向：关键驱动力与里程碑

2020 年新冠疫情显著加快了艺术疗愈实践的数字化进程。20 世纪 90 年代末，Collie 等人开发了首个在线艺术疗愈平台，但此后十余年间数字化进展缓慢，多数治疗师对数字工具持保留态度，认为其缺乏传统材料的触觉丰富性和象征深度。2018 年是重要的转折年份——Hacmun 等^[9]发表了 VR 艺术疗愈的首篇理论框架文章，系统论述了虚拟环境、虚拟材料与非现实特征三个维度对艺术治疗的独特价值，标志着该领域理论建构的开始。随后，数字艺术疗愈在疫情情境下进一步进入主流学术视野，远程平台、沉浸式媒介和 AI 辅助工具逐步形成多技术并行的发展格局。

中国学界的数字艺术疗愈研究呈现出独特的路径特征。张寒等^[10]基于 CiteSpace 和 VOSviewer 的文献计量分析显示，国内数字疗愈研究自 2014 年首篇文献发表以来呈显著增长态势，至 2023 年年度发文量已突破 300 篇。在学科分布上，建筑科学与工程以 103 篇（34.11%）居于首位，其后依次为文学理论（28 篇）、教育理论与管理（23 篇）和心理学（20 篇）。这一分布特征与国际研究形成鲜明对比，国际文献以 VR 临床干预为主导，而中国研究更强调疗愈环境设计和虚拟自然景观^[11]，折射出中国学界在“天人合一”传统哲学影响下对环境疗愈价值的特殊关注。这种以空间与环境为中心的研究取向，也与风景园林学、建筑学等学科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的强势

地位密切相关,形成了有别于西方以临床心理学为主导的独特学术生态。这种差异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对心理健康议题的认知路径,相较于直接的临床干预,公众和研究者更倾向于通过环境营造和文化体验等间接方式促进心理福祉,这与中医“治未病”的预防理念和“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存在深层的文化关联。

二、VR/AR 沉浸式艺术疗愈研究

(一) VR 艺术疗愈的理论框架与心理机制

Hacmun 等^[9]发表的奠基性框架文章围绕虚拟环境、虚拟材料和非现实特征三个维度,将临场感 (presence)、沉浸性 (immersivity)、视点 (point of view) 和透视 (perspective) 识别为核心 VR 属性。该框架指出,VR 不仅是传统材料的数字替代品,更提供了传统媒介无法实现的全新治疗可能性,如动态缩放使来访者能够在宏观与微观视角之间自由切换,身体所有感操控允许通过化身体验不同身份(如性别、年龄、体型的变换),而不可能空间的构建则为创伤叙事提供了安全的象征性容器。这些特性使 VR 在艺术疗愈中的价值远超“数字画布”的简单定位,而是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治疗性创作范式。

在更广泛的 VR 心理治疗领域,Freeman 等^[11]在一项涵盖 285 项研究的里程碑式系统综述中指出,VR 在心理健康的评估、理解和治疗三个层面均具有变革性潜力,已成为精神医学和临床心理学最具前景的技术工具之一。在中国学术语境中,VR 心理治疗在焦虑障碍、自闭症谱系障碍等干预中已积累了相当厚度的文献基础,为探讨其在艺术疗愈中的应用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参照。在艺术疗愈与环境设计的交叉领域,郑朝^[12]从心流理论和亲生物设计原则出发,探讨了沉浸式艺术疗愈的设计策略,将多感官刺激、空间叙事和情感反馈整合为一个设计框架。该研究强调,有效的沉浸式疗愈空间应当同时满足“深度沉浸”和“安全退出”两个看似矛盾的需求——来访者需要足够深入地沉浸于虚拟世界以获得治疗性体验,同时又需要保持对现实世界的锚定感以维护心理安全。这一设计张力构成了 VR 艺术疗愈交互设计的核心挑战。从本土实践来看,国内部分艺术院校与研究团队已开始探索将传统艺术形式与沉浸式技术相结合的疗愈路径,尝试在数字环境中重建中国传统艺术特有的“气韵生动”和“意在笔先”的审美体验,这一方向具有鲜明的文化独特性和理论创新价值。

(二) 临床实证研究进展

VR 艺术疗愈的临床实证研究目前以小样本定性和混合方法研究为主,尚未形成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的证据体系。在国际上,Kaimal 等^[13]使用 Google Tilt Brush 开展的先导定性研究表明,17 名参与者进行 VR 艺术创作后报告了积极情绪、游戏性探索和学习掌握感,研究者据此提出 VR 艺术创作是一种“具身化的视觉表达”,能够激发传统媒介无法触发的新颖艺术反应。在量化研究方面,Richesin 等^[14]将 44 名大学生随机分配至传统艺术创作组、VR 艺术创作组和 VR 控制组,通过压力量表、心率监测和唾液生化指标等多维度测量,发现三组均能有效降低焦虑水平,但 VR 艺术创作组的心率下降幅度最大。这一结果提示,VR 情境本身可能对压力缓解具有促进作用,但其与艺术创作因素之间的独立效应及交互机制仍需在更严格的实验设计中进一步检验。

在中国,VR 心理治疗的临床实证研究已取得初步但重要的成果,多项研究证实沉浸感在干预与社交焦虑改善之间发挥着显著的中介作用,这对于理解 VR 艺术疗愈中沉浸性心理机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沉浸感不仅是 VR 技术的特征描述,更是其治疗效果的关键中介变量。郝石盟等^[15]从风景园林学视角系统梳理了虚拟疗愈环境的研究进展,通过对 2010—2022 年间相关文献的综述,将自然景观模拟与疗愈效益评估相结合,揭示了虚拟自然环境在压力缓解、注意力恢复和情绪调节方面的积极效果。该研究特别指出,具有高度仿真度的虚拟自然景观能够激发与真实自然环境相当的恢复性体验,为 VR 艺术疗愈的环境设计提供了跨学科参照。总体而言,VR 艺术疗愈的实证研究仍处于先导探索阶段,未来亟需更多设计严谨的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来夯实证据基础。

(三) AR 在艺术疗愈中的应用前景

与 VR 艺术疗愈相比,AR 及 MR 在艺术疗愈中的专门实证研究仍明显不足,现有相关综述与案例大多仍以 VR 创作为核心,AR/MR 更多停留在相邻领域借鉴或概念层面的讨论。就技术特性而言,AR 并不以完全遮蔽现实环境为前提,而是在真实空间中叠加数字信息并保持实时交互;这一点使其在心理健康应用中展现出不同于 VR 的价值。已有系统综述表明,AR 已被用于焦虑、恐惧症、心理教育与一般福祉促进等场景,并因其灵活性、可及性以及与现实情境的保留而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16]。对艺术疗愈而言,这一媒介特征的意义在于:它有望在保留纸张、颜料、黏土等传统材料触觉与操作阻力的同时,引入视觉引导、动态反馈、空间标记和协作叠加等数

字功能,从而形成“真实材料—数字增强”的混合式创作情境。进一步看,MR有望在同一空间内支持实物操作、三维生成、自然交互与治疗师共在,因此适合发展过程导向、具身参与与团体协作兼顾的数字艺术疗愈场景。不过,这些优势目前仍主要建立在技术特性分析和相邻心理健康研究的推论之上,针对AR/MR艺术疗愈的高质量研究仍属稀缺,未来需要围绕适用人群、交互设计、材料经验、治疗联盟与伦理风险开展更系统的验证。

三、AI与生成式艺术疗愈研究

在数字艺术疗愈场景中,AI的作用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生成式模型为基础的共创支持,另一类是以机器学习和模式识别为基础的辅助评估与反馈。

(一) 人机协同创作的疗愈应用

AI作为艺术疗愈中的“新材料”,正在开辟人机协同创作的全新范式。与传统材料不同,AI具有自主生成视觉内容的能力,这使其在治疗性创作中的角色远比画笔或颜料更为复杂和多义。在设计学领域,吴琼[17]从人工智能时代的创新设计思维出发,阐述了AI对设计认知与方法论的根本性变革。她指出,AI不仅是设计的工具,更是重新定义设计边界和设计师角色的力量,这一观点为理解AI在治疗性创作中从“工具”到“合作者”的角色转换提供了深刻的设计学理论视角。

在具体应用层面,国际研究者Du等[18]开发的DeepThInk系统代表了AI艺术疗愈领域最系统的设计研究成果。研究团队历时10个月与加拿大艺术治疗协会的5名注册治疗师合作,将AI定位为“材料”而非“权威”,核心设计原则包括降低艺术技巧门槛、增强创造性表达力和维护来访者的创作主体性。Zubala等[19]发表了首篇关于创造性AI在艺术心理治疗中角色的整合性综述,筛选550余篇文献后纳入10篇,提出了一个角色定位图谱,AI的角色从共创伙伴到个性化视觉策展人,从辅助工具到自主代理的光谱分布。该综述还敏锐地指出,部分已发表研究存在概念混淆,将更广泛的AI应用误标为“艺术疗愈”,强调了领域内术语使用的严谨性对于学科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中国,随着文心一格、通义万相等国产AI绘画平台的快速发展,AIGC技术在艺术教育和创意设计中的应用已形成相当规模,但将其系统引入艺术疗愈领域的研究仍处于萌芽阶段,亟需学界从临床有效性、伦理规范和文化适应性等多个维度展开系统探索。

(二) AI辅助的心理评估与绘画分析

AI在艺术疗愈中的另一重要应用方向是计算化绘画分析与心理评估。传统的绘画心理评估高度依赖治疗师的主观判断和临床经验,不同治疗师对同一幅作品的解读可能存在较大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评估的信度和效度。近年来,深度神经网络(DNN)已被应用于多种艺术治疗评估工具的心理状态自动分类,研究证实其在绘画分类任务上的准确率显著优于传统统计方法。在国际上,Kim等[20]在ACM智能用户界面会议发表的AlphaDAPR系统为大规模自动化的“雨中人”(Draw-A-Person-in-the-Rain)绘画评估提供了可解释AI支持,对64名艺术治疗师的调查显示64.06%的治疗师表达了使用意愿,同时后续研究表明AI与人类之间清晰的角色沟通能够显著增强治疗师对系统的信任。值得注意的是,AI绘画评估系统的开发需要大量经过专业标注的训练数据,而中国本土化的绘画心理评估量表和常模数据库尚不完善,这为AI辅助评估系统在中国语境中的应用设置了额外的技术门槛。

(三) 伦理审视:数据隐私、算法偏见与治疗关系

AI在艺术疗愈中的应用引发了多层次的伦理关切,这些关切直接涉及艺术疗愈的核心治疗价值。首先,在数据隐私方面,敏感的心理绘画数据进入AI系统后的存储、传输与潜在泄露风险不容忽视。艺术治疗中的来访者作品往往承载着高度私密的情感内容和创伤记忆,一旦数据发生泄露,可能对来访者造成二次心理伤害。其次,在来访者主体性方面,AI生成内容是否会覆盖来访者的创造性主权引发了广泛争议。当AI能够“补全”或“美化”来访者的创作时,治疗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不完美表达”可能被技术优化所掩盖,而这种不完美恰恰是心理治疗中最具诊断和治疗价值的部分。再次,训练数据可能无法充分代表多元文化群体而导致的系统性评估偏差也值得警惕。最后,AI的介入可能改变治疗师与来访者之间的治疗联盟动态,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削弱这一关系。Zubala等[19]的综述进一步提出,一个根本性伦理问题是创作者的主体,当AI参与共创时,作品的象征意义究竟归属于来访者的心理投射还是算法的数据模式,这一问题直接关系艺术疗愈通过自主创作实现自我理解的核

心治疗逻辑。在实践层面,数字艺术疗愈中的 AI 系统至少应遵循最小必要数据采集、敏感数据加密或本地存储、治疗师保有最终解释权,以及来访者对 AI 生成内容拥有拒绝、修订与撤回权等原则。

四、数字艺术疗愈的设计理论视角

(一) 面向福祉的技术设计框架

基于前述研究,本文将数字艺术疗愈的分析框架概括为五个层次:技术属性层(VR/AR/AI)、交互形式层(创作、暴露、共创、评估)、心理机制层(临场感、具身性、自主性、情绪反馈)、疗效结果层(情绪改善、表达增强、压力缓解、治疗联盟变化)与伦理治理层(隐私、偏见、解释权、主体性保护)。设计学视角的价值,在于打通技术属性与疗愈结果之间的中介机制,并将“如何设计”而不仅是“是否有效”纳入研究核心。

数字艺术疗愈的设计实践需要超越传统人机交互的效率和可用性范式,转向面向心理福祉的设计框架。Desmet 和 Pohlmeier^[21]提出的积极设计框架识别出主观幸福感的三个核心组成部分,即,愉悦、个人意义和美德,并主张促进人类繁荣的设计必须整合这三个维度。该框架与艺术疗愈的内在逻辑高度契合:治疗性创作本质上涉及愉悦的创造体验、个人意义的建构和自我表达所蕴含的美德。此外,Calvo 和 Peters^[22]提出的“积极计算”概念,主张技术设计应靶向自主性、自我觉察、正念、共情和慈悲等心理福祉决定因素,这与艺术疗愈强调“全人关怀”的治疗理念形成了深层共鸣。在中国设计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为福祉而设计”的研究范式,将用户的心理健康和情感需求纳入交互设计的核心考量。

(二) 具身交互与情感计算

具身交互理论为数字艺术疗愈的交互设计提供了核心理论锚点。艺术疗愈的有效性部分根植于创作行为的身体性,动觉参与、材料的反馈和空间操控。数字工具必须保留或重新想象这种具身性,否则可能丧失艺术疗愈最本质的治疗要素。VR 的三维具身表达、全身参与和空间缩放能力被视为对传统触觉损失的补偿策略^[9],而 AR 的物理-数字叠加特性则提供了保留材料触觉同时增加数字维度的潜力。叶浩生^[7]关于具身认知的研究强调,身体经验深刻塑造着个体的认知过程,这为数字疗愈环境中重视身体性参与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在设计实践层面,如何在数字界面中重建“材料感”,例如通过触觉反馈手套模拟黏土的可塑性、通过力反馈笔模拟毛笔的弹性,成为当前交互设计研究的前沿议题。从具身与离身认知的双重视角出发,多模态交互环境下的交互语法研究为数字艺术疗愈中的人机交互设计提供了兼顾身体性参与和认知效率的方法论指引,有助于在“技术中介性”和“身体直接性”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情感计算在数字艺术疗愈中承担多重功能,有望显著提升治疗过程的精准性与个性化水平。在应用层面,情感计算可从艺术作品中识别色彩运用、笔触密度、空间布局等视觉特征以推断创作者的情绪状态,通过多模态传感整合生理信号(如心率变异性、皮电反应、脑电波形)和交互行为(如绘画速度、笔压力度、停顿模式)创建综合情绪画像,进而构建闭环反馈系统,使治疗环境能够根据来访者的神经生理信号实时动态调适。例如,当系统检测到来访者的焦虑水平升高时,可以自动调整虚拟环境的光照、色温和背景音乐,创造更具安抚性的创作氛围。近年的设计研究已开始将情感计算定位为艺术疗愈的“认知路径”,并尝试通过可穿戴生物传感器整合 AI 系统,探索艺术疗愈产品的个性化情感交互设计,为该方向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清晰的技术参照。

五、挑战与未来展望

(一) 当前研究的核心局限

数字艺术疗愈领域面临多个系统性挑战。最突出的问题是证据质量不足,大多数研究为小样本先导性或定性研究,严格的随机对照试验极为稀少^[3]。Zubala 等^[19]对 AI 艺术疗愈的综述在筛选 550 余篇文献后仅纳入 10 篇符合标准的研究,表明该子领域仍处于概念验证阶段,距离形成可推广的循证实践指南尚有相当距离。此外,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健康人群的压力与焦虑管理,而针对临床人群,如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重度抑郁症、自闭症谱系障碍等的深入干预研究严重不足,长期疗效追踪数据几乎空白。研究设计的另一个普遍问题是缺乏主动对照条件:许多研究仅将 VR 艺术创作与无干预组进行比较,而未设置传统艺术创作对照组,这使得 VR 的独特贡献难以与艺术创作本身的一般性效果区分开来。

在技术维度上,多重障碍制约着数字艺术疗愈的推广应用。VR 头显遮挡面部表情影响了治疗师对来访者非

言语线索的读取,而面部表情是心理治疗中最重要的非言语沟通渠道之一。触觉反馈的缺失削弱了传统材料所特有的感觉丰富性,而硬件成本和学习曲线则构成了面向基层社区和资源匮乏地区的推广障碍。在 AI 方面,系统的“黑箱”特性与艺术疗愈对透明性和可解释性的内在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此外,数字鸿沟和无障碍设计问题意味着技术可能在提升某些群体可及性的同时,反而排斥老年人、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在文化维度上,当前研究以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为主导,中国传统美学理念和本土心理学视角在数字艺术疗愈中的融入尚显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领域在中国语境中的理论深度和实践适用性。

(二) 未来研究议程

基于本综述的系统分析,提出以下五个方面的未来研究议程。第一,实证方法学升级,亟需多中心、大样本的随机对照试验,采用标准化结果测量工具,如前后测设计、主动对照条件和长期追踪评估,以建立数字艺术疗愈的循证基础。第二,AR 艺术疗愈的系统探索,作为 VR 和传统媒介之间的桥梁,AR 在保留触觉体验的同时增加数字维度的潜力有待深入开发,混合现实技术可能为解决 VR 的触觉缺失问题提供新思路。第三,AI 伦理框架的建构,需要发展专门针对艺术疗愈情境的 AI 伦理准则,特别是创作权归属、数据治理和治疗关系重构等方面的规范。第四,本土化理论创新,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如水墨画、书法、手工艺的数字化疗愈路径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疗愈潜力,值得深入探索^[12]。第五,跨学科方法融合,整合神经影像、生物传感、情感计算和设计研究方法,构建多模态、多层次的研究范式,推动该领域从单一学科视角走向真正的跨学科协同创新。此外,还需重视数字艺术疗愈实践标准和伦理准则的制度化建设,通过行业协会、学术机构和监管部门的多方协作,建立覆盖技术准入、数据管理、治疗师培训和效果评估的系统性规范体系,为该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六、结语

艺术疗愈的数字化转型正在经历从边缘实验到系统性研究议程的关键转变。VR、AR 技术通过临场感、具身表达和可控环境为艺术疗愈开辟了超越物理限制的治疗可能性,而 AI 技术则通过降低创作门槛、增强心理评估和实现个性化干预重新定义了“治疗性创作”的边界。然而,这一领域深刻的启示在于,技术并非外在于治疗过程的中性媒介,而会影响治疗关系的组织方式、来访者主体性的建构及作品意义的生成机制。当 VR 中的化身可以改变身份特征,当 AI 可以“代替”来访者完成画面,当算法可以“诊断”情绪状态时,艺术疗愈的核心治疗逻辑,即,通过自主创作实现自我理解与整合,需要被重新审视和重新确认。未来的研究不仅需要回答技术的有效性问题的,更需要深入探讨技术如何改变了疗愈本身这一根本性的理论命题。唯有在技术创新与人文关怀之间找到动态平衡,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保持审慎的张力,数字艺术疗愈才能真正实现其促进人类身心福祉的终极价值。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关乎人的尊严、自主性和创造力的深层人文命题。对于中国学界而言,如何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中保持本土文化特色,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和疗愈智慧融入数字技术框架之中,是推动数字艺术疗愈“中国方案”形成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 [1] 杨晓光,孙月吉,吴军,等. 艺术治疗的概念、发展及教育[J]. 医学与哲学, 2005, 26(3): 57-58, 64.
- [2] 周丽. 关于“绘画心理疗法”独特作用的综述[J]. 江苏社会科学, 2006(S1): 61-63.
- [3] ZUBALA A, KENNEL N, HACKETT S. Art therapy in the digital world: an integrative review of current practice and future directions[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1, 12: 600070.
- [4] 崔巍,王建民. 国内外艺术疗愈研究热点与动态[J]. 媒介批评, 2023(1): 1-28.
- [5] NAUMBURG M. Dynamically oriented art therapy: it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illustrated with three case studies[M]. New York: Grune & Stratton, 1966.
- [6] KRAMER E. Art as therapy: collected papers[M].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 2000.
- [7] 叶浩生. 身体与学习: 具身认知及其对传统教育观的挑战[J]. 教育研究, 2015(4): 104-114.
- [8] JOSCHKO R, KLATTE C, GRABOWSKA W A, et al. Active visual art therapy and health outcom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JAMA Network Open*, 2024, 7(9): e2428709.
- [9] HACMUN I, REGEV D, SALOMON R. The principles of art therapy in virtual reality[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8, 9: 2082.
- [10] 张寒,蓝昕婕,何宇. 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国内外数字疗愈研究进展与展望[J]. 老龄化研究, 2025, 12(4): 358-369.
- [11] FREEMAN D, REEVE S, ROBINSON A, et al. Virtual reality in the assessment, understanding, and treatment of mental health

disorders[J].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017, 47(14): 2393-2400.

[12] 郑朝. 沉浸式艺术疗愈的设计策略[J]. *新美术*, 2021(6): 257-263.

[13] KAIMAL G, CARROLL-HASKINS K, BERBERIAN M, et al. Virtual reality in art therapy: A pilot qualitative study of the novel medium and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J]. *Art Therapy*, 2020, 37(1): 16-24.

[14] RICHESIN M T, BALDWIN D R, WICKS L A. Art making and virtual reality: A comparison study of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outcomes[J]. *The Arts in Psychotherapy*, 2021, 75: 101823.

[15] 郝石盟, 王晨, 侯锐, 等. 虚拟疗愈环境及其疗愈效益研究进展[J]. *风景园林*, 2022, 29(8): 79-85.

[16] BAKIR C N, ABBAS S O, SEVER E, et al. Use of augmented reality in mental health-related conditions: a systematic review[J]. *Digital Health*, 2023, 9: 20552076231203649.

[17] 吴琼. 人工智能时代的创新设计思维[J]. *装饰*, 2019(11): 18-21.

[18] DU X, AN P, LEUNG J, et al. DeepThInk: Designing and probing human-AI co-creation in digital art therap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 2024, 181: 103139.

[19] ZUBALA A, PEASE A, LYSZKIEWICZ K, et al. Art psychotherapy meets creative AI: an integrative review positioning the role of creative AI in art therapy process[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5, 16: 1548396.

[20] KIM J, KANG J, KIM T, et al. AlphaDAPR: An AI-based explainable expert support system for art therapy[C]//*Proceedings of the 2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User Interfaces*. New York: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2023: 19-31.

[21] DESMET P M A, POHLMAYER A E. Positive design: An introduction to design for subjective well-be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sign*, 2013, 7(3): 5-19.

[22] CALVO R A, PETERS D. Positive computing: Technology for wellbeing and human potential[M]. Cambridge: MIT Press, 2014.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rt Therapy: Immersive Technologies, Generative AI and Design Framework

Xu Chen¹, Wang Jianmin¹, Zhang Jian²

¹ College of Design and Innovation,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²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Tangshan, Hebei 063000

Abstract: Digital technologies are profoundly reshaping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s and practical forms of art therap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wo major technological trajectories: immersive art therapy based on virtual reality (VR) and augmented reality (AR), and human-AI collaborative art therapy enabled b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rough a systematic review of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published between 2005 and 2025, the paper examine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rt therap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sychoanalysis, humanistic psychology, and embodied cognition. It synthesizes empirical studies on interventions such as VR painting therapy, virtual exposure therapy, and virtual healing environments, and identifies presence, embodied expression, and immersion as key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It also reviews AIGC-enabled co-creative tools and AI-assisted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systems, highlighting ethical concerns including data privacy, algorithmic bias, and shifts in the 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Building on positive design, positive computing, and affective computing, the paper proposes an interaction design framework for digital art therapy and outline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The review suggests that the field remains largely at the proof-of-concept stage and calls for large-sampl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and stronger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to support evidence-base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rovides an interdisciplinary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a systematic knowledge map for the theoretical advancement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of digital art therapy.

Keywords: art therap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virtual realit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bodied cognition

基于地方依恋理论的黑龙江生态 IP 色彩意象研究

田媛迪 宋昭卿

(黑龙江大学 艺术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目标是研究地方依恋理论视域下黑龙江生态 IP 形象色彩设计的方法, 方法采用了文献研究法以及案例分析法, 搭建起“地方依赖—功能识别、地方认同—情感共鸣”的分析框架; 细致分析黑龙江自然生态色彩谱系和文化底蕴, 进而以抚远“鱼熊 CP”、哈尔滨“淘学企鹅”为案例做色彩方面的分析, 结论黑龙江有着冰雪蓝白、森林翠绿、黑土油黑、五花山色等别具一格的生态色彩资源, 站在地方依恋视角来看, 生态 IP 色彩设计要创建能识别的色彩体系、发掘能共鸣的色彩意涵、形成有层次的色彩描绘、构建可延续的色彩密码。

关键词: 地方依恋; 色彩意象; 生态 IP; 黑龙江; 地域文化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375

引言

地域 IP 形象作为文旅传播重要的载体, 近年来于各地蓬勃兴盛起来, 但大量 IP 有同质化方面的问题, 难以使受众形成情感认同, 色彩身为视觉设计的第一要素, 直接对情感唤起起到作用, 黑龙江是生态方面的大省, 持有冰雪的蓝白、森林的翠绿、黑土的乌亮、五花山色的明丽等独特自然色彩资源, 这些色彩不光是视觉方面的符号, 更是承载起地方情感的文化载体。

地方依恋理论为认识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结搭建了理论框架, 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色彩会“使居民产生较多的归属感”, 当下从地方依恋视角对地域 IP 色彩设计进行探讨的研究不多见, 本研究从地方依恋理论着手, 有系统地剖析黑龙江生态色彩资源, 提炼能用于 IP 设计的色彩意涵, 给地域生态 IP 的色彩设计提供理论根据与实践方面的借鉴。

1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1.1 地方依恋理论的核心要义

地方依恋 (Place Attachment) 是指人与地方之间形成的积极情感联结。学界普遍认同 Scannell 和 Gifford 提出的三维框架 (人、地方、过程), 而 Williams 等人则将其简化为两个核心维度: 地方依赖 (Place Dependence) 和地方认同 (Place Identity)。地方依赖是功能性的依恋, 指地方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或活动目标; 地方认同则是象征性的依恋, 指地方成为个体自我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色彩意象的理论基础

色彩意象 (Color Image) 是指人们感知色彩时所产生的心理联想和情感体验。色彩具有色相、明度、饱和度三属性, 不同的色彩组合会唤起不同的心理感受。色彩意象研究通常采用语义差异法 (SD 法) 和因素分析法, 通过量表测量探究人们对色彩的认知模式。色彩不仅是物理现象, 更是文化的载体, 城市环境色彩“反映地方的习俗、历史、文化、自然特色以及群众共同记忆”。

1.3 分析框架构建

作者简介: 田媛迪(2002—), 女, 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艺术设计;

宋昭卿(2000—), 女, 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艺术设计。

本研究构建如下分析框架：地方依赖维度和色彩“功能识别性”相对应起来，即色彩可不可以使人们识别出黑龙江的生态特点；地方认同维度对应色彩所具有的“情感共鸣性”，即色彩能否使本地人有自豪感、归属感，并且和外地人有情感上的联结，识别作基础，共鸣起到深化作用，二者一起构成 IP 色彩设计的情感唤起机制。

2 黑龙江生态色彩资源分析

2.1 黑龙江自然生态的色彩谱系

从五个相互交织的类型来把握黑龙江自然生态色彩是可行的，冰雪生态是以蓝白作为主调，雪原是纯白或者冰蓝色，春季融雪的时候变为灰蓝色，组成最有辨识度的视觉元素，森林生态随季节变迁，夏天呈现出翠绿，秋天是金黄火红景，冬天有墨绿灰褐色，大小兴安岭的垂直分布使色彩层次产生。湿地生态把金黄赭石作为标志，扎龙湿地秋天里芦苇荡与丹顶鹤白羽黑羽组成经典画面，黑土的颜色以油黑深褐这种颜色为主，按照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给出的资料，黑土地耕层厚度是 30 厘米到 100 厘米，含有 5% - 10% 的有机质，黑色土壤的肥沃之感化作丰收的期盼，江河生态有着流动性，春季泥色是黄、夏季水色为蓝，体现出流域季节不同，这五种色彩相互交融在一块，冰雪把森林给覆盖，森林起到涵养土壤的作用，土壤对江河起到滋养，江河浇灌湿地，构成了完备的生态色彩体系。

2.2 黑龙江生态色彩的地域文化意涵

色彩不只是视觉所形成的感知，更是文化意义的凝积，冰雪蓝白之色寓意着纯净、坚韧、冷冽特质，对应黑龙江人不怕冷的性格特质，哈尔滨国际冰雪节自 1985 年开办，到现在已成为世界级冰雪盛会，翠绿的森林体现着生机、丰裕、宁静，对应林海雪原所拥有的生态资源和林业文明，也承载着几代林业工人有关身份的记忆。五花山色体现出绚烂、丰收、热烈，对应着北大仓富饶的物产，2024 年已由黑龙江省文旅厅纳入“龙江金秋”旅游推广核心视觉元素里，油黑的黑土体现出肥沃、厚重、深沉的特质，对应黑土地一直以来的养育之恩，载有几代垦荒人的奋斗记忆，湿地金黄体现出温暖、诗意、悠远的意味，符合丹顶鹤故乡的生态模样。

2.3 黑龙江生态色彩与地方依恋的关系

对于本地人而言，这些色彩是家乡的颜色，童年记忆中的雪原、祖辈耕耘的黑土、家乡门前的白桦林都与特定的色彩相关联，能够唤起情感记忆，强化归属感。对于外地人而言，这些色彩是黑龙江的印象，冰雪的白色、森林的绿色、黑土的黑色共同构成人们对这片土地的视觉认知，成为地域形象的视觉锚点。

3 黑龙江现有生态 IP 形象的色彩分析

3.1 案例选取

本研究选取 2023-2025 年间黑龙江省官方发布的代表性生态 IP，抚远“鱼熊 CP”：2025 年第七届黑龙江省旅发大会吉祥物，由深圳市设际邹工业设计有限公司设计，已开发 323 款文创产品，黑熊“福福”与鲟鲤鱼“源源”的组合对应抚远“黑瞎子岛”与“鲟鲤鱼之乡”的生态定位；哈尔滨“淘学企鹅”：2017 年诞生，2023 年被黑龙江省政府授予“黑龙江冰雪天使”称号，2024-2025 冰雪季曝光量突破 300 亿次，文创年销售额超 3000 万元，已成为哈尔滨极地公园的核心 IP。

3.2 抚远“鱼熊 CP”色彩分析

“鱼熊 CP”色彩设计的地域特色十分鲜明，深褐色被黑熊“福福”用作主色调，还原黑熊原本的毛色面貌；添上日出橙，其为抚远作为“华夏东极”的地理标志；同时加入大花袄纹样的彩色部分，鲟鲤鱼“源源”是以青灰色为主的颜色，配上赫哲族传统花纹里蓝、绿、红等色彩，赫哲族是黑龙江省所独有的少数民族，其鱼皮服饰纹样具有非常高的文化专属性。

从地方依恋视角分析：在地方依赖维度相关方面，黑熊色、鲟鲤鱼色使受众识别出抚远生态方面的特征；于地方认同维度之上，日出橙使东极人产生地理自豪感，赫哲族色彩唤起了大家的民族文化认同，这个案例较好地达成了功能识别跟情感共鸣的结合，但赫哲族色彩运用主要是起到文化展示作用，对本地居民日常情感记忆的唤醒比较有限。

3.3 哈尔滨“淘学企鹅”色彩分析

“淘学企鹅”色彩设计具有对极地环境明确的适应能力，主体巴布亚企鹅采用的天然羽色是黑白相间的，黑色的背部和白色的腹部产生高对比度的视觉识别；加上橙白相间的小书包，橙色在那纯白的冰雪背景中视觉捕捉效率是最高的，同时形成“极地学生”的人格化叙事风格。

从地方依恋视角分析：于地方依赖维度方面，企鹅黑白配色使受众直接辨认出极地生态特征，清楚传达哈尔滨“冰城”的冰雪旅游定位，2024-2025 冰雪季巡游活动据悉转化率 60%，表明色彩和形象搭配成功促成了消费行为；在地方认同方面维度，该案例对于黑龙江本地生态色彩的融入相对偏少，没有充分运用森林绿、黑土黑、五花山色等有着地方文化含义的色彩元素，唤起本地人情感方面的记忆主要依赖“冰雪”这一单一意象，没有做好对林业文明、黑土农耕等多元地方记忆的视觉编码工作。

3.4 案例对比与问题发现

对两个案例做对比，这两个都从本土生态提取核心色彩，同时用高饱和度点缀色增强视觉的吸引力，但“鱼熊 CP”更看重文化叙事深度方面，把赫哲族纹样跟日出橙结合达成双重的目标，“淘学企鹅”倾向于对极地环境做类型化呈现，对多元生态色彩挖掘还不充足，情感共鸣的层次比较单一。

目前黑龙江生态 IP 色彩设计有三方面问题：色彩体系有着碎片化问题，各 IP 单个开发造成相近色彩无关联设计，还未形成整体化视觉识别；二是色彩的含义比较表面，多停留在“色彩就是对应物象”的直接情况，深层文化编码未充分开展；三是在地方认同维度上比较薄弱，地方眷恋的唤起多借助冰雪单一意象，没能有效激活多元的身份认同，IP 形象要从旅游符号升华为文化身份的载体很难。

4 基于地方依恋的黑龙江生态 IP 色彩设计策略

4.1 建立“可识别”的色彩体系

需系统地把黑龙江生态的核心色彩提取出来，产出标准化的“黑龙江生态色卡”，要让 IP 色彩使受众一眼就能判断出“这是黑龙江”，提议采用孟塞尔颜色系统以及 Pantone 色卡进行标准化标定，核心色系的参考范围有：冰雪蓝白色系，需实地采样做确认、森林绿，建议主色系包含冰雪蓝白、森林绿、黑土黑三类核心生态色彩，辅色系纳入五花山色、湿地金等别样色彩，具体的配比可根据 IP 主题灵活做调整，保证不同 IP 色彩基因的延续得以维持。

4.2 挖掘“能共情”的色彩意涵

色彩设计需要深入思索色彩背后的文化意涵，避免“仅仅是为了用色而用色”。冰雪蓝白不只体现冷的感觉，更表明黑龙江人在极寒环境里的坚韧素养；黑土的黑不只指向土壤，更意味着“北大仓”的养育之益与垦荒人的奋斗过往；五花山色不只代表秋天，更展现丰收的喜悦以及知青返乡的秋日记忆。设计者应对本地人的色彩情感与相关记忆展开深入调研，通过访谈、问卷等方式收集居民对特定色彩的个性化说法，让居民参与到色彩选择的过程中，使色彩成为连接个人记忆与集体身份的视觉载体。

4.3 形成“有层次”的色彩叙事

色彩设计要形成主次有序的层次结构：主色调给予 IP 的整体印象；辅助色丰富 IP 视觉上的层次表现；点缀色带出文化细节，三层色彩分别起到“识别-丰富-叙事”的功能，通过对辅助色和点缀色做文化编码，撕开冰雪单一意象，激活不同的地方记忆，可按照 IP 不同应用场景设计出不一样的色彩版本：文旅推广版采用的是高饱和度、高对比度色彩；本地文创版采用的是中等饱和度，掺入怀旧色彩；数字媒体版保留核心的色相，调节明度来符合屏幕显示。

4.4 构建“可延续”的色彩基因

要形成黑龙江生态 IP 的色彩特征，维持不同 IP 视觉方面的延续性，设计新 IP 时可从现有的色彩体系当中选取核心色彩，强化整体的识别性，防止“一个 IP 一套色”造成的零散化情况，建议形成省级 IP 色彩管理规范，对官方发布的生态 IP 做色彩合规性方面的审查，保证色彩基因的连续性，使色彩变为连接不同 IP 形象的视觉关联。

5 结语

本研究从地方依恋理论视角去展开工作,整体分析了黑龙江生态色彩资源和其地域文化的意涵,提出基于地方依恋的IP色彩设计办法,黑龙江拥有特色鲜明的生态色彩谱系,这些色彩是唤起地方依恋意识的重要视觉媒介,现有IP于色彩运用上已作积极探索,但依旧要在色彩体系化、意涵深度、叙事层次方面进一步提高。

本研究为地域生态IP的色彩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还有实践参考素材,未来可进一步采用问卷调查,对不同色彩唤起地方依恋的实际效果进行验证,运用Williams等人所开发的Place Attachment Scale开展量化测量,并且深入研究色彩于不同媒介中的表现差别,为地域IP的可持续设计给予更丰富的实证依据。

参考文献:

- [1] 朱泓睿.基于地方依恋理论的福建游神视觉化设计研究[D].鲁迅美术学院,2025.
- [2] Williams D R, Vaske J J. The measurement of place attachment: Validity and generalizability of a psychometric approach[J]. Forest Science, 2003, 49(6): 830-840.
- [3] Scannell L, Gifford R. Defining place attachment: A tripartite organizing framework[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0, 30(1): 1-10.
- [4] 董梅.绛珠与黛玉——从“红绿”色彩意象探讨《红楼梦》人物塑造及全书主旨[J].红楼梦学刊,2026,(01):107-130.
- [5] 刘梦圆,刘勇,刘蕾,等.地方依恋对大学生返乡创业的影响机理[J].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2,13(01):64-73.
- [6] 唐勇,石瑜,钟美玲.基于迁居意愿的震后重建区地方依恋差异性特征[J].山地学报,2024,42(05):712-725.
- [7] 胡迪,雷灵,唐弘久.游客地域文化原真性感知对地方依恋和忠诚度的影响机理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5, 44(3).
- [8]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规划(2021-2025年)[R].2021.
- [9] 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

Research on the Color Imagery of Ecological IP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Based on Local Attachment Theory

Tian Yuandi, Song Zhaoqing

College of Art,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China

Abstract: The goal is to study the method of color design for ecological IP image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attachment theory. The method adopts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case analysis, and build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local dependence functional recognition, local identity emotional resonance"; Through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natural ecological color spectrum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Heilongjiang, and taking Fuyuan's "Fish Bear CP" and Harbin's "Taoyue Penguin" as case studies, a color analysis is conducted. The conclusion is that Heilongjiang has unique ecological color resources such as ice and snow blue and white, forest emerald green, black soil oil black, and five flower mountain col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attachment, ecological IP color design should create recognizable color systems, explore resonant color meanings, form hierarchical color descriptions, and construct sustainable color codes.

Keywords: Local attachment; Color imagery; Ecological IP; Heilongjiang; Regional Culture

文旅消费新动能视角下冰雪艺术玻璃化创意设计研究

宋昭卿¹ 田媛迪¹

(1.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文旅消费新动能的崛起, 推动旅游市场从传统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型。冰雪经济作为文旅产业的重要板块, 其发展需要依托文化赋能与创意设计的双重支撑。冰雪艺术玻璃化创意设计, 是将冰雪的自然形态与文化内涵, 通过玻璃材质的工艺特性进行转译与重构的创新路径。当前, 冰雪文创产品多局限于传统材质与形式, 未能充分结合玻璃的通透质感与艺术表现力, 难以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个性化文旅产品的需求。本文立足文旅消费新动能的时代背景, 分析冰雪艺术玻璃化创意设计的消费需求, 探索设计思路与应用路径, 以期为冰雪文旅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可行方向。

关键词: 文旅消费; 冰雪艺术; 创意设计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395

一、文旅消费新动能视角下冰雪艺术玻璃化创意设计的消费需求分析

(一) 体验式消费驱动的场景化需求

文旅消费新动能的核心特征之一, 是消费者对体验感的重视程度持续提升。单纯的观赏型产品已无法满足市场预期, 消费者更渴望在特定场景中获得沉浸式、互动式的文化体验。冰雪艺术玻璃化设计场景化需求, 体现在设计作品需与冰雪文旅场景深度融合。例如在冰雪景区的观景节点, 玻璃艺术装置可借助自然光与冰雪环境的映衬, 呈现出冰晶般的通透质感, 让游客在驻足观赏的同时, 产生与自然景观的情感联结。这种场景化的设计需求, 要求作品不仅具备艺术审美价值, 还需承担起激活空间氛围、引导游客体验的功能, 使玻璃艺术成为连接自然冰雪与人文体验的纽带。

(二) 文化认同导向的符号化需求

世界文旅消费的深层逻辑, 是消费者对地域文化的认同与追寻。冰雪文化并非单一的自然符号, 而是蕴含着不同地域的历史民俗、生活方式与精神内核。东北的冰雪民俗、北疆的雪域游牧文化、江南的雾凇诗意, 都为冰雪艺术玻璃化设计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素材。消费者在购买文旅产品时, 本质上是在购买一种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这就要求冰雪艺术玻璃化设计, 需提炼地域冰雪文化的核心符号, 将抽象的文化内涵转化为具象的视觉语言。例如将冰雪民俗中的剪纸纹样、萨满图腾融入玻璃造型, 让设计作品成为地域冰雪文化的载体, 满足消费者对文化符号的情感寄托与收藏需求。

(三) 绿色消费理念下的可持续需求

绿色消费理念已成为文旅消费新动能的重要价值导向。消费者在选择文旅产品时, 开始关注材料的环保性、产品的耐用性与循环利用性。玻璃材质本身具备天然的环保优势, 其主要成分二氧化硅取自自然, 且可反复回收利用, 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冰雪艺术玻璃化设计的可持续需求, 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材料的可持续, 设计过程中应优先选用环保玻璃原料, 减少有害添加剂的使用, 降低生产过程的碳排放。二是产品的可持续, 设计需兼顾实用性与耐用性, 避免过度包装与一次性消费, 让冰雪玻璃艺术品既能作为旅游纪念品, 也能成为日常生活中的装饰或实用器具, 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 契合绿色消费的时代趋势。

二、文旅消费新动能视角下冰雪艺术玻璃化创意设计思路

作者简介: 宋昭卿(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田媛迪(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一）冰雪自然形态的玻璃材质转译

冰雪的自然形态具有独特的美学特质，冰晶的棱角分明、雪花的六边形结构、冰面的裂纹肌理，都是设计可借鉴的原生素材。玻璃材质的通透、冷冽质感，与冰雪的物理特性高度契合，为冰雪形态的转译提供了理想载体。设计过程中，需深入观察冰雪在不同环境下的形态变化，例如低温下的冰棱生长轨迹、雪花飘落的动态姿态、冰雪融化时的水流纹路。针对这些形态特征，可采用不同的玻璃工艺进行转译。对于冰晶的棱角感，可运用玻璃铸造工艺，通过模具塑形打造出线条硬朗的造型；对于雪花的轻盈感，可采用玻璃吹制工艺，在熔融状态下塑造出蓬松的肌理；对于冰裂纹的自然感，可借助玻璃蚀刻技术，通过酸蚀或喷砂的方式，在玻璃表面形成不规则的裂纹纹理。

（二）地域冰雪文化的视觉元素凝练

地域冰雪文化是冰雪艺术玻璃化设计的灵魂，设计需从地域文化中提取具有辨识度的视觉元素，避免同质化创作。不同地域的冰雪文化，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视觉特征。东北地域的冰雪文化，与民俗生活紧密相关，冰雕雪塑、秧歌服饰、窗花剪纸等元素，色彩鲜艳、造型夸张，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北疆地域的冰雪文化，带有游牧民族的豪迈气质，蒙古包的圆弧顶、马鞍的曲线、图腾的几何纹样，线条简洁、形态粗犷；江南地域的冰雪文化，兼具诗意与婉约，雾凇的朦胧感、断桥残雪的意境、园林窗棂的雅致，造型精巧、意蕴悠长。设计过程中，需对这些文化元素进行去粗取精的凝练，提炼出核心的图形、色彩与线条。例如将东北窗花的几何纹样简化为玻璃的镂空图案，将北疆马鞍的曲线融入玻璃器皿的造型设计，将江南雾凇的朦胧感通过磨砂玻璃的质感呈现。

（三）文旅消费场景的功能适配设计

冰雪艺术玻璃化设计的最终落脚点，是满足文旅消费场景的实际需求，设计作品需根据不同场景的功能定位，进行针对性的适配。文旅消费场景可分为观赏型场景、互动型场景与实用型场景三类。针对观赏型场景，如冰雪景区的艺术展馆、主题广场，设计应侧重艺术表现力，打造大型玻璃雕塑或装置作品，通过独特的造型与光影效果，吸引游客驻足观赏与拍照打卡。针对互动型场景，如冰雪乐园的体验区、文创店的互动工坊，设计应增强作品的参与性，例如设计可触摸的玻璃肌理装置、可拼接的玻璃积木，让游客在互动过程中感受冰雪艺术与玻璃工艺的魅力。针对实用型场景，如民宿的软装、景区的文创商店，设计需兼顾实用性与美观性，开发玻璃茶具、灯具、装饰画等产品，让游客将冰雪文化带回家。

三、文旅消费新动能视角下冰雪艺术玻璃化创意设计的应用路径

（一）景区沉浸式艺术装置的场景落地

景区是冰雪艺术玻璃化设计的核心应用场景，沉浸式艺术装置的落地，能够有效提升景区的文化吸引力与体验感。设计过程中，需结合景区的自然地貌与文化定位，打造与环境相融合的玻璃艺术装置。在高山冰雪景区，可利用山顶的开阔空间，打造大型玻璃冰晶雕塑群，雕塑的高度与造型可根据山体的轮廓进行调整，借助阳光的折射，在地面投射出斑斓的光影，营造出“冰晶幻境”的沉浸式体验；在湖泊冰雪景区，可设计漂浮于冰面的玻璃装置，装置采用透明玻璃材质，造型模仿冰雪融化的水流形态，与冰面的裂纹相互呼应，形成“冰湖融韵”的视觉效果；在民俗冰雪景区，可将玻璃艺术装置与当地民俗建筑结合，例如在雪乡的木屋前，摆放带有剪纸纹样的玻璃灯笼，夜晚灯光亮起时，灯笼上的纹样投射在雪地上，营造出浓郁的民俗氛围。

（二）分层级冰雪玻璃文创产品开发

文创产品是冰雪艺术玻璃化设计的重要变现载体，分层级开发能够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拓展产品的市场覆盖范围。产品开发可分为高端艺术藏品、中端实用文创与低端纪念衍生品三个层级。高端艺术藏品主要面向艺术收藏者与高消费群体，邀请玻璃艺术大师进行创作，采用纯手工工艺，打造具有独特艺术价值的玻璃雕塑或摆件，产品限量发行，附带收藏证书，提升产品的稀缺性与收藏价值；中端实用文创主要面向普通游客，开发兼具实用性与美观性的产品，例如玻璃茶具、保温杯、装饰画等，产品采用半手工半机械的生产方式，在保证品质的同时，控制生产成本，使价格更加亲民；低端纪念衍生品主要面向青少年游客与大众消费者，开发小型玻璃挂件、冰箱贴、钥匙扣等产品，采用机械化批量生产，降低价格门槛，让更多游客能够购买到具有地域特色的冰雪文创产品。分层级开发过程中，需保持产品设计语言的一致性，确保不同层级的产品都能体现冰雪文化与玻璃艺术的核心特征，形成完整的产品体系。

（三）数字技术赋能的线上线下传播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冰雪艺术玻璃化设计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路径，线上线下联动的传播模式，能够有效提升设计作品的知名度与影响力。线上传播方面，可利用三维建模技术，为冰雪玻璃艺术作品构建数字化模型，通过景区官网、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等渠道，发布作品的3D展示视频与互动H5页面，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作品的细节与美感。同时，可开发AR互动小程序，消费者扫描景区门票或文创产品包装，就能在手机上看到虚拟的冰雪玻璃艺术装置，还能与虚拟装置进行拍照互动，生成个性化的打卡照片。线下传播方面，可在景区

游客中心、文创商店设置数字展示屏,播放冰雪玻璃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与文化内涵,让游客深入了解作品背后的故事。

(四) 跨界融合的产业链延伸拓展

冰雪艺术玻璃化设计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依托跨界融合的产业链延伸,打破单一的产品销售模式,构建“设计+生产+文旅+消费”的完整产业链。一是与冰雪旅游的跨界融合,将冰雪玻璃艺术设计融入冰雪旅游的全流程,例如在冰雪景区的门票、导览图、纪念品包装上,融入玻璃艺术的视觉元素,打造统一的品牌形象;在冰雪实景演出中,使用玻璃艺术道具,增强演出的视觉效果。二是与民俗文化的跨界融合,邀请民俗艺人参与冰雪玻璃艺术设计,将传统民俗工艺与现代玻璃工艺相结合,例如将剪纸工艺与玻璃蚀刻技术融合,打造具有民俗特色的玻璃艺术品;举办民俗与玻璃艺术融合的主题活动,吸引民俗文化爱好者参与。三是与家居产业的跨界融合,将冰雪玻璃艺术设计拓展到家居领域,开发玻璃软装产品,与家居品牌合作推出联名款,让冰雪玻璃艺术走进普通消费者的生活。通过跨界融合,延伸冰雪艺术玻璃化设计的产业链条,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赢。

四、结语

文旅消费新动能为冰雪艺术玻璃化创意设计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设计的核心在于实现冰雪自然形态、地域文化内涵与玻璃材质特性的有机融合。消费需求的场景化、符号化与可持续导向,决定了设计必须立足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兼顾艺术审美、文化传承与实用功能。从设计思路来看,冰雪自然形态的玻璃转译是基础,地域冰雪文化的视觉凝练是灵魂,文旅消费场景的功能适配是关键。在应用路径上,景区沉浸式艺术装置的落地、分层级文创产品的开发、数字技术的赋能传播与跨界融合的产业链延伸,共同构建了冰雪艺术玻璃化设计的实践体系。未来的设计实践中,还需进一步加强工艺技术的研发与文化内涵的挖掘,平衡艺术创新与市场需求的关系,让冰雪玻璃艺术真正成为连接自然、文化与消费的桥梁,推动冰雪文旅产业朝着更具特色、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 [1]刘杰.新质生产力赋能冰雪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25,33(08):251-254+283.
- [2]本报评论员.以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激活城市消费新动能[N].南昌日报,2025-08-10(001).[3]张敏,杨萍,李梅,等.冰雪产业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动态演化博弈及路径研究[J].科技和产业,2025,25(24):71-79.
- [4]刘静.地域文化符号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J].中国民族博览,2025,(13):183-185.
- [5]刘树龙,王正.浅析现代玻璃艺术在公共艺术中的应用价值[J].美术文献,2020,(11):21-22.
- [6]王宫小惠.现代艺术发展视域下玻璃艺术语言的多元化发展[J].艺术家,2020,(02):147.
- [7]王译莹.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数字文旅融创产品的开发策略[J].中国会展(中国会议),2025,(22):169-171.

Creative Design of Ice and Snow Art Vitrification: A New Driver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Song ZhaoQing¹, Tian YuanDi¹

¹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new drivers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are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ice-snow cultural tourism towards in-depth experiences, while the current ice-snow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re limited in materials and forms.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textualized, symbolic and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demands for the creative vitrification design of ice-snow art, explores the design concepts including the glass translation of ice-snow forms, the visual extrac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the functional adaptation to consumption scenarios, and proposes application paths such as the on-site implementation of scenic installations, hierarchical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digital technology-empowered communication and cross-border integrated industrial chain extension, so as to provide directions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ice-snow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Keywords: Cultural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Ice and Snow Art; Creative Design

莫里斯植物纹样与女式提包融合的设计研究

赵伟强¹ 王玉成¹ 王健同²

(1.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0212, 2.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山西 太原 12779)

摘要: 本文深入探讨了以威廉·莫里斯的植物设计风格为灵感的女式手提包设计, 以工艺美术运动提倡回归自然纹样为背景, 详细分析了工艺美术运动与自然纹样的相关理念, 包括代表人物威廉·莫里斯的植物纹样设计特点、工艺美术运动的核心思想以及自然纹样的分类与特点。通过对敦煌藻井纹样手提包的案例分析, 展示了传统自然纹样在现代女式手提包设计中的创新应用。“自然之韵”论证了威廉·莫里斯植物纹样在女式手提包中的应用, 使其充分体现工艺美术运动的理念, 为女式手提包设计带来新的灵感和发展方向。同时对未来女式手提包设计中自然纹样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指出其将更加多元化、创新化、环保化、个性化和时尚化。

关键词: 工艺美术运动; 植物纹样; 女式手提包; 威廉·莫里斯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393

一、引言

1.1 研究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一些年轻的艺术家用威廉·莫里斯理论的影响, 从英国开始, 发起了一场设计改良运动^[1], 主张向自然学习, 从自然界的植物中吸取素材和灵感。这一运动席卷欧美国家, 其设计思想和作品形式风靡一时。在工艺美术运动的影响下, 设计师们广泛运用自然植物纹样进行产品装饰, 无论是家具设计、灯具设计、墙纸设计、染织设计, 还是雕刻、地毯、室内装饰设计等领域, 都充满了自然的气息。

威廉·莫里斯是现代设计之父和设计改革者, 其设计思想内核为现代设计理念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现实意义与理论基础^[2]。在当今多元化的时尚时代, 女式手提包设计已然在全球时尚界占据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成为时尚产业中极具活力与市场潜力的核心品类。随着当代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与消费观念的迭代升级, 女式手提包早已突破了单纯收纳物品的实用属性, 进阶为彰显个人气质、表达审美主张、凸显生活品位的标志性配饰, 承载着女性的自我表达与精神诉求。

现代女式手提包设计始终坚守功能性与时尚性的深度融合, 在兼顾美观轻巧与实用结构的同时, 不断突破创意边界, 探索环保再生材料、新型合成面料与传统皮质的创新运用, 迭代出更贴合当代生活的设计理念。在设计风格上, 既紧跟全球时尚潮流的迭代步伐, 契合年轻化的审美趋势, 又深耕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革新, 将刺绣、编织、鞣制等工艺融入现代创作。这种兼具时代性与传承性的设计, 让女式手提包成为连接潮流与文化的载体, 持续焕发独特魅力。

1.2 研究目的

“自然之韵”旨在深入探讨植物纹样在女式手提包设计中如何体现工艺美术运动理念。工艺美术运动强调向自然学习, 从自然界的植物中获取素材和灵感, 这种理念在女式手提包设计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在设计风格上, 植物纹样可以为手提包带来自然、清新的气息, 与工艺美术运动所追求的自然风格相契合。在材料选择上, 工艺美术运动主张尊重材料的本性, 选用天然材料进行设计。对于女式手提包而言, 可以选择天然皮革、棉麻等材质, 在制作工艺上, 工艺美术运动重视传统手工艺的价值。女式手提包的制作可以结合传统的手工编织、刺绣、镶嵌等工艺, 使手提包更具艺术感和品质感。

作者简介: 赵伟强(2001—),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王玉成(1972—),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环境艺术设计;

王健同(2006—), 男, 本科, 研究方向为物流管理。

在现代工艺美术产品的设计原则当中,绿色设计这一理念已经成为了美术设计原则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原则内容^[3]。工艺美术运动深刻反对工业化批量生产所带来的艺术质感缺失、资源浪费等负面影响,大力倡导回归自然本真、坚守可持续发展的设计理念。这一经典思想为现代女式手提包设计提供了重要灵感。当代设计师积极践行环保理念,选用再生皮革、有机棉、天然麻质等环保材料替代传统耗材,从源头降低生产对环境的负担。同时,将灵动的植物纹样融入包体装饰,以自然形态赋予设计质朴美感。这种设计实践不仅延续了工艺美术运动的精神内核,更通过时尚载体传达出对自然环境的敬畏与保护意识,让实用美学与生态责任深度融合。

二、工艺美术运动与自然纹样相关阐述

2.1 工艺美术运动与自然纹样理念

工艺美术运动兴起于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历史阶段,彼时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全面取代传统手工造物,成为社会生产的主流模式。然而,盲目追求量产效率的工业产品,陷入了过度堆砌装饰的误区,不仅艺术质感大幅下降,更显得粗陋庸俗、丑陋不堪。与此同时,繁复浮夸、矫揉造作的维多利亚风格风靡一时,进一步背离了质朴自然的审美内核。在这样的时代困境下,工艺美术运动应运而生,它明确主张回归自然本真的设计理念,坚决反对矫揉造作的维多利亚装饰风格,同时批判冰冷的机械化批量生产,倡导重拾手工艺的温度与艺术价值。

威廉·莫里斯作为工艺美术运动的代表人物,其植物设计风格特点鲜明。他提出设计民主,强调产品设计和建筑设计应为人民服务,设计工作必须是集体活动。并且反对机械化批量生产,认为手工制品更艺术化。在产品装饰上,提倡艺术与技术结合,反对维多利亚风格的矫揉造作。

莫里斯的植物纹样设计具有师法自然的特点,在纹样设计中,他的样式达到与自然平衡,设计的纹样与植物形态相协调。以枝条和花叶的缠绕形成几何形去组织图案整体结构,给人以饱满、整齐、紧凑、无限延展的视觉效果。并且纹饰设计具有统一完整性,接受欧洲中世纪以及东方艺术的影响,提倡浪漫、自然、华美的风格,主张以二度空间的形式,采用线条勾勒花纹和平涂的色彩结合的表现手法,作品结构严谨,极具装饰趣味,体现生命与秩序的和谐统一。图案造型写实、逼真,花鸟形象栩栩如生,细节丰富。

2.2 手提包设计案例分析

敦煌藻井图案是敦煌石窟艺术的耀眼明珠,其纹样色彩丰富,结构样式繁多,是民族文化发展的缩影^[4],它融合了中原传统美学与西域异域文化,是古代多民族文化交融发展的生动缩影。敦煌藻井不仅拥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尽显古代匠人的超凡匠心与审美智慧,更在现代文创设计、空间装饰等领域具备珍贵的应用价值,让敦煌艺术的不朽魅力在当代持续传承,如图1、图2。



图 1



图 2

在现代女式手提包设计中,敦煌藻井纹样的创意运用,彻底跳出了常规时尚配饰的同质化困境,为手提包赋予了独树一帜的东方美学魅力与厚重的传统文化内涵。设计师依托现代设计方法,深度剖析敦煌藻井图案的构图规律、线条特征与核心视觉符号,精准提炼出适配现代箱包的初始图形单元,摒弃传统纹样中过于繁复冗杂的细节,保留其精髓内核。

尤其以经典的隋代三兔飞天藻井图案为核心灵感来源,对传统藻井纹样进行现代化解构与艺术化重组,弱化古拙的厚重感,优化线条流畅度与构图比例,完美适配手提包的包面、包边、肩带等不同设计区域,为整体设计提供了多元且精致的素材。这种创新融合既守住了敦煌传统艺术的文化根脉,又贴合当代女性的审美与实用需求,让千年非遗纹样在现代时尚配饰中焕新生,让手提包兼具颜值、实用性与文化底蕴。

结合现代女性消费者的审美认知,将创新衍生方案应用于不同的风格现代女式手提包创新设计中。现代女性消费者注重时尚、个性和品质,对手提包的设计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设计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女性消费者的审美需求和使用习惯,使手提包既符合现代女性审美认知。

通过对于以上案例分析,敦煌藻井纹样在现代女式手提包中的创新设计,一方面有利于敦煌藻井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通过将传统的藻井纹样与现代设计相结合,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敦煌文化,促进敦煌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其他传统图案和纹样在女式手提包中的创新应用提供方法参考。将其他传统自然纹样,如唐朝团花纹样、威廉·莫里斯的植物纹样等运用创新设计方法,进行现代女式手提包的设计,为女式手提包设计带来更多的灵感和可能性。

三、威廉·莫里斯植物纹样在女式手提包中的应用

3.1 纹样特点与设计风格

威廉·莫里斯作为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核心奠基人,其创作的植物纹样在艺术造型上极具辨识度且丰富多元,创作素材多取材于自然中的花卉草木与缠绕蔓藤,摒弃了工业化的刻板生硬,以灵动流畅的线条勾勒出饱满丰盈、鲜活生动的形态。藤蔓蜿蜒舒展,花卉错落绽放,枝叶相互交织缠绕,形成富有韵律感的视觉构图,每一处造型都饱含自然生长的蓬勃生机,将自然万物的灵动与柔美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独具匠心的纹样造型,不仅是对自然之美的艺术化升华与诗意呈现,更深刻映射出莫里斯对自然万物的极致细致观察与独到深刻理解。他扎根自然本真,细究花草的生长姿态与肌理脉络,将对自然的热爱与对人文美学的追求融入创作,让植物纹样超越了单纯的装饰价值,成为自然美学与人文精神交融的经典艺术符号。

莫里斯的植物纹样以枝条和花叶的缠绕形成几何形去组织图案整体结构,给人以饱满、整齐、紧凑、无限延展的视觉效果,强调图案设计的平面感,追求一种连续性、规律性的秩序美^[5],秩序感的产生往往由图案本身的结构所决定,如图3、图4。这种结构不仅使纹样具有装饰性,还体现了生命与秩序的和諧统一。



图3



图4

在女式手提包设计中,这种风格可以通过细腻的植物刺绣、印花等工艺得以体现。莫里斯纹样由19世纪英国艺术家威廉·莫里斯设计创造。植物图案是莫里斯纹样中最具代表性的主题之一,如图5《玫瑰》、图6《雏菊》《偷草莓的小贼》等都是经典的印花设计作品^[6]。手提包的表面可以用刺绣的方式呈现出莫里斯风格的花卉纹样,色彩鲜艳且层次丰富,提手部分可以用编织的工艺模仿植物蔓藤的形态,使手提包整体充满自然之美。这种设计风格也符合现代人对回归自然、追求环保的生活理念,让女式手提包不仅是时尚的配饰,更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象征。

植物纹样是传统艺术中极具韵味的经典载体,玫瑰、菊花与梅花的纹样更是各具风姿,意蕴深远。玫瑰花纹样形态饱满丰盈,花瓣层层叠叠、错落相拥,瓣边的柔美弧度与层叠的肌理相得益彰,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雍容华贵、典雅大气的独特气质,尽显繁花盛放的盛景。菊花纹样则以灵动优雅的姿态与纯洁清雅的形象为核心特质,

花瓣舒展飘逸、纤柔婉转，花蕊精致细腻、层次分明，自带淡然脱俗的文人风骨。

这些匠心独运的植物纹样，绝非对自然形态的简单复刻，植物纹样的来源，往往与人们对大自然的观察与解读有关。古人生活在大自然中，他们对植物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将植物的形态、纹理引入到艺术创作和生活用品中。这种模仿和再创造不仅是对植物美学形态的欣赏，更多的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将大自然的力量与神秘引入日常，赋予物品特定的意义和属性^[7]。既定格了自然生灵的灵动之美，又将人文情思与精神追求融入其中，让每一处纹样都成为自然之美与人文内涵交融的艺术结晶。



图5 (1883年《玫瑰》)



图6 (1877年《雏菊》)

3.2 色彩在自然纹样中的运用

自然纹样中的色彩搭配遵循和谐统一、贴近原生的基本原则，以此展现出浑然天成的自然美感。工艺美术运动深度践行了这一色彩理念，格外注重色彩与自然生态的融合。设计师们摒弃了工业化时代浮夸艳丽的人工色调，转而撷取大自然中的原生色彩，除了象征草木的绿色、代表天空流水的蓝色，还常运用温润的土黄、赭石等大地色系，用以表现植物的蓬勃生机与自然活力。这种质朴的色彩运用，既呼应了运动回归自然的核心主张，也让设计褪去矫饰，呈现出平和本真的艺术格调。

绿色是植物纹样中极具代表性的核心色彩，也是自然美学里不可或缺的存在，承载着生命的蓬勃与希望的曙光。从初春稚嫩清新的嫩绿新芽，到盛夏沉稳厚重的深绿叶片，层次丰富的绿色调，精准勾勒出大自然四季更迭的变化与生生不息的循环韵律。蓝色常作为植物纹样的经典搭配色，以天空的澄澈、流水的清幽为灵感，与绿意相互映衬，巧妙营造出宁静悠远、恬淡空灵的氛围。两种自然原生色彩的交融，既还原了自然本真的视觉美感，也赋予纹样更深层的精神意蕴，成为传递自然情怀的重要艺术载体。

在色彩搭配上，运用相似色或互补色来营造和谐的氛围，如图7、图8。使色彩之间相互呼应，增强作品的整体感。并且色彩在自然纹样中的运用还受到文化和地域的影响。在中国文化中，红色象征着吉祥和幸福，常常被用于装饰中。而在西方文化中，蓝色则被视为忠诚和高贵的象征。地域的差异也会导致色彩的运用有所不同。



图7



图8

3.3 自然元素的表现形式

女式手提包设计中,自然元素的表现形式丰富多样,灵动的植物纹样、质朴的天然材质与和谐的自然色系,都为包袋注入鲜活气息。这些源于自然的设计巧思,打破了工业化的冰冷质感,为手提包增添了独一无二的魅力,也赋予其更深厚的艺术价值。

线材选择是女式手提包工艺设计的重要环节,需紧密贴合设计图案的整体需求,优先选用质地结实、抗拉性强的棉线或高性能合成纤维线。这类优质线材能有效抵御日常使用中的磨损、拉扯,从基础工艺上保障手提包的耐用性与实用性能。同时,线材色彩深度呼应自然设计主题,巧妙选取象征生机的绿色、代表宁静的蓝色等自然色系,与包身的自然元素纹样相互映衬,进一步强化整体的自然气息,实现工艺质感与自然美学的有机结合。

在尺寸确定上,设计师需精准平衡实用性与美观性。结合通勤、出行、休闲等不同使用场景,以及用户的储物需求,科学规划手提包的大小规格。合理的尺寸设定既满足了日常收纳物品的实用功能,又让包体比例结构更趋协调,避免因尺寸失衡影响视觉效果,使手提包在兼顾实用价值的同时,外观更显精致美观,达成功能与美的双重统一。

近年来,女士皮革手提包的刺绣装饰设计立足传统技艺,提炼当今审美需求,逐渐探索出了一条刺绣传统技艺与现代包袋设计的结合之路,在当代装饰领域大放光彩。这种设计手法将刺绣技艺应用在箱包本体或装饰部件上,把刺绣生动直接、色彩丰富的艺术特性融入女士皮革手提包的创新中,不仅为皮革作品注入传统文化底蕴,而且利于民族刺绣文化的活态传承^[8]。钩织基础是手提包设计的重要环节,需要了解基本的钩针技巧,如链针、短针、中长针、长针等,如图9、图10。



图9



图10

这些基础针法构成了整个手提包的主体。通过熟练掌握这些针法,能够创造出各种不同的纹理和图案,为手提包增添更多的细节和层次感。

钩织图案是手提包设计的核心部分,根据设计图案,使用不同颜色的线进行钩织。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学习一些特殊的钩织技巧来完成复杂的图案,比如色彩变换、凸花技巧等。

在女式手提包设计中,我们可以运用以上的设计方法和设计原则,将更多的自然元素融入到设计中,使手提包更加富有艺术感和观赏性,创造出更加美丽、实用且富有艺术价值的手提包作品。

结论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植物纹样在女式手提包设计中,对工艺美术运动核心理念的传承与具象化体现。工艺美术运动作为影响深远的经典设计思潮,重点强调回归自然本真、摒弃工业化批量生产的冰冷与粗陋,同时坚守传统手工艺的价值,反对浮夸矫饰的工业化装饰,而植物纹样在现代女式手提包设计中的灵活运用,从美学风格、精神内核等多个方面,生动诠释了这一核心设计理念。

自然原生的植物纹样,为简约干练的手提包注入了自然、清新的灵动气息,这种质朴柔和的视觉风格,与工艺美术运动始终追求的自然主义风格高度契合,褪去了工业产品的生硬感,让包袋自带恬淡治愈的田园气息。更贴合当下现代人向往远离喧嚣、回归自然、推崇绿色环保的生活理念,让传统设计思潮与现代时尚审美、生态需求相融,让手提包兼具实用功能与人文美学价值。

工艺美术运动主张选用天然材料。女式手提包可以选择天然皮革、棉麻等材质,展现材料的质感和自然之美。装饰材料也可采用天然的植物染料、贝壳、木材等,增加手提包的天然元素。这不仅体现了对自然的尊重,也符合环保理念。

工艺美术运动重视传统手工艺的价值。手工制作的手提包更具温度和个性,每一个细节都凝聚着工匠的心血和技艺,同时也传承了传统文化,满足现代人对个性化的追求。

综上所述,植物纹样在女式手提包设计中充分体现了工艺美术运动的理念,为女式手提包设计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发展方向。通过将自然纹样与现代女式手提包设计相结合,我们创造出了既具有历史文化底蕴又符合时代潮流的优秀作品,为时尚与自然的完美结合树立了典范。

参考文献:

- [1] 杜乐乐,温再骞.英国工艺美术运动领袖人物威廉·莫里斯设计作品简析[J].美术教育研究,2019,(17):62-63.
- [2] 张新凯.威廉·莫里斯的设计观[J].美术教育研究,2022,(01):86-88.
- [3] 陈晓明.探析绿色理念的艺术设计方法与趋势[J].艺术科技,2016,29(01):250.
- [4] 孙頔.敦煌藻井图案再设计在现代时尚服饰品中的应用[D].杭州师范大学,2019.
- [5] 谢婷婷,李文肖,刘行燕.莫里斯植物纹样在儿童针织毛衫中的应用研究[J].针织工业,2024,(09):77-81.
- [6] 占琳.绿色发展视角下植物纹样在服饰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植物学报,2024,59(01):164-165.
- [7] 李瑛.植物材料包装与植物纹样的融合探究[J].分子植物育种,2024,22(03):962-966.
- [8] 侯倩.当代女士皮革手提包的装饰设计进展与分析[J].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4,23(03):66-70.

A Study on the Integration of Morris Floral Patterns and Women's Handbags

Zhao Weiqiang¹, Wang Yucheng¹, Wang Jiantong²

(¹ School of Art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150080, China; ² Shanxi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Shanxi, Taiyuan 12779,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design of women's handbags inspired by William Morris's botanical styl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Arts and Crafts Movement's advocacy for a return to natural motifs, it provid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movement's underlying concepts regarding natural motifs, inclu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illiam Morris's botanical designs, the core principles of the Arts and Crafts Movement, and the classification and features of natural motifs.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a handbag featuring Dunhuang coffered ceiling pattern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natural motifs in modern women's handbag design. "The Rhythm of Nature" demonstrates the application of William Morris's botanical patterns in women's handbags, fully embodying the ideals of the Arts and Crafts Movement and providing new inspiration and directions for women's handbag design. It also offer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natural patterns in women's handbag design, indicating that they will become more diverse, innovative, eco-friendly, personalized, and fashionable.

Keywords: Arts and Crafts Movement; Plant patterns; Women's handbag; William Morris

传统银饰工艺在可持续时尚产品设计中的创新研究

石思雨¹

(1.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全球生态管控力度不断加大, 循环经济发展也持续深入, 在这样的背景下, 时尚产业正处在从依赖资源消耗实现增长, 向构建绿色闭环模式转变的重要阶段。当前, 时尚产业转型的核心矛盾在于, 如何让材料、低碳生产以及文化身份这三者相互配合、协同发展。传统银饰工艺凭借金属材料无限循环潜力, 和高溢价的手工技艺门槛, 正成为可持续时尚语境下极具潜力的创新载体。本研究聚焦传统银饰, 开展其工艺转译和价值挖掘。在考察国内外手工艺复兴状况以及可持续设计理念的基础上, 分析银饰工艺在当代审美体系中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和文化韧性。通过对本土品牌的深度解构, 系统探讨了其在再生银材质应用、文化重构及去工业化制作流程方面的探索路径。研究表明, 引入银饰工艺不仅增强了产品的情感持久性, 还借助工艺的现代化转型, 为时尚产业从单纯注重物质减排转向关注文化生态修复的模式, 为产业转变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参考。

关键词: 传统银饰工艺; 可持续设计; 时尚配饰; 设计创新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394

在全球气候治理与循环经济政策推进的双重驱动下, 时尚产业正面临结构性转型的必要性, 由以资源消耗驱动的增长模式, 向以材料循环、低碳生产与文化再生协同发展的绿色闭环模式转变。现有研究与产业实践多集中于替代性生物材料和对生产技术的改良, 尽管这些方向具有重要价值, 但单纯依赖材料替代并不足以解决时尚消费中的“心理废弃”与文化流失问题。为此, 需要将关注点扩展至承载文化记忆与工艺知识的传统技艺, 从而在物质减排之外同时实现情感耐久与文化生态修复。

乔纳森·查普曼提出的“情感永续性”理论, 提示设计不仅要优化物质生命周期, 也要通过产品的情感与叙事延长使用与保留价值, 这为传统工艺融入现代可持续时尚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1]。传统银饰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两方面的独特优势: 一方面, 银作为金属材料在物理层面具备高回收性与可循环潜力; 另一方面, 手工篆刻、花丝等技艺代表了低能耗、去工业化的制作方式, 并承载着浓厚的文化意义与地方性叙事。因此, 传统银饰天然处于“材料可循环性”与“情感耐久性”两条可持续路径的交汇点。但现实设计实践存在两类误区: 其一是对纹样与装饰的表层堆砌, 造成文化符号的浅表化; 其二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过度神圣化、与当代消费语境分离。为避免上述极端, 必须探索“工艺的当代转译”路径, 既保留技艺核心与文化脉络, 又通过设计和生产组织创新, 使其适配现代市场与循环供应链。

一、传统银饰的材料循环与文化价值

1.1 传统银饰的材料循环优势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不断深化的背景下, 材料的循环利用已成为推动时尚产业绿色转型的重要路径。传统银饰在材料层面具有天然的循环优势, 使其在可持续设计语境中具备独特价值。银作为贵金属材料, 具有良好的延展性、可塑性和稳定的物理化学性质, 在多次熔炼与再加工过程中仍能保持较高的材料性能, 这使得银在理论上接近“无损循环”的材料形态。与需要复杂化学处理的部分新型材料相比, 银的再生利用流程相对成熟, 回收后的

作者简介: 石思雨(2002—),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时尚产品设计方向。

银材经过提纯与再熔炼即可再次进入生产体系，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材料循环链条。

从生产方式来看，传统银饰的制作通常依赖手工工艺完成，例如篆刻、花丝、焊接等技法。这类工艺主要依靠人工操作和简单工具完成，其生产过程能耗相对较低，也较少依赖大规模工业化设备，因此在生产阶段具有一定的低碳特征。同时，小规模工坊式生产模式也使得材料利用更加精细化，边角材料往往能够被重新熔炼并再次使用，从而减少资源浪费。

随着循环经济理念的不断发展，再生银逐渐成为时尚配饰设计中的重要材料来源。通过建立回收、提纯与再生产的材料循环体系，银饰产品能够在生命周期结束后重新回到生产链条中，实现资源的再次利用。与一次性消费品不同，这种材料循环模式不仅延长了材料的使用周期，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自然资源的开采需求。因此，从材料属性和生产方式两个层面来看，传统银饰均具备较为明显的可持续优势，为其在当代可持续时尚体系中的应用奠定了物质基础。

1.2 传统银饰的文化价值与情感耐久

除材料层面的循环特性之外，传统银饰还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与情感属性，这一特征使其在可持续设计中展现出不同于普通消费品的意义。长期以来，银饰不仅是一种装饰品，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象征与社会意义^[2]。在不同地域文化中，银饰往往与身份象征、礼仪习俗以及审美传统密切相关，其制作过程所蕴含的技艺知识和文化记忆，使银饰成为一种具有文化传承属性的设计载体。在当代设计理论中，产品的可持续性不仅体现在材料与生产环节，还体现在产品与使用者之间建立的情感关系。英国设计理论家乔纳森·查普曼提出的“情感永续性”理论指出，能够与用户建立情感联系的产品往往具有更长的使用周期，从而在无形中减少资源浪费^[3]。传统银饰正是这一理论的重要实践案例。由于其蕴含特定文化意义和手工价值，消费者往往更倾向于长期保存甚至代际传承，而不是在短时间内被替换或丢弃。

二、情感永续视角下的工艺转译

2.1 情感永续理论与慢时尚设计理念

在可持续时尚的研究语境中，产品生命周期的延长不仅依赖于材料与制造层面的优化，还与产品在使用过程中所形成的情感价值密切相关。传统的快时尚模式往往以快速生产和频繁更新为主要特征，消费者在短时间内不断更换产品，从而导致大量资源浪费与环境负担。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化，慢时尚逐渐成为反思这一消费模式的重要方向，其核心在于通过提升产品质量、文化价值以及情感意义，使消费者更加珍视和长期使用产品。

在这一理论背景下，英国设计理论家乔纳森·查普曼提出的“情感永续性”为理解产品与用户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视角。该理论认为，产品的“过时”并不总是源于物理损坏，而往往源于情感联系的断裂。当产品缺乏文化意义、审美深度或个人记忆时，消费者更容易产生“心理废弃”，从而选择更换新的商品。因此，通过设计强化产品的情感维度，使其能够在使用者的生活经验中不断积累意义，是延长产品生命周期的重要途径。

传统银饰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具有天然优势。银饰在历史上常常与仪式、身份和纪念意义相联系，其佩戴行为往往带有一定的文化象征。例如，在许多地区的传统文化中，银饰既是审美装饰，也是表达祝福、祈愿或身份认同的重要媒介。而手工制作过程赋予每件银饰独特的细节差异，使产品在视觉和触觉层面都具有一定的个体性。与工业化批量生产的标准化产品相比，这种差异性更容易引发消费者的情感共鸣。从慢时尚的视角来看，传统银饰不仅是一种物质产品，更是一种能够承载情感与文化记忆的设计媒介。当设计者通过适当的设计策略强化这种情感价值时，产品便能够在用户生活中持续存在，从而在无形中延长使用周期，并降低资源消耗。

2.2 传统银饰工艺的当代设计转译

传统银饰虽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工艺价值，但在当代设计实践中，如果缺乏适当的转译策略，传统元素往往难以与现代生活方式建立有效联系。一方面，一些设计实践仅停留在对传统纹样的简单复制或堆叠，使文化元素流于表面装饰，难以形成真正的设计创新；另一方面，也存在将传统工艺过度神圣化的倾向，使其被固定在“文化遗产”的语境之中，而缺乏与现代审美和市场需求的互动。如何在尊重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实现当代化表达，

成为传统银饰融入可持续时尚体系的重要课题。

工艺转译的核心在于将传统技艺中的文化精神与制作逻辑转化为符合现代设计语言的形式表达。这一过程并非简单地保留或替换传统元素,而是通过对材料、结构与审美形式的重新组织,使传统工艺在新的设计语境中获得新的生命。比如在设计过程中可以通过简化纹样结构、强化材质质感或结合现代造型语言,使传统元素在视觉上更加符合当代审美趋势。同时在保持手工制作特色的前提下,通过适度的技术辅助与工艺改良,也可以提升产品的制作效率和稳定性,使传统工艺更好地适应现代生产体系。

在情感永续理论的视角下,传统银饰工艺的当代转译不仅是一种设计策略,更是一种连接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重要路径。通过对工艺语言、审美形式与文化叙事的综合重构,传统银饰能够在保持文化特性的同时融入现代设计体系,并为可持续时尚的发展提供新的可能。

三、传统银饰驱动时尚转型路径

3.1 传统银饰在可持续时尚中的实践模式

目前时尚产业正逐渐从以快速生产和高频消费为特征的传统模式,向更加注重资源循环与文化价值的生产方式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传统银饰工艺凭借其材料循环特性与文化价值优势,逐渐成为连接传统工艺与当代可持续设计的重要实践载体。与依赖大规模工业生产的时尚产品不同,传统银饰在生产组织方式上往往呈现出小规模工坊与品牌设计相结合的模式,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同时也为传统技艺的延续提供了现实基础。

当代设计实践中,一些本土品牌通过将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探索出具有可持续特征的发展路径。如软山在产品设计中强调材料的循环利用与工艺细节的呈现,通过对传统工艺的现代化表达,使银饰产品既保持文化特征,又能够适应当代审美需求^[4]。而其品牌在产品设计中注重材质本身的质感表现,通过简洁的造型与细节处理,使传统银饰在视觉上更加符合现代设计语境。

另一品牌瑞银鸟则以传统民族银饰文化为基础,在设计中保留具有代表性的工艺语言,并通过品牌叙事强化产品的文化意义。通过对传统工艺流程的系统梳理与优化,品牌在保持手工制作特色的同时,也逐渐形成较为稳定的生产体系,使传统银饰能够在现代市场环境中持续发展。上述实践表明,当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方法相结合时,银饰不仅能够作为文化符号存在,还可以成为具有市场活力的设计产品。

3.2 传统银饰在可持续时尚中的实践模式

在可持续时尚的发展过程中,传统银饰工艺所展现出的材料循环与文化价值,为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设计体系提供了重要启示。在材料层面,通过建立再生银的回收与再利用体系,可以有效延长材料生命周期,从而减少资源浪费。在设计层面,通过对传统工艺进行当代转译,使其在保留文化内涵的同时适应现代审美需求,有助于增强产品的文化认同感与情感价值。在品牌与产业层面,通过构建以工艺为核心的设计品牌,可以进一步推动传统技艺在当代社会中的持续发展。与传统工业产品不同,工艺型品牌往往更加注重产品背后的文化叙事与制作过程,通过对工艺过程的展示与传播,使消费者能够理解产品的文化意义,从而增强对产品的认同感。这种基于文化叙事的品牌策略,有助于建立消费者与产品之间的情感联系,从而延长产品的使用周期^[5]。

传统银饰工艺在可持续时尚中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具体产品的设计上,更体现在其所代表的发展模式之中。通过材料循环、工艺传承与设计创新的协同发展,传统银饰为当代时尚产业探索出一条融合文化传承与绿色发展的转型路径,也为构建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可持续设计体系提供了有益参考。

四、结论

在全球生态治理不断深化与循环经济理念持续推进的背景下,时尚产业正逐渐从以资源消耗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转向更加注重材料循环与文化价值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本文以传统银饰工艺为研究对象,从材料循环与情感耐久两个维度出发,探讨了其在当代可持续时尚体系中的应用潜力与发展意义。

银材质具有较高的可回收性与循环利用价值,为时尚配饰在材料层面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在技艺

方面篆刻、花丝等传统手工技艺所体现的低能耗制作方式，使银饰在生产环节中呈现出一定的生态优势。在文化层面传统银饰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象征，通过设计转译能够强化产品的情感价值，从而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减少因消费更新所带来的资源浪费。通过对本土品牌实践的分析可以发现，当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方法相结合时，银饰不仅能够保留文化特征，还能够适应当代审美与市场需求。总体而言，传统银饰工艺在材料循环、文化传承与设计创新之间建立了有效联系，为构建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可持续时尚设计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推动时尚产业向更加绿色与长期的发展方向转型提供了实践启示。

参考文献:

- [1] 陈汐圆. 毛南族花竹帽及其编织技艺在服装设计中的创新应用[D]. 鲁迅美术学院, 2025. DOI:10.27217/d.cnki.glxmc.2025.000008.
- [2] 薛瑾. 美育视角下黔东南苗族文化符号在室内装饰中的创新应用 [J]. 纺织报告, 2024, 43 (08): 133-135.
- [3] 葛晗. 情感永续理论下的适老化空气调节产品设计研究[D]. 江南大学, 2024. DOI:10.27169/d.cnki.gwqgu.2024.001620.
- [4] 张煜,宗世英. 非遗文化传承视域下苗族文化创意设计与应用 [J]. 轻纺工业与技术, 2024, 53 (01): 101-105.
- [5] 陈云云. 跨媒介叙事下武汉红色文旅产品设计研究[D]. 湖北大学, 2024. DOI:10.27130/d.cnki.ghubu.2024.000708.

Innovative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Silver Craftsmanship in Sustainable Fashion Product Design

Shi Siyu¹

¹*School of Art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global ecological control measures are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and the circular economy development is also continuously deepened.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fashion industry is currently in an important stage of transitioning from relying on resource consumption for growth to building a green closed-loop model. Currently, the core contradiction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fashion industry lies in how to make the three elements - materials, low-carbon produc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 cooperate and develop together. Traditional silver jewelry craftsmanship, leveraging the infinite recycling potential of metal materials and the high premium threshold of handcrafting skills, is becoming a highly potential innovative carrier in the context of sustainable fash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traditional silver jewelry and conducts its process translation and value exploration. Based on the examination of the revival status of handicraft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sustainable design concepts, it analyzes the symbolic meaning and cultural resilience of silver jewelry craftsmanship in the contemporary aesthetic system. Through in-depth deconstruction of local brands, it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ir exploration paths in the application of recycled silver materials,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and de-industrialization production process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ntroducing silver jewelry craftsmanship not only enhances the emotional durability of products but also, through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the craftsmanship, provides an operational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fashion industry to shift from merely focusing on material emission reduction to paying attention to cultural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y.

Keywords: Traditional Silver Craftsmanship; Sustainable Design; Fashion Accessories; Design Innovation

客家乐舞艺术的文化功能与当代价值研究

徐高瀚^{1, 2} 吴璇¹

(1. 洛阳理工学院, 河南 洛阳 471023, 2.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 新乡 453000)

摘要: 客家乐舞是客家民系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创造的艺术形式, 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与族群情感, 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形式丰富多元, 常用于重要的节日仪式, 具有鲜明的民俗特色。在文化功能上, 客家乐舞承担着族群认同、文化传承与社会教化的作用, 是维系客家人情感纽带的重要方式。随着时代变迁, 客家乐舞逐渐从民俗活动走向专业舞台, 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不断创新。同时, 在文化旅游、艺术教育、对外交流等领域展现出新的生命力, 彰显出传统艺术在当代语境下的多重价值。

关键词: 客家文化; 乐舞艺术; 文化功能; 价值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强省研究项目“黄河流域(河南段)石窟乐舞艺术保护与传承研究”(项目编号: 2025JYQS1245)的阶段性成果; 2026年度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科技赋能河南省客家文化资源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项目编号: 262400410055)的阶段性成果。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399

一、客家乐舞艺术历史渊源

1. 音乐主要种类及渊源

福建十番音乐、江西采茶戏、广东汉乐等客家音乐中常见的五声调式音阶、旋律走向, 与中原传统音乐有着明确的亲缘性。福建十番音乐早在明末清初就已经在闽西各县流行, 在长期的发展中, 不断的吸收融汇畲瑶古乐、南词说唱及汉剧、采茶戏、木偶戏音乐甚至宗教音乐等, 形成深厚的艺术积淀; 江西采茶戏起源可追溯至宋代时期, 明末茶篮灯发展为“两旦一丑”的三角戏, 清代中叶形成完整表演体系; 广东汉乐传承宋元明清以来的古韵遗风, 历史上曾有“国乐”“中州古韵”“外江弦”“汉调音乐”之称, 素有中原遗响之美誉, 曲风典雅大气, 古朴流畅。

2. 舞蹈主要种类及渊源

福建上杭舞狮、广东樟木头舞麒麟、江西定南瑞狮等客家舞蹈形态中遗存着中原古风, 其步法、阵式与节奏型态, 与客家音乐的板式变化一脉相承。福建上杭客家舞狮相传始于汉代, 盛于宋代, 表演分为“文狮”和“武狮”两种。文狮表现狮子温驯神态, 武狮表现勇猛性格, 舞狮形式有舞双狮和舞单狮, 分别对应文狮和武狮; 广东樟木头舞麒麟是明末清初由客家人从北方带来的, 距今有四百五十多年的历史, 表演分“头套”和“尾套”。舞麒麟都是师傅口传身授, 每个姓氏自当一门, 多为祖传, 世代相承; 而江西定南武狮盛行明代初年, 也称“青草狮、猫公狮”。清末, 定南县历市镇砂头村舞狮艺人、武秀才张赞香对“定南瑞狮”表演形式进行了较大改进。据定南民俗, 瑞狮登门为“瑞气盈门”, 能消除邪恶, 招来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百业兴旺、满门吉庆之兆。

二、客家乐舞艺术在民俗仪式中的功能

1. 乐舞艺术在祭祖仪式中的运用

祭祖仪式是客家人社会生活中最为核心的礼俗活动, 其间的乐舞绝非简单的背景衬托, 而是宗法伦理秩序的有声符号, 深刻体现了对中原礼乐文化的传承。通常情况下, 祭祖仪式采用的乐舞形式以节奏舒缓、旋律古朴的器乐曲开场, 营造出敬畏、凝重的氛围。肖艳平(2023年)将赣闽台地区的客家传统祭祖礼俗与宋代朱熹《家

作者简介: 徐高瀚(1997—), 男, 博士研究生、文艺学博士后, 讲师, 研究方向为音乐学、文艺学;

吴璇(1972—), 女, 硕士研究生, 教授, 研究方向为石窟寺音乐、河洛传统音乐

礼》中的“祠祭”“昏礼”的仪程进行比较后发现，八百多年后的当下，客家群体所使用的礼俗规程与当时竟然在主体框架上高度一致。而宋代正是客家先祖大举迁徙至南方的时期。也就是说，当前客家人所举行的礼俗，极有可能与他们的祖先所举行的礼俗基本内容大致相同^[1]。在祭祀过程中，特定的曲牌与特定的仪节严格对应，例如在“迎神”、“三献”、“侑食”、“送神”等环节，均有与之匹配的乐舞。这种程序化、固定化的运用，并非随意安排，而是将抽象的伦理秩序进行仪式化。通过年复一年的展演，参与者在行为上、听觉体验上，内化了宗族社会的等级秩序。

其次，祭祖仪式是宗法伦理观念的感性化表达。客家人尊崇的“祖”并非单一对象，而是一个“一脉宗亲”的序列，从近祖上溯至炎黄二帝。这种独特的祖先观念，在乐舞上有其对应的表达逻辑。在家庭厅堂祭祀中，乐舞设计可能较为简单，或许只是一段清唱或简单的丝竹伴奏，配之简单的舞蹈，体现的是“敬宗”之情。而在宗祠、联宗祭祖的大典中，乐舞的规模、编制逐渐复杂，常动用完整的乐队，庄严恢宏，象征着集体的力量。欧阳睿（2022年）在调研了客家祭祖大典后发现，部分地区祭祖乐用的是传统的三通鼓吹打乐，在献乐舞的环节，不像黄帝陵公祭那样采用官方的乐祭舞祭，高诵吟诗等，而是以歌舞表演为主，如《板凳龙》《文武灯》《回回舞》《旱船》《稻草龙》和《马灯舞》等，在公共舞台上的表演又与民间表演有所区别，在表现形式上，一些舞蹈形式也有所改变^[2]。乐舞艺术将血缘关系转化为可感知的集体情感共鸣，成为宗族凝聚力与社会地位的彰显。

另外，祭祖仪式强化了文化认同与“根”的意识。仪式中使用的许多曲牌，本身就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感。钟俊昆（2024年）发现，赣南客家祭祖音乐文本中多次出现“洛阳桥上花如锦，洛阳桥下好划船”，其核心词是“洛阳桥”“划龙船”。船表现出凝聚性、固态性、流动性与承载性的特质，“唱船”的仪式活动激活了船的多重属性。歌本描述的是“唱船”与祭祀的仪式，它“凝聚了船的核心符号”。船具有起点、流动与终点的特质，正好与历经迁移的客家人对“家”的情感思念与传承载体有关^[3]。当族人齐声咏唱这些词句时，不仅仅是在完成祭祖仪式，更是在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还乡，用声音强化了关于河洛祖地的集体记忆，在心理层面维系着对中原文明的深切认同。



图1 定南瑞狮（图片来源：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2. 乐舞艺术在礼俗仪式中的运用

在客家人婚丧嫁娶等人生大事里，乐舞从来都少不了。它的作用不只是热闹，更重要的是标记人生阶段的转变，把整个社群的情感凝聚起来。

客家婚礼融入了古代礼仪，程序相对繁琐，基本包含了传统婚礼的“六礼”框架：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从提亲到成亲，每个环节都有讲究，几乎每一步都配着相应的乐舞。虽然不同朝代仪式会有些变化，但大的结构一直没变，这体现了对秩序的尊重。迎亲队伍出发时，唢呐在前面开路，锣鼓在后面助威，吹的都是热闹喜庆的曲子。这种用乐的方式，更接近于宋元以后中原民间婚俗的喧闹场面。它既是在向外宣告喜事，驱邪

纳吉,也象征着两家结亲。仪式中,乐器有时会模仿人声,用“咔腔”这样的形式来模仿祝词或者戏曲唱腔,把祝福变成实实在在的声音。这些曲子的旋律、调式,还有乐队的配置,都清晰地显示出与中原鼓吹乐、戏曲音乐的亲缘关系,是古礼在客家地区鲜活存续的明证。

而丧葬仪式则把儒家思想和中原古制融合在一起。丧礼是“慎终追远”最直接的体现,其间的乐舞承担着导引亡灵、安抚生者、规范礼仪的功能。在整个丧葬过程中,音乐的情绪和作用是会变的。仪式刚开始时,哀乐低沉,用丝竹乐器奏出悲伤的调子,配合着眷属的哭泣,把哀痛释放出来,这符合儒家“丧致乎哀而止”的说法。做法事或道场的时候,音乐就跟宗教紧密结合起来,既有庄严的诵经声,也有节奏分明的铙钹、钟鼓,目的是超度亡灵、安抚生者。有意思的是,在客家的“香花佛事”或某些地方的丧礼里,会穿插一些节奏相对轻快、甚至带点戏曲味道的表演,这种“以喜冲丧”的做法,反映出对生死的一种豁达看法。

此外,在诞育、寿辰、新屋落成这些场合,乐舞也很重要。它的作用是加强社群联系,让大家一起分享喜悦。比如家族在庆祝的时候,会请戏班来演采茶戏或木偶戏,剧目内容多半讲忠孝节义、耕读传家,音乐用的都是大家熟悉的曲牌。这时候,乐舞不光是娱乐,更是一种社区文化教育,在不知不觉中巩固了客家人从中原带来的传统价值观。参与者在共同的乡音乡曲中,体验着集体的归属感,文化认同由此得以强化。



图2 闽西客家民俗 (图片来源:中国文物网)

三、客家乐舞艺术的当代价值

客家乐舞艺术在当代社会语境下,其价值已超越传统民俗范畴,在文化遗产、社会凝聚、经济发展等多个方面展现出新的生命力。

在文化遗产方面,客家乐舞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对象,承载着不可再生的文化基因。福建上杭客家舞狮、广东樟木头舞麒麟等已列入各级非遗名录,这些乐舞形式保存了大量中原古礼的活态样本。袁文彬(2024)指出,广东客家舞蹈从民俗活动到舞台表演的演变,不仅展示了其自身的适应与创新能力,还体现了客家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持续生命力^[4]。全球化浪潮下,地方性知识体系的保护变得格外重要。它们承载的不只是文化多样性的一个样本,更是族群文化记忆能否延续的关键。客家乐舞的保护工作这些年有了新思路,从过去那种抢救性保护,逐渐转向生产性保护——数字化记录、传承人培养、展演平台搭建,都在同步推进。

在文化认同方面,客家乐舞在凝聚族群情感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客家人离开故土,传统社会结构面临解构。然而,每逢重要节庆或宗族活动,客家乐舞依然是联结海内外客家人的情感纽带。叶春(2020年)在对粤赣两地客家民俗仪式的田野调查中发现,虽然中原音乐文化的根源在注入粤赣两地不同的土壤之前,在传播的路途中,就已经产生了差异,但在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下,依然发挥着维系族群认同的重要作用^[5]。这种认同不仅是对历史的追溯,更是对共同价值观的确认,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当下具有重要意义。

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客家乐舞已然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源。以2024年在洛阳举办

的世界客属第33届恳亲大会为例，期间涌入的海内外游客直接拉动了住宿、餐饮、交通、购物等消费增长，不少游客因世客会期间接触到客家乐舞，会后专程前往客家地区体验民俗文化，推动节会旅游向常态旅游转化。同时，乐舞展演催生了演出服装、乐器制作、培训教学等配套产业，为当地创造了就业岗位，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另外，客家乐舞在艺术创新和教育传承上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不少当代舞台艺术创作者从客家乐舞里找灵感，像2009年永定的《土楼神韵》、2019年梅州的《白鹭村》，都是这样创作出来的。与此同时，一些高校和中小学把客家乐舞加进了艺术教育课程，通过“非遗进校园”这类活动，让年轻人对本土文化有更多认识和感情。这样做既保住了乐舞艺术的文化根基，又给了它符合当代审美的新形式，为传统艺术的延续找到了新出路。

四、结语

客家乐舞艺术呈现的是客家人的精神世界，也见证了中原古礼在南迁过程中如何延续和再生。在传统社会里，乐舞跟祭祖、婚丧这些礼俗紧密交织，既要维系宗族秩序，又要传递伦理观念，是客家人日常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到了当代，客家乐舞艺术并没有因为时代变化而消失，反而在非遗保护、舞台艺术创作、文旅融合这些方面重新活跃起来。从乡村祠堂到城市剧场，从民俗节庆到世客会的舞台，客家乐舞在适应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文化辨识度。这种传统与当代的有机融合，不仅给客家文化的延续提供了内在动力，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有益参照。

参考文献：

- [1]肖艳平.赣闽台客家礼俗音乐与中华文化认同研究[J].中国音乐学,2023,(01):142-144.
- [2]欧阳睿.宁化石壁客家祭祖的仪式特色及其文化意义[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2,(03):98-101.
- [3]钟俊昆.洛阳意象与赣南客家元宵唱船歌[J].寻根,2024,(06):22-30.
- [4]袁文彬.从民俗活动到舞台表演：广东客家舞蹈的演变与影响[J].艺术大观,2024,(17):40-42.
- [5]叶春.论粤赣两地客家民俗仪式音乐之异同[J].歌海,2020,(04):32-41.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Functions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Hakka Dance and Music Art

XU Gaohan 1, 2Wu Xuan1

1. Luoya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oyang, Henan, China

2.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China

Abstract: The Hakka music and dance is an artistic form created by the Hakka ethnic group during their long-term production and life. It carries profound historical memories and ethnic emotions, and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Hakka culture. Its forms are rich and diverse, and are often used in important festival ceremonies, featuring distinct folk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cultural functions, the Hakka music and dance play roles such as ethnic identity,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social education, and are an important way to maintain the emotional bond among the Hakka people. With the changes of times, the Hakka music and dance gradually moved from folk activities to professional stages, constantly innovating in artistic forms and expression methods.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shown new vitality in cultural tourism, art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demonstrating the multiple values of traditional art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Keywords: Hakka culture; dance and music art; cultural function; value research

传统服饰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创新应用

李凤泽, 郭俊傲

(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在全球化语境与文化认同重构的背景下, 传统服饰元素的当代表达成为服装设计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本文以传统服饰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创新应用为研究核心, 立足于文化符号学与设计学交叉视角, 对传统服饰中的纹样体系、结构语言、工艺技法及色彩范式进行系统梳理与理论解析, 挖掘其内在的文化语义与审美逻辑。在研究方法上, 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与设计实践相结合的路径, 引入“符号转译—形态重构—语境再生”的方法论框架, 对传统元素进行多维度的再设计探索。同时结合当代设计语境, 从材料技术创新、功能需求适配及情感化表达等层面, 构建传统服饰元素向现代服装转化的设计机制。

关键词: 传统服饰元素; 符号转译; 形态重构; 现代服装设计; 文化再生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406

一、传统服饰元素的构成与文化内涵

(一) 纹样元素的符号属性与审美逻辑

在全球化与文化多元交融的时代背景下, 服装设计已不再仅仅是功能性与审美性的结合体, 而逐渐成为文化表达与身份认同的重要媒介。传统服饰作为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蕴含着丰富的审美经验与文化符号, 其在当代语境中的再利用与创新表达, 成为设计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近年来, 随着“国潮”文化的兴起与本土文化意识的觉醒, 传统服饰元素逐渐回归大众视野。然而, 在实际设计过程中, 部分作品仍停留在表层的符号拼贴与装饰借用, 缺乏对其文化内涵与结构逻辑的深入理解, 导致设计流于形式。因此, 如何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通过系统化方法实现其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创新转化, 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传统服饰作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复合载体, 其构成并非单一视觉元素的叠加, 而是由纹样、结构、工艺与色彩等多重要素共同构成的综合系统。这一系统不仅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审美观念与技术水平, 同时也承载着深层的文化价值与社会意义。因此, 对传统服饰元素的系统性梳理, 是实现其在现代服装设计中有有效转译的基础。

纹样作为传统服饰中最具视觉识别性的元素, 其本质是一种高度符号化的视觉语言。从符号学角度来看, 传统纹样既是“能指”(视觉形式), 也是“所指”(文化意义)的统一体。例如, 龙纹象征权力与尊贵, 凤纹寓意祥瑞与和谐, 莲花纹代表纯净与超脱。这些纹样通过长期的文化积淀, 形成了稳定的象征系统, 构建出独特的文化语义网络。在审美结构上, 传统纹样普遍遵循对称、均衡与节奏化的构成原则。其组织方式多采用连续纹样、适合纹样与单独纹样等形式, 通过重复、对比与变化形成视觉韵律。这种形式规律不仅体现了东方审美中“中和之美”的哲学思想, 也反映出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秩序观与整体观。此外, 传统纹样往往具有叙事性特征, 通过图像组合表达特定主题或寓意, 如“百子图”“福禄寿喜”等, 这种叙事性为现代设计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资源与表达路径。

(二) 结构版型的文化表达

传统服饰在结构设计上具有鲜明的东方特征, 其核心在于“平面构成”与“整体包裹”的设计理念。以汉族传统

作者简介: 李凤泽(2000—),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时尚产品设计;

郭俊傲(2002—),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服饰为例，常见的交领右衽、对襟、直身等结构形式，强调衣片之间的平面拼接关系，而非通过立体剪裁塑造人体曲线。这种结构方式体现出“以衣载道”的设计思想，即通过服装形制传达伦理秩序与文化规范。从文化层面来看，传统服饰结构不仅是功能性安排，更具有社会象征意义。例如，不同领型、袖型及衣长往往对应不同身份与等级，体现出礼制文化对服饰的深刻影响。同时，宽松的廓形与流动的线条，也反映出东方哲学中“天人合一”的观念，即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存。此外，传统服饰在结构上强调“留白”与空间感，通过宽松剪裁形成身体与服装之间的“气韵空间”，这一特征在现代设计中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三）工艺技法的地域性与文化传承

传统服饰工艺是其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包括刺绣、织造、印染、盘扣等多种形式。这些工艺不仅是技术手段，更是文化记忆的载体，其发展往往与地域环境、民族习俗及历史背景密切相关。以刺绣为例，不同地区形成了风格各异的技艺体系，如苏绣以细腻见长，强调写实与层次；湘绣注重光影变化，具有较强的立体感；苗绣则以夸张造型与强烈色彩著称，体现出浓厚的民族特色。这种多样性不仅丰富了服饰的表现形式，也反映出文化的多元共生。在文化传承层面，传统工艺多通过师徒制或家庭传承得以延续，其制作过程蕴含着工匠精神与时间价值。工艺本身所具有的“手工痕迹”，使服饰超越了工业产品的标准化属性，成为具有独特情感温度的文化载体。

（四）色彩体系的象征意义与秩序结构

传统服饰色彩具有高度的象征性与制度性，其形成与古代哲学思想密切相关，尤其是“五行”理论与礼制文化的影响。在这一体系中，不同颜色被赋予特定含义，如红色象征喜庆与生命力，黄色代表权威与尊贵，青色体现自然与生机，黑白则具有阴阳对立与平衡的哲学意涵。同时，色彩的使用往往受到严格规范，如古代宫廷服饰中对颜色的等级划分，体现出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这种“色彩秩序”不仅具有视觉上的统一性，也强化了服饰的文化属性。从审美角度看，传统色彩搭配强调和谐与对比，通过综合色、间色的运用形成层次丰富的视觉效果。例如，“对比中求统一”的配色原则，使服饰既具有视觉冲击力，又保持整体协调。在现代语境中，这种色彩体系不仅为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来源，也为文化表达提供了重要的视觉媒介。

二、现代服装设计语境下的转译需求

（一）审美范式转型与视觉语言重构

在当代社会语境中，服装设计正处于多重力量交织的复杂场域之中。全球化进程加速了文化的传播与融合，消费升级推动了审美需求的多样化，技术革新则不断重塑设计方法与生产模式。在此背景下，传统服饰元素若要实现有效的当代表达，必须通过“转译”这一关键过程，将其从原有历史语境中提取，并重新嵌入现代设计体系之中。因此，明确现代服装设计语境下的转译需求，是构建创新设计路径的重要前提。

随着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当代消费者的审美观念逐渐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宏大叙事转向个体表达。极简主义、功能主义与跨文化混搭等审美趋势并存，使传统服饰中复杂繁复的视觉形式面临适配挑战。传统服饰元素在原有语境中往往具有较强的装饰性与象征性，其纹样密度高、色彩对比强、结构层次丰富，而现代服装设计更强调简洁、可识别与日常化表达。因此，在转译过程中，需要对传统视觉语言进行“降维处理”，即通过抽象、提炼与重组，将复杂元素转化为符合现代审美逻辑的设计语言。这种转译并非简单的“简化”，而是对视觉结构的再编码。例如，将传统连续纹样转化为模块化图形系统，将具象图案抽象为几何形态，使其在保留文化意涵的同时，具备更强的当代视觉适应性。

（二）功能导向强化与穿着场景适配

现代服装设计强调多场景适应性与功能复合性，从通勤、运动到休闲，不同使用情境对服装提出了差异化需求。相较之下，传统服饰多服务于特定礼仪或生活场景，其结构与材料在功能性上存在一定局限。因此，在转译

过程中, 需要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功能需求相结合, 实现从“象征性服饰”向“实用性服饰”的转化。例如, 通过对传统宽袍结构进行比例调整与面料替换, 使其适应现代人体工学与活动需求; 或通过模块化设计, 使服装能够在不同场景中灵活转换。此外, 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与生活方式的变化, 舒适性、透气性及可持续性等功能指标也成为重要考量。这要求设计者在转译过程中, 不仅关注形式表达, 还需兼顾材料选择与结构优化, 从而实现功能与美学的协同发展。

(三) 技术介入与设计方法革新

数字技术与新材料的发展, 为传统服饰元素的转译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三维建模、虚拟试衣及数字印花等技术, 使设计过程更加高效与精准, 同时也拓展了传统元素的表现形式。在这一背景下, 传统工艺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再现与创新。例如, 将传统刺绣纹样转化为数字图案库, 通过算法生成多样化设计; 或利用激光切割与 3D 打印技术, 对传统结构进行精细化重构。这种“技术转译”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 也为传统元素的当代表达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与此同时, 智能材料与可穿戴技术的发展, 使服装从静态产品转向动态交互媒介。传统服饰元素在此语境中, 不再仅作为视觉符号存在, 还可以参与信息传递与交互体验, 从而拓展其功能边界。

(四) 文化认同重构与可持续发展理念

在全球文化交融的背景下, 服装不仅是个体表达的工具, 也是文化身份的重要标识。传统服饰元素的当代应用, 往往承载着文化认同重构的功能。然而, 传统符号在脱离原有文化语境后, 可能出现意义弱化甚至误读的问题。因此, 在转译过程中, 需要对其文化语义进行再阐释, 使其能够在现代语境中被重新理解与接受。这一过程可视为“再语境化”, 即通过设计手段重建符号与当代生活之间的联系。例如, 将传统吉祥纹样与现代生活方式相结合, 使其不再局限于礼仪场景, 而融入日常穿着; 或通过跨文化设计, 将东方元素与西方设计语言融合, 形成具有全球视野的设计表达。这种文化层面的转译, 不仅有助于提升设计的文化深度, 也为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提供了新的路径。

在消费社会中, 市场需求对设计方向具有重要影响。随着“文化消费”与“情感消费”的兴起, 消费者不仅关注产品的功能与外观, 也重视其背后的文化意义与情感价值。传统服饰元素因其独特的文化属性, 具有较强的市场吸引力。然而, 若缺乏创新表达, 容易陷入同质化竞争。因此, 在转译过程中, 需要结合市场趋势与用户需求, 对传统元素进行差异化设计。例如, 通过品牌叙事强化文化内涵, 通过系列化设计建立视觉识别体系, 或通过跨界合作拓展产品边界。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转译策略, 有助于提升设计的商业价值与传播效果。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推动下, 服装设计逐渐向环保与伦理方向转型。传统服饰中蕴含的“物尽其用”“长期使用”等理念, 与当代可持续设计思想具有内在契合性。因此, 在转译过程中, 可以从材料选择、生产方式及使用周期等方面, 挖掘传统服饰的可持续价值。例如, 采用天然纤维替代合成材料, 借鉴传统工艺中的低能耗生产方式, 或通过可拆卸设计延长服装使用寿命。这种从可持续视角出发的转译, 不仅有助于提升设计的社会价值, 也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三、现代服装设计语境下的转译需求

(一) 审美现代性转向与符号简约化趋势

研究表明, 传统服饰元素作为一个由纹样、结构、工艺与色彩共同构成的复合系统, 具有高度的文化符号属性与审美价值, 其核心意义不仅体现在视觉形式层面, 更蕴含于深层文化语义与社会结构之中。因此, 在现代服装设计中, 对传统元素的应用不应停留于表层的形式借用, 而应通过系统性的“转译”过程, 实现其文化内涵与当代设计语言之间的有效对接。传统服饰元素面临多重转译需求, 包括审美范式的转型、功能结构的重构、技术手段的介入、文化语境的再建以及市场机制的驱动。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传统元素当代表达的现实条件与发展方向。

通过对这些需求的分析可以发现,转译的本质在于对“形式—意义—功能”三者关系的再平衡,即在保留文化识别性的前提下,实现形式的现代化与功能的适配化。在方法层面,本文提出以“符号转译—形态重构—语境再生”为核心的设计路径。其中,符号转译强调对传统视觉语言的提炼与再编码;形态重构关注结构与形式的创新组合;语境再生则致力于重建传统元素与当代生活之间的联系。这一方法体系为传统服饰元素的创新应用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框架。通过设计实践与案例分析可以进一步验证,上述方法能够有效提升服装设计文化深度与创新表现力,使传统元素在现代语境中获得新的生命力。同时,这一过程也有助于强化设计作品的文化识别性与市场竞争力,实现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协同发展。

在当代设计语境中,服装不再仅是身体的遮蔽与装饰,而逐渐演变为融合文化表达、技术媒介与社会意义的复合系统。传统服饰元素在这一语境中的再应用,实质上是一个“跨时空的意义转译过程”,即将历史语境中的文化符号,通过设计手段重新嵌入当代生活结构之中。因此,“转译需求”不仅是形式层面的适配问题,更是涉及审美范式、技术逻辑与文化认同的系统性重构。

(二) 身体观转变与结构功能再组织

随着现代性进程的推进,当代审美从传统的装饰性与象征性表达,逐渐转向理性化、功能化与个体化并存的多元格局。极简主义、去装饰化设计以及“低信息密度”的视觉趋势,使传统服饰中高复杂度的纹样体系与装饰结构面临适配压力。在此背景下,传统服饰元素的转译首先表现为“视觉降噪”与“符号压缩”。即通过抽象化与几何化处理,将原本具象且叙事性较强的图像转化为具有识别性的视觉符号。例如,将传统花卉纹样提炼为线性结构或模块单元,使其在现代服装中以更轻量化的形式呈现。从符号学视角来看,这一过程可理解为“能指形式的重构”与“所指意义的延续”。设计的关键不在于复制传统形态,而在于在新的视觉语境中保留其文化识别性,从而实现“简化而不失义”的设计目标。

现代服装设计中的“身体观”已由传统的遮蔽与规范功能,转向强调自由、舒适与个体体验。这一转变使传统服饰中基于礼制与身份等级构建的结构体系,面临重新解读与再组织的需求。传统服饰强调“宽袍大袖”“平面裁剪”等结构特征,其设计逻辑更多服务于仪式性与象征性表达。而现代服装则更加关注人体工学与动态适应性,如运动自由度、穿脱便捷性及多场景转换能力。因此,在转译过程中,需要对传统结构进行“功能再编码”。例如,通过对传统交领结构的比例调整,使其适应现代体型与穿着习惯;或将传统服饰的层叠结构转化为模块化设计,使服装具备组合与拆分的功能。这种结构层面的转译,本质上是对“形式—功能关系”的再平衡。

(三) 技术语境转变与生产逻辑重塑

在数字化与工业化高度发展的背景下,服装设计的生产逻辑已发生深刻变化。从传统手工制作到现代工业制造,再到数字化定制,技术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也重构了设计思维。传统服饰元素在原有语境中多依赖手工艺,如刺绣、织造等,其制作周期长、成本高、标准化程度低。而现代设计则强调效率、规模与可复制性。因此,转译需求之一在于实现“工艺语言的技术转化”。具体而言,可以通过数字印花替代传统刺绣,实现图案的快速复制;利用参数化设计生成纹样变化,提高设计效率;或借助3D建模技术对传统结构进行虚拟重构。这一过程不仅是技术替代,更是设计方法论的转变,即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此外,智能材料与可穿戴技术的发展,也使服装具备感知与反馈能力。传统服饰元素在这一语境中,可以作为信息界面的一部分参与交互,从而拓展其功能属性。

四、结论与展望

总体而言,现代服装设计语境下的转译需求,是一个由审美转型、功能重构、技术介入、文化再生产与市场机制共同驱动的复杂系统。传统服饰元素的当代表达,不再是简单的形式借用,而是一个涉及多维度重构的动态过程。只有在充分理解这一转译需求体系的基础上,构建科学的设计方法与路径,才能实现传统文化资源的有效

转化与创新利用,从而推动现代服装设计在文化深度与创新维度上的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传统服饰元素作为一个多维度的文化系统,既包含具体的视觉形式,也蕴含深层的文化意义。其纹样的符号属性、结构的文化表达、工艺的传承价值以及色彩的象征体系,共同构成了丰富而复杂的设计资源。对这些元素的深入理解,不仅有助于挖掘其审美潜力,也为其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创新应用提供了坚实基础。现代服装设计语境下的转译需求,体现为审美、功能、技术、文化与市场等多重维度的综合作用。传统服饰元素的当代表达,不仅是形式上的再设计,更是一个涉及文化重构与价值再生产的复杂过程。只有在充分理解这些转译需求的基础上,构建系统化的设计方法,才能实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有效衔接,从而推动服装设计的持续创新与发展。

参考文献:

- [1]王万兴,潘玲霞. 陶瓷元素在时尚生活中的展现——景德镇传统青花瓷纹样在现代设计中的转译与消费[J].景德镇陶瓷,2025,53(05):64-68.
- [2]杨晨曦,王翻. 徒步运动服装的功能性结构设计研究[J].染整技术,2025,47(08):58-61.
- [3]熊馨雨. 陕西刺绣中抽象几何纹样在女装设计中的创新应用[J].西部皮革,2025,47(16):99-102.
- [4]杨妍,李正,吴艳,等. 基于 CiteSpace 的清代服饰研究进展的可视化分析[J].服装设计师,2025,(08):44-50.
- [5]田俊阳,刘斌,张华玮. 戏曲服饰符号在新中式时尚中的应用[J].设计,2025,38(13):30-33.
- [6]宋德凤,杜冰洁. 龙纹的演变及其在服装设计中的创新应用[J].西部皮革,2025,47(11):86-88.
- [7]叶明珠. 传统漆艺在饰品设计中的抽象转译与创新实践[J].雕塑,2025,(03):72-73.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lothing Elements in Modern Fashion Design

Li Fengze, Guo Junao

School of Art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the contemporary expression of traditional clothing elemen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in the field of fashion desig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lothing elements in modern fashion design. Based on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emiotics and design studies, it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and theoretically analyzes the pattern system, structural language, craftsmanship techniques, and color paradigms of traditional clothing, exploring their inherent cultural meanings and aesthetic logic.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this paper combines literature review, case analysis, and design practice, introducing a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of 'symbol translation—form reconstruction—context regeneration' to conduct multi-dimensional redesign explorations of traditional elements. At the same time, considering the contemporary design context, it establishes a design mechanism for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clothing elements into modern fashion by addressing innovations in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adaptation to functional needs,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Keywords: Traditional clothing elements; symbol translation; form reconstruction; modern fashion design; cultural regeneration

四川廉洁文化基因的时空传承与非遗化建构 ——以“琴鹤”意象与赵抃、丁宝桢清官谱系为例

石婷婷，管太兴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摘要：四川廉洁文化资源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基因，其中“琴鹤”意象与赵抃、丁宝桢构成的清官谱系最具典型性。本文从文化基因的时空传承视角出发，考察赵抃“一琴一鹤”意象的形成与经典化过程，梳理丁宝桢对赵抃精神的跨时空承接，揭示四川廉洁文化基因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分析当前廉洁文化资源开发面临的碎片化、同质化问题，提出以非遗化开发为路径，通过技艺类非遗嫁接、表演类非遗赋能、空间叙事重构和数字化活化等策略，实现廉洁文化从物质载体到精神符号、从历史记忆到当代价值的创造性转化。

关键词：琴鹤意象；赵抃；丁宝桢；廉洁文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5年成都市清廉文化研究院自筹课题——从物质载体到精神符号：成都“琴鹤”廉洁文化资源的非遗化开发策略（课题编号：CDQL202522）；2025年四川党风廉政建设与治理研究中心自筹课题——四川清官谱系中的丁宝桢与赵抃：四川廉洁文化基因的跨时空传承研究（课题编号：MY2025ZX214）研究成果。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411

一、研究缘起

（一）研究背景

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强调，要“挖掘历史文献、文化经典、文物古迹中的廉洁思想，整理古圣先贤、清官廉吏的嘉言懿行”。这为地方廉洁文化资源的挖掘与转化提供了政策指引。四川作为历史文化名省，拥有丰富的清官廉吏资源。从北宋“铁面御史”赵抃到晚清“国之宝桢”丁宝桢，从“一琴一鹤”的廉洁符号到“清白江”的地理印记，这些文化资源既是历史的馈赠，也是当代廉洁教育的宝贵财富。本文以“琴鹤”意象与赵抃、丁宝桢清官谱系为中心，考察四川廉洁文化基因的形成与传承机制，探索非遗化开发的可能路径，以期为实现廉洁文化从“入眼”到“入心”的转化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二）核心概念界定

“琴鹤”廉洁文化资源，是指以赵抃“一琴一鹤”入蜀典故为核心形成的物质载体与精神符号系统。物质层面包括古琴、白鹤等器物意象，以及琴鹤堂、琴鹤广场、清白江等纪念性空间；精神层面则指向廉洁、自律、高洁的价值追求。

清官谱系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清官廉吏人物之间形成的文化传承网络。四川清官谱系涵盖从诸葛亮、赵抃到丁宝桢、牛树梅等历代廉吏，他们在人格特质、治理理念、精神追求上存在内在关联。

非遗化开发是指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视角出发，通过生产性保护、活态传承等方式，将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产品和文化体验。

二、“琴鹤”意象的生成与经典化：赵抃入蜀的符号建构

作者简介：石婷婷（1985-），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天府文化；

管太兴（1966-），男，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

（一）赵抃入蜀与“一琴一鹤”的意象起源

北宋仁宗庆历八年至神宗熙宁年间，赵抃四次入蜀，分别在江原（今崇州）、梓州、益州、成都等地任职。这位与包拯齐名的“铁面御史”，其入蜀方式颇具传奇色彩，不携家眷，不带随从，仅以一琴一鹤相伴，匹马入蜀。关于这一典故，苏轼遵旨撰写的《赵清献公神道碑》有明确记载：“上谓曰：‘闻卿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龟自随，为政简易，亦称是耶？’”这段文字记录了宋神宗对赵抃的称赏之语，也首次将“匹马入蜀”“一琴一龟”作为赵抃清廉形象的标志性符号写入官方文献。值得注意的是，早期文献有“琴龟”与“琴鹤”两种表述，沈括《梦溪笔谈》亦记：“赵阅道为成都转运使，出行部内唯携一琴一龟，坐则看龟鼓琴。”

“琴”与“鹤”为何成为赵抃的随身之物？这背后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涵。古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是乐器，更是“正音”的象征，琴乐“正音”寄寓着正统思想和文化理想。赵抃本人深谙琴艺，北宋大儒朱长文所撰中国第一部琴史专著《琴史》将赵抃列入其中，记载其“好琴，其将命于四方，虽家人不以从行，而琴与龟鹤未尝去也”。鹤则性情高雅，形态美丽，素以喙、颈、腿“三长”著称，有“仙风道骨”之态，被称为“一品鸟”，代表优雅、高洁、高尚的品格特征。

（二）从个人行为到文化符号：经典化的多重路径

“一琴一鹤”从赵抃的个人行为上升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命题，经历了漫长的经典化过程，其传播路径主要有三条。

1. 文学书写推动意象凝定

赵抃去世后三年，苏轼作《题李伯时画赵景仁〈琴鹤图〉》二首，其一云：“清献先生无一钱，故应琴鹤是家传。谁知默鼓无弦曲，时向珠宫舞幻仙。”诗中取“琴鹤”意象指代赵氏清廉尚雅的家风，成为“琴鹤家风”一说的文献起点。南宋以后，诗词中引入赵抃入蜀典故者渐多，杨万里“随身琴鹤如清献，治蜀功名更武侯”（《钱赵子直制置阁学侍郎出帅益州》）即为一例。这些送别诗多勉励友人为政得法、清正廉洁，使“琴鹤”逐渐成为官员清廉的代名词。

2. 类书编纂确立固定表述

南宋祝穆编纂《古今事文类聚》时，别集目录中“清廉”条目下设有“一琴一鹤”语。这意味着至迟到南宋，“一琴一鹤”已成为固定成语，被收入类书，供文人写作时引用。明末幼儿童蒙读物《笠翁对韵·下卷·八庚》亦有“三箭三人唐将勇，一琴一鹤赵公清”之句，将赵抃故事传播提前到了孩童时代。

3. 器物纹饰实现日常渗透

元代以后，“一琴一鹤”（或“琴鹤相随”“赵抃入蜀”）成为瓷器、玉器、文房用具上的常见纹饰。磁县博物馆藏一方元代磁州窑长方形白地黑花人物故事枕，枕面绘赵抃抱琴、仙鹤起舞，线条简洁、画面素净。山东博物馆藏元白地黑花“一琴一鹤”长方形枕，画面更为丰富：赵抃执杖前行，束发长髯，衣带飘逸，后随童子抱琴，仙鹤相伴。枕虽是普通生活用具，但将“一琴一鹤”绘于枕上，家庭教育与士风传承便融入了日常居处之中。明末清初的青花笔筒、白玉牌、盖盒等器物上，此题材亦屡见不鲜。

（三）“琴鹤”符号的精神内核：清廉、高洁与家国情怀

“琴鹤”符号之所以能穿越时空、历久弥新，关键在于其承载的深厚精神内涵。赵抃本人以江明志的故事，最能体现这一精神内核。据载，赵抃在青白江上乘舟时，见江水澄碧如素白绸带，不禁感慨：“吾志如此江清白，虽万类混淆其中，不少浊也。”据说青白江（原为“清白江”）之名即由此而来。这“清白”二字，正是赵抃一生的精神写照。

赵抃的清廉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的“轻装入蜀”，更体现在制度层面的刚正不阿。他在蜀地为官时，针对当地官场奢靡之风，上书宋仁宗《乞绝川路州军送遗节酒》，如实汇报“多差衙前急脚子驱送递铺兵士，并役使百姓人夫，往来络绎，提挈劳苦，州县骚动，嗟叹之声，不绝道路”的现状。他倡导“三廉修身”：廉于自身，从自己做起；廉于职务，不利用手中权力谋私利；廉于社会，提倡节俭，反对奢靡。这种从个人到职务再到社会的“三廉”理念，构成了完整的廉洁伦理体系。

三、跨时空的共鸣：丁宝桢对赵抃精神的承接与发扬

（一）晚清廉吏丁宝桢的四川治绩

丁宝桢(1820-1886)，贵州平远(今织金县)人，晚清洋务运动重要成员，官至四川总督。光绪二年(1876年)，57岁的丁宝桢升任四川总督，督川十年，直到在任上病故。

丁宝桢治蜀，以“严劾贪墨吏，澄肃官方”为突破口。他到任之后，发现咸丰年间因战事需要设立的夫马局，在战事平息后仍以各种名目征派费用，中饱私囊，导致百姓负担加重。丁宝桢果断奏请裁撤夫马局，“裁夫马以恤民，革陋规以恤吏”。在兴利方面，丁宝桢大力兴办洋务，从欧洲购买机器设备，创办四川机器局，使之成为四川近代工业的发端。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四川机器局制造的军械装备五营军旅，奔赴抗法前线。此外，他还大力整治都江堰水利工程，至今都江堰仍矗立着丁宝桢的雕像。

(二) 精神谱系的连续性：人格、事功与家风

赵抃与丁宝桢虽相隔近八百年，但在人格特质、治理理念和家风传承上呈现出惊人的连续性。

1. 人格特质：刚正不阿与清廉自守

赵抃因弹劾宰相陈执中纵容嬖妾杀人而闻名朝野，时称“铁面御史”。丁宝桢则因诛杀骄纵不法的大太监安德海而轰动天下。1869年，慈禧太后宠幸的太监安德海出京南下采办，一路张扬招纳权贿，无人敢触之。至山东泰安时，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以太监出都门违犯清朝祖制为由将其拿获，押至济南正法。这一举动，与赵抃弹劾权贵的胆魄如出一辙。

2. 治理理念：务实为民与勇于任事

赵抃治蜀，以惠民为本，开渠兴修水利，严惩坑害百姓的衙役，百姓呼之为“赵青天”。丁宝桢治蜀，裁撤夫马局以减轻百姓负担，整治都江堰以兴修水利，兴办机器局以自强求富。丁宝桢生活在中国历史发生大变局的时代，他以开放的眼光看待世界形势，痛斥“墨守纲常”的人，认为中国要自强，必须学习西方。

3. 家风传承：清廉报国与诗书传家

赵抃的家风，苏轼以“琴鹤是家传”概括。丁宝桢的家风则体现于先辈丁公俊留下的家规：“人非圣贤无高下，世代忠良不可差。读书耕田不误时，精忠报国品自嘉。廉洁奉公身高洁，尊老爱幼在天涯。一旦蒙恩受命时，不负朝廷不负家！”丁宝桢在家书中教育长子丁体常：“不可妄取民间一钱”“尔当于‘利’之一字，斩断根株，立意做一清白官，而后人则受无穷之福”。这种对“清白”的执着追求，与赵抃“吾志如此江清白”的誓言遥相呼应。

(三) 跨时空传承的文化机制

赵抃与丁宝桢精神的跨时空传承，有赖于多种文化机制的共同作用。

1. 祠祀与遗迹的空间叙事

在四川，纪念赵抃的琴鹤堂、琴鹤广场、琴鹤大桥等遍布崇州等地。纪念丁宝桢的遗迹则以都江堰雕像、四川机器局旧址为主。这些物质遗存构成廉洁文化的“记忆之场”，使后人得以在空间中感知历史。

2. 方志与官史的文本记录

《宋史》对赵抃事迹的记载，《清史稿》对丁宝桢的记述，地方志中关于两人的大量材料，构成廉洁文化传承的文献基础。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清心直道——历代廉政故事录》，将赵抃与丁宝桢并置其中，彰显了二人作为四川清官谱系代表人物的地位。

3. 民间叙事的活态传承

赵抃“一琴一鹤”的故事在四川民间广为流传，成为清官文化的集体记忆。丁宝桢与“官保鸡丁”的传说，更是将廉洁主题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结，这道家常菜因丁宝桢有功被追赠“太子太保”而得名，而丁宝桢本人“穿得最多的是布衣和已褪色的官服，吃得最多的就是家常菜”。

四、从历史资源到活态传承：非遗化开发的路径探索

(一) 当前廉洁文化资源开发的问题诊断

当前，四川对“琴鹤”廉洁文化资源的开发存在三方面问题。第一，碎片化。赵抃与丁宝桢的遗迹散布于成都、崇州、都江堰等地，缺乏系统性串联；“琴鹤”意象与清官人物之间缺乏谱系整合，难以形成完整的文化

叙事。第二，同质化。多数廉洁教育基地以静态陈列、图文展示为主，形式单一，缺乏互动性与体验感。参观者“看展板、听讲解”，难以产生情感共鸣。第三，边缘化。“琴鹤”廉洁文化资源尚未纳入非遗保护体系，缺乏活态传承的机制保障。古琴艺术虽为联合国非遗项目，但与赵抃“琴鹤”意象的结合尚处于空白状态。

（二）非遗视角下的资源重构

非遗化开发的核心在于将静态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活态的文化实践。具体路径有四方面。

1. 技艺类非遗嫁接

将“琴鹤”意象与四川传统非遗技艺相结合。古琴艺术（蜀派古琴）本身就是国家级非遗项目，赵抃作为历史上将蜀派古琴经典名曲《流水》以曲谱形式记载下来的第一人，为古琴与廉洁文化的结合提供了历史依据。可开发“琴鹤”主题的古琴文创产品，举办“琴鹤清风”古琴雅集，让参与者在琴音中感悟“清心直道”。蜀锦、竹编、剪纸等四川传统美术亦可融入“琴鹤”元素。可设计“琴鹤”纹样的蜀锦工艺品、竹编摆件、剪纸作品，将廉洁符号植入日常生活。

2. 表演类非遗赋能

利用川剧、四川清音、金钱板等传统曲艺形式，创编赵抃、丁宝桢的新编历史剧目。川剧高腔《铁面御史》可展现赵抃弹劾权贵的胆魄，四川清音《丁宝桢》可演绎其诛杀安德海、整治都江堰的故事。自贡市纪委监委将廉洁元素融入自贡灯会这一国家级非遗项目，设立华夏家风馆，通过现代技术将书画、图片、故事融于一体，取得了良好效果，这一经验值得借鉴。

3. 空间叙事与线路开发

打造“琴鹤清风”廉洁文化主题游径，串联崇州琴鹤堂、琴鹤广场，都江堰丁宝桢雕像、四川机器局旧址等节点。在每个节点设置非遗体验点，变“看展板”为“听琴音、折纸鹤、学技艺”。崇州市在风景如画的滨江路修建“琴鹤广场”，塑赵抃手牵白马、琴鹤相随的雕像，将全长880米的桥梁命名为“琴鹤大桥”。这种空间命名的策略，使廉洁文化融入城市肌理。

4. 数字化活化与传播

数字化技术为廉洁文化的活态传承提供了全新可能。可系统整合赵抃、丁宝桢等清官廉吏的文献史料、遗迹遗存、民间传说及研究成果，构建集知识图谱、时空地图、数字展陈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设置“清官人物志”“遗迹时空图”“廉吏家训录”“琴鹤文化廊”等板块，以图文、音视频、三维建模等形式全方位呈现四川廉洁文化基因。在沉浸式体验方面，可利用AR/VR技术还原关键历史场景，通过VR技术再现赵抃“一琴一鹤”匹马入蜀的经典画面，让体验者“穿越”至北宋时期，亲身感受清官轻装简从、不扰民力的清廉作风；通过AR技术叠加历史与现实，在都江堰景区扫描特定点位，即可看到丁宝桢指挥治水、与工匠商议修缮方案的动态场景，直观感受其务实为民的实干精神。

（三）从物质载体到精神符号的转化逻辑

非遗化开发的核心逻辑，是实现廉洁文化从物质载体到精神符号的创造性转化。

1. 物质载体的活化

“琴”不再仅是博物馆中的文物，而是可弹奏、可体验的乐器；“鹤”不再仅是图画中的意象，而是可折纸、可刺绣的工艺品。通过非遗技艺的介入，历史符号转化为可参与、可消费的文化产品。

2. 精神符号的内化

当参与者在“琴鹤”工坊亲手制作一件蜀锦作品、聆听一曲古琴雅集时，赵抃“清白”的精神、丁宝桢“报国”的情怀便不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具身的体验。这种体验式、浸润式的廉洁教育，远比单纯的说教更为有效。

3. 廉洁文化的当代转化

赵抃的“三廉修身”——廉于自身、廉于职务、廉于社会，与当代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要求高度契合。丁宝桢“穷而益坚，分毫不为外物所摇夺”的操守观，对于当前反腐败斗争仍具有镜鉴意义。通过非遗化开发，这些传统智慧得以转化为当代廉洁教育的鲜活资源。

五、结语

从赵抃“一琴一鹤”匹马入蜀，到丁宝桢“清正许国”督川十年，四川廉洁文化基因穿越近千年时空，在“琴鹤”意象与清官谱系中积淀、传承、发展。这一文化基因的核心是“清白”二字——清白做人、清廉为官、清明理政。在新时代背景下，挖掘这一文化基因的当代价值，关键在于实现从“历史遗产”到“文化资本”的转化。让尘封的历史人物重新站立，让冰冷的物质载体焕发生机，让抽象的廉洁理念可感可触，这正是非遗化开发的意义所在。当“琴鹤”不再是博物馆中的遥远记忆，而成为可弹奏的琴音、可触摸的纹样、可体验的游径，四川廉洁文化基因便真正实现了从“物”到“魂”的升华。

参考文献：

- [1]四川辞书出版社.清心直道：历代廉政故事录[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9.
- [2]于晓川.“一琴一鹤”的经典化传播[N].光明日报, 2025-09-01(13).
- [3]卢炳忠, 封金剑.丁宝桢：清廉报国传后世[N].中国纪检监察报, 2025-01-03(7).
- [4]叶美峰.“一琴一鹤”说赵抃[N]. 人民政协报, 2024-05-09(11).
- [5]易旭东.成都“老市长”赵抃⑦：“三廉修身”惠政蜀都[EB/OL]. 四川省情网, 2021-01-07.
- [6]史志崇州.志说廉洁 | 崇州地名中的“琴鹤”与谁有关? [EB/OL]. 微信公众平台, 2024-05-31.

Spatiotemporal Inheritance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Based Construction of Sichuan's Integrity Culture Genes: A Case Study of the “Qinhe” Imagery and the Genealogy of Incorruptible Officials Zhao Bian and Ding

Baozhen

Shi Tingting, Guan Taixing

Chengdu Agricultural College, Chengdu, Sichuan, China

Abstract: Sichuan's integrity culture resources contain rich historical genes, among which the “qinhe” (lute and crane) imagery and the lineage of incorruptible officials represented by Zhao Bian and Ding Baozhen are the most typic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otemporal inheritance of cultural gen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formation and canonization process of Zhao Bian's imagery of “one lute and one crane,” sorts out Ding Baozhen's spatiotemporal continuation of Zhao Bian's spirit, and reveals the internal logic of Sichuan's integrity culture genes. On this basis, it analy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fragmentation and homogeniz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ity culture resources, and proposes a path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based development. Through strategies such as the integration of craft-base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mpowerment by perform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construction of spatial narratives, and digital activation, it aims to achiev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integrity culture from material carrier to spiritual symbol, and from historical memory to contemporary value.

Keywords: Qinhe Imagery; Zhao Bian; Ding Baozhen; Integrity Culture

浅析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女性服装变革

张宇璇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58)

摘 要: 英国工业革命, 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重要篇章, 标志着技术与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生产技术的进步引起了时尚与着装风格上的一场革命性的变革。这一时期, 随着生产力的飞速提升和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 女性服装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转变, 从奢华繁琐逐渐走向简约实用, 工业革命时期女性服装变革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它不仅改变了女性的着装风格, 更深刻地影响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与自我意识。女性逐渐摆脱了社会传统观念的束缚, 走上了各个工作岗位, 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与独立。这一变革不仅改变了女性的着装风格, 更深刻地影响了女性的生活与命运, 为后来的社会发展与进步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关键词: 英国工业革命; 女性; 服装; 服装变革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413

18 世纪中期到 19 世纪中期英国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一时期, 机器生产逐渐取代手工劳动, 纺织业是机器生产的先锋, 飞梭、珍妮纺纱机、水力织布机等机器的发明和应用, 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降低了生产成本。生产技术的革新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 不同纺织材料的出现和服装生产工艺的进步为该时期的民众提供了更多的着装选择。而大机器生产带来的工厂制度, 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女性逐渐从家庭中解放出来, 走向了各个工作岗位, 促进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抛弃从前繁琐、束缚的服装, 转而选择更加轻便、舒适、适合生产工作的服装, 掀起了一场女性服装变革。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 国内对英国服饰文化的研究

英国服饰作为欧洲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演变历程不仅反映了社会变革、经济发展, 也深刻体现了不同群体的地位、审美观念及文化认同的变化。近年来, 国内学者对英国服饰的研究逐渐增多。

国内学者对于服饰在英国时代所反映出的时代内涵的研究主题多样。其中, 与消费观念相关的比如, 王洪斌的《18 世纪英国服饰消费与社会变迁》^②从服饰消费状况视角看 19 世纪英国的社会变迁相, 他指出: 服饰消费的变化是社会变迁的一个具体体现, 并且其演变深深植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之中并成为推动英国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与政治相关的比如, 谭赛花的《从服饰看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奢俭观的冲突》^③, 文章从 17-18 世纪英国的抑奢观念角度展开, 论述了英国贵族男子以简朴装树立远离奢侈品的道德模范形象, 为其排斥王室而统治英国增添合法性和正统性。后来贵族的这种策略后来被中间阶层吸收和改造, 简约服饰成为他们抨击贵族统治和要求参与政权的有力武器。此外, 在女性着装与妇女解放的关系方面, 如李雨婷的《浅析一战时期女装男性化的变革意义》^④一文深入探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女装向男性化风格转变的重要意义, 指出在这一时期, 英国女性涉足传统上属于男性的工作领域乃至战场, 服装风格也随之发生了相应变化, 女装男性化趋势因此成为一种必然现象。

作者简介: 张宇璇 (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英国史。

^②王洪斌:《18 世纪英国服饰消费与社会变迁》,《世界历史》,2016 年第 6 期。

^③谭赛花:《16-18 世纪英国的服饰与社会变迁》,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09,第 25 页。

^④李雨婷:《一战时期女装男性化的变革意义》,《纺织经济》,2011 年第 8 期。

（二）国外对英国服饰文化的研究

在对工业革命前后英国服装业的发展研究中，纺织技术的进步和时尚观念的转变成为众多学者讨论的核心。约翰·斯泰尔斯(John Styles)在《时尚、纺织与工业革命的起源》(Fashion, Textiles and the Origins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①中指出，通过考察早期现代纱线和织物的纤维含量及其与市场的关系，从纺织业的视角看英国工业革命的起源。黛安娜·克莱恩(Diana Crane)的《时尚及其社会议程》(Fashion and its Social Agendas)^②则强调，19世纪工业社会中，阶级与性别等因素为时尚构建了基本框架。

而关于英国女性的着装与女性社会地位变化方面，艾米·凯蒂亚·墨菲(Amy Ketia Murphy)在《她的收入算术：1660-1750年伦敦时尚和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The Arithmetic of Her Revenues: Changes in Fashion and Women's Social Status in London, 1660-1750)^③一书中提到，整个1660年至1750年期间，服饰风貌发生了显著变化，“更多样化的服装成为了必需品，而非仅仅是奢侈品”。这些变化对英格兰女性的社会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工业革命对英国服装纺织业的影响

（一）生产方式的变革

17世纪之前，商品的生产活动主要局限于个体工人的小规模家庭作坊之中。货物的分配与流通则依赖于服装商贩，他们通常驾驶着装载货物的驮马队，穿梭于各个村落与城市之间，构建起早期的商品交换^④。这些商品中，既有供当地居民日常穿着的衣物，也包括销往他国的本国特产，体现了早期市场经济的萌芽状态。而这一时期的服装生产多为自给自足和对外贸易相结合的模式，亚麻、羊毛及亚麻混纺布料等材料占据重要地位^⑤。

进入18世纪初期，随着工匠们对提升生产效率的探索，一系列创新方法应运而生，工业化逐渐起步。在此期间，棉花作为一种新兴纺织原料，凭借其产量高、适应性强的特点，逐渐取代了丝绸、羊毛等传统材料，成为纺织工业的核心。这一变化不仅深刻影响了纺织品的种类与结构，也预示着大规模生产时代的到来。

18世纪下半叶，英国经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从以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向以机器驱动为核心的工业社会转型。这一转变首先体现在纺织工业的机械化上——珍妮纺纱机、水力织布机等创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与此同时，炼铁技术的突破与煤炭精炼能力的提升，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能源基础。交通网络的逐渐完整也促进了贸易的扩张与市场的整合，使得商品能够更高效地流通至全国乃至全球各地。在此背景下，纺织工厂应运而生，劳动力从低效的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投入到高效率的城市工业生产中，促进了纺织业生产力的飞跃，也深刻改变了社会结构与人们的生活方式，标志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

（二）新织物的问世

1700年之前，欧洲的传统纺织业以亚麻和羊毛为原材料。床单和内衣用亚麻制成，外衣则用羊毛^⑥。由于棉花在西欧无法种植，因此在当时棉花是一种昂贵的外来材料。中世纪后期，丝绸和棉花在引入西欧，其制造和消费在近代早期大幅扩张。从这一时期开始，织物逐渐由羊毛和亚麻转向羊毛、亚麻、丝绸和棉花等相结合的模式，服装材料也向更轻、更色彩丰富和更有图案的织物转变。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有四种典型织物的流行：

首先是“棉天鹅绒”。在中世纪时期，天鹅绒作为一种昂贵织物主要来自意大利威尼斯和阿拉伯国家，是一种富裕和地位的象征。工业革命时期，英帝国通过海外殖民打通了棉花进口道路，丰富的棉花来源和先进的纺

^①J. Styles, "Fashion, Textiles and the Origins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East Asian Journal of British History*, Vol.5, 2016, pp161-190.

^②Diana Crane, *Fashion and its Social Agendas: Class, Gender, and Identity in Clothing*,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③Amy Ketia Murphy, *The Arithmetic of Her Revenues: Changes in Fashion and Women's Social Status in London, 1660 - 1750*, Starkville: Mississippi State University, 2002.

^④J. Styles, "Re-fashioning Industrial Revolution. Fibers, Fashion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in British Cotton Textiles, 1600-1780," *Fashion as an Economic Engine: Process and Product Innovation, Commercial Strategies, Consumer Behavior*, Giampiero Nigro, Florence: Firenze University Press, 2022.

^⑤马瑞映、杨松：《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棉纺织产业的体系化创新》，《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

^⑥J. Styles, "Fashion, Textiles and the Origins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East Asian Journal of British History*, Vol.5, 2016, pp161-190.

织技术催生了天鹅绒平价替代品——棉天鹅绒^①。自其问世后，因其因其光泽、柔软、质地丝滑但价格较从前低廉而备受喜爱，被制成华丽的舞会礼服、美丽的西装和特殊场合的服装。

其次是“平纹细布”。“平纹细布”包括一系列昂贵的、精细纺制的全棉纺织品，主要是素色的，也有刺绣或有织机图案的。它们起源于印度，17世纪下半叶由东印度公司大量进口。英国手工纺纱无法以可被市场接受的价格生产出与印度平纹细布相匹配的纱线。18世纪中叶，印度平纹细布在英国价格昂贵且进口关税高，但仍被广泛追捧，尤其是作为围裙和手帕等配饰^②。18世纪中叶平纹细布引起了用干净、白色平纹细布进行装饰的新时尚趋势，这是当时民众对一种更简单、朴素的着装方式的追求。

最后是印花布。自17世纪初以来，东印度公司将印花棉运往英国，然而，受限于本土设计能力的不足，英国人不得不委托制作具有比传统印度风格更为简约的特定图案，并将其带回英国。进入18世纪，印花布印刷技术迅速风靡，瑞士、德国乃至英国本土相继开设新的版画厂，其中法国以其精湛的艺术图案与工艺脱颖而出，其设计在欧洲范围内被广泛复制与流传^③。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印刷技术实现了机械化革新，圆筒或滚筒印刷技术的开发，通过雕刻辊的应用，实现了单次印刷多达六种不同颜色的能力，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纺织品印刷技术的兴起，不仅进一步加速了生产流程，还极大地促进了服装的个性化，使得纺织品印花技术和服装设计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三）消费观念的转变

英国工业革命这一历史性的转折时期，人类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其中人们时尚面料（如前文提到印花布、天鹅绒等）消费需求激增现象的背后反映出时代变革对民众消费观念的影响。

首先，在工业革命之前，人们的消费观念主要基于实用性，即重视物品的使用价值和耐用性。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工业化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和财富积累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有能力追求时尚和品质生活。社会阶层的分化则导致了消费观念的多元化，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有不同的消费需求和消费习惯，这种多元化促进了市场的细分和产品的多样化。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对时尚的追求也开始成为消费观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转变在服装领域体现为：人们开始更加注重服装的款式、设计和颜色，而不仅仅是其实用性。这种对时尚的追求不仅推动了时尚面料需求的增长，还促进了纺织业的技术创新，使得面料的生产更加多样化、个性化^④。

三、女性着装的变化

（一）工业革命前女性的着装

近代早期英国女性服饰的特点丰富多彩，深受当时社会背景、文化潮流以及审美观念的影响。这一时期，贵族阶层引领时尚的潮流，女性服饰体现了贵族阶层对展示奢华与地位的需要。

在都铎时期，英国女性服饰受到欧洲大陆宫廷服饰的深刻影响，呈现出一种奢华而精致的风格。贵族女性常穿着紧身上衣、裤袜和披风，这些服饰通过切口、填充物、镶嵌珠宝、花纹系带等手法进行装饰，展现出一种低调而华丽的奢华感^⑤。同时，“拉夫领”作为这一时期贵族女装的特色之一，以白色或染成浅色的细亚麻布制成，经过熨烫后形成挺括的领型，进一步增添了服饰的优雅与庄重^⑥。

进入17世纪，随着洛可可风格的兴起，英国女性服饰开始追求更加柔软、轻盈的面料和更加细腻、精巧的装饰。洛可可女装以追求服装面料的质地柔软、花纹图案小巧、色彩明快淡雅和浓重柔和相并进为特点，营造出一种优雅而浪漫的氛围，也体现出服装的华丽与精致^⑦。

^①A. Godle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lothing Industry: Technology and Fashion", *Textile History*, Vol.28, 1997, pp3-10.

^②马瑞映、杨松：《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棉纺织产业的体系化创新》，《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

^③J. Styles, "Re-fashioning Industrial Revolution. Fibers, Fashion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in British Cotton Textiles, 1600-1780," *Fashion as an Economic Engine: Process and Product Innovation, Commercial Strategies, Consumer Behavior*, Giampiero Nigro, Florence: Firenze University Press, 2022.

^④E. Robinson, "Eighteenth-century Commerce and Fashion: Matthew Boulton's Marketing Techniques,"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16, No.1, 1963, pp.39-60.

^⑤R. Worth, *Fashion and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20.

^⑥A. Bolton and *Anglo Mania, Tradition and Transgression in British Fashion*,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6.

^⑦谭赛花：《16-18世纪英国的服饰与社会变迁》，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09，第25页。

（二）工业革命后女性的着装

工业革命开始后，棉花的流行改变了服装业和时尚。棉织物比羊毛或亚麻更舒适、透气、更容易染色。棉质服装成为所有社会阶层的人们的日常服装。随着新面料的发展，风格也发生了变化。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化学纤维和人造丝等新型材料的出现，使得服饰的制作成本降低，色彩更为丰富，质地也更加结实挺括。这促进了女性服饰的进一步变革

在 18 世纪初期，随着英国经济的繁荣和社会风气的变化，女性服饰开始呈现出一种更加自然、简约的风格。这一时期的女性服饰不再过分追求奢华和繁复的装饰，而是更加注重面料的质地和剪裁的合身性。例如，这一时期女性服饰摒弃了沉重的鲸骨撑裙和骨衬紧身内衣，转而采用轻便的白色布料和超高腰设计，使服饰更加舒适、自然^①。

到了 19 世纪末，众多白领女性在职场上与男性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她们不断提升自我能力，同时在外观上，也渴望摆脱虚弱形象，展现出如同男性般的精明与干练。在此背景下，一部分中产阶级女性认为，要从外貌上着手，方能赢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因此，她们的审美观念逐渐偏向于男性化。例如，灯笼裤的普及。这种裤子将东方风格的阿拉伯式宽松裤子引入女装，为女装的进一步革新指明了方向，即摆脱夸张裙撑的束缚，给女性以更多的行动自由^②。妇女解放运动挑战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并推动了更实用、更舒适的服装。女式裤子、更短的下摆和更宽松的廓形的推出反映了女性在工业革命后社会角色的转变。这一时期由于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劳动力市场，需要实用而时尚的服装选择，因此女性工作服也相继出现。此外，时尚杂志的兴起为女性提供了最新款式的指导，进一步影响了她们对服装的选择。

四、服装变革背后的女性解放

19 世纪后期，随着商品的扩张和中产阶级的增长，服装改革运动作为摆脱限制女性活动自由和舒适差的服装的“反击”而出现。服装改革运动主要由中产阶级女性领导，她们提出、设计和穿着比当时社会普遍流行的服装更时尚、更实用、更舒适的服装。该运动倡导更实用、更舒适的服装，这将使女性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并促进她们的身体健康。一方面，该运动是由女权主义理想和挑战决定女性着装的社会和文化规范的愿望推动的，参与该运动的女性认为，当时的限制性服装，包括紧身胸衣、箍裙、和厚重的层层织物，象征着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并成为她们参与公共生活的物理障碍。与此同时，服装改革运动也与当时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趋势息息相关，如中产阶级的崛起。服装革命的倡导者认为，实用舒适的服装将使女性能够更充分地参与社会活动，并过上更健康、更积极的生活。服装改革者们在鼓励为女性提供更实用和健康的服装的同时也与女权主义者一道为女性争取更多权利而努力。例如，19 世纪妇女选举权运动在促进妇女权利和更大的性别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未来解决女性时尚的限制性、生殖权利、对妇女的暴力和工作歧视等问题铺平了道路。妇女选举权运动在服装改革运动倡导的时尚变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五、结语

在英国工业革命这一场科技与社会的巨大变革中，女性着装的变革不仅是时尚领域的革命，更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女性服装从奢华繁琐到简约实用，不仅反映出生产技术的进步和消费观念的变化，更体现了女性社会角色的转变与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服装的变革也为后来的女性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 [1] A. Bolton and Anglo Mania, *Tradition and Transgression in British Fashion*,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6.

^①王洪斌：《18 世纪英国服饰消费与社会变迁》，《世界历史》，2016 年第 6 期。

^②C. W. Smith, "Dress of the People: Everyday Fash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 Scriblerian and the Kit-Cats*, Vol. 42/43, Iss. 2/1(Spring 2010), pp.93-94.

- [2] Diana Crane, *Fashion and its Social Agendas: Class, Gender, and Identity in Clothing*,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 [3] A. Godle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lothing Industry: Technology and Fashion", *Textile History*, Vol.28, 1997, pp3-10.
- [4] Amy Ketia Murphy, *The Arithmetick of Her Revenues: Changes in Fashion and Women's Social Status in London, 1660 – 1750*, Starkville: Mississippi State University, 2002.
- [5] E. Robinson, "Eighteenth-century Commerce and Fashion: Matthew Boulton's Marketing Techniques,"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16, No.1, 1963, pp.39-60.
- [6] C. W. Smith, "Dress of the People: Everyday Fash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 Scriblerian and the Kit-Cats*, Vol. 42/43, Iss. 2/1(Spring 2010), pp.93-94.
- [7] J. Styles, "Fashion, Textiles and the Origins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East Asian Journal of British History*, Vol.5, 2016, pp161-190.
- [8] J. Styles, "Re-fashioning Industrial Revolution. Fibers, Fashion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in British Cotton Textiles, 1600-1780," *Fashion as an Economic Engine: Process and Product Innovation, Commercial Strategies, Consumer Behavior*, Giampiero Nigro, Florence: Firenze University Press, 2022.
- [9] R. Worth, *Fashion and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20.
- [10] 方逸韬,杨德才:《打开“技术黑箱”:技术进化视阈下近代中英棉纺织业的发展差异》,《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0卷第5期,第81页。
- [11] 李雨婷:《一战时期女装男性化的变革意义》,《纺织经济》,2011年第8期。
- [12] 马瑞映,杨松:《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棉纺织产业的体系化创新》,《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
- [13] 谭赛花:《16-18世纪英国的服饰与社会变迁》,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09,第25页。
- [14] 王洪斌:《18世纪英国服饰消费与社会变迁》,《世界历史》,2016年第6期。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in Women's Clothing Brought about b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Britain

Zhang Yuxu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a significant chapter in human history, marked a tremendous transformation in technology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advancement in production technology brought about a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fashion and dress style. During this period, with the rapid increase in productivity and profound adjustment of social structure, women's clothing underwent an unprecedented transformation, gradually shifting from luxurious and elaborate to simple and practical. The impact of the clothing revolution for women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as profound and long-lasting. It not only changed women's dress style but also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ir social status and self-awareness. Women gradually broke free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traditional social concepts, entered various job positions, and gained more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This transformation not only changed women's dress style but also profoundly affected their lives and destinies, laying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subsequent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Keywords: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Women; Clothing; Clothing Revolution.

大白兔品牌文化的塑造与传播研究

张佳丽

(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随着时代进步和新事物的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年轻品牌应运而生,致使一些历史悠久的品牌面临着诸多挑战,但有一些老字号品牌的发展却能历久弥新。作为中国民间传统品牌的大白兔,寄托了无数中国人的童年回忆。本文将从大白兔品牌的背景进行介绍,再对其品牌文化的塑造方式及传播策略分别进行论述,以此对其发展历程进行深入学习分析。

关键词: 大白兔奶糖; 品牌文化; 品牌塑造; 品牌传播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415

大白兔品牌文化的核心在于其文化的内涵,具体而言是其包含的深刻的价值内涵与情感形成的外延,六十年的发展经历了诸多风雨坎坷,它收获了众多忠实的消费者。身为上海老字号品牌,大白兔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从当代新生品牌力量的发展角度看,大白兔的品牌发展历程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一、研究对象分析

(一) 品牌背景

大白兔品牌起源于195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10周年,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该品牌隶属于冠生园——一家成立于1918年的中国民族工业老字号企业。在冠生园众多品牌中,“大白兔”最具盛名,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的重要代表符号。多年来,大白兔多次作为上海的文化名片走向全国乃至世界,成为游客到沪时不可或缺的特产之一,深受外地游客喜爱,常被选购作为馈赠亲友的佳品。

(二) 品牌发展历程

大白兔品牌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覆盖全年龄段消费者的产品体系。从适合儿童食用的大白兔奶糖,到受到中青年青睐的各类衍生用品,再到老年人因其承载的童年记忆而成为忠实粉丝,大白兔在不同代际消费者之间建立了广泛的情感联结。其发展历程体现了品牌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持续探索,也反映出其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保持生命力的能力。

二、品牌塑造方式

(一) 加强品牌管理

大白兔有着系统化的品牌管理。最早是在2002-2007年,它将产品线进行了延伸,生产出诸多产品,有大白兔鲜乳糖、牛乳糖、天山话梅糖,原味、巧克力、薄荷、酸奶、玉米味奶糖,可谓品类众多,大白兔奶糖为适应文化市场发展的新需求,在传统牛奶口味的基础上推出了话梅、芥末、咖啡等全新口味^[1]。2007-2012年间,大白兔将品牌延伸至副品牌加多品类的形式,它旗下产品有晶彩奶糖、Q果软糖、棒棒糖等诸多系列,2012年之后,大白兔进行了品牌核心资产的战略调整,平衡兼顾到“经典传统”与“创新变化”两大品牌形象的基本要素。由此可见大白兔对品牌管理的重视程度之大。

(二) 重视品牌定位

大白兔品牌注重产品定位。它将老字号品牌与新国潮相结合,相继推出了系列冰淇淋、奶茶、香水、抱枕等产品,使广大消费者对传统的老字号品牌有了全新的认识。大白兔也将品牌定位放长远,进军日常生活用品以及快闪潮流产品领域,选择与一些品牌合作共同推出联名产品。品牌间的合作联名不单是销售产品带来的利益,还有企业良好形象和企业口碑,更重要的是联名合作所激起的社会精神层面的共鸣和价值^[2]。其中较为著名的是大

作者简介: 张佳丽(2000—),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与数字艺术设计。

白兔的“气味图书馆”香水，它采用蓝色为主色调，红白颜色作为点缀，配色清新简约又大方。瓶身造型设计以方形为主便于手持，正面中心部位有大白兔的品牌标志，使得整款产品具有代表性。宣传海报色调和谐，创意新颖，激发消费者购买欲望。

（三）优化形象设计

大白兔品牌在近年来开始重视品牌的优化设计。大白兔的品牌形象经历了几代完善发展，最开始的经典品牌形象是由上海人王纯言先生设计的，最初他为了同“崇洋媚外”的米老鼠区分开来，特此设计出了大白兔的形象。正是因为他的不懈坚持，才有了流传后世的经典大白兔形象。王纯言先生有“冠生园第一艺术设计师”之称，他设计的形象名为《白兔》，标志主视觉为一只灵动活泼的大白兔，生动的大白兔商标也以富有生命力、亲切可爱、与乳白色奶糖如出一辙的形象深入消费者内心^[3]。后方以鲜艳的红色蘑菇作为映衬，红黄色彩对比鲜明，下方标有“大白兔”的黑色中英文字体，整体形象完整，给人别具一格的新意。

（四）质量把控与公关

大白兔在自己的品质发展之路上也并非一帆风顺。它曾因为 2007 年甲醛事件和 2008 年三聚氰胺事件产生的负面影响使销售量大跌，国内外的许多新闻媒体都为此做过报道，大白兔奶糖的食品安全也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质疑。但它并没有一蹶不振，在突遇“甲醛门”事件后，冠生园公司积极应对^[4]，凭借出色的公关团队成功解围。它的成功之处主要体现在：1、抓住最佳时机，及时开展危机公关。在风波发生之后并未消极对待而是选择积极回应 2、寻求权威机构，迅速消除疑虑。公司进行了多方机构严格的质量检测，发现结果均未查出甲醛超标的情况，因此得以全身而退。同时大白兔品牌也重视社会公众、做好公关与广告宣传，重新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信任。

三、品牌传播策略

（一）品牌传播模式及过程的演变

根据了解、调查，这里总结长期以来形成的固定的品牌宣传模式，以表格的形式简洁清晰地整理出品牌传播的具体内容。（表 1）

表 1 品牌传播的具体内容

CI 发展	视觉系统识别阶段 (VI)			公司文化识别阶段 (MI)		品牌资产识别阶段 (BI)	
传播观念	USP	企业识别	品牌形象	定位	品牌个性	整合传播	品牌识别和品牌关系
产生时间	50 年代	50 年代	60 年代	70 年代	80 年代	90 年代	90 年代-现在
效果依据	实证支持	视觉差异	形象差异	心智位置	性格魅力	统一感受	价值意义
沟通基点	产品	企业	品牌	产品、品牌	品牌	品牌	品牌
传播手段	广告	各种媒体	广告	名称、广告	广告	各种工具	各种工具
构成元素	标志	标志	形象	形象	个性	价值	识别、关系

由此可见，大白兔品牌遵循了这个客观发展规律，积极运用各种有效力量进行自己的品牌传播，主要通过新闻、媒体、消费者等角度全方位地进行传播，从而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

（二）提升品牌知名度的方法

大白兔提升自我品牌知名度的方式可谓多种多样。例如在各大媒体广告平台不断重复品牌信息，在销售过程中利用联想记忆增强购买者的印象，宣传的信息点简单明了但具有辨识度等等。这里认为记忆有效的品牌信息也是大白兔品牌所重视的内容所在例如关注消费者对糖果零食的需求、使用明星效应为品牌提升知名度，如众所周知的“国民女神”赵薇。以下是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提高品牌知名度的方法进行的深入分析与点评。

1、传统广播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收音机是每家每户收听新闻广告的重要方式，大白兔早期通过广播使听众可以接收到最大程度精简的核心产品信息，但广播时效短，过后内容容易被遗忘，给听众留下的印象有待加深。

2、电视广告

通过电视节目进行宣传，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电视媒体的受众面较广，各个年龄层面、不同职业的人群都能方便地接收到最新信息，此外电视节目传递的信息量较大，可以使消费者更全面地了解到大白兔这个品牌的信息。

3、融媒体

通过近些年迅速发展起来的融媒体进行宣传，适应当代社会不同年龄段人群对信息接收的选择方式。通过现代新媒体平台的宣传，大白兔品牌已经开拓了自己的海外市场，以此来提升自己的品牌影响力。

4、杂志报纸

通过报纸，介绍大白兔品牌的文章较为详细地以文字形式呈现出来，能够保证数据的准确性，纸质信息便于保存。但由于近些年数字技术的发展，报纸的受众数量大大减少，因此存在普及范围不广的问题。

5、宣传海报

设计有代表性的海报，是进行品牌特色宣传的重要方式之一，富有创意的海报会引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从

而增加大白兔品牌产品的销量。近些年大白兔品牌的宣传海报可谓推陈出新,各具特色,为宣传品牌文化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三) 品牌传播效果与受众反馈

品牌传播的有效性不仅体现于传播渠道的多元与内容的创新,更在于其在受众群体中产生的实际认知、情感与行为层面的影响。大白兔近年来在跨界联名、快闪活动、新媒体营销等方面的传播实践,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与消费者讨论,形成了较为显著的传播效果。

1. 传播效果分析

通过与“气味图书馆”联名推出香水以及在全国多地开设快闪店等方式,大白兔成功吸引了年轻消费群体的关注。提升了品牌的认知度。传统认知中,大白兔常被定位为“童年记忆”的怀旧符号,而近年来的跨界传播使其逐步向“时尚国货”的形象延伸。消费者对大白兔的认知从单一零食品牌扩展至涵盖生活方式、潮流文化的综合性品牌,品牌形象实现了从“过去”到“当下”的有效跨越,实现了品牌形象实现年轻化转型。大白兔的传播内容普遍强调“童年”“温情”“国货情怀”等情感元素,与消费者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纽带,形成了跨代际的情感共鸣,也使情感联结得以强化与延伸。

2. 受众反馈特征

消费者对大白兔品牌传播的反馈集中于正面评价下“情怀”与“创新”的结合。多数消费者对大白兔的跨界尝试持肯定态度,认为其在保留经典元素的同时展现了创新意识。典型评论如“大白兔还是那个味道,但变得更潮了”“童年记忆也能这么时髦”等,反映出受众对品牌活化策略的认可。此外也不乏有一些负面的声音,多涉及产品体验与实际预期等。

四、总结

随着品牌发展日益年轻化的今天,更多的“大龄品牌”也存在着被淘汰的风险,而大白兔品牌的快闪、跨界、正是想从“新”开始,告别童年符号的简单消费,进行真正的再创新,更持久、更具有美学价值地发展下去。国产品牌,也正因如此,才能在新时代新潮流里奋进向前,延续和弘扬国产品牌的活力。老字号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工艺性、鲜明的品牌形象、独一无二的品牌文化,都在消费者心中占据了有利的位置^[5]。相信大白兔能够在国际品牌发展的潮流中重新寻找好自身的定位,制造出更多优质的产品,让国货迈出国门,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 [1] 林文萍.新时代文化市场视域下国民老字号的路径探析——以大白兔奶糖为例[J].中国市场,2020,(17):50-51.
- [2] 韩云,古怡.对品牌联名的策略研究——以乐町与大白兔的品牌联名为例[J].现代营销(下旬刊),2021,(02),44-45.
- [3] 史梦好.基于市场经济变动下的老品牌营销决策分析——以大白兔品牌为例[J].现代商业,2020,(18),10-11.
- [4] 孙倩,肖东升.出口企业突发事件干扰模型管理的构建[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06),51-55.
- [5] 黄珂颖,姚惠.老字号“大白兔”品牌视觉形象[J].时尚设计与工程,2023,(05):37-39.

Research on the shaping and communication of White Rabbit brand culture

Zhang Jiali

School of Art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things, more and more young brands emerge at the historic moment, resulting in some time-honored brands are facing a lot of challenges, but som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ime-honored brands can endure. As a traditional Chinese folk brand, The White Rabbit conveys the childhood memories of countless Chinese people. This paper will introduce the background of The White Rabbit brand, and then discuss the ways of shaping its brand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respectively, so as to conduct in-depth study and analysis of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Keywords: White Rabbit Creamy Candy; Brand Culture; Brand Building; Brand Communication

夹江年画在多元民间艺术谱系中的跨界再生机制研究

余 娇, 佟吉丽, 蒋 钰

(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 绵阳 621000)

摘 要: 夹江年画作为四川三大年画之一, 与绵竹年画、梁平年画共同构成巴蜀民间美术的重要谱系节点。其发展依托当地手工造纸业与蜀地雕版印刷技艺, 风格沉厚古雅, 地域特色鲜明。在多元民间艺术谱系相互交织的当代语境下, 夹江年画面临严峻的生存困境: 在谱系内部, 夹江年画与传统造纸、印刷、民俗等关联产业的生态链断裂, 同绵竹、梁平等地域流派的差异化价值模糊; 在谱系外部, 夹江年画困守单一品类, 致使其逐渐脱离现代社会文化语境。本文基于民间艺术谱系理论, 剖析夹江年画在谱系联动、媒介转化、代际传承、产业延展维度的结构性困境, 提出跨界再生的四重机制, 旨在为传统民间艺术的活态传承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 夹江年画; 民间艺术谱系; 跨界再生; 活态传承

基金项目: 西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 (25ycx1169)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417

一、引言

近年来, 国家高度重视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工作, 陆续出台相关政策。2021 年相关部门先后发布《“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1]《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等文件, 强调要加强非遗区域性整体保护, 加大非遗传播普及力度。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夹江年画以木版套印为主, 兼用手绘技法, 题材涵盖门神、戏曲故事、吉祥图案等, 色彩鲜艳明快, 线条粗犷有力, 具有浓郁的巴蜀地域特色, 是四川民间美术的瑰宝。^[3]然而, 随着现代化的加速发展, 年画赖以生存的传统民间土壤逐渐消失。城市化掏空了乡村, 春节习俗的简化大大减少了人们对年画的需求, 数字印刷技术的冲击也使手工技艺的价值越来越难以实现。随着老一代传承人的逐渐老去, 技艺断层的问题日益严重。夹江年画如今陷入了“保护困境”。一方面, 它们必须保持本质特色, 保留文化基因; 另一方面, 它们又必须找到适应现代生活的方式, 使这一技艺真正能够“生存”下去。现有研究大多从应用艺术、民间传说和遗产保护的角度来探讨这一主题, 这为理解夹江年画的文化价值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 也存在明显的问题: 许多研究仍然将其视为封闭的、自成体系的艺术形式, 很少将其置于“多样民间艺术的互动谱系”中考察。同时, 对于它们如何通过跨学科整合实现“再生”的内部机制, 也缺乏深入分析。因此, 本研究旨在聚焦夹江年画在多样民间艺术谱系中的确切定位、面临的实际挑战以及它们如何通过“跨界”方式实现“再生”。希望能找出一条既能保留传统文化内涵, 又能贴合现代审美需求的创新路径, 同时为当代传统民间艺术的转型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二、夹江年画在多元民间艺术谱系中的价值定位

夹江年画不光是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 它本身也是一个活着的“连接点”, 能把多种艺术脉络连在一起。夹江年画因其自身的传统文化优势, 在当代具备跨界转型的条件。下面我们将从历史和艺术互动这两个角度, 探讨夹江年画在民间艺术谱系中的价值定位。

作者简介: 余 娇 (1999—),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

佟吉丽 (1997—),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推广、中华文化传播;

蒋 钰 (1999—),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华文化传播、跨文化交际。

通讯作者: 余 娇

（一）历史谱系中的文化根基与技艺价值

夹江年画的历史定位根植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产业传统。夹江县坐落于中国西南部四川省境内，紧邻青衣江畔，是乐山市下辖的一颗璀璨明珠。这里不仅是四川通往雅安乃至西藏的重要通道，还因其丰富的竹资源和闻名遐迩的“竹料手工造纸技艺”而备受瞩目。^[4]夹江自古为纸乡与印刷重镇。明代《蜀中名胜志》记载夹江造纸业繁盛，其造纸技艺始于唐、继于宋、兴于明、盛于清，因质量佳、技术精而载誉巴蜀。^[5]夹江县水路交通方便，纸张供应也足，慢慢地就形成了“纸—画”一体化的产业传统，给年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夹江年画始于明初，距今已有 500 多年历史。至清代，县城近郊已形成二十多家作坊，“董大兴荣”“董大兴发”等画店享誉四方。这一历史积淀赋予了夹江年画三重独特价值。一是工艺体系的完整性。以木版套印为主，兼用手绘技法，包含画稿设计、雕版刻制、颜料配制等十余道工序。^[6]二是材料运用的在地性。采用本地手工竹纸，颜料多从矿物或植物提炼，冷暖对比鲜明，久不褪色；三是技艺传承的活态性。以家族与师徒传承为主，形成“口传心授”的隐性知识系统，传递审美判断与文化内涵，展现出开放性与适应性，具备跨界转化潜能。

（二）多元民间艺术谱系中的节点价值与互动网络

夹江年画并非孤立存在的艺术形态，而是在多元民间艺术谱系中扮演着关键的“节点”角色，与周边艺术形式形成深层的互动网络。在巴蜀年画谱系中，夹江年画与绵竹年画、梁平年画共同构成四川三大流派，形成互补共生的格局。^[7]与绵竹年画的华丽复杂、梁平年画的粗犷朴素相比，夹江年画有着“构图饱满、颜色沉稳、线条硬朗”的特点。夹江年画像一个“交汇点”，与不同门类的艺术互相影响、互相借用。如它的造型手法，与夹江的竹纸手工艺、本地剪纸、寺庙里的壁画及川剧的脸谱，都有着很深的内在联系。具体而言，武将门神的脸部画法，明显借鉴了川剧里花脸的造型；夹江年画的整体布局，也受了本地寺庙壁画的影响；而年画里那些吉祥图案，与剪纸、刺绣上的视觉样式也很像。正因为这些符号和手法在不同艺术之间通用，夹江年画成为了本地民间艺术体系里的一个“编码核心”。更关键的是，夹江年画里的图像可以跨媒介使用，这为它在当代社会的转型奠定基础。如门神这个形象，可以变成剪纸里的镂空语言，可以做成皮影戏里的表演，还能变成衣服上的装饰图案，甚至做成数字化的动漫 IP 形象。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时代要求下，夹江年画可在与文创设计、公共艺术、数字传播的融合中逐步形成新的文化形态。

三、夹江年画在多元民间艺术谱系中的传承困境

夹江年画在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一直很受欢迎，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观念和审美也发生了变化。并且随着机器印刷、喷绘等技术的出现，夹江年画逐渐被推向了边缘。目前，民间艺术种类繁多，各种文化交织在一起。在此背景下，夹江年画面临许多困境，如市场萎缩、创新思路匮乏、传承断裂等，这些困境致使其原有的价值逐渐被忽视。

（一）年画市场萎缩，产品销售低迷

传统年画本就和农耕社会的年节习俗绑得紧紧的，市场需求也跟着习俗走。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现代人对“年味”淡漠，张贴年画的人变少。^[8]夹江年画的消费人群由以前的农村居民逐渐转向了城市里的文化收藏者。但这部分人群的市场规模本就不大，需求还很分散，所以年画的销量大幅减少。目前电商平台虽为年画销售开辟了新渠道，但无法阻止整体市场萎缩的趋势。目前，夹江年画的传统实用类产品的销量持续下降，如门神和灶神。至于可收藏的精品，因其价格高而少有人购买，导致整个行业进一步萎缩。市场萎缩还牵扯到了整个产业链，以前的年画作坊都是“前店后厂”的模式，和造纸、颜料、装裱这些行业紧紧绑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生态。周边的辅助产业随着年画需求的减少而不景气。随着产业生态的崩溃，年画的市场困境只会愈演愈烈。

（二）年画产品同质，缺乏创新样式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审美偏好发生了明显变化。如果夹江年画想要再次走进千家万户，就有必要创作符合当代审美的作品。然而，目前夹江年画存在同质化严重的问题。传统夹江木版年画大多沿用旧方法。诸如门神、财神和送子图等经典图案被一再复制，没有任何新的元素。无论在题材还是艺术表现上，都没有突破或创新。缺

乏对当代生活的反思和表达,使其难以在年轻消费者中引起情感共鸣。此外,产品的创新只是表面化,主要局限于调整尺寸或改变安装方式,并未触及核心,即内容叙事和美学表达的深层次转变。目前,基于年画的文创产品仍处于探索的早期阶段。不仅品种少,质量也参差不齐,设计缺乏新意。由于缺乏独特性,这些产品的市场认知度较低。因此,夹江年画处于虽然知名度较高,但销量不佳的尴尬境地。

(三) 年画传承断裂,技艺后继无人

夹江年画的传承也面临着断裂的危机。核心问题就是传承人梯队断档,还夹杂着技艺失传的风险。制作年画是体力活,消耗的时间多,又没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年画艺人都愿自己后代传承年画技艺。^[8]随着时间的推移,老艺人相继去世,技艺人员青黄不接,画家纷纷改行。^[9]更令人担忧的是,许多核心技能只能通过工匠的长期实践来掌握。像一些高难度的技法和关键知识,大多只存在于老艺人的脑子里。这些知识尚未得到妥善保存或系统记录,一旦经验丰富的工匠去世,可能会完全丧失,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技艺随人而亡”。此外,传统的“学徒制”模式现在也难以维持。首先,学习周期太长,其次,收入不高,没有人愿意学习。此外,在目前的职业教育体系中,基本上没有相关课程,因此传承的路径被切断了。并且年画不再像过去那样必需,逐渐成为一种怀旧的象征。年轻人不会考虑将其作为职业,随着年画需求降低,继承者的社会地位较低。这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不愿从事这项工作。随着人才的流失,传承的困难越来越严重。

(四) 年画技术挤压,手工价值降低

夹江年画面临机械化生产与数字技术的双重挤压,手工技艺价值持续贬损。传统年画制作依赖刻版、印墨等数十道手工工序,耗时费力且产量有限,而现代色彩艳丽、价格便宜的机器胶印年画以及喷绘年画效率优势显著,给夹江传统的木版年画造成了激烈冲击。^[8]与此同时,电脑绘图软件和AI生成技术越来越普及,年画设计的门槛也大大降低了。那些“心中有图,手中有刀”的老艺术家的工艺和经验,如今已经被算法取代,手工创作的独特性逐渐失去了优势。从市场角度来看,消费者无法区分手工年画和机器印刷年画的质量差异。低价的机器印刷年画在市场上随处可见,手工年画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工匠们被迫通过降低价格进行竞争,或转向小众定制工作,其经济回报与其技能价值严重脱节。更重要的是,这种技术替代带来的危机不仅影响生产过程,还导致社会越来越不认可“慢工出细活”的手工理念。手工制作背后付出的时间、艺人的亲身实践,还有其中蕴含的文化温度,都被忽略。到最后,年画不再是一门“手艺”,顶多算是一件“产品”。在以效率为中心的技术浪潮中,它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正在逐渐被削弱和侵蚀。

四、夹江年画在多元民间艺术谱系中的跨界再生机制

上述困境揭示了夹江年画在现代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危机,但危机本身也蕴含着重构的机遇。年画从来不是孤立的民俗遗产,它是活生生嵌在民间艺术谱系里的文化资源,它与其他工艺相互关联。因此,复兴夹江年画需要通过跨领域的合作来寻求突破口。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从谱系联动、媒介转化、代际传承和产业延伸四个维度探讨夹江年画的当代转型机制。

(一) 年画谱系联动,重构市场共生

川渝地区的民间艺术资源十分丰富,其中绵竹年画、蜀绣、竹编、漆器等艺术与夹江年画共享巴蜀文化基因,具有天然的谱系亲缘性。^[10]夹江年画的再生应与巴蜀年画乃至中国木版年画的谱系相联系,可建立“年画+”艺术联盟,从而实现技艺之间的互动和产品的融合,例如将年画的构图元素融入蜀绣针法设计,或利用竹编工艺承载年画的装裱形式,形成兼具地域识别度与多功能性的文创产品,从而拓展消费场景的边界。在市场层面,也可以共同创建综合性的展销平台,如“巴蜀年画·非遗市集”。通过这个平台来整合分散的传承人资源和获取观众流量,降低个体艺人进入市场的成本。同时,还可以通过与文旅融合政策对接,将年画体验融入古镇游、民俗节等线路。让消费者从观看者的角色转向参与者的角色,在一些互动体验活动中与夹江年画建立情感联系。这种跨区域的谱系联动不仅可以防止“孤岛式”保护带来的文化狭窄,还能通过相互借鉴增强各个传统的独特性,形成“和而不同”的民间艺术生态体系。

（二）年画媒介转化，激活文化方言

在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数字技术对非遗传承保护有着重要影响。数字化保护作为非遗传承保护的一种新型方式，其通过文本、录音、录像、数字多媒体等多种现代化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系统全面的记录，保证其以数字化形式永久保存并便于检索。^[11]夹江年画作为一种传统民俗工艺，由于储存方式有限和传播手段落后，逐渐从公众视野中淡出，因此迫切需要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媒介转型和跨学科再生。我们认为在此背景下，应着重推动三个层面的转型：第一层是数字化存档。传统木版画、老照片以及制作工艺都应进行高精度扫描，并系统分类，以建立一个开放共享的“夹江年画数字基因库”。第二层是创造沉浸式体验。可以开发互动式AR年画，或者使用虚拟技术还原过去的民俗场景，如春节贴年画和祭灶等。数字资源的优势在于不受时间或地点的限制，复制成本低，使其非常适合在线推广和资源共享，从而通过个人体验让传统文化得以“复兴”。第三层是人工智能赋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用于辅助年画图案设计并创建个性化定制。然而，这必须基于“人机协作”，核心的文化符号应保持剪纸年画的本质，不能歪曲或误传。

（三）年画代际传承，创新培养体系

非遗手工艺的传承，离不开“人”的因素，传承人拥有传统手工艺技能，使这些传统技艺得以延续。因此，对传承人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夹江年画的活态传承可以建立“基础教育—社会普及—高等教育”的代际培养体系，实现传承人梯次发展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在基础教育层面，可以在夹江县中小学开设年画课程，培养青少年的文化认同感与非遗的情感联系。在社会普及层面，传承人自己应积极拥抱新媒体，利用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开展线上技艺展示，实现技艺的跨代际传播。而如何将夹江年画转化成年轻人更熟悉的设计语言，并使之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这是非遗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要诀。^[12]培养创新型传承人，应该加强与高校之间的合作，充分发挥高校教育在夹江年画传承保护中的作用，推动非遗文化与高校教育的融合。具体可通过以下两个途径：一是建设专业非遗夹江年画相关课程体系，培养高校学生的文化意识。二是建立夹江年画制作工坊，请夹江年画传承人进行讲学，让高校学生能够亲自体验夹江年画的制作过程。夹江年画进入高校，一方面可以使夹江年画逐渐被认识了解，另一方面可以培养既具有文化底蕴，又具有精湛技艺的创新型夹江年画非遗传承人。

（四）年画产业延展，重塑价值符号

要使夹江年画在当代真正“活起来”，就需要打破“工艺品”的单一标签。必须运用IP思维来重振这些老符号，建立完整的“内容—产品—场景”的产业链。首先是内容层面。夹江年画中的门神、财神和戏曲人物都是现成的文化IP。我们必须深入挖掘它们背后的故事，将其转化为可持续运营的资产。例如，这些角色可以制作成动画角色，发布为数字藏品，或与其他品牌进行联名和授权。将只能挂在墙上的静态图案，转变为能够持续产生新内容的文化符号。产品层面需要将年画元素融入现代生活，开发跨界产品，如文创家居和潮流服饰。这样人们购买的不是“年画”本身，而是一种文化认同感和生活方式。场景层涉及创建沉浸式体验。可以建造以年画为主题的城镇，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坊，并举办互动展览，连接生产、展示和消费。这将年画从“春节装饰”转变为日常可见的审美生活象征。总之，产业延伸的关键在于重新诠释夹江年画的价值，它不仅仅是民俗物品，更是承载怀旧情怀、审美趣味和文化自信的现代符号。

四、结语

夹江年画是乐山非遗的一块瑰宝，它当下的处境反映了中国很多民间艺术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普遍问题。本文从民间艺术谱系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夹江年画面临的几个结构性难题：市场萎缩、创新思路匮乏、传承断裂等。然后，我们系统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跨界再生机制，希望为夹江年画探索出再生的新路径。研究表明，夹江年画的活态传承核心不在于盲目迎合市场而自我解构，而是在多元民间艺术谱系的互动网络中，找到传统基因与当代语境的创造性结合点。这种再生既是技艺的延续，更是文化逻辑的重构。

参考文献

- [1] 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2021年5月25日.
-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21年8月12日.
- [3] 夹江县人民政府: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夹江年画:2024年12月27日.
- [4] 陈馨逸.夹江年画视觉元素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研究[D].北京印刷学院,2025.
- [5] 余哲雅.夹江年画文创产品设计策略研究[D].湖州师范学院,2023.
- [6] 夏东慧.夹江木版年画制作及纸材选择[J].造纸信息,2022,(6).
- [7] 江淼.巴蜀地区绵竹、梁平、夹江木版年画艺术特征多维比较研究[J].天工,2025,(31).
- [8] 曾冬梅.夹江年画发展浅析[J].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新论),2020,22(03).
- [9] 沈泓.中国濒危年画寻踪夹江年画之旅[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1.
- [10] 郝雯婧,王雪梅,许志强.四川非遗文化整合与传承[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
- [11] 夏三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以女书为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 [12] 李超德.非遗研究和创新设计需要新视角[J].湖南包装,2020,35(01).

A Study on the Cross-Border Regeneration Mechanism of Jiajiang New Year

Paintings in the Genealogy of Diverse Folk Arts

Yu Jiao, Tong Jili, Jiang Y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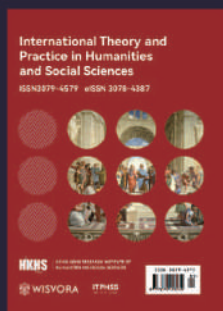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Sichuan,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three major New Year painting genres in Sichuan, Jiajiang New Year Paintings, together with Mianzhu New Year Paintings and Liangping New Year Paintings, constitute important nodes in the genealogy of Bashu folk fine arts. Its development is rooted in the local handmade paper industry and Sichuan block printing techniques, with a solemn, simple and elegant style and distinct regional features.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where diverse folk art genealogies are intertwined, Jiajiang New Year Paintings are confronted with severe survival dilemmas. Within the genealogy, the ecological chain connecting Jiajiang New Year Paintings with related industries such as traditional papermaking, printing and folk customs has been broken, and its distinctive values different from regional schools like Mianzhu and Liangping have become blurred. Externally, Jiajiang New Year Paintings have long been confined to a single form, gradually alienating them from the modern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folk art genea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ructural dilemmas of Jiajiang New Year Paintings in the dimensions of genealogical linkage, media transformation,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and industrial expansion, and puts forward a fourfold mechanism for cross-border regeneration,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for the living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folk arts.

Keywords: Jiajiang New Year Paintings; Folk Art Genealogy; Cross-border Regeneration; Living Inheritance

WISVORA 出版社：专注于学术出版管理，WISVORA 出版社提供期刊编辑、论文出版和国际索引、期刊创办、期刊托管等服务，增强学术研究的全球传播和影响力。

www.wisvora.com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是由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学术期刊，致力于为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个高质量的学术交流平台。本刊重点关注学术研究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旨在探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议题，促进知识的广泛传播与共享。作为一份面向全球中文学术界的专业期刊，本刊倡导跨学科、跨文化视角的学术探讨，为学术界和实践领域之间搭建桥梁，推动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与应用。

印刷出版 ISSN 3079-4579

电子出版 ISSN 3078-4387

ISSN 3079-4552



9 773079 455255



权责声明

期刊所刊载的评论、意见、观点等均出自文章作者个人立场，不代表本出版社的观点或看法。对于文章任何部分及文内引用材料给任何个人、机构、及其财产所带来的任何损失及伤害，本出版社均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郑重声明，本出版社的出版业务，不构成对任何产品商业性能的保证，也不表示本社已承认本社出版物中所述内容适用于某特定用途。如有疑问，请寻找专业人士协助。

学术赠阅